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编
苏位智 刘天路 主编

齐鲁书社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编
苏位智　　刘天路　主编

齐鲁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苏位智,刘天路主编.—济南:齐鲁书社,2000.9

Ⅰ.义… Ⅱ①苏…②刘… Ⅲ.义和团运动-研究-概况 Ⅳ.K2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779 号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

苏位智 刘天路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375 印张 2 插页 653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33-0903-0

K·260 定价:60.00 元

序　言

在义和团运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时候，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编写、苏位智和刘天路主编的《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正式出版，无疑是一件十分适时也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部对义和团研究进行世纪学术总结的著作。当我们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候，不论是流连往昔，还是瞻顾未来，都会很自然地回顾百年来走过的历程。因此，近年来，从各个不同学科和各个不同视角进行百年学术回顾的书，已经出了不少。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像这样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作出如此系统、详尽的学术总结的，似乎还不多见。由于各个篇目的撰写者大多是长期从事义和团研究的著名专家，文章的内容又不仅限于研究状况的客观介绍，更多的还是对各种学术观点及研究趋势的分析评述，就更增加了本书在学术上的深刻性和权威性。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我国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斗争。如果拿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衡量，义和团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有不少可訾议之处。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缺乏先进的武器。指导他们行动的是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手中执持着用来对抗洋枪大炮的不过是原始的大刀长矛。这样的运动无法避免悲惨失败的命运。但脱离历史事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以今天能

够和应该做到的去要求历史人物，这既丧失了起码的历史感，也远离了科学的历史观，是任何严肃的学术态度所不取的。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是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它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毕竟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世纪里走向新的更高形式的斗争的一个必经阶梯。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思和评论，事实上，从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起初，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就对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议论，有的诅咒，有的嘲讽，有的同情，有的赞颂。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更多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总结这场运动，评论者也逐渐从政治界转向学术界，使它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一直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个历史进程，在本书中有着生动具体的描述。

读一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状况，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受到中外历史学家长期广泛关注的学术课题。书中不但详细介绍了我国包括港台学者对义和团运动各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还具体评述了日本、欧美、俄国及前苏联学者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情况与进展。这一历史事件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是因为这场非同寻常的斗争，当时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不仅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其次，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正如本书有的作者提出过："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剧烈震动等，都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关注的话题。"不

同观点和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我们衷心希望这种好的学术风气，能够继续保持并不断发扬光大。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学术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水平，是越来越提高、越来越接近于客观历史真实的。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所以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人们只能在不断发掘和掌握新材料的过程中，用科学的历史观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创新，逐步达到对历史真相的更加深刻的认知。

对于既往的学术回顾与总结，同时也是对今后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热切地期望，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立足于已经达到的学术高度的起点之上，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达到新的辉煌。

2000.8.17.于
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序 …… 李文海(1)

第一部分 百年研究述评

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 陈振江(2)
建国前的义和团运动研究 …… 孙占元 徐玉凤 唐月民(26)
"语境"中的"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 王学典(50)
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 …… 程 歗(74)
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研究 …… 王如绘 刘晓焕(101)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研究 …… 喻大华(126)
义和团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研究 …… 张 鸣(144)
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 …… 吴士英(158)
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 黎仁凯(180)
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研究 …… 苏位智 刘天路(203)
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赵树好(221)
50年来义和团运动资料概述 …… 庄建平(239)
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 杜继东(253)
西方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 [德]R.G.狄德满(277)
日本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 [日]佐藤公彦(309)
俄苏学者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评述 … [俄]A.A.博克沙宁(333)

第二部分　百年论著目录

编例 …… (348)

第一编　中文论著目录 …… (350)

一　论文、资料 …… 张洪英　蒋秀丽(350)

(一)综述 …… (350)

(二)性质 …… (363)

(三)历史意义与教训 …… (367)

(四)组织与源流 …… (371)

(五)社会背景与发生原因 …… (377)

(六)发展阶段 …… (396)

(七)各地义和团活动和反教会斗争 …… (399)

(八)口号与政治思想 …… (431)

(九)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 …… (435)

(十)其他派别的态度与活动 …… (441)

(十一)列强对华政策与武装侵略 …… (446)

(十二)东南互保 …… (461)

(十三)中外舆论 …… (463)

(十四)辛丑条约 …… (468)

(十五)书评、史料、文物 …… (473)

(十六)学术动态 …… (511)

(十七)人物研究 …… (518)

(十八)文艺作品 …… (532)

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文章 …… (538)

二　著作、图书 …… 苏丽丹　关家铮(543)

(一)综述 …… (543)

(二)背景与教案 …… (558)

(三)组织与源流 …… (562)

(四)义和团运动在各地 …… (563)
(五)义和团时期的清政府 …… (573)
(六)两宫西巡 …… (574)
(七)帝国主义侵略及中外关系 …… (576)
(八)辛丑条约 …… (591)
(九)人物研究 …… (595)
(十)文艺作品 …… (601)
(十一)其他 …… (608)
三 台湾、香港地区研究论著目录 …… 杜继东(610)
(一)论文 …… (610)
(二)著作 …… (619)
(三)史料 …… (620)

第二编 外文论著目录 …… (623)
一 英文 …… [德]R.G.狄德满(623)
二 德文 …… [德]R.G.狄德满(700)
三 法文 …… [德]R.G.狄德满(735)
四 意大利文 …… [德]R.G.狄德满(769)
五 其他西文 …… [德]R.G.狄德满(776)
六 俄文 …… [俄]A.A.博克沙宁[中]苏位智(781)
七 日文 …… [日]佐藤公彦(796)
八 韩文 …… [韩]金希教(824)

后记 …… (833)

第一部分

百年研究述评

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陈振江

发生在19、20世纪交替时期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变。这场运动是中国人民以暴力反抗外来侵略和保卫社稷家园的一种特殊的抗争形式，它所涉及的社会层面和国际关系最为广泛，各种矛盾最为错综复杂，运动骤起骤落，矛盾瞬息万变。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引起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视，于是它们制造种种借口唆使清政府严厉镇压，并于1900年组成英、法、俄、德、美、日、奥、意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挑起烧杀劫掠不遗余力的殖民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灾难，时称"庚子国难"。这场国难异乎寻常地震惊世界，也异乎寻常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使他们对这场运动痛感惆怅和茫然！更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大肆歪曲事实真相以及诋毁义和团运动的言论满天飞，再加上义和团自身的蒙昧落后及其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使义和团拼死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性和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令人是非莫辨、真相难明。因此，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政界和舆论界对义和团的评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悬案。

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百年历程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研究倾向和重点。但是，有关义和团的成因、源流、性质、口号、作用和历史意义始终是

各家争论的焦点。而且讨论逐步深入，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有创见、有影响的论点，出现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为正确的评价义和团运动和深刻认识中国国情与革命道路以及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提供了充分的史实和理论依据。因此，百年来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多半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或坐而论道，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但也不乏科学严谨和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涌现。这里谨就20世纪百年间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形成的几次研究热潮的情况略作评述。

一　义和团运动早期研究的政治性及其导向

义和团运动的早期研究，系指义和团运动从酝酿、失败到辛亥革命前夕十多年间的各种研究活动及其著述、章奏、评论与不同形式的记述情况。19世纪末期，义和团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的基础上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而聚众起事，使封建统治阶级一时间弄不清其底细而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急于了解义和团的来历、成因及其起事的真正的目的和性质，以便制订是剿是抚的对策。因此，这一时期研究义和团的人多是山东、直隶等地的官绅，研究的重点是义和团的源流、起事的原因与性质。早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奉命派员到鲁西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得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的明确结论，并于是年6月30日(五月十二日)将调查情况奏报清廷。奏称：在咸同年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①]他建议清廷不镇压义和团，而采取"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并"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②]的笼统控制政策，成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说"的创始人和主抚派的代表人物。次年九月，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在查阅有关文献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义和团教门源流考》，他主

要根据嘉庆二十年直隶总督那彦成镇压白莲教的奏折，认为义和团是乾嘉时期的义和拳的延续，属于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的离卦教，是历来被取缔的"邪教"，并提出严厉镇压的主张，成为义和团来源于"邪教说"的创始人和主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张、劳为代表的义和团的早期研究者，大都是从考察义和团的源流或起因以确定其性质，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抚与剿两种对立的决策。可见，他们研究义和团不是做"纯学术"的文章，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手段在当时和以后的政治上、学术上都有很深的影响。这说明义和团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研究，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义和团时期及其失败后的10年间，有关义和团的著述、日记、书札、笔记、文集等等不下百余种，或综述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全过程，或记述某地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大多是作者的亲身见闻，亦有记录传闻者，成为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其观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贬损、诋毁义和团，称之为"拳匪"、或"拳祸"。有的亦记述了教民为害地方、官府袒教抑民、清军残杀义和团以及记述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等等事实。这些著作中，以曹倜的《古春草堂笔记》、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乔树生的《拳匪纪略》、艾声的《拳匪纪略》、管鹤的《拳匪闻见录》、柴萼的《庚辛记事》、仲芒氏的《庚子记事》等等较有影响。尤以恽著和李著中所分析的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与甲午丧师、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互为因果的，记述影响较大。但是这些记述所强调的不是由于外国侵略的加深的必然结果，而是封建顽固势力为报复外国人而煽起义和团运动。

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对义和团的评论很不一致，情况比较复杂，但各自的研究都只有为其政治服务的明确目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对义和团攻击诋毁不遗余力。梁启

超说："吾观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则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3]改良派所控制的报纸《中外日报》、《国闻报》和《清议报》等，连续报道和评论义和团运动，提出一些似是而非而又颇有迷惑性的观点。其中尤以《中外日报》发表的《义和团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论近日致祸之由》、《原近时守旧之祸》和《原乱》等几篇评论最为混淆视听。评论说：旧党"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故组织义和团而"而殄灭之"[4]；蔑称义和团是由野蛮派、小说派、闭关派和联俄派这"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也"[5]；断言"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6]。这种是非颠倒、歪曲和否定义和团反帝爱国的言论，一时间流布颇为深广。

与康、梁等人相反，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家和研究者，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旗帜鲜明地为义和团伸张正义，盛赞义和团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发扬光大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1900 年 12 月，《中国旬报》第 33 期发表题为《主权篇》的评论，义正词严地驳斥改良派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盛赞"义和团与外国争权"的爱国精神，深信这种精神"必发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之大国也"[7]。1901 年，《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评论，首先指出："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也。"这些"所谓文明国"的侵略罪恶才正是引起义和团反抗的根本原因。评论盛赞义和团"出于爱国之心"，"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8]。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促使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积极主动地从劳动人民中寻求力量，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并在理论上触及到了义和团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关系、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历史所赋予的重大命题。

二 20—40年代义和团研究的学术性与两种史观的对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和民族运动的高涨。觉醒了的人们面对国势日蹙和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探索造成这种"国将不国"危机局面的根源与解救的途径。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探讨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的前因后果，总结历史教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正力量和道路等重大课题，逐渐形成研究风气。刚刚过去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由于西方历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遂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形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尖锐对立。这种情况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最为明显。

二三十年代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著只有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但在各种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与教材中大都设有论述义和团运动的专章。在一些专史中也有较大篇幅的论述。其中以1922年出版的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书中论述义和团运动的篇章最具有代表性，影响也深远。梁著别出心裁地从"因、缘、果、报"四个方面论述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性质与特点。所谓"因"，是指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且有内因和外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分。他认为内因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外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纲纪废弛。"缘"是指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导火线。他把缘又分为亲缘（直接缘）和间缘（间接缘）。他认为戊戌变法是义和团的"亲缘"，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变而谋废立等等是间缘（助缘），"因缘和合，果斯生焉"。他把义和团的"灭洋"

和反侵略活动，以及对外宣战等等都视为“果”，把义和团运动之“果”称之为“一幕滑稽剧”、“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义和团所得到的“报”则是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梁启超从多方面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不无可取之处。但他从根本上颠倒了是非曲直，把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引起义和团反抗的主要原因歪曲为“外因”，反而把排外与迷信视为义和团运动的“主因”或“内因”，把义和团与爱国清军英勇抗击八国联军蔑称为“极奇特的病态”[9]。这种错误观点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旧调重弹而了无新意，只是在方法和理论上运用“因缘果报”的唯心论推断出一套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并被不少学人所接受。例如，高彦博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说：义和团运动完全起于“排外心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强调义和团的迷信心理，认为“自群众而言，唯有神道，义和团说遂起”。还有一些教材和著述亦采纳梁著的错误观点。

但也有一批资产阶级学者在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基础上得出比较客观、正确的结论。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传统”的排外与迷信心理，而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的结果。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欺凌而造成民众的“公共的积愤”和民众严重的“生活的不安”所致。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认为，主要是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教民横行乡里，其次是偿付赔款，人民负担加重和吏治败坏引起的。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较全面地论述了义和团运动并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义和团的斗争方式虽然落后，但它具有强烈的民族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精神。他说：“论者责其方法不善可已，至其反抗压迫之精神，则正中国民族性之表现也”；“而吾华民族主义精神之公然流露，实以此次运动为嚆矢，此又读史者所不可不辨也”[10]。此书以严肃的治学精神正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原始落后，而充分肯定其坚决反帝斗争的民族精神。而

且论述充分、分析透彻、观点客观公正，使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学术性明显地增强。

随着中国人反帝运动的高涨，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林育南等人，从1922年开始，以《向导》和《中国青年》等为阵地，发表一系列的全面评价义和团的论文，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反动唯心史观的清理和批判，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并为义和团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他们研究义和团的主要倾向是认识国情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研究的重点是全面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的社会背景，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成因和性质，深入剖析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

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者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史观全面评价义和团运动，得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11]；或"民族解放运动"等鲜明的结论。林根（即林育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太平天国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第一次表现，"义和团是第二次，辛亥革命是第三次"[12]这一著名的论断，成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创始者。他们在评论中充分肯定义和团和农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称赞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头一次充分的表现"[13]；断定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样，都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的"[14]，或者说"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15]。这些论点不仅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和农民的历史地位，还肯定了义和团所进行的这场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此外，他们尖锐地批评义和团"仇杀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斗争手段的拙劣；指出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结果"[16]。

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义和

团运动的先河，并在义和团史的研究中日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对许多具体问题所作的结论，而在于他们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在中国初步建立起影响深远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逐渐成为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且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尖锐对立。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出版了一批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新史观、新体系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着重阐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崭新的新史学体系。当然以反帝为主要目的的义和团运动便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1945 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以巨大篇幅和唯物史观全面系统地论述义和团运动，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令人认同和深思的新见解。例如，该书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无疑是甲午战后的外国侵略和满清暴政"所引起；认为"义和团与大刀会实际上合成一个'灭洋'团体"。此外，对义和团的源流、历史功绩、清统治集团的各派人物以及东南互保、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勾结等等都有精到的论述。平心而论，范著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虽有"拔高"之嫌，或有争议之处，但总体上看却是高水平的论著：观点新颖，分析深刻，史料丰富、翔实，论述精当，实事求是而无"八股腔"。这种以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科学理论与方法，逐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形成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

三 50－70年代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成就与偏向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建国初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7年间，共发表文章约200余篇，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等著作。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论丛》是建国初期发表的有关论文选辑，它从不同的方面肯定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清理解放前各种诋毁义和团运动的旧史观。特别是同年翦伯赞发表的《义和团运动》的讲演[19]，论述尤为全面、精详，并以史论结合见称，成为称誉一时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它深刻地论述了义和团兴起的国际与国内的社会环境，明确地论断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他认为，"义和团在组织上继承的是八卦教的形式，有禁欲主义的宗教意识，但在宗教迷信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他认为义和团主要打击洋人和外国侵略者所表现出来的偏狭的排外和仇教是可以理解的；认为义和团的阶级成分复杂，并"在清王朝可耻的欺骗、出卖和帝国主义强盗的联合进攻之下失败了"；但它的爱国反帝精神永不磨灭。这些论点不无争议，但基本上成为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观点。

这17年间，有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成绩斐然可观。大型资料《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史料丛编》等相继出版，为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义和团团民和运动的参加者与目击者的口碑资料，如何若钧等人的山东、河北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的天津义和团调查、山东大学的山东义和团调查等等，都是极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活动，抢救了一批难得的当事人的口碑资料。总的说

来，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倾向是批判和清理以往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和歪曲，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和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这个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及其阻止瓜分中国等巨大的历史作用与积极意义。

但是，这个时期史学工作者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研究义和团运动史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批判”与“肯定”难免偏颇，甚至1957年后“左”的倾向的影响和干扰已掺杂其间。特别是60年代初期由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形成的政治气氛十分严峻，而使学术研究一直处于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紧张状态，遂使正常的学术争论被扭曲，而使极左思潮干扰学术研究。及至10年动乱和极左思潮大泛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煽动群众“造反”和篡党夺权，从而掀起了无限夸大与吹捧义和团、红灯照的歪风。但是这类“紧跟政治风向”的影射史学，无论如何算不上正常的学术研究，反而对义和团的研究产生极坏的影响。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重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真正的繁荣。

四　改革开放推动重新评价义和团运动

改革开放促进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并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于是在80年代前后开始了重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学术讨论。重评的主要倾向是清除极“左”思潮和“四人帮”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干扰和破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的同时，正视它的落后、消极及其盲目排外等缺陷，并对义和团运动作具体而深入的探索。这场讨论是由张玉田的《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18]、李侃的《义和团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20]

等文为发端的，及至1980年11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会形成讨论的高潮。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义和团运动是否奉旨造反和"封建蒙昧主义"，以及义和团的源流和性质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张玉田提出，"我们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研究中的流毒，全面正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他认为在肯定义和团反强暴、反压迫及其反帝爱国性质的同时，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正视和评价它的落后的一面，"应当把它作为沉痛教训来加以接受"。李侃亦持类似的观点，并对"义和团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孔"、"排外"等问题详加驳议。王致中的文章亦强调要正视义和团的落后性，强调这场运动"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而反对"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反对"把义和团斗争的一切行为一概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性质"。他认为"义和团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这些见解与大多数的论者并无分歧。但是，他认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并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蒙昧主义实在难以用主流、支流来解释[1]等论点，却引起广泛的论争。

在80年代重评义和团运动的讨论中，重大的"悬案"如源流、性质、口号、排外、历史作用等等几乎都有争论，但决不是80多年前旧观点的翻版，而是学术争论的深化与发展，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和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源流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远远突破了传统的"乡团说"或"白莲说"，而是提出多种见解。李世瑜认为义和团是白莲教、大刀会等民间秘密宗教与义和拳、梅花拳等秘密结社的结合，原叫义和拳或义和门[2]。徐绪典则认为光绪年间的义和团和以前的义和拳在组织上没有继承关系，而是一个新型的组织。参加义和团的各种拳派和刀会，都放弃了以前的信仰而成为新组织的成员[3]。路遥认为义和团是大刀会、大红拳、梅花拳、义和拳等各种拳会的混

合体，其主要的组织是与金钟罩（大刀会）相结合的神拳[24]。程献认为是众拳会、结社的结合[25]。陈振江认为主要是以民间习武团体为基础，并有白莲教支派的参加[26]。周海清认为义和团源于八卦教的外围组织——武场[27]。此外，持乡团或团练说的论者也有新的论证。但明显的趋向是愈来愈多的论者同意"多源同流"的观点。陈振江、程献在《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一书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环境中的民间宗教、组织数量多，类型和性质各异，就是同一性质和类型的宗教、组织、宗支也不同，师承存在歧异，再加上各地区的差异，所以很难笼统地把某一具体民间宗教、组织排除在义和团源流之外。因此需加强将近代下层民众反抗斗争组织形式、思想渊源结合起来分析探讨。此外，《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汇集义和团自身的文献最为齐全，考证与诠释精炼，并对义和团源流、性质、口号、作用、阶级结构、思想、信仰与习俗等等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基本上可以反映出80年代的研究水平。

2.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这是80年代重评义和团运动所争论的问题之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对"扶清灭洋"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李侃认为"扶清"是扶保清朝，"灭洋"是笼统排外，而绝对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28]。荣孟源等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国的内容，"灭洋"可以解释为排外[29]。廖一中等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华和扶保清朝双重内容；"灭洋"是反帝与笼统排外的统一体[30]。其二，这个口号有无策略意义？李侃等认为它不是策略，因为"农民小生产者是提不出类似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陈振江则认为争论的关键在于应以什么方法、什么标准评价义和团的斗争手段和解释"策略"。"扶清灭洋"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灭教"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可见，"扶清"只是迫于斗争形势而采取的有

条件的权宜之计，具有策略的意义[31]。其三，"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大都认为既有推动义和团运动发展、动员各阶层参加反帝斗争等积极作用，也有模糊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而受其蒙蔽与欺骗的消极作用。总的说来对其作用问题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对消极作用的估价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3.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再评价。如上所述，从二三十年代起，学术界已逐渐认同义和团运动是农民群众自发性的反帝运动。四十年代，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进一步阐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对抗帝国主义瓜分野心的反帝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已是不争之论。及至改革开放时期，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又重新探讨和论争。争论的焦点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义和团运动是不是农民革命或农民战争？建国以来，大都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旧式农民运动；刘大年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32]；胡绳认为它是古代"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33]。1979 年以来，一些论者提出了异议。有的认为义和团运动没能触动封建制度的一根毫毛，义和团从来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因此它不是农民革命[34]。苑书义则认为，根据"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的原理可以断定，"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35]。其二，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1979 年李侃提出义和团运动不反封建。他认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的纲领，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36]。王致中等不少论者也都持这种观点。荣孟源则认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37]朱金甫、庄建平认为山东义和团多次对抗官府官兵、浴血战斗，甚至一县或数县义和团联合打击清军，义和团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比在反帝反洋教斗争中的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38]戚其章认为，不能以推翻封建统治，变革封建制度，改变生产方式作为

农民起义反封建的标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封建的标准[39]。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斗争暂居次要地位，各地义和团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封建，有的不反，情况比较复杂，连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也搞不清义和团是否反对他们自己[40]，因而清朝统治者内部的争论也很激烈。可见反封建与否的复杂性。其三，关于"封建蒙昧主义"和奉旨造反的争论。实质上，这是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问题论争的深化。1980年王致中发表《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着重研究封建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41]。仅就这一论点并无多大争论。但他进而断言义和团运动"就高潮阶段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运动"；义和团的封建蒙昧主义"实在难以用主流、支流来解释"，这些观点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苏寿桐认为，"北京义和团的确已经同顽固派沆瀣一气，参与了清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被"逐步改造成为'努力王家，同仇敌忾'的工具，纳入他们'盗窃兵柄，窥伺神器'的网罗"[42]。林克光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义和团接受招抚，即所谓奉旨造反的过程，正是义和团受清政府控制，逐步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权的过程，所以奉旨造反并不是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标志，而是开始走向退潮的信号"[43]。路遥在《义和团运动》一书中对这场争论作了简明的概括，发表了精到的见解。他说："对'义和团运动有宗教迷信的蒙昧的表现'及其消极影响这一不争的事实并无人否认，关键在于对其评论不能离开这种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根源，更不可不切实际的贬低或夸大其词。"他指出，早在40年代，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上册就已明确的指出：义和团"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同时也显示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的来源，主要是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迷信只能起辅助作用"，"说义和团运动仅

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迷信行为，那只是不合事实的毁谤”。50年代，剪伯赞亦指出：“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路遥评论说：“这些论述是正确的，还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的迷信尚表现为大量的巫觋风习，其宗教色彩却又更多的表现为白莲教系统的宗教异端特征”；“而白莲教异端却又是旧式农民所具有反封建统治斗争的传统，这两者都不宜用‘封建蒙昧主义’来概括。对于这些特征，我觉得用‘神秘主义’与‘异端宗教’的说法似乎比‘封建蒙昧主义’的提法更为恰当”。关于“奉旨造反”的争论，路遥认为，应该弄清北京义和团中的“官团”、“私团”究竟各有多少？“它们在北京的各自活动情况如何？对这些问题，至今还不完全清楚，有待于深入研究。因此，否认义和团是‘奉旨造反’，或认定它已被纳入‘窥伺神器、盗窃兵柄’罗网，似乎都仅从某一局部现象来考察，离全面的分析尚有距离”[44]。

4、关于“灭洋”与排外主义的争论。“灭洋”是义和团运动的口号和斗争目标，其表现形式是笼统排外，而实质上则是反帝斗争。80年代以来对“灭洋”的认识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李侃认为“‘灭洋’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这个‘洋’字，在义和团那里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义和团的‘灭洋’，在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还要根绝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事物，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那就是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了”[45]。朱东安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灭洋”的确是义和团憎恨一切洋人、洋事物的表现。但是，“他们对洋人、洋教、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的憎恨，都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

起的”，因此“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正是“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49]。

在义和团“灭洋”问题的讨论中，争论的双方都不否认义和团笼统排外的事实及其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二者的分歧在于：前者对“灭洋”的历史作用基本否定，或否定过多，后者则是基本肯定并指出义和团运动所不能克服的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性及其斗争的盲目性与落后性。因此，这个问题的争论不是史实之争，而是理解和运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形成的观点分歧。

五　80－90年代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局面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又有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深入探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研究主题突出、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方法与理论增新，以及新论题的提出和旧论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等新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人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和学术争鸣正常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一新局面的开始和形成，在时间上并无具体而明显的界碑。但是1986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所讨论的重点与取得的重大进展，大体上反映了义和团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明显拓宽。1996年在保定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讨论会”，既是天津、济南讨论会的继续和深化，又是开拓新论题和展示新思路的一次有意义的研讨会。

1986年天津会议前后发表的论著以及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重点，大都围绕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而立论的，体现了探讨新问题和开拓新领域的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研究者较广泛地注重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多层次的探讨，而不是局限于论列这场运动的具体情节。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初步运用了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结构分析，以及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下层社会与群体意识等等。这些文章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心理、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义和团的思想以及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等问题。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编成《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年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一批研究社会基础的论文着重从社会结构的变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成因、成份及其斗争宗旨等。程洪在《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17]一文中认为，当时旧的生产部门结构已趋于破坏，新的工业化为标志的结构尚未确立。就业结构危险正动摇着社会的基础。自然灾害频仍，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打破了就业结构的平衡，外国在华势力又从中推波助澜。文化结构的迟滞变化，以一种带强烈色彩的方式反映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难免不沦为一场民族灾难，而使反侵略的任务无法完成。

李文海、刘仰东的《义和团时期社会心理分析》[18]一文，把义和团的心态与行动放在社会心理的大环境中考察，别开生面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与局限，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此文分析了这场运动的特殊风貌和斗争形态，认为当时的社会心理主要反映了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心态、愿望和认识水平。文章认为迷信思想是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之一种，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心理背景，它在一个时期里发生作用，但毕竟因其反科学而不能持久。文章认为，义和团时期谣言四起、流传迅速广泛，是同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相关的，即在某种社会压力下个人盲目地接受外界的影响，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义和团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而使运动来得如此迅猛异常。此

文还用"逆反心理与社会刻板印象"解释义和团笼统排外主义倾向，立论颇为新颖。徐绪典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民反帝爱国的朴素感情自发地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即驱逐洋人，恢复中国的旧秩序"。"这是现实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之后，人们自发的'反馈'，表露出痛苦和希望。"[49]这种情绪和意图的广泛流行，成为当时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探讨义和团运动的组织基础虽属源流范围内的老问题，但不少文章则从更深的意义上论证了民间各种"自卫身家"的武术团体、秘密宗教和形形色色的团练是怎样在民族矛盾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凝集成了强大的民众运动，下层民众是怎样在共同的民族传统和反侵略的群体意识的基础上迅速联合起来的。有关"东南互保"的争论也是"旧题新论"和研究深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对它几乎是众口一词，完全否定。天津会议上却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金家瑞、谢俊美和刘天路分别发表专论"东南互保"的论文，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三篇文章均收入《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论文集》)。金家瑞在《论"东南互保"》一文中仍然坚持否定观点，并进一步详加论列。谢俊美的《"东南互保"再探讨》认为它有着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是"牵制"各国的"救急要著"；它在防范外国侵略者对长江流域的新的侵略扩张与争夺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互保"反映社会各阶级保护本国经济的愿望和要求，对维护南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刘天路的《"东南互保"述论》一文对"东南互保"的形成、本质及其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他认为"东南互保是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与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清廷对外宣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于各自的需要而互相利用的产物。"认为刘、张等人策划东南互保具有对外限制的一面，其指导思想是"以夷制夷"。但"互保"的"主要方面是对外妥协"。其结果"非但不能阻止侵略，反而提供了侵略的便利"。程献的《神拳

与义和团》等论文，从不同的层面对义和团运动的源流、组织基础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可称之为"旧问题论出新水平"的代表作。

在1990年纪念义和团运动90周年之际，在济南举行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199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同1986年天津会议的主题虽然一样，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则有显著地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提出开拓性的新论题；二是旧问题的争论亦有新的突破；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显示着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交互辉映。这次会议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的主要标志，是一些论者提出并论证了灾荒与游民社会的成因、游民流动趋向、游民社会与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成员构成及其信仰与思想状况。陈振江在《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9]一文中，对华北游民群体的社会成因及其流动趋向进行了论证，认为在频繁的天灾袭击下，倾家荡产的流民群体是华北游民社会最主要的成因。文章着重分析了游民的社会心态、信仰与结社的情况，认为大批秘密教门的信徒转而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激化了教门与教会的冲突，成为反洋教的重要原因之一。林敦奎的《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10]一文，系统地剖析了北方的自然灾害连年袭击，进一步激化了反帝反封建的怒潮；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几乎与北方数省的天灾同步行进，这就给运动输入更多的群众，而形成反帝高潮。程歗在《民俗信仰和拳民意识》[11]一文中提出并全面深刻地论证义和团运动是历史时代和乡土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文章认为，神秘主义"对于农民爱国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斗争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些文章是全面探索灾荒与游民社会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尝试，拓宽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领域。不少学者认为，这些方面的确大有文章可做，是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方面。

“旧问题新突破”是这次济南会议的又一显著特点。例如路遥的《“义和拳教”钩沉》[59]、王如绘的《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60]等论文，对源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有的论者不仅从组织形态上对义和团运动的源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还深入到拳会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在精神，以论证在华北农村形成的不受外国欺辱也不屈于封建压迫的刚劲民气乃是运动的思想源流。这是源流问题研究中的新突破。此外，义和团运动与秘密结社的关系这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仍然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例如有的论证义和团运动与八卦教不是依附关系，而是两者互有影响。

1996年保定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两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题：一是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变迁；另一个是几任直隶总督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的研究。前一个论题是前两次“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的继续、深化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后一个论题则是一项富有开拓性和独特性的新论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论题所论述的内容有着密切关联，并对晚清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直隶南部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直隶省的天津等府县则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的斗争中心和抗击八国联军的主战场。直隶省城保定及其附近地区，既是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又是八国联军骚扰和进行报复与毁灭性打击的重灾区。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直隶境内的义和团活动、社会状况等问题则很少有专题研究。这次研讨会着重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有一批论文深入研究直隶和华北社会经济的变迁、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以及民间信仰等等。黎仁凯在《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61]一文中，着重探讨了直隶社会的特殊性，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社会根源。他说：“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无序运行的特殊环境，酿成了特殊的社会心理，造成了人们心理的无序互动、人心浮动、讹言四起”，并指出：“天灾是酿就直隶群众特殊社会心态

的酵母，也是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的催化剂。"李金鹏的《景廷宾反洋教斗争考略》[35]一文，以充分的论据论述景廷宾起义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余绪，而是在民主革命派人士的支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清起义。这些见解促使学者进一步的思考。义和团运动前后，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由镇压到支持，最后在八国联军攻击下兵败自杀；再次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极力反对义和团，并负责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和"处理善后事宜"。几任直隶总督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同，说明晚清政局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因此，对直隶总督的研究是深刻了解晚清政局和义和团运动的又一条途径。

上述研究状况表明，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多彩。本文所述评的4次大型研讨会论文集和1984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论文集》、1985年路遥编的《义和团运动》是全面系统地反映出各个历史阶段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的论文集锦和标志。八九十年代的20年间还出版了一批很好的专著和资料，例如：廖一中、李德征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1981年)，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年)，陈振江、程献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1985年)，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86年)，路遥、程献

注释

① 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5 页。

② 同上,第 16 页。

③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43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第 18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⑤ 同上,第 180 页。

⑥ 同上,第 181 页。

⑦《中国旬报》第 33 期(1900 年 12 月 26 日)发表的《主权篇》一文,收录在徐绪典主编的《义和团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附录》,齐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0—303 页。

⑧《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第 59、60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版。

⑨ 详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第 123—127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⑩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⑪ 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 81 页。

⑫《中国青年》第 88 期。

⑬ 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 81 期。

⑭ 林根:《介绍八十一期以后之向导》,《中国青年》第 51 期。

⑮ 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 81 期。

⑯ 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 81 期。

⑰ 这篇讲演稿发表在《历史教学》1958 年第 5 期。

⑱ 见《辽宁大学学报》,1979 年第 1 期。

⑲ 见《历史教学》1979 年第 2 期。

⑳ 见《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㉑ 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㉒《义和团源流试探》,《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㉓《义和团的源流问题》,《义和团研究会刊》。
㉔《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册。
㉕《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㉖《简明中国近代史》,第262—26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㉗《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和发展》,《破与立》1979年第6期。
㉘ 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0日。
㉙ 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㉚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87—91页。
㉛ 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㉜ 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60年8月30日。
㉝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54页,人民出版社19年版。
㉞ 左步青、张鸣九:《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㉟《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第416页。
㊱ 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㊲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28页。
㊳ 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5期。
㊴ 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4期。
㊵ 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㊶ 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㊷ 苏寿桐:《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
㊸ 林克光:《评义和团运动人两个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㊹ 详见路遥编:《义和团运动》,第23—27页,巴蜀书社1983年版。
㊺ 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
㊻ 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㊼ 该文收入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㊽ 全文收入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㊾ 徐绪典:《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全文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㊿ ㊿①㊿②㊿③㊿④诸篇论文均收入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㊿⑤ ㊿⑥两篇论文均收入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　华北社会　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建国前的义和团运动研究

孙占元　徐玉凤　唐月民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它出现之时便有人对其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在建国前的50年间，中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与阶层以不同的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评价义和团运动，出现了数量比较可观的一批或叙述性或研究性的成果，使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作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并且不断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开展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对于建国前义和团运动的研究，80年代初有两篇考察与述评的文章发表，[①]使学术界对于这个领域建国前的研究概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艰辛劳作。由于建国前有关义和团研究的材料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而且难于全面查找，以至于以往对这个时期义和团研究的全貌难以有全景式的把握。本文力求尽可能地把建国前义和团研究的有关材料搜集到，并分两个阶段介绍义和团研究的大体脉络，分十个专题评述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不同层面的研究进展情况，以期有助于对建国前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全貌和主要问题的了解和把握。

一

建国前的50年间，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义和团运动发生到辛亥革命前；第二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第一阶段：震动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失败，曾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清朝的统治者、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对义和团发表各种看法，持有不同的态度，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在义和团还处于萌发阶段时就已经有人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为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着意于探寻义和团的起源和流向问题。如山东巡抚张汝梅在1898年上奏中认为义和团起源于乡团，吴桥县令劳乃宣于1899年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继任吴桥县令支碧湖于1900年撰《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其持论带有很深的个人偏见与阶级偏见。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社会上各政治派别极为活跃，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申报》、《中外日报》、《国闻报》、《同文沪报》、《清议报》等都有大量文章议及义和团，[②]绝大多数文章把义和团称为"拳匪"、"拳乱"。在当时对义和团不绝于耳的诬蔑声中，著名思想家容闳却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义和团代表了中国的民气。[③]

这一阶段，已经登上并活跃于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也对发生不久的义和团运动予以评价，同时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表明自己的态度与把握自己的策略。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否认义和团有积极作用，他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章，站在君主立宪的立场上，反对民主革命，连带攻击义和团。在他看来，革命会召来外国干涉，八国联

军侵华就是义和团暴动召来的，而且人民大众素质还太低，没有谈论革命的资格。与梁启超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许多人则肯定了义和团的积极作用。早在1901年，革命派主办的刊物《开智录》发表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该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义和团的发生，赞扬了义和团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指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义和团运动后出现的政治形势是革命者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④]这篇文章发表在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朝野上下许多人对义和团是一片诅咒和诬蔑的时刻，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无畏精神。孙中山也对义和团作了重要评论，他一方面批评义和团的愚蒙，由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另一方面又从义和团看到了蕴藏在下层群众中的巨大力量，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障碍。[⑤]还有章太炎、汪精卫等当时的民主革命者也以分析的态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评价。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可取的，看到义和团愚昧落后的一面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肯定义和团的巨大力量又使革命党重视会党在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中的作用。

这一阶段为后人留下了大量有关资料，各种上谕、奏折、函电、笔记、日记，记载了义和团发生前后的情况，如《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教案奏议汇编》、《有关"东南互保"资料》、《庚子海外纪事》、《庚子教案函牍》、《拳案杂存》、《山左教案函牍》、《拳匪纪略》、《辛惠纪略》、《平原教匪纪略》、《津乱纪实》等等。[⑥]它们虽然多数带有统治阶级的偏见，但不失为价值较高的珍贵史料。

这一阶段，人们对义和团的研究刚刚开始，显得比较粗糙，虽然研究的面已涉及到源流、起因、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但总的来说还是不系统的。不过毕竟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出现了初步繁荣，整理出版了许多有关的研究资料，出版了几十种研究著作。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方同以王芸

生、李鼎声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对义和团评价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义和团运动，使研究工作更加深入，成效也较显著。

这一阶段，大量有关义和团的研究资料得以整理出版。主要有：《清实录》、《东华续录》、《清史稿》、《光绪政要》、《光绪条约》、《续碑传集》、《碑传集补》、《清季外交史料》、《清史纪事本末》、《清鉴辑览》等，还有《清稗类钞》、《国闻备乘》、《掌故拾零》、《满清外史》、《清代轶闻》、《晚清祸乱稗史》、《清朝野史大观》等稗史掌故类史书，其中都有专门章节记述了义和团运动。还有关于义和团的各种专门资料，如《掌时上谕》、《庚子京师褒恤录》、《庚子纪事长札》、《庚辛纪事》等等。⑦

辛亥革命后，许多学者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刊载了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两篇文章，这是最早系统记述义和团的文章。两文互为补充，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概貌。以清政府为中心记述义和团，对帝后两党与主剿和主抚两方力量的对比消长，义和团的源起与组织和发展状况等都有所记载。行文中处处称义和团为"拳匪"、"拳祸"、"匪党"，暴露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偏见。⑧

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论及义和团运动。他用"因缘果报"的方法来分析义和团，力图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必然的联系，这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方法。而且他注重了民族性和心理史的研究，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思路，拓宽了领域。他的史学研究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同时代的一些有关义和团的著作，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中大体沿袭了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义和团之"因"，在心的方面为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在境的方面为外力之压迫，政纲之废弛。义和团之"缘"，又分亲缘、间缘，亲缘又分主缘和助缘，戊戌政变，

教案问题等都是义和团运动之缘。义和团之果，主要有：山东直隶团匪组织蠢动，两省官长纵容，北京王大臣附和，对全世界宣战，戕杀教徒及外国人，围攻使馆，毁坏铁路等。义和团之报则为：八国联军入京、东南互保、俄占东三省、辛丑和约、清末新政等。[9]

有一些史学家对义和团运动表明了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看法，如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和陈功甫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等，对义和团的起因、性质、作用都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评价。如王芸生指出，甲午战后割地赔款造成排外仇教的感情洋溢全国和清王朝吏治败坏为义和团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肯定了义和团在近代外交史上的重大意义，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企图，对中国有保全之功。[10]李鼎声也认为，义和团是一种反帝国主义运动，反映了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11]他们对义和团的分析评价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也比较公正。

在这一阶段，义和团研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新进展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开始系统、全面地研究义和团运动，不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义和团研究的新局面。

早期共产党人对义和团的研究始于1924年。这时，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指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国人民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觉醒程度不断提高。1924年，出现全国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从1924－1927年，每逢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之日的国耻纪念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集会以纪念国耻。《向导》、《中国青年》发表"九七"特刊，专述义和团。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彭述之、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用马列主义史学方法和理论对义和团进行了重新评价。探

讨了义和团的起因、性质、历史地位、失败原因等问题，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诸如“匪”、“野蛮”等诬蔑之词，认定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探讨了义和团的起因，指出义和团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必然结果，从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上给义和团以肯定评价，从历史的、阶级的等原因上分析了义和团失败的必然性。毛泽东对义和团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他肯定义和团同抗日战争一样，“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2]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及有关农民运动的一般论断，为义和团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1940年5月，杨松、邓力群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纲》问世，这是用马列主义方法和观点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初步尝试。大纲分析了义和团爆发的原因、起源、思想、组织、阶级基础、发展经过、失败的原因及教训等。认为义和团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农民与封建贵族地主之间这一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被反动的清政府利用，很快失败，并未表现出反封建的性质。

1945年11月，范文澜在延安写成《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年秋出版发行。该书第八章以“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为题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着重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分析了义和团的起因，再加上外国侵略和清朝的暴政，义和团运动终于爆发。义和团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广泛的群众反帝运动，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教训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抛弃了旧式农民起义，转向自觉的民主运动。[13]

当然，还有蒋介石、余家菊等一部分人反对革命，把共产党比作义和团，诬蔑义和团，代表了学术界最顽固的一部分人对义和团的认识。

二

建国前，国内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主要就义和团的源流、义和团与近代教案的关系、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性质、《辛丑条约》、东南互保、驻外使节的活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及失败原因、义和团运动的地位与作用、义和团与五卅运动等的比较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和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与教案没有关系。清吴桥县令劳乃宣认为义和团源于白莲教的一支八卦教，而八卦教兴起于嘉庆年间，当时"天主、耶稣犹未通行"，因此义和团并非因仇教而起，义和团起事的目的是"聚众结盟"、"煽惑招诱"、"谋为不轨"[14]。蒋廷黻则认为"义和团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15]

而陈捷则把教案视为义和团兴起的一大原因，他在《义和团运动史》一书中分析义和团的起因时指出："外人以兵舰之力，欺蒙之术，攫得传教之权，在华从事侦探政俗，干涉法案，藐视官民，欺侮平民之举动，我国的无知愚民，也往往以入基督教为逋逃薮，依仗外势，鱼肉同胞。加以各地教堂终年扃闭，异常秘密。教徒有疾病相死者，每按彼教之习，以水沃额而封其目，于是挖眼剖心之说，哄传于我不知底细之华人间，而教祸始矣"。此乃教案的起因。他列举了1858年广西西林教案，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教案，1867年四川教案，1869年天津教案，对这些教案的不公正处置，激起平民愤怒。"天津教案后，吾国官吏愈益畏缩，天主教士愈益骄横。民教相争，平民无得益者，一旦激成教案，则吾国政府又每以赔款惩犯了之。于是莠民入教者愈多，良民被迫也甚。人民正在

呼答无门有冤莫诉之际，于是八卦教之说以诱，而义和拳之党以兴”。[16]认为义和团是教案的自然发展。

2.关于义和团的起因

这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除劳乃宣等清政府统治阶层的人物把义和团的爆发原因归为继承白莲教衣钵图谋不轨之外，其他诸如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或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则从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义和团的起因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分析：“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这两种心理遇到清季的适于滋长的环境：“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衅衅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无人能匡救其失”。以上为义和团运动之“因”，还有“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这两种亲缘又有各自复杂的“间缘”。从外部来说，“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之政策”。因为有这三种外缘，所以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随着胶州、旅顺、威海卫被租借，瓜分之局，咄咄逼人。关于第二个“亲缘”，宫廷问题，则光绪与慈禧不和已久，猜嫌日积，戊戌政变后，慈禧谋废立，立大阿哥事件遭外国公使反对，又加上外国保护亡命海外的康梁等维新人士，遂使慈禧仇外心起。再加上曹州、兖州、易州等地教案不断，乡民与教学构怨益深。种种原因，汇在一起，导致了义和团的爆发。[17]

瞿秋白，范文澜等人则进一步从经济方面剖析了义和团的起因。瞿秋白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18]范文澜也指出："甲午战后，北中国经济也起了骤然的变化，如开海港、造铁路、办邮电、废漕运等等，这也成为促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19]则连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引起旧有经济组织破坏，"社会上突然出现多量的失业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地主及其他，而当时新的生产力本就不能充分发展以容纳这些失业者为新式产业的工人，在殖民地的中国尤其不能发展；这一大批的失业者为饥寒所迫自然要铤而走险"。[20]

陈功甫指出义和团的发生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爱国仇教心理与清廷顽固分子的仇外心理相合，因而被清廷所利用。他说："其时各国对中国割让租借采矿筑路之要求，纷至沓来，早激起一般人民爱国嫉外之思。又在内地之天主教徒，乘中国国权衰弱，凡关于教徒与平民争讼，其宣教师不问教徒之曲直，均予以极端援助……由是各省民众，无不视宣教师与教会如蛇蝎，深与义和团宗旨表同情"。同时，这时宫廷内西太后意图废光绪，立大阿哥，而"外人颇持异议，太后意愤甚，日夜图攘夷"，载漪、刚毅等顽固派重臣亦是仇视外人，"卒以酿成义和团之役"。[21]

王芸生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及清政府的腐败是义和团发生的主要原因。"甲午战后，割地赔款，国家人民，交受其辱。继以三国干涉以后之列强瓜分运动，创痛益深。……大者远者，有国家危亡之惧，小者近者，尤深切肤之痛，排外仇教之感情，因而洋溢全国。此为庚子事变之主要原因"。此外，清政府"聚敛繁苛，吏治败坏，民怨政昏，国势岌岌，……戾气所播，人心思动。此为庚子事变之第二原因"。[22]

还有人特别提到了中国连年外交失败也是义和团的起因之

--,则连在《九七与中国民族革命》--文中从1899年开始回溯了几次重大的外交失败事件: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1894年甲午惨败,1886年英国占领缅甸,1882年法国侵略越南,再加上戊戌维新遭到政府镇压,人心更形不满,义和团运动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27]王亚权还进一步分析了外交团对义和团事件的重大影响,他说:"义和团事变的发生,大半是由于中国民族对于列强帝国主义的反响。"但同时,"外交团也有一部分应负责任。在1900年初义和团势力渐渐膨胀,很多外国传教士纷纷向本国使馆报告紧急情形。他们这种报告多半是有枝添叶,甚至无中生有的。外交团得了报告,并不考察事实正确与否,就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厉取缔义和团,并用海军在中国海面示威。因为这种情形,中国士民格外激昂,同时义和团的发展也一天紧似一天,结果完全是火燎原,不可收拾了"。[28]

3.关于义和团的性质

由于不同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义和团性质的评价也相差极大。劳乃宣认定义和团乃是"邪教",必须坚决剿灭。蒋廷黻把义和团称为"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同时,他又用近代化的方法分析义和团,认为义和团也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与洋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相连的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此方案反对西洋化、近代化,它的失败证明我国民族要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29]

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等站在中国民族革命的高度上,认为义和团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陈独秀指出,义和团"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这种反抗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和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悲壮的序幕。[30]他把义和团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了全民族反抗压迫的意识和利益的运动。彭述之则认为义和团是"真正民

族群众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伟大的民族运动”，是“封建时代的真正民族革命者”。[27]

与陈、彭不同，瞿秋白对义和团性质的评价更为客观一些。他肯定义和团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又指出义和团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而且是失业群众的暴动”，“他们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作主干，这些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对外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便应当同时是对内的阶级斗争——反抗满清贵族的平民阶级的斗争。可是，因为义和团被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28]

4.关于《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近代对我国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对于它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主要有庚子赔款问题、和约某一条的执行情况及和约对中国的影响等等问题。

有人专门探讨了庚子赔款问题，《新中华》第三卷第八、九期刊登了《庚子赔款的由来及其变迁》一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庚款的由来及变迁，指出我国历来各项国耻赔款中，要以庚子赔款的数额为最大。“庚子赔款不仅直接影响我国家经济，且因担保品关系，又间接影响到我国关税与盐税，驯至我财政大权，亦由是旁落于各国银行家手中”。该文一针见血地得出“强权下无公理”的结论，揭露了辛丑和约的分赃性质。和约订立前，各国成立了赔款委员会，列强都想攫得最大数额的款项，又怕清政府实在负担不起，又成立

了"财源调查委员会",调查清政府的负担能力,最后确定数额。关于用庚款设立大学的问题,该文也进行了分析。我国开始支付赔款后经12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大变动,而且同时又使赔款的支付义务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战前各国对德、奥、俄的赔款停止支付并废止,对协约国的赔款延期五年支付,对中国应付各国的赔款考虑怎样加以利用。历经种种周折变迁,中国与法、比、英、日、美等国签订协定,规定庚款的一部分用来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或公益事业,但同时规定这些事业要用所赔款国的技师及物品。文章明确指出:"危害我国经济财政的巨额庚款,至今总算经过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或则无条件地全部废弃了(如德奥俄),或则为我国而使用,为我国而使用的,当初多追随于美政府之后,使用于文化方面,以谋己国文化之发展,近来亦有使用于生产方面,以谋己国材料(商品)之销路的,所以虽名为我国而使用,但仍掩不住每一钱都含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及经济侵略的血腥气!"[29]

曹宗儒撰文详述了《辛丑条约》第七款的实行经过。第七款是关于各国在中国建立使馆界,由外国人管理并防守,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这是极大损害中国利益的规定。该文分"民产迁让问题"、"堂子之迁让"、"实行划界"、"俄国教堂之纠葛"、"赔偿地价之来源"等问题介绍了第七款的实行经过。对当时的中外交涉情形描述颇为详细。各有关的交涉均以中国政府让步而告终,使馆界内迁出的华民,清政府希望由各国政府支付补偿地价,但列强不允,只好由清政府从户部银中拨付;使馆界内的堂子是清代重要祭所之一,清政府原希望保留,但因划入使馆界内,也被迫迁址。凡此种种,鲜明地表现了弱贫的清政府在庚子战败后任人宰割的情形。[30]

恽代英著文讨论了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痛切指出辛丑条约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加于中国的一下致命打击,使中国四万

万人不但在物质方面成为无抵抗的政治经济的亡国奴隶，并且在精神方面20余年不敢对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独立平等的权利。他指出，“辛丑条约对中国的影响，一为总数五亿余两赔款本利之损失，每年须付赔款一千二百余万两至二千四百余万两；二为使中国因‘赔款用金’含糊规定，每年发生意外的负担；三为使帝国主义者攘得保管近四分之一的关税之权；四为使帝国主义者攘得海关附近常关的管理权；五为开不忠实的修改税则之恶例；税收方面于值百抽五之标准下尚每年有巨数的损失；六为北河黄浦两水道之修治，堕于国际势力支配之下”。文章特别指明庚子赔款有80%是属于惩戒性的。各国所索赔款，平均计算约七倍于他们实在损失的数目。巨额赔款剥夺了无数青少年受教育的机会，窒息了中国工商实业发展的机会。然而这还不是最恶劣的影响，更大的是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精神上的打击。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要作种种屈服谢罪的表示，而且无论是贵族官吏人民都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惩罚……在帝国主义所规定的严刑峻法之下兢兢业业地过日子……这是强加于中国民族如何痛楚的鞭挞啊！”辛丑条约还剥夺了中国自卫的权力。可怜的中国人民，经过这么沉重的打击，几乎没有一个敢于不承认帝国主义的虎威了，北洋军阀政府与他所任命的大小官吏第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帝国主义保障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权力，禁止中国有任何排外的行为”。恽代英在文中悲痛控诉辛丑条约：“自从有了辛丑条约，中国人几乎完全失了民族独立的意识，没有人做梦还想到要申诉庚子赔款的残酷与其他一切约束限制的蛮横无理，没有人做梦还想到可以撕毁辛丑条约与一切不平等条约。[31]

5.关于东南互保问题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但建国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多。《人文》第2卷第7期发表有惜阴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该文为《惜阴堂笔记》之一，作者是东南互保的发起人之一，提供了有关东南互保的较详细的资料。[32]

有人认为东南互保的做法从全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不妥当的，“东南督抚为一时权宜之计，与外人立约互保，以保境宁人，未为不是。虽然，为一方计可也，为全局计不可也；为一时计可也，为长久计不可也”。因为“夫使东南督抚，诚以安社稷、救民生为己任，则六月间，一面立约，一面纠合诸候，厚集勤王之兵，公举一大将统之，以剿匪自任，科表即行，最上则天津可以不失，其次则北仓不战，其次京师不破，然迁延至两月，而兹事无能为矣”。在北方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东南督抚“优游如故，宴会如故”，是极不应该的。[33]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析了东南互保对后来中国政局的影响：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所以辛亥革命，起于地方，各省响应，中央瓦解，一直影响到20年代各地军阀混战。[34]

6.关于当时驻外使节的活动

义和团起事时驻外使臣的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义和团运动正酣时，曾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还杀死了德国驻华外交官。这使得当时驻外的中国使臣的处境变得比较微妙。杨鸿烈写有《“拳乱”与驻外使臣的活动》一文，记述了当时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出使俄国大臣杨儒、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出使法国大臣裕庚、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和驻英的罗丰禄等人的活动，详述了几位使臣中备受煎熬、“受窘最甚吃苦最多”的驻德、俄、日使臣吕海寰、杨儒、李盛铎的活动。还引述了当时日本报纸的记载，赞扬了驻美、英的伍廷芳、罗丰禄为中国力争的言行，说伍廷芳“有外交之才，为中国尽力，实非浅鲜”。“在美国时，无论有公私事件与人聚谈之时，必辩明中国此事之大变，非中国国民固为此排外

举动，实因各国传教师之在中国者，干涉中国地方官吏之事，及保护无赖之徒，良民深为不平，故激成此大变也。……又驻扎英京公使罗丰禄者……与伍公使相应，尽力为国，……如英美重要之国有此二公使，为之周旋，亦不幸中之幸也”。[35]

7.关于义和团的盲目排外问题

这是得到广泛注意的一个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是完全错误，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罗惇曧在其《庚子国变记》一书中，对义和团“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36]的“排外”之举大加鞭挞，指责义和团为“拳匪乱民”。

一部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义和团的“排外”给予了充分理解。王独清认为：“义和团所以把仇视洋人作了中心的目标，那并不是简单的由于‘历史上遗传’的‘排外心理’，而是一点不含糊地

独立，妨碍其民族之生存，对于其国家民族为不恭敬之侮辱言论者，其国家之国民便立应排之，便立应以极端的激昂态度排之——就是义和团，又怎么样？在生物的伦理上，难道哪个能不承认义和团是一个很拙劣的而正当的自卫么？"[40]罗章龙更揭露了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但在本国"排外"，还跑到中国来"排内"[41]，建立租界、使馆区，不许中国人靠近。

可以发现，建国前对义和团的排外问题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总的来说，各种观点均有失偏颇，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是有缺陷的，作为箍在中国人心灵上的精神枷锁必须打破，然而从反民族压迫的角度出发，义和团的排外精神又是值得继承的。

8.关于义和团的落后性及失败原因

义和团运动虽然曾轰轰烈烈，席卷大半个中国，但它自身有着严重的落后性，正是这致命的缺陷，加上其它一些主客观因素，导致了义和团的最终失败。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从历史的、阶级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则连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之一在于其"迷信神权"，同时他又指出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农民暴动，而且没有别的进步阶级为其指导，自然要发挥封建社会里，农民群众必有的迷信神权思想"。义和团运动最大的缺陷在于"与当时的满清政府结合起来为其所利用"。被利用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是国际帝国主义，而满清政府反受帝国主义的统治支配压迫十分不堪，其欲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正与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不谋而合"。[42]

瞿秋白着重从农民阶级本身的落后性分析了它失败的必然性。他说："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

义”。“他们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大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的工具”。“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统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加要压迫农民。他们一切迷信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据于这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文化主义而发生的”。他更进一步指出：“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45]

蔡和森着重从历史局限性方面分析了义和团失败的必然性。他说：“这种本能的幼稚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在方法上面；然而这种缺点是历史限定他的，并且是必然的。”“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这是义和团的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的结果”。[46]

彭述之也指出：“义和团的失败是由于：(一)不懂得历史进步的趋向。(二)因被反动的封建阶级利用。(三)不知道科学革命方法”。[47]

李鼎声对义和团的失败原因作了这样的总结：“正是因为义和团没有健全的生产阶级做领导者，正是因为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劫持所利用……义和团以迷信的幼稚可笑的咒语与法术来作为抵抗帝国主义的炮火的武器……亦就是因为这样，而注定了它的失败”。[48]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从探讨义和团的失败原因入手，总结了应从中吸取的教训。这项工作从义和团发生之时就已开始。如1900年《中外日报》上一篇文章指出，从义和团事件应吸取的教训是：“欲中国自立，必自大开民智始”。因为盲目排外的扶清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灭洋的说法更是谬妄。是对“东西之大势，既杳乎其未之闻，中外之大局，茫乎其不晓”的愚昧之见，靠这样见识的人

民和政府是不可能实现自立的”。“欲强中国，亦自有道，苟其众正盈庭，百废俱举，振兴学校，而人材以奋；整饬武备，而国势以强；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而利权予以挽回，地利予以回辟，而又柔远能迩，交邻有道，如此则东西各大国，皆吾友邦”。[47]文章批评了顽固闭关排外的做法，强调了开民智的重要性。

早期共产党人也非常注意从义和团运动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如彭述之说：“我们从义和团运动及其失败所得的教训是：一、我们——真正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真正的民族革命者；应该继续义和团之广大民族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精神。二、我们应仔细看清历史前进的趋向。尽力脱去复古的色彩，往进化的路上前进。三、我们认定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可是绝不能与任何反动派合作。四、尽力运用最进步的科学的革命组织与科学的革命策略”。[48]

9.关于义和团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建国前史学界对义和团地位的评价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一种观点对义和团的评价很低，把它和辛丑条约并列，蒋廷黻说：“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49]

一种观点对义和团的历史地位评价较高，把它和辛亥革命等伟大的业绩并列。彭述之认为：“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运动史上，甚至在全部中国历史上，始终占着极重要的位置，有伟大的历史价值，他的价值决不减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50]蔡和森也说：“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第一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及各乡团，第二是——一九〇〇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二者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而后者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比较的更为严重，更为悲壮”。[51]陈独秀也说：义和团运动“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52]毛泽东对义和团运动也给予了较高评价，他

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58]在这里，毛泽东是把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中的一环来看待的。

对义和团历史作用的评价，也出现了较大分歧。

梁启超认为义和团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这是义和团的"直接业报"，间接方面，还有俄国在东三省迟迟不撤军，因此引起日俄战争，日本在南满取得特殊地位；英日同盟出现；中国海关、银行等大权被外国操纵；中国国民心理由排外变成媚外，自尊自重的元气大伤，等等。应该说，梁启超把这些恶影响都归罪于义和团是不公正的。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义和团对于国民心理上"最大的良影响"是"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59]实际上，梁启超是把义和团之后的中国社会局势作了一个较全面的分析。

陈捷、范文澜等人认为义和团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运动，同时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陈捷指出："设吾民族可以任人宰割而不知自救，则可以无义和团之祸；而亡国之惨或早已实现，亦未可知，此其影响于吾国之存亡尤大。故义和团者，殆帝国主义压迫之反动，吾国民族主义运动之雏形也"。"其在西人方面亦鉴于吾国民气之发皇，全国人心对外之一致，始恍然于中国民族之不可轻侮……外国政府与在华教士莫不自此怀畏惧之心，而捐其昔日藐视华人之态，此则影响之尤大者"。[60]王亚权也认为："义

和团事变后，列强为免除在华利益冲突起见，暂时放弃积极政策，采取缓进的侵略。瓜分中国之说，因列强利益不能均分，只能作为罢论"。[66]范文澜也指出："义和团运动……这个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精神的大规模运动，足够教训那些狂妄无知、高谈瓜分的帝国主义者，……义和团'灭洋'战斗是惨败了，义和团运动却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运动"。[67]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国前史学界对义和团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出现了很大分歧，表明要想取得对历史事件的尽量客观公正的认识，史学家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和理论，抛弃个人成见，方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10.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研究

关于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关义和团研究领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但建国前有关的研究并不多，据笔者所见资料，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中，曾对义和团与五卅运动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比较。

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可以说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但是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已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

第一，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租界制度、领事裁判权、驻防中国的外国海陆军，要求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自由权、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却不是反对一切西洋文化。

第二，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他们不会象义和

团一样，被国内统治者所利用。

第三，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他们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民众之间极普遍地发展着。而义和团暴动的农民，绝无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策略，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一般的士大夫、文明人，都帮着帝国主义骂"拳匪"，灭杀民众的反抗精神。

第四，工人阶级明白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有力打击，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会真诚地同情中国的运动，而且能与以有力的援助。工人阶级决不盲目地反对一切外国人，而只反对帝国主义者，还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者。

第五，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五卅运动结果是使帝国主义列强至少表示了表面上的让步。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却是帝国主义以武力进攻而攫取特权，置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

总之，瞿秋白总结道："五卅运动与义和团的区别，正在于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③]

总之，建国前国内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从1990年至1949年的短短5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异常迅猛，学术思想界也呈现出活跃之势，在义和团的探讨、研究和评述中，尽管由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以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去评价、分析义和团运动，并且受到现实政治斗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使人们对义和团的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允；还由于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

面对着外敌不断入侵，国内政局起伏等状况，对于义和团研究固然在许多专题的探讨已开始起步，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肤浅的，既缺乏系统性，也缺乏深度，但是无论如何，建国前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为建国后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开展研究打下了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魏晓明：《建国前义和团研究史的考察》，《历史教学》1981 年第 7 期；罗超：《建国前国内研究义和团状况述评》，《安徽师大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 171 – 237 页辑录了当时国内报纸对义和团的舆论，内容涉及义和团的起因、发展、评价、教案问题等等。

③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④《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59 – 62 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⑤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 1 卷，218 – 22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⑥《义和团书目解题》，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29 – 59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⑦《义和团书目解题》，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29 – 598 页。

⑧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

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45 – 150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1932。

⑪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46。

⑫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9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⑬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29 – 40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47。

⑭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 433 – 439

页。

⑮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 82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拾民国 28 年版重版本,1996。

⑯陈　捷:《义和团运动史》,第 14 - 16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45 - 147 页。

⑱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 128 期。

⑲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41 - 342 页。

⑳则　连:《九七与中国民族革命》,《中国青年》第 131、132 期合刊。

㉑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上海,商务印局馆,1933。

㊶罗章龙:《排外与排内》,《向导》第64期。
㊷则　连:《九七与中国民族革命》,《中国青年》第131、132期合刊。
㊸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
㊹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
㊺彭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81期。
㊻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84－185页。
㊼《论中国欲自立宜先求开民智之策》,1900年9月17日《中外日报》,见资料丛刊《义和团》(四),210－213页。
㊽彭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81期。
㊾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83页。
㊿彭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81期。
(51)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
(52)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
(5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2页。
(5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8－150页。
(55)陈　捷:《义和团运动史》,第1－2页,第139页。
(56)王亚权:《义和团事件的政治背景同中国民族运动的关系》,《师大月刊》第1期。
(5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21页。
(58)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

“语境”中的“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王学典

义和团暴动已经发生了一百年，也整整被评价了一百年。

严格说来，“研究”历史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而“评价”历史本质上则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

——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因此，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评价历史。一百年来对义和团评价的起伏，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所以，对义和团百年评价史这一“思想史”范畴内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对这一期间“社会史”考察的基础之上。

应该承认，如何评价“义和团”，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但中国社会对此敏感，西方社会也同样对此敏感。义和团暴动已经过去，但义和团暴动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即“义和团式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同着我们。这可能就是人们对义和团评价如此敏感的深层动因。究竟如何对待“西方”？究竟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究竟如何积极地反抗帝国主义或经济发达国家对所谓“落后国家”的侵略？究竟如何看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些可能就是义和团现象所提出来的同时又覆盖了百年中国而直到今天我们仍未走出的“问题”。这些问题

的实质是:20世纪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将"西方因素"驱逐净尽然后让中国社会倒回到鸦片战争之前的那种圣君贤相统治下的大一统的宗法村社共同体去,还是在引进"西方因素"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再振居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雄风?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在世界潮流面前闭关自守,还是顺应世界大势对外开放?在笔者看来,对义和团暴动的不同评价,事实上透露了关乎中国社会走向的信息。当然,从这样的视角观察对义和团的评价,丝毫也不意味着对由于义和团自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评价差异的忽视。的确,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事件能象义和团运动一样,包含着如此多的相反的信息、相反的价值、互相冲突的目标。老实说,任何一个真诚的学者面对义和团运动都会产生"价值"与"理性"的撕裂感,善与恶在这里是如此的纠结,其界限是如此的模糊,以致于使任何一个明察秋毫的人都可能判断失误。但是,稍经考察即可发现,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所以,把对义和团评价的考察放在"社会史"、"思潮史"范围内比放在"学术史"范围内可能离真相更近。这样做当然也可能会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但笔者坚信,非如此不足以凸显历史的本质。

"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

在将对义和团的评价还原到所在时代的社会状况中去时,必须看到,对历史评价起直接制约作用的并非"社会状况"本身,而是在这种"社会状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亦即某种特定的语境、特定的精神气候。正是这种语境和气候,规定和控制着历史评价,尤其是规定和控制着对义和团的评价。

百年以来,我们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迁: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

主义”救亡语境，从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大体上可以看作曾经统治过舆论的语境变迁史。看得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义和团的面貌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反传统”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为一种“落后”的象征；[①]而“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为一种“进步”的象征。[②]五、六十年代“反西方”冷战语境，实际上是这种救亡语境的继续。

“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形成，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若干年才被打破。如上所述，这种语境下的义和团运动，依然是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在给1949年到1979年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分期时，时贤多把这一时期划为“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主要根据是，“文革”10年尽管没有“史学”可言，但对义和团运动而言，却有戚本禹的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这篇文章构成义和团研究史上的一大事件。笔者认为，戚氏此文，除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之外，并未创造什么。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推向极端而已；他与“文革”前的众多研究者持有共同的基本假定：革命优于、重于改良；农民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富有革命性因而更先进；西方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不同之点仅仅在于，戚本禹把这些前提、尤其把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结论纳入到“文革”的总意图之中。但看得出来，“文革”中与“文革”前，人们据以评价义和团的基本语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从对义和团的总体评价上来说，可以划为一个段落。

1949年10月之后，最先对义和团运动作出评价从而为未来的义和团评价确定了基调的是翦伯赞。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是对义和团运动发生50周年的最好纪念。这套书不但因提供了此后研究义和团的基本资料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它还因对义和团研究在当时看来准确的定位而为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所遵循。翦伯赞在此书"序言"中说："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资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学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他还说："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獗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50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这种对既往"血账"特别是对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血账"的清算，在翦氏看来，"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3]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是今天的警钟，把对义和团的研究看作是清算历史血账，历史回顾就这样被纳入到现实的创造中去。"义和团"在这时变成了反对"西方"、特别是反对美国的象征。当然，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最初给这一研究确定上述基调的是胡绳、范文澜和华岗。他们分别在1949年前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承接了他们的论旨，并把这种论旨进一步与50年代初的精神气候吻合起来。

5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惯性运动中，高涨激昂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刺激而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对新中国的冷漠、敌视与封锁，促使中国"一边倒"，这时笼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反西方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当然把几乎所有的西方因素、包括所谓的"先进生产方式"，都等同于帝国主

义，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屠杀，而只能一齐予以拒绝。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下，义和团当然被当作现实中“反帝”的榜样、先驱来对待了。所以，这时的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④]到1958年，翦氏对这一点的表述则更规范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⑤]刘大年则称义和团为“人民反帝运动”。[⑥]另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而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⑦]还有的读者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深刻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⑧]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⑩]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此前不断发生的“教案”，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教冲突。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构成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一个侧面，而冷战语境中的传教士形象只能是罪恶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1952年的一篇文章在“外国传教士的罪恶”目下首先指出：西方强盗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方式可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起初是传教士，然后为商人，最后便是军舰大炮。”然后断言：“传教士，不仅是侵略者强盗的先锋，他们还以假仁假义的面孔，而且作为侵略强盗们的头等侦探，实际执行侵略强盗们的侵略政策，尽量发挥商品和军舰、大炮的效能。三者是有机联系与互相配合的。……他们的罪行是数不完的。”[⑨]所以义和团的“仇教”、“灭洋”是无可非议的。

进一步地或者说彻底地把对义和团的评价与研究纳入到冷战语境中去，是60年代的事情。1960年8月25至28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首次义和团讨论会及其会议论文集，可以让后人充分领略

"反帝反西方"的精神气候和时代氛围是如何左右对义和团的评价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选自这次会议。从这册20多万字的《论文集》看来,此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纪念"性质的会议,甚少"学术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置入冷战语境中予以观察与衡估的结果。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这次会议的主旨;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时,除了历数他们镇压义和团的罪行外,还主要控诉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奠基在我们当时对世界大势的特定感受与观察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基本假定和未来预期上:"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地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做尽了坏事,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11]后来对义和团评价甚低的黎澍,当年也在这次会议上,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为题发表讲话,主要痛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预言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一定也很快会灭亡。[12]除黎澍外,还有两篇文章专门揭露美国镇压义和团和其他侵华罪行:一篇是:《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另一篇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13]在这种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想像。

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这次会议对义和团评价的主要变化,是在分寸上已基本上没有保留和限制了。譬如,翦伯赞当年在承认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并未忘记强调这次斗争"是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的"斗争;在肯定义和团是"农民战争"和"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们带有"自发"的性质;另有文章在指出义和团是"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的同时,并未忘记指出它还有"反机器生产"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特点。这一切当

然都是为了坐实义和团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判断。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对义和团全面认同之声。黎澍说:"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14]在"反传统"的启蒙语境下,义和团的形象是蒙昧的。现在,刘大年则认为,义和团"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么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15]在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16]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17]"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的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义和团是一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贫苦农民占极大多数。"[18]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事实认知而是价值判断了,这已经不是在"评价"历史,而是在"歌颂"历史了。如果说,"评价"历史已经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那么,"歌颂"历史严格说来已经与学术研究无关了。但这种对义和团的没有限制与保留的"歌颂"却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在"文革"初期戚本禹那里登峰造极。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重大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地放肆地利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此后的"评法批儒"和"评《水

浒》批宋江”，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使放在“文革”阶段，《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盗用“历史”方面也是格外刺目的。

前面说过，在高度评价、歌颂义和团方面，戚本禹并未创造什么。事实的确如此。戚氏此文说：“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19]这里的评价，老实说，并未与义和团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评价与歌颂有什么两样。区别看来只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更加突出了“反西方”的基调。如把通常所谓的“笼统排外主义”举动一律奉为“反帝爱国”的义举。“杀洋人”、“砍洋头”、“杀洋鬼子”、“禁止洋货”等，以及“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等行动，均被看作可无保留加以歌颂的“革命行动”。这在以往通常是被淡化处理的。2.可能是第一次把义和团与戊戌变法作了正面对比，从而全面肯定前者而彻底否定后者。3.把对历史的评价公开引入到中共党内斗争中来，从而因对历史上西方取向式的改革的不同态度而生发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说。上面三点，实际上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抗拒。

对海通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方”实在是一个有着太多根本对立内涵的概念。在多数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野蛮的侵略、征服与屠杀；在另外的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的时候，人们又以“西方”中看到了“现代化”、“政治民主”、“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等内容。当然，也有的时候，人们认为“西方”中并无矛盾的内容，因为“现代化”、“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义”，“资

本主义”的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可以与野蛮的侵略、疯狂的屠杀划上等号。当人们把“西方”、“洋人”、“传教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锅煮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可能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这正是戚本禹的逻辑。有人曾经觉得奇怪：对《清宫秘史》的不同评价，怎么会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问题扯到一块。其实，对戚本禹而言，这非常自然。《清宫秘史》既然倾向和同情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则必然首先要遵守人家的所谓“规则”，其中当然包括要遵守列强们所制订的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如保护“洋人”及其所谓的在华利益等。这在欣赏“闭关锁国”政策的戚本禹等人看来，光绪皇帝怎能不是“卖国主义”呢？义和团运动又怎能不高于戊戌维新呢？

通过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谴责，戚本禹此文实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把光绪皇帝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连接起来，把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对立起来，把当年“灭洋”的举动与今天红卫兵的造反等同起来。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藩篱，就这样被全部撤除。在当时那种彻底与“西方”（侵华的“八国联军”是当时“西方”在造反青年中的主要形象）决裂的背景下，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发生实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既然“敌人（西方）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还有什么必要与“西方”打交道、还有什么必要在国策上不往“东”走而向“西”去呢？假如说，1900 年中国人对“西方”的“义和团”式拒绝具有足够的历史理由的话，那么，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执意不愿“睁眼看世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蒙昧！这种蒙昧既然通过对义和团的歌颂与认同表现出来，当时过境迁之后再通过对义和团的重新评价来打破这种“蒙昧”，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

“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

现在看来，在1949年后50年间义和团研究史上欣起过波澜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仅有三篇：一篇就是刚刚评述过的戚本禹的文章，另外两篇则是左步青、章鸣九的《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从某种角度看，左文与王文一起，可以说开辟了义和团评价史上的“新时期”。在估计这两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和所代表的趋向时，必须联系“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背景，尤其是必须联系黎澍当时的一些思想主张，因为此两文都明显是在黎澍有关见解的指导下成稿的。

在笔者看来，“文革”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在中国的集中反映，发动“文革”的总指向，是用农业文明来抗拒和抵制工业文明，“文革”的失败所具有的一个可能意义是，它意味着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形态在世界工业文明大势面前的最终落幕。所以，“文革”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史事件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绵延不绝的独特的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终于开始认同并汇入世界潮流之中了。具体到中国，可以看出，1949年后的主导性社会思潮是“反资本主义”，——逐步清除近代以还积淀起来的“西方因素”（在这里“反西方”与“反资本主义”是互为表里的），“文革”不过是把这一思潮推向极端而已。“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能成为一顶可以把国家主席置于死地的罪名？端在于“反资本主义”已成为控制、制导我们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成为一种被全民认可了的判断尺度，成为一顶绝大的政治帽子，成为一种话语暴力。但“文革”结束之初，人们发现，“反资本主义”的结果却导致向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也即所谓“封建主义”的复归，林彪、“四人帮”对社会的统治被看作是黑暗的“封建复辟”。于是，对“文

革”的否定很快就变成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对近代化工业化的追求，对“西方”、“西化”的重新认识。这一切，汇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反封建主义”。在这股新的带有“霸权”意味的思潮影响下，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有一种与“文革”对着干的特征。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看做是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

戊戌维新高于、优于义和团，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高于、优于任何农民运动农民革命，是1980年前后很有影响力、比较流行的一种见解。这种见解认为：

> 义和团是农民的自发斗争，一开始就使用了暴力手段，矛头对着外国侵略者，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但是，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戊戌维新与义和团不可同日而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戊戌维新尽管由于本身的弱点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最后归于失败，然而它在中国却起了启蒙运动的除旧布新的作用，社会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3]

在这种见解的导引下，与“文革”中人们千方百计地压低戊戌维新运动、抬高义和团运动地位的情形不同，千方百计地为戊戌维新说好话、为义和团运动指缺点，可以说，是1980年前后总的观点倾向。

这时的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普遍较低，主因在于引入了新的评价参照。对19世纪末叶的中国来说，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的路，是惟一的选择，对这时一切历史是非的认定，都应放在这个时空坐标之内，是这时人们持以估量义和团功过的基本尺度。因此，有的文章说：戊戌维新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而"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更重要的是，"义和团作为自发的爱国的农民运动，恰恰由于它的农民的保守性与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制度的控制，而终以悲剧的结局断送了它的正义的反帝壮举。义和团运动确实未能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而且，义和团运动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运动"、"革命高潮"，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埋葬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而不能由农民运动来完成"。[4]

"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的义和团的形象最后由王致中的文章绘制完成。《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在这时是一篇备受瞩目也备受非议的文章，它与"文革"中戚本禹的文章恰好站在两个极端上。《蒙昧》认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此文纵论这种"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对封建

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这…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因此，义和团“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义和团诚然反光绪、反贪官，但并不“反封建”。而且，就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是封建主义框架内的一种现象。义和团诚然被“利用”，但正是由于它的落后与蒙昧，“才有可能被利用”。最后，“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听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22]

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与“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一样，都是社会学意义上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均非历史学意义上或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新启蒙语境中的这些义和团论文，也与戚本禹的文章一样，实际上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清算，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现象的间接批判，正如《蒙昧》一文的作者所言：指责义和团的“封建蒙昧”，“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的青年于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错误”而已。因此，上述见解的社会意义当然大于科学意义，思想史上的意义当然大于学术史

上的意义，启蒙的意义当然大于建设的意义。

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这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争论是围绕着上述文章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展开的：义和团与清廷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义和团的“仇教灭洋”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举动？前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具体化为“义和团是反封建还是受封建主义蒙蔽”？后一个问题在讨论中也具体化为“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实质是反帝爱国还是排外主义”？学者们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而且主要是肯定性意见，特别是对《蒙昧》一文所持的见解展开了反击。[②]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到1981年后还得到进一步强化，“蒙昧主义”说甚至被目为史学领域里的“政治问题”。这当然与这一时期的“乍寒乍暖”的精神气候有关。应该说，这并非“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如同上述，这一时期的关于义和团，尤其是针对戚本禹的义和团文章，并非纯粹的学术文章，其中的观点也并非纯粹的学术见解。所以，批评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问题也就不应视为故意“上纲上线”。应该看到，1980年前后的若干年，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再作选择的重新定向之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虽然已经提出，重新打量、对待西方的进程虽然已经启动，但强大的历史惯性运动不是一下子就能中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尤其如此。在这个层面上，究竟主要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人们还在犹豫不决。“反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能不肯定灭洋的义和团，“反封建主义”，不能不否定“扶清”的义和团。这时的“乍寒乍暖”，正是这种犹豫不决的表征。肯定或否定义和团的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基于研究者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假设之上。不难看出，对义和团的评价与对近代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密不可分。而所谓“线索问题”说到底是研究者的一种价值预设。按照“三大高潮”说，义和团的地位甚高；按照“四个阶梯”说，义和团的地位很低，甚至没有地位可言。对义和团的估价与定位，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趋向的判断为前提，

这种判断又以研究者对自身所在的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和感受为前提。所以，说到底，上边所提出的那两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仍是意识形态命题而非纯粹的学术命题。实际上，环绕着义和团的性质、地位与评价所展开的争论，大部分只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围绕着对义和团的评价所展开的论争，在1980年11月于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达到顶峰。其结果，则是"反封建"新启蒙语境的迅速终结和"冷战话语"的强烈反弹。据《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0年12月)所载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11篇，其中，"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32篇"，"义和团性质方面的5篇"(为义和团定性与评价义和团完全是一回事)，可以推知，在这37篇文章中，肯定各种评价意见都有。但后来结集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却只收入了对《蒙昧》一文持批评态度一方的文章。[14]尤令人回味的是，黎澍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以《中西文化问题》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但他的这个发言却受到了冷遇：不仅《专辑》未予选登，在《讨论文集》上也不见踪影。个中缘由，黎澍后来作了交代："本文是我1980年11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据说在当时与会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映。什么样的强烈的反映？……大概是遭到强烈的反对了。反对什么？我判断可能是因为这个发言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使一些人误会为主张'全盘西化'，感到难以接受。"[15]在一个讨论义和团的会议上为什么要大谈"中西文化问题"，而且犯忌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全局性主张？黎澍认为，他通过此文希望弄清楚的是："近代中国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答案是：面临着一个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必须西学为体，否则不是现代化"，换句话说，现代化也就是"被迫欧化"。"欧化"，则"仿佛有点象是古人所谓'用夷变夏'"。在这个价值坐标内，如何估计以"灭洋"为宗旨的

义和团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篇发言稿在当时遭到抵制在长时期里难得面世也就不难理解了。

义和团研究领域中新启蒙话语的忽起忽落、冷战语境的迅速反弹，进一步说明了下面两个基本事实的存在。尽管已经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门，尽管市场取向式的改革政策已经出台，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界，仍实在很难立即从对"西方"爱恨交织的情感矛盾中脱身出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又体现为现代化，这两方面同样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与目标。……当西方被定性为侵略者和剥削者（魔鬼般的西方）时，义和团对西方的反抗使中国的爱国者深感满足，并很容易被冠以赞美之词。然而，当西方被看成是现代生活的源泉（天使般的西方）时，义和团那种……毁坏西方电报电话设施、铁路和汽轮船的行为，则往往成为造成严重困境的缘由而遭到严厉的谴责。……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学很难对义和团有一致的看法，也无法确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而且，这并非是一个可能会瞬时即逝的问题。"[6]这是其一。其二，"反帝爱国"，尽管是在救亡语境、冷战语境中对义和团所作的定位，但这一定位也的确包含着不受这一语境制约的真实的历史内容。换句话说，尽管是出于发泄对"西方"的不满与怨恨，义和团运动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象征，但把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概括为"反帝爱国"，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依据的。这部分学术依据当然不会随着冷战语境的消失而消失。所以，当蔑视或轻忽这部分依据时，它可能就会反弹。不过，在坚信这一点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历史本身其实并不曾固有什么性质等待人们去发现。历史的性质实际上是后人赋予的，带有后设性。而且，每一种对性质的概括都是在对真相的偏离中形成的，但历史研究又不能没有这种概括，——以把繁杂的历史简约化，所以，我们只能取那种偏离度最小的概括。也就是说，对历史性质的界定，应离这种历史的原生态越近越好。就义和团而言，人们最早

把这一运动概括为"反洋教",后又进一步概括为"反西方列强",最后才形成"反帝国主义"的概括。显然,"反洋教"比"反帝"离历史的本相更近。"反洋教"既能为历史当事者所理解,又能为后人所悉知。而"反帝",显然是后来者的语话,义和团的团民们肯定不知道"反帝"为何物。何况,"反帝"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反洋教"广泛得多,也复杂得多。这样,用"反帝"来定位义和团,可能反而会影响人们对义和团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把握。但不管怎么说,"反帝"说中毕竟内在地包含了"反洋教"这一真实的历史内容。当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一内容并试图将这一内容向"排外主义"偏转时,它受到纠正,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中的义和团

如果说1960年在济南召开的那次义和团纪念会议是冷战话语占主导地位,1980年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是冷战话语与新启蒙话语胶着对峙的话,那么,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讨论会,则是这一敏感的研究领域中学术语境已经占上风的标志。在《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学术气息是如此的稀薄,以致于使后人几乎一点也嗅不到,充斥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评价;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尽管科学之外的色彩仍十分浓厚,——"评价"的内容构成此书的主体,但真正的学术探讨毕竟出现了,并构成这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而《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则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论文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内容仍然存在并列在此书的首位,但从篇幅上看,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强。仅就评价而论,无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倾向于批评,调门都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评价"本身的学术含量在大大加强,不可避免的、仅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被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稀释了。可以说,发生在19世

纪与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直到20世纪末叶才开始受到理性的冷静的对待，才真正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处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1990年的这次会议是整个80年代学术积累的结果。应该看到，在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线索的交错或冲突：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对义和团的利用与史学界对义和团原始面目的学术认知。义和团研究中的这两种倾向在多数时期是相互排斥的。从1949年至70年代末期，社会政治把义和团作为象征性资源来开发汲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学术认知的倾向虽然存在，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副产品、附属物而出现的；从80年代初开始，虽然义和团研究与评价仍笼罩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但学术认知的倾向显然在一步步强化，学术认知的成份在逐渐增大。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从20世纪20年代始至60年代达到顶峰的话，那么，1980年的那次会议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对义和团的"祛魅"进程。对义和团研究与评价来说，整个80年代是一个过渡与转型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为90年代认知倾向占主导地位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1990年的这次会议上和此后90年代的义和团史学界，人们在评价义和团时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视野放宽了，而且主要是把义和团置于学术视野之内。如同路遥先生所言，过去我们"往往惯于纯从'反帝斗争'的视角"和"阶级斗争视角"去观察义和团，结果，往往导致"把奇幻诡异的历史画面简单化"，而无法揭露历史深处的隐秘。正确的做法是："在考察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时，……应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态、民俗传统、地域环境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等多层次、多视角去探幽。"[②]换句话说，应把义和团从过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平台上移置到现在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上去观察和评价。一旦这种"移置"完成，传统的义和团运动画面就会呈现出另外的状貌。这在1990年的义和团讨论会上即有初步的展示。这次会议共围绕着六个大的主题而展开研讨：义

和团运动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成因；义和团运动与秘密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西方在华教会、教案；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治；义和团运动与世界。老实说，这些主题、尤其是若干前所未有的主题下的文章，给学界更深入、更精细、更恰切、更平实地从科学层面上估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意义提供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的历史画面。不过，在笔者看来给传统历史画面以大面积敲击、可作为把义和团从意识形态迷雾中初步清洗出来并还原到事实基础上来的标志性成果的，可能是林华国先生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

此书在义和团评价史上出现的最重要意义，是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据以评估义和团的"立场"问题。长期以来，对义和团评价产生支配性影响的不外四种立场：正统立场、西方立场、民间立场（义和团立场，亦即通常说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或种族立场。立场不同，可能是造成义和团评价百年歧异的深层原因之一。但除了上述立场之外，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是否还应该分出另一只脚踏在另一种立场上，那就是学者立场：尽可能不站在历史当事者的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只问史实是非，不计学术之外的利害。我认为，《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已接近这一立场。这从它的许多结论性意见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些意见的特点，是从准确的事实出发，事实求是。譬如，在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中，清军与义和团各起了多大作用？多年流行的看法是，义和团起了主力作用，清军作用甚微。作者则在谈到抗击联军最烈的天津战役时指出，"在整个天津战役中，担任中方主力的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只是在最后时期……才担当起主力的任务。"[28]阻截西摩尔军进京之役也同样如此："在杀伤敌军方面，清军起了主要作用"。[29]在谈到"庚子围攻使馆事件真相"时，作者说："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而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30]在谈到"清政府决定宣战的真正原因"时，作者说，人们通常认为，西太后一贯媚外卖国，绝

不会有反侵略动机，除非危及到她个人的权位。作者认为："这种看法实在把西太后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不能……认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反抗外国的侵略。……她的卖国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而不可能是'彻底'的。当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尚存的部分主权形成了过大的威胁，危及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时，她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反抗侵略的行动，直至下令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次下诏宣战正是这样。[17]诸如此类的结论性意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而且皆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而发，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皆言之凿凿，证据充分。作者虽然没有对义和团的整体评价给出基本的结论，但却颠覆了已有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庚子国攻使馆事件"，褒之者谓是义和团的"功绩"，贬之者谓是义和团的"罪状"，刘者的前提是

着对这些信仰与实践采取一种基本敌视的态度，致使要对义和团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些信仰与实践及其在义和团的知识和感情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更深刻的评断，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同样的是，将'反帝爱国'的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义和团上面则是将各色各样、错综复杂的动机极端简单化了，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这些动机作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些动机则促使义和团在各种有影响力的起因果作用的因素中，帝国主义（不论其何等重要）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行动也不必定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促成的氛围中就其所为而行。"[38]在另一个场合，柯文又说：义和团"给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普通想象力带来了一系列极有影响也许有些相互矛盾的神话。在西方，义和团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被广泛地看作'黄祸的化身'，'义和团主义这一名词使人想象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的景象'。20世纪20年代初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往往抱有同样的看法，同时又补充上'迷信'与'落后'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外主义高潮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又开始将义和团再造进一个更具正面意义的神话之中，其中心是'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品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把义和团看作反侵略英雄斗士的肯定性观点在大陆中国人（以及某些在美国的华裔）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柯文的结论是："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了对过去的特定鲜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读中对过去的利用。"[39]

在百年中国为义和团运动所做出的许多基本结论中，也许只有"反帝爱国"带有最基本的性质。这是惟一一个50年来为各方各派所认可的一个定位，包括黎澍与王致中等对义和团持强烈批评态度者，也把这一定位当作前提来维护。现在，柯文把这种定位当作"神话"和"标鉴"来重新予以思考，他的这一思考将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实难预测。也许这是那些对这四个字背

后所蕴含的强烈、屈辱的民族情感缺乏感同身受式体验的“西方”学者的偏见！但是，在这个“合法的偏见”中，却内在地具有对未来义和团评价、研究有意义的两点思考。首先，超越既有的评价与定位，在学术的层面上，把探讨的触角伸向历史的纵深处，还原出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柯文说，义和团研究要深入到“过去的创造者所经历过的过去”中，也就是要“探寻经历过义和团不同阶段的直接参与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多半是由于生存原因而加入其村庄义和团组织的中国青年农民、在起义高潮时期散居在被干旱焦灼着的华北平原上的不安的传教士、1900年初夏被困在战火蹂躏的天津城内的中国和外国居民——简言之，那些并不知道能否从各自的生死关头逃脱出来的个人，那些头脑中事先并没有整个‘事件’代码的个人，那些因之而只能以与历史学家追溯回读式建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他们经历的个人”。同时，还要“把1900年华北的整个经历分成某些剖面来进行考察——干旱、大众性降神附体、法术和女性禁忌、讹言与死亡”等，而且，要“投入感情，以发现普通人——义和团民、非团民的中国人、传教士——‘理解世界’的方式”。[35]总之，在柯文看来，义和团研究要回到学术中来，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来写作义和团的历史。

其次，若要实现“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写作义和团的历史”的要求，必须走出“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系统。否则，用“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去描述、反映义和团事件，可能会远离历史的真相。的确，象“反不反帝”、“排外与否”、“是否反封建”、“反帝反封建”、“封建主义”、“封建迷信”、“愚昧落后”、“蒙昧主义”、“近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文化”、“西化”等概念，均属“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特定的政治话语，在这种话语系统内部提出的一些命题如“义和团是否反封建”之类，大都是些意识形态命题，而非学术命题。用这套话语、在这套

话语系统内部对义和团作出的评价，多是社会学方面的评价，而不是历史学方面的评价。其实，何止义和团研究领域如此，在历史研究的众多领域可能均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并没有自己的一套独立于政治社会的话语系统，这样，我们对包括义和团事件在内的众多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定位，充斥着社会政治诉求，就丝毫不奇怪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①②参见（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载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 年 7 月版。

③④翦伯赞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序言》，（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4 月 3 版。

⑤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 年第 5 期。

⑥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第 19 页，新华时事丛刊社 1950 年 11 月 3 版。

⑦周南：《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性质？这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历史教学》1954 年 11 月号。

⑧转引自上揭周南文。

⑨司缓延：《义和团运动（1900－1901）——中国近代史讲课记录》，《历史教学》1952 年 3 月号。

⑩《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1955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

⑪丁名楠、张振鹍：《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28 页，中华书局 1961 年 12 月版。

⑫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5－11 页。

⑬均载《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⑭《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5 页。

⑮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

文集》,第12－13页。

⑯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

⑰史恩群:《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5页。

⑱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7、79页。

⑲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红旗》1967年3期。

⑳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再思集》,第1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与黎澍持相同见解的文章这时还有: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陈旭麓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问题》(1980年1月8日《光明日报》)。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在那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㉑左步青,章鸣九:《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㉒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㉓参见1980年,1981年的有关义和团论文与"座谈纪要"及相关综述、报道。

㉔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4月版。

㉕黎澍遗作:《中西文化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㉖(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3－54页,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

㉗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前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㉘㉙㉚㉛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第130页,第126页,第107页,第82页。

㉜㉝见上揭柯文文,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25页,第52－53页,齐鲁书社1992年7版。

㉞㉟(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序》,《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24期,1997年5期。

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

程 歗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特别是义和团起源问题。100年来几代的历史学者、政治人、传教士和记者为阐释这个问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由于义和团的起源复杂、组织奇特、可供解释的文字史料和其他的人文传承物又过于零散，因而使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就带有许多模糊不清、彼此矛盾的因素；而且也因为这是一个人们在考察晚清政局乃至考察中国的历史脉络时都容易发生联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出于不同的立足点和方法论，勾廓出了许多不同的乃至于是对立的义和团"起源论"。中国史学界不可能回避问题的挑战。从"起源"入手来揭示义和团兴起的背景、成因、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并进而作出相应的历史评判，就这样构成了义和团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起源论"的提出和展开

19世纪末，当鲁西南大刀会的打教风潮刚刚铺展时，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信徒就攻击这些胸裹红兜肚、手执大刀和标枪的人是"白莲教妖人"。[①]这个说法在传教士和新闻媒体中流传。"起源

论”首先是被天主教教会和一些敌视大刀会、义和拳的人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对手置于“邪教叛乱”的非法地位。1899 年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为这个说法找到了“证据”。他引用了嘉庆十三年的一份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一个奏折，从这些官书记载的“义和拳”的名称上判定，直、东交界等地新起的倡扬“毁教灭夷”的组织来源于近 100 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支持了劳氏《源流考》的观点。虽然这本小册子拿不出嘉庆朝的“义和拳”或“义和门拳棒”同 19 世纪末的“义和拳”有什么组织关联的证据，但它为严禁派的举措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义和团高潮中神秘主义的急剧升温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强化了“白莲说”。可以看成是第一本义和团史作的李希圣撰《庚子国变记》(1902)，李的友人罗惇曧续补的《拳变余闻》(1913)，以及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1914)等小册子中，都有诸如“义和拳者，起自嘉庆时”，“‘义和拳’源于‘八卦教’”，“义和拳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与流裔”的提法，恽毓鼎还强调了劳氏“考证”的详尽。[12]此后的学术界在讨论“起源”时几乎没有人不涉及《源流考》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沿用了“义和团源流”这一表述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当史学界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义和团时，劳氏观点的可信性并没有随着学者们对他写作动机的批判而被严格检验。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研究者还缺乏细致勾画相关史事的条件，同时也部分地取决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在价值评判上的转变。“白莲教”(其实是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的教派林立、组织复杂的各种越轨信仰集团)在历史上的起事受到肯定，甚至这类组织本身也被有的学者定义为“农民的宗教”或“起义者的宗教”，那么将义和团定位于来自民间教派，似乎更能解释义和团的反抗传统。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义和拳是旧式农民起义的许多秘密结社的一种，它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后

来义和拳在山东取得合法地位，多数大刀会员加入，义和团与大刀会实际上合成一个'灭洋'团体。"[3]翦伯赞的论文和金家瑞的专著（都题为《义和团运动》）以及其他一批论著都采取了类似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讨论"组织源流"的论文是陈湛若的《义和团的前史》。作者通过对清代大量相关史料的爬梳，第一次提出了此后为学者们经常议论的话题：鄚县神拳、王伦义和拳、鲁西南红拳等民间教门和拳棒结社的造反事件。作者将这些事件界定为通向义和团的"前史"。[4]几年后胡珠生的一篇论文认为义和团的前身是清代"祖师会"，它演化出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5]这两篇论文，启发了此后学术界关于义和团是源于教门还是来自巫术的讨论。

60年代推动了"起源论"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从1960年开始的分别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天津史学界组织的学者和学生们在山东、河北进行的实地调查。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口述史料抢救，因为经历过义和团风暴的村镇居民（包括拳民和目击者）还有一部分人健在。他们口述的经历对于此后的研究相当宝贵。山东大学的学者们由此形成了义和团最初萌发于鲁西南大刀会、直东交界义和拳和鲁西北神拳的地域和组织分类法。在同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正义性是中心议题，同时也出现了路遥（署名吴松龄）用很大篇幅来讨论义和团组织和地域起源的论文《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这篇份量很重的论文在70年代末被收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论文集》。[6]史学界认为，这本精选的集子大体反映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近代史研究各领域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60年代在"起源论"上引人注目的另一件事，是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在台湾问世（1963）。戴玄之首次向"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提出了全面挑战，并支持美国人施达格在《中国与西方》一

书(1927)中关于义和团来自团练的观点。这项研究使戴成为否定劳乃宣《源流考》并主张"团练说"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几乎在同时,北京大学邵循正在《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中也对劳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义和拳"和"八卦教是分清畛域的",义和拳"继承了白莲教的战斗传统",但"没有采用白莲教的经典和教义宣传,而以设厂练拳作为组织群众的方法",它"本身不是一个教门。"[7]邵根据他掌握的史料严肃地描述了历史事像,没有下更多的结论。

整整10年的"文化革命"中断了"起源论"的任何发言。按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说法:那个年代"神话化了的义和团就彻底地取代了历史的义和团"。[8]为了强调"义和团、红卫兵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体化传统,如果一定要寻义和团的"源",那就是"天然合理"的"革命造反精神"。王聪儿(白莲教)和林黑儿(红灯照)就这样被塑造成了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的代表。

"神化"义和团的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在70年代末被打破。1979年李世瑜的《义和团源流试探》,是十年动乱后第一篇旧话重提并作出突破性尝试的论文。[9]次年11月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起源"讨论。根据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义和团运动》提供的论文、资料索引,从1979到1982年,有20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从而形成了一场规模可观的义和团起源大讨论。

从这时起到1990年,可以说是"起源"研究的丰收时段。路遥、程献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和一批优秀的论文都是在这个时段发表的。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是得益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的推动。在每隔一段时间由该会经过精心准备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几乎都能听到"起源论"的发言。二是得益于相关史料专集的出版。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义和团史料》、《筹笔偶存》、《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和台湾出版的《教务教

案档》,这些史料的整理者和出版者对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三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周锡瑞、包德威、舒曼、小林一美、佐藤公彦等的相关论文或专著,还有1986到1990年中日两国学者联合对近代华北农村的调查(该调查团里集中了两国多名研究义和团的专家),使中国学者从多方面了解了国外同行们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与自己的异同。

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为"起源"研究作了一个高水平的阶段性总结。路遥的《"义和拳教"钩沉》深化和发展了他30多年来对这一课题的思考。马西沙、周育民、邵雍等的论文则反映了由于民间教派史、会党史专家的参与而进一步拓宽了"起源"研究的视野。美国、德国、前苏联和日本等国的众多专家从史学方法论、华北的社会结构、宗教活动、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等角度给了"起源"研究以许多新的启示。[19]此后十年时光的流逝,不仅没有冲淡反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发言的价值。

二、学术争鸣

人们也许已经注意到,50年代到90年代的相关研究在表述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学者的论说将义和团"源流"研究改成了"起源"研究。这种学术语汇的转换至少有两层含义:1.经过多年讨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逐渐超越了那种由"源"至"流",或者说将历史上的某种既成组织(如某教门)与义和团作直线联系的思考方法,尽管他们对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联系的方式、程度各有所见,但关注义和团自身形成逻辑的探究已逐渐形成势头。2."源流"研究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既成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义和团的地域起源、称谓起源和组织起源。

地域起源:1900年初,直隶、山东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讨论

"合办"义和团时，已经觉察到"义和拳老巢总根，实在冠县十八村"，并由此"延蔓于直东交界各属"。[11]但由于拳民四处蜂起，当时和稍后的一些笔记、史作将这个地域界限搞得非常模糊。此后的史学界基于时人对义和团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并不很清楚的记载，曾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发源于山东，然后蔓延到直隶等地。"义和团，起山东"的民谣，还被列入了一些书的章节标题。晚近以来史学界对地域起源研究有两点重要突破：1.起源于直、东交界。戚其章提出：赵三多的"梨园屯起义实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12]冯士钵等支持此说。台湾学者萧一山和戴玄之对义和拳组织起源的看法不同，但也都认为义和团事件应开始于冠县梨园屯教案。[13]路遥的提法更明确：组成义和团的"最主要的一支——义和拳运动乃发生于'直东交界'地区。"[14]虽然史学界基本上一致认为直东交界的这次起事是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但国内外也有不同的声音，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周锡瑞另辟蹊径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他根据义和团所特具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标志性仪式，强调了鲁西北地区的神拳在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中起了核心作用。[15]2.起源于山东、直隶两省。对此作出较为详尽论证的是林华国。他支持路遥等的观点并补充说："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拳在赵三多起义后是平行发展的"，"在义和团运动初起阶段，直隶省所处的地位与山东省大体相当"，因此可以把这两省看成义和团的发源地。[16]

称谓起源：由于至今没有发现"义和拳"何时改称"义和团"的可靠文字记载，学者们在称谓起源上出现了多种分析和推断。其中较为流行的说法是，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这个说法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在报章和城乡舆论中流传。此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金家瑞著《义和团运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廖一中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下卷均持此说。团体称谓是其行动和理想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起源的自身逻辑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因

此它在"起源论"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在多年的讨论中，前述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受到质疑。陈贵宗、冯士钵等根据1898年6月张汝梅的奏折和其他笔记史料，提出义和团的称谓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之前已经出现。[17]林华国则认为义和拳改称义和团确系发生在毓贤任山东巡抚期间，但这个名称是拳民们自号的，并对自号的具体时间作了考证。本文后面将再涉及。

迄今集中了众多见解的问题是义和团的组织起源。本文只能就有关讨论作出尽可能符合于作者原意的尝试性概述。

1.起源于白莲教或其他的民间教派。前揭陈湛若文构廓了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神拳、红砖会——义和团的思路，提出了义和团是"八卦教之支流"说。周海青在1979年推进了这个思路，他论证了历史上山东的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和八卦教发生联系的关节点在于它们都属于八卦教外围组织的"武场"。甲午战争后它们由秘密会社转化为反帝组织。[18]王如绘对鲁西南大刀会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提出作为大刀会主要特色的金钟罩在咸同年间的热河一带已经发展到武圣教而完全教门化，武圣教则属于混元教系统。他认为1894年在鲁豫苏边境兴起的大刀会和武圣教极为相似，也与直隶混元教的支派"红门"的仪式风习相类。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从德文档案中确认了大刀会的师父叫赵天吉。这个发现和稍后发掘出来的山东巡抚衙门的档案记载完全一致。王论证了赵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鲁西北神拳就是简化了的大刀会仪式与巫和拳的结合。[19]

2.起源于宗教化的拳会，或具有教门信仰的众拳会的汇合。前揭李世瑜文利用官方档案记载的梅花拳、义和拳案件勾廓了他的"起源论"逻辑：义和拳本来是拳术，它和康熙年间的梅花拳是一个拳种的两个称谓。后来这些习拳的人组成了秘密结社，但它在嘉庆年间已经从某些秘密宗教中吸纳了诸如供神、念经、诵咒和运气等仪规风习而宗教化，"演习拳棒宗教化，秘密宗教而演习拳棒

——它们结合在一起了”。

路遥、程歗考察的拳会比较广泛，包括了乾隆中叶以来的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会、金钟罩等等，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在历史上和民间教门发生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联系，一批拳会充当过教门起事的“羽翼”。在考察义和团的组织起源时，他们更关注梅花拳——义和拳以及离卦信仰、金钟罩和神拳互相融合的这两条脉络。[20]

路遥的《“义和拳教”钩沉》进一步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的互相印证，分析了义和拳的具体组织传承：义和拳渊于鲁西流传的收元教（八卦教）离卦和六趟拳组成的文武场。离卦传人李翠将这种组织形式带进了属于同一教派的王伦起事，并融合了梅花拳在内的当地拳派或拳会而形成了“义和拳教”。嘉庆年间，义和拳武场由于更多拳派的融入而复杂化了。作者强调梅拳第八辈传人冯克善（嘉庆十八年八卦教起事时的第三号头头）对于众拳派的协调，判断“义和拳教”的主干应是离卦六趟拳、红拳会和渊于民间教派的梅花拳。由此，他从李翠、李芳春（道光朝一位倡扬神灵“转世”说的离卦教首）的传承，推断这支组织通向同样崇尚离卦的朱红灯神拳。[21]

马西沙支持路、程的观点。他通过八卦教创始人刘姓教团和由他传承下来的王伦教派的异同比较讨论了王伦武场。和路文的区别是，他认为王伦武场中的主要拳种是带有信仰主义色彩的八卦拳，李翠等义和拳手在该教内的地位不高，但他强调了王伦起义的意义在于使“义和拳与八卦教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撞击、融合”，并容纳了由于教门起义而很难再公开露面的八卦拳。作者认为乾隆中叶后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和各种武术团体的合流，反映了华北地区农民运动的历史趋势，义和团运动是这种趋势的结果。但作者的论说不限于此，他并不赞成夸大民间教派对义和团的影响力，因为后者是一次更广阔、涉及面更大的全新运动，并非近代

史上的八卦教军。[22]这种将一个时代的教门拳会起源和另一个时代的抗争群体重组加以明确区分的论说，使该文很有新意。

3.起源于一般性的民间秘密结社。有一些学者可能是沿着邵循正的思路，将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界定在与教门发生交叉但不应混同的历史位置。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充分关注"拳"、"教"关系的多样性。其中较有影响的论说有丁名楠、徐绪典、金冲及、朱金甫、庄建平等。他们认为义和拳这类组织和白莲教或八卦教有渊源关系，但本身并不是教门。[23]徐绪典详细论证了义和拳的习武传统大于它和白莲教的历史关联。[24]他和金冲及都对"拳"、"教"两者的信仰、组织和活动方式的异同作了比较，论证了"拳是练拳，教是信教"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金冲及还认为，曹州大刀会最初是受当地大地主控制的联庄会一类性质的组织，以后鲁西北神拳的师承来自于曹州大刀会，但它的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游民和手工业者，它的白莲教因素更少组织也更松散了。金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社区构造、集团成员的成份差别，影响了各种组织的特性和运动走向。但他的论述没有展开。张寄谦对曹州大刀会的性质也持类似的观点。[25]

和上述学者既力图厘清"拳"、"教"区别又认可两者之间发生交叉的思路相比，方诗铭的见解别具一格："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方主要是利用了1813年(嘉庆十八年)鲁西南金乡县镇压八卦教起义时形成的县级档案。这些原始史料表明，很有谋略的金乡知县吴墉起用了两名练义和拳的捕快，"以毒攻毒"地扑灭了正在密谋起事的教门集团。他还发布公告招募义和拳勇"投充官丁"，共同保城抗教。方据此指出，被称为"拳会"的义和拳和被称为"教党"的八卦教，"不但不是同一个组织，或具有某种组织上的渊源关系，而且'势同仇火'"。方在肯定这种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前身的框架内展开了他的思路：义和拳在历史上"根本不是传统的反封建组织"，"八卦教起义时，义和拳已经在'扶

清'了",但是在19世纪末的反帝民族斗争中,义和拳和天龙八卦教的朱红灯大刀会并肩作战,并从后者那里吸取了按照八卦区分组织的形式。[25]

方提出的话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有好几篇论文对金乡案件中的"拳"、"教"关系作出了不同解释。[27]

4.主要起源于民间习武团体。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用语显然经过仔细推敲:"义和团是以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28]陈振江也提出并展开了类似的观点:1898年在直、东交界普遍建立的义和团或义民会,是"以村落为基地的习武团体,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直、东等省历来是白莲教及其支派最活跃的地区,它们在甲午战后也发展成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抗侵略和自保身家的群众团体。当义和团运动发展时,这些教派乘机而起,参加了运动并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9]陈总结了中日学者近代华北农村调查团取得的相关资料,进一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调查地区盛行的武术流派、组织、拳手以及村镇居民的武术价值观作了深入的研究。[30]他的成果,拓宽了学界较为习惯的将直、鲁地区的武术集团和民间教派互相联系的视野,在国内外引起了好评。周锡瑞称赞该文"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论点极有说服力","显示了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成果"。张鸣在研究北方农村文化对拳民意识的塑造时列出了"习武之风"一节,其中几次引用了陈的成果。[31]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学界的讨论涉及到广泛的拳种和武术流派,从而引起了武术史研究者的兴趣和介入,并呼吁社会史和武术史的合作互补。康戈武、燕子杰、周伟良等参与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他们的武术理论功底、资料和技击经验,为"起源"研究增添了活力。

5.起源于义和拳等农民结社和民团的结合。陈贵宗考察了义

和团组织内部的基本特征后认为，义和团很可能是各具特征的“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部分组织的短暂结合”，这种结合是从1898年到1900年通过多种途径而实现的。由此他明确提出了义和团组织的“多源”说：“一则表现为源于若干大大小小的农民结社；再则表现为源于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作为这两种‘多源’来说，反映义和团这个组织全貌的应为后者。”[㉜]

6.起源于乡团。这是戴玄之的研究成果，但大陆学者的回应冷淡。除前述陈贵宗的分析外，冯士钵、侯斌等也是从各地义和团并起的大背景中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的。他们从口述史料里发现，1866年（同治五年）直隶威县地方政权在对抗捻军时出现过一个名为“义和团”的乡团，在将这件材料和相关文献相互印证后，冯认为由于威县的梅花拳师赵三多的徒弟有不少团丁，从而促使赵在1898年民教冲突激烈化时采用义和团的名字代替了他领导的梅花拳。冯提出当时直、东各地民众“自为团练”的现象相当普遍，但这多是没有被当局认可的私团。直到义和团运动高潮时，一些义和团组织才被纳入清政府的地方团练。[㉝]侯斌也认为，由于威县已经出现了义和乡团，1898年威县的团勇和拳民们大量参加到梨园屯反教斗争中去，所以“梨园屯反洋教斗争组织也采取了义和团的名称，但它并不是被官府所认可之乡团”，只是“自立私会”。

两位作者论述的是同一个事件——赵三多、阎书芹的拳民和梨园屯教堂的对抗。但他们讨论这一事件在义和团起源过程中的地位时出现了分歧：冯认为这里是拳民运动的“根”；而侯更强调鲁西北“神场子”的作用，他比较详尽地论证了这种组织来源于和白莲教无关的巫，并进而认为义和团的“形迹”发展到习神拳的“神场子”才算完备，因此“神场子”才是义和团组织的前身。[㉞]侯的上述观点发表在20年前，但我们没有见到他有后续的相关成果。

由于讨论组织起源的作品是如此之多，本文的概述很难全面和准确，但有一点比较清楚：如果我们把“教门说”和“乡团说”界定

在讨论的两极，那么不难发现这两极及其介于之中的各种论说，大多同其周边的论说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叉和衔接。学者们研究的是同一地域的同类客体，而且经常利用了相同的材料来加以解释；之所以出现既相异又交叉的发言，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我们研究的客体本身就带有许多模棱两可，难以考索的特性。不过出于从学术上严肃勾画过去的共同心愿，大家对于历史客体中那些经过勾画而变得比较明晰的史实，往往容易达成共识。再者，大多数曾经持某一起源说的学者，也在学术交流中逐渐调整自己的视角，并不排拒对其他的有益见解的吸纳。这样，经过长期的讨论，各种观点逐渐在互相接近。义和团组织的"多源论"，已经或正在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三、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

本文以上对"起源"研究成果的概述基本是平面的，实际上，这类讨论在几十年中经历了一个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为了加深对讨论的认识，略为评析一下几本相关专著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也许是有意义的。由于写作分工，这里主要只涉及中国学者的研究。

戴玄之成书于60年代初的《义和团研究》无疑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在众口一词的"义和团是白莲教支派"的学术语境里，他率先批判了劳乃宣的小册子。戴论证了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与光绪末年的"义和拳""名同而质异"，并且进一步提出，当年那彦成奏疏中关于"义和门拳棒"等组织是"离卦教之子孙徒党"一说，也是靠不住的。他第一个注意到了嘉庆十八年的金乡案件(但材料和论说都远逊于前揭方文)，以此证明"义和拳与八卦教为敌"；再联系到1900年北京义和团捕杀过白莲教徒(无论这些教徒的身份真假)，以及团民们将白莲教和天主教相提并论的史实，都可证"义和

拳与白莲教、八卦教不但源流不同，毫无关系，而且对白莲、八卦所作所为极力反对，有如水火"。[35]戴这里挑起了好几个重要的话题：清代早期的和1898年以后的义和拳是名称上的巧合还是存在历史的关联？义和拳是依附于教门的"徒党"还是两者历来都"有如水火"？白莲教和天主教是怎样一种关系，怎样解释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白莲教信徒大批涌入天主教的现象，[36]以及是否就此潜伏下了义和团更加仇视白莲教的原因？这几个犹如一团乱麻的话题，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基层组织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们在此后被许多中外学者仔细讨论过。迄今在"起源论"上各家学说的一些关节点，都多少是戴氏话题的延伸。

戴是秘密结社史专家。他最早从信仰、仪式及其文化内涵上作了厘清义和团和白莲教的尝试。可能是沿着"五四"文化人的思路，他认为义和团崇尚的神灵来自于民间小说和戏剧，在对这些神灵作了简要分类后，他提出义和团的意识是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混合，而起主导作用的是传统的忠义观念。由此推及和白莲教比较，他认为义和团中从来没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言和弥勒崇拜等这类隐含着反政府倾向的白莲教信仰，而作为义和团主要形迹的"降神附体"、"吃符念咒"和自称"刀枪不入"的特征，则是嘉庆年间的八卦教或义和拳所没有的。虽然戴的论证存在某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但他进行的民间文化分类研究以及着重于仪式、形迹的考察方法，则带给了史学界以相当开阔的思考余地。80年代后大陆学者的义和团意识和文化内涵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在知识背景上和戴的话题有关。

不过，和以上新见相比，戴关于义和团来自咸同乡团的论说却缺乏说服力。他的主要论据是现在的研究者已经熟知的两个文件：山东巡抚张汝梅为防范直东交界的拳民闹教"滋事"，于1898年6月17日寄送总署的咨文和同年6月30日的一份奏折。戴认为这两个文件表明："义和团由梅花拳而来，梅花拳由义和拳而来。

至于义和拳，则源于咸、同年间的乡团。”对此路遥和林华国都反驳说，戴引用这两件材料时没有注意到它们由于情报来源不同而在内容上的矛盾：来自署冠县知县曹倜的报告讲当地梅花拳原为乡团义和团，而来自东昌知府洪用舟的报告则说梅花拳原为拳会义和拳，张汝梅送到北京的两个文件分别采用了两个报告的内容，却把结论搞模糊了。但既然曹、洪都肯定梅花拳在1898年恢复了原来的名称，那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知道这支队伍在1898起义前后的名称是什么，就可以判断它过去的名称和性质。他们都考证出起义的队伍叫“义和拳”，从而证明了它原来是义和拳拳会而不是乡团。[37]

本文对这场讨论略加介绍，也许能说明史学界认同“乡团说”者稀少的原因。戴氏的论点是崭新的，但在60年代，他的研究方法似乎还没有超出那种将义和团和历史上的某一既成组织作整体性对应的传统。他的论说经常流露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倾向，从而妨碍了他充分发挥历史学的认知功能去解释复杂多变的事像。

1988年出版的路遥和程献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是他们分别对自己从60年代或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戴书的回应。[38]虽然这时有些外国学者已经对中国同行们在“起源论”上热衷于组织寻根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但该书还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组织”问题。这种思路并非单纯出于中国学者治史时喜欢寻根溯祖的习惯，主要是来自于数十年起源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问题意识”：既然前人对于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作过那么多的勾勒，那末对于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进一步的爬梳，把握它们在义和团起源中有没有或者扮演过何种角色，发生过什么样的演变和重组，应该是解释义和团成因及其自身发展脉络的前提。至少，它可以为研究的深入作某种基础性的铺垫，总结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

训。尽管路子艰苦，还是值得一试的。

该书的基本观点是，象义和团这样一种如山洪迸发，奔突流泻，旁支杂出的民众运动，不是任何一个既成组织所能发起和它的形式所能容纳的。当时的各种力量及其组织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上表现自己。因此，应当把义和团组织的形成看成一个动态过程，通过对当时的多种民间组织如大刀会、义和拳、神拳、红拳会、乡团等作分类研究，进而找出它们和义和团的关联以及它们在这个联合体中的地位。

他们研究的结论：1.义和团的初始阶段，山东腹地和直、东交界的多种会社团门就在分别行动和发生交融。狭义的"白莲说"或"乡团说"都会在事件的多发性和勾画的同一性之间产生矛盾，应当把义和团看成源多流杂的抗争群。2.在这个抗争群中起主导作用的组织，是这一地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脉络里产生的带有教门信仰的拳会刀社。大刀会首先揭举了"杀洋灭教"的旗帜和传播了"刀枪不入"的法术。义和拳的名称和口号体现了更大的联合。但真正使这场运动快速发展的则是鲁西北的与金钟罩结合的神拳。这些组织在结构、信仰和价值观上的共性使它们有可能将仪式和风习交融在一起，塑造出了以"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为主要标志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形迹和清史上的教门拳会大相径庭，但继承了信仰和习武相结合的古老的传统。

这本著作被国内外同行们多次引用，但它是有缺陷的。它对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和组织形式之间的联系缺乏分析，早一年在美国出版的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则对此作了相当出色的研究。它在叙述一些组织如梅花拳、义和拳的历史传承时还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去年日本出版了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该书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教门和拳会，还是对西方基督教会向中国华北社会渗透的种种历史脉络，都作了相当深入的阐释。

路遥在上书出版的同一年又一次组织了实地调查。当地几位热心于乡土史的国家公务员如顾自忠、黄成俊、李金鹏等成为他的合作者，为这次调查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199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该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将义和团研究的视角移向区域性考察"。这次他们考察的中心，是当年直、东交界的几个县在直隶威县辖区内形成的被称为"飞地"的村落群。作者在考察之后修正了他过去认为鲁西北"神团"是义和团组织主体的观点，提出义和团运动中最主要的一支——义和拳运动发生在直东交界地区："山东冠县十八村和直隶威县沙柳寨一带"。因为作者发现，这里由梅花拳改名的义和拳不仅为运动提供了名号，也提供了过去鲜为人知的组织典型，而且他们的活动贯穿于运动的始终。

该书对这个社区的政治经济综合体的调查相当精细。这些调查包括当年的村落区划、村落人口、作物种植、家户职业构成、经营方式、交换方式和社会生活。一系列详尽的统计数字、地图和图表勾画出了一个生动的社区空间。该书指出，这个社区从早清到晚清，经历了一个大土地占有制度和宗法制度逐渐弱化，为市场服务的小农业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半发展半停滞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凝集性和分散性的传统在这里并存交织。由于天主教势力的渗透，在变动了的社会多层结构中，浮现出了乡团、拳民和教民等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力量不仅在不同的村落之间出现对峙，而且渗透进某些村落和宗族的内部。在各种集团势力犬牙交错而教会力量又相对薄弱的地带，最容易迸发冲突。

该书在把握这个社区里各种集团错综交织的全场景中，首次对梅花拳作了系统的梳理。根据调查中得到的《根源经》、《习武序》、《邹氏家谱》等丰富的史料，该书判断梅花拳始于明末清初，至少在雍正年间，它由于吸纳了《皇极宝卷》（指《皇极金丹九莲正信

归真还乡宝卷》)的相关内容而形成了具有经卷、请文和宝印为文化特征的教门形迹。教门式的"文理"思索和拳场中的技艺传授相结合,使这个拳会具有场分文武的入会程序、组织形式和观察事像的太极、八卦意识。这项研究,证明了扑朔迷离的梅拳谱系确实存在,它从早清到光绪年间的踪迹历历可寻。拳会的组织、仪式和文化意识也基本上明朗化了。这个拳会的第十四辈文场师父赵三多在梨园屯起事前应邀联合其他拳派,以梅花拳为主体塑造出了"义和拳"。虽然这支义和拳在运动起源中的地位还可以讨论,但在此以前,我们还没有见过什么人作出这样清晰的勾勒。佐藤公彦热情地赞扬该书"是研究史上划时期的著作"。[39]

1993年出版的林华国著《义和团史事考》是一本字数不多但份量很重的著作。该书只有一章研究"起源",但据我看来,作者对几个重要的议题,如义和团是否起源于乡团、义和拳和白莲教的关系、义和团的名称和区域起源等,都作了逻辑最为严密因而极有说服力的论析。作者的研究方法得益于他的考据学功底和他对数学的爱好。他用史学传统支撑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思维框架。如果说我们某些学者是习惯于筛选有关史料来建立一种观点,那么林的方法首先是对各种不同观点所依据的史料进行审查,排除那些不可靠的史料以澄清史实的真相。以考证义和团称谓起源为例子:作者发现,所谓1899年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的流行观点,是以一批不可靠的史料为依据的。这些史料(如鹿完天、刘孟扬的笔记,《拳祸记》收集的各种教会报告以及《清史稿》中的毓贤传等),一部分是都市文人信手记下的传闻,一部分是含有政治用意却又说法不一的报导,而且从文字和版本上也能找到它们之间以讹传讹的明显痕迹。传闻的多次重复就这样变成了"史实"。为了考察真相,作者通过排比官方档案(如毓贤收到的各种报告和他的批示等文件)去追踪毓贤的行动。他发现,当传闻所说的毓贤为朱红灯集团"改名"之时,这位山东巡抚恰好在忙着派出马步队去扑灭朱

红灯"滋事"和"严缉逸匪";在毓贤本人的行文中也一直把朱红灯及其部下称为"匪首"、"拳民",而从未使用过"义和团"、"团民"之类的称谓。毓贤"改名"的可信性就这样被排除了。最后,作者提出,在1899年10月14日即朱红灯集团在平原县杜子李庄和官兵发生冲突的前三天,附近庞庄一位传教士的通信还将这支武装称为"义和拳社",而在随后发生的森罗殿之战中,官方收到的报告里第一次出现了"官兵与团民"交火的记载,再将这些原始史料和较为可靠的口述史料相互印证,作者初步认定:改"拳"为"团"的"时间是在杜子李庄之战以后,森罗殿之战以前这几天之内","这次改名是由义和拳自己改的。"[40]"改名"反映了义和团自身发展的史实。由于材料有限,作者将他的判断称为"假说",但这一"假说"至少是经得起现有史料检验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起源论"从一开始就由于劳乃宣的小册子而带有"考据"色彩。对于这场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再勾画,如果没有严密的史料考据和史实分析,不屑于作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即使一流史家也可能滑进误区。既往"起源"研究的某些论述没有成功,至少部分地失误在史料的处理上。我们需要吸收相关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来丰富观察历史事件的视角,但历史的基本事实却不会因为观察工具的更新而发生变化。林书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出色的论说,而且他的研究证明了中国传统考据学中那种敢于质疑、重视实证、严密审识、反对空谈等积极因素,在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中仍有其活力。

最后,笔者获悉黎仁凯等撰写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从我见过的该书提纲和部分初稿的内容来看,该书的"起源"研究有两个特点:1.地域起源上山东和直隶并重。该书认为直隶义和团的主体并非自山东传入而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作者研究了大名府民间组织在运动初始阶段的作用,认为1897年11月1日大名府的大刀会杀死两名传教

士，和次年4月27日大刀会在府城（这里正在举行文官考试）散发反洋教揭帖这两件事，标志了运动脉络的逐步展开。2.组织起源上更广泛的考察。除了秘密会社，该书还较为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团练、联庄会、民间武术团体、水会、花会和"混混儿"等组织与义和团兴起的关联，以及由于它们的卷进而导致运动的利弊得失。该书关于"起源"研究的思路和成果，可能显示出区别于山东或直、东交界的同类研究的地域特色，并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四、题边随想

拙稿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不过，这次在重读了各家论说特别是路遥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之后，不由得发生了一些怎样继续开展"起源"研究的随想，作为读书心得，求教于同行学者。

经过多年讨论，史学界在"起源论"上尽管还存在相当多的分岐，但至少有两点，或者说对义和团起源的两个特性，已经达到了不同程度的沟通或共识：1.起源的社区性；2.起源的多元性。山东、河北的学者在社区综合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义和团不仅是带有不同社区特色的多种民间组织的总汇合，而且在某一特定社区（如直、东交界），也是当地的多层组织和多种文化因素撞击交溶的结果。凭藉这两个基点，我们有可能将研究再拓展一步。如果把话说得浅白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以特定社区为依托的各种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来讨论它们是怎样在变化了的社区格局中"动"起来的。为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社区"和"组织"之间，进一步找出一种可以涵盖和贯通两者的研究角度，或者说，找出一种对特定社区的多种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力量呢？笔者把这种角度，叫做"社区精英群"研究。

所谓"社区精英群"，在"起源"的论题里，是指士绅、商人、各种

基层正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民间组织领袖，以及社会分层和社会角色都相当复杂的村镇能人。已有的成果表明，义和团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在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错综交织的背景下，由这样一大批从各个阶层和多种组织里浮现出来的人群，自发地扬弃各自阶层或组织的规范，又在更大的联合中彼此认同，将社会力量一圈又一圈地动员和汇聚起来的。因此，通过晚清变动中的社区空间，把握"社区精英群"所主导的各种组织和力量的重组，可能是通向进一步勾画义和团起源的一个衔接点。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把甲午之后的历史倒溯一个时段。一些中外学者已经阐释过，由于道咸朝的农民大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枢权力变动，清帝国出现了高度复杂化和权力多元化的政治——社会格局。战乱中出现的地方权力空白，导致全国各地的地方精英（绅士、商人等）介入了原来由州县官员所控制的地方管理事务，开拓出一块介于州县级国家政权和乡村宗法、保甲体系之间的新的活动空间，并在这里拓展了区别于国家活动和宗法、保甲活动的权力新态势。这里，我们可以把"地方"的概念限定在更为具体的社区（如直、东交界）范围内来进行讨论。

首先，需要研究社区精英在本地事务管理领域中的活动态势。这种态势在直、东交界特别是各县插花地犬牙交错的社区中表现得更有特色。路遥细致调查过的冠县十八村的中兴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社区精英活动空间。[47]这里的钱粮柜制度（冠县衙门委托该集会首向各村代收钱粮），以及州县官员到中兴集邀约绅士、会首们议事的社区管理方式，典型地反映了社区精英们的权力伸展。在农业商业化、乡村集镇化以及人口增加的社区变动中，由于国家没有相应地对州县政权作出职能调整，而这个村落群又远离县级政治中心，于是绅士、会首们就介入了收纳赋税和维持社区秩序（特别是处理诉讼）这两种最主要的基层权力领域。而这些权力，本来是属于州县的。州县对社区精英依赖感的增强，使后者在同

光年间几乎参与了当地所有的重大民教冲突的调解。在有些场合，官员们甚至委托文生武举跨州县去化解冲突；在另一些场合，不属于"名流"的集市能人也参与其中。这种调解的意义不在于每一个案件的具体结果，而在于操作过程中绅士的权力向社区利益倾斜，并同基层的反洋教首领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权力关系的新组合，逐渐撕裂了州县和士绅和谐合作以维系社区秩序稳定的纽带。

其次，要研究社区精英特别是士绅们在文化领域的行动。书院重建是战后恢复地方秩序的一项重要工程。清初禁止新建私人书院和强化官方书院的教育体制已经松动，社区精英利用重建书院和学校的机会加强了对本地教育领域的控制。直、东一带修整书院和教会大规模渗透的年代是重叠的。当江浙一带某些书院致力于研究带有体制改革性质的新的经世学说时，直、东一带书院则坚守了遭到教会威胁的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书院相联系的是庙宇，这两者都是社区的历史延绵及其凝聚力的标志。民间组织的或村落的领袖乐意把庙宇捐给义学或书院，但坚决反对改庙宇为教堂。在保卫文化传统的层面上，社区精英群的一致性在扩展。

同书院发生关联的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文官制度，它通过考试程序来确定权力分层：哪一些人可以进入国家官僚集团或获得支配地方事务的正式身份，其他的人则不能。绅士们在调解教案时还貌似持平，而在他们负有直接责任的这个文化——权力领域，则筑起了坚拒异教徒的精神壁垒。虽然地方官在天主教直隶东南牧区的要求下批准教民可以参加科考，但没有哪一位名流肯替应考的教民提供保证书"。[42]另一方面，有些教民虽然富有，但由于没有功名，也就积极地利用各种教职（会长、司铎）来代替它。文化冲突本质上是权力冲突：对社区管理事务和有限的经济资源的争夺。这双重争夺极大地加剧了社区秩序的紧张。

第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社区的军事化和体制外的民间组

织的公开化，使这种紧张关系很容易诉诸于武装对抗。许多讨论“起源”的著述研究过咸同年间直东一带的团练。这类社区武装，是清廷鉴于正规军无力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和各种地方性起义事件，而向正式体制外的社区精英求助的产物。国家的兵权一旦放开，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基层社会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号称“团练”的军事中心。士绅、拳会以至于民间教派首领都在这面旗子下筑寨自保和发展力量。民间教派面对变局时表现了绝非清一色“反封建”或“反清复明”的复杂性。寨堡的土围子改变了许多自然村落的格局，凸现出宗法、保甲之上的社区空间。

我们以往的团练研究比较拘谨，没有充分注意它们构成的复杂性和从这里展开的社区格局的新变动。至少以下三点值得思考：1.地方政权鉴于无力“御贼”，在变乱中向教派、拳会以及其他民间武术团体中那些维护地方利益的首领妥协，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官府笼络自号“团练”的民间组织，甚至从严禁民间习武转而加以“奖励”，把精壮的拳手编为护城勇。有的民间组织也和地方政权有过军事合作的经历。2.这种经历在战后构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社区精英在相互交往时的“记忆认同”。象直、东交界的梅花拳、红拳等民间组织虽然在基层体制之外自成系统，但拳会的道德约束和乡团、保甲的秩序规范同具“各保身家，守卫相助”的功能，因此，拳手作为拳会的入门弟子和作为保甲居民的双重身份通常不会发生扞格。有的地方，官府甚至为战时死于“自卫身家”的拳手们立起了专祠。3.战乱之后，某些团练长期保留下来了。团丁们练习的是当地流行的拳种，并且要请师操练。正式体制内的组织和体制外的组织、团丁和玩拳人之间的边际都在逐渐模糊。国家严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随同学习”的条例在这类社区里丧失了权威性。

这种社区秩序的变动在日常生活的积累中显得自然而然，只有我们将其和乾嘉年间官府动辄逮捕“邪教”、“邪拳”，以至连结会

迎神也"例有明禁"的场景作比较时，才能体味出变动的意义。学者们在研究义和团的组织起源时常常发出疑问：为什么屡见于乾嘉刑部档案的"拳教"记载在此后颇长的时间段里消失了？为什么在讨论"组织"起源时出现了谜一样的历史空白？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1."空白"表示这类"组织"不存在，甲午之后的义和拳等与乾嘉朝的早期组织仅仅是名称上的巧合。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说明这种解释缺少说服力。2.它们不仅存在，而且公开化地融入了社区生活。咸同以后，每年春天的庙会季节，直、鲁、豫一带的"习拳之辈"，"传单聚会"、"亮拳"比武，成为了民间司空见惯的风尚。随着"拳教"呈控案的减少，它们才很少出现在国家掌握的秘密组织的名单里。

"拳教"的谜一样的历史把自己化作了历史之谜。后人由于很难窥测其底蕴而各抒己见。不过，对过程的勾画在这里比定性更为重要。19世纪60年代以后，直、东一带社区精英的权力拓展遇到的是外国教会的新攻势，由此，他们在社区事务管理上同官府发生了微妙的依违和扞格，他们维护地方利益和文化传统的认同感日渐强烈。社区凝聚力的内卷拉大了和国家州县政权的距离。在战乱中有过各种复杂经历的体制外民间组织顺着变动的社区秩序浮出地面，渐成气候；社区精英们对洋教的反击也因此而日渐组织化和武装化。如此等等，都为义和团的起源积累了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一切变动，距离皇权独揽和力图对地方实行严格控制的乾嘉年代已经相当遥远，它们只能出现在由于外部入侵和内部病症交织，因而政治日渐衰败，政治——社会格局也日渐复杂起来的晚清历史脉络中。

义和拳起事发源于这种变动的社区空间并加剧了秩序的变动。当起自基层、企望"变动"的组织和人群逐渐壮大，任何一种牵动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的事件都可能刺激它将能量迸发出来。1897年德国部队占领胶州湾、1898年的黄河下游大漫决和此后近

两年的华北旱灾，构成了多事的世纪之交。前一个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社区精英群的民族意识。“布衣谋政”和跨社区的联合行动由此而起。没有造反传统的梅花拳介入反洋教，表现了乡村民族意识激进化的程度。而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这种激烈的意识相交织，则进一步将处在社区结构边缘地带的更多的教门结社席卷进来。教门分子、巫师拳师等流浪人夹在饥民群中四处辐射，将简化了的仪式和法术带进村落，和土著的乡镇能人们联合起来。1899 年 10 月 6 日，也就是鲁西北神拳起事的前五天，一道地方官的禀文描述了这种场景：“外来拳师，在境内夸炫技勇，乡民年少无知，为之欣动，约集人众、学习拳棒。”[43]从各个社会层次上浮现出来的精英分子及其主导的组织、意识和力量的层层汇合，创造出了义和神团。

如上想法并不成熟，只是依托于晚清国家和社会互相重塑的背景，为“起源”研究中有关“社区”、“组织”等问题的讨论增添一点思路。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多种思路，比如，关于基督教会在华北的行动及其引起的官、绅、民、“洋”多方关系的变化；甲午之战和随后的瓜分态势在华北地方引起过何种回应；直、东两省的大刀会和神拳的组织或文化起源；畿南地区的民间组织特别是以“乾”、“坎”为卦号的民间教派的动向；几十年来基本上持对外强硬态度的京师“清议”势头同华北社会之间的互相作用，等等，都值得继续发挖史料和进行深入研究。我们相信，值此庚子百年祭，学术同行们一定会拿出更多更好的思路和成果，把我们共同关心的义和团起源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

注释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1册,11页,4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2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

③该书上编第一分册,356页,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④该文原载《文史哲》,1954.3,以后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38~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⑤胡珠生:《义和团的前身是祖师会》,《历史研究》,1958.3。

⑥该书下册,661~6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⑦该书第4册,9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⑧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以简称《论文集》),4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⑨《历史教学》,1979.2。

⑩这些论文,均请参见前揭《论文集》。

⑪致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

⑫戚其章:《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3.1.26。

⑬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21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戴玄之:《义和团研究》,5~6页,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出版丛书,1993。

⑭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5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⑮请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第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⑯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2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⑰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7;陈贵宗:《义和拳·民团·义和团》,《史学集刊》,1982.1。

⑱周海青:《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破与立》,1979.6。

⑲王如绘:《鲁西南大刀会考》,《东岳论丛》,1982.3;《大刀会与义和团运

动》,《论文集》,162～178页。

⑳路遥:《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程献:《乾嘉朝义和拳浅探》,后两文收入《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41～9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

㉑该文收入前揭《论文集》,100～126页。

㉒马西沙:《〈五圣传道书〉·清水教·义和团》,《论文集》,127～146页。

㉓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1;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5。

㉔徐绪典:《义和团源流刍议》,《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辑)》,1980.1。

㉕金冲及:《义和拳和白莲教的关系》;张寄谦:《义和团在山东活动情况二、三事》,均见前揭《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㉖该文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4,收入《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69～179页。

㉗比如:程献、陆景琪:《金乡义和拳辨析》,《历史档案》,1982.1;路遥:《论义和团的源流及其他》,《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1;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98～103页,东京,研文出版,1999(他的相关论文早已发表在1982年的《史学杂志》上;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附录:《清朝中叶的义和拳与白莲教》。

㉘该书,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㉙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262～26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㉚陈振江:《直隶、山东的武术文化和社会心理动向》,路遥、佐佐木卫主编《中国的村,家,诸神》,71～80页,东京,东方书店,1990。

㉛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7页;张鸣、许蕾:《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26～27页,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

㉜陈贵宗:《义和拳·民团·义和团》,《史学集刊》,1982.1。

㉝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7;《义和团

源流杂议》,《史学月刊》,1986.3。

㉞侯斌:《试论义和团的组织及其源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1。

㉟本文所引戴的观点及原文,均见其《义和团研究》第一至二章。

㊱美国学者包德威对此作了专题研究,他的论文《山东的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三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收入了《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徐绪典的《义和团源流刍议》也涉及此,他进而认为1900年北京的白莲教案件是义和团把白莲教徒当成了基督教徒。

㊲参见路遥:《论义和团的源流及其他》,《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1,49~52页;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2~5页。

㊳该书于1988年由济南齐鲁书社出版。作者从组织、信仰等方面阐释了与戴书不同的观点。

㊴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239~240页。

㊵该书,5~13页。

㊶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14~26页。

㊷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39页。

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

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研究

王如绘　刘晓焕

作为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有其兴起、蓬勃发展以至走向失败的过程。对这一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义和团研究的大部分论著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或与这个问题有关。

严格意义上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研究，基本上是在义和团运动发生近50年之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起步的。早在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前，封建统治阶级的朝野人士就已经开始了对义和团的研究。那时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义和团的性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义和团的来源问题。这是他们制订处置义和团的政策的需要。在义和团运动中，特别是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一些有心人记录了义和团的活动情况，但这都属于纪事的性质，还谈不上研究。此后的近50年间，义和团一直是有着极大争议的对象，所以多数涉及义和团的论著都集中在义和团的性质、意义等评价问题上。显然，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研究的迅速开展，与新中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充分肯定是分不开的。

同时，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研究的开展，是义和团运动研究深化的表现，是由单纯质的研究进入了质、量并重的研究，由较为简单的和笼统的研究进入了较为系统的和具体的研究。这一研究

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条路径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作整体的全面的描述;另一条路径是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局部的、个案的研究或进行区域性研究。

一、对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的整体研究

在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中,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以下简称范著)率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设专章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全面论述,并给予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作者将这一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以"义和拳在战斗中扩展起来"为题,由义和团的兴起叙述到1900年6月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天津。对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叙述,以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的斗争为主线,认为:义和拳本是"反清复明"的起义团体,由于官吏袒教抑民,乃适应群众义愤,反教抗官。朱红灯改提"扶清灭洋"口号后,势力愈益扩张。山东巡抚毓贤无力镇压,出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义和团得以公开活动。早就开始仇教的大刀会,这时也汇合到义和团中,义和团形 成全省规模的运动。1899年12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大肆屠杀义和团。一部分义和团联合大刀会继续在山东战斗,一部分入直隶境,向天津方向谋发展。对于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该书一则认为,直隶东南部以大名府为中心,义和团势力与山东同时高涨;一则又指出,山东义和团入直隶境,立即与多数民众结合起来,天津、保定、通州成为义和团的中心地区。

第二部分以"外国的压迫与义和团的反抗"为题,突出义和团的被迫自卫和反抗,从外国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的互动中去把握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作者将这一过程分作三段进行叙述。(一)大沽炮台失陷(1900年6月17日)以前。在1900年4月下旬以前,义和团主要是反抗官府镇压,不曾武装进攻外国教堂。自5月下旬

各国外交团向清政府表示将自行调兵处理后，义和团开始进攻长辛店、丰台火车站，驱逐外国工程师。后 列强派兵入京，兵船 16 艘在大沽口示威并登陆，清政府顽固派害怕列强扶持光绪皇帝，默许义和团入北京城。(二)天津失陷(1900 年 7 月 14 日)以前。集中叙述义和团在天津及附近地区的斗争以及抗击八国联军的情况。(三)北京失陷(1900 年 8 月 16 日)以前。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首先受到外兵的攻击。清政府被迫宣战后，义和团奉命与清军一起攻击使馆，围攻使馆 56 天，围攻北堂 67 天。义和团日夜在火线上冲锋，表现非常勇敢。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与旗兵在宫门外联合抵抗，死伤甚多，尸骸枕藉。

第三部分以"人民的继续反抗"为题，叙述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不仅外国侵略军屠杀义和团，连清政府也把"剿办"义和团当成向联军乞怜的礼物。各地义和团退入乡村，不再是几万人的大集团，而是数十、数百人的小部队，对八国联军一直采取进攻姿势，在 1900 年一年中，不曾停止过战斗。作者还综述了 1900 年直隶以外各省义和团及其他团体所进行的反对教会、反抗清政府的斗争。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叙述，得出了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的结论。

尽管范著对义和团运动发展的描述还是粗线条的，有些史实还欠准确，阶段划分也不够明晰，缺乏前后一致的标准，但范著的这一研究空前细致、具体，具有开创性，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范式和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范著不愧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典范。应该说，后出的大部分中国近代通史著作的相应部分和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专著，都受到该书的影响。

从整体研究的角度来说，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当然是全面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专著。从 50 年代以来，这样的专著出版约有 10 种以上。笔者认为，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2 月第 1 版，1959 年 12 月第 2 版)，

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以及牟安世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金家瑞著《义和团运动》(以下简称金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而又很有份量的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著。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金著大体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期,作者以"义和团在战斗中成长"为题,主要叙述义和拳在山东的初期活动,以及遭受袁世凯残酷镇压后,义和团主力于1900年春向直隶"转进"的情况。第二个时期是义和团运动扩大的时期。主要叙述义和团在直隶的多次反"剿灭"战斗的胜利,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及1900年6月上旬向北京、天津进军的情况。第三个时期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主要叙述义和团从长驱直入京津开始,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情况。如阻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天津进攻外国租界及在北京的战斗,直至天津、北京陷落,清政府撕掉招抚义和团的假面具,宣布剿除义和团为止。同时叙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各省义和团的斗争及其他形式的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情况。第四个时期,从1900年9月7日以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携起手来对义和团进行武力镇压开始,人民斗争转入"扫清灭洋"阶段。

金著在吸收前人成果,特别是范著《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对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的、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作了深入的开拓和发掘,对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轨迹勾勒得更加清晰,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更加合理,从而使其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著《义和团运动史》(以下简称廖著)是一部近40万字的煌煌巨著,该书出版于80年代初,是建立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取得大量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该著对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叙述,从框架到内容都有很多特点。首先,更加突出了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地域性,把义和团运动整体发展线索

的表现，寓于其地域性发展的叙述中。如该书第三、四、五章，分别集中叙述山东、直隶、京津义和团的发生与发展，各具始末，但第三章“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第四章“义和团在直隶的斗争”，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壮大；第五章“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和天津的发展”，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从整体上看，比较全面系统地表现了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走向高涨的全过程。其次，注重以丰富的义和团活动的史实表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历史运动是由一件件具体的历史活动组成的。只有充分再现这些具体的历史活动，才能正确把握历史运动的走向、特点和本质。廖著内容详尽具体，考核精审，不仅补充了大量以前著作缺失的重要事件和史实，而且匡正了一些以前著作的错误。如范著、金著均忽略了山东冠县以阎书勤、赵三多为首的义和拳的斗争，廖著则以“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为题，改写了山东义和团兴起的历史。再次，注重义和团运动发展规律与特点的总结，这在其很多章节中都能发现。

1997年出版的牟安世的新作《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力作，该著宗旨在于阐明义和团如何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而对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叙述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前的阶段划分，该著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从1898年10月到1899年12月，是冀鲁边区发展阶段，包括：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起义；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在鲁西北的活动及平原、茌平大张庄之役；武修和尚和王庆一在冀南的活动与枣强、景州之役。第二发展阶段，从1900年1月到6月，是冀中和京畿附近的发展阶段，包括：任丘、涞水之役，占领涿州等。

前述论著均涉及义和团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分期问题。他们虽未专门讨论分期问题，但都依据各自的标准对义和团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专门讨论分期问题的论文并

不多见。60年代初，吴松龄在《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分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把义和团运动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活动（1896－1899年）"，第二阶段"主要为义和团在河北、京津的发展及其失败（1900－1901年）"。[①]80年代初，戚其章作《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一文，对分期问题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认为义和团运动应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8年10月24日到1900年6月16日，即从赵三多和阎书勤等"十八魁"发动冠县十八村起义，到清政府决定"招抚"义和团为止。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98年10月到1899年4月，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阶段，其活动中心在鲁西北与直隶交界地区。从1899年4月到1900年1月，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其活动中心转移到山东境内，朱红灯领导的神拳由茌平发展到恩县、平原一带，很快义和拳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省大部分地区。从1900年1月到同年6月，为义和团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其活动中心则转移到直隶境内。此时，在京畿一带，义和团运动已形成燎原之势。第二个时期是运动的高潮时期，从1900年6月16日到同年8月14日，即从清政府决定"招抚"义和团，到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天津，运动的中心开始转移到了京津地区。历时仅两个月的时间。第三个时期，是运动的低潮时期，从1900年8月14日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开始，到1902年，历时两年左右。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8月到1901年9月，为义和团抗击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的阶段。从1901年9月到1902年，是义和团再次举义的阶段。其中最大的两起，一是赵三多与景廷宾于1902年4月23日联合发动的巨鹿起义，一是四川义和团首领李冈中于同月领导发动的资阳起义。[②]

与发展阶段问题密切相连的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问题。在70年代以前，多数论者把朱红灯领导平原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的

起点。如以范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和以金著为代表的义和团运动史专著均持这种看法。有关研究论文多数也持此观点。但不同意见也是有的。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于1960年组织了义和团调查，这次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认为："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及其开始"是从1886年至1898年，"以赵三多为首的义和团，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是这一时期的革命基本力量"。[③]1886年是法国天主教士在冠县梨园屯拆庙建堂的一年(实则为1887年春)，而义和拳介入梨园屯教案是在1897年3月。大刀会则起于1894年，1896年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武装斗争。把冠县义和拳与鲁西南大刀会作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显然是比把朱红灯领导的金钟罩神拳作为起点在时间上提前了一步。但是，如果以冠县义和拳的反洋教斗争为起点，最早只能是1897年3月，比较说来，大刀会的斗争反倒要早些。吴松龄于同年发表的《义和团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一文，对《调查报告》的说法作了修正，认为"义和团发端于甲午战后曹、单大刀会的反洋教斗争"，是经历了"巨野教案"、"冠县教案"、"平原教案"等几次具有影响的斗争活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④]。到80年代初，主张把赵三多、阎书勤为首的义和拳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起点的观点成为主流，如前述廖著和戚其章的论文均持此说。曾经主张朱红灯起义是义和团运动起点的陆景琪也改变观点，认为赵三多、阎书勤的斗争"揭开了义和团在山东开展斗争的序幕"。[⑤]路遥(吴松龄)80年代初仍坚持其60年代形成的观点，认为"山东义和团的兴起及其对运动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三个地区：曹县、单县(曹州府属)，茌平(东昌府属)，冠县(东昌府属)"。[⑥]但到90年代初，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成是义和拳运动的延续与发展"[⑦]。80年代以来，由于对大刀会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刀会在义和团运动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义和团运动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有些论者继续坚持认为大刀会

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如郭墨兰即在几篇论文中支持此说。[8]笔者曾就大刀会问题作过一些肤浅的研究，认为，它与义和团运动是前后相承、无法分割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后持续了几年的一个过程，仅据一个名称或一句口号，即把某一事件认定为运动的起点的做法，未必可取。事实上，人们不管对起点问题的主张如何，在论述义和团兴起过程的时候，都要从大刀会的斗争开始说起，这实际上已经把大刀会当成了义和团运动兴起过程的起点。

二、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区域研究

义和团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其分散性，各地义和团互不统属。从起源来看，义和团系由鲁苏豫皖边界的大刀会、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及鲁西北的金钟罩神拳发展而来，它们形态各异，没有直接的组织关联，在发展过程中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义和团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地区还融合了形形色色的其它民间教门和民间结社组织。不同地区的义和团，形态既不雷同，口号也不尽一致，如“兴清灭洋”、“扶清灭洋”、“顺清灭洋”、“保国灭洋”、“替天行道”、“保国卫民”、“国民相助”等等。所奉神灵更是千差万别。每一个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与该地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等紧密相关。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因而，对各地义和团的研究，受到义和团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正是在对各地不同特色的义和团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全面地把握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这种地域性研究中，最受到关注的当然首先是山东。

（一）山东

山东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为各地义和团研究论著之冠。早在50年代，骆承烈就写出了全面研究山东义和团运

动的专著《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10 月出版)。为纪念义和团运动 60 周年,从 1959 年开始,山东的近代史工作者陆续发表了一批全面、系统研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论文。如陆景琪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山东师院《山东通史》编写组的《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刘亦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概述》等。其后,直至 80 年代,对山东义和团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如对大刀会的研究,对冠县义和拳的研究,对茌平、平原一带义和团及平原起义的研究,对山东义和团复起的研究等。陆景琪还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结撰了专著《义和团在山东》(齐鲁书社 1980 年 6 月出版)。一些有关的重要资料如《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以及《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的出版,无疑极大地促进了研究的开展。在山东义和团的研究中,以下问题比较突出,值得一提:

1、茌平、平原一带义和神拳及平原起义的研究。活动在鲁西北地区茌平、高唐、平原一带的义和神拳及其发动的平原起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根据《茌平县志》等文献的记载,义和神拳是在大刀会传播的基础上,由金钟罩神拳演变而来的。神拳于 1899 年开始发动反对教会的斗争,并导致与镇压他们的清政府军队的冲突。朱红灯是神拳的著名首领,研究者对其颇有争议。以往论著多据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而认为,朱红灯是一个有反清目标的教门分子,是义和团运动初期的主要首领。有的论者还依据调查,认为朱红灯影响及于茌平、高唐、平原、平阴等地。有的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任荣康等发表《关于朱红灯反清问题的商讨》一文[9],认为朱红灯等人的打击对象是教会和教民,同官军的冲突完全是为了拒捕才发生的,没有任何反清的迹象。侯斌、郭墨兰发表《朱红灯是初期义和团主要首领吗?》一文[10]认为"朱红灯是一个重要拳民或某地区拳会首领,在长清、平原、茌平等地'闹教'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但却不是运动初期的"总首领、总代表"。

毓贤出于政治需要将其以"匪首"罪名杀害,劳乃宣接过去大加穿凿附会,蒋楷又据其特殊需要把朱红灯塑造成了教主式的最高拳首。朱红灯的身份、地位及作用问题,对研究鲁西北神拳的性质、规模及发展关系很大,因此,这一问题有进一步弄清的必要。

平原起义是鲁西北神拳斗争的高峰,被视为义和团运动成熟的标志。从平原起义开始,神拳开始自称为"义和团"。至少在这时他们公开提出了"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的口号。对于平原起义,史学界仍有颇多争议。对于事件本身,有的称"平原事件",有的称"平原战斗",有的称"平原教案",有的称"平原起义",这四种提法,内涵显有不同。朱红灯所率义和团在平原抵抗官军的战斗有两次,第一次为杠子李庄之役,第二次为森罗殿之役。以往一些论者将其称之为"平原大捷"或"森罗殿大捷",有的虽不称大捷,但也说是义和团取得了"胜利"或"旗开得胜"。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义和团真的把一营多正规清军打得大败,其实力可谓相当可观。但通过对材料的分析,认为根本不是什么"大捷"。有人甚至认为义和团是"大败"。林华国也撰文指出:"对义和团是否战败持存疑态度是可以的,但认定义和团打败了清军则是不慎重的"。对于"森罗殿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山东各地义和团的斗争……有利地推动了鲁西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等提法,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11]

2、关于山东义和团主力是否"转进直隶"问题。如前所述,范著《中国近代史》即曾提出,1900 年初春,义和团"从山东北部入直隶境向天津方向谋发展"。金著《义和团运动》则进一步提出,由于袁世凯的残酷镇压,山东"义和团主力向直隶转进","在景州、故城一带整顿队伍以后,就分成两路继续前进。其中一路沿着运河北上,目的地是天津;另一路则西北行,想沿芦保铁路北向京师"。前一路兑字团遭吴桥知县劳乃宣屠杀;后一路乾字团和坎字团,"以雷霆万钧之势,排除一切阻碍,终于进至白洋淀",接着又分兵两

路，一支队伍东行，一直继续北进，长驱进入天津北京。类似说法所在多有，散见于多种义和团论著中。李宗一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山东义和团转进直隶说质疑》一文，对上述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李宗一首先考察了在山东境内和直鲁边界活动的各支著名的义和团队伍的状况，指出，在1899年冬至1900年春，直、鲁交界各州县义和团英勇奋战失利，受到很大损失，大部分团民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反帝运动一时转入低潮。直到1900年夏，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涨时，山东义和团才又"复起响应"。"足以证明山东义和团主力一直在当地活动，而没有向外地作战略转移"。同时，山东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产生一致公认的首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不具备向京津两城挺进的"主客观条件"。再说，根据记载，直隶各州县义和团是由当地群众组成，京津地区的义和团也几乎都是本地和附近各州县的民众，而不是什么山东义和团主力。廖著《义和团运动史》也指出："从1898年到1900年冬，直鲁两省交界地区的义和团彼此联合，相互过境活动的事例很多"，"但是，它并不说明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镇压而逼使主力转移直隶"。

3、山东义和团"复起"的研究。由于袁世凯采取疯狂的镇压政策，山东义和团在1899年12月以后一度沉寂，但到1900年6月京津地区义和团掀起高潮以后，山东各地义和团纷纷"复起响应"，再掀高潮。以往义和团研究，多只注意山东义和团的兴起，而对全国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山东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则较少注意。80年代以来，对山东义和团"复起"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廖著《义和团运动史》摈弃了以往"义和团在山东坚持斗争"的提法，首先提出了"复起"的概念，详细叙述了山东义和团"复起"及掀起反帝新高潮的情况。该著还分析了造成山东义和团复起的四个方面的原因，特别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饥民队伍的扩大，人民

参加义和团以求生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商鸣臣撰文分析了山东义和团复起的五大特点：(1)复起地区广泛，斗争声势浩大；(2)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3)集中破坏清政府的电线和电杆；(4)采取流动作战的战术；(5)有的地区义和团使用了"洋枪"等新式武器。[12]陆景琪的《义和团在山东》一书没有使用"复起"的概念，而是沿用了"义和团在山东坚持斗争"的提法，但所叙述的斗争活动，基本是在1900年6月以后。这些叙述，是详尽而具体的。

(二)直隶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主要在山东省，那么，其发展壮大并掀起高潮是在直隶省。因而，直隶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史上具有突出的特点和耀眼的地位。自50年代开始，史学工作者对直隶义和团运动进行了研究，并开展了部分调查，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和一批宝贵的调查资料。但相对于山东等省市的的义和团研究来说，直隶义和团的研究曾在较长的时间内相对滞后，以致影响到人们对直隶义和团运动重要地位的认识。

对直隶义和团运动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较早的当推廖著《义和团运动史》。该著不仅以相当大的篇幅设专章论述义和团在直隶的早期活动、发展壮大及开始高涨，还在相应章节论述了直隶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英勇斗争以及作为义和团运动尾声的"扫清灭洋"斗争。该著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论述，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意把握运动发展的阶段性。如该著把"宣战"前直隶义和团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899年底以前为早期斗争阶段，从1900年春至4、5月间为发展阶段，从1900年5月底至6月下旬为开始高涨阶段。二是注意把握运动发展的区域性。如该著认为，直隶义和团早期斗争阶段活动的主要地区在直隶南部、东南部与山东毗连的州县；在发展阶段义和团开始从直隶东南部逐渐向

中部地区"蔓延",并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形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基地;在开始高涨阶段,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并以此为中心汇集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又如对早期斗争阶段,又明细为三个主要地区:一个是以大名府为中心,包括开州、东明及长垣各县;一个是冀州、深州所属各县,包括枣强、衡水、南宫、武邑、武强、安平、饶阳等地;一个是河间府所属各县,以景州为中心,包括献县、故城、阜城、吴桥、东光等地。由于该著很好地把握了阶段性和区域性这两个关键,所以对直隶义和团发展的叙述条理清晰,富有立体感。此后,公孙荀出版了《义和团运动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填补了直隶义和团运动专著的空白。

在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涌现出一些热点和富有特色的课题。其中最有成绩的是廊坊大捷的研究。廊坊大捷是义和团痛击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首的侵华联军的战斗,集中体现了义和团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以往对这一战役的研究成果较少,一般均语焉不详。1991 年 6 月,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了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研讨会,会后将论文结集出版了《义和团廊坊大捷》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与会学者就廊坊战役发生的社会背景、战役发生的具体地点和起讫时间、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廊坊大捷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等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会议还探讨了廊坊地区民间文化如民间歌谣、歌曲、音乐、曲艺、花会、武术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廊坊大捷(或战役)概念的内涵问题,是讨论的第一热点。根据苏位智的归纳,有小、中、大三种概念所包含的五种观点。小概念特指 1900 年 6 月 14 日和 18 日在廊坊火车站义和团和部分甘军与西摩尔联军之间的两次战斗。大概念则把 6 月 17 日发生的天津大沽口之战和 6 月 18 日发生的老龙头火车站之战也包括进了廊坊战役的范畴,理由是这两次战斗虽未同西摩尔联军本身对垒,但目的是打援,与击败西摩尔联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概念包括了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起

于6月11日西摩尔联军在落垡首次遭阻击，止于6月18日联军败离落垡；其二认为起点应是西摩尔联军6月10日从天津出发，止于6月19日联军从杨村向天津的总溃退；其三认为起点应是西摩尔联军6月10日从天津出发，止于6月26日天津西沽武库的战斗。[12]前两种观点支持者较少，而后三种观点均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尚难分高低。总之，通过这次集中探讨，不仅生动再现了廊坊大捷的雄壮历史场景，多侧面地展现了廊坊义和团的战斗英姿，而且拓宽和深化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

直隶义和团研究中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如关于所谓"涞水大捷"的问题，芦保铁路沿线义和团与清军杨慕时部力量对比问题，景廷宾起义等问题，都引起学术界一定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河北省为主的一些史学工作者连续发表文章，或以正面评价的方式，或以比较研究的方式，阐述他们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试图改变以往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不够、认识不足、评价不到位的状况。如傅德元、姜文英通过对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团运动从兴起、规模、相互影响及最后失败时间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直隶是义和团运动最早兴起和最后失败的省份。""第二，直隶是义和团运动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且涌现出大批义和团领袖的重要省份。""第三，直隶义和团运动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13]尽管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情况还把握得不够准确，但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与这种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新认识相适应，一些研究者呼吁加强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黎仁凯指出：长期以来，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相当薄弱，与其所处的地位极不相称。目前，无论在研究队伍、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方面，河北与毗邻的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他甚至认为："加强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应是整个义和团运动研究走向深入的突破口。"[14]他还就如何加强和深入研究直隶

义和团运动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如“开展社会调查，转换研究视角”、“探索世纪之交直隶社会的特殊性”、开展比较研究、加强区域性和阶段性研究等。

(三)北京、天津

北京是清朝的首都，天津既是直隶的另一省会，又是北京的门户。两座大城市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特点颇为相近，而有别于山东和直隶。两座大城市清政府控制严密，义和团的兴起和传播较晚，是义和团由山东而直隶，对京、津两市形成包围之势以后，才开始由逐渐渗透而至大规模发展的。京津地区义和团的发展，是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义和团在北京、天津同列强军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写下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丽诗篇。有关京津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记载，有历史档案，有日记，有诗文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大部分已经整理出版。与此相适应，有关两市义和团发展的研究，也起步较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研究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意义。因为京津特别是北京，是清政府统治的中心，又是帝国主义列强使馆区、租界区的所在，是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略的首要目标，所以，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集中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集中反映了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顽强精神，也集中反映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兹对京津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中的几个引起讨论的问题加以概述。

1、义和团为什么能在1900年6月大批进入北京。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是从1900年6月上旬开始的。为什么会在这时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们作出了多种解释，主要的有两种。一种以廖著《义和团运动史》为代表，认为这时清政府已决定招抚义和团，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因而默许其进入北京。另外有不少论著认为，当时清廷已无力或不敢阻止义和团进入北京，否则“将陷入

灭顶之灾”。林华国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对于前一种说法，他认为，义和团三五成群络绎不绝进入北京，根据记载，是在6月7日之前，而这时慈禧太后并未下定利用义和团的决心。直到6月13日至15日，西太后还连续发布“上谕”查禁京城一带的义和团，并调马玉昆部到京加强镇压。对于后一种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义和团人数众多，活动的地区也相当广阔，清政府无力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但是，义和团正规作战的能力特别是攻坚的能力一直很差，根本无力攻打北京这样有重兵防守的坚固城池，更不可能使清朝统治“陷于灭顶之灾”。义和团民是三五成群进入北京的，清军如果阻止他们进城，并无多大困难。实际上，义和团之所以能顺利地大量进入北京，是因为守城清军不予阻拦。5月底6月初，帝国主义加快了武装干涉的步伐，清政府内部在义和团政策上分化为主抚、主剿两派，慈禧太后首鼠两端，放松了对义和团的镇压。负责把守北京城门的八旗亲贵乘机令士兵敞开城门，任义和团自由出入。[16]

2、义和团在围攻使馆中的作用。很多义和团运动史的论著认为，义和团从1900年6月20日清政府对外宣战前夕开始参加了围攻外国使馆。有的著作认为，义和团6月20日围攻外国使馆之举是自发的行动，但更多的论著则认为，义和团围攻使馆是奉清政府之命。有的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把义和团排在参与围攻使馆的各支清军之前，以突出义和团的地位，甚至认为清军主要起牵制义和团和暗中保护使馆的作用。有的则认为，奉命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荣禄的武卫中军，义和团不是围攻使馆的主力，参加人数不多，时间也很短。有的认为，围攻使馆是慈禧太后及其一伙在宣战的旗号下所策划的废帝立储、保权保位的阴谋，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并无共通之处。义和团参加攻打使馆，是受了清政府的煽动和蒙蔽。它之所以能被利用，除了朴素的民族义愤外，还与本身的笼统排外思想有关，也受“扶清”思想的支配。有的则认

为，义和团在攻打使馆时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无从议其功罪。

3、天津之役中义和团所起作用。天津之役从1900年6月17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是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有的论著认为，义和团是这次战役中方的主力，而另有人认为，清军是中方的主力。林华国通过考察，认为义和团并非中方主力。但他同时认为，义和团在天津之役中所起作用是不可缺少和不可低估的。战争爆发后，直隶总督裕禄把位于二线的一些据点交给义和团驻守，或由义和团协助清军驻守，天津城的城防也有义和团参与。还发给了义和团不少步枪。在围攻租界、阻断敌军交通线等方面，义和团配合清军作战，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战役的最后关头，马玉崑率部逃跑，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肩负起保卫天津城的艰巨任务。对义和团在天津之役中所起作用应实事求是地给与充分肯定，不应加以贬低，更不应予以抹煞。[17]

（四）义和团在各地的发展

东北是义和团运动较早波及的地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起步于50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视，是在"文革"结束以后。首先是廖著《义和团运动史》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接着又发表了黎光、张璇如合作的专著《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还出版了一部50多万字的《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有关论文也有数十篇以上。对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各种论著持有并不完全一致的意见。如有的论者认为，东北义和团运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00年2月至6月末为第一阶段，系秘密活动时期，是义和团处于不合法阶段。6月末至8月上旬为第二阶段，是义和团合法活动时期。8月中旬至1901年上半年为第三阶段，是

《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两文。"文革"结束后，又有一些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张力的专著《四川义和团运动》。这些论著的研究认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义和团的成员潜入四川，以"神打"、"阴操"、"红灯教"、"顺天教"等名目活动，清政府官方文件中有时也称之为"拳匪"，它们就是四川义和团。廖著《义和团运动史》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四川红灯教、顺天教等于1901年以"灭清剿洋兴汉"为旗号举行起义，并于1902、1905、1907年几次掀起斗争高潮，这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红灯教、顺天教是否即可称为"四川义和团"，这些斗争是否可以称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曹蓉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上发表《"四川义和团"质疑》一文，对此进行了辨析。该文认为，"四川义和团"这一组织和称谓，在清官方文书、当时的报刊及志乘中均无记载，虽有时也把红灯教称为"拳匪"，但那只是对习拳、打洋教之类组织的泛称，不能据此便把红灯教等组织称为"四川义和团"；红灯教是一种秘密宗教，早在同治初年就在四川掀起反清斗争，并非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由北方传来；它与义和团在组织形式、组织成分、组织特点、首领称谓、服饰装束、旗号、传徒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各种论著所提"四川义和团"的斗争，绝大部分实为红灯教、顺天教的斗争。因而作者认为"四川义和团"在史实上是不存在的，应该恢复原有"红灯教"的提法。曹蓉的论文发表后，未见有人提出商榷。但四川红灯教的"灭清剿洋兴汉"斗争是在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受到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促成，恐怕是不容置疑的。

除了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的反帝斗争之外，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出现了遍及全国的人民反帝斗争的高潮。前述省区除了义和团外，就有一些与义和团宗旨相同但来源并不相同的组织，如东北的忠义军、六合拳，内蒙古的"多归"等。在义和团组织蔓延较少的南方各省，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在长江流域，哥老

会等组织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遍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以至上游的云南、贵州。在东南沿海，浙江先后有刘家福领导的斋教起义，王锡桐领导的伏虎会、濮振声领导的白布会起义；福建有“义和会”等组织的斗争；广东、广西有三合会党的起事等等。这些斗争虽然与义和团不一定有组织上的联系，组织形式和活动特点也有一定差异，但都可以看作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关这些斗争活动的研究，有的已较为系统，但多数似乎仍嫌薄弱。

三、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的展望

如上所述，自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在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这一研究并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了，它还需要继续深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整个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是建国50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领域之一。其中，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义和团的起源问题，义和团与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关系问题所取得的成就则更大一些。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当然也是取得成就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比较而言，这一课题的容量更大，涉及的领域更为广阔，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弄清的问题也更多。发展问题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等很多问题密切相关，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促进整个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深入意义更大。人们早就开始谈论义和团运动研究如何突破的话题，发展研究应当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为进一步搞好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以下问题笔者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1、继续做好义和团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历史科学是特别讲究实证的科学，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是取得科学结论的前提条件。建国以后，义和团史料的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力

地配合了研究工作的开展。但是，目前仍有必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比如，国内有关各地义和团运动发展的档案史料仍有待于发现和整理，有些流散到台湾省和海外的史料更有待于收集；已出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90 年版）只收录了有限几种中文报刊的资料，有些较重要的中文报刊如《申报》等的资料还有待于开掘，有些当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的资料也应组织人力进行翻译。各地义和团的资料的整理也很不平衡，有的省区好一些，有的省区就显得比较薄弱，甚至阙如。已有的一些调查资料也没有完全得到整理和出版。继续搜访各地义和团及其它反帝爱国组织的发展与斗争史料，仍有很大潜力，可望取得好的收获。

2、把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结合起来。要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在各地的发展状况客观地反映出来，就必须进行过细的研究，把定性的研究与定量的研究结合起来。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人们在纠正了统治阶级和旧的研究者对义和团的不公正的评价之后，又走入另一误区：在对义和团肯定的时候，往往少有程度的区分；对不同地区义和团的表现一律大加肯定，缺少恰如其分的分析；对义和团的实力，往往过高估计；对义和团参加的战斗，动辄便称“大捷”……。如此等等，几乎成为研究者的一种思维习惯。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正在被打破，但其影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未来的义和团发展研究，应该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注意质的规定性，又要注意量的规定性，并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比如，对某一义和团的队伍，在对其实力做出判断时，应根据文献记载对其人数、人员成分、年龄结构、所使用的武器等状况进行认真地考察；在对其活动范围进行描述时，应具体考察是哪些州县甚至村镇；在对其进行的战斗进行评价时，要尽可能搞清双方死伤人数，不要清军或八国联军一有伤亡便称义和团取得胜利甚至“大捷”。另外，对义和团运动影响下人民群众所进行的

反教会、反侵略 甚至"均粮"等斗争，是什么组织领导进行的，就应写什么组织，不应笼统地一律称之为义和团。

3、加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经济、社会原因的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山东、直隶等省轰轰烈烈，而有些省区则波及面较小；同是山东、直隶，不同州、县的义和团运动发展也不平衡。究其原因，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种因素有关。过去，人们较多地探讨了影响义和团发展的政治因素，如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政策等等，近年来，人们则开始关注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人们特别注意到了灾荒与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关系，有的论文还论述了义和团运动为何没能在江南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在社会因素方面，有的论文涉及华北游民社会及农村文化心理的问题。这些研究都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应该说，对义和团运动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譬如，研究者早就指出，清政府中以端王载漪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的态度，是影响义和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固然有其废帝立储的偏狭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鬼神迷信也是原因之一。当时在清朝官员中，"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19]，他们表面上说义和团民气可用，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重义和团的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勇气，更不会看重义和团手中的刀矛棍棒。他们宁可相信，义和团遍地蜂起，是神意、气运使然，是上苍要假义和团之手把洋人赶出中国；宁可相信，义和团的上法、刀枪不入等神术足以对抗八国联军。北京"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20]局面的出现，与此大有关系。事实上，甲午战后，随着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以大刀会、金钟罩神拳为代表的各种气功、拳术、巫术也广泛传播。首先是山东、直隶，青少年争相传习，如痴如醉，风靡大半个中国，影响所及，连清政府的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都将信将疑。义和团运动发展史，既是一部农民反帝斗争崛起史，也是历史上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气功、拳术及各种

巫术的大泛滥史。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在一触即发之际，来不及选择合适的展开形式。或者说，当时的农民反帝斗争，也几乎只有利用这样的落后形式才可以奏效。这种历史的尴尬不必讳言，而只有靠社会的、宗教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来给以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又如，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与其成分有很大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注意义和团成员的阶级成分，而对其他方面则较少注意，如年龄构成。义和团的成员，以青少年为主体，时人记载北京义和团说"未及岁童子尤多"④，其他地方也大致相同。山西省榆次县什贴镇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姜晋华只有十二岁（虚龄）。红灯照则以刚过十岁的小闺女居多。用来表演附体者也都是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时人传言"七岁小孩不及一刀之长，持刀上阵，杀人如泥"②，足见对幼儿参战的迷信。这种未成年人在队伍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大，以及对义和团的影响，值得研究。他们参加斗争的积极性高，能吃苦，一呼百诺，但他们不具备成年人的自控能力，盲目性大，容易走偏方向，且战斗力低，"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利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要深入下去，需要继续搜集新的资料、拓宽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方法。可以预期，在新的世纪，义和团运动发展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①④《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年第2期。

②《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18－138页。

③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铅印本，未著年月，第14－15页。

⑤《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第1期。

⑥《论义和团的源流及其他》,《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

⑦ 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与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⑧ 郭墨兰:《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试论》,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920-921页。

⑨《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⑩《东岳论丛》1982年第4期。

⑪⑯⑰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5页;第67-73页;第136-138页。

⑫ 商鸣臣:《论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载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年8月。

⑬ 苏位智:《廊坊大捷的概念、称谓及其它》,载《义和团廊坊大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⑭《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研究》,同上书。

⑮《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载《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⑱ 吴士英:《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北方论丛》1991年第1期。

⑲《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

⑳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

㉑《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页。

㉒㉓《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第189页。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研究

喻大华

长期以来，史学家主要从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史，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于“社会”这个范畴而论，则视角未免有些狭隘。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史学家们本着探索进取的精神，开始拓展视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对义和团运动做深入的考察。1986年5月6日至10日，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成为会议的主题，这是中国史学家转变视角的开端。此后，学者们围绕着社会经济、社会变迁、自然灾害等方面展开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

一、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

早在1901年，明恩溥在纽约出版了《动乱中的中国》一书，其中强调了义和团运动的经济背景。他在详尽地描述了西方棉纺织品对中国北方自然经济的冲击后指出：“在外国商品冲击中国古老的社会秩序之前，曾有一些能够吃饱穿暖的年份，然而现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不足，并且前景十分糟糕，由于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所以不能指责中国人对新事物所持有的抵触情绪”[①]。由于作

者本人的传教士身份，所以他强调的义和团起义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宗教原因的观点或许是别有用心的文过饰非，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肯定与19世纪末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大有关系，对此，后来的中国史学界也是肯定的。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国内史学家们却对经济原因重视不够。如翦伯赞的《义和团运动》[②]一文，强调的是外国商品倾销造成了国内自然经济破坏、手工业者破产；铁路和新式航运业使传统运输业者大批失业，从而扩大了流民队伍。《义和团运动史》[③]在诠释运动兴起的原因时，也沿用了这一基调，以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作为此时经济侵略的主要内容，表现在进行政治性贷款、在华开设银行、兴建铁路、设厂开矿以及商品倾销、原料掠夺等方面，其结果是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这些论述由于缺乏大量的量化分析来支持，所以带有较强的"想当然"的色彩。

这种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改变。1986年春夏之交，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一些区域或专题经济史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在程洪的《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④]一文中，有关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引人注目。该文认为，从形式上看，19世纪末华北的经济方式依然是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主，但深究起来，便可见结构的内部已发生着深刻的质变：在农业结构方面，商品生产者有所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有了大的增长；在手工业结构方面，手工业已经大量纳入商品生产，手工业与农业的关联发生变化，更主要地依赖于市场，手工劳动者的流动性和行业的不稳定性加大。总之，在直鲁豫三省，旧的经济结构已趋于破坏，新的结构尚未确立，受外国经济操纵和冲击较大，处处仰人鼻息，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只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来求生存。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排除洋货，可视为经济结构变动的反映。

从总体来看，该文还未超越以往的基本思路，且直鲁豫的地理范围也显过大，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多了起来，研究方法更加缜密，资料和数据更为丰富，因此，也就更加深入地说明了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张思的《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破产与义和团运动》[5]一文是探讨义和团运动的经济背景的力作。该文研究了19世纪末的数十年间，直鲁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和生存方式所遭到的猛烈冲击和破坏及其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并以这些经济上的变迁来解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显得颇有新意。文中以大量具体而又详明的表格、数据，丰富的中外文资料，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传统的小农经济本来就承担着苛捐杂税、地主剥削、天灾频仍、人多地少的巨大压力，又面对着洋纱、洋布的致命冲击，其结果就是大批农民失业破产，生活急剧恶化。

张思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往史学家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解释难以说明义和团起源地区的特殊背景，从全国来看，山东洋教的扩张并未超过它省；从山东来看，鲁西的洋教比重也不大，可见，民教冲突并非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的全部。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从直鲁地区千百万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现实出发，从他们的切身利害中，对义和团运动产生的根源予以说明。"

张思认为："在19世纪末叶，华北和直鲁地区是洋纱、洋布输入最多，销流最广的地区"，给农民生产带来影响之严重，亦是全国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洋纱、洋布的侵入与洋教明显不同，它影响了直鲁农村的各个角落，使每一个农民都无法躲避、旁观。即使是再闭塞的农民也深知他们失业破产，生活每况愈下，乃至无法生存都是洋货造成的"。"这样，洋布、洋纱等等洋货就成为当时所有直鲁农民怒目仇视的对象，一场震惊中外的燎原烈火便在这一聚焦点上生燃了。毁禁一切洋货成为直鲁各地义和团的共同标

志，这也使义和团运动首先表现为是一场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洋货运动”。农民对洋货的仇视与对洋教的反感同为义和团运动产生的根源。“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地区与直鲁农村的传统的纺纱织布发达地区在地图上完全‘重合’不是偶然的，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正需要这一重合的地图给予说明。这即是19世纪末叶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严重衰落的标志，又是千千万万走投无路的失业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然产物。”

1991年，胡绳武、戴鞍钢的《义和团运动期间江南的社会环境》[6]一文，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张思的观点。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如火如荼之时，南方则相对平静。对于这一特殊现象，胡绳武、戴鞍钢不同意仅仅以东南互保抑制了群众反帝斗争来解释，而是认为：“义和团运动期间，江南地区之所以没有发生象华北平原上出现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该文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八九十年代，长江流域发生了反洋教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反对的是西方教会，却是以封建经济结构解体、社会矛盾激化为背景的，外国商品和新式航运业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很多失业者的产生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贫困化，以致激起反抗。但到了19世纪末年，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自然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发展、近代工业发生，人民的经济生活由面临危机到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社会经济逐步近代化。而在华北平原，经济的转型方露端倪，更多见到的是洋货倾销对农家生计的严重打击，再加上日德两国在山东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和连年灾荒的特定原因，终于激发起了义和团运动。

当然，胡绳武、戴鞍钢并不认为经济条件是造成江南地区未象北方那样出现义和团运动的唯一原因，为了圆满解决这一问题，他

们建议进一步对当时南北民间结社、南北社会习俗、南北政治力量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深入说明问题。

从周锡瑞的研究成果来看，张思的在19世纪末叶，华北和直鲁地区是洋纱、洋布输入最多，销流最广的地区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周锡瑞说："1980年，当我访问平原县义和团曾活动过的村庄时，我特别急于询问老农，机纱对当地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令我吃惊的是，人们众口一词地说大约在1920年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见过洋纱。在我访问的山东和直隶交界处的其他地区，直到今天，农民们还常穿手工织成的土布衣服。"但周锡瑞的结论仍能对张思的观点给予一定的支持，周认为："我强烈地感觉到不是机纱和机织布进口到了植棉区，而是这些地区正在失去它们的外部市场(大部分在北方和西部地区)，现在从天津进口的货物直接占领了这些市场"。同时，周锡瑞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观点："与其说这些地区是因洋纱和洋布的进口而失去了重要市场，不如说这些地区是太偏远太缺乏应变能力，因而通商口岸在某种情况下带给邻近地区的经济变化，在鲁西地区就很难产生。例如在烟台周围地区，有些农民能够放弃棉花纺织，转而编制草帽以供出口，但是，……在植棉的平原地区，没有任何生产性行业代替(纺织业)。结果是这些植棉区遭受了外国经济渗透的严重打击而得不到由其产生的任何益处"⑦。

姜文英、刘建军的《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⑧一文注意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经济因素对义和团运动的制约。该文以经济因素来解释义和团的保守、排外、分散、抢掠等，较有新意，但尚待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社会经济背景应该是揭示义和团运动发生于直鲁地区的最有说服力的方面，义和团的许多行为方式也与此大有关系，所以，对此值得下大力气，长期、深入地从事研究。8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成果，较之五六十年代的认识是大大地深刻了，但从

总体来看，在基本思路上还缺乏突破，在资料和研究方法上也颇有丰富的余地。怎样跳出以往的樊篱，开展中外交流，开阔思路，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发掘资料，从而取得大的突破，应该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社会的变迁与义和团运动

社会以特定的形态而存在，一定形态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同时，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变迁的。甲午战后，正是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期，社会处于剧烈的变迁之中，其结果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在此，综述除了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探索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时，自然对此有所考虑，廖一中、李德征等编《义和团运动史》、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9]、路遥、佐佐木卫编《中国的家·村·神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10]等书也对当时的社会变迁有所涉及。但一直缺乏深入的揭示。

由于本节较为丛杂，故做细分，以期明晰。

（一）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义和团运动

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从社会历史角度来对义和团时期社会变迁加以考察，堪称力作。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一章："山东——义和团的故乡"中，以区域为单位，对"鲁西"社会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对自然状况、经济条件、人民生活等的揭示，与江苏、河南、河北等区域的对比，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尤其是指出了鲁西北与鲁西南悬殊的差别：在经济方面，鲁西南比鲁西北富裕，因此，有一个比率较高的地主阶层；在社会治安方面，鲁西南盗匪较多，地主所有制是防范盗匪的核心力

量，同时也是盗匪活动的根源；在人口流动方面，鲁西北的流动是双向互动的，而鲁西南的人口流动则主要是外向的，也就是说，外来户在鲁西南不受欢迎，而在鲁西北则容易被接纳。作者以这些社会因素解释鲁西北的义和拳与鲁西南的大刀会的不同，进而说明鲁西北比鲁西南更容易接纳义和团的社会原因，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杜耀云的《论义和团倡始鲁西的社会环境》[11]一文中有些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义和团倡始的鲁西地区在民情习俗上的突出特点是耕读为世、男耕女织、不事商贾、深闭固拒、民情悍塞、家重礼教、户重仁义、习骑射、高义勇，“以善导之，固易于兴起；以邪诱之，亦易于鼓簧”。而且，“19世纪末年，鲁西地区的特定社会环境，不仅制约着义和团倡始的地区，也制约着义和团斗争的方式和结局。这表现为义和团倡始山东的地区，不是同商品经济较发达，帝国主义军事侵略重点的鲁东地区相联系，而是同封建经济结构较牢固的鲁西地区相联系。这是因为在鲁西地区，不仅有着利于拳民活动的地理形势和民教构怨已深的社会基础，并且多种宗教和秘密结社长期存在，这就为旧式农民进行斗争提供了最为得心应手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义和团运动同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不同，它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经济的反映，而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相联系的旧式农民对教会侵略势力和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直接反抗。”

（二）社会阶层的变迁与义和团运动

周锡瑞从绅士阶层的兴衰变迁来解释义和团的兴起，显得很有新意。作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鲁西南，还是鲁西北，二者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即士绅力量十分微弱。作者指出：“这一点至关紧要，因为很显然，正是由于该地区正统儒士的稀少，才促成了像大刀会和义和拳那样的极其异端邪教仪式的普及”，因

此，作者专设《山东士绅的分布》一节，通过“山东省举人分布情况表(1368～1900年份)”、“大运河沿岸各县的举人数(1400～1900年份)”、“举人(1851～1900)主要变量的多元回归表”等的量化分析，全面、系统地对此加以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西举人数下降惊人，16世纪前半叶，鲁西两个地区的举人占全省的一半多，到19世纪末，却仅占1/5。鲁西士绅力量削弱的一个因素是大运河的衰落，鲁西北士绅力量削弱尤其严重，这导致了缺乏维护本地正统和稳定的力量，结果就是异端活动的盛行。

其实，在此之前，陈振江、程献就已经注意了士绅阶层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动向。在《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12]一书中对此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涉及。书中设“从文献看义和团的阶级结构”一章，通过对义和团文献的研究，在承认“斗争的主力来自社会底层”的前提下，强调了士绅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士绅参加义和团是正常的现象，士绅与下层人民相结合的形式有两种：1、士绅出资立法，延请拳师，召集徒众；2、以劳动人民为主要领导成分的团、坛，大量吸收封建士人参加。封建士人参加义和团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但笼统地认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只会对这场运动起消极和败坏作用的提法，是不够全面和完整的。

19世纪华北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再分化，产生了游民(亦称流民)阶层。该阶层与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陈振江在《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13]、《华北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14]等文章中，首次对华北游民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的成因、流落趋向、社会心态及其在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做了研究。

在游民的成因方面，该文认为第一个原因是自然灾害的结果，灾民的流落趋向有五方面：1、流入北京、天津等通都大邑，或济南、开封等省城；2、南下淮扬或渡江到苏州、常州、镇江等地；3、出关逃荒，近则热河，远则东三省；4、聚集于铁路沿线；5、结伙抢掠，甚至

聚众起事。华北游民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清政府的多次遣散兵勇，这些散兵游勇虽然在数量上比游民要少得多，但能量很大，多为游民的首领。游民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受铁路、轮船所排挤的车夫、船工、店主、苦力等失业者。总之华北游民的形成主要是天灾连年与兵祸殃民的结果。

在游民的社会心态、信仰与结社方面，该文认为他们只求充饥活命，其余无心顾及，所以没有政治上的要求。由于在天灾面前显得那么渺小，所以几乎任何迷信宣传都可以把他们征服，任何点滴苟以活命的恩典都会使他们感激涕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固定的信仰可言，什么都可以信，也什么都不信。这造成了华北社会，特别是黄河流域泛神信仰的宗教迷信现象，并使华北成为各种教门教派其中包括西方宗教各派别的丛集之地。游民多参与宗教组织、秘密宗教、西方教会、武术结社和团练等，尤其是武术结社和团练的骨干。通过团练形式把游民与农民、富户、士绅连接起来，构成晚清时期华北社会所特有的格局。

关于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该文通过对一系列教案的分析和对义和团运动的再研究，指出：在反洋教斗争中，游民和半游民成为骨干，他们往往首先发难、冲锋陷阵、扩大事态，把反教会侵略的正义斗争降低到最低的斗争水平，甚至引入歧途。因此，研究者没有理由把这些非正义的行为当作正义的反教会侵略斗争来颂扬，就连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滥杀无辜和盲目地砸、烧、劫、掠等行为，也大都是游民无产者所为。游民无产者勇于斗争、敢于任事、极其盲目的破坏性等优缺点，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文对义和团运动与反洋教斗争进行了比较，高度评价了前者，指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的政治宣言和打击目标方面，远比斗争宗旨十分模糊的反洋教斗争高明得多。但是，与反洋教斗争相同的是，义和团的基干力量和首领人物都是游民无产者，义和团的兴

起恰逢华北大旱之时，“入团以求安饱者”不少，义和团是以游民、半游民和灾区流民为主的队伍。

那么，同是以游民、半游民为骨干的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后者要远远高于前者呢？该文认为是由于甲午战后民族意识的高扬和民族觉醒的开始的结果。

黎仁凯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15]一书也探讨了19世纪华北的流民问题。在成因方面，也是从灾荒、铁路修筑等方面加以考虑的，但论述更为深刻、全面，并对流民的社会心理有所揭示。关于直隶流民的流向与归宿的研究则多发前人所未发，很多观点很有新意。

（三）社会组织结构与义和团运动

程洪的《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一文，运用社会历史理论和经济学、文化学的方法，对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社会结构的变动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文中以较大篇幅揭示了经济结构的变迁，以此来反映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物质基础，对此，本文已在上面有所综述，在此，集中介绍其关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

在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该文认为当时以宗族主义为纽带的家长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君臣关系是社会结构的主流，活跃于此的秘密会社、秘密宗教是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形式，这些组织的特点一是实行家长制、二是与乡勇有一定的关联、三是常有封建势力渗透其间。总之，上述这些因素是义和团后来被清统治者利用的社会结构上的背景。

最后，该文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动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本原因，……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政治结构又决定了义和团的归宿，几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标志，也导致义和团运动最终成为一场悲剧。”

关于19世纪末的社会基层政权如保甲和团练等问题，早有研究成果，如陈贵宗的《义和拳·民团·义和团》[16]，王明伦的《团练与义和团运动》[17]等。但那时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了说明义和团的源流问题。1986年，朱金甫、程歗呼吁史学界转换视角，

三、自然灾害与义和团运动

灾荒史的研究兴起较早，解放前即已出版了《中国救荒史》(邓拓著)等著作，但后来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较长的时间里，虽然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成果也难免讲到19世纪末北方的水旱灾荒，但往往不加深究，比如达37万字的《义和团运动史》一书，在"第一章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中仅用了300余字的一个自然段，对当时北方的灾荒情况做了十分笼统的交代。总之，那时的国内史学家们不愿意用除了帝国主义侵略以外的其他原因来解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这就更不对这一运动的人的[illegible]

转变，史学家开始借助于此来深究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些问题。199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

“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确有紧密的联系。”林敦奎在《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9]。该文以直隶、山东两省为主，从灾情与民情、入坛灾民动机的分类考察、义和团的天灾观等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自1890年以来，直隶气候变异，持续发生水灾，到1898年，仍然以涝为主，同年，山东省也发生黄河决口，灾情之大，为历史所罕见。但从1899年起，直隶、山东等地又一改以涝为主的态势，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山东尤其严重，而且在旱灾之上又继之以虫灾。”山西、河南也是灾情不断。到1900年，北方的灾情仍在发展中。灾害的旷日持久，造成了民心的哀怨浮动，大批的饥饿流民，络绎于道，人心惶惶。

对待自然灾害，清政府虽然有一套救荒的措施与政策，但由于吏治腐败，每逢灾荒，地方官或匿灾不报，或拒不放赈，或苛扣赈款，故灾民基本上得不到政府接济，只能自寻生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进入高潮，几乎与北方数省自然灾害的日益严重同步进行。饥民在求生无路的绝望时候，把大刀会、义和拳看成是反对压迫和饥饿的依靠力量，纷纷加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规模和声势。当时，灾民参加义和团的斗争大致可分以下三种类型：1、自然灾害发生时加入，灾害解除后散去；2、灾民配合反洋教反压迫斗争；3、加入义和团组织。

林文强调，灾荒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但绝不等于说灾荒是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引发这场运动的主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使在当时，中国各阶层对此已有共识，而且也为外国报刊所承认。但是，义和团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巧妙地把民族危机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做广泛动员，这样来吸引、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的确有紧密的联系。

义和团利用了中国传统的灾荒观，即“天象示警”、“天变之兴，皆由人事之应”等古老的观念，把帝国主义的暴行、清政府的腐败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紧密地结合起来，反复强调久旱不雨的原因是由于洋鬼子在中国的行径引起“玉皇大怒”而降下的灾难，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这种不科学的宣传在充满迷信思想的农民大众身上，起了颇大的作用。总之，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确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牟安世也认为：“1900 年直隶持久而严重的旱灾也是使义和团迅速扩大高涨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也就便于为义和团的反瓜分斗争提供大量的爱国志士”[①]。

应该指出，在 1990 年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问题成为热点之一。陈振江关于北方游民的研究，实际上与此大有关联。还有学者围绕民族矛盾这一大的背景，对灾荒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指出：在考虑天灾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时，应进一步考虑到水灾和旱灾的区别。水灾来得突然，去得迅速，水灾后的土地比较肥沃，灾民往往忙于耕种和恢复家园。旱灾则旷日持久，民心怨怒，容易激起反抗运动。所以应该注意研究不同的灾情和不同地区的具体数据，及各种灾荒造成的不同社会心理状态等。

黎仁凯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也以较大篇幅探讨了 1900 年以前的直隶灾荒问题，认为灾荒是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一。该成果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更为缜密、深刻、全面，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将社会调查与查阅文献资料紧密地结合起来，能给读者深刻的直观印象和丰富的感性知识。这应视为新时期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突破。

笔者认为，关于灾荒史的研究在较大程度上有对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加以补充的意义，据此有助于深入认识义和团前夜的晚

清社会及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但与以往相同的是，任何一位研究者都不认为灾荒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有赖于方法的更新和理论色彩的提升，一些问题也值得深思，如有学者提出：自然灾害怎样影响统治阶级的决策？怎样造成社会秩序的震荡和社会成员的流动？怎样引起民众心态反常？义和团是利用灾荒去反洋人，还是从心理上真正认为灾荒与洋人有关？这反映出该研究还刚刚起步，值得探讨的问题还很多。

义和团运动的烽烟已经逝去了整整100年，在历尽坎坷的百年之后的今天，应该承认，史学界对此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义和团运动，经过不断努力，一些是非已经明确，很多史实得到澄清，研究领域日见拓宽，总体走向日趋深入，这为今后史学家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打下了基础。

但是，也应承认，在新时代，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新起点上，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也须认识到不足，这是保证未来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前提。实际上，相对于这场曾经震动世界的运动而言，史学家所做的揭示和诠释尚还不够。尤其是近些年来，成果数量不多，没有形成热点和焦点，没有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这值得反省和深思！

展望未来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笔者认为，1、首先应该立足于未来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需要。时代在发展，史学家的视角也应不断调整，这样才能使研究成果获得社会欢迎。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步与倒退等一系列问题永远值得人们深思，值得史学家不断诠释，通过义和团运动来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的社会、农民和古老的传统更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角度应该是未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2、笔者认为，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历史，突破点应该在经济

史上。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运动，都离不开经济背景。在义和团运动中，无论是人口流动、民情习俗、宗教信仰、基层组织、活动方式，还是运动的成败，都不是孤立的，而大多都与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深入，有赖于经济史研究的突破。

3、在指导思想上，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学说，同时对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理论学说做批判的吸收，在理论水平上不断丰富，不断提高，方能高屋建瓴，突破创新。

4、现在来看，仅仅从革命史的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是有很大的局限的。这不但不能深入说明义和团运动本身的许多问题，更不能说明义和团与中国社会的复杂与深刻的关系。因此，未来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介入，需要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的热心，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史学家自己的努力，不断引进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5、由于义和团运动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传统，因此，为了深入说明问题，必须坚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调查的手段，而且，还必须借鉴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调查理论与方法。在具体研究上，多用量化分析，避免"想当然"的倾向，从而使研究特色有一个根本的改观，研究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

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义和团运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研究环境，这令我们对研究的总体走势持乐观态度，相信在新时代里，新老学者辛勤耕耘，定能收获到更为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 转引自[美]周锡瑞(J.W.Esherick)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

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6～77 页。

② 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 年第 5 期。

③ 廖一中、李德征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程洪：《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载于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张思：《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破产与义和团运动》，载于《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⑥ 胡绳武、戴鞍钢：《义和团运动期间江南的社会环境》，载于《东岳论丛》1991 年第 1 期。

⑦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 77～78 页。

⑧ 载于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⑨ 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⑩ 路遥、佐佐木卫编：《中国的家·村·神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 年版。

⑪ 杜耀云：《论义和团倡始鲁西的社会环境》，载于《历史教学》1992 年第 11 期。

⑫ 陈振江、程献：《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⑬ 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载于《历史教学》1991 年第 6 期。

⑭ 陈振江：《华北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载于《山东社会科学》1991 年 1 期。

⑮ 黎仁凯编：《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⑯ 陈贵宗：《义和拳·民团·义和团》，载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⑰ 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于《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⑱ 朱金甫、程献：《就新编档案史料谈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几点浅见》，载于《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⑲ 见《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 202 页。

⑳ 林敦奎:《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㉑ 牟安世:《试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高涨的原因》,载于《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

义和团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研究

张 鸣

关于义和团的思想意识和心态研究，是晚近才形成规模和气候的。在建国以前，知识界对义和团运动似乎有讳言其"丑"的心态，影响到史学界，结果导致义和团运动史的整体研究十分薄弱，对团民意识与心态的考察基本上没能提上日程。建国以后，义和团运动从政治上得到了"正名"，在"厚今薄古"思想指导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变成了"热点"，各种研究成果纷纷涌出。但是，由于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有意无意的，人们忽视了对义和团思想意识的探讨，或者是担心被人说成"唯心主义"，或者是认为这种研究无足轻重。严格来讲，直到改革开放，这方面的研究才真正浮出了水面。学术界从讨论义和团的口号，到探讨义和团的思想，再到研究其思想的社会文化根源和探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对于义和团口号的意义的探讨，团民意识的构成和来源，义和团社会心态和拳坛仪式的文化意识内涵等问题上。

在今天，已经很少人还会怀疑义和团思想意识及其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意义了。尽管这种种意识和心态的形成，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但是，这种种意识和心态一旦在团民中流行起来，就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行为，而且会造成相应

的社会、政治甚至经济的后果。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研究，不仅仅意味着义和团整体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义和团行为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义和团行为的研究，恰是义和团运动整体研究的一块不可缺少的基石。

大体上，有关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的研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前萌芽阶段；萌芽阶级；突破阶段和成长阶段。下面，我将分而述之。

一、前萌芽阶段（1949年前）

从义和团运动尘埃落定到新中国建立，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总体上讲，由于知识界受西方的影响，对于义和团运动基本上取否定态度，大多羞谈此事，所以比起太平天国运动来，义和团的研究相对薄弱得多，名家写的近代史（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提到义和团运动，非常简略地提几句团民的信仰和排外思想，一带而过。出现了一些专史，大多都对义和团精神层面不甚重视。如陈功甫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1930），虽论及团民的信仰，但只说它们源于民间流行小说和戏剧就了事了。而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1930），在第三章特意设置了“降神及咒术”和“义和团宣传之方法”两节，论及义和团的信仰、符咒、禁忌和“刀枪不入”的功法，可惜基本上是叙述，缺乏论证。如果把这种研究往更早推一点，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指出过义和团的思想来源是佛道儒和“打脸”、“打把子”的民间戏剧，不过那是杂文，还算不上是严肃的研究。只不过后来的研究在价值评判上却与陈独秀基本上一致，对义和团精神层面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当然，不同的声音也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7）对义和团运动持积极的肯定意见，而且花了不少的篇幅讨论了义和团的口号、志愿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只是依然存在论证不充分，证据不足的问题。

二、萌芽阶段(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为义和团运动"正名"上,强调其反帝爱国的正面意义。义和团的组织、领袖、成员和行为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连义和团的起源,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将之定位在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上,借以证明义和团是农民传统的造反出身,无意中却暗合了清末激烈反对义和团的劳乃宣的说法。尽管如此,义和团的精神层面的诸因素并没有被完全的忽视,人们还是注意到了义和团揭贴、文告、歌谣等宣传品的功用以及反映的精神内涵,特别是讨论了以往为人所忽视的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胡绳、戴逸、刘大年、史思群、陆景琪等人在50和60年代初的著述中,都论及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其中李时岳、毛健予和李俊虎还有专门的文章论述,大家着重指出了这个口号的策略意义和肯定了号召鼓动群众的正面价值。几乎所有人都袭承范文澜的观点,认为"扶清灭洋"口号是从"反清复明"蜕变而来的,从而暗示义和团原有的"反封建"意义,接着又强调了景廷宾起义的"扫清灭洋"口号,从而赋予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当然,也有人指出了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局限性,比如戴逸就认为这个口号是毓贤提出而被义和团接受的,荣孟源早在1952年就有专门的文字讨论义和团的揭贴,并指出过义和团有落后性。张寄谦、杨济安、林华国和黄思骏等人也直接指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是有弱点的,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其弱点越发明显。李时岳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这个口号"欺骗了团民,束缚了群众的行动和思想,便利了清朝统治者的利用和叛卖。"这一时期比较成型的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史,对义和团意识层面的研究也相当忽视,零星的论述,也基本上沿袭了上述

观点。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萌芽，论述得比较粗浅，在价值评判上，有人为的拔高的倾向，某些结论也比较随意，比如把"反清复明"判断为"扶清灭洋"之源，就缺乏明显的根据。显然，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一阶段义和团的研究虽然热闹，但却没能深入下去。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停了下来，义和团在一段时间内竟然当作大批判的"话题"，对于义和团研究而言，实在是一种悲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台湾的戴玄之对义和团的思想和信仰也做了某些研究。顺着当年陈独秀的思路，他认为义和团所崇拜的神灵多来自于民间戏剧，其思想基本上是民俗信仰并杂以儒道佛的内容。并将义和团信仰粗略地分了类，在他看来，忠义观念是义和团的主导思想。虽然失之精糙和武断，不能不说还是有某些可取之处的。

三、突破阶段(1978－1985)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与义和团意识和心态有关的研究，也一改以往若有若无的消沉状态，变得空前活跃起来，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讨论，从70年代末延续到80年代初，这场大讨论涉及面之广，牵扯人之多，在义和团研究历史上是空前的，实际上，关于义和团口号的争论在文革前就有了，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对义和团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倾向，真正的讨论没有能开展起来。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对这个口号的评价上。一些学者开始对以往对义和团评价过度拔高的倾向进行了反思，对认为这个口号是义和团在复杂的环境中出于反帝斗争需要作出的策略调整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批驳，李时岳60年代批评这一口号的文章，在此时得到了相当多的共鸣。陈贵

宗、吴恩鸥、苏寿桐等纷纷著文，认为“扶清灭洋”的口号实际上就是义和团的纲领或者旗帜。其实是体现了义和团封建统治者的幻想，反映了农民小生产的局限性。将这个口号视为“高明的策略”，实际上是义和团运动拔高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层次。一些学者依然倾向于坚持原来的观点，毛健予的文章被再次刊印，陈振江也认为，人们不应把策略一词看得太神圣，虽然农民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无法制定科学的斗争策略，但是，作为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者，他们也会摸索出一些实际策略，而且，这个口号在实际斗争中也曾起到了策略的积极作用。实际上，经过讨论，争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缩小。

对于“扶清灭洋”口号中的“扶清”之义，争论显得比较激烈。否定者认为“扶清”恰恰表明了义和团认识上的糊涂，王致中、郑云山、戚其章等人还指出这个口号背后还蕴藏着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等蒙昧落后的意识。肯定者如陈振江则认为，“扶清”不过是义和团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扶清的“扶”，恰恰说明义和团与清朝统治者是结盟关系，体现了他们的自主性，义和团的大量表现表明他们有时是反清的。廖一中等人则持中间立场，认为“扶清”既有落后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又有爱国主义的一面。在“扶清灭洋”口号“灭洋”的含义上，争论的各方基本上意见一致，都认为既有反帝的意义，又有盲目排外的特征。总的来说，经过这场大讨论，原来那种在义和团研究中存在的无原则拔高的倾向开始消退，人们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以及对义和团运动本身的认识都进一步加深了。

第二次讨论与第一次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80 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立即在史学界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王致中以批驳文革中戚本禹借古讽今的大批判文章为由，引述大量史料将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迷信、蒙昧、笼统排外、被封建顽固派利用打击维新势力、

敌视先进的生产方式等等现象罗列出来，甚至对一向为研究者称道的义和团的纪律也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团民出于对迷信的恐惧而已，对义和团的勇敢精神和首领的表现也评价不高。据王自己说，文章的目的并非要否定这场运动，而是要充分估计封建蒙昧主义给义和团运动带来的落后性，以期正确认识历史。

这篇文章问世后，一些人表示赞同，但是有相当多的人表示了不同意见。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李吉奎、陈振江、李文海等人分别在排外主义、宗教迷信、滥杀教民、反对先进生产力以及义和团的纪律等方面，为义和团进行了辩解，认为义和团的所谓"笼统排外"不应该一概否定，运动的主流毕竟是反帝爱国，义和团破坏的铁路电杆，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象征，所以义和团对西方器物的排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还认为，宗教迷信则更多的是义和团借以发动组织群众的工具，更是无可厚非。孙祚民的文章是直接与王致中争鸣的，对王文在义和团"奉旨造反"、排斥先进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几个提法上提出了质疑。论战双方一方面引证大量的不同史料，同时还大量征引革命领袖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两次论战都没有什么定论，但是至少表明，义和团运动的确是一场面目极其复杂的运动，想简单地用一种模式或者倾向的语言来概括是根本不可能的。论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实事求是地研究义和团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实现义和团的意识和心态研究的真正突破的，是程歗和陈振江，最主要的是程歗。程 1983 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民间宗教和义和团揭贴》一文，实际上真正使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研究进入了正题。文章从分析义和团的揭贴入手，从义和团的劫变思想、多神主义和附体风习、真主信仰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义和团意识心态的方方面面，对其源流、表征、作用和意义都做了相当充分的爬梳。文章指出义和团意识的这三个方面

与民间教门有着相当明显的渊源关系，或者说民间教门的教义是义和团意识的主要来源。文章征引大量的史料，说明义和团的劫变观念离佛教比较远，而与以白莲教为首的民间教义更接近，民间教门的劫变观念，一向是他们用来鼓励人们入教，甚至造反起义反抗统治者的工具，但是随着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这种观念开始被用来反侵略，最明显地是被用在反教会斗争中，所以，义和团引入这种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章还敏锐地看到乡村巫风染被民间教门，以及各种民俗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相互渗透的现象。虽然，文章重点强调了民间教门教义对义和团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指出，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特殊复杂性，"在义和团的文献中，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宗教迷信和世俗迷信都庞杂地交错在一起，表成了一种五光十色、混沌迷离的宣传语言。"程献认为，义和团意识的主要特征是神秘主义，它既包藏和融合了农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成为运动发展的媒介，也暴露了义和团思想的贫乏，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先天的致命伤。文章问世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有关的研究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

不久，由陈振江、程献二人合著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1985)问世了，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义和团思想和意识的著作。应该说，这部花了作者六年心血的力作具有这项研究的里程碑的价值，虽然说，早在1952年，荣孟源就写过关于义和团揭贴的文章，但荣的文章过于简单，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将这个话题提出来了而已。此书的前半部分收录了当时所能收集到义和团文献(即义和团的精神产品)揭贴、告白、书信、碑文、坛谕、乩语、歌谣、咒语、旗书和口号等凡179件，逐条做了注释和分析，在分析中阐明了其意义和价值。这项工作无疑是开山性的，至今，人们在研究义和团的时候，依然要引用他们所做的辑注，此书成为义和团研究中被征引次数最多的著作之一。书的后半部分是对这些文献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程献《民间

宗教和义和团揭贴》一文的理路进行的。在此，他们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对义和团精神产品中反映出来的团民的阶级和社会构成，义和团的性质和行为以及团民的信仰和风习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们告诉我们，义和团的成分是相当庞杂和广泛的，几乎涉及到了北方中国的社会各个阶层，想把义和团限定在某一个教门或者某些阶层是不切实际的，反过来说，义和团的思想意识也是庞杂的。虽然，民间教门的思想依然是义和团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第一，它们不源于一个或者某几个教门，而是民间宗教意识的混杂物，第二，其他的社会意识、民俗信仰甚至乡村社会绅士阶层的意识也对之有某种程度的渗透。为此，书中在分析团民的信仰和风习时，特意加了一节"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的庞杂交错"，以论证团民意识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对团民行为、目标和运动结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前阶段有关义和团口号和封建蒙昧主义讨论的总结，既充分肯定了义和团意识中反帝爱国的前提，也充分地分析了其封建迷信蒙昧以及神秘主义色彩的成因和后果。由于占有的材料特别充分，论证相当透彻，所以，在此这后，类似的论争就基本上止息了。到此，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的研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四、成长阶段(1986－　)

八十年代后期，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人们的视野更加宽阔了，不再就思想论思想，就渊源谈渊源，而是将思索的触角伸到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在一个更广泛而深厚的背景中来讨论义和团的思想意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学界文化热和社会心理学热的背景，为这项研究的深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这个阶段，有关的义和团心态研究才真正浮出水面。

李文海和刘仰东的文章《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篇文章直接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来，文章指出，义和团的迷信思想之所以能够一时风靡大半个中国，主要是存在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心理，如果没有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人们是不会那么倾向于相信义和团的种种"神术"和他们的各种神秘主义的宣传的。反过来，义和团渲染自己的"神术"，营造了神秘主义的恐怖气氛，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意的体现，渲染和夸大洋人的恶行劣迹，甚至将天旱下雨都说成是洋人作怪，实际上是迎合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借以鼓动群众，增强自身的凝聚力。文章还引入了"从众行为"和"社会刻板印象"等社会心理学范畴来解释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种种现象，作者认为，运动期间之所以各种打洋灭教的讹言会如此广泛的流布，是因为人们已经对洋人洋教有了"坏"的社会刻板印象，而且人们又比较倾向于听信与自己有关和一向有威信的人的话，所以，一旦讹言在自己的周围开始流传，人们出于从众心理就会跟着走。应该说，李文海和刘仰东的文章在引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工具，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增强了历史学的解释力。这一时期，类似文章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还有戚立煌的《义和团运动：试析近代华北农村社会文化心理》，文章的贡献是比较明确地点出了华北农村社会和文化的特点，以及这个特点对于义和团采用神秘主义武器的关联。

八十年代末，可以说是出现了义和团意识与心态研究的一个小高潮，涌现了不少专门研究义和团思想的著述，何若钧、乔还田、郭墨兰、史若民等都进入到这一领域里来，其中史若民的观点是比较有特色的。他对几乎众口一词的农民小生产落后、蒙昧和保守排外的"定性"，表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说义和团的仇洋灭教是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致，那么如何解释恰是贫穷的农民才率先入洋教这一现象？在他看来，义和团仇洋灭教，盲目排外思想的

根子，其实在于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史若民的文章的价值还在于，第一次将教民引入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视野，虽然非常粗线条，但很有意义。

作为这一领域研究在八十年代的总结，程獻的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义和团政治意识散议》是份量最重的。这篇文章综合利用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诸方面的知识与理论，试尝将义和团意识与心态研究与近代底层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爬梳了义和团政治意识的方方面面。首先，程文告诉我们，义和团的神教观念是与小农的价值观和宗教思维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农民的务实精神，对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执着追求，阻塞了他们的心理滑向纯粹的宗教崇拜，西方富有彼岸追求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农民那里没有多少市场，“中国民众的宗教意念恰在于祈免痛苦，以人生为欢乐。”而“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上多数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使民间宗教以‘免劫祈福’为核心的神教意识获得了长期存在和滋生发展的社会心理环境。”而甲午战后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环境，更是人们渴望“变动”心理的丰厚土壤，义和团也恰是利用了这一点，借神教以动员群众，维系人心。程文还分析了打教讹言是如何经过社会心理学的所谓“过滤器作用”，在人们中扩散传播以及官绅的大量卷入推波助澜地将近代的笼统排外情绪导向白热化。特别富有见地地描绘了义和团是如何在久远而强固的皇权意识支配下，由于清政府的软化政策，出现了倒向封建顽固派，被他们利用甚至向维新派示威的现象的过程，克服了以往将这个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1990年是义和团运动90周年，这一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义和团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把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这次会议的前后，义和团爱国主义问题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注意力，但是，最引人瞩目的研究还是程獻的《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俗

信仰和义和团意识的关系：一、天运观念与“灭洋”意识；二、全神崇拜与集群意识；三、附体时尚与传播意识；四、拳民禁忌与防御意识。首先，程文归纳了下层民众的“天运观念”的四个层面：1、天是有序运行并有用的自然体；2、天是有意志的能够左右人事的神灵体；3、天人合一天人同构意识；4、天是变动不居的。程猷着重指出，民俗信仰中的天运观念，是义和团“天意灭洋”意识的主要来源，“六十年一逢厄会”的信念，成为人们乐于和勇于在庚子年（1900年恰是鸦片战争后60年）前后打洋灭教的内在动力，而民间教门的“三阳劫变”与“改换天盘”的思想，与民俗信仰的天道变化观念是相通的。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天人感应的信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行动，在他们的意识里，洋人洋教是干犯天怒，惹起人怨的总根源。程文还顺便提出，民俗信仰中善恶分明的果报思想，与民间教门类似的观念是相通的，它们也成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杀洋灭教的极端行为的意识根源。其次，文章论述了由于民众的求索型功利性的信仰心理，导致了他们有神必信，多多益善的全神信仰，这种信仰在义和团运动中则转化为拳民的信仰的三个方面：“先知”信仰，义勇神信仰和真主崇拜。这三种信仰无一不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先知’标志着机运，即对‘洋人灭’、‘灾劫免’、‘殃转福’的祈求祈诉。”义勇之神代表反抗的勇气和团体凝聚的道德法则。“而‘真主’则集中‘劫后太平’的美好理想。”其三，文章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大规模流行的“降神附体”现象进行了考察。程猷发现，虽然降神巫术流行于中国的大江南北，然而，华北地区的巫术相对轻率一些，一般缺少严格的仪式和规模，也不少都有师承，这就为运动期间大规模巫术行为提供了前提。而民族危机的紧迫为大规模巫术的仿行提供了契机，正是出于抵御西方洋枪洋炮先进武器的迫切需要，才使得人们需要自己通过“降神”的过渡，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力与法术。同时团民通过“降神术”，也获得自我的壮大感和神圣感，来抗衡朝廷和官府。

其四，文章对义和团的禁忌做了分析，认为所有的禁忌实际上都是下层社会原来的禁忌民俗的翻版，原来的禁忌民俗在现实斗争中被赋予了防御洋人，维系内部，控制局面等等新的意义。

程歗的这篇文章，比较明晰地突破了以往义和团意识研究过于注重民间教门教义的局限，开始摆脱那种将义和团直线地与以白莲教为代表的民间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里考虑问题。显然，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程歗已经开始了他的晚清乡土意识的研究，这项在全国来讲属于首创性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将两项研究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更有了更大的解释力。事实上，在《义和团政治意识散议》里已经出现了两者结合的苗头，但是在此时，这种结合才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二是在这一时期，程歗已经意识到不能再简单地在义和团源流上总是把民间教门与义和团对应，开始倾向于多源多流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程歗使这项研究又一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此之后，关于这项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著述，首先是杨天宏1993年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义和团神术的来源》，首次比较清晰的爬梳了义和团的"功夫"，分析了团民降神巫术对其心态的影响。而程歗与张鸣合写的文章《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告诉人们，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的几十年的打教风波里，乡里社会出于文化上的隔膜、认知定势的误区，以及这些隔膜和误区在对洋人洋教侵略的敌视心理作用下，人们产生了一种"哈哈镜"似的扭曲的洋教观，这种洋教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同样是两人合作的另一篇文章《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则告诉人们，西方教会的侵入，已经在近代中国的乡土社会撕裂了一道从日常习俗、信仰到家族伦理的裂痕，恰是由于这个裂痕，义和团才会对教会和教民如此仇视。张鸣在《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意识走向》一文里还指

出，义和团拳坛"上法"所降之神，之所以多为民间戏曲中的人物，说明他们的神道崇拜实际不过是对平时耳濡目染的戏剧英雄的某种模仿。张鸣通过研究发现，各个不同的坛口不同的拳民喜欢降的神都有一定的趋向，这些戏剧英雄（神）在原剧中的政治意向和性格特征，往往间接地表达了模仿他们的拳民的政治取向。在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文章里，作者详尽地列举了拳民模仿的各类戏剧英雄，和所要借以表达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意向。而同一作者在《华北农村的巫觋风习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描述了华北农村的巫风与义和团思想行为的联系，以及各种巫术与禁忌在义和团仪式中的位置和作用和为什么拳民会不约而同地大规模仿行巫术。在他看来，降神巫术在当时实际上是农民最熟悉也最便捷地将神人交融的工具。应该说，这两篇文章开辟了一条不仅仅通过义和团揭贴口号等文字材料来研究义和团意识的途径。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某些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著作，如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1995）和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农民意识变迁》（1997）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义和团的意识和心态。前者从非常时态的社会心理角度讨论义和团的社会心态，而后者则将拳民意识放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都丰富了这项研究。

最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本著作《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1998），这本研究义和团和教民意识的心态的专著，是在程歗的指导下，由张鸣和许蕾共同完成的。这部著作从晚清北方的乡村教育和文化传播入手，一步步描绘和分析了拳民与教民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晚清社会政治心态的构成，既描述了拳民仪式和行为模式所表达的社会政治理想，也分析和归纳了教民在近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皈依动机和政治取向。在学术界第一次将拳民和教民这一对"冤家"放在一起论述，在作者看来，也许这样更好地说明问题，增强解释力。很明显，虽然是学术界尚

不多见的研究义和团仪式和心态的著作，但作者并非奢想建立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只是想说点自己想要说的话，尽管这些话并不成熟。

关于义和团意识和心态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起步比较晚的研究领域，在80年代中期才形成气候。但是，这又是一个成长最快的研究领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其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的研究中比之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逊色，足令国外同行不能小觑。这项研究，与义和团的源流研究和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史研究息息相关，彼此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这项研究也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和底层社会史以及政治思想史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这些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支撑，相信这项研究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水平。当然，这个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人的研究里，这项研究还局限在表层，而且，与这项研究相关的田野考察还非常不充分，即使在今天，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从事这项研究的人还嫌太少。不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更年轻的学人投入，研究将进一步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

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

吴士英

义和团研究经历了一个同历史并进的发展脉络。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史学界对于长期以来被冷落和曲解了的农民战争的讨论，义和团史很快、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上升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且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在国际国内引起的剧烈震动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义和团与清王朝及国内其它派别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多年来，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也同整个义和团史的研究一样，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在这个阶段中，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仅学术论文就有20多篇。

第二阶段是1966年"文革"发生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帮"及其走卒的破坏。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义和团的历史命运虽然和中国近

代史上的其他历史事件有极大的不同，没有被"革"掉，但却成了极"左"思潮借以为"文化大革命"升温的历史工具。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弄得令人啼笑皆非。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0年"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在此期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轨道。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成果非常显著。仅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的论文就发表40余篇，有关义和团与国内其他派别关系的论文也发表了近40篇。后期是从1990年到现在。这期间，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的研究逐渐冷了下来，见诸报刊、文集的论文虽有近20篇，但多数是1990年"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的研究成果，真正属于此时期的很少。但这期间研究义和团与其他派别，特别是资产阶级各派别关系的文章却日渐多了起来。这主要是在1990年学术会议的推动下，人们研究的范围更宽了，不少学者已转向与义和团相关、但领域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地方史、宗教史和民众意识等等方面去了。这预示着义和团史及义和团与国内各种社会势力关系的研究，将迈向更为崭新的阶段。

在新中国50多年的历程中，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国内其他派别关系研究成绩斐然，涉及很多方面。下面仅就两个主要方面作一简略述评。

一、关于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

这个议题，涉及民众与国家、地方与中枢，乃至中国与世界等多层领域中的复杂关系，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

(一)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初期的政策

这牵涉到底层民众是顺应还是违背了国家的意向而动员起来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文章和著作,一般都把清政府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说成是"一开始"就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屠杀,也就是自始就采取"剿"的方针。只是由于义和团的力量愈来愈大,清政府剿不胜剿,才不得不"改剿为抚"。金家瑞即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自始就是以"剿"为主,只是后来由于义和团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清政府才"改剿为抚"的。"金冲及、胡绳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主要以镇压为主"①。

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海内外长期以来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认为清政府早就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并对其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进而认为义和团的大发展是"慈禧鼓励"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有的也持"以抚为主"说。廖一中是持这种观点最力者。他不止一次地提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贯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而不是镇压②;义和团既没有反清,当然不必镇压义和团,两者是合作的关系③。他还在其主编的《义和团运动史》中说,义和团之所以在北部中国兴起,原因"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以后,在北京有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对义和团反对洋教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直隶总督裕禄尽管不那么明显,也有相似之处。凡此种种,都给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北方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④。

此外,还有几种观点。如戚其章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就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⑤林敦奎和李文海考察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政策应对的含糊和混乱,认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他们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剿"或"抚"来概括清政府这一

阶段对待义和团的政策，那么，批评者们所说的“既不剿，又不抚”，倒是勉强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情况⑥。刘天路则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是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⑦。应该指出，这三种观点都强调了义和团是在民族危机尖锐化和政治—社会格局复杂化所造成的权力空隙中壮大起来的。

在此期间，清政府到底对义和团采取了怎样的政策？我们认为，既不是一味主“剿”，也不是“以抚为主”，而是时剿时抚，剿抚兼施，而“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

像义和团这样，武装起来的农民不是把革命暴力的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统治者，而是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这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还是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对于清政府来说，怎样对待这一场虽不是主要反对自己，但是又在很多方面冲击封建统治秩序的群众运动，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是“义民”，应该支持、赞助；一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是“乱民”、“叛民”，应该禁止、剿杀。那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态度和方针又如何呢？考诸史实，它是兼采了上述两部分人的意见，采取了时剿时抚，剿抚兼施，而以弹压解散为主。它的这种政策，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 1899 年 12 月 29 日）《军机处寄署山东巡抚袁世凯电旨》中即作了概括。该电旨一方面强调“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一方面又指出“不可一意剿击”，“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⑧。有人认为，清政府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900 年 1 月 11 日），“才把对待义和团的方针确定下来。这个上谕指出今后地方官办理民教矛盾事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⑨。其实，这个上谕一方面承认立会练拳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预设了随时加以镇压的借口，只要义和团超出了封建统治秩序所允许的范围，就要扣上“匪”的罪名予以惩办。这和

前述电旨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样的。

(二)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

有人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复杂性和反动性,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因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各种复杂情况改变而改变的[10]。还有些学者对清政府政策变化的情况分阶段作了研究,只是在阶段的划分上意见不一。例如有的分两段,张春等即认为:"总的说来,可以以义和团入京被招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1]有的分三段。在分三段的人中,对第一、第二阶段的分界线意见又不一致。戚其章认为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并发上谕要将义和团"招募成军"[12]。而路遥、林敦奎、李文海等人则主张应以同年四月底(1900年5月下旬)义和团占据涿州为界[13]。

在学术界,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有变化,这是一致的。但到第二阶段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则有严重分歧。人们通常把清政府在这个阶段的政策称做"抚"的方针,或者叫做"全面招抚"的方针。苏寿桐甚至认为,招抚的结果,义和团运动已被封建统治集团所控制,成为"努力王家、同仇敌忾"的工具[14]。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丁名楠就说:"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如果继续镇压义和团,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15]张寄谦等也认为,义和团虽然被清政府欺骗、利用,但总的说来,义和团还是占据优势而控制了京城[16]。面对这种局势,清政府不敢镇压,就推行了"抚"的方针。路遥则认为,在这个阶段,"很难说谁控制了谁,但与先前相较,显然是由于义和团的大批涌入,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17]。

笔者认为,将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情况分成以下三个阶段比较合适:第一阶段是从义和团运动发生到1900年5月义和

团占据涿州。这个阶段，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是剿抚兼施，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第二阶段是从同年6月初刚毅、赵舒翘察看、“晓谕”义和团返京到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个阶段，清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企图对义和团进行控制利用，并借刀杀人。第三阶段是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一行逃亡以后。这个阶段，清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对义和团进行剿杀。

人们通常把清政府在第二阶段的政策称做“抚”的方针或是称为“全面招抚”的方针，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却很不确切。因为“抚”这个字眼儿，并不能包含这样的事实：在清政府正式褒称义和团为“义民”、屡屡“传旨嘉奖”并赏赐银米、甚至下令各省督抚将其“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同时，清朝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包括某些所谓“支持”义和团的封建官僚在内，却几乎不约而同地在那里设法并实行着借刀杀人的阴谋，即借助帝国主义的武装，消灭义和团的有生力量。

众所周知，清廷在发布所谓“宣战”上谕后的第四、第五天，就先后向各省督抚解释“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八天以后，就向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不过因为看到公开“惩办”的条件尚未成熟，封建统治者便装出一付“爱国”的面孔，驱赶手执刀矛棍棒等原始武器的义和团到前线，去与使用新式武器的侵略军硬拼，以图削弱甚至消灭义和团的力量。而且，当义和团冒着生死与侵略军厮杀时，他们又派军队在团民背后开黑枪。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就有人称清政府此时的政策是“半抚半剿”[18]。这一阶段同其前后两个阶段相比，显然“抚”的成份居多，故可以称之为“剿抚兼施，以抚为主”。

（三）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变化的原因

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虽然在以“剿”为主还是以“抚”

为主或是剿、抚并重的问题上有分歧。但大家都承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不少人对其变化的情况分阶段进行了考察。那么，导致这种政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

传统的说法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政策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清政府无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义和团进入京津，所以才变"剿"为"抚"。胡绳也认为，是西太后害怕在京城动刀兵，因而派刚毅去"劝导"、"晓谕"义和团[19]。吴思鸥认为，西太后"归政"的恐惧症是"构成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发展变化的主因"[20]。廖一中等人也说："由西太后控制的清政府，看到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帝，反对废帝立储，乃至扬言要西太后归政，心中的不满情绪从此滋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西太后及其党羽和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利用义和团抵制一下洋人的愿望从此产生。"[21]林华国的观点是，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义和团，清政府，帝国主义三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所造成的"[22]。路遥不同意上述各种观点，他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义和团力量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感到威胁所致"[23]。

与清政府在义和团高潮阶段政策变化原因相关联的问题是义和团为什么能够大举进入北京？因为这也牵涉到是清中枢的派系斗争吸引了义和团，还是当时极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推出了历代农民战争中这一绝无仅有的场景等问题，探讨之不仅有意义，而且也很有意思，所以对此讨论也很热烈。有的学者认为西太后及其党羽为了废帝立储，要利用人民的反帝意愿，所以准许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有的人进而认为这一举措使进京的义和团众成为"党祸之战"的工具。也有的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研究者强调，这是由于京津附近团民势力迅速发展壮大，清王朝无力或不敢拒绝其进入京师。近年来林华国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认

为义和团四处蜂起，但自发分散，他们的综合作战能力远不如清军，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加大，特别是公使调动国际部队进京的举措，进一步引起了清廷内部的混乱和对外政策的反弹，从而为大批团民在几天之内涌入帝都提供了进机[⑦]。

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何以会对义和团在政策上发生改变，义和团何以能在短期内大举入京，上述种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尤其是林华国和路遥的意见，更为贴近史实。不过他们二人见解的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未分出主次。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学术界犯的一个通病是语言形式斩钉截铁，非此即彼。以人物评价为例，要么是彻头彻尾的恶棍，要么是十全十美的英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纠正，实行了历史评价的两分法。但有人又犯了新的毛病，即从其语言的有效性来看，“既有/又有”、“一方面/另一方面”，貌似全面，实际上却失去了评判的力度和深度。就如理论必须彻底才能征服人一样，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评价，首先应当区分表象和本质，分清主要和次要。否则的话，就没有原则和尺度，同时也就没有批评和选择。林华国在分析义和团能够进京原因时，已注意到主次了，看出了“帝国主义的压力加大”才是基本原因。我们同意这一观点。

应该认为，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使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才是清政府政策所以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毛泽东曾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向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⑧]）当八国侵略联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清政府为着自己的生存，有必要同义和团建立暂时的军事合作，这才是清政府改变政策、也是义和团能在短时间内涌入京师的基本原

因。

(四)以慈禧为首的清中枢为什么戏剧性地对外"宣战"?

在早期研究中,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根据《崇陵传信录》,认为慈禧太后决心"宣战"是被一件伪造的列强勒令她"归政"的假照会给惊昏了。廖一中等认为,"归政失权的恐惧是西太后决定宣战的主要动因"[26]。更多的人则强调这是来自义和团的压力,并促使她想借列强的刀来消灭义和团。1986年在天津举行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上,林华国、孔祥吉提交的论文,都据档案史料反驳"假照会"说。孔祥吉认为,促使慈禧作出最后决定的原因是她接到了裕禄"接仗获胜"的"假捷报"。他说:"慈禧的对外宣战,与裕禄这份虚假的捷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慈禧正是在裕禄的奏报中看到了义和团的'神勇',印证了刚毅等人由涿州回来后所鼓吹的所谓'民心可恃',甚至盲目自信可战胜列强,于是敢于作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决定。"[27]林华国则认为,"宣战"取决于洋兵已大举进攻津沽,并公开宣布要向北京挺进的严峻形势而不是由于某种一时的"误会"。他认为此后一个时段中清廷的政策并非不少论者所说的"假抵抗,真投降",而是"一面抵抗,一面求和",并同义和团形成过短暂而松散的军事合作[28]。

总之,对于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直接导因,也是众说纷纭。学者们的论说虽然存在分歧,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哪种论说更合理、更贴近史实。但是,这类讨论或争论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搞清义和团、清政府及帝国主义这三者的关系,对最终找到合理答案也有不可否认的贡献。

(五)对毓贤等地方官的评论

在探讨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中,常常要涉及到一些地方官员,尤其是山东巡抚毓贤等人。关于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态度问题,

说法颇多，主要有三种。一是镇压说，认为他是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范文澜为此说他是“著名屠户”[29]。林增平则说他“任曹州知府时，以屠杀大刀会、义和拳而声名卓著”[30]。林华国坚持说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态度未改，“不仅没有支持义和拳、大刀会等团体的反洋教斗争，而且还镇压过这种斗争”[31]。另一种是庇护说。最初是德国驻华公使根据其驻山东主教安治泰的报告，照会总理衙门，骂毓贤“庇护贼匪（指义和团）”[32]。后来形成一种舆论。现在一些著名的有关史学著作中也皆有类似的说法。王守中并十分肯定地说毓贤是“明显地在为拳民抢劫教民的行为作辩护”。杜耀云也肯定地说，毓贤实行的是“纵拳仇教”的方针[33]。第三种主要观点是改剿为抚说。如有的论著中说，“毓贤曾任曹州知府，因疯狂屠杀拳民而博得了那拉氏的赏识。……当他无力镇压义和拳的时候，看到义和拳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认为在‘扶清’的前提下可以对义和拳加以利用和控制。因此他对义和拳采取‘缓靖’政策”[34]。再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更明确地说：“毓贤对义和拳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35]。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观点外，戚其章在1999年9月召开的“义和团平原起义10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认为毓贤对义和团始终采取的是“剿抚兼施”。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比较正确。因为第一，毓贤对大刀会、义和拳并不是一味地镇压。否则外国传教士也就不会那样不满和谴责，并要求清政府撤换他了。对此，镇压说不能做出圆满的回答。第二，连毓贤本人也对教会所散布的庇护说嗤之以鼻，反问说：“至谓本部院庇护会匪，何以本部院前办大刀会匪时，立将匪首刘士端、曹德礼正法？昭昭在人耳目，此言可不辩自明。”[36]为此，庇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难以成立。第三，由剿变抚说也是没有根据的。考诸史实可以看到，毓贤从任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到交卸山东巡抚印篆为止。对大刀会也好，对义和拳也好，都是既未单纯地“剿”，也未单

纯地"抚"。始终实行的是"惩首解从"、"弹压解散"。故只有"剿抚兼施"说较符合历史实际。只不过在"剿抚兼施"中,他又坚持弹压解散为主的方针。

与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有关的地方官员还有蒋楷、豫咸、劳乃宣、裕禄、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秉衡、张汝梅、寿山、聂士成、荣禄等等许多人,史学界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见解。由于篇幅关系,不再赘述。

二、义和团和国内其他派别的关系

义和团和国内其他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讨论也很热烈,涉及的主要派别有:

(一)民族资产阶级各派别与义和团的关系

1、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义和团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如何?对此,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他们害怕和敌视义和团运动。金冲及和胡绳武就说: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却提出了一个反动的'剿匪(指义和团)勤王'的口号"。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害怕农民大众甚至超过了害怕帝国主义,选择向帝国主义献媚乞怜的办法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反动的一面",已"堕落为一个反动的政治派别"[37]。罗超等说,"与孙中山等人相反,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则完全否定义和团有积极作用"[38];"康有为等人自外于革命的群众运动,视义和团如冰炭水火,甚至与中外反动派持同一立场","说明康有为本人以及他们的'维新事业'已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反动"[39]。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维新派的营垒中,也有人对义和团运动

同样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义和团给予有条件的同情者……就更为广泛了”,“就连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步骤,启迪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40]。

第三种观点是持“变化”说,认为康、梁改良派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赵春晨就说:“维新派虽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对之采取了敌视和批判的态度,但是当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41]何树宏也指出:“改良派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完全否定义和团。在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因而对中国大举入侵的时候,改良派……痛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罪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义和团运动的一种肯定。”[42]

关于改良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对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阻碍和破坏了义和团运动。如说他们“领导的会党起义在客观上都阻碍和抵制了义和团运动在南方的发展”[43]。有的认为他们的活动对义和团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如赵春晨说:“维新派虽没有直接参加抵抗八国联军的军事活动,但是他们利用舆论工具,广泛揭露和抨击了列强的侵略行为和侵略手法,对国内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失为一种间接的配合,这是应予肯定的。”[44]还有的说,改良派发动的自立军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三者之间,实际上是互不排斥的”,而是“互相推动,互相激荡的”[45],等等。

2、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义和团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对义和团的态度,首先是学术界很感兴趣的问题。人们纷纷著文发表看法。迄今为止,多数论者都对孙中山之态度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只是高低程度不同。江

中孝说:"孙中山虽然对义和团的认识较为正确,但也不乏错误和偏见。"罗超说:"孙中山对义和团既不是笼统赞扬,更不是全盘否定。"[46]骆宝善、桑兵认为:"革命领袖孙中山虽然也批评义和团运动为'狂妄之举',但他却隐然认为,正是义和团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47]周兴梁对孙中山作了较高的评价,说"孙及其战友始终对义和团运动有较正确的认识与评价[48]。"

对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学术界有着多种不同的见解,主要是:(1)认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赵春晨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总结义和团经验教训时,肯定、赞扬的态度较之维新派往往更加明朗、坚决,但这不过是认识深度的差异,并不表明二者对义和团的基本态度有何质的不同"[49]。(2)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数人是否定义和团的。如骆宝善等说:"正象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维新派,……普遍认为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的人甚至持一种速祸论,认为是义和团运动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50]金冲及等人也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义和团起义同样抱着不信任的态度。"[51](3)认为肯定义和团的人是大多数。商鸣臣指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似乎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一样的站在义和团运动的相对面"是错误的,"其实,当时在国内的一些倾向革命的资产阶级人士,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却持有另一种看法和态度",他们"独树一帜,公开承认义和团是正义之师","而且这种观点逐渐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占据了主流地位"[52]。何树宏也说:"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失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先进阶级的代表,在全世界反动舆论对义和团的一片责骂声中,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53](4)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义和团继承人。周兴梁说:"义和团运动曾给孙中山及其战友以巨大的鼓舞和影响,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接过义和团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担,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救国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54]总

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3、义和团与庚子勤王运动

与义和团运动同时发生的庚子勤王运动（其中包括自立军起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运动。它既牵涉到该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又牵涉到资产阶级改良、革命两派之间的关系，甚至还牵涉到义和团与某些官绅之间的关系，所以向为学术界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年间，仅发表有关自立军起义的论文就达40多篇。在探讨庚子勤王运动的论著中，涉及到它与义和团关系的问题也不少。例如：

（1）庚子勤王运动（包括自立军起义）对义和团运动是起了阻碍作用，还是推动作用？对此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认为是起了阻碍作用。在1990年10月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学者指出，康有为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机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义和团一样均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义和团是爱国的，反对义和团的维新派也是爱国的，不能单纯把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划分爱国与否的标准”。但是，康梁维新派所“领导的会党起义在客观上都阻碍和抵制了义和团运动在南方的发展”。[15]

第二种观点，认为庚子勤王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以及庚子惠州起义是彼此互相推动，互相激荡的。骆宝善等所著《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即持这种观点。桑兵认为义和团运动为庚子勤王运动提供了契机。例如他说：“（1900年）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勤王运动的）实施步骤”。“7月初，北方形势危急，汇聚上海的革新人士（遂）酝酿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16]陈旭麓则说义和团运动、维新派的自立军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惠州起义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武装‘灭洋’，武装‘勤王’，武装革命，不同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相近的时间里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操刀一割，显示了改良派在戊戌喋

血后的再起，但未形成牵助全局的波潮”；“孙中山组织的惠州起义……代表了中国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还没有突破历史的临界点”；相比之下，还是义和团运动造成的影响最大，“是影响全国而震动中外者”。[57]

第三种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及其以前的反洋教斗争，不如维新派的活动进步。赵春晨认为，维新派“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已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和落后意识的束缚和影响，由自发的因应抗拒转变到了较自觉的调适和斗争。”因此，维新派批判和否定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应当说并不是维新派的消极面、反动面，恰恰相反，它是表现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维新派在思想意识与政治行动上的进步性。”“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同地方上的‘反洋教’士绅常常势同水火，而变法失败后‘反洋教’、反维新力量抬头及相互联手也就不足为奇了。”[58]似乎“反洋教”的义和团仇视维新派，义和团运动倒是妨害了维新派的勤王等活动。

(2)义和团运动与自立军起义的关系本质上是义和团与康梁改良派的关系呢，还是义和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

传统看法认为，自立军起义是康梁改良派领导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自然就体现了义和团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关系。现在出现两种新的看法。一种新看法是，“在保皇会看来，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在整个勤王运动中，有不少开明官绅参加。[59]因此，庚子勤王运动不仅使义和团要与康梁保皇党发生关系，也要使之与开明官绅发生关系。另一种新看法是，自立军起义主要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革命。[60]因此自立军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也就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义和团的关系。

4、义和团未能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责任在谁

对此问题，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认为责任在义和

团。如有人认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不去联合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去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而去扶持和保护压迫、统治本阶级的清朝统治者，结果不但'灭洋'不成，自己也被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推进血泊之中。"[61]赵春晨进一步说："至于有的论者提出要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利用、改造义和团的想法，作为事后的议论和总结固然可取。但在事发当日，即义和团业已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支配、被后党顽固派所利用的情况下，却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以此去责备康梁等人也就大可不必了。"[62]另一种意见认为责任在民族资产阶级。如王承仁、乔茵就指出："义和团与资产阶级不能联合反帝，责任也不在义和团，而在资产阶级。"[63]

笔者认为，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在义和团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研究上，成绩还是较为显著的。虽然分歧较大，但这是正常现象，而且还能促使人们进一步讨论，以期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限于篇幅，笔者不拟就各种见解加以评说，仅就义和团与民族资产阶级未能联合反帝反封的责任问题，说一点浅见。笔者赞同王承仁等人的观点。因为第一，责备义和团不去主动联合资产阶级，这不符合逻辑。农民是一个与旧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传统阶级，它不能自己解放自己，需要新的阶级来领导。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登上历史舞台，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他们不去设法领导农民，反要义和团广大农民去主动联合资产阶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第二，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反帝。义和团民不顾生死，主动承担了这个重任。资产阶级改良派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资产阶级革命派却要他们放弃反对当时最主要敌人帝国主义而去搞"革命排满"。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民们怎么能与之联合呢？事实说明，不是农民不愿接受资产阶级的联合和领导，实在是资产阶级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

(二)义和团与教民及乡绅等的关系

由于义和团运动是在过去几十年反洋教侵略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50多年来凡是研究义和团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多少不涉及到义和团与教民关系的。此议题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例如:

1、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与教民的关系

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多数学者已取得了共识。但是各地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直接导火线与教民关系如何?这在学术界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少数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并不是因为教民有什么过错,而是他们无辜受害。例如,王守中在分析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原委时就说是由于团民抢劫,山东巡抚毓贤纵容。[64]

第二种观点,认为义和团"打教",是由封建蒙昧主义引起的,教民不过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牺牲品。王致中认为,"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子",对于属于"十毛之人"的教民,"必杀无赦","教民被杀者相当多也是无辜的"[65]。周兴春认为义和团在封建蒙昧思想影响下反洋教,"杀戮、摧残信洋教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66]。

第三种观点,认为少数助纣为虐的教民的胡作非为,确是引发义和团反教斗争的因素之一。郭墨兰认为,"鲁西北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和全国各地义和团一样","直接原因是洋教势力横行,教民依恃教会欺压平民"[67]。

2、义和团对待教民有无政策和纪律

对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百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论著,对此大抵都作了肯定。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经过争鸣,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以下三

种最有代表性。

第一种，认为义和团受封建蒙昧主义支配，又由农民小生产者地位所决定，分散、自私、迷信、落后，行事（包括对待教民）根本就不讲什么政策。王守中说，“各地义和团都是靠迷信巫术组织起来的”，“纪律极差”。他们的“所谓‘灭洋’，实际上是打着‘灭洋’的旗号抢劫中国教民普通百姓”。在他看来，义和团民都是些“似此抢劫放火杀人”者，形同土匪，对教民根本就不讲什么政策[68]。

第二种观点，认为义和团对一般平民讲纪律，有政策，而对教民就不讲什么政策纪律了。李文海是这一派观点的主要代表。[69]

第三种观点，认为义和团对教民还是有政策策略的，尽管显得有些简单粗糙。这方面，陈振江、程歗等的看法最有典型性。他们说：“为了争取群众支持，争取教民出教，以便孤立和打击外国侵略者，义和团曾在斗争中产生过一些简明的政策和策略”。“那种认为主要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义和团只能产生蒙昧主义指导下的蛮干，而不可能有任何策略手段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对教民曾实行“背教不杀”等政策[70]。

笔者认为，在义和团与教民关系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远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因此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另外，讨论中出现的一些理论是非问题，更需要弄清楚。例如，能否因为教民中多数是穷人就可否定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对义和团对待教民的过火行为究竟应该怎么看？等等。这些都是应该探讨清楚的。

有人认为，义和团的“灭洋”，主要就是抢劫中国教民的粮食衣物，焚烧教民房屋，而教民又绝大多数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宜过高[71]。笔者以为，不能因为教民中多数是穷人就否定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实际上，教民中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地主劣绅，一是地痞盗匪，再就是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前两类人和平民的矛盾，本来就是掠夺者和被掠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往往是教案中的主要肇事者，成为侵略势力的工具

和帮凶，和他们斗争完全没有错。至于贫苦教民同平民之间的矛盾，本来属于劳动者内部的纠纷。若在一个主权国家，经过诉讼和调解，本来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可是当时中国已深深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教会享有特权。在这种特权腐蚀和毒害下，平民入教者便被教会引上了损人利己、无是生非的邪路，往往被外国侵略势力所利用。所以评价民教争端时，不能因为教民多为穷人就否定义和团反洋教的正义性。对于义和团在反洋教斗争中的过火行为，也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而不应苛责于前人。

最后，应该指出，地方士绅作为介于官、民之间的阶层，在近代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其特殊地位是引人注目的。所以，义和团与地方士绅（乡绅）的关系，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且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就此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有人提出，就乡绅封建性较强的部分来说，确实是教案的积极参加者、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而就其另一部分思想较开化的人来说，或是由于对西方政教有更多的了解，或者基于对国情的认识和斗争策略的考虑，大多对教案持平情分析甚至反对的态度。这后一部分人对义和团运动起着阻碍的作用⑫。这种见解就较以往有新意。总之，义和团与乡绅关系问题，本是热点。但限于篇幅，只好略而不谈。

50多年来，义和团与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关系研究，成果累累。相信今后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灿烂的成就。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①⑪⑫张春等《义和团运动研究五十年述略》，《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11期。

②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③廖一中《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85 年第 6 期。

④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 页。

⑤⑫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123,118 页。

⑥林敦奎、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302 - 303、305 页。

⑦刘天路《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1 期。

⑧《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6 页。

⑨⑰㉒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6,269、267 页。

⑩李文海《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⑬林敦奎等《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 302 页;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中国近代研究述评选》,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6 页。

⑭苏寿桐《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 年 4 月 22 日。

⑮丁名楠《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80 年 5 月 12 日。

⑯张寄谦、杨济安等《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11 - 129 页。

⑱《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 1 辑,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95 - 96 页。

⑲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㉑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41 页。

㉒林华国《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144 页。

㉔㉘㉛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 - 73,80 - 102,23 页。

㉕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321 页。

㉖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0 页。

㉗孔祥吉《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54－655 页。

㉙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40 页。

㉚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2 页。

㉜㊳《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313－315，361 页。

㉝如萧一山《清代通史》四，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184 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41 页；王守中《毓贤与平原教案》，《北方论丛》1992 年第 6 期；杜耀云《论义和团倡始鲁西的社会环境》，《历史教学》1992 年第 11 期。

㉞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94－95 页。

㉟《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1983 年第三次修订版，第 288 页。

㊲㊶㊷金冲及、胡绳武《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各阶级动向》，《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62－464，464 页。

㊳㊼罗超《建国前国内研究义和团状况评述》，《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05，504 页。

㊴㊵㊺㊼㊽㊿骆宝善等《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85，474、480，489，473，483 页。

㊶㊹㊾㊿56㊷赵春晨《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的态度》，《广东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

㊷53何树宏《革命派、改良派与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思述论》，《纪念义和团 100 周年论文选集》，天津义和团纪念馆 2000 年印制，第 132，126 页。

㊸55邵雍《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91 年第 1 期。

㊻江中孝《论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义和团的态度》，《广东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㊽54周兴梁《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和论述》，《文史哲》1998 年第 1

期。

⑰商鸣臣《义和团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北方论丛》1991 年第 3 期。

⑱桑 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⑲陈旭麓《庚子与辛丑》,《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6 期。

⑳赵春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1 年第 1 期。

㉑桑 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㉒申成玉《试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山东师大学报》1997 年增刊。

㉓见《人民日报》1980 年 4 月 10 日。

㉔王承仁等《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科社版)》1991 年第 3 期。

㉕王守中《毓贤与平原教案》,《北方论丛》1992 年第 6 期。

㉖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㉗周兴春《用现代文明意识去审视评判平原起义及义和团运动》,1999 年平原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㉘郭墨兰《鲁西北义和团运动特点概述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纪念义和团 100 周年论文集》,天津义和团纪念馆 2000 年印制,第 16 页。

㉙王守中《平原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9 年平原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㉚李文海《论义和团的纪律》,《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31 页。

㉛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7、248 页。

㉜吴士英《义和团平原起义 100 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9 年第 6 期。

㉝可见前揭邵雍文及刘泱泱《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求索》1992 年第 2 期。

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黎仁凯

义和团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一个相当复杂而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走向白热化，致使八国联军侵华，蹂躏京师、直隶和俄国侵占东三省。列强各国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间对华权益与领土的争夺也空前激烈。它们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导致了侵华政策的变化，以致"门户开放"政策、"东南互保"等相继出台。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因此，研究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对于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国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虽然尚属相对薄弱的领域之一，但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且有研究述评的论著问世，如夏良才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以及几篇研究概述的文章。[①]但这些均属通史性的述评，仅就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而言，尚未见有专题研究述评文章发表。本文拟就此作一回顾与述评。

一

早在民国年间，已有少数学者关注了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在出版的一批国耻史、列强侵华史、近世外交史及国别外交史中多有涉及，专题论文则不足 10 篇，有的探索了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有的论述了《辛丑条约》签订实施的过程及庚子赔款的由来及其变迁，还有的记述了“东南互保”，[②]但这些文章基本上还停留在史实的叙述上，且大多对义和团持诋毁态度，还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中外关系史研究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纵观研究发展的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阶段由于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斗争的需要，史学界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及其相关历史的研究，除出版了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三联书店 1950 年初版），卿汝楫《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 1953、1956 年版），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初版），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 1963 年版）等有关专著外，还出版了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6 年版）和《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等，发表了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论文 20 余篇。从这些论文的内容看，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及揭示其侵略本性是论述的主线。有的详细地论述了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及勒索赔款的全过程，包括议定

议和大纲12条、确定赔款数额、方式、年限及赔款抵押等，清晰地揭示出一幅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争赃图。[③]有的论述了清政府将庚子赔款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大大增加了捐税剥削，以及农民反赔款的斗争。[④]有的论述了帝国主义如何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及它们之间既矛盾斗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⑤]有的论述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评价这一政策的作用，并指出它是美国为独占中国开辟道路的政策。[⑥]还有些学者论述了"东南互保"，他们在揭露英帝国主义蓄意侵占长江流域阴谋的同时，也指出策划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是封建买办的代表，是外国侵略者忠实的代理人，认为互保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加强镇压革命运动和迫害中国人民而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互保是"一幕丑剧"，是"明目张胆的通敌叛国活动"，实施互保的结果，把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业已酝酿成熟的人民运动扼杀于摇蓝之中，使全国规模的斗争变成华北诸省的局部运动。[⑦]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学者则对"东南互保"作了较多的肯定，认为由于东南互保，才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免于瓜分之祸，并认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应为盛宣怀。[⑧]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围绕《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及"门户开放"等问题作了一些知识性的介绍和阐释，恕不一一列举。

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我国大陆学者而言，大体存有三种情况，一是受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反帝的大前提下，重点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及其虚伪性。对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则大多以帝国主义走狗或买办目之，尚缺乏全方位的具体研究。二是研究有极强的针对性，重点是研究中国与美、英两大国的关系。中俄关系则由于建国初的中苏两国友好相处，研究也重在谈友谊，对义和团时期俄国的侵略扩张史实往往被忽视或掩盖。三是一改建国前诋毁义和团的态度，变为在赞赏农民运动、歌颂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外关系。以上这些，已表

露了"左"倾思想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某些干扰。这一阶段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1—3册(三联书店1957—1962年版),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的有关资料等,《近代史资料》陆续刊登了一批有关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关系的资料。有些学者还翻译了部分有关东南互保英美方面的资料及英国档案馆藏有关义和团资料。这些资料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

1966年夏天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气候骤变。自此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四人帮"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大搞影射史学,极"左"思潮泛滥,摧残了科学文化事业,中外关系的研究也一度处于停滞状态。60年代后半叶至70年代之交,几乎没有发表过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关系的论著。就在这时,中苏两国开始了边界问题谈判。苏联方面的某些学者为其扩张主义服务,居然歪曲中俄边界形成的历史,替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作辩护,随之中苏关系走向恶化。为了说明历史的真相和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我国一些史学工作者不得不投身于中俄关系史研究。他们一面陈述历史事实,一面针对苏联某些学者发表的错误观点进行反驳,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的论著,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1—3卷(人民出版社1976—1981年版),戎疆编《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史地组等编:《血与火的历史——沙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的暴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和《文明传播者还是刽子手》(中华书局 1978 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苏修的谎言与历史真相》(1977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及兰州大学历史系编:《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等。

据笔者统计,这一阶段发表有关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论文近 10 篇,几乎全部与沙俄侵略我国有关。其中以论述沙俄霸占我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和海兰泡的文章最多。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揭露了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批驳了彼方学者歪曲史实的错误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沙俄帝国主义从辛丑和约基础提案的提出到议和大纲的制订,都是主谋者。并认为,沙俄承认李鸿章为和议全权大臣资格,完全是为了利用李鸿章这条走狗,以便与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这块肥肉。[9]有的详细论述了 1900 至 1903 年间沙俄胁迫清盛京将军增祺与俄方阿列克赛耶夫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和进行中俄彼得堡谈判、北京谈判和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以及沙俄掠夺我东北主权的经过,并驳斥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齐赫文斯基等人在中俄关系问题上的奇谈怪论。而且详细论述了 1901 至 1905 年间爱国救亡的拒俄运动。[10]此外,这一阶段还编辑出版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 共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吕浦、张振鹍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以及《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等资料。

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明显出现了中俄关系史一边倒的倾向,且主要集中在军事侵略和边界交涉等问题上,未免显得单一和片面。但学者们搜集了大量资料,用史实阐明了中俄边界的历史真相,揭露了沙俄侵略我国领土的野心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及无辜

百姓的罪行，对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继续深入研究义和团时期中俄关系史中的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开辟了道路。

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科学文化事业才开始重新焕发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研究工作也步入了新的阶段。学者们解放了思想，逐渐排除了"左"的思潮的干扰，转变了观念，实事求是地对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重新审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健康发展，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首先，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不断涌现。主要有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从帝国主义侵华的角度出发，运用翔实的中外文资料，论述了义和团时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英国策动"东南互保"，以及《辛丑条约》签订等问题，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专著。此外，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著《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培华著《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顾明义著《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著《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公素著《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鹍等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赵佳楹著《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芦苇著《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牟安世著《义和团抵

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的有关章节,也各有侧重、不同程度地论述了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

其次,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成绩斐然。自 1979 年以来出版的有关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主要资料有: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该书是根据义和团时期英国驻华公使、领事等文武官员,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报告等议会文件中译出,内容包括列强各国对华采取的对策及各项军事行动,占领天津、北京的情况,以及各地发生的教案等。刘心显、刘海岩译《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 1983 年版),该书内容为义和团时期美国与各国往来的外交文件、函电等,反映了美国与列强各国制订和推行对华政策的经过和签订条约的情况。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 1983 年版)、《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中华书局 1994 年版),收录了这一时期赫德与金登干、赫德与清政府官员及各国使馆往来的文件,也有各地海关洋员与当地官吏相勾结的文件,以及中国与英、美、日、葡、德、意等国商约谈判的有关文献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980 年版),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齐鲁书社 1980 年版),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842——1918》(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北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许崇信等译《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徐绪典等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90 年版),梁为楫、郑则民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等资料的出版,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第三，学者们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据笔者统计，自1979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论文有60多篇，其中有老问题的深化和重新审视，也有新的开拓，现分若干专题略作述评。

1、关于“门户开放”与列强侵华政策

自建国后30年来，“门户开放”政策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为独占中国开辟道路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含着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11]有的还认为，比较而言，美国比其他国家友善得多，没有租借中国港湾，没有占据中国土地，其“门户开放”政策，除了希望得到均等的商业机会外，还要求各国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辛丑议和期间，美国替中国主持了不少公道。[12]围绕“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引出了一场学术论争。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一项侵略性政策，美国打着机会均等的旗号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这一政策本身不可能包含任何有益于中国的成份，它既继承了最富侵略性的最惠国原则，又奠定了美国几十年对华扩张的基石。这一政策曾经起过的某些作用，主要是维护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所连带产生的作用，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是不能成立的。[13]由此争论引发人们去研究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有的说，中美关系的历史，不是一切都好，把这部历史说成是友谊史是片面的；也不是一切都坏，用侵略史来概括一切也不妥当。“门户开放”政策反映了美国统治者在对华事务上的审慎态度，它的提出是出自关心中国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资源宝库的完整这一经济动机，也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乃至当权者个人的态度密切相关。[14]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是由英国最先于19世纪末向列强提议实行的，后英国又多方影响美国重提“门户开放”政策。至于它的客观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

阻挠了某些列强(如日本、沙俄)瓜分中国,但收效甚微。[17]有的认为,这一政策是列强第三次瓜分中国危机时期,美国为谋求取得跟列强相同的在华权益的一种斗争策略和手段,除了意大利外,没有一个国家对此政策表示过无条件的同意。[18]有的就清末中国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作了考察,指出清政府态度复杂,既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又对它的作用将信将疑;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则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19]有的论述"门户开放政策"节节失败的原因是日本等国决心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其在华所得权益所致。[20]还有的论述了传教士与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认为此间美国政策有三个基点:门户开放、有限干涉和相对独立。美国传教士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21]

一些学者还分别论述了其他各国的对华政策,有的指出,英国对联合侵华表现得相当积极,是企图把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但在其总体侵华战略中,重点始终放在长江流域,企图利用北方的战乱吞并东南地区。[22]有的考察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认为日本是想通过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来取得充当列强承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进而确立其在东亚的霸权。其目标是"脱亚入欧",迫订《马关条约》是"脱亚"的标志,参与八国联军、趁火打劫则是"入欧"目标的基本完成。为此,日本采取了积极干涉与审慎步子相结合的策略,由确立"北守南进"转变为"南守北进",迅速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其对华政策具有对强者妥协、对弱小欺凌的双重性和投机性。[23]

俄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对华政策,大多都从军事侵略着眼。一种意见认为,俄国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主角""元凶"或"祸首",是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侵华的主谋和急先锋。[24]另一种意见认为,俄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干涉政策,虽然不放弃承担的军事义务,但决不准备争夺八国联军的领导权、充当主角,以保持行动自由,是采取"二流普通参加者"的政策。但又指出,俄国的实际行动与

官方政策相距甚远，俄军几乎始终站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前哨。[24]还有的认为，八国联军侵华全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法、英、俄、日、德分别在不同阶段扮演主角，不存在始终如一的主谋和元凶。[25]

德国在侵华八国联军中具有特殊地位。有的学者指出，克林德事件发生后，德国想抓住这一事件，为在远东建立霸权奠定基础、抬高德国的国际地位。其陆军元帅瓦德西取得了联军总司令地位，勒索赔款占居第二位。该文还考察了德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26]

2、关于"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的重要事件。上已述及，建国后30多年间，我国大陆学者多视其为"一幕丑剧"，参与互保的东南督抚则被目为"通敌叛国者"。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实事求是地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

首先，"东南互保"的动机问题，一些学者认真考察了帝国主义、清政府与东南督抚三者之间既相互勾结依存、又相互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后，改变了以往一概骂倒的做法，认为互保是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吏对西太后及顽固派盲目排外政策的抵制，是牵制各国的"急救要着。[27]互保有防内、拒外和避战自保三个方面的用意，防内就是防止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发生"骚乱"，并防止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向南方蔓延；拒外就是防止洋人入据长江；避战自保是使东南各省免遭战火，借此保全东南督抚自己的统治地盘和清朝的统治地位。东南督抚策划互保是以保全清室统治而又不得罪帝国主义为前提的，他们基本上是站在清朝一边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28]还有的认为，英国侵略者为维护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企图把刘坤一、张之洞作为推行特殊侵略方针的政治工具，以达到镇压中国人民、防止其他列强插手，实现武力占领长江、确立在长江的势力范围的侵略目标。[29]

上述学者认为，互保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帝国主义把互保看成是保全在华生命财产、暂渡难关的应急措施；东南督抚也把它视为"委曲求全"的权宜之计，是企图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的"以夷制夷"之策。互保还反映了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保护本国经济的愿望和要求社会安定的心理。因而互保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其次，东南互保约款的拟订和实施问题。一些学者指出，互保约款与历次不平等条约不同，它是中国方面拟就的。其本意是以"严拿匪徒"和切实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为条件，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不派军舰入据长江、占领吴淞炮台及上海制造局。约文中规定各国不增派兵轮入长江、兵轮水手不登岸；各国兵轮不可在吴淞、长江各炮台及上海制造局附近驻泊、操练；外国传教士不到偏僻未设防地区游历等，对帝国主义扩大在长江流域的侵略都有约束作用。互保约款不仅没有给帝国主义列强提供新的权益，反而对原有的权益也稍加限制。因此，当列强各国渡过了难关、时过境迁后，便先后拒绝正式签约。因为中外双方都已按约款作出了承诺，保持了长江流域相对和缓的局面，互保的目的实际上已基本达到。[28]有的还指出，互保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刘、张二总督同英国谈判合作保卫长江，以收到"英保商务、我保疆土"的效果。第二阶段是盛宣怀、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领事订立约款。列强对上海的占领和日本侵略厦门则是互保局面的进一步发展。[29]

再次，关于"东南互保"的作用与评价，尚存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仍从基本否定的立场出发，认为互保是帝国主义与东南督抚双方达成默契，是一桩半明半暗的勾当，它维持了半殖民地大局，保护了官僚买办阶级一小撮人的利益，而主要受益者乃是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帝国主义。[30]"东南互保"为地方军阀官僚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搞封建割据开了先例。他们在东南独树一帜，与

清政府的公开宣战唱反调，那原是封建官僚搞两面派活动的拿手好戏。[32]"东南互保"所起的作用是限制和妨碍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削弱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便利了帝国主义对北方义和团的进攻，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3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为互保所作的努力不应全盘否定。他们对外主和，不仅不是卖国，而是审时度势的表现。他们在此间也明显存在着对列强的抵制和抗争，如积极筹备战守、阻止洋人募兵护路和派轮船驶入襄河等，均体现了对帝国主义的抵制与抗争。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层面去分析，互保呈现出正与反、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历史作用，即政治上限制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扩展，抑制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军事上动摇了北方军民反抗八国联军战争的军心，起了调节、分化瓦解战争和避免再开南方战场的作用；经济上在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同时，也保存了我国东南微薄的工业基础，对维持南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思想上顺应了东南地区人民反战和要求社会安定的心理。[34]这种主张一分为二评价"东南互保"历史作用的做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

3、议订《辛丑条约》及有关问题

议订《辛丑条约》是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面谈到的有关著作大多均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但专题论文却不多见。有的学者指出，中外议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瓜分危机已经缓解。帝国主义列强自甲午战争以来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实践已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中国为主权国家，作为谈判的一方来对待。[35]有的则认为，谈判只是列强之间进行磋商，作为谈判一方的中国代表却被丢在一方不予理睬。所谓议和谈判，毋宁说是列强之间的分赃会议。[36]在参与谈判的列强之间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认为，出现了大致以英、日、美为一方和俄、法为另一方的相互对立的形势。[37]有的则认为，虽

然法国较多地站在沙俄一边，英、日正酝酿着缔结同盟，但由于各国在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因此，在谈判中没有形成明显的集团。[38]学者们对议和谈判的进程和议和重点的论述大同小异，大多围绕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提出议和大纲12条，以及两个重点，即所谓"惩凶"和赔款问题进行论述。在"惩凶"问题上，有的认为，"惩凶"本身就违犯万国公法。因为这场侵略、非正义的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西摩尔联军和炮击大沽炮台最先发动的，要惩凶，就得惩办帝国主义列强自己。现在却把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抵抗派中央和地方官员当作"凶"来加以惩办，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39]在赔款问题上，学者们指出，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武器。但帝国主义列强在勒索赔款数额、付款方法及财源等问题上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大体英、美、日为保持和扩大它们的对华贸易，主张根据中国实际偿付能力而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因赔款造成各国共管中国财政的局面。而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法、德等国，则希望从中国勒索更多的赔款，而且最好能以现金一次付清。[40]中国海关与庚款的关系也为论者所关注，有的认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税务司贺璧理恃仗其特殊地位，于幕后操纵谈判、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中国赔款负担，避免列强共管中国财政；另一方面为索赔

国退还部分庚款兴学问题，有的指出，以往认为美国政府主动退还部分庚款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清驻美大使梁诚才是首倡和争取退款兴学的第一人。1904 年 12 月梁诚在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会谈庚款是还"金"还是还"银"时，正式提出核退庚款的要求。后经反复商讨交涉，于 1907 年和 1921 年两次退款计为 4146 余万美元，并论述了其他各国对庚款余额的退还及庚款的最终取消等问题。[42]此外，还有一些论者也撰文论述了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及在华兴学等问题。[43]

关于《辛丑条约》对中国的影响和危害问题，论者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该约及其附件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它不仅大大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军事监督和政治控制，也空前扩大了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华民族的灾难愈益深重。有的认为，《辛丑条约》后的几个商约，也不能仅从经济上的通商、航行意义上去理解，实际上带有严重的政治含义。如何看待《辛丑条约》后的清政府，史学界一直流行的观点，说《辛丑条约》是清政府彻底投靠帝国主义的卖身契。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彻底投降"（或者"完全投降"、"全面投降"）了帝国主义。有些论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并没有彻底投降帝国主义。他们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有争执、甚至有斗争，并不是每个帝国主义的每个要求他们都接受。他们有反驳、有抵制，有时顶撞得相当厉害。在东三省问题上，俄国一再诱迫清政府签约，但未能如愿以偿就是明证。[44]有的探讨了《辛丑条约》与外国驻华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礼仪变迁的关系，指出外使觐见问题被作为庚子战后善后谈判的重要内容并写进条约，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列强各国企图以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伦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改造中国，也是中国逐步开放、进入国际社会并在外交方面渐次实现近代化的标志之一。[45]还有的论述了辛丑议和中国际法问题，认为辛丑议和的全过

程和《议和大纲》、《辛丑和约》的约文，可以看出列强违背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之处甚多。列强发动大规模持久的对华战争，却不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又要按战争法迫使中国议和，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都是违犯国际法规定的。[46]

总之，上述围绕辛丑议和及庚子赔款有关问题所作的探讨，减少了建国初以来重情感、重声讨的色彩，更注重实事求是，拓宽了研究视野，增强了量化分析，得出了更多令人信服的结论。

4、关于交收东三省和接收天津都统衙门的交涉

俄国既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也参加了辛丑和议谈判。有关中俄交收东三省的交涉理应在辛丑和议中一并解决。但俄国蓄意霸占我东三省，坚持同清政府单独交涉。因此，在辛丑和约谈判的同时，还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交收东三省谈判。对此，有关专著多有论及，但尚乏专题论文。论者的研究一般是通过阐述历史事实来揭露沙俄企图独霸我东三省的阴谋。如论述俄方胁迫清盛京将军增祺擅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指出俄国是想抢在辛丑和约签订以前，从清政府手中得到一份出卖主权的文件，使其掠夺东三省的土地成为合法化。还论述了沙俄推行的"黄俄罗斯计划"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和列强各国的牵制，终使其吞并东三省的阴谋未能得逞，保持了我领土主权的完整。论者还对我驻俄公使、全权大臣杨儒在谈判中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给了肯定的评价，称其不愧为清末的一位爱国外交家。[47]

但是，一些论著在论述清朝高级官员对俄国侵占东三省的不同态度时，总是将他们看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认为不管是李鸿章还是刘坤一、张之洞，都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他们在各自的外国靠山影响下，彼此竟发展到相互攻击的地步，或者说李、刘、张之间各为其帝国主义主子效劳的争吵，后来发展为相互攻讦揭发。[48]这种将他们都看成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论是非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似欠公允。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当时张之洞等人

全力支持杨儒抗争，又频频向清政府建策，其主观愿望是好的。虽然他们提出的种种计策不外是"以夷制夷"，也往往是一厢情愿，但他们尽力坚持不失领土主权，其所作所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众的爱国情操相呼应，具有一定积极意义。[49]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不久，成立了由俄、英、日三国派员参加的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开始对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在此后两年余的时间内，天津都统衙门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屠杀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军事防御设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为八国联军扩大侵华服务等方面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在这方面，除了一些专著不同程度论及外，也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对天津都统衙门的成立、原先沙俄策划并控制天津都统衙门，到后来让位于瓦德西的变迁及其所作所为进行了论述，进一步揭露了八国联军的侵华罪行。[50]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各国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接收天津都统衙门的交涉。有的指出，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接收天津的交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1年12月袁世凯两次致函各国公使，要求归还天津开始至1902年2月，清政府除了与各国接触外，还没有正式向各国公使提出照会，也没有实行实质性的谈判。第二阶段从1902年2月下旬清外务部正式提出照会至6月，由于各国联军司令官提出了交还天津的通谍，仍然不肯放弃武力征服中国的手段，态度强硬，使双方交涉陷于僵局。第三阶段从1902年6月至8月，由于各国修改了归还条件和清政府妥协让步，最终达成了归还天津的协议。[51]

四

综观建国以来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如上所述，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资料的整理出版，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学者们解放了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探讨了一些新问题，使研究出现了满园春色的景象。但是，认真回顾和思索建国50年来的研究历程，还是有一些未尽人意之处，如研究还存有一些薄弱环节，不仅老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且缺乏理论的概括，新的开拓也稍不足，研究方法难免有些简单化，资料的搜集整理也还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等。今后如何增加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依然任重道远。

首先，建国以来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论题上，而且受国内国际大气候及中外关系现状的影响相当明显。如建国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受此影响，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探讨了美国在义和团时期的"门户开放"政策，揭露其虚伪的侵略罪行。这当然是必要的。相反，由于当时中苏友好的缘故，论者对沙俄在义和团时期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便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或忽略。直到"文革"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后，又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沙俄侵华史研究成为热点，以致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其他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唯中俄关系研究一花独放的局面。研究重点是揭露沙俄对我东北地区的侵略罪行及其炮制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并对一些苏联学者的有关错误观点进行驳斥。本来研究现实生活中大家关注热点问题，从中提供历史的借鉴无可厚非，但研究出现了某些情绪化、简单化倾向，众口一词、无所争议，学术过多地被政治所干扰。

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排除了"左"的干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开拓。但截至目前出版的论著来看，无论是对外交涉或是签订条约，基本上都从侵略与反侵略的视角出发，因而易于出现雷同和缺乏新意。诚如有的学者评论九十年代初以前几年出版的几部著作时说："有的书名不同而内容雷同，甚至从章节到体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的把帝国主义侵华史和简化的中

国近代史拼凑在一起，算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这些著作确有名不符实的嫌疑，并不能承担起书名标明的不同责职，因此也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除了重复以外，得不到更多的知识。"[58]言词虽有些尖刻，却说到了要害之处。其实，中外关系包括的范围颇广，政治上的遣使交涉、出访、签约、觐见；经济上的外贸、海关、借外债；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留学、传教等，均可纳入中外关系的视野。义和团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尖锐，侵略与反侵略是主线，但并不排除中外民间的友好交流、相互同情和支持。有的学者就撰文论述了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和德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59]因此，只要我们冲开旧的模式，勇于开拓，努力发掘史料，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去论述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中外关系，定能写出新意迭出、各有特色的论著。

其次，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相当复杂，运动初期有各地五花八门教案的交涉；运动高潮时期，既有清政府的对外宣战，又有地方督抚对外主和、与帝国主义策划"东南互保"。八国联军进京后中外议和时，既有帝国主义列强各怀鬼胎的对华争夺，又有清政府内部不同派系间的相互攻讦。因此，不同阶段、不同派系对不同的国家在中外关系上的表现各不相同，亟需具体分析和做更多的个案研究。可惜一些论者仍习惯于简单化，只要是帝国主义，便一概骂倒；对一些主和派的封疆大吏，则统统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对《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清政府，大多也视它为"洋人的朝廷"，是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这种把复杂关系简单化、程式化的做法，使得研究少有观点歧异，难于展开学术论争。其实，帝国主义对清政府依然施展"打"和"拉"的政策，只是各国手段各异、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清政府和地方督抚对帝国主义列强有警惕、有无奈，有投降妥协，也有抗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复杂的中外关系，定性分析故然重要，但有些定量分析则更能说明问题。上引迮汝成关于庚子赔款偿还等方面所作的定量分析就是一例，他把这方面

的研究推进了一步。[58]

再次，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亟待开拓。上已述及，中外关系涉及面颇广，查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索引，就会发现还有许多空白。如在条约方面，就《辛丑条约》而言，除了一些中外关系史、外交史、侵华史等通史性著作有大同小异一般性的论述外，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发表过有份量的专题论文，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而对《辛丑条约》的19个附件，有关著作或一带而过、或干脆不提；紧跟《辛丑条约》后的几个商约及章程，虽然有的论者已经提出应予关注，但至今似乎还未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至于条约涉及的十几个国家，除了英、美、俄、日、德等几个大国外，其他一些国家也缺乏专题研究。在有关人物研究方面，庚子年间在华传教士与外籍人员的群体与个案研究有待加强。他们的言行、际遇都与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至目前已发表的论文中，专论的只有赫德、丁韪良等数人。[59]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尚不如外国学者做得多，我们的翻译出版工作也还跟不上。如果能就庚子年间外籍人员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及其活动、心态等方面作一群体或个案研究，也将有助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深入。

总之，建国以来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不足之处也无需忌讳。在这纪念义和团运动百周年之际，我衷心期待中外学者能携手合作撰写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专著。囿于分工的关系，本文仅对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加以评述，基本上没有谈及我国台、港、澳及外国学者的研究，敬请鉴谅。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 靳良永：《建国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述评》宫明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刘蜀永：《建国后近代

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述》,《史学集刊》1989 年第 3 期;王建朗、郦永庆:《50 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② 参见《向导周报》第 81 期,《东方杂志》12 卷 17 期,《中和》3 卷 12 期,《新中华》3 卷 第 8、9 期,《人文》2 卷 7 期。

③ 丁名楠:《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大公报》1951 年 9 月 7 日;《庚子赔款——一幅帝国主义强盗争赃图》,《进步日报》1951 年 11 月 25 日。

④ 刘克祥:《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剥削》,《历史教学》1962 年第 6 期。

⑤ 宋异:《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争夺》,《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第 11 期;童恩正《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矛盾与合作》,《四川大学学报》1962 年第 2 期。

⑥ 王铁崖、周仁:《"门户开放"的侵略政策》,《进步日报》1950 年 12 月 19 日;余绳武:《"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帝侵华史中的作用》,《历史教学》1951 年第 5 期。

⑦ 丁名楠:《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所谓"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6 年版);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 7 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王明中:《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国与"东南互保"》,《南京大学学报》1964 年第 3、4 期。

⑧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第 6 章,台湾文海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初版、五十六年再版。

⑨ 李嘉谷:《辛丑条约与沙俄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4 期。

⑩ 丁名楠:《老沙皇独占东北野心的大暴露——1900 至 1903 年沙俄胁迫清政府订约出卖东北主权的经过》;杨天石、王学庄:《1901 年至 1905 年的拒俄运动》,均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4 期。

⑪ 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 年第 3 期。

⑫ 张忠栋:《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反应》,《美国研究》第 3 卷 3、4 期合刊。

⑬ 丁名楠、张振鹗:《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近代史研究》1979 年 2 期;丁名楠:《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若干历史考察》,《档案与历史》1986 年第 1 期;向荣:《论门户开放政策》,《世界

历史》1980年第5期。

⑬ 吴嘉静：《"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复旦学报》1980年第5期；项立岭：《怎样向前推进？——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⑭ 邹明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源研究》，《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

㉕ 丁名楠:《德国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㉖ 谢俊美:《东南互保再探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㉗ 黎仁凯:《张之洞东南互保新探》,《江汉论坛》1988 年第 7 期。

㉘ 安静波、孙孝恩:《"东南互保"再析》,《北方论丛》1990 年第 6 期;刘天路:《"东南互保"述论》,《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㉙ 黎仁凯:前引文;安静波、孙孝恩:前引文。

㉚ 刘天路:前引文。

㉛ 金家瑞:《论"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㉜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8——359 页。

㉝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1 页。

㉞ 谢俊美:前引文;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2——153 页。

㉟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2 页。

㊱ 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0 页。

㊲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2 卷,第 144 页。

㊳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2 页。

㊴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 447 页。

㊵ 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下册,第 162 页;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第 410——411 页。

㊶ 薛鹏志:《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谈判》,《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㊷ 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徐建平:《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华东

师大学报》1998 年第 2 期。

㊸ 王海军:《试论美国庚子赔款的退还》,《山东师大学报》1998 年第 5 期;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天津师大学报》1997 年第 6 期。

㊹ 张振鹍:《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

㊺ 李岫:《辛丑条约与晚清外使觐见问题》,《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㊻ 张海鹏:《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

㊼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 466 页;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义和团运动史》第 444 页。

㊽ 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下册,第 177——178 页;王绍坊:《中国外交史 1840——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9 页。

㊾ 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第 168 页。

㊿ 李嘉谷:《沙俄与天津都统衙门》,《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廖菲:《八国联军设立的天津都统衙门》《历史教学》1984 年第 6 期。马振举:《天津都统衙门再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9 年第 1 期。

(51) 张利民:《接收天津都统衙门的中外交涉》,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52) 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1 页。

(53) 王晓秋:《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青柳猛〈义和团赞论〉及其他》,《北方论丛》1982 年第 4 期。丁名楠:《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54) 宓汝成:前引文。

(55) 叶凤美:《赫德与〈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见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王维俭:《庚子年间的丁韪良》见中美关系史丛书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 辑,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研究

苏位智　刘天路

军事侵略(或称武装侵略)往往伴随着战争,战争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①],是国家政治关系的极端形式。因此,从广义上可以把军事侵略视为国家关系的组成部分。同理,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亦应是同期中外关系的内容。但由于前者对后者所占份量甚大且其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故设立此述评专题。

自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世界列强纷纷效尤,伴随经济掠夺的军事侵略接踵而至。因此,"救亡"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奋斗任务之一,加强对列强军事侵略的宣传和研究成为舆论界、学术界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据统计,自1900年至1949年间,各种版本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耻史、外患史、外祸史等多达近百部,其中90%以上出版于20、30和40年代。经研究,上述著作的60%以上涉及义和团时期列强对华军事侵略,集中地反映出中华民族各界派的同仇敌忾和群体力量。特别是40年代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等著作均设专门章节论及八国联军侵华罪行,开创中国学者以唯物史观研究此专题之先声。应当指出,在这50年

间，专门研究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的科学论文非常罕见，几乎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50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此专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尚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本文拟从阶段概述、重点问题和开拓前瞻三方面进行简略的回顾思考，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建国之后的50年间，中国大陆对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阶段面临建国之初的朝鲜战争及以后的东西方"冷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孤立、敌视中国的国际背景。史学工作者将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列为重点，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自然融入其中。

此阶段最早的成就为史料建设。建国之后，近代史渐为显学。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组织全国著名历史专家在这一时期内编辑出版了10种中国近代史资料，其中最先出版的是排序为第9种的《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这部资料集的提前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更因为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作为本书主编的翦伯赞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这部书共4册，其中第3册载有《瓦德西拳乱笔记》、《八国联军志》、《庚子中外战记》、《晋东防军纪略》等反映列强军事侵略的史料，但这些史料并非首次面世，均在一二十年代公开出版过[②]。该书第4册所载"各帝国主义的司令官事略"和"义和团书目题解"虽然不很完整，但对此专题的研究颇有帮助。

这一阶段，出版的有关本专题的资料还有陶菊隐辑《美国侵华史料》（中华书局 1951 年）、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 1957 年）、朱士嘉辑《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中华书局 1959 年）及孙瑞芹译《德国外文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等。

这一阶段，论及此专题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 1951 年）和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③]。刘书因受书名的局限，只写了美国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情况，无法涉及其他列强。金书是建国后系统论述义和团运动的第一部学术著作[④]，也是第一部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列强军事侵略的著作。由于时代和材料的局限，该书虽然在观点、史实上均存有不尽善之处，但其毕竟对义和团运动及列强军事侵略的研究都作了精心探索和设计，对后人具有相当启示和影响。

这一阶段有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外关系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然而涉及列强军事侵略的依然不多，只有丁名楠、张振鹍的《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⑤]、朱活、史森钦的《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⑥]和王志光的《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对中国的侵略简述》[⑦]三篇文章涉及此专题，且都是讲美帝国主义一个国家。此阶段揭露联军武力侵略及暴行的文章，只有丁则良《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⑧]一篇。严格来讲，这篇文章主要是提供了一些十分罕见的资料。

第二阶段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阶段极“左”思潮泛滥，国内学术研究陷于中断、停滞状态。由于面临中苏边界冲突及谈判的国际背景，史学工作者不得不承担起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形成“文革”中的唯一学术波澜。义和团时期沙俄对华的军事侵略是其中的最重要内容。

这一阶段本专题的最主要成就是出现了以军事侵略为主要内

容的专书，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地组参编的《血与火的历史——沙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的罪行》（中华书局 1977 年）和《文明传播者 还是刽子手?? 沙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累累罪行》（中华书局 1978 年）均属此类。

这一阶段出版的国内沙俄侵华史有 10 余种，另外还出版了［美］马洛泽莫夫的《俄国的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 1977 年）、［英］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等译著。这些著作均涉及义和团时期沙俄军事侵华的内容，无论从资料、观点还是研究方法，对国内的研究都具有借鉴作用。

这一阶段有关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论文不过 10 篇，时间都集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内容几乎全部与沙俄侵华有关，其中涉及沙俄出兵东北与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最多。第三阶段从 1979 年重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 1999 年底。这一阶段通过拨乱反正，创造出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随着中外关系史和义和团运动史正态研究的不断发展，本专题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有关本专题的专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越以往。全书重点论述列强军事侵略的专著代表作是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合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该书利用大量中外文原始资料对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全过程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同类著作还有马东玉、邸富生的《八国联军侵华》（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李炳清的《庚子蒙难》（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等。用书中部分章节集中论述这一专题的代表作有丁名楠、张振鹍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和牟安世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三部著作均有高水平论述，但其角度各有特点。丁书是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纵向视角，使

用两节篇幅对联军侵占津京和沙俄占领东北进行简洁精致概述。廖书是从义和团运动全史的方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军民双方的军事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构划。牟书则将中外的军事战争牢牢地附着于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这条主线上。同类的专著还有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张玉田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雷远高主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鲍中行编著的《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1900 年)以及这一阶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诸多教材和著作。还有一些专著单就某一列强的军事侵略进行深入研究,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黑龙江历史研究所编写的《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王守中编著的《德国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佟冬主编的《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年)、鲁瑜编著的《永不满足的扩张野心:沙俄侵华纪实》(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年)等。这一阶段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学者有关此专题的著作,如[苏]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苏]阿瓦林的《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俄]多勃隆拉沃夫的《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齐鲁出社 1982 年)、[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的《俄中战争——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俄]扬契维茨基的《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俄]基尔希纳的《攻克瑷珲》(商务印书馆 1984 年)、[奥]卡明斯基、翁特里德合著的《奥中友谊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该书第 8 章记述奥匈帝国海军参与八国联军对华侵略的情况,并反映了正直欧洲人的正义感)、[法]贝野罗蒂的《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等。上述著(译)作从不同视角客观真实地揭示列强的这段血腥侵略历

史，观点也都公正合理。

其次，有关本专题的论文也是空前繁荣。据统计，这一阶段光是列强对华政策和武装侵略（不包括东南互保和辛丑条约）的论文就有120多篇[①]。其内容涉及列强军事侵略的诸多方面，既有老问题的继续深化和重新审视，又有新领域的史料发掘和理论探索。焦点问题及观点并在本文第二部分试作述评。

第三，这一阶段的资料出版再显高潮。零散的不算，仅结集付梓者达10多部，且多半系中外文档案资料。有的与本专题全部相关，如《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编，董果良译，齐鲁书社1980年），该书是沙俄总参谋部军事档案馆刊行的内部资料，记述俄国在华实行扩张的军事行动。《八国联军在天津》（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许逸凡等译，齐鲁书社1980年），该书节译7种外文书，是研究联军在津军事侵略的重要资料。有的与本专题部分相关，如《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年）、《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刘心显、刘海岩译，齐鲁书社1983年）等，这两部书以中外关系的内容为主，部分涉及军事行动。《义和团档案资料续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9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徐绪典主编，齐鲁书社1990年）等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此专题。

（二）

建国50年来，中国大陆对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的研究，主要就列强军事侵华政策的确立与演变、列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矛盾与合作、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列强对华军事侵略的活动及暴行、联军所设军事殖民机构，列强抢占天津租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关于列强军事侵华政策的确立与演变

列强军事侵华政策是其对华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地位，各国对华政策及由此所制约的军事侵略政策互不相同，各具特点。

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但不是为主的国家。就其军事活动来讲，是排在法、英、俄、日、德之后的。建国50年来，之所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成果占居首位，有两点不容置疑的原因：一是受50年代中美敌对关系的影响；二是美国与众不同的"门户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前，"门户开放"被普遍认为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独吞中国的侵略政策。1979年汪熙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但"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作用"[10]。汪文引出一场学术争论。对于这场争论的不同观点，当时已有专文评述[11]，恕不赘言。对此不同观点的争论，至今仍有延续。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的军事策略和行动，是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派生和实践。1900年6月16日，美军司令官没在给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上签字[12]；攻克北京后，美军较早撤离北京[13]；瓦德西来华后，美军没有参加瓦氏指挥的四出扩大侵略的活动[14]……这一切都是为了本国的既定目标，对中国人民决无可褒之处。

俄国基于自身的侵华企图，义和团时期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单独派遣17万之众的兵力侵占东北全境。这不仅是义和团时期最严重的军事侵略，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侵略军入境数量最多的一次。因此，在面临"新沙皇"军事威胁形势下来揭露"老沙皇"的军事侵略是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19世纪末俄国政府的既定国策是吞并中国的东北，进而称霸远东。"[15]有的学者将俄国的战略企图明确为四个方面：第一，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尽快镇压

下去;第二,乘机吞并中国一大片土地;第三,进一步控制清政府,以便寻机独吞中国;第四,夺取远东霸权,进而称霸世界[16]。但在具体如何实现其既定国策的问题上,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意见:以财政大臣维持为代表的意见是采取"和平的经济渗入"的政策;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为代表的意见是实行强硬的武力侵略政策[17]。有的学者认为,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初期"实行了一种所谓的'二流政策'——一不要领导权;二不充当干涉主角。"[18]以上说法都有道理,只是角度和具体时期不同罢了。应当说,沙俄在义和团运动全过程的对华军事策略有所变化,不过这些变化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实现其既定国策服务的。

英国是最先用武力侵略中国大陆并一直保持在华绝对优势经济地位的国家。在19世纪最后几年,随着其他列强对中国"瓜分"企图的增强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英国的优势地位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并扩大在华优势经济地位便成为英国当时对华政策的最重要内容。其军事侵略政策亦由此而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英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对联合侵华表现得相当积极,"如果说英国在华北的目的是争夺联合侵华中的领导地位,那么在长江流域则抱着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排除在外实现独吞这一地区的险恶用心。"[19]英国最忌讳沙俄向华北的扩张,但因当时正陷入南非布尔战争,一时派不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到直隶与沙俄相抗衡,便极力支持有快速增兵条件的日本出兵[20]。

日本的既定国策是跻身于强国之列,图谋将来掌握东洋霸权,因此不失时机地参加八国联军。但是,三国干涉还辽的余悸又使其在派兵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谨慎。简言之,即"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与充分的小心"[21]。有的学者认为,甲午战后日本的"国策"是"武力击败沙俄,插足中国东北",并论述了其实现此国策的"三步曲"[22]。有的学者结合史实论述了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北守南进"向"南守北进"的转变[23]。更有的学者将日本基本国策的目标归纳

为"脱亚入欧",认为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和迫订《马关条约》是"脱亚"的标志,参与八国联军、趁火打劫则是"入欧"目标的基本完成[24]。

德国是义和团时期军事侵华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其对华政策紧紧与军事行动结合在一起,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武力强占胶州湾;其二,以克林德被杀为借口增派重兵并夺得八国联军的统帅权,以抬高德国在远东的国际地位;其三,以四出扩大军事侵略的压力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勒索巨额赔款[25]。

奥匈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在义和团时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追随德国的立场,也都想趁此纷乱之机扩充在华利益。两国都派出海军陆战队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攻克北京之后,也都派部队参与了瓦德西指挥的四出扩大侵略的军事活动[26]。

法国在义和团时期的对华政策是以俄国盟友的面孔表现的。在大多数问题上,它都支持俄国的意见,但在攻克北京之后的撤军撤使和南侵保定等军事行动上都一反常态,没有听从俄国的指挥[27]。

2、列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矛盾与合作

八国联军侵华是列强的共同军事侵略活动,但它又不是铁板一块,其间充满明显的矛盾和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八国联军的"联合不过是一种松懈的、暂时的、相对的、转瞬即逝的联合,它们的合作不过是一种貌合神离、互相牵制的合作;而它们之间绝对的、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却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战争和分赃的过程。"[28]有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在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整个过程中,勾结是其主流,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9]。长期有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时期列强在华的争斗形成以英、日、美为一方和以俄、法、德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集团。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此种看法不完全正确,说"俄法结成一伙和英

日结成另一伙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至于德、美两国的态度，则不是十分固定的"[30]。

对于谁是八国联军元凶的问题，史学界存有不同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主流认为沙俄是元凶。80年代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在八国联军这个松散的军事联合体中，不存在自始至终的主谋和元凶，为了自身的利益，法、英、俄、日、俄五国分别在不同阶段扮演主角。当然这里对八国联军的界定仅限于直隶和北京战场。[31]这种观点是比较符合史实的。沙俄参加八国联军仅仅是它远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军在联军中力量的消长紧紧围绕着占领东北这一"既定国策"而不断变化。沙俄在东北地区的造孽远远超过了它在顺(天)直(隶)战场上的罪行，说沙俄不是八国联军始终如一的主谋和元凶，并不等于否认它是义和团时期对华军事侵略最凶恶的国家。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

关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一直是一个分歧较大的议题，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不同意见。仅就中国大陆建国后50年的论著来看，大致有两种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镇压义和团运动而不惜动武。如范文澜先生明确指出，"外国用武力在先，义和团的被激自卫在后，负此次战责的自然是外国侵略者。"他列举了大量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32]。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1900年初帝国主义就已作了进一步侵华准备……，到了5月30日各国兵舰云集大沽，开始了向中国的罪恶进军，也开始了军事合作的阶段。"[33]胡绳先生同意这种观点，"帝国主义列强在看到清政府已控制不了局势，义和团势力渐渐渗入北京、天津的时候，就决定出动兵力，直接出面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34]《八国联军侵华史》的作者们对此事考察得更为详实，指出"'为解救公使而战'的说法纯属借口，……

清政府下令围攻使馆是6月20日，而八国联军的酝酿组建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这时各国的战舰早已冲进大沽口，第一批"使馆卫队"已侵入北京，西摩联军亦已出动，而且联军已攻陷大沽炮台。况且在列强大肆策划调兵之时，使馆区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义和团当时的仇恨仍集中在"洋教"上，清政府当时对使馆一直是采取保护态度和措施。可以说，围攻使馆事件与八国联军侵华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确实是"衅自彼开"[5]。另一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无疑是八国联军战争的主要起因，但慈禧所控制的清政府所采取的错误对策也是战因之一[6]。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差异仅在于视域不同，后者似乎更全面一些。

4、列强的军事侵略及其暴行

这个问题关系到义和团战争的性质。为驳斥帝国主义分子及其鼓吹者的不实之辞，中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观点方面没有什么分歧意见，主要问题是不断丰富材料，力求更加客观、系统、全面。

义和团运动时期对华进行军事侵略、实施暴行最严重的是沙皇俄国，主要涉及顺直和东北两大战场。在顺直战场主要是参与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这方面的论著不少，代表著作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余绳武等编著的《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册和山东大学李德征等编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两部著作对沙俄在八国联军全过程各阶段中的军事侵略方针和行动都有细致的定量定性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不同的，前者是专门论述沙俄一国，而后者是将沙俄与其他列强对比论述。集中论述该问题的论文有苏位智的《沙俄在八国联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7]。在东北战场则是沙俄一国的军事侵略，这方面的论著更多，代表著作还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册，该书对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对海兰泡－齐齐哈尔、伯力－哈尔滨、斯列田斯克－齐

齐哈尔、海参崴－宁古塔－吉林、旅顺口－盛京等五路军事侵略活动均有论述，条理清晰，资料详实。论文的代表作有薛衔天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38]和宋秀元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39]。

日本是天津、北京之战的主力和先锋，另外还有出兵厦门和上海之举。论述日本军事侵略的代表性著作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李德征等编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前者对日本的北、南方军事活动均有论述，比较系统。后者专记北方活动，但内容较前者丰富。论文不多，只有穆景元的一篇[40]。

德、英、法都是义和团时期对华进行军事侵略的重要国家。迄今为止，分别论述这三国的著作和论文不多，这方面的内容大都包含在对多国的论述之中。代表性著作还是《八国联军侵华史》。该书对德国争得联军统帅权、克攻北京之后的四出扩大军事侵略等，对英国挂帅的西摩联军、盖斯里指挥及参与的所有军事侵略活动等，对法国侵略军司令官的易人及其参与的所有军事侵略活动等均有论述。

相对而言，美国在该时期的对华军事侵略不及上述五国，但专论著作有50年代的几部美国侵华史。《八国联军侵华史》中则对其参与联军的共同军事活动以及沙飞未在给大沽炮台最后通牒上签字、攻克北京后提前撤军、不参加四出骚扰报复等细节均有论述。数量不多的论文集中在"文革"以前。

至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军事侵略活动，大陆学者的专门论著尚没有。其内容散见于有关综合性论著。《八国联军侵略史》中有论述，但意大利的资料很少。

5、列强设立的军事殖民机构

军事殖民机构的设立是军事侵略的典型象征，它既是军事侵

略的产物，又是军事侵略的继续。义和团时期列强在华设立的军事殖民机构主要有“天津都统衙门”、“管理北京委员会”和“保定权理司”三处。

天津都统衙门存在的时间最长，机构最完备，发掘的资料较多，研究的成果也相对较多。林树惠先生早在1952年就发表文章，对其组建、性质、组织机构、罪恶活动、移交等有比较全面的论述[41]。1984年廖非的文章利用瓦德西认为天津都统衙门应该是一个归属他领导的军事占领机关的材料来说明该衙门的性质，是比较有说服力的[42]。1989年马振举撰文，“在这个机构存在的两年中，列强为维护其统治，在军事镇压和政治扩张的背后，亦实施了某些有益的市政交通工程。”[43]1990年出版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对该机构的论述最为详实，历数其实施军事殖民统治的种种罪行，并认为所建市政工程虽在客观上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经济开发，但从帝国主义的本意来讲，的的确确是为了加强其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44]

管理北京委员会是一个松散的战时军事殖民机构，是瓦德西到达北京之后，因对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在自己的占领区各自为政的状况不满意而策划成立的。因缺乏外文资料，中文资料也不系统，因此对其研究情况远远不如天津都统衙门。《八国联军侵华史》也只有简短的介绍[45]，没有详细展开。

保定权理司只存在半年多，与德、法联军驻保时间相始终。“表面上与中国地方官共同管理保定府事务，但实际上它是凌驾于中国地方官之上的军事殖民机构。”[46]尤文远、吴云廷分别在《保定文史资料选辑》上有介绍。《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设专节，从文字照会和实际所为两方面对其军事殖民性质逐条给予分析说明。

6、列强抢占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达九国之多，是中国租界国别最多的城市，其中有四个国家的租界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设立的；天津租界总面积达2.3万多亩，相当于当时天津旧城面积的八倍，其中75%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设立和扩张的。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天津租界的最终形成与八国联军侵华紧密相关。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专著以李德征等编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较为详尽。该书对俄国首先强行划界、英德两国的沉默和英俄两国的军事冲突以及各国抢占租界情形均有涉及[47]。另外，天津市政协编写的《天津租界》[48]和天津市地方志委员会编纂的《天津通志(附志·租界)》[49]对这方面的内容也有论述，提供了大量史料，颇有参考价值。

(三)

综观建国以来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与整个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历史地位不无关系。正如某位先哲所言："只有站起来的民族，才有资格书写跪下去的历史。"然而，由于政治、语言、资料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本专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或理论观点欠佳，或资料搜集不足，或研究方法陈旧，甚至还有一些空白之点。在回顾反思的基础上，略陈几点前瞻意见，以供21世纪研究者参考。

第一，吸取历史教训，客观研究历史。通过上述回顾，很容易同意一种看法，即建国前30年，此专题研究受政治影响太严重。自50年代至60年代初，铺天盖地揭批美帝；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单纯一色地批驳苏修。本来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无可厚非，但是走入极端便不正常了。从小处讲是个研风问题，从大处讲是科学思维不成熟的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情大有

好转，研究风气、科学思维渐趋正常。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不成熟又频频出现，甚至走入另一极端，似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了。笔者认为，作为科学的成熟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应当求真求实求全面。凡是研究薄弱或尚有空白点的领域和课题，都应当继续探索。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就是属于这类课题。继续此课题的研究并不会影响正常的对外开放，反而会使前进的步伐更加快捷、更加稳健。

第二，加强资料的发掘、翻译、出版、考订工作。

历史研究离不开资料。列强军事侵略属于涉外课题，因此不仅需要中文资料，更需要外文资料。参加八国联军侵华的国家都存有丰富的军事档案、战史著作、报刊杂志、随军日记等相关资料。建国以来出版的此类资料以苏俄较多，其他国家的资料大多散见于有关中外关系的资料之中，涉及军事侵略的很少，极缺乏系统性。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翻译出版的资料几近空白，使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极为困难。在新的世纪里，政府科研立项、学会协调工作都应加强力度，落实措施，组织力量，推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本专题的研究水平出现整体性的提高。

对于此类资料，除发掘、翻译、出版之外，考订、鉴别工作亦很重要。往往中文资料说不清外方情况，而外文资料又说不准中方情况。因此，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多方印证、考订和鉴别。

第三，加强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本专题与军事史密切相关，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两方面研究人员的合作不够，致使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因知识构成因素而各存不足。与此同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更加缺乏。国际性的课题只有国际性的合作，才能尽快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成果。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这一方面的成功范例已屡见不鲜，希望并坚信今后会越来越多。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①[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第一卷,第11页。

②这些史料的最早出版时间请查阅本书第二部分。

③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只出版了2卷,内容写到义和团运动的前夕。按该书的编写思路,有关义和团时期的内容应在第3卷。

④这一阶段,还有数部冠名"义和团"、"义和团运动"的书籍,但多为通俗读物。

⑤《新建设》1960年10期,并载《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⑥《文汇报》1960年10月14日,并载《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⑦《学术研究》1965年1期。

⑧《光明日报》1954年2月1日,并载《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

⑨参考本书的有关统计。

⑩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3期。

⑪郝贵远:《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几种不同看法》,《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1期。

⑫⑬⑭⑳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第105－106、303、358、196－1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⑮⑰苏位智:《沙俄在八国联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1期。

⑯吴士英:《义和团时期沙俄对华军事行动的战略企图》,《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1980年1期。

⑱李节传:《试论八国联军侵华初期的俄国政策》,《历史教学》1985年6期。

⑲刘志义:《略论义和团时期英国对华政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年。

㉑王魁喜:《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2期。

㉒丁名楠:《甲午战后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政策》,《东岳论丛》1981 年 5 期。

㉓蒋一兵:《试论 1900 年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 1982 年。

㉔刘学照、周成平:《日本的"脱亚入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

㉕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丁名楠:《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 年 6 期。

㉖[匈]尤山度:《奥匈帝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87 年 2 期;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㉗㉛㉟㊹㊺㊻㊼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第 359、437 – 438、436、161 – 181、281 – 282、369 – 373、181 – 193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㉘㉝童恩正:《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矛盾与合作》,《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㉙李德征:《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在联合侵华中的矛盾和斗争》,《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1980 年 1 期。

㉚胡滨:《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80 年 5 期。

㉜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56 – 378 页,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㉞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 593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㊱赵春晨:《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若干特点》,《历史教学》1997 年 2 期。

㊲苏位智:《沙俄在八国联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1 期。

㊳薛衔天:《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81 年 1 期。

㊴宋秀元:《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历史档案》1982 年 2 期。

㊵穆景元:《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 年 4 期。

㊶林树惠:《天津都统衙门　　帝国主义侵略的机构》,《历史教学》1952 年 6 期。

㊷廖菲:《八国联军设立的天津都统衙门》,《历史教学》1984年6期。
㊸马振举:《天津都统衙门再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1期。
㊽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㊾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赵 树 好

晚清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来华基督教会的斗争(又称反洋教斗争或教案)开始于 1842 年,结束于 1911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教会斗争数量极多(有据可查的就有近 2000 起)、参加者十分广泛,遍及全国各地。所有这些,都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这一斗争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建国前的几十年间,有关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仅有 11 篇论文和 3 部专著:(英)亚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①]、吴盛德、陈增辉合编:《教案史料编目》[②]、王文杰著:《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③],很不深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出现了转机。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的研究脉络加以勾勒,对主要学术争鸣进行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几点建议,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的研究脉络

建国以后,反教会斗争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自 1949 年至 1965 年间,共发表有关论文 95 篇,年均 5.6 篇;出版资料专辑和专著 3 部,即南昌人委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印:

《1906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④；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⑤；南史著：《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⑥。由于受极"左"思想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学术界对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基本上限于"反帝"的框架，思想闭塞，研究范围狭小，仅仅对天津教案、余栋臣起义、周汉反教案、景廷宾起义、南昌教案、以及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等少数问题展开讨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受到严重冲击。在这10年内，只发表了两篇论文，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即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天津人民反帝斗争史话)⑦。讨论的问题仅仅涉及云南和天津教案。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几乎被"革"掉。

粉碎"四人帮"后，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自1977年至今，先后召开了5次有关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即1982年6月在四川省大足县召开的小型"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92年11月在湖南省怀化市召开的"第四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还成立了"四川省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会"。所有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改善，台湾张贵永、吕实强主编的有关反教会斗争最重要的中文资料：《教务教案档》(7辑21册，1000多万字)、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以及《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等书在大陆流传，对大陆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共发表了论文223篇，每年平均9.3篇；出版资料专辑6套，即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⑧、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⑨、

庾骆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10]、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11]、中华续行委员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12]、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第1—3册[13];出版专著14部,即周健钟编著:《贵州三"教案"》[14]、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5]、庾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四川省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会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7]、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18]、程歗著:《晚清乡土意识》[19]、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20]、冯祖贻、范同寿、顾大全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21]、吴金钟、刘泱泱、马昌华、翁飞主编:《近代中国教案新探》[22]、陶飞亚、刘天路著:《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23]、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24]、张鸣著:《乡土心路八十年》[25]、张鸣、许蕾合著:《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26]。这一时期,学术界除了对此前讨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外,还探讨了全国各省区的反教会斗争和许多典型案例,研究的范围远远超过"文革"之前。此外,一些学者还转换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研究反教会斗争。如胡维革和郑权的"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27]、路遥的"民众意识与反教斗争"[28]、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从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了下层民众在反教会斗争中的作用。又如卢仲维的"乡绅与反洋教运动"[29]、蔡少卿、屠雪华的"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30]、蔡少卿的"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31]、戚其章的"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斗争"[32]、孙江、黄东兰的"论民间秘密结社与晚清教案的关系"等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乡绅和会党在反教会斗争中作用进行了探讨[33]。再如李志刚的"晚清广东基督教教案之试析"[34]、赵润生、赵树好的"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35]、赵树好的"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的量

化分析”等文运用计量历史学的方法[36]，对晚清广东基督教教案、教案起因、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尽管这类成果数量不多，但昭示着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已开始向纵深发展。

二、主要学术争鸣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许多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限于篇幅，只对其中4个主要问题加以概述。

（一）关于反教会斗争的起因和性质

这是反教会斗争研究中历久不衰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公认，反教会斗争是由多种因素引起，但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4种观点：

第一，侵略说。一些学者认为，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7]，是西方列强及其传教士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结果，是受害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痛苦抉择[38]。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量化分析，指出“侵略与反侵略决定了晚清教案的存在”、“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扩大而发展的”，在能搞清起因的教案中，侵略及列强保护下的教会势力种种的不法行径引起的教案占比例最大，因此，侵略是晚清反教会斗争的主要原因[39]。

第二，中西文化冲突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有所分歧。有的认为“教案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清末围绕中西文化冲突所出现的一系列教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产生教案的根本原因。”（吴金钟：第三届（1989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

有的则认为:反教会斗争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日益发展的反洋教斗争。"也就是说,民族矛盾和中西文化冲突都是晚清反教会斗争的主要原因[40]。

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说法,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督教文化只是西方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能以基督教文化去替换整体的西方文化。中国人在反对西方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中,用中国的传统儒学作为武器去抵抗基督教,只是表现为中西精神文化范畴以内的局部冲突。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宜把这种局部冲突,概括为整体的中西文化冲突"[41]。有的学者则将其界定为文化歧异,认为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宗教持怀疑和回避态度,"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冷静地看待宇宙万物","这自然成为中国人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的坚固堡垒"。二是基督教神学(神创说、原罪说、灵魂不灭、末日审判、天堂地狱说)和伦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分歧[42]。

对于"中西文化冲突"在反教会斗争中的作用,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单纯的社会礼俗和宗教信仰不同,是不可能使教案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教案,是因为有了传教特权,有了侵略,才激化了礼俗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才导致了侵略,才有了传教特权的出现"。"造成近代教案发生的根源乃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传教特权。""所谓中西礼俗、文化冲突云云,只能是次要的原因"。[43]有的进一步指出:"这种中西精神文化的局部冲突,表面是思想文化斗争,实质是中华民族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政治、经济斗争,反映了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矛盾。"[44]

第三，三重危机说。有些学者认为政治上的民族危机、经济上的生存危机、文化习俗上的信仰危机是近代反教会斗争原因[45]。

第四，多种因素说。有些学者认为，“在研究反教会斗争起因的时候，不能忘记中国近代史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否则就会犯简单化的毛病。产生教案的原因颇为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A、帝国主义侵略和洋教本身具有的侵略性所引起，所以，教案首先应当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B、中西文化冲突所导致。其中最突出的是基督教中很多信仰特征和习俗同中国的很多信仰特征和习俗相牴牾。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延伸和继续。C、洋教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和封建官绅个人的切身利益。D、国内阶级斗争（如太平天国）和政治斗争的某些因素也是触发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原因是彼此牵连、相互影响和互为作用的”[46]。

由于对晚清反教会斗争的起因存在分歧，因而对这一斗争的性质也有3种不同意见。

其一，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一些学者认为，“反洋教斗争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个别地区的个别斗争具有反封建因素，但从总体和主流来说，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封建主义，指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反洋教斗争从未提出过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反洋教斗争不仅没有触及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把爱国、保国和忠君、护清混杂一起，扶保清王朝。”[48]

对反教会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民众的爱国反侵略运动，以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纲常礼教和神教迷信为重要思想武器，又使得这场斗争对西方文化的多重机能缺乏明智的选择，蒙上浓重的封建性和情绪性的色彩”[47]。在反侵略中又常常陷入盲目排外和自我禁锢[49]。是“乡

村民族主义"[9]。有的进一步指出,"近代民教矛盾,除洋教士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族矛盾外,还有一部分是入教与未入教的中国农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社会传统内乱匪患在近代的特殊继续,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劣根性大搏斗在近代的特殊表现。在这一矛盾和斗争过程中,作为反教农民有反帝爱国的一面(特别是中后期教案)。作为教民与未入教农民之间的斗争,也有是非、善恶、正邪之分。但双方都有大量的非爱国行为,尤其是恶教民犹甚。正是这种愚昧、无知的非爱国主义行为,加剧了教案,加剧了教案灾难性的后果。"[10]

其二,具有反帝爱国和反封建双重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斗争,既具有反帝爱国性质,又带有反封建的因素和内容。所谓反封建,就是农民自发地反抗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反抗封建制度的纲领和口号,因此,不应以是否反对封建制度作为反封建的标准。他们认为,传教士不仅全"都拥有治外法权特权,不受中国的管辖",而且还拥有教堂收税权与主教发卖执照等等权利"。1899 年 3 月 15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承认主教具有总督、巡抚的官衔,摄位司铎具有司道的官衔,一般传教士具有府、厅、州、县各级官吏的官衔。这样,外国传教士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因此,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11]。有的学者则认为,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在中法战争爆发到甲午战争前 10 年间则具有反帝反封建双重性质[12]。

对于这一观点,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第一,如果教会统治下的教民,特别是租种教会田地的佃农起来反抗教会,那么反教会斗争就可称之为农民革命性质,但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第二,外国传教士包揽词讼、欺压良善、鬻卖执照、盘剥勒索等罪恶勾当,"与其说是统治,不如说是侵略";至于 1899 年清政府

发布上谕承认传教士具有各种官衔是指接待规格而言，不能证明他们就取代了地方官的实职；第三，发动、领导和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是全民的，而封建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了斗争的发起人和倡导者。后来虽然封建地主阶级人物或退却，或转到后台甚至反面，“但运动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所以，不能说反教会运动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54]。

其三，具有正义和保守双重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决定了反洋教斗争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性”；“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又决定了反洋教斗争的保守性和盲目排外性。”[55]

从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是由侵略引起的，它的性质是爱国主义。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对起因认识上陆续出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三重危机说和多种因素说；在对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反帝爱国和反封建双重性质或具有正义和保守双重性质。这种变化反映了学术界思想解放，认识深化。但在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忽视侵略这个大背景，以及侵略对其他因素的制约作用，不可把各种因素割裂开来看待。

（二）关于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

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是学术界争论最激烈，分歧最大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学术界提出了 10 种不同的观点：

1、三阶段说。第一阶段：1861—1870 年；第二阶段：1870—1885 年；第三阶段：1885—1894 年。划分阶段的标准是领导成份的变化[56]。

2、三阶段说：第一阶段，1860（或 1856 年）—1884 年；第二阶段，1884（或 1885）—1894 年；第三阶段，1895—1900 年。

3、四阶段说：第一阶段，1856—1870 年；第二阶段，1870—1885 年；第三阶段，1885—1894 年；第四阶段，1894—1898 年[57]。

4、二阶段说：即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幼稚阶段）、19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成熟阶段）[58]。

5、三阶段说。即第一阶段，1860年（也有主张第一次鸦片战争）—1870年；第二阶段，1871—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59]。

第二至第五种观点，划分阶段的标准不明。

6、五阶段说。第一阶段，1844—1860年；第二阶段，1861—1895年；第三阶段，1896—1899年；第四阶段，1900—1901年；第五阶段，1902—1911年。划分阶段的标准是教案的发展起伏和特点[60]。

7、三阶段说。第一阶段，1860—1870年；第二阶段，1871—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所依据的标准是教案的特点[61]。

8、四阶段说。第一阶段，1846—1860年；第二阶段，1860—1884年；第三阶段，1884—1894年；第四阶段，1894—1898年。所依据的标准是各个阶段教案的特点[62]。

9、二阶段说：第一阶段，19世纪70—90年代；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前十年。所依据的标准也是教案的发展起伏[63]。

10、五阶段说。第一阶段，1846—1860年；第二阶段，1861—1883年；第三阶段，1884—1894年；第四阶段，1895—1900年；第五阶段，1901—1911年。所依据的标准是教案的特点[64]。

上述观点之所以众说纷纭，其根源在于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的标准和起止时间不统一。以领导成份的变化作为标准已经被许多学者否定。学术界对以特点作为标准并无疑议。上述一些观点以发展起伏作为标准，这也是颇有道理的，但他们并没有以数量变化做基础，因而难以令人置信。至于起止时间，更是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既然是晚清反教会斗争发展阶段，其阶段就应该贯穿整个晚清时期，以晚清第一起和最后一起反教会斗争作为起止时间。

（三）关于反教会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反洋教斗争只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动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而并非义和团运动的全部内容。义和团反洋教，也反瓜分"[66]。有的指出，义和团的反教会斗争"同先前士绅领导的反洋教斗争没有什么牵连。与其有密切历史联系的，则是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兴起的秘密会社发动的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早期发动，可以说是这一斗争的继续，特别是1891年哥老会、金丹教在南北起事的发展。笼统地说义和团运动是直接继承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反洋教运动，这是不确切的。"[67]

第二种观点认为："义和团与历次教案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是分散斗争汇集为比较集中，是个别打教发展为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的高峰，是一次大教案。"[68]有的则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一是"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扶清灭洋和保卫封建的传统文化。"二是"封建士绅和官吏是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同一倡导者和支持者。作为官吏来说，其反教方式虽有公开参加或暗中支持两种，但从没退出反教斗争的队伍。士绅反教则不遗余力，为反教斗争的旗手。义和团运动中，封建士绅和官吏的表现仍是如此。况且从广义上说，公开参加、暗中支持、舆论鼓动都可视为官绅反教的内容。所以说近代教案（包括义和团运动）基本上都是官吏士绅领导下的产物"。三是列强借口义和团运动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法国借口西林教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的继续，没有根本的不同[69]。

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的高峰和一次大教案的看法是一种新的观点，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他们的论据还不够充分，仍需

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反教会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两种意见：

第一，全面肯定。有的学者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对于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它的发展的作用，使得它毕竟没有达到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上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的狂妄目的”[69]。甲午战后，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都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反洋教斗争适时地总汇合为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为反洋教战争，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并为1911年的“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积聚了力量和作了某些组织上的准备。因而“反洋教斗争及其高潮——义和团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70]

第二，一分为二。有的学者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动员了千百万人民起来战斗。1900年势如暴风骤雨的义和团运动，以数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为前导；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是在群众反抗风暴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反洋教斗争又是落后的。它的落后性首先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凡是传教士，凡是教民，乃至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事物，一概反对，从而不仅伤害了一些无辜者，而且盲目抵制了西方的一些进步事物，妨碍了进步人士和反洋教斗争结合。其次，单纯的暴力手段也不是恰当的斗争方式。他们对基督教会“单纯用暴力手段予以歼灭，非烧即杀，既不能解决宗教信仰问题，还给人一种不分是非，不讲道理的野蛮的印象。最后，运动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它不仅表现为由封建守旧人物倡导和参与，而且其指导思想是保卫圣道、维护伦常、忠君救主等等。参预反洋教斗争的封建守旧分子，极力煽动群众的排外情绪，磨灭斗争的反封建棱角，因

而，运动进展缓慢，进一步退二步，始终没有达到近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水平。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的艰巨任务。"[71]因此，反教会斗争"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不可能实现赶走侵略者、复兴中国的愿望和目的。"[72]有的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起到了遏止教会和列强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然而，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在组织方式、目的方面的落后与盲目排外性则是不可取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是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反动"，"在近代中国，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如果依靠这种落后的方式，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会愈陷愈深，以至于不能自拔"。[73]

我们认为，反教会斗争的时间跨度极长，起因、类型和反教者的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它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因而第一种观点显得太绝对化了。

三、反教会斗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与这一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研究相比较，仍然显得十分薄弱。这突出地表现在资料缺乏、微观研究不够，没有将反教会斗争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学术交流缺乏等。我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推动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大力搜集、整理和出版相关资料

目前，反教会斗争研究的突出问题是资料不足。有关反教会斗争研究的最重要的中文资料是台湾张贵永、吕实强主编的《教务教案档》，但这套书只有部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存有，况且多数单位还不全(缺第7辑)。所以，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购买或

补齐这套书。建国以前出版的《清季教案史料》、吴盛德、陈增辉编著的《教案史料编目》等有关反教会斗争的重要资料只有少数单位存有，可否考虑重印；一些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资料散见于清方档案、官员书信、私人文集、日记、中外报刊杂志、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书籍、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中，应该组织人力，将上述书刊中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资料集中整理出版。另外，当时向中国派遣教会的法、英、俄、美、德等国政府和教会都留下了大量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资料，应设法搜集这些资料，将其翻译出版。只有这样，才能为反教会斗争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大大推动这一研究。

（二）拓宽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

在以往有关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中，不乏宏观考察和总论性的成果，但教案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阶段研究还很薄弱。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宏观研究结论，难免偏颇。如有的学者认为沿海地区反教会斗争远远赶不上偏僻闭塞的云南、四川，越是在闭塞、落后的地区，遇到的反抗就越强烈。实际上，沿海地区教案的平均数最高，山东、直隶（今河北）都超过四川，云南的教案则名列倒数第八位，绝对不能算多。而更加偏僻闭塞的新疆、西藏地区的教案则名列倒数第一、二位，所以，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此外，还有许多类似情况。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阶段研究，搞清每起教案的起因、经过、结果、主要成员、中外双方对该案的态度等情况，进而进行综合分析，才能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在晚清时期，反教会斗争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中国社会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必须把反教会斗争放在晚清社会和世界近代史的大范围中加以考察，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

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外交、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

产物，又给这些因素的变迁以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除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研究外，还要借鉴宗教学、宗教心理学、国际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计量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开阔思路，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三）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协作

建国以来的50年间，仅仅召开了5次专门讨论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而且这些讨论会全是国内会议。这种状况，根本无法与晚清其他重要历史事件相比拟，也与反教会斗争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认识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学术研究除了需要独立思考之外，更需要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而学术讨论会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则是其他形式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建议今后每几年召开一次有关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尤其应该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另外，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缺乏联合与协作。因此，应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协作，以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

注释

① 南洋公学译书院1891年版。
②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1年版。
③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年版。
④ 1957年印行。
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⑦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⑧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⑨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⑩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
⑪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⑬ 中华书局 1996、1998 年版。
⑭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⑮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⑯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⑱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⑳ 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㉒ 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㉓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㉕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㉖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㉗《东北师大学报》1996 年第 1 期
㉘《历史档案》1987 年第 3 期。
㉙《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㉚《社会科学研究》1984 年第 3 期。
㉛《南京大学学报》1984 年第 4 期。
㉜《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4 期。
㉝《南京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
㉞《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㉟《人文杂志》1996 年第 2 期。
㊱《河南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㊲ 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㊳ 史岩：第三届（1989 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

研究》1990 年第 2 期。

㊴ 赵润生、赵树好：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载《人文杂志》1996 年第 2 期。

㊵ 王守中：略论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 年第 5 期。

㊶ 涂鸣皋：对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㊷ 陶飞亚、刘天路著：《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8—341 页。

㊸ 路遥：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㊹ 涂鸣皋：对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㊺ 郭汉民、邹小站：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㊻ 史岩：第三届（1989 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 年第 2 期。

㊼ 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㊽ 程献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1 页。

㊾ 史岩：第三届（1989 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 年第 2 期。

㊿ 张鸣、吴静研：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新"十字军"东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51) 徐梁伯：反洋教斗争中的农民爱国主义探微，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52) 牟安世：中国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4 期。

(53) 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54) 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

㊺ 王守中：略论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 年第 5 期。

㊻ 李时岳：《甲午战争前三十内间的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第 6 期。

㊼ 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㊽ 19 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摄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第 1 期。

㊾ 19 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摄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第 1 期。

㊿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4 月版。

(51) 路遥：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52) 1990 年，戚其章：近代教案发展论，载《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53) (苏联)A、C、科斯佳耶娃：《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 7 月版。

(54) 邱远猷：近代反教会侵略的斗争分期及其特点，载《文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

(55) 邹范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与义和团运动，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56) 路遥：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57) 廖一中、李运华：论近代教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58) 孙长来：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关系略论，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 年第 3 期。

(59) 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4 期。

(60) 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⑪ 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4 页。

⑫ 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⑬ 廖一中、李运华:论近代教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50年来义和团运动资料概述

庄建平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正义斗争。新中国建立以后的50余年间，中国的学术界对这场运动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和数以百计的著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史料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是把研究义和团运动拉向繁荣的起点和保障。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思想、社会、民俗诸多方面；形式非常多样，有公文档案、函电、奏议、文集、日记、报刊、当事人回忆录、碑传以及外文资料，还有近代修撰的地 方志等等，卷帙数量非常庞大，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本文为叙述简明扼要，分作：一、综合资料，二、义和团文献，三、清朝档案，四、外文资料四类加以介绍。凡近年来出版的新资料的内容则多介绍一些，对大家熟知的内容则介绍更简明一些。本文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1950年，由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伊始，就制订了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的工作，确定编纂的档案资料，集中地反映晚清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50年代初编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专题资料10部，最早出版的是第九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这部专题资料集的编选者是著名的学者荣孟源、金家瑞、林树惠等人。《义和团》的最先出版的意图，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义和团运动资料散见于全国各地，搜集不易，考辨更难。编者要在短时期内编成既能反映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又能反映义和团思想、源流和组织结构诸多方面的情况，更是费工费力。为配合时政的需要，编者经过辛勤劳作，终于编成《义和团》第一部综合资料集。全书选辑资料48种，除编者自辑的《有关义和团上谕》、《有关义和团的舆论》、《有关东南互保资料》3种外，有31种是当时人记载，有14种是文书档案。全书资料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德国侵占山东胶澳，迄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全书分装4册，约共170万字。第一册收录《庚子国变记》、《崇陵传信录》、《景善日记》、《宰惠纪略》、《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等18种，综述义和团运动全过程，以及义和团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初期活动的情况。第二册收录《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等10种，记载高潮时期义和团在天津和北京等地的活动情况。第三册收录《瓦德西拳乱笔记》、《庚子西行日记》等10种，记载八国联军从大

沽上岸、入侵津京等地的情况。第四册收录《有关义和团上谕》、《有关义和团奏稿》、《庚子剿匪电文录》、《恒谦手札残稿》等原始文件，记载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策略，以及勾结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义和团的情况。书后附录《义和团书目解题》，对300多种书籍，概要作了介绍。这是研究义和团运动基础资料。要深入研究各种问题，还须另找更多的资料，但《义和团》一书的出版，曾为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常的历史研究的拉动，从60年代至80年代相继又出版了多种综合性资料集，以弥补丛刊《义和团》所选录的资料不足。兹举数例如次：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两辑），共收资料21种，其中北京地区资料8种，直隶地区资料10种，东北地区资料3种。这些材料，大多是未经发表的稿本或钞本，例如林学城辑《直隶剿匪电存》，选录直隶总督裕禄与各府州县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往来电报681件，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期间，北京和直隶义和团斗争的情况。从这些资料中暴露出清廷在"剿团护教"的政策下，对义和团血腥镇压，对帝国主义奴颜媚骨的丑恶行径。嵩崑的《洋事记册》、《嵩崑庚子日记》、程德全的《庚子交涉隅录》，均系伯都讷副都统嵩崑、吉林将军长顺、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等人的往来函电文牍。这些文件揭露了沙俄以"保路"为幌子，出兵东北，蓄谋攫取我国东北及西北广大疆土和主权的狂妄野心与凶暴的行径；也记载了东北地区义和团与民众奋勇抗击沙俄侵略斗争情况。《恽毓鼎庚子日记》、《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事实》等资料，记载着义和团在北京的浩大声势，以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义和团仍坚持斗争的情况；还揭露了洋兵在北京烧杀淫掠的残暴罪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杂志，自1954年创刊以来，在专刊和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义和团资料，约有

300余万字。用"近代史资料专刊"发表的有5种:(一)、《庚子记事》。本书共收北京地区资料5种,有仲芳氏的《庚子记事》、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华学澜的《庚子日记》、佚名的《庸扰录》、高枏的《高枏日记》。这几种资料记载庚子五月义和团大队进入北京后的情况,和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的野蛮行径。(二)《杨儒庚辛存稿》。本书汇录1900年到1901年清朝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商谈俄兵撤出东北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资料。这些文件揭露了俄国凌虐东北人民,欲图长期侵占我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狂妄野心。这些资料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侵略中华利益而引起的争斗。(三)《义和团史料》,约97万字,按资料性质分4类:(1)义和团文献,收录义和团的传单、文告、揭帖、乩语和咒言等4种原始文件的辑本。(2)史籍汇录,收录时人记载、文集、日记、年谱、信函和纪事诗等67种。其中有李超琼的《庚子传信录》、刘福姚的《庚子纪闻》、陈璧的《五城公牍汇存》、河北博物馆编的《献县天主堂资料》等19种,都是未刊的稿本和钞本。还有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曹倜的《古春草堂笔记》、佚名的《综论义和团》等48种流传不广的印本。这些资料以北方地区为主,计有山东、直隶、天津、北京、山西、陕西等地,并有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区的资料。记事比较翔实,是研究当时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以及义和团历史的重要资料。(3)四川红灯教,共收四川府衙原始文件75通,记载四川红灯教活动的情况。这批案卷在50年代初发现,这是第一次公布。(4)方志辑录,收录直隶、山东等12省199种方志,其中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也包括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府县的方志。虽然搜集的省份不全,却可以看出义和团式的反帝斗争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本书是继《义和团》丛刊以后,又一部综合资料。(四)《山东义和团案卷》。(五)《义和团史料——等笔偶存》。这二种资料,在下节"清方档案"中叙述,这里就不赘说了。

《近代史资料》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共30余种，包括3类：(一)义和团文献类。如王火选辑的《义和团杂记》、孙敬的《义和团揭帖》和从《庚子荜蜂录》中辑出的《义和团乩语》等原始文献。(二)时人记载类。如岳超的《庚子随行简记)》、左绍佐的《悟彻源头》、刘品一的《西什库被围纪略》等6种。(三)回忆录调查记类。如《义和团时的献县教堂》、《庚子回忆》、《庚子见闻录》、《天主堂霸占民田》、《美国教士万卓志》、《宝复礼屠杀义和团》等10余种。以上这些资料是研究义和团思想和运动起因的重要资料。

应当指出，在1966－1976年之间的10年中，义和团研究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严重挫伤。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义和团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了新的发展。在此期间和以后，收集和挖掘并出版了大量的义和团新史料。

最受史学界关注的义和团资料丛编，当首推在1980年义和团运动80周年之际，齐鲁书社出版的"义和团资料丛编"：这套丛编共出5种颇具史料价值的资料集。(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整理的《山东义和团案卷》。(二)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辑》，所选资料均系曾经参加过义和拳或亲历者的见闻。1960年至196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曾经3次赴鲁西、鲁西北、鲁冀交界各地，调查了55个县，共得调查资料140多万字。这次选录24万余字。编者用有关档案材料对调查资料作了考订，并注明了两者之间的异同，使用更为方便。(三)廉立之、王守中编的《山东教案史料》，所收大多是档案资料，记载咸丰十一年济南教案到光绪二十五年肥城教案。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仅山东一地就发生了30多起重大教案。资料说明，引起这些教案的原因主要

是:教士索还天主堂旧址,教堂强占庙地田产,拆毁民房,教士包揽词讼,鱼肉乡民,洋兵抢杀民命重案等等。本书对研究山东义和团发生的原因,提供了重要材料。(四)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的《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五)天津历史所节译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四)、(五)两种资料归并到"外文资料"一节叙述。"义和团资料丛编"的出版,有助于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二

长期以来,关于义和团源流以及义和团运动性质的两大问题,是历次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的争论焦点之一,意见分歧,众说不一。对义和团源流问题,有白莲教说,或白莲教支派八卦教说、乡团说、一般秘密结社说。对义和团运动性质,有义和团灭洋并不反封建说,或反帝爱国并带有反封建的因素说、反帝反封建说。要考察清楚以上诸种问题,义和团自己的文献是重要史料。今日我们能见到的义和团揭帖、传单、告白等原件极少;多数是从各种档案、地方志及时人记载中传抄来的,约有200余件。这些义和团文献,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然而它和历代许多农民起义一样,其政治主张和要求,往往掩藏在这种神秘的外衣之内,揭开神秘的外衣,可以看到义和团如何反对侵略,如何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例如,《刘伯温先生碑文》是义和团主要揭帖之一,碑文说:"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这个传单指出,中国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利是从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始的。各地义和团普遍提出了"灭洋"的口号。这些揭帖和传单张贴城墙街头,显示出中国人民驱除列强势力的坚强意志。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因此在义和团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义和团如何对待清政府的问题。

其中有些比较明朗，但多数却是以隐语秘言的形式出现。有一份义和团告白，曾译载于日本《邮报》，是帖说："百余年来，赃官见信于朝廷，官府为买官鬻爵者开，……皇帝垂涎高官财富，高官则剥削下官，下官又剥削黎民。……现在天愤怒，派遣神灵下凡调查上下，罪魁乃当今皇帝，断子绝孙，后嗣无人。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另一揭帖《吕祖乩语》说："十个官、九个肥"。另一乩语说："大清官，钱买的"。这些乩语指斥了清朝政治腐败和官吏贪污枉法及残害人民的罪行。又如《马家堡碑文》说："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庚子年圣帝鸾语》说："天下各省谁为主，满天星斗与孽妖，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这些揭帖又暗喻清朝是"孽妖"统治，鼓动群众跟随"义和明教"，才能求得光明大道。有些揭帖把清朝统治者称为"草名之人"、"一群猴"；而把自己的理想皇帝称为"真龙主"、"真主"、"真君主"、"我皇"。例如《南苑三台山》乩语宣传"真龙出现了，路上没有草名之人贴出票来了"，"要过太平年了"。《庚子乩文》说："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宝坻县乩语》说："若问真龙主，全在二八五，满城一支花，独野无匡土。""二八五"暗隐二十六，即指二十六年。显而易见，这些传单具有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思想。

1957年《近代史资料》（总12号）曾经刊出义和团文献39件。但直至80年代初，这些研究义和团思想的重要资料，还没有汇编成册，阅者要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寻找，甚感不便，也不易了解义和团文献的全貌。后来，程虎啸和陆景琪编辑的《义和团思想史料》（油印本），汇集了散见于各地各处的义和团文献以及民间歌谣，但仅是作为教学参考用书，若有象这类专题史料出版，对阅者就更为方便了。

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是，1985年，由陈振江、程献编著的《义和团文献辑注和研究》是一部精品之作。本书最大的成就之处，即综汇义和团揭帖、告白、书信、碑文、坛谕、乩语、诗歌、咒语、旗书、

戒条、团规、对联、门贴等文献179件。这是迄今唯一完整和系统资料。这些义和团文献，大都出自义和团民之手或支持义和团的士绅之手，曾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与史乘、口碑资料相互印证，探讨义和团的思想源流、基本内容、作用和影响。

三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光绪朝二十六年。在这一时期的清朝档案中，有大量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记载，固然从皇帝的谕旨到各级官吏的奏疏中浸透了统治阶级的反动意志，一方面则竭力粉饰"文德武功"，另一方面则肆意污蔑民众反抗运动。但这些档案毕竟是在运动过程中所形成，可以从反面提供许多事实，向为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利用这些档案汇编成史料选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清政府专门设立机构纂修的官书，一类是私人辑集的政府文书汇编。

按照清朝律例规定，新帝登基，必须修纂前朝皇帝的"圣训"和"实录"。溥仪登位三年，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清王朝统治，所以"圣训"未来得及编成，惟有"实录"。《德宗实录》共597卷，是一部谕旨总汇，其中卷四三七至四九二，录有义和团运动上谕。但因编修者（陈宝琛等）随意删削和改动原文，失实之处甚多。例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谕旨称："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而刊行本却将此句改为："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经此改动，则意思完全相反。另外《德宗实录》汇集谕旨也不齐全，仅以包士杰所辑《拳时上谕》校勘，有39通谕旨为实录所不载。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寄南北洋大臣的谕旨，仅是缺漏中的一例而已。虽然实录有失实之处，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清政府对义和团采用"剿抚并用"的卑劣伎俩。

私家利用档案编成的史料集主要的有以下4种：（一）朱寿朋

编《东华续录》共220卷，其中卷一五九至一七〇，记载了义和团运动事迹。是书于宣统元年出版，当时《德宗实录》尚未编成，朱氏所据材料主要为邸钞京报刊出的政府档案和文书，部分系采录当时报纸和诸家文集，是一部仿东华录编年体例的资料长编。（二）沈桐生、董沅、董润编印《光绪政要》共34卷，其中卷二十六至二十七，录有与义和团有关的谕旨和奏稿。就史料价值高下而言，是书不如《东华续录》。（三）王彦威、王亮父子合辑的《清季外交史料》共242卷，其中卷一三七至一六〇，记载义和团运动期间诸大事。王彦威时直枢廷30余年，他利用入直军机处的机会，抄录外交档案编成《洋务始末》，成为《清季外交史料》的主要部分。本书附录的《西巡大事记》，即是王彦威随驾扈从秦晋时的记录，亦颇有参考价值。（四）裴维钧等编的《光绪条约》和于能模等编《中外条约汇编》的国际条约内，录有辛丑条约十二款，附件十九，照会一件，皆有关义和团事。

建国以来，为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义和团》第四册，录有清朝中央及地方的档案。中华书局校点出版了朱寿朋的《东华续录》，改名《光绪朝东华续录》。此外，由学者和藏档单位通力合作整理的清朝档案集，并受到学界重视的有3种档案资料汇编。其一，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本书所收材料包括宫中批奏折，军机处的上谕档和电寄档，以及西安行在军机处的文件，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到二十七年十二月的史实。从皇帝谕旨和中央地方以及驻外使节的报告文书中，可以看到义和团由山东、河北发端，迅速扩大到其它地区的发展情况，也可以看到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后，疯狂镇压义和团，以及依据"足适各国之意"，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辛丑条约》的众多事实。这些资料还提供了各帝国主义在侵华问题上引起的矛盾和斗争，对于了解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以及引起清政府统治集团矛盾，都有参考价值。其二，1990年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全书共辑录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档案资料共1600余件，起自光绪二十二年，迄于二十九年。这些档案文件大都系第一次公布，记录了中外关系、晚清政局、社会生活及民间社团诸多方面的实况。其三，对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研究室主编的《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辑录1990年2月至1902年8月，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赫德与金登干、总署、各国公使以及各海关洋员的来往函电文书。这些资料都是从旧海关档案中选录出来的有关义和团运动及当时帝国主义侵华的资料。

上面提及的是清中央政府的档案，地方政府的档案数量很少，但这些档案资料偏重于反映重大事件的过程和晚清政治、军事、中外关系的情况，完整的具体的反映一时一地的义和团运动情况的档案资料较少。就其史料价值而论，地方政府的档案更比较接近事件的真相。以地域为中心的专题资料出版，推动和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研究向更广阔的范畴发展。例如，近代史资料编辑室整理的《山东义和团案卷》，是山东巡抚衙门的档案，汇录了新建陆军各防营和济南、泰安、武定、临清、沂州、兖州、曹州等各府州县的禀报，按各防营及府州排比，约78万字。全部文件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起至二十七年二月止。这部案卷记载山东义和团的首领和成员大多数是劳苦大众和游民，地方士绅直接参加义和团者极少。他们在遭到袁世凯疯狂屠杀后，反而与清军作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次战斗则聚众数千人，其中较大的战斗就有数十次之多。尽管在阳信东门里书院，滨洲皂李庄、济阳玉皇庙等10多次战斗中，义和团一次牺牲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但反抗斗争仍此伏彼起，持续不断。这部案卷还记载了各地抢教事件的具体情况，细及被抢教民丢失白银几两、骡马几匹、大车几辆、棉花烟土几斤、何种教民被杀、何种教民不抢等情况，这对于剖析抢教的性质提供了大量确实的依据。这部案卷是研究山东义和团的重

要史料。又如，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和中国第一档案馆合编的《义和团史料一筹笔偶存》，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部地方政府文案手稿。本书汇录光绪二十五年五月至二十九年二月，山东巡抚衙门经办的有关义和团和洋务交涉方面的官方文牍，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文摘抄，包括谕旨、各部院的咨电以及省内各道府州县防营的禀呈文书和外国传教士的函牍；二是山东抚院草拟文电函札，包括奏折、咨呈文书、答复洋教士的信函，以及对下属的札饬、通告、函电、批示等，均为全文；三是有关文案辑录者个人活动的记载，内容很少。《筹笔偶存》是反映山东人民反帝反洋教斗争，其中包括山东义和团运动情形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原始资料。这份资料对研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义和拳的源流，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山东义和拳的参加者和反对者，山东义和拳和直隶义和团的关系，山东义和团运动中的所谓"排外"等问题，都提供了许多确切的事实。这份资料中有关洋务交涉的文件，暴露了德国蓄谋攫夺山东主权的野心和凶横的罪恶行径；同时也记载了山东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的情况。《筹笔偶存》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所反映的山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事迹，几乎遍及全省各个州县，其中对许多著名案件及事件的记载甚详，为别的资料所少见。并还填补了《山东义和团案卷》所缺的登莱青三府一州的资料空白。地域性专题资料集中，为研究者经常参考的还有《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天津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等。这些资料的出版，为某些专门事件进行考察论证，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使研究比以往更深化。

在清朝官员中与义和团事有关者极多，如毓贤、李秉衡、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英年、裕禄、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王文韶、袁世凯等人，他们或有奏疏、文集、年谱、日记等传世，皆载有义和团事。其中有一

部分已收入《义和团》等综合资料中，尚未发表的还甚多，都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资料。

四

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外文资料也是相当丰富的，按其形式可分为各国政府的档案、在华外交官、传教士等诸色人士的记载和国外报刊杂志的资料。国外公布有关中国近代史范围内的档案，已有相当的数量。其中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文件也极多，有的已译成专卷出版，概略介绍于下：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开了1871年至1914年期间的外交档案，并出版了54卷外交部外交档案汇编。1960年，孙瑞芹从中译出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资料，题名《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分装3卷，记载1894年中日战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是书第二卷是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英国档案开放到20世纪初叶。1954年王崇武依据英国档案馆藏中国事务文件，译成《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选辑》，录有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英外交大臣等人的信函4件，英军官卫特曼报告山东义和团活动情况信一件。1980年，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选辑》，起自1899年山东卜克斯教案，止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本书所选译的资料，绝大多数是当时英国公使、领事、武官、教主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报告及往来文件。

苏联从1922年到1941年，公布了一批帝俄时代外交档案，发表在《红色档案》杂志上。1957年，张蓉初从中译出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题名《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全书分为中日战争文件、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最初步骤、关于收买李鸿章和张荫桓、义和团起义、库罗巴特金日记、辛亥革命7篇，

大部分是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材料。1980 年，吉林历史所译《俄军在华军事行动资料》，记载 1900 年到 1901 年俄国在华的军事活动情况。这份资料是由沙俄总参谋部军事档案馆于 1902 年作为机要保密资料编印的奏折、电报汇集，当时只有少数高级军官要员才能看到。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有关中国事件及在华军事行动报告等资料也已经公开，但至今国内还没有译本。朱士嘉编译的《19 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以国内中文档案为主，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从美国档案馆抄录回来的资料。

日本公布了一批外交文书，1868 年到 1898 年的档案名称叫《日本外交文书》，1898 年以后的文书名称叫《日本外务省文书》，其中有关义和团运动及中日交涉史料，现尚未译出。北京图书馆有引进的文书显微胶卷，可所了解全貌。

有关义和团的外文著作，大多在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侵略军军官及新闻记者之手，约有百余种，已译成中文的也有几十种，例如《庚子使馆被围记》、《瓦德西拳乱笔记》、《八国联军志》、《庚子中外战记》、《俄国在远东》、《维特伯爵回忆录》等书。又如 1980 年，天津历史所编译的《八国联军在天津》中，辑录了《华北作战记》、《中国与联军》(、《在华一年纪》、《京津随军记》、《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和《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等 7 种外人记载。这些著述，主要记载 1900 年 6 月至 8 月，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开战的情况。

在外文资料中，同情义和团运动的极少，而多数是百般的为各国侵华政策辩护，并又肆意诬蔑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斗争。但真相总是掩盖不住的，从各国的档案和外人记载中，还是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欲图瓜分中国而进行的罪恶活动，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争斗的情况，也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义和团以及各爱国阶层人士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这些外文资料也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参考资

料。

在80年代，在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认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即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简略的总结，从史籍文物出版相比较，在后期义和团运动资料的出版总量是上升趋势，义和团研究蓬勃开展。其标志就是，1980年11月在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成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1982年9月在威海举行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暨研究会代表大会；1986年5月在天津召开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1988年7月在黑龙江黑河举办学术讨论会；1990年举行纪念义和团运动9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这些全国性学术会议期间出版了大量资料。上文已简括叙述，不再赘述。在90年代后，资料出版总量下降，义和团的研究也退居为非热点，大多数学者把视角视野投向了晚清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研究，以及近代教案的研究。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就是在这种学术研究氛围中产生的。今后如何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开展，这是史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杜继东

与大陆地区的研究状况比较而言，50年来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显得有些寂寥。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认知理念的差异，台湾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若干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对50年来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介绍，供大陆学者借鉴和比较，正是本文的主旨。从时间方面来说，台湾地区的这项研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所以本文拟对若干重要专题分别加以介绍。由于笔者搜求不广，识见有限，遗漏和错失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一、关于中国人反教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反洋教活动的一次大爆发。关于中国人反教的原因，有一些学者从中西文化的冲突着手进行分析。在1949年以前，文化冲突论就已形成，如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王文杰在1947年即指出，“中国顽固的士大夫素来以生于文物礼仪之邦自诩，他们除了承认传统的礼俗和旧文化的权威外，不肯亦不屑向任何外来的精神文化低头，所以他

们的心目中，这来自夷邦的夷教，简直被认为异端邪教，洪水猛兽一样。'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是二千年前儒家老师的经义吗？……所以教案算是中国旧传统旧礼俗对新的西洋宗教势力的排斥和斗争，它是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①

50年代初，台湾学者继承了这种看法，如李定一在分析教案迭起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对立与冲突："凡入教者不祭祖先，不敬神佛，不崇孔子，而复男女混杂同作礼拜，使得一般士大夫与民众，都将教民（信教之中国人）当作丧心病狂之徒，而视传教士为伤风败俗之主使人。"②

不但台湾学者如此，国外也有学者持类似的看法，如美国学者柯文在其《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对中国人反教之事加以论述。他认为中国人反教思想的主要基础，是儒家正邪对立（Heterodoxy - Orthodoxy Antithesis）的观念和"辟异端"的精神。③文化冲突论虽然揭示了中国人反教的根本动因，但忽略了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的观照，没有对具体原因进行具体分析。1966年，吕实强出版专著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修正。吕曾参与《教务教案档》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对晚清时期（1860－1900）的民教冲突颇有研究。关于反教问题，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从表面上看，参与教案的"常为成千成百的平民，但真正的鼓动与策划者，则多半为当地的官绅与知识分子"。④他们反教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文化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对立，而要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有三：一是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与"人禽之辨"观念与基督教的碰撞；二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所具有的侵略性质引起了中国官绅的恶感；三是中国社会"久已形成的种种迷信观念与习俗，以及中国官绅素所享有的现实利益及地位与尊严，因基督教的传入而大受影响"，从而引发了官绅的反弹。上述因素往往互相关连，彼此混杂，使得民教冲突不断发生。他的结论是："基督教在华

传教一事，如不用政治武力强迫推行，虽未必能全免于冲突，但未始不可以和平方式为主，由逐渐的相互了解，而达于彼此交流与融合。其所以引起许多重大不幸的惨案，所关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根本者，并非甚多，而出于人类贪婪自私的因素，实为主要。"⑤

后来，吕实强继续发表文章，探讨反教问题。关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教，吕认为他们把一些荒诞不经的方术与邪法统统列为传教士的罪行，是对儒家的"理性与笃实精神"的漠视，他们所倡导的反教手段极其残酷，是对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的违背。他的结论是："在晚清时期，尽管所有的反教知识分子，都宣称他们是秉承与保卫儒家传统而反对基督教，但他们所言所行，却往往漠视儒家思想的本意，甚且与之相反。这便很难认为教案的发生，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⑥

陈银昆另辟蹊径，以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晚清的民教冲突，但在分析民教冲突的原因时，他仍然从文化冲突入手，以"本土化"和"本土运动"等新概念加以阐释："就文化接触而言，外来文化若欲生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必须关联传统文化，经过一番过滤与改造之适应过程，是为本土化（Indigenization）。若外来文化不经此一适应过程，强行移植，势必引起本土文化中成员之反抗的本土运动（Nativism）"。而"基督教于清季再传入中国时，时值中国政权、文化并衰之际，以强文化的姿态，以保护传教条约的不平等方式，强行传入，立即引发无数重大的纠纷。由此观之，教案显然是以传统文化为认同目标的社会文化重整之本土运动"。其次，"传教运动可视为价值取向之社会运动，其意义在于促进或改变社会变迁之方向"，而反教运动"可视为反价值取向之社会运动，其目的在于抗阻传教及传教带来之社会改变，以维持现状"。由于二者"目标互异，冲突之产生势所必然"。⑦

二、关于义和团的源流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学者多承晚清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所谓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源出于八卦教之离卦教”的说法，例如，何健民指出：“中国典籍，咸称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而白莲教又发源于白莲社。”[8]王尔敏认为，义和团的本质，“神的成份大，尚迷信，其原始为白莲教的余孽”。[9]李定一虽未指义和团源于白莲教，但也认为义和团是“民间秘密会党之一”，“初名‘大刀会’，盛行于黄淮流域各省，乾隆时曾严禁之。到十九世纪末叶，大刀会势力复盛”。“大刀会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为‘团’字，义和团之名由是而兴”。[10]

1962年，戴玄之撰文指出义和团与白莲教和八卦教无关。他的主要理由如下：1，信仰不同。白莲教信奉弥勒佛，而义和团则信奉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其所信奉的神灵虽多至不可胜数，但决找不出‘弥勒佛’三字”。2，组织结社不同。白莲教和八卦教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秘密结社，组织严密，大权统一，但义和团不是秘密组织，而是公开的团体，“是以村、镇为单位的乡团组织，各自独立，彼此不相统属”。3，仪式不同。白莲教以“妖言惑众”，或“佛法惑众”，而义和团“则为神鬼所役，盖拳民非有所谓神仙附体是不能有所谓‘神术’的。其所谓神术，只是刀枪不入，未发现像白莲教自称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巫术”。4，宗旨不同。“白莲教是具有政治野心的革命团体，藉宗教迷信来煽惑群众，以达其称王建号的政治目的”。相反，义和团没有政治色彩，其目的“初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其后变为仇教反外团体”。5，白莲教的教主多是世袭的，而义和团根本没有世袭这回事。6，白莲教、八卦教“聚众敛财”，而“真正拳民自备资斧，用罄才索取粮饷”。7，拳民“称白莲教为邪教，自称不是邪白莲”。[11]

劳乃宣的说法既不足信，那么义和团的来源到底如何呢？戴玄之考察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后指出，义和团“由梅花拳而来，梅花拳由义和拳而来。至于义和拳，则来源于咸、同年间的乡团”。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每年梅花季节到处“亮拳”，乡民遂称之为梅花拳。光绪十三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发生以后，梅花拳“转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因受官府剿压，于光绪二十四年二三月间改梅花拳为义和团”。或称义合团，取朋友以“义合”之义。他进一步指出，义和团自称“得有神功，能避炮火，故又称‘神拳’或‘神团’”。[12]李守孔亦持义和团源于团练说。他指出：“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伐，扰及山东一带，鲁民团练自保，农暇习拳棒以自卫，初名梅花拳，后称义和拳，亦称大刀会，无知愚民乃凭藉以排外，对于西教尤其仇视。”[13]

庄吉发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档案加以研究后指出，义和拳之名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率众起事的王伦“传习白莲教，教人念诵咒语，教中又习练义和拳”。他还对梅花拳是由义和拳演变而来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就现存档案而言，梅花拳与义和拳同为秘密宗教各教派所传习，梅花拳的出现不一定晚于义和拳，乾隆年间已查获梅花拳及义和拳，彼此之间，不必认为是一直线的发展。”他认为，庚子事变时期的义和团是“包括习练红拳、梅花拳、神拳、义和拳的拳民及大刀会、义和门等各教派的群众，是下层社会各种组织的混合体，于是红拳、梅花拳、神拳、义和拳、大刀会和义和门教等一方面可以说是义和团的主要成员，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或别名。”[14]

邝兆江广泛参考了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探讨义和团的源流，“先要认清‘义和团’这个称谓的意思”，义和拳民并不都属于同一组织，“拳民组织之间又不一定互有统属关系，更谈不上有全盘行动的计划。因此从广

而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做了分析："总之，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如果没有列强要瓜分之祸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连年的天灾，纵令慈禧想尽方法来鼓励人民排外，也不必能达到目的，更不会那样波澜壮阔。"他特别强调慈禧对于庚子事变应负主要责任："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于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因此，庚子拳祸，万方有罪，罪在慈禧，因逢迎而获罪诸臣冤枉，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实不能辞其咎"。[27]

吴相湘亦持此观点，他指出："义和拳之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关节，亦慈禧政治生命史上祸国达于极峰之纪录，女主一念之差，几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其影响固尚及于今日。"[28]

李守孔着重考察了光绪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内在联系。他指出，戊戌政变后慈禧和守旧大臣图谋废黜光绪皇帝，因各国反对而罢，这使慈禧颇为恼火。己亥建储后，各国公使不肯入贺，慈禧更加仇视外人，乃有庚子年间清廷的"纵拳排外"之举。[29]

四、关于义和团的性质

义和团到底是秘密会社还是公开的组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如黄大受认为，"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的一种秘密会社，初名大刀会，由无智识的分子组成"。义和团"仇视教士，实行排外运动，一呼百应，很得民众的拥护"。[30]而戴玄之则认为，"义和拳不是秘密结社，而是以村、镇为单位的公开组织"，每一村或一镇为一

团，每一团均设有神坛，“其设神坛是公开的，乡民入团是公开的，习拳弄棒也是公开的”，所以义和团“不是劳乃宣氏所说为带革命性秘密结社的邪教，而是地方一种公开组织的乡团”。“是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乡团’”。[39]但是，由于无人统一领导，义和团逐渐发生了变化，“初为各乡镇自然结合，继为白莲八卦所渗入，末为顽固的王公大吏所利用，遂决堤横溃，贻害邦国”。就其宗旨而言，则由最初的防御盗贼变为反抗教士教民，进而屠杀教士教民，由保身保家变为保国，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是义和团的构成。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加入义和团，使义和团的构成变得极其复杂，好坏难辨，良莠难分。二是真团与假团。所谓真团，“就是乡团组织以村、镇为单位的义和团，其构成份子甚为单纯，皆系乡间善良农民”。所谓伪团，“是指变质后的义和团里的复杂份子而言，包括王公大臣、土豪劣绅、散兵游勇、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富豪、武生、兵丁、太监、会匪、土匪、人贩、盐枭、马贼、偷儿、乞丐、少女、少妇、寡妇、老太婆、宫女、娼妓、鸨母等等”。他们不是为了保卫身家，防御盗贼，更不是为了仇教反外，保国卫民，而是“托名团民，以资掩护，乘机为非作歹，达其私欲”。三是会党的活动。戴玄之把会党（主要是大刀会、白莲教和八卦教等）与义和团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当时的许多匿名揭帖是会党而非真正的义和团散布的。[40]

五、关于东南互保

台湾学者对东南互保多持肯定态度，如王尔敏认为，“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41]戴玄之指出：“庚子拳乱，实近代史上一大奇迹，由于东南互保，始使风雨飘摇的

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28]吴文星则对东南互保作了这样的定性："东南互保订约运动的倡行，是当时上海中外官绅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焜、福开森(J. C. Ferguson)、汪康年、赵凤昌等在盛宣怀的领导下，欲使张(之洞)、刘(坤一)等以实力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诺保护教堂，拒阻洋兵人侵东南各省之作为合理合法化的活动。"[29]

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有谓首倡于李鸿章者，有谓首倡于张之洞者，有谓首倡于张之洞、刘坤一者。戴玄之辨析有关史料后指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是盛宣怀。他说，"考保护东南章程之发端与订定，皆由于盛宣怀之倡导与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仅是采纳其建议，出名行事而已"，而李鸿章则没有参与东南互保条约。戴对盛宣怀称赞有加，说盛"精明干练，聪明机智，眼光远大，思虑周密，凡所策划，动关大计"，"以北方业经糜烂，东南如再有事，国家危亡即在旦夕，乃建议刘、张两督与外人订立……互保东南之约，并受命襄助谈判，东南各省赖此以安"。[30]

林世明不同意此说，他认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是英国政府。戴玄之谓，庚子年五月，英国政府曾电令英领事转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英国打算派海军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时盛宣怀在沪，知英人名为帮助弹压土匪，实则欲达其出兵长江之诡计；果尔，则各国效尤，大势去矣。补救之法，唯'自认保护，勿任干预'。遂于廿四日(六月廿日)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云：'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明……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31]对此，林世明指出："早在光绪廿六年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上海英国总领事霍必澜(Pelham L. Warren)即已电告英国外相沙利斯堡(Lord Salisbury，时兼首相)，建议英国政府若与北方清廷中枢决裂，则应立即采取措施与湖广两江总督

取得谅解，以维持当地之和平及避免所能引起的重大损失”。“由此可知，东南互保运动早在盛宣怀‘推动’前（即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四日前），即已有台议。根据现有资料记载，知盛宣怀、余联沅于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建议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前，即已与各国领事有初步的谅解。故东南互保运动其实为英国政府所发轫者也。”[⑯]

林世明还分析了英国首先倡议东南互保的原因。从中国方面来说，东南两江、两湖地区是英国在华利益最多的地域，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最深惧列强借机伸展势力入长江地区，若长江地区一旦发生变乱，不仅英国在该地独占利益将受严重打击，而其他各国势必借口要求派兵入驻，以保护侨民之安全，则英人势难维持在此一地区之独占势力”。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英国正在南非进行布尔战争，在列强中较为孤立，“在东方势必无法大有作为”。[⑰]

王尔敏考察了东南互保的发起、订约和具体的实施过程，还对东南互保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1，南方的社会组织多为会党，“其宗教性质不及北方的教团深厚”，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会党以人为本，教团以神为本，会党尚忠义，教团尚迷信，会党靠自身实力，教团靠巫术符咒，会党组织严密，“其原始带有反清的政治色彩”，教团组织松散，源于白莲教，“没有固定的政治色彩”。由于两者“本质不合，彼此不相谋，故不至于一时勾结而成巨患”。此外，刘坤一在互保条约签订之后，招安江南最大的会党首领徐宝山及其会众，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安全。2，由于利益攸关，列强互相牵制，“彼此监视”，“谁也不敢遽为戎首”，向南方进兵。此外，由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列强在此次事变中未存领土野心。3，南方各省督抚，尤其是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三人起了重要作用。4，互保条约的订立，对中外双方都是一个约束，“在后来的运用上，则是南省应付外人的良好武器”，而“外人则在相对义务上，不得不严格地履行条约，避免负不义之名”。

王尔敏还对东南互保的意义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东南互保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创举"，保约的订立是"良好的外交成就"。对东南各省而言，"这次的保约，地方上获得完整无缺，避免了兵祸，保全了民命"。对清政府而言，全国第一的东南"财赋"得以保全，尤其重要。此外，"南省的自保，对于后日议和，以及索还东北，在外交上增强不少力量"。[14]

在一片褒扬声中，林世明对东南互保的评价要冷静得多。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而言是一大悲剧，而东南互保运动乃于此悲剧下，基于中外两方需要的一种产物，严格来说，乃一种分裂运动，绝非光荣体面情事，故绝无必要予以刻意赞褒"。他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从国内法的观点来看，"东南互保运动在法理上是不巩固的，一国之中央政府对外国宣战，而地方政府竟擅自宣称中立，此举且竟出自深受儒家忠君思想观念影响之东南疆臣如刘、张、袁及盛宣怀等，更是匪夷所思"。再就国际法的观点而论，"古代人臣无外交，地方政府订约是违法的。揆以中外惯例，要代表国家元首或特别经授权之代表，对外方有缔约之权"，而促成东南互保的中外双方都"欠缺缔约足够的合法条件"。他在力指其非的同时，也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东南因此而免于糜烂，影响国家甚钜，故亦无所谓贬毁。习史者当须明了事实真相，记取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错"。[15]

吴文星考察了日本与东南互保的关系。当义和团在北方大兴以后，日本朝野有不少人主张乘机扩大日本在中国南方的势力范围，甚至有人提出扶持亲日派在南方成立新政府。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时向日本政府提出应对之策。盛宣怀有了东南互保的设想后，首先征得了小田切的赞同与支持。小田切积极推动互保条约早日签订，但日本政府坚持与各国共同行动的原则立场，"不抢先支持互保订约"，目的在于"获得各国的信任，由是而减低中外对于日本的防范"。互保条

约签订后，日本曾以厦门一所日本教堂被焚毁为借口出兵厦门，但因其他列强的反对而撤回。他的结论为："综观此一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南地区之政策，无非是利用东南疆吏力维秩序保护外人的态度，以及各国间相互制衡的状况，保障其在东南地区的利权。同时乘着各国专意于华北之际，企图扩张其在华南的势力范围，阴谋攫夺有利的地点，以为扩张势力范围的根据地。"[65]

六、关于列强对华政策

张水木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因干涉还辽有功，向清廷索取天津、汉口两租界，1897 年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攫夺山东省的利权，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运动发生之时，正是德国帝国主义继续在华扩张之际，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被杀为德国奉行极其强硬的对华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德国一面派军队侵华"肆行蛮横报复，一面乘势严苛勒索，藉以强化在华势力，故不但清廷文物横遭掠夺破坏，华人生命财产备受残酷侵害，而且蓄意以严惩祸首及高额赔款等条件阻扰和议，更进而处心积虑图谋瓜分中国，其野心之大实当时各国所望尘莫及"[66]。

吴文星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一跃而成为远东的强国，其"军国主义益发得势，资本主义急剧地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为其推行向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借口。日本政府对出兵中国虽有急进（以青木周藏为代表）和稳健（以山县有朋、桂太郎等为代表）两派之别，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青木周藏认为义和团事变是日本参与"世界历史、世界事业"的良机，桂太郎则视之为"掌握亚洲霸权的开端"。当出兵中国的决定正式做出后，日本政府内部又出现了"少量出兵论"和"大量出兵论"的争执。由于形势的变化和

英、美等国的鼓动，“大量出兵论”占据上风，日本遂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主力军。战后，日本在列强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与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乃有英日同盟之成立，远东国际局势由是又为之一变”[⑧]。

张忠栋对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对华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指出，美国在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两次发表门户开放宣言，奉行门户开放政策，“除了希望得到均等的商业机会之外，还要求各国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庚子拳乱期间，美国一度参加联军攻入北京，那是为了解救受困的美国外交人员。乱定后，美军迅速撤退，并且在辛丑议和期间替中国主持了不少公道”[⑨]。

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军对东北的侵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郭廷以在《帝俄侵略中国简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简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帝俄借机强占我国东三省的史事，以及中俄间关于东三省问题的交涉经过。

杨绍震著文指出，俄国对东三省的经营，主要由财政大臣威特主持，“其所采取之方法，以和平的政策，发展工商业，以经济势力并吞东三省”。义和团运动波及东三省后，俄军乃借口镇压义和团，大举入侵东三省，其“进行之路线，可分为五：第一路，由中东路线之北端，自呼伦贝尔越西兴安岭而南下。第二路，由海兰泡（Blagoveshensk）渡黑龙江攻瑷珲，越东兴安岭，经墨尔根（嫩江）而趋齐齐哈尔。第三路，由伯力（Khabarovsk）附近溯松花江而上，经依兰（三姓）而趋哈尔滨。第四路，为驻海参崴之俄军，攻珲春、宁古塔而趋吉林。第五路，由旅顺而攻奉天，经营口、辽阳而进沈阳”。他在文中还对中俄东三省撤兵交涉的历程做了考察。他把这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1年1月1日至4月6日）的交涉在俄国首都进行，中国方面的主导人物为李鸿章，负责具体谈判者是杨儒，俄方的主导人物是威特，因俄方所提要求非常苛刻，在各方反对下，交涉未有结果；第二阶段（1901年9月至11

月7日)的交涉移至北京进行,中方仍由李鸿章主持,他不顾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反对,力主与俄单独谈判东三省问题,并与俄代表达成了协议,准备签字。11月7日李鸿章病亡,"一切都完了"。第三阶段(1901年11月7日至1902年4月8日)的交涉由庆亲王奕劻和王文韶主持,在中国国内舆论的反对声中,在其他列强的压力之下(包括1902年1月结成的英日同盟),俄国不得不有所收敛,放弃原来提出的诸多无理要求,中俄关于东三省的交涉遂顺利结束。作者认为,除其他因素外,直接给予威特谋夺东三省的计划"以重大打击者,则有二事:第一为李鸿章之死,使威特在中国失去其拥护者。第二为英日同盟之成立,远东对俄阵线完成,使俄国不得不退让"[40]。黄俊彦亦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对中俄交涉的完成起了推动作用:"中俄交涉谈判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莫过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俄国之所以让步,主要由于英、日、美之干涉。中俄东三省撤兵协定之所以能够成立,俄之所以甘心放弃银行协定,无非是英日同盟的影响"。俄国坚持在撤兵协定中保留撤兵条件,埋下了日后毁约不撤兵的伏笔,最后导致了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就远东国际政治关系而论,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年中俄东三省撤兵交涉未始不是由中俄冲突转变为日俄冲突的过渡阶段,而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则为此阶段的分水岭"[41]。

七、关于庚子赔款

王树槐的专著《庚子赔款》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题为"庚子赔款的议定",主要考察列强确立赔款原则,商定赔款总数和各国所占比例,厘订赔偿章程,确定赔付方式、利息和年限等的复杂过程。关于赔款总额,美国曾于1901年1月提出中国财力只能偿付202156334海关两,但遭到德、俄等国的坚决反对,美国遂增加数额,提出以4000万英镑(合

266666666 海关两)为限。此议再次遭到列强的反对。1901 年 5 月 7 日,各国公使开会议定向中国要索 6750 万英镑(合 450000000 海关两)。关于偿付方式,不外以下四种:(1)中国政府一次付清;(2)借款,由中国自行担保;(3)借款,由各国担保;(4)中国发行债券,分年支付本息。前两种方式根本不可行,列强所争论者为后两种方式,赞成第三种方式者有俄、法、日、德等国,赞成第四种方式者有英、美等国。争论结果,列强议定采取第四种方式。作者认为:"此法最易行,对中国亦最有利。"第二章题为"中国的筹措","分为两部分讨论:一为当时士大夫的议论,讨论如何应付此次巨额的赔偿;一为实际的筹措"。关于如何筹措赔款,中外臣工提出了 17 项建议,"属于加强旧有之捐税者七项:计亩捐、丁捐、房捐、契税、膏捐、关税、捐输。欲新设捐税者有二项:计印花税、公债。欲行新法或建新事业而增国库收益者有六项:设银行、发钞票、饬圜法、办保险、广邮政、开矿。整顿节流者有二项:整顿课厘、裁减营勇"。而清廷为稳妥起见,没有采用大臣们提出的新法新税。第三章题为"偿付的波折",主要考察在偿付庚子赔款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还金还银之争,民国初年庚款的缓付和停付等。第四章题为"各国的退还",详细考察了民国时期各国退还庚款的具体情况和所退款项的使用情况,并对轰动一时的金法郎案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订。[40]

庚子赔款赔付期自 1901 年起,至 1938 年止,共计 38 年,清季只占 11 年,民国时期却占 27 年。王树槐研究了民国时期庚款的退还、停付和缓付等情况,具体分析了各国退还、缓收或放弃庚款的原因。他指出,由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付德、奥庚款,缓付协约国 5 年庚款,加上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放弃庚款,所以 1923 年以前"中国实际付出之庚款,约为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自 1923 起,中国恢复支付庚款,到 1938 年底停止,此阶段所付的庚款,"大致皆为各国所退还。连同德、奥、俄庚款合计,按原

赔偿表海关两本利计算”，共约 5 亿多两，其中用于行政者约占 56.78%，用于教育文化者约占 12.09%，用于实业者约占 10.74%，挪用者约占 18.88%。[43]

王树槐注意到，除 4 亿 5 千万两银子的“大赔款”外，还有许多地方赔款，即“由领事、教士、教民与地方官绅调查协商所议定的赔偿”。他根据有关史料对各地的赔款额做了初步统计，共达 22272908 两银子（私自议结者、未见于资料者、定额以外者、偿以土地者未计算在内），其中教会的损失多包括在“大赔款”之内，教民的损失多由地方赔付，地方实际偿付数额至少为 16873000 两。这笔巨款的来源“不外两途：一为民付，以摊派方式筹足付赔；一为官付，由司库挪用他款支付。官款亦系向百姓搜刮而来，最后仍不外加重百姓的负担”。[44]

王树槐认为，除庚子赔款外，八国联军在华北各地抢掠的金银财物也“无法估计”，是“庚子赔款之外的又一章”。他撰文对各国军队的军纪做了比较，对联军抢劫的方式、抢劫的对象和数量、赃物的处理等问题做了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联军在华的抢掠，“就现金而言，有确实数目者，官方失银约六、七百万两，制钱数百万串。民间损失更是无算。就物质而言，官方损失食米七万石，民间损失牛羊马鸡鸭鱼肉水果蔬菜，不计其数。至于珠宝文物等的损失，无从估量”。[45]

八、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也有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如李定一认为，义和团运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影响极其深远：第一，列强认定义和团运动是“野蛮”运动，“断定中华民族是半野蛮民族”，世界各国对中华民族的观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满

清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民众汇合而成的力量"的彻底失败,这使民族自信心几近丧失,而"民族自信心丧失的结果,使国民逐渐养成媚外的心理"。第三,东南互保之举事后非但没有受到清廷的责备,相关的督抚反被誉为"老成谋国",使得各省督抚的权力更加膨胀,"形成半独立局面,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政治,都有影响"。第四,清政府的"愚昧无识"在运动中表露无遗,从此以后,"凡属有志救国之士,莫不对满清政府表示绝望,一齐走上革命的道路,使革命运动平添了许多生力军"。第五,俄军进占东北,激成英日同盟的缔结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东亚国际形势为之大变,"而中国东北亦从此成为世界的火药库"。[46]

沈忱农也撰文指出,洋人在庚子事变中获得"无比的胜利和权益",由此对中国产生鄙视,对中国人"不是采取可鄙的态度就是采取可怜的态度"。而中国知识分子经过庚子事变以后,"真正认识了西洋力量的'伟大',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那一方面中国实在'落后'太多,因而发生了自卑感,一切都盲目去学习西洋,以致失去了立国的基本自信心"。[47]

关于庚子事变对国人心理的影响,李定一和沈忱农的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如有论者指出:"庚子事变,为中国人民不堪外人之压迫,而群起反抗的民族排外运动,故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其行为虽愚,然其爱国精神可嘉。但经此事变,我全部屈服,其影响最大者厥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由上国天朝沦为次殖民地;由自尊自大,一变而为惧外媚外。"[48]吕士朋也认为,庚子事变的严重后果,使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渐养成惧外媚外的心理,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日后中国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都一味摹仿西洋或东洋,对本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背景不加考虑,以致造成许多削足适履的现象,都是这种心理在作祟。"[49]也有学者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待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如邝兆江认为,"义和团事件标志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一个

时期的结束。一九〇一年签订的辛丑和约第十二款，即把总理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在列强迫使下，清廷对外措置进入了另一阶段。"[50]

沈忱农还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观察了义和团运动对广大农民的深远影响。他指出，经过庚子事变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迫接受西洋的文化，但是这种情形不能普遍深入到中国农村"，所以数十年来"在中国国内表现的是都市和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前者"全力模仿西洋"，后者则"故步自封，囿限于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道德的生活范围以内，所谓'拳匪思想'仍若隐若现的存在于广大群众心中，随时有发泄的可能"。[51]

九、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台湾近代史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和出版较为重视，数十年来整理出版的近代档案和影印的近代官书和私人著述卷帙浩繁，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史料数量也不少，其中较重要者有：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共26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1963－1965年印行）。

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从故宫带走了大批档案，后加以整理出版，供学者们使用，此书即是其中的一种。宫中档是臣工奏陈及皇帝硃批原件，史料价值较高。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共7辑21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4－1981年印行）。

此书系根据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的教务教案部分编纂而成，上起咸丰十年（1860年），下迄宣统三年（1911年），内容包

括诏谕、奏疏、函札、照会、咨文、条规、告示等，分为通行教务、京师教务、直隶教务、山东教务、山西教务、河南教务、江苏教务、安徽教务、江西教务、湖北教务、湖南教务、四川教务、浙江教务、福建教务、广东教务、广西教务、云南教务、贵州教务、陕西教务、甘肃教务、新疆教务、奉天教务、吉林教务、黑龙江教务等大类。其中第6辑第3册和第7辑第1册辑录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史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影印和出版的近人撰著书籍主要有：

台湾学生书局——伍铨萃：《北游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七年四月）》（1966年）；高枏：《庚子记事》（1976年）。

文海出版社——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1966年）；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第5辑（46）（1966年）；龙顾山人：《庚子诗鉴》、陆睦：《拳变系日要录》，"丛刊"第34辑（335－336）（1966年）；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陈捷：《义和团运动史》，"丛刊"第65辑（643－644）（年份不详）；陈贻先、陈泠汰译：《庚子使馆被围记》，"丛刊"第74辑（732）（年份不详）；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丛刊"第74辑（733）（年份不详）；佐原笃介和沤隐：《拳匪纪事》，"丛刊"第83辑（822）（年份不详）；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丛刊"第83辑（823）（年份不详）；高绍陈：《永清庚辛纪略》，"丛刊"第83辑（824），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祝芾：《庚子教案函牍》，"丛刊"第83辑（825）（年份不详）。林学瑊辑：《直东剿匪电存》，"丛刊"第83辑（826）（年份不详）；咏楼主人编：《西巡回銮始末记》，"丛刊"第83辑（827）（年份不详）；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以下简称"丛刊续编"）第13辑（127）（1975年）；《义和团档案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361）（1977年）；劳乃宣辑，蒋楷、刘春堂撰：《奉禁义和拳汇录 平原拳匪纪略 畿南济变纪略》，"丛刊续编"第37辑（362－

4)(1977 年);白曾焯著、左舜生辑:《庚辛提牢笔记 庚子拳乱资料》,"丛刊续编"第 37 辑(365 - 366)(1977 年);王守恂:《庚子京师褒恤录》,"丛刊续编"第 37 辑(367)(1977 年);也愚:《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 18 辑(1986 年)。

鼎文书局——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义和团文献汇编》(1973 年)。广文书局——罗惇曧:《庚子国变记》(1966 年);唐晏:《庚子西行记》(1967 年);国风出版社——《拳案三种》(1970 年);程宗裕:《教案奏议汇编》(1970 年)。

综观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特点:(1)投入力量少,研究成果少。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的最初一二十年,台湾学术界在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风气不盛,大部分学者都是以教学为主,研究为副。就中国近代史而言,许多学者的兴趣都在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和现代化运动等大课题,对义和团运动较少关注,只是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戴玄之发表系列文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后经补充整理,出版专著《义和团研究》,曾在台湾近代史学界引起过一阵涟漪,但随即复归平稳。70 年代以后,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日渐增多,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学术讨论会日见频繁,学术批评的风气日益浓厚,学术研究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但学者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趣不升反降。80 年代以后,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成果更见稀少。就笔者查到的资料看,1953 年至 1992 年来台湾各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共有博士论文 50 篇,硕士论文 550 篇,其中没有一篇以义和团运动为题的博士论文,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硕士论文也不多。[69](2)专题研究多于综合性研究。就笔者所知,综合性研究只有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而且这部著作是在作者一系列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专题研究著作如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林世明的《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专题论文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尽管其中的一些观点可能不

为我们所接受。(3)以个体研究为主,鲜见集体性项目。大陆的义和团研究多有两人以上的集体项目,而台湾则鲜见这种情况,即使像《庚子赔款》那样的大部头著作,也是由王树槐先生一人完成的。

在资料方面,台湾学者在挖掘台湾所存档案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大陆出版的各种史料的使用,但对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搜集的口述史资料的重要性似乎认识不足。尽管这些资料是在特殊的年代搜集的,可能带有较深的时代烙印,对其可信度有所影响,但只要认真辨析,谨慎对待,仍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研究堪称典范,他们谨慎地使用这些口述史资料,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释

① 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年版,第6-7页。

② 李定一:《中国近代史》,台北,1953年,第205页。

③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 - foreignism, 1860 - 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④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 -18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16辑),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年版,第3-4页.

⑤《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 -1870)》,第201页。

⑥ 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的检讨》,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版。第293页。吕实强的相关论文还有:《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1860- -189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第4期上册，台北，1973年；《晚清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义理的辟斥》，《师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2期；《晚清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师大历史学报》1975年第3期。

⑦ 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页。

⑧ 何健民：《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58年版，第288页。

⑨ 王尔敏：《拳变时期南省自保(下)》，《大陆杂志》第25卷第6期，1962年9月30日。

⑩ 李定一：《中国近代史》，第213、214页。

⑪ 戴玄之：《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考》，《大陆杂志》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

⑫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第10、16页。(此书分别于1967年和1993年再版)

⑬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版，第144页。

⑭ 庄吉发：《清代义和拳源流考》，《大陆杂志》第65卷第6期，1982年12月。

⑮ 邱兆江：《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几点初步观察》，《大陆杂志》第70卷第2期，1985年2月。

⑯ 李守孔：《清季山东之教案与拳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34页。

⑰ 《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第14页。

⑱ 何健民：《中国近代史》，第286－288页。

⑲ 沈忱农：《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上)(下)，《反攻》第169、170期，1956年12月。

⑳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98、99页。

㉑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第70、71页。

㉒ 《清德宗实录的正本》，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㉓ 李守孔：《光绪己亥建储与庚子兵衅》，《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69页。

㉔ 黄大受:《中国近代现代史》,台北,1960年,第214页。
㉕ 戴玄之:《义和团的本质》,《大陆杂志》第24卷第1期,1962年1月。
㉖ 戴玄之:《义和团的变质》(上、下),《大陆杂志》第26卷第11、12期,1963年6月15、30日。
㉗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上),《大陆杂志》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15日。
㉘ 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175页。
㉙ 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239页。
㉚ 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177、179、188页。
㉛ 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177页。
㉜ 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㉝《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第54页。
㉞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下),《大陆杂志》第25卷第6期,1962年9月30日。
㉟《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第125－126、134页。
㊱ 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253页。
㊲ 张水木:《德国与庚子拳乱》,《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115页。
㊳ 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出兵华北》,《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193－227页。
㊴ 张忠栋:《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反应(1899－1906)》,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4)·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6页。
㊵ 杨绍震:《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束》,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5)·清季对外交涉(二)俄

日》，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583－635 页。

㊶ 黄俊彦：《拳乱后中俄交收东三省问题(1900－1902)》，《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5)·清季对外交涉(二)俄日》，第 683 页。

㊷ 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31 辑)，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1974 年版。

㊸ 王树槐：《民国时期的庚子赔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 383—397 页。

㊹ 王树槐：《庚子地方赔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 335—382 页。

㊺ 王树槐：《拳乱期间联军的抢掠行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第 263、280 页。

㊻ 李定一：《中国近代史》，第 217－219 页。

㊼ 沈忱农：《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下)，《反攻》第 170 期，1956 年 12 月。

㊽ 中国近代史教学研讨会：《中国近代史》，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6 年，第 287 页。

㊾ 吕士朋编著：《中国近代史》，台北，世界书局 1985 年版，第 190 页。

㊿ 邝兆江：《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几点初步观察》，《大陆杂志》第 17 卷第 2 期，1985 年 2 月。

(51) 沈忱农：《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下)，《反攻》第 170 期，1956 年 12 月。台湾大学 班一鲁：《拳乱前后袁世凯的处变》(指导教授李守孔)，1972 年 6 月；东海大学 林松友：《张之洞在拳乱期间之地位》(指导教授吕士朋)，1978 年 4 月；文化大学 曹中平：《清季直隶教务与拳乱》(指导教授李守孔)，1980 年 7 月；政治大学 陈德汉：《山东义和团之研究》(指导教授戴玄之)，1986 年 6 月。

西方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德]R.G.狄德满

对普通西方人来说,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抵制进步史中一个业已被淡忘了的事件;而对人民中国的史学家们来说,它是中国农民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英勇抵抗……

——V.珀塞尔[①]

在整个19世纪,西方各国对中国最多只是略有些许关注。然而在1900年之夏,中国突然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诚然,在义和团起义[②]发生期间和发生之后不久,就曾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大量的出版物,从许多方面对这次起义进行描述。在那以后,这个著名事件也一直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然而,很少有人关注过规模更为宏大、但人们却知之甚少的义和团运动。尽管如此,学术界和通俗文学界从一开始就提出并一直在讨论着许多问题:1.义和团组织是一支受官方支持的乡团,还是一个与早前有着相似名称的结社有着组织联系的非法的异端教派?2.义和团运动是亲清王朝还是反清王朝的?3.它是否主要是一个反帝、反教会或反基督教的运动?4.诸如"扶清灭洋"之类的口号是由义和团自己首先提出的,还是先由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精英们提出的?5.它是

一场灾祸，还是一场英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6.这一运动是一场农民运动还是非农民运动？7.义和团的前辈组织（大刀会和梅花拳）后来是否参与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义和团运动？8.由清王朝的衰败、自然灾害和人口压力引起的内部社会－经济失序，以及外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侵入带来的外部压力，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评价有关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学术研究，但在对学术成果做详细研究之前，笔者将先简要谈谈当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留下的大量文字记载，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版的通俗历史书籍。一般性报道主要对公使馆被围时的情形和联军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描述，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则侧重于讨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但是，无论是在当时人的通俗性文章中，还是在以后的学术文献中，事件的余波（例如辛丑条约和赔款的影响）几乎都没有受到关注。

当时的报道和事后的回忆

许多义和团事件的西方当事人都留下了有关其亲身经历的文字记录，这些材料大都是在起义发生期间和在1900年的不幸事件发生后不久出版的。可以想见，有关京津两地围困事件的报道在报刊杂志上成为了醒目的特写。包括个人回忆录和某支外国部队作战史在内的大量出版物记载了外国的军事干涉行动，而劫后余生的传教士们则提供了中国内地反基督教暴行的详细描述。这些作品是在一个极其危急的时期写成的，因此所表达的大都是充满敌意的观点，不仅是对义和团充满了敌意，而且还包括一般的中国人。另外，义和团事件恰恰发生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高潮时期和西方国家对"黄祸"的莫名恐惧之时，各大报刊上刊登的有关围困使馆和攻击传教士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更加剧了对中国的敌对情

绪。但是认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西方"观点,也是错误的。外国列强代表之间互相猜疑,各职业集团(传教士、官员、记者、军人)的观点存有分歧,甚至在各职业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在华传教士在惩凶和赔款问题上,就曾长期争论不休[③]。由于这类文献为数甚巨,并且良莠不齐,这里只能提及其中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出版物[④]。

一些卸任的外国外交官连篇累牍地撰文,谈论义和团时期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巴兰德和田贝。尽管不能说他们握有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内部情报,但他们对外交问题的评论为舆论提供了信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影响了国内政府政策的制订。他们曾告诫获胜的联军不要对中国施以严厉的惩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更是在许多文章中,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进行了较为积极肯定的描写。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⑤]。

一些西方亲历者对1900年发生的事件持有较为公正的看法,如奥地利使馆秘书纳色恩和妻子波拉[⑥]。还有一些人谴责了外国人的行为。G.林奇[⑦]和W.张伯伦[⑧]等记者对占领北京后在直隶进行的抢劫和不加选择的惩罚性征讨表示痛惜。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法国作家兼军人绿蒂在由北京寄给《费加罗报》的信中,描绘了一幅联军士兵对无辜的中国人施以无理暴行的可怕画图[⑨]。还有人对传教士卷入"抢掠"和武力征收赔款的行为提出了批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⑩]就是其中一位。"传教士问题"确实成了西方各家报刊的一个主要话题,人们指责传教士把外国宗教和文化强加给一个古老文明,从而引发了这场战火。在德国,这一争论还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交锋,新教徒作者们立即谴责山东南部的天主教主教安治泰应为义和团的兴起负责[⑪]。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和评论家们的攻击对象不只是传教士,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行为。

有关1900年危机的各种评论浩如烟海,但令人感到奇怪的

是,只有少数几个评论家愿意去剖视义和团运动的内部情形。外国传教士在内地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多,他们本该对义和团活动的

过的劳乃宣有关义和团与白莲教联系的评述，又再次得以出现[17]。

西方作者对义和团和其它非基督教徒的命运缺乏兴趣，这或许并不太奇怪，但有关中国基督教徒经历的报道，相对说来也较为罕见。能提供一些有关基督教徒生死情况的是殉教者传记集。在新教方面，E.爱德华兹有关山西省的恐怖、受难和殉教情况的记载中提到了中国基督教徒[18]。麦美德专门以中国基督教徒为内容写了两本书[19]。罗马天主教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根据好几个代牧区幸存的目击者的证词，痛苦地重建了数千名中国基督教徒的殉教情形[20]。这些殉教者传记提供了有关基督教皈依者个人及其教会团体的重要史实，是很重要的资料来源，但它们一直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研究。

有关义和团事件的通俗性历史著作

这些年里出版了许多有关义和团事件的通俗性历史著作。这些描述性的著作大多以前面提到的西方资料为依据，但也有一些著作借助了原始资料（如某些参加者的日记和信件）。其中多数著作以北京使馆被围和西方军队的战斗为中心内容，其目的不仅仅是表达历史知识，而且还想为一般读者提供娱乐。这类著作主要有以下几部：

P.弗莱明：《北京的围困》

C.马丁：《义和团起义》

R.奥康纳：《精神战士：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表述》

E.奇瑟：《中国的觉醒：义和团运动》

A.格里戈利扬茨：《1900年北京之围：义和团攻打西方人》

H.基翁－博伊德：《1900年义和团运动史》

D.普雷斯顿：《被围在北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学术文献——历史性考察

当时人撰写的大量西文文献主要记载了1900年和义和团起义之后不久发生的那些事件，因为它们影响并涉及到外国人。比如攻击传教士、包围使馆、外国军队的武装干涉、强迫赔款等。与之相反，自那以来的学术研究重点大都集中在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上。然而，从欧洲中心研究观到中国中心研究观的变化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在最初的50年里，西方人对义和团事件进行实质性的学术研究，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到了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致力于研究一些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和发展方面的复杂问题。这种变化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49年以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开始更多地去接触原始资料。较为丰富的档案资料也推动着义和团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义和团起义发生的广阔背景之中，如华北长期以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化，传教活动，以及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和影响。

考虑到在学术研究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本文这一部分分为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两节。1949年以前，当外国帝国主义还是一个支配性力量时，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把义和团视为一种反面的、缺乏长久意义的现象。而1949年以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方学者开始用一种比较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们，认识到1900年发生的事件对现代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不过，西方这种较为肯定的评价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在1949年后的高度。在那里，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方面的考虑，义和团被提高到了农民反帝斗士的地位。

（一）1949年以前的义和团研究

1915年出版了P.克莱门兹的一部书，一年以后，他以这部书

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这是有关义和团事件的第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如书名所示，这部著作的重心是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和外交问题。全书有大约一半的篇幅论述秩序的恢复和有关《辛丑条约》的谈判。关于义和团事件，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争夺租借地"、百日维新和传教士的干涉，同时黄河泛滥和对日赔款的负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到1899年下半年，"义和拳"和"大刀会"联合起来，"出现了大量的骚乱、抢掠和杀戮"。但有关叙述相当粗略。当然，应当指出，克莱门兹没有查阅档案资料的机会，主要资料依据公开出版的英国议会文件，其次是美国的《对外关系》，另外还参考了明恩溥《动乱的中国》一书。

施达格的专著[2]涉及面与克莱门兹相似，但他用了更多的笔墨来论述义和团的起源和发展。他对劳乃宣有关义和团起源于反清的白莲教和八卦教的断言持否定态度，说它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首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信奉异端教义并且有着革命目标的秘密结社会会有意地发起一场仇视基督教会的激烈斗争，从而招致官方对其采取行动，引起外国使节们的不满。这种做法与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秘密会社的一贯行为方式截然相反，在这个国家也是史无前例的[3]。

施达格认为，义和团是乡团一类民兵武装，也就是说，它是忠于清朝的半官方组织，决不可能反对朝廷。对"义和拳"和"义和团"同时出现在资料中这一事实，他解释说，前者是反对义和团的人使用的名称，而"团"则是同情这场运动的人使用的名称。

"义和团"是完全合法和惯常的地方防卫组织，并在1898年11月5日以后得到多道特别谕令的明确批准和鼓励。

不幸的是，官方对这种武装自卫精神的鼓励导致了不良的结果，而这在中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军队习惯于从土匪、走私犯和其它社会不安定分子中间征兵，而义和团很早

就明显表现出吸收亡命之徒和无所事事者入伙的倾向[24]。

施达格认为，义和团所吸收的最重要的"未经批准的"组织是大刀会。但这一说法以传教士的资料为根据，多少有些令人怀疑。不过应当指出，作者在进行这一研究时，中西文原始资料的利用都还受到限制。无论如何，后来的西方研究者已经摒弃了他的"乡团论"。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47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25]的主要兴趣是要弄清义和团为什么能和官方合谋。既然人们认为义和团没有能力组织这场运动，那么它又是如何能够"从山东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发展成蔓延直隶和山西的浪潮，然后又将整个国家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该发生的同西方列强的战争呢"[26]？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各自受到不同的因素组合的驱动作用，尽管外国侵略可能是对所有阶层都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但宫廷成员、士绅官吏和一般民众对它的反应却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官绅阶层是一个关键性群体，因为它有助于将民众的普遍不满集中起来，而把传教士和外国侵略同等看待的也正是这些官绅们。义和团正是能够利用了中国社会这三个主要部分压抑已久的巨大仇恨，才有可能在没有组织或者训练有素的领导人的情况下，在华北掀起了义和团主义的浪潮[27]。"给予义和团实质性的领导和支持，使其从原先相对微不足道的状况发展成1900年时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最早是李秉衡和毓贤二人，然后横向发展到一些省级官员，向上发展到朝廷内的王公大臣"[28]。然而，R.希克斯向施达格的"乡团说"提出了挑战。"乡团说"认为义和团是在朝廷的明确命令下出现的防卫组织，而R.希克斯则认为，对义和团的支持"来自朝廷中一部分人数有限但地位重要的王公大臣"，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894年被封为端王的载漪[29]。有一些省级官员支持义和团，但也有官员反对这一运动，或者持中立态度。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也并非是反清的秘密结社斗争目标的改变，而

是在八卦教、大刀会、义和拳一类组织下开展反外斗争的农民不满情绪的表达。这些组织深得人心的反抗活动拨动了各级官员反外思想的琴弦[49]。

(二)1949－1979 年期间的义和团研究

1949 年以后,由于能够利用到更多的西方档案资料和中国出版的资料集,西方学者现在得以提出了更加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谭春霖 1955 年出版的著作以大量的中文资料为依据,从中国内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对义和团运动做了严肃的论述[50]。同时,他还否定了施达格的"乡团论",不过他也没有充分支持义和团与民间教派有联系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义和团"开始时是自发的组织,……但很可能有秘密结社在幕后操纵"[51]。

秘密教派起源说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西方学者的研究重心较为密切地集中在宗教问题上,而这正是 50 年代的中国学者有所忽视的问题。西方学者主要依据了当时新出版的中文资料丛刊[52]。法国学者 G.邓斯泰梅是第一位利用并对这些新近接触到的资料进行分析的西方人。[53]在其原计划撰写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里,邓斯泰梅考察了日本作者佐原笃介著作的摘要,尤其是题为《拳事杂记》的节选。它最早收入在佐原 1901 年出版的 6 卷的《拳匪纪事》中。在极力否定乡团说的同时,邓斯泰梅发现义和团并没有系统的宗教体系,相反,他们的法术性宗教信仰由演练刀枪不入的仪式、降神附体以及"拳术"本身构成。法术活动的确是鼓舞战斗力的重要刺激因素。他似乎认为,尽管不能确凿无疑地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的义和团与 19 世纪初的拳术团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但在一贯道首领王觉一的活动中可能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据认为,王觉一于 1884 年去世于天津附近的杨柳青。

后来,在 1964 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邓斯泰梅把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出现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献介绍给法国读者，并且进行了评论[35]。针对施达格的乡团说，邓斯泰梅指出，“团”不一定就意味着“乡团”，它也可能表示团社、团伙以及其他由中国农村地位的边缘人和流民组成的集团[36]。然后，他又提出了义和团研究中的两个疑难问题：(1)义和团和朝廷之间的合作是什么性质？(2)有关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期的1895－1899年的情况，存在有什么样的文献？邓斯泰梅指出，现有的材料使我们有条件去探究朝廷对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态度的变化，探究它从传统的敌视政策转变为与义和团相互串通、最后又进而发展成为同盟的过程。尤其是青岛被占以后，清政府内部逐渐产生了抵抗西方的倾向。例如，1899年3月，它拒绝了意大利取得一个基地的要求。一些深切感受到戊戌变法威胁的官员们将其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因而或公开或秘密地支持鼓动反外活动。在这些官员中间，义和团的同情者大有人在。端王及其朋党尤其支持将义和团转变成为同盟。但是作者也注意到，朝廷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支持义和团的[37]。

在资料方面，邓斯泰梅指出，没有任何具体史料涉及到那些反清组织以及那些要求回到“明”所代表的过去的人们[38]。尽管深感史料缺乏，邓斯泰梅还是准备构造一个有关义和团起源的假说。他注意到了大刀会和法国耶稣会士R.伊索雷(赵席珍)于1898年10月25日所提到的义和拳的“悠久历史”。的确，他没有看到大刀会和义和团之间有什么实际的区别[39]，因为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一书发表的文献中，“大刀会”的名称在很长时间里就一直和“义和拳”一道出现。例如，直到1899年12月26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的一篇奏折中，“大刀会”的名字还和义和拳以及神拳相提并论[40]。

邓斯泰梅把白莲教称作义和团的“母会”，因为白莲教是反清的，而平原事件的主角朱红灯就宣称自己是明王室后裔。但是，朱后来转而反对基督教会，同时又亲清朝，提出了“助清灭洋”的新口

号[41]。但是，邓斯泰梅认为，朱在1899年中提出这一口号很可能并不是最早的，因为伊索雷在1898年10月25日曾提到过一个措辞相似的口号[42]。无论如何，义和团不是“一个新信仰的鼓吹者”。例如，“无生老母”中就看不出有什么信仰。他们毕竟主要是反对西方侵略的“作战团会”。“他们的革命首先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革命。对基督教的反对并非根源于深刻的宗教基础，它在起义中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说只能是第二位的。”依靠西方保护进行的基督教传播只是西方整体性侵略的一个表征而已。邓斯泰梅把义和团起义视为中世纪（工业前）中国和现代中国两个历史时代的分界线。“不只是军事训练和大部分武器装备，义和团战士的精神状态也仍然处在中世纪水平。在中世纪，一切都充满着宗教和巫术，义和团战士就是根据中世纪的一般概念来思想和感觉的。与中世纪的任何组织一样，支配着义和团的也是迷信的信仰”[43]。邓斯泰梅的结论是：“我们的印象是，在临近19世纪末时，义和团首先是作为反对外国的团体出现的，它因此自然也反对基督教，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宗教信仰的结社。”它们创造性地利用了宗教仪式和从低级的民间宗教中借取来的某些思想，包括小说和戏剧中的某些因素。“这并不足以使义和团成为真正的宗教社团，也不足以使其战斗团体的反抗行为成为一种特别的宗教起义”[44]。

同样以翦伯赞的《义和团》（1951年出版）和1959年出版的《庚子记事》[45]为参考资料，陈志让于1960年发表了一篇论述义和团运动性质和特点的文章。他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断言：“它是一场宗教起义，从整体上看，是本世纪整个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宗教起义。”[46]另外，他还认为“义和团起义实际上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47]。不过，陈志让注意到，义和团的信仰根源于山东民众“初步的宗教教义”，这种教义的基础是他们所理解的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某些因素。同时，通俗小说和戏剧对此也提供了补充，加强了其中的信仰成分。例如，义和团信奉的神灵中有许多是流行小说中

的英雄人物[48]。陈志让认识到义和团缺乏统一的领导、共同的宗教信条或一体化的组织，不过他相信这并不能仅仅视为政治上的落后，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精心制定的策略。他补充说：

> 无论如何，义和团用来传播流言、发布揭帖和使人们传播这些流言和揭帖的机制有非常高的效率。另外，它的全部主张都来源于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和戏剧。最重要的是，它赶走外国人的目标具有很大的号召力。[49]

这一切都意味着有某种等级的社会精英在幕后活动，但陈志让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他对义和团的组织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结论是它们基本上是以八卦为基础，其基层单位在农村是“团”，在城市则是“坛”。

在后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50]，陈志让又回到了有关白莲教起源说和乡团起源说的论争之中。这主要是回应台湾学者戴玄之，他在 1963 年又使施达格的“乡团说”死而复生[51]。陈志让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山东各种乡团武装在 19 世纪中的叛乱时期的活动，接着，他又考察了被认为是反清的“秘密结社”，并且讨论了这些秘密结社的成员如何能够加入到乡团之中，“把他们的组织转变成乡团武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乡团组织来进行其秘密的政治活动”的问题。他推断说，并不是所有的秘密结社都是积极反清的。陈志让又重新提出了他前篇文章曾简要提到的一点，认为“青门”（后来被称为“青帮”）是一个在政治上较为温和的结社，最初是在与“漕粮”有关的运输工人中建立起来的。陈志让简要地概述了“19 世纪 60 年代山东秘密社会的状况”，一端是反清的白莲教和不那么好战的姊妹组织八卦教，另一端是“堕落的、政治目的模糊”的青门。他由此推论，这些五花八门的“下层社会组织”恰恰与山东的乡团组织交叉存在。陈志让就是以这种混乱状况为背景，去探讨义和团的起源的。他尽管承认“融合各种不同信仰的义

和团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使用各种卦名作为团体名称，但如果由此而断定它们是八卦教或白莲教的支系的话，则未免有失轻率。……不仅不可能在义和团和白莲教之间明确地建立起联系，而且也很难发现义和团和大刀会、红拳会之间有什么固定的联系"[58]。他反倒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或许在相当程度上"，义和团和青门的成员相互交错。他的结论是：

> 总的来看，义和团运动融合了多种教派信仰，组织来源复杂，其成员来自许多不同的教派和结社，由反对外国的思想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白莲教、八卦教和洪门不在其中。因此，无论是把这一运动与白莲教联系起来的秘密结社说，还是把它描绘成是一个守法组织的乡团说，都不能被完全接受[59]。

最后，陈志让也把平原事件看作清政府和义和团两方面的态度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V.珀塞尔用整部书的篇幅来进行义和团起义"背景研究"[60]的著作，同样是利用了新出版的中文资料集。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的是一般性的背景，但关键的几章集中论述了义和团信仰和组织这两个问题。他同样认识到通俗小说和戏剧在义和团宗教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对劳乃宣的白莲教说和施达格的乡团说都不满意，他以新出版的布告和上谕奏折集[61]中的资料为根据，断言义和团既有叛乱者的特点，也有反抗西方的爱国者的特点。他认为，义和团的最初成员中混杂着各色人等，其中有少数想恢复明朝统治的叛乱分子首领，但来自普通百姓的大多数人参加该组织只是要使自己免受外国人和基督教徒的压迫。因此，义和团原先仅仅是一个既不为政府支持、也不受其控制的自发的群众性自卫组织。但是后来，政府方面通过山东巡抚毓贤接触到这些潜在的反清叛乱者，他们便转而成了清王朝的支持者。珀塞尔根据当时人的记录[62]推论，义和团在其领袖朱红灯于1899年秋在山东平原地区被捕之后，改换了旗帜上的口号，

并且从反清转变为亲清。但他补充说，运动中的真正革命者并没有随之改变，继续保持了反清的立场。他的证据来自《庚子记事》中的日记，其中有关于1900年7月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处死白莲教徒的描写。但是归结起来，珀塞尔的观点还是更接近劳乃宣而不是施达格，因为他坚持认为义和团与1813年的八卦教叛乱之间存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支持这一断言的具体证据则来自错误的翻译[97]。

（三）1980年以后的义和团研究

虽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各种各样的义和团研究使西方读者能了解到大量新的信息，但仍有许多基本问题未能得出令人心悦诚服的结论。直到80年代中叶，新一代西方学者才重新开始对义和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推动这一进展的除中国国内历史研究的复兴外，还有西方出现的更为成熟的方法论和分析方法。1980年以后，又有一些新的中文资料[98]和有卓见的中国学术研究新成果出版。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50年代和60年代顽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不一定有助于准确、全面地重建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包德威（特邀主编）编的《义和团运动的最新研究成果》（纽约，1987年）通过翻译使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新解说和新发现。

背景研究 在一般性背景的研究方面，下面一些成果特别有助于了解义和团的兴起。J.施雷克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考察了德国人侵山东所产生的影响。就德文资料来说，施雷克不仅利用了以《欧洲政府重大决策》为名出版的文件集，而且利用了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中的大量资料（当时存放在波恩）。另外，他还是当时极少数有权利用德国驻北京使馆档案的西方学者之一，这些档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年代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施雷克集中从军事、经济和宗教方面讨论了

德国人在鲁东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他没有把这一存在与义和团的兴起明确联系起来，但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鲁南天主教代牧区主教安治泰咄咄逼人的行为。在70年代初，这对于学术界了解德国帝国主义入侵的性质和程度，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贡献。应该记住，山东通常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的摇篮。

K.里维纽斯是一位圣言会成员，他发表了大量有关鲁南传教团与国际政治问题的出版物。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研究最为相关的是他的《世俗势力的庇护与传教工作的进行：德国对天主教鲁南传教的保护》。他相当细致地考察了90年代德国天主教传教事业与德国世俗野心之间所谓的联系。在H.格伦德的《基督教传教运动与德国帝国主义，1884－1914》一书的第四章，对圣言会传教在山东的传教活动提出了更具批评性的看法。这些著作主要从外交史的角度阐述传教事业，对我们了解中国内部的发展几乎没有多少帮助。

在背景研究方面，J.库珀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与山东南部的天主教会》集中研究了义和团起义前夕山东南部的情况。他在帮助我们了解鲁南的背景情况方面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作为在鲁南从事传教活动的天主教传教组织圣言会的成员，他参考并分析了该组织已出版的资料。除了较早时候出版的某些圣言会传教士的传记外，他主要依靠圣言会的3种受人欢迎的期刊《耶稣信使的心灵》、《天主之城》、《圣米迦勒历》，来了解义和团起义前夕传教士对传教活动发展的看法。与此同时，库珀能够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查阅当时尚未出版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这些资料后来出版时名为《教务教案档》。他还接触到了《胶澳档》，这一有关德国占领青岛的史料保存在台北同一家研究所里[59]。另外，他还参考了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里的相关文件。

这样，库珀就能更客观更准确地描述19世纪末山东南部的情形。这是第一部阐述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学术著作，它进一

步表明，械斗和土匪活动等乡村暴力在这一地区十分普遍，而且到处都有土生的各种教派。德国圣言会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安治泰和福若瑟领导下于1882年开始传教活动的。尽管山东南部此前实际上没有一个教徒，但鲁南（包括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和济宁直隶州等几个行政区，1898年，梵蒂冈又补充进青岛周围的4个县）传教会很快就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传教区之一。库珀指出，某些教派组织对基督教特别感兴趣，巨野县磨盘张家庄的情况就是一例。

然后，库珀又回到在基督教成功扩展情况下反基督教活动兴起的问题。他先是从总体上勾画了基督教在家庭、村庄和县区内受到反对的情形，接着又详细描述了传教士进入兖州城引起的长期斗争，把它视为来自"儒教"反对的实例。这段冲突历史最后的也是最具实质性的一部分有着一个相当费解的标题："革命的中国与天主教传教会"。这一部分探讨了大刀会在单县和曹县的兴起，以及1896年夏这一自卫团体在山东、江苏交界地区与天主教会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在这之后，是1897年两位德国传教士在磨盘张家庄遇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的记述。最后，库珀讨论了1898－1899年期间鲁东地区发生的有组织的反基督教暴力事件，随之而来的是1899年夏在鲁西南地区发生的多起冲突，最后在1900年夏天义和团起义时达到了高潮。

库珀未能获准使用圣言会的档案资料。不过，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后，圣言会的F.博尼曼的洋洋巨著《福若瑟（1852－1908年），伟大的在华传教士》一书依据档案提供了有关圣言会内部情况以及与山东传教会紧张关系的详细资料。大量的脚注资料提供了相当具有地方性的详情，因而特别有用。该著作的英译本书名是《神圣的福若瑟：1879－1908年的在华传教士》，但是没有注解和附录。

上述的背景研究对于理解富有进攻性的传教士在鲁南的活动

所带来的扰乱性影响相当有用，但它们并没有去解释义和团的起源。然而，无论是通俗性著作还是学术性著作中，往往都暗示，传教士的活动与义和团的起源有着某种联系。显然，需要去发掘更为充足的具体资料，才能说明安治泰以及山东南部的基督教徒在鲁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起了决定性的因果作用。

除上述著作外，还应提到一些更一般性的研究。这些著述尽管与义和团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较近的一些义和团研究已经应用了它们的分析方法和视角。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农民起义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一个受欢迎的重要课题。J.谢诺撰著或编写的几部出版物[60]就是这样帮助理解了秘密结社和宗教教派之间的区别。另外，学术界在 70 年代之所以对中国民众运动和秘密结社的研究产生了更广泛的兴趣，这些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G.施坚雅[61]提出一种空间概念，他把 19 世纪中国划分为 8 个地文学上的"大区"，各自有相对较发达的中心和欠发达的外围地区。虽然施坚雅模式中没做明确说明，但鲁西和与之毗邻的直隶、河南、以及江苏境内的几个县同属华北大区的外围地区。按施坚雅的说法，在这规范控制虚弱的地区，有逃避司法和税收人员进行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民间团伙，也有包括土匪、宗教帮派和煽动性秘密结社等在内的异端组织。

华北大区的外围地区之一是淮北。裴宜理对这一长期以来始终难以控制的地区进行了研究[62]，她的多维"社会生态学"方法论证了长期性团伙暴力的模式有着地域性差异这一基本现实。在论述各种形式的地方性军事性的集体行为时，裴宜理确定了在分析学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有组织的争斗活动模式：一种是掠夺性的，包括械斗、土匪活动和食盐走私；另一种是保护性的，包括看护庄稼、村社工事以及各种形式的村庄自卫和村际自卫活动。各派势力之间的争斗主要是——但并非绝对是——由争夺稀少的各种资源而引起的，如为获得或保护经济资源而发生的争斗；领导者之间为扩

大或维护自己政治和社会权势而进行的争斗。裴宜理认为:"在匮乏的情况下,对争斗对手采用暴力往往是一种合理的手段。缺少资源、生活来源没有保障的环境可能会使冲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剥夺他人的必需品被认为是直接有助于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65]这样看来,义和团及其直接前身是某种混乱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环境中,居民习惯于为稀少的资源而争斗。基督教社区也是如此。

考虑到上述地区特有的派系斗争的悠久历史,当外国传教士于多灾多难的19世纪90年代在华北平原积极进行传教活动时,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随之加剧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方面,应该提到两个重要的背景研究成果:C.李清杰的《华北的乡村宗教与乡村组织:19世纪末天主教的挑战》和R.汤若杰的《中国农村的众神之光:基督徒、儒者和现代化中的国家,1861-1911》。两篇文章都收入了D.裴士丹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至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李清杰关于直隶西部反基督教情绪的产生和村庙之争引发的冲突的研究特别有用,因为这些案例与在十八村飞地发生的梨园屯事件相似,这一事件在1897-1898年导致了梅花拳的干预。

对于中国宗教教派历史的考察还包括有韩书瑞[66]对1774年王伦起义和1813年八卦教叛乱的研究,这些论著使西方学者对通常被看作白莲教遗绪的中国宗教教派运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后来出版的两篇文章中,她提出"既要从比较注重信徒集体的角度,也要从比较注重信徒个体的角度,去审视清代的宗教教派"。[67]与义和团研究特别有关的正是比较注重信徒个体的某些"静思"团体。"在教派类型中的另一极,师傅通常会单个地会见他的徒弟,教他静思的方法和武术,给他治病以吸引信徒,并且是以口述形式而不是文字形式来传播教派的思想"[68]。在论及19世纪初尚武的教派意识时,韩书瑞指出,在八卦教一系的某些注重静思的教派内部传授的特别技艺之一就是"拳术"。"空手或者持棍表演的这些

精心设计的技艺，一学会就能用来自卫，并且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因而也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传授给静思教派信徒的这些技艺还能被用来“在集市上与不同流派的练武者进行比赛”。韩书瑞使我们想到，1800年前后的某些流派与19世纪90年代末的作为义和团前身的某些教派有着相同的名称：金钟罩、八卦拳、梅花拳、义和拳和红拳[17]。

这点与义和团研究不无联系，因为从劳乃宣开始，就有一些作者提到，义和拳这一名称在更早的时候就曾出现过，并由此来推断义和团和它在组织上存在连续性。B.哈尔[18]不久前对白莲教的历史作了一番更为清楚的描写，并且警告我们在教派名称上要小心。或许我们更应注意某些教派名称广为流行这一现象，而不应过分重视它们在组织方面的联系。鉴于许多中国学者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有着教派连续性的特点，就目前在所谓的白莲教传承方面的思考说几句话也许并不多余。在过去，中国许多各不相同的宗教派系被不加区别地一概统称为白莲“教”。然而，晚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它们是有差别的，白莲教团体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由许多不同的支派组织组成的，这些支派组织彼此之间往往没有多少联系。另外，白莲“教”只是华北好几个这类似乎无处不在的宗教集合中的一个。在与义和团运动特别有关的这一方面，中国学者最近已经表明，八卦“教”是华北一个主要的、有别于其它教派的教派体系。据认为，这些组织是从罗教衍生出来的，这是罗清于明末在大运河上运送漕粮的船民中间创建的一个复杂的的信仰体系[19]。此外，正是在这一派系的发展中，首先出现了被称为“无生老母”或“无生父母”的最重要的“教派”神[20]。因此，向新信徒传授的主要“秘密”真言，即八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或“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是八卦教教义的一个要素。由于中国民间信仰与生俱来就有着强烈的融合各种教义的倾向，白莲教一派也合乎时宜地采用“无生老母”作为它最重要的神。

还应注意到，某些学者反对把中文的“教”字翻译成“sect”。就拿哈尔来说，他认为“教”一字有着“只在上层精英们头脑里才有的出轨和异端的意思，而我们的大部分资料就是他们写的”[71]。因此，在讨论有着白莲教理想、被他称为“中国世俗佛教团体”的社团时，他更喜欢用“teaching”一词[72]。哈尔的话极有道理，因为甚至在已传播开的主流民间文化里，也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内容，其中有些成分绝对不是“正统的”。信仰和各种宗教活动的差别很大，从崇拜祖先、土地神和城市神直到占卜、看风水、算命、巫术和服用仙药。中国统治阶级接受民间文化中那些培养道德行为、有利于地方社会团结的成分，对其他成分仅仅是容忍，而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害的活动则试图加以镇压。就所谓的“sects”而言，许多中国学者也正在开始使用更加中性的词来描述这些宗教团体，把它们称为“民间宗教”和“民间秘密宗教”。最近，山东大学的路遥教授提出了“民间秘密教门”这个名称[73]，似乎特别适合于活跃在早期义和团活动中心的鲁西地区的一些八卦教组织。

如果我们承认八卦教不是白莲教一部分这一论点的话，那么义和团和民间“教派”之间的联系问题就应该更容易解决了。八卦教的组织结构使那些以卦命名的团体特别易于分裂，就象增生出来的大量不同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易于分裂也易于归并的特点结合起来，会使得某些八卦教组织——那些符合韩书瑞所提出的“静思教派”的组织——更有可能和独立的武术团体联合起来。周锡瑞[74]关于清中期“教派起义”研究中对这一点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不过，他并不相信后期义和团与白莲教团体或者较早的名叫“义和拳”的团体在组织方面有联系，反而认为它们都是民俗文化的产物[75]。

回到起源研究 周锡瑞近年出版的全面研究义和团起源问题的权威性专著是对西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在其他学者仍然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梅花拳、义和拳和大刀会的集合时[76]，他已经令人

信服地论证了义和团于19世纪90年代末起源于鲁西北一个与众不同的拳术团体，即神拳会。但是，周锡瑞用相当多的篇幅认真研究了义和团运动的两个先驱组织，即鲁西南的大刀会和大运河上的临清城以西的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梅花拳。这两个组织都曾因其反基督教会的活动而声名狼籍。在这方面，他详细分析了鲁西北地区与大刀会活动的中心鲁西南地区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由于神拳会活动地区的特殊环境，降神附体的宗教仪式就具有了某种明显的平等性。当这种仪式通过拳师传播到毗邻的直隶省并传向天津、北京之时，成为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因素。

在义和团起源的讨论中，周锡瑞相当重视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表现。在标题为《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一章中，他认真研究了圣言会的德国天主教士们在19世纪90年代富有进攻性的发展教徒的策略所产生的影响。周锡瑞特别注意了安治泰的活动，尤其是他在把其教区的护教权由法国转到德国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巨野教案和德国人侵山东东部时的所做所为。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解决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的争端，以及基督教徒们日渐专横被认为是促使义和团起义爆发的重要因素。

包括以好战的安治泰为首的圣言会传教士在内的传教士们确实实行了一个挑衅性的发展教徒的政策，但在考察这一点时，还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鲁西南的社会生态。这后一点或许更为重要。在这种缺乏秩序的环境下，械斗、盗匪活动以及宗教教派的暴力行为在传教士来到之前很久就已经是该地区的一个普遍特点，居民们习惯于为争夺稀少的资源而进行群体性活动。换句话说，区别非基督教徒和土匪的界线并不明显。在一个儒教规范统制相当虚弱而又有着暴力竞争传统的地区，某些社会成员与外国宗教建立起联系并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至少在相对正常的年代里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但是，基督教徒有时会在这些本

质上还是传统性的争斗中占据优势:他们可以通过传教士借助于外部势力。这样,有势力的传教士和基督教徒更有力量的专横无疑就会使华北农村存在的各种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一方面,基督教的出现能够加剧地区性的紧张,但另一方面,它的影响也吸引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团体和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的现象在1895年到1898年夏天大量增加的事实,有力地表明基督教成功地进入了乡村社会[77]。

关于这一点,人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几乎就在大刀会于1896年夏天失败后不久,它在江苏境内的主要首领庞三杰就成了当地天主教会的忠诚捍卫者[78]。更鲜为人知的是,1896年以后,在毗邻的江苏省,大刀会作为防御土匪的自卫武装继续大规模扩充人数[79]。同样富有意义的是,当1900年义和团战火席卷华北大部分地区从而达到高潮时,鲁南和苏北只是略受影响。而在以前的活动中心,当地大刀会和基督教徒反而携手反对外来的"义和团"势力[80]。虽然一些成员可能参与了1900年夏天北京地区的活动,但大刀会本身并没有卷入义和团起义。换句话说,在山东、江苏交界地区,人们所熟悉的传统的集体暴力行为继续普遍存在。在这里,人们习惯于采取进攻性的生存策略,同时又习惯于团结一致,抵御前来掠夺的外人。就是说,地方性的拳术组织和基督教徒一直都是这个边界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成员之间和团体之间时而相互合作,时而相互对抗。可以肯定,"异教",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国传来的,通常都不是边界地区的主要矛盾。正如陈志让所指出的:"乡团、秘密结社和土匪的社会界限模糊,它们之间很容易相互转换角色。这种现象表明,想把义和团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任何企图,都缺乏历史的意义,而坚持要进行某种区分的做法则体现了一种方法学上的错误或者误解。人们的注意力与其集中于这些民间团体的组织联系方面,不如集中到它们的社会模糊性和思想模糊性方面。"[81]

在论述华北平原边界地区的各种模糊性时，陈志让关于梅花拳领袖赵三多来自山东冠县的假定是错误的[62]。实际上，赵三多和他的组织是从直隶前来援助梨园屯的非基督教徒的。梨园屯位于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一个名为十八村的飞地内。正是由于这种行政位置，梨园屯事件引起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学者未能认识到这个行政上的碎片地区。R.狄德满在1978年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飞地"这个重要问题时，人们对晚期中华帝国还会存在这样一种异常的行政区域还曾表示过怀疑[63]。当这一地区地理政治的真实情况被了解以后，人们就明白梅花拳发生在直隶而不是山东了。

狄德满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对日益加剧的内外压力的一种多方向的复杂反应。这一"运动"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组织结构，但是最好把它理解为由各种不同矛盾引起的一些分散的、地区性事件的聚合。怨愤、仇恨、痛苦和恐惧等诸多因素不断变化地组合在一起，推动着它的发展。对于主要以反基督教暴力表现出来的反外主义的急剧高涨，1898年末以来的形势和各种事件所造成的独一无二的危难局面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由于清王朝的衰落，中国的社会精英和民众便以各种形式，为了各种——甚至相互矛盾的——原因，对这一危局作出了反应。就这样，改革派精英和保守派精英们都对一个软弱的政府所带来的否定性发展做出了反应，而与此同时，地方名流和民众则反抗一个干预地方事务的政权的侵入（如反对昭信股票、反对激进的改革政策、甚至反对上面强加下来的"教案"解决办法）。他们对日益加剧的外国侵略和日见专横的基督教势力作出了反应。最为关键的是，各个阶层都不得不面对1898－1900年特定的环境大灾难[64]。

尽管世俗的和宗教的帝国主义的不幸卷入是导致反外主义在1898年末到1900年达到高潮的重要因素，但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发展与一次大饥荒同时发生也是十分重要的。的确，自19世纪90

年代中叶起，山东的某些地区经历了连年的严重歉收和其他灾害。在整个90年代，华北平原每年都发生洪水，而1898年8月济南西南的黄河大堤决口造成的洪水泛滥据说是近年来较为严重的的毁灭性灾难，被灾面积很大，一些以前较不容易被淹没的地区都受到了影响。然而，尽管黄河多次泛滥成灾，仍然不能被视为是导致后来鲁西爆发反外暴力事件的关键原因。实际上，当山东其他地区已经开始有组织地攻打基督教徒时，新教传教士们还在济南下游的洪泛区忙着分发救济品，他们甚至一直忙到1899年年初。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山东许多地区发生了大范围洪水之后，又出现了持续的、范围更大的旱灾，这场旱灾连同其它因素一起，为暴力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爆炸力的潜能。到1899年，实际上整个华北平原都严重缺雨，教会报刊和中国沿海地区的报纸上充满了有关物质严重匮乏的报道。

P.柯文在其新著中令人信服地论述说，旱灾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正是这一因素使义和团运动能够在1900年春夏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与之相比”[65]。虽然暴力、物质匮乏和饥荒在华北某些地方经常发生，甚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与这次极为严重的、持久的环境灾难相伴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威胁性的重要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最可怕的谣言在农村传播开来并流入了城市。“有关形势要发生巨变的谣言有着不同寻常的威力，人们普遍信以为真”[66]。对干旱带来的死亡的恐惧，以及认为外国人和他们的信徒们最终应为这场自然灾害负责的信念，引起了有关外国人的“虚假的坏消息”。这些消息参考了“中国古老传统中有关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基督教徒品行恶劣、折磨生灵的一些往往带有种族主义的传说”[67]。有关基督教徒往井里投毒的指控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消息。“投毒下井谣言的流传这样就直接触及到那时普通百姓思想中最大的集体恐惧，即对死亡的恐惧”[68]。考虑到当时特

定的危机局面，这种谣言有可能会引起群体性的恐慌或歇斯底里。

正如柯文所认识到的那样，需要把1898年11月至1899年6月期间在山东东部发生的反基督教活动和这一时期在鲁西北和直隶东南部开展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明确地区别开来。胶州和威海卫被占领后，山东东部成了外国政治和军事人侵以及未来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狄德满认为，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对德国在这一地区建立租借地的反应，该省东部的某些实业界上层分子支持了1899年在沂州府发生的反基督教事件。这是一些独立于正在华北平原兴起的义和团运动的地方性事件。狄德满怀疑，这些人发动群众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发展，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被排除在获利者的行列之外。尽管爱国而又有改革精神的山东士绅好象并没有支持义和团运动，但似乎仍有理由认为，爱国的社会精英们对外国人在鲁东的意图所给予的关注和所作出的反应，一定在山东西部的内地找到了某种共鸣。东部的爱国精英们的动向与华北平原那些较为狭隘、更受传统束缚的民众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性质的相互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不过，考虑到山东农村人口的流动性较大，可以认为，人们的关注和忧虑能够以乡村流言、扰乱人心的谣言、煽动性小册子、揭帖以及拥护清王朝的口号等形式横越乡村，传播开来。

关于早期出现的支持清王朝的口号，鲁东地区的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曾于1898年末报告说，沂州府的一伙"叛乱者"的旗子上写有"保清灭洋"的口号。在狄德满看来，这一口号在鲁东地区出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这一亲清口号很有可能并不是象普遍认为的那样发源于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义和团，而是统治阶级成员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不久，以某种一般性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宣传的。另外，这类口号还会得到有可能敌对的人士的支持，就是说，既能够得到了顽固分子的支持，也能得到进步的精英分子的支持。还有，当时中国其他先进

地区也有有关类似口号的报告[89]。

超越起源研究 柯文的《历史三调》(即事件、经历和神话)把我们引向了义和团起源研究以外的问题。1898 年末直到 1900 年夏天各种事件的结合,使得这场运动得以在天津和北京这两个北方城市聚集起力量。他阐述"经历"的几章捕捉住了那些经历了这一事件较为引人注目的高潮时期的中国同情者和外国人的心态,他给予这些参与者们大量的空间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以"传达义和团民以及和他们一道经历了义和团事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经验世界中的某些特别之处,尽管很不充分,尽管只能是印象主义的"[90]。他有关妇女组织红灯照以及妇女禁忌和巫术功效的评论使广大读者了解到义和团运动一些特别有吸引力而迄今尚未有人研究过的方面。这些章节是全书最富有想象力和最有独到见解的部分。

最后,柯文创造性的方法认为,对义和团事件的改造是 20 世纪期间不断加强的神话化过程的结果。柯文知道神话往往比真实更加具有力量,他追溯了从事件发生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反帝运动、最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义和团在中国被神话化的演变过程。由此来看,他富有影响力的专著首先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编纂理论方面的成果。尤其是在最近 20 年里,义和团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中西学者的合作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更深刻地理解,义和团运动是对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压力所作出的多方面的复杂反应。学术界对 1900 年夏发生的诸多事件、或者这些事件的后果(即外国占领北京[91]和天津、《辛丑条约》和赔款问题)仍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迄今尚没有对山西、内蒙和满洲里的义和团活动进行有实质性的研究。有关义和团起源的关键问题也未必都已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和充分的解释。然而,现在我们很难断定下一代西方学者是否会愿意致力于这些"内部"问题。西方的历史研究对中国农民和民众起义已经不再有强烈的兴趣,其重心已转向"殖民地话语"上了。因此,中国和西方

1900年暴力冲突中有关外国的部分很可能将得到更彻底的认真研究。西方人对外国使馆被围、八国联军的战役所作的大量通俗性描述，尤其是有关外国士兵抢劫和惩罚性征伐的描述可能将会得到更仔细的学术考察。传教士的态度和心态同样也将受到密切注意[19]。不过，希望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兴趣不要被完全抛弃。

（徐康玲译）

（作者单位：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

注释

①V.珀塞尔：《义和团起义：背景的研究》，剑桥，1963年，第Ⅶ页。

②从一开始，西方观察家就用义和团"革命"、"叛乱"、"造反"、"起义"、"运动"、"事件"等词形容1898－1900年的暴力事件，但所有这些词都不尽如人意。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起义"和"运动"二词，尽管它们不是理想的选择。

③见1900－1902年《教务杂志》上的争论。

④本书第二部分西文研究书目中几乎列有所有这些出版物。

⑤赫德：《这些自秦国来》，伦敦，1901年。作者的亲中国观点立即招致西方新闻界某些人的批评。

⑥他们的日记和回忆录的摘录最近已由G.卡明斯基与E.翁特里德发表，名为《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加入义和团》，维也纳和苏黎士，1989年。第三章涉及义和团事件。

⑦G.林奇：《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随联军行记》，伦敦和纽约，1901。

⑧W.张伯伦：《受命赴华：1900年义和团暴乱期间的书信》，伦敦，1903年。

⑨此后出版为一本书。绿蒂：《北京最后的几天》，巴黎，1902年。

⑩马克.吐温：《致我的传教士批评家们》，《北美评论》，1901年4月，第520－534页；《致坐在黑暗中的人》，《北美评论》，1901年2月，第161－176页。

⑪例如G.沃耐克、P.霍白奇，以及F.尼波尔德的各种出版物。

⑫明恩溥：《中国目前的形势》，《国际传教士评论》第23卷第6期（1900

年6月),第430－434页;又见他以一个传教士的视角撰写的综合报道:《动乱中的中国》,纽约和芝加哥,1901年。

⑬马丁荣在其著作的修订版本中增补了一个有关群众性歇斯底里和义和团的章节:《封闭的中国:迷信、犯罪和贫困》,巴黎,1900年;他还分别发表了:《义和团时代的歇斯底里》,《亚洲评论》,1901年12月1日,第86－92页;《义和团的歇斯底里与中国》,《科学评论》,1901年3月9日,第302－304页。

⑭例如L.诺森蒂尼的《秘密结社与中国王朝》,《新文选》1900年7月,第123－130页。

⑮J.格鲁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上的一页》,阿姆斯特丹,1903年。

⑯同上书,第2卷,第430页,脚注2。

⑰H.高第:《1860－1902中国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3卷,巴黎,1902年,第453－454页;

任德芬的文章《直隶西南部的义和团》,《研究》第84卷(1900年),第366－394页,1900年8月收入《中国与锡兰》第2期,第11－53页。

⑱E.爱德华兹:《山西的刀与剑:外国人与中国基督教徒的殉教》,爱丁堡、伦敦、纽约,1903年。

⑲麦美德:《中国殉教者传》,费城、辛辛那提、纽约;《中国两英雄:自传与见闻录》,纽约、芝加哥,1903年。第2卷包括《孔祥熙见闻录》。

⑳关于北京地区,见包士杰(编):《义和团迫害时期有关北京蒙难者的资料》,北京,1920年。关于直隶东南部的耶稣会,见《中国人与献县代牧区》,罗马,1937年。关于山西,见G.里奇:《1900年山西省殉教者事迹》,1911年。该书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山西省被害的基督教殉教者个人的调查,共录有1764人。

㉑P.克莱门兹:《义和团起义:政治与外交评论》,纽约,1915年。

㉒G.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纽黑文,1927年。

㉓同上书,第129页。

㉔同上书,第137页。

㉕R.希克斯:《义和拳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再考察》,《中国论文》

第1期，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1947年12月，第74－135页。

㉖同上，第101页。

㉗同上，第110页。

㉘同上，第85页。

㉙同上，第94页。

㉚同上，第112页。

㉛谭春霖：《义和团大灾难》，纽约，1955年。

㉜同上书，第45页。

㉝翦伯赞主编：《义和团》4卷，上海，1951年。

㉞G.邓斯泰梅：《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与巫术》，《通报》第47卷第3－4期（1959年），第323－367页。

㉟G.邓斯泰梅：《义和团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版的文献与论著》，《历史评论》第231期（1964年4－6月），第387－416页。

㊱同上，第394页。

㊲同上，第407－408页。

㊳同上，第409页。

㊴同上，第412页。

㊵同上，第413页。朱的奏折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第42页。

㊶同上，第412页。

㊷同上，第413页。

㊸同上，第415页。

㊹同上，第416页。

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庚子记事》，北京，1978年。

㊻陈志让：《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特点——形态学研究》，《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3卷第2期（1960年），第287页。

㊼同上，第307页。

㊽同上，第291－292、298－299页。

㊾同上，第304页。

㊿陈志让：《义和团的起源》，见陈志让与N.塔林主编的《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研究：纪念V.珀塞尔论文集》，剑桥，1970年，第57－84页。

(51)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北，1963年。

㉜陈志让:《义和团的起源》,前引书,第 75 页。

㉝同上,第 84 页。

㉞V.珀塞尔:《义和团起义》,1963 年。

㉟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1959 年。

㊱《义和团》,北京,1951 年。

㊲关于翻译和罗马拼音化的问题,见对珀塞尔著作的书评,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简报》第 28 卷第 1 期,1965 年,第 186 – 187 页;又见 G.邓斯泰梅的文章,《通报》第 52 卷第 1 – 3 期,1965 – 1966 年,第 208 页。

㊳应特别提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济南,1980 年。

㊴本汇编已出版发行,书名《胶澳专档》,黄福庆等编,台北,1997 年。

㊵J.谢诺:《1840 – 1949 年中国的农民起义》,伦敦、纽约,1973 年;J.谢诺编:《1840 – 1950 年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结社》,斯坦福,1972 年;J.谢诺:《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的秘密会社》,伦敦,1971 年。以上著作原著均系法文。

㊶G.施坚雅:《中国农民与封闭的社会》,《当代社会历史研究》第 13 期(1971 年),第 270 – 281 页;G.施坚雅:《晚期中华帝国的流动性政策:地区性机制分析》,见 C. 史密斯编《地区分析》第 1 卷,第 327 – 364 页,纽约,1976 年;G.施坚雅:《19 世纪中国的地区性城市化》,见 G.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1 – 249 页, 斯坦福,1977 年。

㊷裴宜理:《华北的叛乱与革命》,斯坦福,1980 年。

㊸同上书,第 3 页。

㊹韩书瑞:《中国的千年叛乱:1813 年的八卦教》,纽黑文,1976 年;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纽黑文,1981 年。

㊺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中国的教派体系网》,《近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37 – 360 页;韩书瑞:《白莲教在中华帝国晚期的传播》,见 D.约翰逊、A.内森和 E.罗斯基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民众文化》,第 257 – 293 页,伯克利,1985 年。

㊻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前引书,第 359 页,注释 2。

㊼韩书瑞:《中国的千年叛乱》,第 30 – 31 页。

㊽B.哈尔:《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莲教》,莱顿,1992 年。

㊾马西沙与韩秉芳:《中国民间宗教史》,第9、19－20页,上海,1992年。.

㊿同上书,第929页。

(71)B.哈尔:《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莲教》,第12页,注28。

(72)同上书,第13页。

(73)路遥:《关于八卦教内部的一个传说》,1993年5月现代中国秘密会社史国际研讨会论文,未出版。

(74)周锡瑞:《义和团起义的起源》,第48－52页,伯克利,1987年。

(75)否定义和团与白莲教联系的看法还可见B.哈尔的《白莲教》,第281－288页。关于意大利人对义和团巫术和武术的研究,见L.苔斯:《义和团起义》,佛罗伦萨,1995年。

(76)见M.埃尔文的"义和团运动的空间分析",标题为《满清官员与千年至福主义者:对1899－1900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见H.贝克与S.福伊希特万主编:《新环境中的旧国家: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第224、227页,牛津,1991年。该文章首次发表于《牛津人类学协会学刊》第10卷第3期(1979年),第115－138页。

(77)狄德满,《农村的动乱》,第172页。

(78)同上书,第222－225页。大刀会是被由乡绅领导的乡团和官军联合打败的,这一事实反映了山东、江苏交界地区存在着各种矛盾。同上书,第220－222页。

(79)同上书,第225,236－238,288－294页。

(80)圣言会传教士H.普伦报告说,一支由基督教徒和非基督徒联合组成的地方武装于1900年在曹县第二次打败了外来的义和团。见《耶稣信使的施太尔之心》第28卷第12期,1901年9月,第179页,普伦1901年4月22日信函。

(81)陈志让:《义和团的起源》,见陈志让和N.塔林主编:《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研究:纪念V.珀赛尔论文集》,第81页,剑桥,1970年。

(82)同上,第76页。

(83)R.狄德满:《农村集体暴力活动的地缘政治性:1868－1937年期间的华北》,未刊论文(1979年),第34页。该论文初稿提交给哈佛大学中国共产主义根据地专题讨论会(1978年8月14－21日)。关于此后的地图资料和进一步的讨论,见包德威编:《最新中国研究》,第222页,地

图3;周锡瑞,前引书,第139页,地图3;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6-7页和第36-37页之间的地图,济南,1990年;狄德满:《农村的动乱》,第241页,地图11。

㉔狄德满:《农村的动乱》,第322-323页。

㉕P.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95页,纽约,1977年。

㉖同上书,第159页。

㉗同上书,第162页。

㉘同上书,第172页。

㉙狄德满:《农村的动乱》,第277-278页。

㉚柯文,前引书,第67页。

㉛一篇少见的论文是M.亨特:《被忘却的占领:1900-1901年的北京》,《太平洋历史评论》第48卷第4期(1979年11月),第501-529页。

㉜这一方面的某些研究已经开始。见J.何伟亚的近期的研究:《给中国留下耻辱的烙印:义和团运动结束后传教士的讲道》,《近代中国》第18卷第3期(1992年7月),第304-331页;何伟亚:《使中国完全平等》,《历史社会学学刊》第3卷第4期(1990年12月),第379-400页。

日本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日）佐藤公彦

历史研究好像总是带着研究者本身所处时代的印记，这也许可以说是由于只要研究者以“现实”、“现在”为依据来对过去“提出问题”，就要深受其对当代的关注和历史意识等的影响。不仅如此，其研究还要受到研究者本身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其所掌握的学术模式（对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方法）等很大的制约。虽说是科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免要围绕“业绩”、“荣誉”（以及与之相应的地位、经济利益）等的匮乏而相互竞争，并以此为动力去从事知识性的社会活动。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要掌握好社会规范性和历史相对性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对历史研究进行历史考察（史学史），也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次必要的自我检查。回顾百年来日本对义和团的研究，对此颇有深切的感受。

首先要说的是：对义和团事件，日本方面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表现得十分迟钝。当时留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内的有：公使西德二郎、书记官石井菊次郎、楠原陈政、留清学生——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以及公使馆武官柴五郎等，其后的资料中也未见有其他使馆人员。从他们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看，他们对事态情报的收集和对其后情况发展变化的反应也是十分迟钝的。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日本人并非基督教徒。

由于义和团是一次被激化的反基督教运动，因此，那些拥有传教士的欧美各国公使和领事们对来自山东、直隶腹地的情报，反应十分警觉，并且相互交换情报。但是，日本人却只将其当作是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事物来处理了。所以在事变当时，日本学者的评论也多集中于包括日本出兵在内的与列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上，（例如：有贺长雄[1900]）。也许是由于这一影响，在有关义和团问题的史料中，主要是一些诸如日本出兵后的从军记事、观战记以及被围困于日本公使馆内的柴五郎与服部宇之吉等人被围经历的报告等等。除"战史"外，还不见具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只是，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万朝报》特派记者堺利彦在报道中谈及的战争惨状以及幸德秋水在《万朝报》(8·7)上发表的反战言论——〈斥帝国主义〉。幸德于1901年4月出版：《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他亲身经历了义和团事变，并把世界进入二十世纪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幸德的感觉也是十分敏锐的。——亲身经历过布尔战争（亦称南非战争或英布战争——译者）的霍布森（J·A·Hobson）所著《论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于1902年——。他直观地认为义和团事变是世界史和东亚史的转折点。而日本人却把义和团运动称为"北清事变"，后来只将其看作是日俄对立和日俄战争的一个背景，并在辛亥革命、"日韩合并"这些历史变动中被日益淡漠了。至20年代，"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开始席卷中国之时，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意义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正欲将自己的势力伸向大陆的日本人与过去不同，他们所面对的将是要打倒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这样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

清末曾在北京留学七年，亲身经历了清朝覆灭——辛亥革命的矢野仁一（1872～1970），在留学期间曾是《北京志》(1908)的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是近代外交史和近现代史的专家。他在中国国民革命高潮中的1927年，曾在东京帝国大学

史学会作过一次题为〈义和拳乱之真相〉的演讲〔矢野 1928〕,其中对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意义作了如下阐述。他认为存在于旧制度、旧传统之上的清朝却在义和团事件后的 1901 年发布了变法上谕,从而丧失了其德治主义的世界帝国的理想。丧失理想的清朝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可以说清朝与"义和拳匪之乱"同时遭到了灭亡。从这个意义说,义和团事件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义和团之乱是一次"排斥基督教"的运动,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仅此尚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形成了如此大规模骚乱的真谛。根据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义和拳教门本出自白莲教,最初仅热衷于习练拳术,本来他们是与官宪并无关联的秘密结社,后来在"排斥基督教"的"名号"(Slogan)下,他们才结合在一起。"排斥基督教"、"扶清灭洋"本是无可非议的(justifiable)的"名号",它与国民革命时期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名号"同样都是正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义和拳的骚乱与国民党、共产党在热潮中与民众相"结合"时所形成的骚乱颇为相似。义和拳骚乱扩大化的实质是各方社会力量的"结合",这些社会力量包括政府当局(政治权力)、本来出自非法组织白莲教的邪教狂热教团——义和教门的力量,以及看到他们(为使自己合法化)提出的"名号"便认为他们是义民会而与之随声附合的民众力量等。矢野认为:根本问题是在中国的社会基层存在着一种"骚乱精神"。在他看来,义和团事件和国民革命一样,都是同一时代的经历,是现代史。然而,他在《北京志》上发表的〈清代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一文中,尽管谈了德国收回对山东南部的天主教保护权问题,但却未联系发生于其身边的义和团运动,这确是难以想象的。我认为这还是由于日本人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问题表现冷淡。

后来,他又在另一篇文章〔矢野,1944〕中认为:义和拳的仇教是"名目",由于受到官方的袒护才得以蔓延。清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暧昧不清,"即使不是明助,也是暗助和奖励"。御前会议之后,

清廷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探讨了引起战端的大沽炮台问题、还政问题。他认为：1859 年英法联军要求清廷交出大沽炮台，纯属无理，而 1900 年则是因为天津、北京告急。他在文中又自问自答地写道：难道没有“交出炮台”的要求，就没有战争吗？即使没有，冲突也是难免的。此外他对《景善日记》中所说的外国照会问题，即要求西太后还政问题导致她决心宣战一事表示怀疑，他认为《景善日记》所记日期混乱，对其史料价值提出疑问。这几点在其以后的研究中成为了他的重要论点。这显示了一位历史学家在对待文献史料上的卓越的洞察力。矢野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对欧美各国侵略中国采取了批判的笔法，从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深处存在着一种对抗欧美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然而，仅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出战前的日本人却未能翻过来理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一面。

矢野还在《现代中国研究》(1923)、《甲午战后中国外交史》(1937)等书中都谈到了义和团事件的国际背景问题。他在〈义和拳匪和俄罗斯占领满州〉(1934)一文中得出结论说：俄罗斯为夺回和保护铁路，早有派遣大批军队的意图，即使没有瑷珲炮击俄国舰船、没有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事件，俄罗斯也难免要占领满州。园田一龟〔1934〕利用有关地方志著文，全面地介绍了义和团向“满州”扩展的情况。田保桥洁〔1939〕写了一篇颇具说服力的著名论文，该文分析了清廷在处理义和团事件中，在内政、外交上表现动摇的主要原因，与在列国出兵干涉中日本与俄罗斯所表现的态度等。该文论述的焦点集中在政治外交史的研究上。但是，他并未认为《景善日记》是伪造。矢野还著有《满州近代史》(1941)一书，详细地论述了义和团事变后俄罗斯的撤军问题。他是一位对满州问题颇感兴趣的学者，随着“满州国”的建立，有必要把义和团、日俄战争作为满州近代史的起点，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他的研究动机吧。以上这些是战前的主要研究。

战后，最早发表义和团研究文章的是东京大学派（东京学派）的市古宙三。市古战前就是写过《近代日本的大陆发展》一书的骨干学者。他在〔1948a、1948b〕等文中，以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为依据，批判了施达格（G·N·Steiger）的义和团团练说，他认为：义和团属邪教、会党之类，并非忧国、爱国的组织，其叛乱无异于中国历史上的教匪、会匪之乱。仅在民教纠纷之际，把自己的"名义"改为"扶清灭洋"，并不是对列强的入侵感到忧愤的排外行为，而是暴徒化的盲目排外运动。清政府也不是对其承认和庇护，而是对其采取了与对待历来匪乱同样的措施（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月止）。这一观点，与 1928 年矢野的现代史研究以及田保桥〔1939〕的研究相比，是一种倒退。市古的研究是把矢野、田保桥在研究中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国际性视野锁进了陈旧的中国一国史的框框中，使其接近于汉学传统。这是在东京学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权威性的典型之一。市古的研究成为战后日本义和团研究的起点，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翌年，山本澄子〔1950〕发表文章，山本可能是基督教徒。文章重点较偏重于义和团对基督教的态度的问题，也涉及到义和团的起源。该文认为：同一名称的义和拳，经过近百年之后又出现于同一地区，因此，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与光绪年间的义和拳无异是同一个事物。习练白莲教系统拳棒的宗教集团——义和拳是因生活贫困才揭竿而起的"民乱"。它们采取了反基督教、反西欧的排外运动的形式，与西太后的排外思想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得到了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和纵容，从而导致了与列强之间的战争。因此，应该说，开战之前政府确实帮助过义和拳。

战后重建的历史学研究会（始创于 1933 年）于 1951 年以《历史研究》第 150 期编了〈亚洲变革〉的专辑，其中刊登了江口朴郎的题为《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意义》的文章，该文认为：如将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世界整体问题来考虑时，那么，其焦点当是

1900年的中国，而义和团事件则是划时期的分界点，这表示了它是从“世界分割”走向“为了再分割”的世界战争的转变期。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问题是帝国主义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义和团的反帝意义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他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这一现实着眼的。该文还认为：不能否认康有为、孙文等人的资产阶级运动具有后进国家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从属于外国势力的一面。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在这一时期，他们已经相当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康有为、孙文（惠州事件）、义和团之间的分歧，并促成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集团黑龙会的发展。江口并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所掌握的史料还不够充分，然而他那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掌握历史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学习的。

同年，村松祐次〔1951〕著文称：他所关心的是“中国人的排外与对外抵抗的行动具有怎样的意图和意义”、“想弄清甲午、日俄两次大战的十年间，中国的内外形势及其格局的情况”。出于这种关心，他从政治背景着眼开始研究义和团。关于义和团的性质问题，村松将其定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张汝梅的乡团化中，义和团已成为具有乡团性质的集团，而在十月却又转为具有会党性质的集团了。

从事外交史研究的曾村保信〔1952〕著文，详细地查对与整理了戊戌变法后清朝的内政变化与外交案件——包括德军占领日照、意大利对三门湾的要求等——、山东天主教会的情况、也涉及到毓贤的态度，清廷是应美国驻清公使康格（Conger）的要求将其撤换的。该文又以清政府与北京外交团交涉的问题为中心，分析了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指出：“清廷的态度反映了满族统治的末期现象”、“认为民气可用的袒匪型，主要是满州贵族和与之随声附合的保守主义的汉人高官，而认为民气不可用的剿匪型的激进派则以汉人为主体”。“汉人优秀分子的民族觉悟正在不断觉醒，

受到孤立的满族统治者为了最后地保全自己，便超越阶级的差异想在蜂拥而起的民众（义和团）中寻找支持者，从而，被其狂暴的冲动所驱使了，这一观点难道不妥吗？”，文章暗示满汉之间出现了分裂。这篇论文是以外交史料为中心，经过精心整理而成，可以从中概括地了解到事件的结构和全貌，可以说是一篇著名的论文，颇有预见地指出了满族的种族主义以及清朝国家的问题。但十分遗憾的是对此提出问题的响应其研究的除后来的野村〔1961〕、佐藤〔1999〕外，别无他人，这一研究成果被埋没于研究史中，未能得到继承与发展。

市古宙三著文〔市古，1951、1952〕对江口和村松的二篇论文提出批评。市古从“传统的”中国史学的立场出发，认为江口的论文是“陈词滥调”、“象似备忘录”，否定了江口所说的：康有为变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义和团的反帝性、占领胶州湾与义和团发生的关联性、义和团与清廷的结合、义和团的民族主义性等。市古还认为江口的论文尚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基础”。对村松的论文则批判说：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从资料上看也不能断定承认其为乡团是出于不得已。对此，村松〔1953〕举出劳乃宣说，认为：承认义和团的本质是会党教门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是“为官民共同防御而崛起的义民”。接受这一论点的森田明〔1953〕认为：应对清朝政府内部的统治结构进行分析，政府对义和团是采取了剿抚并用的对策，而不是予以承认和帮助；并指出在清廷尚未决定对策之前，义和团的骚乱已经扩大，从而在政府内部产生了剿拳派与抚拳派的对立，在对立中抚拳派骤然占了上风。实际上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即义和团本来是起源于在法律上被明文禁止的白莲教，而其所掀起的反基督教运动为什么又被官、民看做是“义民”行为呢？这是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对植田捷雄〔植田，1942〕和佐伯好郎、〔佐伯 1949〕所提出的关于受条约特权庇护的基督教传教问题，在这一时期尚未着手探讨。对中华帝国国家论的考察问题，

在野村〔1961〕指出之前也未能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五十年代初围绕义和团问题的论争对后来的研究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是江口与市古的论争，后来，他们在研究风格上的差距更加扩大了。江口在 1961 年政治学会上发表论文〔江口 1961〕，该文以国际政治情况，也就是以俄法同盟后的世界政策为焦点，关于东亚，他论述了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完成世界分割）、为了再分割而爆发的世界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义和团放在这一大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他认为义和团是在帝国主义外压下的民众运动，与朝鲜的东学党同样都是"仍然披着朴素的封建外壳的"反 帝国主义运动。这些论述后来被整理、归纳于他的著作中，但他并未专门论述义和团，对此，只有寄望于野村沽一了。野村在同学会发表了著名论文〔野村，1961〕。该文认为：列强对中国的"均衡分割"与中国的分裂——分裂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唐才常的"创造自立国"、孙文的"反清革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以武力入侵清朝，而清朝则在刚刚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正处于超传统主义的西太后的统治下。在清国与列强正面冲突的漩涡中，显露出清朝中华帝国的统治原理已经达到了极限状态。守旧派之所以鲁莽地对列强宣战，从当时清朝统治阶层的心理状态（mentality）来看，确有某种必然性。守旧派一贯忠于自己的信条（Principle）。"一君万民"即一君统治万民，同时又受到万民的拥戴，这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原理，就是守旧派的信条。万民的意志就是民气、民心，这是王朝命运的最终保证。从而使守旧派与义和团在"扶清灭洋"这一中华世界型的口号下得以结合在一起。斗争就是原理与原理的激烈冲突，野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本质。我认为：在这个"清朝中华帝国的统治原理"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满州族的种族主义的国家主义"。野村不愧是丸山真男（1914 年生于大阪，1947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任副教授、教授、哈佛大学及牛津大学客座

教授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著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等——译者）门下的高徒，这是一篇杰出的政治思想史论文。

对这一课题，国际政治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东洋史"的研究方法在五十年代初虽曾有过这样一瞬间的交错，但是后来就像一对聋子似的，再也没有交流过。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英修道〔英，1956〕也曾著文评价说："这一清朝人的排外运动，在实际上还具有国权恢复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运动性质的一面。江口和英是从更广阔的角度以透视法（Perspective）来研究义和团。而"东洋史"的研究则是以汉文史料为依据，进行中国一国史的研究，使这一研究局限于专业性较浓的领域中而不肯听取他人的观点。例如：关于列国外交团与清朝政府、义和团的关系问题，村松〔1955〕虽然继承了田保桥的论点，却未能继承从外交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卓越研究的曾村保信〔1952〕的论点。外务省外交资料馆的河村一夫〔1956〕〔1957〕对森田提出的问题加以发展，并分析了清朝内部的权力结构，这一出色的研究也几乎不去理会"东洋史"研究的观点。杰出的外交史专家坂野正高对市古宙三的近代史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此以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再也没有人研究义和团了。

其间，从"东洋史"领域来研究义和团的，还有京都大学派（京都学派）的里井彦七郎、小野信尔、崛川哲男、菅野正等人。里井在京都大学做助教时即与小野等人一起共同研究了近代中国的仇教运动，并着手研究围绕基督教传教的中国反应。这一研究是对以市古为代表的义和团研究中不足之处加以补充的一次杰出尝试〔里井，1954、里井小野，1961〕。在东京支持他们的是集结于历史学研究会的一些中国研究者。

受到京都学派思潮的影响，利用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卷进行研究的是崛川哲男。崛川著文〔1964、1969〕对矢野、市古作

为研究前提的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本身的可信性，在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质疑。他在文中认为：清中期的义和拳与清末期的义和拳已相隔了近九十年，无视这一事实硬要将其直接联系在一起是有问题的。并认为：义和团本来就是多元的仇教自卫集团，像火花似的四处飞溅、传播扩大，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大刀会的法术并得以发展。他在另一篇文章〔1970〕里又认为从民众的言行看，这一运动的性质是：从"出于愤怒而憎恨西洋事物"出发的，"充满迷信等非理性内容"的一次大张旗鼓的斗争。菅野的研究则较此稍晚，他以签订北京议定书的外交，特别是以小村外交为中心进行了研究，并著文〔菅野，1966、1967、1972〕指出：日本要求的赔偿金额是出兵费用的实际数额，而美国等其他各国则提出了过大的要求。

日本的战后历史学——其理论基础是战前被禁止、镇压，战后得以辉煌重兴，并被认为是"真理"在手的马克思主义——在六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其巨大成就之集大成是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后来移居东京的里井彦七郎在为《世界历史》一书写了题为〈义和团运动——穷人的天下〉的文章〔里井，1969〕之后，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相继发表了义和团研究文章。他对十九世纪的仇教斗争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全貌等的论述与考证，不论是在实证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均较历来的研究水平高出一筹。其特征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风格，重视社会经济史和阶级斗争，并能进一步涉及思想领域。他对义和团的咒术信仰问题，认为应该看到其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是二者的统一。这是辩证地把握历史〔里井，1972〕。

里井的义和团论，可作如下概括：甲午战后，列强的资本输出，即帝国主义侵略是发生义和团运动的首要原因。由于列强、买办资产阶级逐渐进入华北地区，在未成熟的资本积累过程，即半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出现农民的极度贫困化，给多数的农民、城市手工

业者、搬运工人、士兵等带来了失业，使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却又不能作为自由劳动力为资本所收购，而沦为半无产阶级滞留于农村。就是这些非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形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义和团的中坚领导层。所以，这一过程是形成义和团主体的必然过程。这样，里井又客观地将其分析为：以社会经济史背景为出发点，又通过矛盾的凝聚、斗争的展开、思想的发展等形式，把整个运动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这一运动与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合乎规律地地从落后发展成为进步。他的这个"半原始积累、半无产阶级论"曾在当时的青年研究者中间广为流传。

在里井的研究背景中有：接受了东京学派及京都学派在"东洋史"研究中提出的应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观（毛泽东史观）为依据的观点，以及受到冷战时期，六十年代末的世界性反越战运动的高涨、在中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与激发，他在研究中用"革命主义"的观点去把握义和团。因此，对斗争的具体对象——教会、传教士的形象与民教纠纷的具体情况，对与起源有关的义和团的性质及其咒术等的把握，对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应如果看待等问题，其论点缺乏慎重的探讨——当然必须考虑到受当时资料匮乏的制约——。他的论述与归纳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斗争史观"。

围绕里井的理论，日本近代史家远山茂树也指出："义和团确有其反帝国主义的一面，但其反封建意识尚且不足。其后一代的学者仓桥正直〔1970〕和小林一美等也批判说：在里井的理论中"存在着轻视当时历史与社会的制约，过高地评价了人民斗争的倾向"（仓桥）。在阐明运动的整体形象与思想意义时，必须从义和团的世界观及其主观结构的内在理论方面加以说明。而这些又是以华北民众的信仰、情念世界、由武和义构成人际关系的世界为基础的。并认为里井的研究是用外科医生的手法来分析、肢解和制成切片用显微镜来观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和思想，而忽视了义和团

的整体形象。并指出:华北民众具有"白莲教、民间宗教和崇拜祖先的世界观",他们对与自己相对立的、异质的、内涵帝国主义的、强行闯入的基督教提出了挑战,因此才出现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小林)。

这期间,市古宙三〔1971〕整理出版了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集。他对堀川〔1964〕与戴玄之《义和团研究》中不能肯定清中期的义和拳与清末义和拳是否为同一事物的见解,与山本〔1950〕相同,认为:既然嘉庆时期在山东有过义和拳教,经过不足百年之后,同样在山东又出现了义和拳教,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流派,这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可以称义和拳为秘密结社会组织,因它掀起了排外运动,后来就被称为团练或私团了。这说明市古接受了村松〔1952〕的"一时乡团化论"。关于起源问题,小林一美〔1975〕也以"从白莲教叛乱到义和团运动"这个系统来把握,从而出现了白莲教秘密结社说与对此持疑问态度的学说(外国人有施达格(Steiger)、戴玄之的团练说)这二者并存的局面。对此提出新见解的是编村松论文集《义和团研究》(岩南堂书店、1976)的佐佐木正哉〔1977、1978〕。

佐佐木正哉受戴玄之〔1963〕的激发,对作为白莲教起源说依据的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进行了仔细探讨,并对团练起源说的依据,即将义和拳化为乡团的张汝梅奏文与梨园屯教案及大刀会等进行探讨之后认为:劳乃宣所说的义和拳是单纯习练拳技的集团,并非宗教团体。而义和门则是信仰集团,与拳技无任何关系。所以劳乃宣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并认为:仅据劳乃宣的观点将其定为秘密结社是有问题的。冠县的梅花拳即义和拳是自古以来即在当地习练的一种拳技,师徒之间及同练者之间有着纵横关系,是一个独自集团。自光绪十八年介入玉皇庙纠纷以来,在与教会的抗争中,其组织得到了加强。自光绪二十三、四年起又吸收了大刀会的"刀枪不入"金钟罩武术咒语,从此成长为可与教

会、外国相对抗的强力集团。最早出现自称义和团的是冠县。巡抚张汝梅对镇压义和拳持消极态度，其奏文具有保留拳民的性质。根据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张汝梅上奏，清政府明确采取将义和拳改编为公办乡团的方针，使之乡团化。大刀会也与义和拳相同，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平原事件后，由毓贤将其名称改为义和团，改编为政府公认的团练，编为"保清灭洋"的战斗部队。也就是说：乾隆时期以来的义和拳是与白莲教无关的一种拳技，它在介入反教会的斗争中引入了带有符咒性质的大刀会金钟罩武术，并被山东当局改编为正式团练——义和团，大刀会也同样被当成了义和团。

这篇论文，在尚未充用利用《教务教案档》及其他档案史料的阶段，确是一极为详尽细致的论证文章。但是，对那彦成奏文中所说的义和拳是否是单纯的拳技问题，则有必要跳过那彦成的奏文，对秘密宗教的白莲教即八卦教本身作进一步探讨。此外，冠县的梅花拳即义和拳也仅仅是拳技吗？还有，大刀会是怎样的组织？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探讨的余地。还有一个遗留问题是：张汝梅的乡团化的意图是清楚的，但是，果真将其改编成乡团了吗？尚未得到证实。关于这些起源问题，与佐佐木取同一方向性从事研究的佐藤公彦〔佐藤，1979〕著文认为：应追溯至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叛乱中的文弟子与武弟子等来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战后历史学派于 1978 年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史讲座》（共七卷，东京大学出版会）标志着这一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书中对义和团问题，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堀川哲男仍持前述论点，小林一美则就民众思想问题论述了其所持论点（后述）〔堀川，1978、小林 1978〕。

1980 年在中国召开了〈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会上介绍了中国国内外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公布了一批调查资料和档案史料，使得有助于研究的史料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出

席这一讨论会的佐藤公彦利用档案史料对提交大会的文章作了补充之后发表了一篇论文〔1982a〕。该文反对了佐佐木正哉的起源学说,认为:乾·嘉时期的义和拳是在"白莲教"即八卦教的"文·武"结合组织论指导下,与宗教相结合从事习练的一种拳棒,所以被人看做是与"白莲教"同义的组织。与"白莲教"相结合、带有宗教、咒术性质的拳棒后来在山东地区曾被广泛流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大刀会、义和拳运动。从这一点考虑,劳乃宣说尚有其直观的正确性。此外,佐藤还写了初期义和团运动论〔佐藤,1982b〕,文中认为:山东西南部的大刀会是八卦教的武派组织。它在甲午战后的特殊情况下,作为一个自卫团体,其势力得以扩大。而在同一地区,在法国对天主教拥有保护权的情况下,通过圣言会的传教活动不断扩大了教会势力,致使民教之间对立频生,于是大刀会介入了这一民教纠纷,不久引起了巨野事件。据此,佐藤提出了义和团(拳)起源于八卦教武场说。

1982年《史潮》杂志出了一期〈义和团运动〉的专辑,刊出了孙祚民、周锡瑞、佐藤公彦·斋藤晢、黑羽清隆等人的文章。周锡瑞的〈传教士·中国教民与义和团〉与佐藤〔1982b〕一文正式提出了教民问题。黑羽〔黑羽,1982〕则指出:对义和团,有些日本人的认识是对中国的民众民族主义给予否定的、贬低的评价。三十年后日本又再次为类似义和团的大刀会、红枪会的抵抗所困扰(此处指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地区的民众抗日活动——译者),其中就有日本的特殊义和团体验的历史位置。

同时参加上述讨论会的小林一美于1987年出版了《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一书〔小林,1987〕。他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清朝的权力阶层也好,人民也好,都分裂为媚外与排外两个不同的方向,并共同经历了一个崩溃的过程。扰乱下层大众生活的是在国内不断加强其传教活动的基督教会,由于贫民的入教,增强了教会、教民的势力。这样,在本是小宇宙

的自然村落，即在小共同体的世界里酿成了分裂与抗争。就是这一宗教问题引起了运动。人们相信只要接受"邪教"就能获得与之相对抗的威力，于是就由白莲教、秘密结社的成员、英雄好汉们掀起了这场运动。然而，为了超越其狭窄的界限，就必须有秘密结社与土著村落农民的共同体意志，保卫乡土意志的结合，由此而产生的便是义和团运动。自然村落内的下层农民从外部把带有民众威力的外乡人(outsider)请入村落的圣地，并拜其为拳师、大师兄——这些邪教徒、秘密结社的成员们受到了农民的公开欢迎，他们在村内设坛搞降神附体活动，使村内的地主权威和封建秩序、封建意识形态变得软弱无力，将村落变成民族防卫的堡垒，即小宇宙——，从而革命地重建了自然村落。在这里为民众所崇敬的各路神仙得以复活再生，人们作为民族精神和民俗诸神的代理人活跃于各地，肩负着爱国运动的重荷。义和团就是通过创建这样的村落共同体的增殖运动来对抗民族危机的运动。因为这是一个以建立灭洋民族共同体为理想的运动，所以，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口号中的"扶清"象征着民族的共同性，把吾辈江山、吾辈社稷耸立于"洋鬼子"的面前。"扶清灭洋"这一口号是拥护一个作为共同的带有幻想性的"清"，一切都淹没于灭洋之中了。"清"是全中国共同象征的"清"。这是小林对义和团运动法则的定型化的结语。

小林的研究虽有理论性、抽象性的难以理解之处，却具有逼近运动本质的魄力。可以说这是试图摆脱战后历史学束缚的艰苦奋斗的结晶。小林的研究明显地说明：在这一论争的场地(arena)中提出了应如何把握义和团的"民众思想"问题。可以说，这也是对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安丸良夫〔安丸，1974〕等人研究民众思想的一次共振。历史学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历史学的中心，其1987年的大会主题是民众运动与民众思想。这说明日本的历史研究受到阿奈尔派社会史、E·P·Tamphson的经济道德(moral economy)论以及Walerstein的世界体系(system)论等的影响，正在起着很

大的变化。在大会上就义和团问题发表文章的是中村哲夫〔中村，1988〕，这说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仍未摆脱战后历史学的束缚。

充分显示日本世界史研究已从战后历史学中解脱出来的是《社会史研究》杂志和《向世界史提问系列丛书》全十卷（岩波书店，1990）的出版。其中论及义和团问题的是其〈民众文化〉卷的〈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观〉〔佐藤，1990〕一文，指出了义和团的民族意识和拥护国家的一面，认为：义和团运动，从其实际情况看，它是要通过驱逐教会、教民的行动来圣化地域社会的空间。而其思想本质从"神助灭洋"这一口号看，——"扶清灭洋"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有其局限性——义和团是能够接受各路神仙保护和帮助的民族正义的体现者，通过排斥外国来使黎民百姓能安定地生活，以此来捍卫和恢复天下的人伦秩序，义和团就是具有这样思想的运动，这是一种"民族意识"。该文又指出：对于这样的思想和运动志向来说，清朝国家作为一君万民，行使着保护民生的权力，并自认其具有正统性，从而使这样的清朝国家得到了义和团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承认。这就是义和团的民族意识、拥护国家的一个侧面。

这时期，研究者们得以进入在战后日本人不可能看到的中国农村进行调查，于是产生了基于调查的研究动向。佐佐木卫〔1987〕是这方面的先驱，自 1986 年至 1989 年日中两国研究者合作，对与义和团有关的地区进行了华北农村社会调查。作为成果，出版了论文集〔路遥、佐佐木，1990〕。该书以华北农村的家产均分继承文化、亲族集团的分化与统合、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武术文化、民间宗教和信仰、天主教传教与农村社会、秘密拳会梅花拳、帝国主义与义和团、民族主义等为题，用日文进行了论述。提出：有必要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基础上来考虑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终于有可能对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以这一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迫使人们对战后日本在中国研究中所绘制的中国社会形象进行修正，唤起人们对战前的〈惯行调

查)及研究进行重新探讨的必要感。而且也对义和团研究赋予了实感性。调查记录以佐佐木〔1992〕形式公开出版。

基于这一调查,佐藤写了题为〈华北农村社会与义和拳——梨园屯村的反教会斗争〉〔佐藤,1993〕的论文,对长达20年之久的梨园屯教案,抓住耶稣会、方济各会的传教活动和农村社会结构,详细地阐述了由教民与村民的对立所引起的村内共有地产——玉皇庙的土地纠纷和围绕当地的教会化所不断发生的纷争,以及对其审理的过程。对审理中双方的主张与法律意识的差异问题,该文指出:这是由于华北农村社会土地买卖的习惯观念和经济道德(moral economy)与依据条约、协定的近代所有观念相互矛盾所致。并指出:这是近代中国难以处理的文化摩擦的一个典型。该文也介绍了在法国的外交压力下民众抵抗受挫的经过。还指出:在以士绅为中心的全体村民的抵抗受挫之后,十八魁便奋然采取了实力斗争的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了地域社会的传统价值,即一般常见的实力斗争方式。而其深层的背后还存在着族内的对立和族内规范秩序的危机。还有,赵三多的梅花拳并不是单纯的武术(周锡瑞说认为是单纯的武术),它有文场·武场组织论,是信仰无生老母的宗教(白莲教)武术。它在介入梨园屯教案时改名为义和拳,并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的危机感中,在"顺清灭洋"的旗帜下揭竿而起。该文从生活在农村社会的人们的感性和意识(民众文化)方面来抓住问题的实质。这一梅花拳即义和拳,也说明白莲教起源说是妥当的。

1994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来自亚洲的思考》一书,全书共分七卷,在〈亚洲的近代——民众运动与体制构想〉的一卷里,关于义和团运动,收有周锡瑞所写〈义和团的文化前提〉一文。该文是他的著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的第二章内容经压缩后用日文发表的。他在文中再一次阐述了对"白莲教"派(sect)起源说的批判见解。对此,佐藤公彦对周锡瑞的民间文化起源论进行了

方法论的批判，认为是大刀会金钟罩即原神拳的逐渐扩大化，结果形成了神拳即义和拳〔佐藤，1995〕，

此外还有三石善吉，他与上述战后历史研究不同，是以政治思想研究的独特观点来看待义和团。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文化帝国（其本身具有文化优越感）"以民制夷"的惩罚原理与白莲教·义和拳（有反体制性质）的保卫家乡思想，在列强侵略的危机感中采取了文化的、人种的千年王国运动的形态。这是丸山真男所说的"前期民族主义"〔三石，1984〕。后来，他又在以千年王国论来研究中国当中，将义和团定位为儒·佛·道的千年王国，并进一步以千年王国论将义和团运动整理成书〔三石，1996〕。从历史学角度看，这一观点很难成立，而且在史实上也有很多错误。在日本，这是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本最为通俗（popular）水平的读物。

1999年，佐藤公彦出版了包括其历来研究在内的著书〔佐藤，1999〕。该书中运用了北京与台北的大量档案史料，再一次地批判了周锡瑞说。认为：义和团起源于"大刀会"与"义和拳"，而大刀会是八卦教的武场组织，"义和拳"则是在其武场组织中演练的一种"拳教"武术。冠县的义和拳是梅花拳的变称。此梅花拳也是与民间宗教有关联的"拳教"。所以起源是与民间宗教（白莲教）相结合的"拳教"武术。神拳则是大刀会的变相组织。是由该等的融合而形成了"义和团"的运动。佐藤还利用德国圣言会的史料详细论述了该大刀会在1896年的斗争和巨野事件。并使用总理衙门档案《收发电》等，弄清了戊戌政变后在反对外国风潮中发生的沂州教案，致使德国军队入侵山东腹地，并在刺刀威胁下强行要求毓贤处理问题，从而增强了毓贤及山东当局的反外国姿态。此时整个山东社会充满危机意识，因此地方官员便允许和承认了拳民运动，从而爆发了1899年秋义和拳即神拳掀起的反教会斗争。而且还提出了如下独到的见解：在鲁西北神拳的斗争中，义和拳民众自称是"正义的代理人"。斯密士（明恩溥）的团练起源说仅是为唤起美国

外交介入的诡辩，并无实证。神拳的活动波及至直隶东南代牧区和直隶北部代牧区，相继发生了景州、河间、清苑、涞水等地的事件。农村地区的义和团扬言要“打到天津去火烧租界”，使天津成为运动的焦点。该书连贯地叙述了从“顺清灭洋”到1902年景廷宾起义的“扫清灭洋”的整个运动过程。还论述了围绕这些事件的一系列外交、国际关系以及北京外交团与清朝政府、清朝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以及围绕宣战问题的议论与决心、戊戌政变后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满汉对立等相关问题，从而构成一部义和团“会史”。笔者对自己的著作加以评论实属不妥，但该书对百年来在义和团研究史中论争的几乎所有问题，通过农村调查及新史料的实证，大体上都作了全面的明确解释。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是总括性、归结性的研究。

最后，在日本的义和团研究史中还有另一个领域，那就是〈义和团事件与日本〉这个课题。对此在国际政治和日本史研究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在此仅作概略的叙述。

关于日本的舆论动向问题，菅野正〔1966〕以大阪每日新闻为主要材料发表文章，弄清了日本在甲午战后的对外扩张主义风潮中，围绕应付义和团事件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涉及到黑龙会、对俄同志会、玄洋社等，说明了与江口〔1951〕提出的问题有关联。关于日本政府的出兵与列国的外交姿态问题，山口一之〔1968、1970〕发表文章认为：义和团事件中，日本急忙派出临时派遣队是对俄国出兵的对应行动。后来的对应措施，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与列国一致原则下的出兵外交。(二)乘俄罗斯占领满州、英朝出兵上海之机，日本则试图调整在朝鲜的对俄势力并加强对清朝南部的经营态势(后遭挫折)(三)日本作为对李鸿章等温和派进行工作的邻国，出兵表示了一种讨好的姿态，其中(一)出兵外交问题有稻生典太郎〔1952〕详细的外交史研究；(二)的“厦门事件”问题，有永井算巳〔1960〕、佐藤三郎〔1963〕、大山梓〔1965〕、小

林一美〔1987〕等人的详细研究。

永井算已在论述厦门事件中以清朝东南督抚的抵抗为背景的"东南互保"约款问题的文章〔永井 1960〕的前一年,发表了〔永井,1959〕一文。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该文指出:在"东南互保"背后的张之洞有防卫中国殖民地化危机的志向,这个"东南互保"约款在事实上成为镇压自立军的法律、政治上的支柱。这一约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东南九省一事成为两广总督李鸿章对付出现于香港总督、孙文派等人的"两广独立计划"的政治背景。该文还指出了:从这些情况看,"东南互保"约款对内具有反康有为、梁启超派、反民族共和革命(孙文派)的性质,对外则具有反帝性质的双重结构。由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这一稳重的和平活动,才勉强地支撑了清朝的命运。

关于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堀川哲男〔1966〕作了先驱性的工作,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高度评价为优异的论点。这与野原四郎〔1968、1972〕及久保田文次〔1970〕的工作相关联。野原还发现了 1901 年刊载了《女子杂志》513 号上,青柳猛所写的〈义和团谈论〉,并作了介绍,这是十分难得的。

以上是日本百年来研究义和团的轨迹,最后还想附加一言:1999 年北约(NATO)军打着"人道"的旗号,为"科索沃"问题轰炸了南斯拉夫。使人不能不想到这与百年前列国的代表威胁清朝、义和团,说他们犯下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岂不一样吗?每当听到"文明的冲突"、"反人道的罪行"等这些词汇时,就不能不痛感现在也还有义和团事件。对于义和团运动及其事件,必须从中国历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去内在地把握,同时,我希望还要从"世界史"的角度去把握。

(作者单位: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

引用文献目录(基于年代顺序、按论述顺序排列)

有贺长雄 〔1900〕〈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日英外交始末〉《外交时报》3－32等

矢野仁一 〔1928〕〈义和拳乱的真相〉《史学杂志》38.9(后以〈义和拳乱之本质〉为题,收于《清朝末史》1944中)

矢野仁一 〔1944〕〈义和拳乱之真相〉《清朝末史》(大和书房,1944)第四章

矢野仁一 〔1934〕〈义和拳乱与俄罗斯的占领满州〉《东亚经济研究》18·1。

园田一龟 〔1934〕〈满州拳匪之乱〉《满蒙》15－4.5.6.7(1934年,奉天图书馆发行的小册子)。

田保桥洁 〔1939〕〈义和拳乱与日俄〉、收于史学会编《东西交涉史论》(富山房)。

市古宙三 〔1948a〕〈义和拳的性质〉《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究会现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好学社刊〔再录于市古宙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市古宙三 〔1948b〕〈义和拳杂考〉《东亚论丛》六号,1948,〔再录于市古宙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山本澄子 〔1950〕〈义和拳的性质〉《史观》33。

江口朴郎 〔1951〕〈义和团事件之意义〉《历史学研究》150(1951.3)。

村松祐次 〔1951〕〈义和拳乱—1900年—的政治背景〉、《一桥论丛》26卷5号。

市古宙三 〔1951〕〈关于江口朴郎氏《义和团事件》〉,《历史学研究》153(1951.9)。

市古宙三 〔1952〕〈1951年历史学界——清末民国〉《史学杂志》61编5号(1951.5)。

曾村保信 〔1952〕〈义和团与清国政府〉《国际法外交杂志》51卷2号。

村松祐次 〔1952〕〈义和团乱的社会经济背景〉,《一桥论丛》28卷1号。

森田明 〔1953〕〈拳匪剿·抚两论考〉、《岩手史学研究》13号。

植田捷雄 〔1943〕〈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法律地位〉、《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册。

佐伯好郎 〔1949〕《清朝基督教之研究》(春秋社,1949)。

江口朴郎 〔1961〕〈1900年前后的世界〉、《年报政治学1961—现代世之开幕》日本政治学编,岩波书店刊。

野村浩一 〔1961〕〈义和团事件前后之政治、思想状况〉、《年报政治学 1961—现代世界之开幕》日本政治学会编，岩波书店刊。

英修道 〔1956〕〈有关义和团事件之一考察〉《法学研究》(庆应大学)29 卷 11 号。

村松祐次 〔1955〕〈涞水事件与列国出兵〉《一桥大学创立八十周年纪念论集》F、《劲草书房，1955)。

河村一夫 〔1956〕〈荣禄在义和团事变中的事绩〉上、中、下，《历史研究》4 卷—1.2.3。

河村一夫 〔1957〕〈义和团事变与日本〉，《国际政治—日本外交史研究·明治时代》(有斐阁，1957 秋季)。

里井彦七郎 〔1954〕〈十九世纪仇教运动的一个侧面〉、《东洋史研究》13 卷—1.2.3.4 号。

里井彦七郎·小野信尔 〔1961〕〈十九世纪中国的仇教运动—对殖民地主义的抵抗〉、《世界历史》第 11 卷(筑摩书房，1961)。

堀川哲男 〔1964〕〈义和团运动研究序说〉、《东洋史研究》23 卷—3 号。

堀川哲男 〔1969〕〈义和团的形成〉《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第 18 号。

堀川哲男 〔1970〕〈从民众的言行看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岐阜史学》57 号。

菅野正 〔1966〕〈义和团事变与日本舆论〉、《历史(History)》(大阪历史学会)44.45 号。

菅野正 〔1967〕〈北京议定书的缔结过程——以小村公使的赔偿交涉为中心〉、《历史(History)》49 号。

菅野正 〔1970〕〈辛丑条约的成立——以庚子赔款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1 卷－3 号。

里井彦七郎 〔1969〕〈义和团运动——穷人的天下〉《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 22 卷(近代 9)。

里井彦七郎 〔1972〕《近代中国的民众运动及其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

仓桥正直 〔1970〕〈关于义和团运动〉、《历史学研究》360 号。

小林一美 〔1970〕〈义和团民众的世界〉，《历史学研究》364 号。

小林一美 〔1973〕〈书评：里井彦七郎著《近代中国的民众运动及其思想》〉、《历史学研究》394 号。

市古宙三 〔1971〕《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所收〈义和拳的性质〉之〔追记〕309－301 页。

小林一美 〔1975〕〈从白莲教叛乱到义和团运动〉《面向历史学的重建》(浓尾社)。

佐佐木正哉 〔1977〕〈义和团起源〉上、中,《近代中国》(岩南堂书店)第 1 卷、第 2 卷。

佐佐木正哉 〔1978〕〈义和团起源〉下,《近代中国》第 3 卷。

佐藤公彦 〔1979〕〈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叛乱小论——义和团论序说〉、《一桥论丛》81 卷—3 号。

堀川哲男 〔1978〕〈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讲座中国近现代史 2 义和团运动》(东京大学出版会)。

小林一美 〔1978〕〈义和团的民众思想〉、《讲座中国近现代史 2 义和团运动》(东京大学出版会)

佐藤公彦 〔1982a〕〈义和团(拳)源流—八卦教与义和拳〉《史学杂志》91 编 1 号。

佐藤公彦 〔1982b〕〈初期义和团运动的各种表现—教会活动与大刀会〉、《史潮》新 11 号。

黑羽清隆 〔1982〕〈日本人的团匪观〉《史潮》新 11 号。

小林一美 〔1987〕《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汲古书院。

安丸良夫 〔1974〕《日本的近代化与民众思想》、青木书店。

中村哲夫 〔1988〕〈中国农村社会的市场社会与民众生活——义和团的诸神〉、《历史学研究》573 号。

佐藤公彦 〔1990〕〈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观《世界史问题系列丛书 6,民众文化》岩波书店。

佐佐木卫 〔1987〕〈近代华北村落社会的结社性质〉《季刊人类学》18 卷—1 号。

路遥·佐佐木卫编 〔1990〕《中国的家庭、村落、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方书店。

佐佐木卫编 〔1992〕《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文化——日中共同研究·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集》,东方书店。

佐藤公彦 〔1993〕〈华北农村社会与义和拳运动——梨园屯村的反教会斗

争〉、《亚非语言文化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45 号。

佐藤公彦 〔1995〕〈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对周锡瑞说的批判、《史学杂志 104 编 1 号。

三石善吉 〔1984〕〈义和团与"以民制夷"的谱系〉、《中国近现代史的诸问题——纪念田中正美先生退休论文集》图书刊行会。(收于三石善吉《中国的千年王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

三石善吉 〔1996〕《中国,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光芒》中公新书 1299(中央公论社)。

佐藤公彦 〔1999〕《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研文出版。

山口一之 〔1968〕〈义和团事变与日本的反应——一派遣陆军部队的动机〉、《国际政治—日本外交史的诸问题》,第 37 号。

山口一之 〔1970〕〈义和团事变与日本的反应(二)——火中取栗〉《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方法》第 39 号—2。

稻生典太郎 〔1952〕〈义和团与日本出兵外交—第五师团出动前的经纬〉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开国百年明治文化史论集》,乾天社。

永井算巳 〔1960〕〈互保约款与厦门事件〉《信州大学理学部纪要》第 10 号。

佐藤三郎 〔1963〕〈有关明治 33 年厦门事件的考察—近代日中交涉史的一个片断〉,《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 5 卷 2 号。

大山梓 〔1965〕〈义和团事变与厦门出兵〉,《历史教育》第 13 卷 12 号。

永井算巳 〔1959〕〈从日中关系史料看东南互保约款〉《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纪要》第 9 号。

堀川哲男 〔1966〕〈义和团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第 15 号。

野原四郎 〔1968〕〈关于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专修史学》第 1 号。

野原四郎 〔1972〕〈围绕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专修史学》第四号。

久保田文次 〔1970〕〈围绕"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谈"的笔者〉《史洲》第 11 号。

(任明译)

俄苏学者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评述

(俄)A.A.博克沙宁

19—20世纪之交时,中国爆发的义和团("和平与正义之师")民众运动及随之而发生的八国列强对中国进行的武装干涉,曾引起俄国舆论界的密切关注。当时发表了事件目击者和参与者的一些文章,对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评介。但这些文章仅限于作者个人的印象,未引证文献资料,因而从学术角度来看,是不够严谨的。文章中既有对各国列强在中国的某些行动的谴责,也有赤裸裸的沙文主义论调(12;14)。但就在那时,对发生事件进行科学思考的人已开始出现。在这方面,首推A.B.鲁达科夫教授和他的著作《义和团及其在远东时局中的作用》(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

鲁达科夫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时说,义和团是在中国有着久远传统的秘密会社(教派)的一种,神秘意识在其参加者之中有很大作用,他们追求精神上的完美,其言行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对与中国格格不入的欧洲文化入侵及外国工业扩张的反响。他在谈到对欧洲文化的理解时,很重视基督教及其布道的传教士的作用。按照他的看法,义和团是自发产生的,但大清帝国政府出于本身的利益利用了义和团运动,有一段时间充当了义和团举义组织者的角色。促使清政府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是:一方面是害怕广泛的民众运动失去控制,另一方面是意识到

双方有些意图一致。就政府来说,看不出对义和团运动有任何歧异或模棱两可的态度(46,第43页)

鲁达科夫谴责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行动,但同时也怪罪中国当局,认为清政府面对西方的进入未采取必要的行为(46,第30页)。他没有把俄国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做是与中国利益相抵触的行动,所以他说义和团和清军与俄国的冲突是一场"误会"(46,第77页)。尖锐抨击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及行动,也见于当时俄国其他几位学者的言论中。如:A.斯托尔波夫斯卡娅的文章《中国人与洋人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后果》(莫斯科,1903),B.B.科尔萨科夫的述评《北京事件》(圣彼得堡,1901)等。特别是科尔萨科夫,他在述评中写道:"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带给信奉异教而文化独特的中国民众的是伪善和谎言。欧洲人得到的只能是所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的仇恨和鄙视……在北京我看到人们那冷漠无情的神态,是我这辈子在任何别的地方从未见到过的"(28,第14页)。另有一些学者则相反,如:H.K.米哈依洛夫斯基和C.H.尤扎科夫,他们为各国列强在中国的行动辩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反对"欧洲文明的血腥暴乱"(37,第102页;55,第116页)。

B.и.列宁对19—20世纪之交时中国发生的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就此事件在1900年12月份的《火星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31,第4卷,第378—383页),并在以后的许多著作中一再提到这一事件。显然,列宁关注这一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利益这一角度来看的。他据此提出了这一事件起因的问题。列宁认为,问题不是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也不纯粹是种族憎恶,而是各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在整个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掠夺政策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是对这种政策的反响。列宁在谴责西方列强的同时,也抨击了俄国沙皇政府在远东的政策。与此同时,他认为俄国仅是附合了西欧列强早就对中国实施的掠夺行径(31,第4卷,第379页)。

列宁还把义和团运动称做是"中国的旧式的骚动",尚未成熟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整体落后所致(32,第17卷,第179页)。列宁的评论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继续进行此项研究有很大影响,当时俄国用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和政治的方法占优势。

用政治化的方法以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前景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在20—30年代苏联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著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有时变成了空泛的抽象议论,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但就在那时,也有不少研究者力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页。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公布了俄国对外政策档案收藏的有关中国义和团的文献资料(2,编者 А.Д.波波夫)。20—30年代期间,在有关中国历史(К.А.哈雷斯基、Г.И.萨法罗夫)(48;52),中国近现代史(Н.В.屈纳)(30;38),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史(А.Е.霍多洛夫、М.П.帕夫洛维奇等)(21;54),俄国外交史(42;45)等许多著作中专门列出义和团运动的章节。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些专门阐述这一问题的文章。这里应提一下А.Е.霍多罗夫(53)、Д.М.波兹涅耶夫(44)、П.А.格里涅维奇(11)、М.И.巴拉诺夫斯基(1)、Е.苏格罗博夫(50)等人的文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恢复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从这时起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政治色彩明显减少,科学的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不过在对19—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行动进一步的关注中,可以看到"冷战"的某些影响(参看Г.В.叶菲莫夫、А.А.富尔先科(富森科)、С.Б.戈列利克、А.С.耶路撒冷斯基、Л.Л.扎林娜和С.Г.利夫希茨的著作(17;51;10;15;16;19)。促使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的是,1968年出版了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其中收入很多从中文翻译的史料,这是以前俄苏史学家很少利用过的(7)。在有关世界史、东方各国及中国史、国际关系史等(3;6;8;9;18;22;29;36;39;

40;47)一般著作中,对这一题目仍很关注,还有一些文章和学位论文,其作者有 M.Ф.布罗茨卡娅(4)、B.多纳泽(13)、C.Г.利夫希茨(35)等。

在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H.M.卡柳日娜娅的著作占有特别的地位,她多年来全面研究这一课题。成果是 1978 年出版了学术专著《义和团起义(1898—1901)》,还出版了关于这一课题的历史文献书籍(23;24),据我所知,这是迄今唯一的一本。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就划上了句号。表明这一点的是,1998 年出版的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有关义和团的章节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述与上述作者的看法就有些不同(20)

以上扼要叙述了苏联对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进程。现在来介绍一下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几种主要不同的评价。我们先来看运动产生及导致起义的原因。常提到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列强对中国的奴役。这里指两个方面:经济上指机器生产的西方商品和西方资本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人们(11,第 85—86 页;20,第 354 页);政治上指国家丧失独立的危险(6,第 248 页;23,第 330 页)。同时也要指出,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扩张最早是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也就是说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激起了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各阶层民众的反抗(29,第 23—24 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 1894—1895 年对日战争的失败起了特别的诱发作用,庞大的赔款加深了民众的困苦处境,在排外思潮中,要提一下绅士的立场这一因素,这一有影响的社会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代表,他们不接受随着外国人的渗入而在经济和文化上发生的变革(20,第 354 页)。由此也就谈到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不符身份的活动(1,第 128 页)。有些作者写道,义和团运动与 19 世纪 90 年代末几乎在中国全境风起云涌的民众起义和运动有密切的联系(48,第 223—224 页;18,第 126—127 页;39,第 334—335

页)。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早期阶段,也有人提出义和团运动和起义产生的原因纯粹是中国内在的,如封建压迫的加重和上层政权的危机(50,第72页;54,第65页)。还提到政府对运动的诱导问题,政府力图转移日益高涨的民众怒潮,把其引向排外的轨道,以期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52,第370及373—374页)。最后,有人说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看出"革命的形势"(11,第86页)。但从后果看,这一推论值得质疑。

关于运动发生的时间也没有定论。Г.И.萨法罗夫认为,义和团运动起于1897年京城所在的直隶省北部区地区(48,第225页)。大多数俄苏学者认为,运动的开端是1898年山东省爆发的骚动。而且在具体时间上也有不同说法,一些人倾向于发生在秋季,另一些人认为发生在四五月间(20,第354页;24,第173页)。也有人说运动1899年才开始,甚至是从1900年开始(24,第92页)。运动终止的日期也有不同的说法:或是外国军队攻占北京的1900年8月(40,第71页;6,第247页),或是清政府签署最后议定书的1901年9月(5;24,第174页;20,第356页)。

义和团运动的过程分三个阶段:一、从运动兴起到1900年夏初,这一阶段起义者自主举事,斗争的矛头是反对洋人的基督教徒;二、从1900年夏初到同年8月北京陷落,这一阶段起义者与政府协同行动,运动席卷满洲;三、从1900年8月到签署最后议定书,这一时期清政府投降,外国军队围剿起义者的最后基地(5;24,第174页)。研究者都提及起义在山东、直隶、满洲东北各省爆发的不同时间。

义和团运动的排外倾向是众所公认的。但有些学者考查到运动也有国内的政治动因。如萨法罗夫认为,运动起初并不带有反对外国的色彩,起义者要求的是减税和释放无辜的被捕者。他指出,起义者反对基督教徒和洋人的举动,只是到1899年夏才见之于文献(48,第226页)。К.А.哈雷斯基也写道,起义发展壮大初

期是反政府的(反清王朝的,即反满清的)(52,第376—377页)。认为义和团具有反对外国奴役和反对农奴制及满清王朝双重倾向的,还有苏联早期的П.А.格里涅维奇及其他几位学者(11,第271页;50,第72页;21,第5章,第32页)。指出义和团运动有反封建动因的还有М.Ф.布罗茨卡娅和Г.В.叶菲莫夫(5;18,第129和142页)。此外,1998年新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该章节作者为А.А.皮萨列夫),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政府的全国民众运动的一部分(20,第353页)。然而在苏俄学者中,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Н.М.卡柳日娜娅却认为,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是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因而不是为了解决国内问题的(23,第333页)。В.Н.尼基福罗夫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运动有什么反封建的倾向(6,第248页;40,第13页)。也有人推论说,影响义和团运动性质的是,运动发生在中国北方,同华中华东华南相比,运动爆发在中国社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52,第377页;48,第233页)。

运动的倾向决定了起义者的纲领,纲领尽管不够明确完备,但从其口号"扶清灭洋"中可以看出来(24,第7页)。这就是说,口号中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外国的侵略势力。可是那些认为义和团运动有反封建倾向的人,根据某些具体情况推论说,起义者提出的要求中有夺取基督教的土地和财产,对富人课重税,减轻农民负担等(48,第229页)。

总体来看,对义和团运动成员的社会成分,俄苏学者没有分歧。但不同学者对各社会阶层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提及复杂的社会阶层,其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搬运工、士兵、僧侣、学生,还有贫民阶层的游民、乞丐、仆从、家奴、妓女、被起义者释放的囚犯、无业匪徒(土匪)等。他们还提到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很多学界政界的绅士和官吏以及政府当局的某些高层代表人物。虽然有些学者看不到农民起义者在运动中起多大的

重要作用(43,第32页),但另一些学者从总体上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看做是起义的主要推动力量(24,第7及61页;54,第66页;1,第128页;50,第72页),还有些学者认为主力只是贫雇农和城市贫民(11,第268页),或者生计无着的农民和农村的流氓阶层(48,第229页)。Г.И.萨法罗夫把起义中的重大作用归于城乡的流氓阶层,称他们是"流氓中的健康成分"。他得出这一结论是根据运动的很多领导人物出身于这类阶层(48,第229—230页)。还论及起义者之间存在的内部矛盾(48,第233页)。总体来看,正如H.M.卡柳日娜娅所说,研究者对义和团运动中各社会阶层的作用还探讨得很不充分(24,第174—175页)。

大多数学者,和上面提到的A.B.鲁达科夫一样,都谈到了义和团组织与秘密会社在思想上的相近。关于这一点,有些学者认为义和团源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莲教派(43,第32页;48,第225—226页;18,第127页;8,第264页)。但是,H.M.卡柳日娜娅认为上述观点出自中国旧的历史文献,不符合实际情况(24,第170—171页)。K.A.哈雷斯基阐述义和团与秘密会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联系时说,在中国当时存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没有可能进行正常的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政治活动只得秘密进行。谈到起义者本身的思想意识时,他认为起义者缺乏明确的目标(52,第376页)。起义者在思想上有以下特点:崇拜神秘教派和宗教仪式,以此吸引并恐吓人们,笼络人心;他们狂热,禁欲,蒙昧,鼓吹民族的狭隘性,把中国传统与欧洲文化价值对立起来。因此,起义者的宗旨在思想上具有中世纪的特点(48,第233页)。俄苏研究者认为,正是起义者思想上的这些因素以及和满清政府的合作,才使中国的改革派、民主派以及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不拥护义和团运动(20,第356页;48,第333页)

研究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思想宗旨和组织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如H.M.卡柳日纳娅,她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三教九流秘密

会社的同盟，是自发组成的地方民团、盗匪的结盟，相互之间的联系松散，没有统一的领导(23，第329页)。Г.И.萨法罗夫也说，起义者之中有某种垂直领导，领袖统辖着互为从属的"坛口"，但没有发现起义者之间有广泛的政治组织(48，第232页)。П.А.格里涅维奇也谈到起义者对领袖的隶属关系是"附庸"关系，领袖很快会蜕变为"十足的封建主"(11，第269页)。然而，上述两位学者仍认为，在起义者控制地区可能出现管辖居民的"新政权的雏形"(与旧的不同——作者注)(11，第267页；48，第230及232页)。也有人推测运动可能会有统一的指挥中心(46，第8页)。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不赞成这一观点(24，第36页)。Г.И.萨法罗夫指出，起义者的行动有无政府思潮因素(尤其是在京津地区)：不服从地方当局管辖。掠夺浩劫，擅自惩治等。你П.А.格里涅维奇一样，他推断说，运动的最终结局可能会导致推翻旧王朝又出现一个新王朝的统治(11，第269页；48，第231—232页)。

关于清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立场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当局自己煽动起义和团运动的(54，第13页；30，第104—105页；11，第263—264页)。有的还补充说明，这种唆使起初是隐蔽进行的，后来才公开行动(52，第370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而清政府只是鼓动或利用而已，之所以利用是为了转移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时又可给外国干涉中国以反击，从而把民众的愤怒引向排外的轨道。有些研究者把政府这一方针与1898年依靠中国北方统治阶级保守阶层而掌权的集团联系在一起，该集团力图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48，第227—228页)。这样，政府招抚义和团，使义和团合法化，力图使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政府并未成功(54，第65页；2，第8页；48，第227—230页)。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的立场有所改变，未始终如一。但对此问题各有所侧重。Н.М.卡柳日娜娅认为，政府起初对义和团运动有所容忍，纵容义和团的排外行动。可同时政府

有时也禁止义和团运动。只是在外国列强武装干涉后，政府才公开与义和团走到一起(23，第330—331页)。与此相反，A.A.皮萨列夫认为，政府起初把义和团看做是暴乱，积极进行镇压，委任袁世凯督办。利用义和团运动排外的意图，只是在各国列强武装干涉开始后才出现的(20，第354—355页)。

H.M.卡柳日娜娅还提到地方当局和上层人士对起义者的态度问题。她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北方地区部分当地上层人士赞同起义者的排外思潮并给予某些支持。但是，中原和南方各省的上层人物不支持义和团运动，甚至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举动在这些地区扩展的企图(23，第331—332页)。

俄苏学者和评论家对义和团运动及其被镇压事件的总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苏联时期以前，俄国学者是从西方与中国不同文化传统冲突的思路来探讨的。固然有些人，如A.B.鲁达科夫，从冲突中也看到反对外国列强扩张的抗议，可另一些人，如H.K米哈依洛夫斯基和C.H.尤扎科夫，只看到对欧洲人的憎恶(参看上述)。B.И.列宁在对事件进行评论述时，认为抗议外国对中国进行奴役是主要的。他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的斗争，是对欧洲各国列强的殖民掠夺政策的正义反响(31，第4卷，第379—380页)。与此同时，正如所述，他谈到这种抗议的形式是落后的。

20—30年代，苏联研究者对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质问题进行过讨论。一部分学者斩钉截铁地承认义和团运动具有革命性质，还明确指出，运动的一个矛头是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矛头是反对满清统治王朝(21，第5章，第32页；50，第72页)。另一部分人承认运动的革命性质，还看到义和团运动表现形式的反动性(11，第271页)，第三部分人一般不提其革命性，而是看到这场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外国入侵的斗争是一次必遭失败的尝试。Г.И.萨法罗夫写道："这次激烈的起义尝试，是反对曼彻斯特、利物浦、大阪、

孟买和上海的机器"(47,第 337 页)。这里要提一下上海,它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象征。K.A.哈雷斯基也支持这一看法,他写道,这场"从中国驱赶帝国主义的尝试是英勇的,又是荒谬的"(52,第 374 页)。M.П.帕夫洛维奇、A.Д.波波夫和 H.B.屈纳称义和团起义是一场"无望的冒险行动",他们还说,参加义和团运动的是中国社会的极端反动分子,因此可称这场运动为"中国黑帮分子的战争"(2,第 8 页;54,第 13 页)。K.A.哈雷斯基还把起义者的举动与俄国史上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相提并论(52,第 376 页)。

从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评述中,可以看到许多相同或近似的观点。他们指出,不能把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同样也不能认为是革命的。总体来看,大多数人谴责外国的武装干涉,称这次运动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的一场反帝爱国斗争。不过,同时也指出义和团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弱点(神秘主义、民族狭隘性等)。尤其是 H.M.卡柳日娜娅的著作,似乎是对这一派苏联学者的研究作了总结,她称这一场斗争是"自发的爱国运动,没有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24,第 60—61 页)。她又说:"尽管有种种弱点和缺陷,这仍是一场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客观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23,第 333 页)。然而这并不是说,上述评价是唯一的定论。前面提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98)中,提法就有些不同。书中写道:"这场起义的参加者受到爱国思潮的鼓舞,以民众排外的形式出现,斗争最终会发展成反对统治王朝的起义。他们的理想是回到中国传统生活的准则上去。与此不同的是,改革派和革命派却力图把爱国主义与现代化的思想联系在一起"(20,第 353—354 页)。同时,在这里要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得不一下子与八国列强发生冲突(20,第 356 页)。

谈到义和团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如上所述,B.И.列宁认为是中国社会经济总体上落后,因此中国当时"还未成熟到"进行资产

阶级革命(34,第2页)。按A.Д.波波夫和H.B.屈纳之见,这场举义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希望"是由参加运动各社会阶层的反动性所决定的(2,第8页;30,第108页)。K.A.哈雷斯基写道,起义者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得不到国内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支持有关(52,第377页),Г.И.萨法罗夫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运动"内部自身的弱点",如活动过于分散、起义者之间矛盾重重、组织上和思想上拘泥于中世纪的形式(23,第333页)。Г.B.叶菲莫夫认为,起义"遭到失败还因为世界反动势力全副武装联合起来反对义和团运动,清政府背信弃义的政策又削弱了运动"(18,第142页)最后,H.M.卡柳日娜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不具备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总体上封建落后,起义者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弱点,当局态度前后矛盾,没有资产阶级人士及其社团的支持(23,第232—233页)。

许多研究者,尤其是Г.B.叶菲莫夫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中国人民为捍卫独立和建立公正社会新制度而风起云涌斗争中的一环"(18,第142页)。Г.И.萨法罗夫认为,这次运动"为1911年革命铺下了第一块跳板",而H.M.卡柳日娜娅认为,这次运动使中国人得到一个沉痛的教训:不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就不可能使国家从依附于外国的地位中解放出来(48,第234页;23,第334页)。

(作者单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注释:

①巴拉诺夫斯基M.И.:《教皇与义和团起义》,载《无神论者》1930年第53期,第122—128页。

②《义和团起义》,见《红色档案》1926年第1卷第14册,第1-49页。

③邦达连科B.П.,列泽诺夫П.И.:《19-20世纪初中国人民的革命解

放斗争》，莫斯科，1959年。
④布罗茨卡娅 M.Ф.：《义和拳领导的中国民众运动(1898－1901)》，列宁格勒，1947(副博士学位论文)。
⑤布罗茨卡娅 M.Ф.：《义和拳领导的中国民众运动(1898－1901)》，莫斯科图书馆·市图书馆，(副博士学位论文提纲)。
⑥《非势均力敌之争的世纪之交》，莫斯科，1967年。
⑦《义和团起义》(文献资料)，莫斯科，1968年。
⑧《世界历史》第7卷，莫斯科，1960年。
⑨加尔金 И.С.：《中国 1870－1918》，莫斯科，1950年。
⑩戈列利克 С.Б.：《1898－1903年美国在满州的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莫斯科，1960年。
⑪格里涅维奇 П.А.：《义和团起义》，载《中国问题》1934年第13期，第242－275页。
⑫《俄国在中国胜利的雷声》("神拳"的毁灭)，莫斯科，1900年。
⑬多纳泽 B.：《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起义》，载《国立第比利斯大学丛刊》1953年第51册，第111－154页。
⑭叶列茨 Ю.Л.：《黄祸的侵犯》，圣彼得堡 1903年。
⑮耶路撒冷斯基 A.С.：《德帝国主义与1900年国际武装干涉中国的外交策划》，载《亚洲人民》1961年第4期，第68－105页)。
⑯耶路撒冷斯基 A.С.：《19－20世纪之交时德国垄断集团对中国的渗透》，载《历史问题》1960年第9期，第66－89页。
⑰叶菲莫夫 Г.В.：《德帝国主义与1900－1901年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载《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会议周年纪念论文集·历史分册》，列宁格勒，1948年，第264－275页。
⑱叶菲莫夫 Г.В.：《中国近现代史文集》，莫斯科，1951年。
⑲扎林娜 Л.Л.，利夫希茨 С.Г.：《英帝国主义在中国(1896－1901)》，莫斯科，1970年。
⑳《中国历史》，梅利克谢托夫 A.В.主编，莫斯科，1998年。
㉑《19－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史》莫斯科，1928年。
㉒《近代亚非各国史》，莫斯科，1971年。
㉓卡柳日娜娅 Н.М.：《义和团起义(1898－1901)》，莫斯科，1978年。

㉔卡柳日娜娅 H.M.:《义和团起义(1898－1901)》(历史文献),莫斯科,1978 年。
㉕卡柳日娜娅 H.M.:《关于义和团参加起义者撰写的揭贴内容》,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 71 期,1964 年,第 133－142 页。
㉖卡柳日娜娅 H.M.:《关于秘密会社义和团的性质》,见《旧中国的秘密会社》,莫斯科,1970 年,第 85－107 页。
㉗坎托罗维奇 A.Я.:《美国参与瓜分中国的争斗》,莫斯科,1935 年。
㉘科尔萨科夫 B.B.:《北京事件》,圣彼得堡,1901 年。
㉙克留科夫 M.B.、马利亚温 B.B.、索夫罗诺夫 M.B.、切博克萨罗夫 H.H.:《19－20 世纪初中国民族史》,莫斯科,1993 年。
㉚屈纳 H.B.:《中国现代政治史概要》,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 年。
㉛列宁 B.И.:《中国的战争》,1900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78－383 页。
㉜列宁 B.И.:《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1908 年,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74－183 页。
㉝列宁 B.И.:《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1912 年,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400－406 页。
㉞列宁 B.И.:《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 年,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4 页。
㉟利夫希茨 C.Г.:《1900 年华中华南反帝运动史料》,载《东方学问题》1960 年第 4 期,第 93－105 页。
㊱《远东国际关系(1840－1949)》,莫斯科,1956 年。
㊲米哈依洛夫斯基 H.K.:《文献与现实,中国事态》,载《俄国财富》1900 年第 7 期,第 91－108 页。
㊳《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近代史》,莫斯科,1940 年。
㊴《中国近代史》齐赫文斯基 C.Л. 主编,莫斯科,1972 年。
㊵《东方各国近代史》,第 2 卷,莫斯科,1952 年。
㊶奥夫夏内 П.:《发生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圣彼德堡,1910 年。
㊷《帝国主义时代专制制度对外政策史文集》,列宁格勒,1928 年。
㊸帕沃洛金 П.Л.:《中国及中国与欧洲当前的争斗》,莫斯科,1901 年。
㊹波兹涅耶夫 Л.M.:《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解放斗争的一个阶段》,载《星》月刊 1926 年第 4 期,第 156－172 页。

㊺罗曼诺夫 Б.А.:《俄国在满州(1892－1906)》,列宁格勒,1928年。
㊻鲁达科夫 А.В.:《义和团及其在远东时局中的作用》,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
㊼萨法罗夫 Г.И.:《阶级与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
㊽萨法罗夫 Г.И.:《中国历史概要》,列宁格勒,1933年。
㊾斯托尔波夫斯卡娅 А.:《中国人与洋人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后果》,莫斯科,1903年。
㊿苏格罗博夫 Е.:《中国的民众起义》,载《共产党人》(古比雪夫)1939年第1期,第69－72页。
(51)富尔先科 А.А.(富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
(52)哈雷斯基 К.А.:《中国从远古到现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年。
(53)霍多罗夫 А.Е.:《中国革命史的一页》,载《新东方》1923年第3期,第258－266页。
(54)霍多罗夫 А.Е.、帕夫洛维奇 М.П.:《中国为捍卫独立而斗争》,莫斯科,1925年。
(55)尤扎科夫 С.Н.:《中国事态》,载《俄国财富》1900年第6期,第115－129页。

(张永全译)

第二部分

百年论著目录

编　例

一、辑录范围：

本目录索引收入1897——1999年国内(包括台港地区)外正式出版或发表的研究义和团运动及其相关的著作目录、报刊论文篇目以及史学论文集中的有关篇目，还收入史籍资料篇目。文字涉及中、英、德、法、意大利及其他西文、俄、日、韩等语种。

二、编排体例：

本目录索引分为中文论著目录和外文论著目录两编。

第一编中文论著目录，下设论文资料题录、著作图书目录和台港地区研究论著目录三类。论文资料题录和著作图书目录均按文献内容分类编排，其中论文资料题录在分类之后附有"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台港地区研究论著目录分论文、著作、史料三目编排。

第二编外文论著目录，按语种分类编排。其中，西文、俄文目录将论文、著作统一编排，其中加引号者为论文，未加引号者为著作；日文、韩文则将论文、著作分目编排。

三、著录格式：

1.每篇论文、每种图书为一条目。

2.中文论文条目,均著录篇名、作者、载体名称及出版、发表时间。

3.中文图书条目,均著录书名、著者、册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因翦伯赞等编辑的近代史资料《义和团》和廖一中主编的《义和团大辞典》对诸多书目已有较详题解,故本书的书目题解从略。为方便读者,仅就书名不能明显反映主题内容之书目附有简明提要。

4.外文论著条目,亦尽力著录篇(书)名、著作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除照录原文外,另译出中文篇(书)名及著作者姓名,以供读者参考。

5.一篇论文见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载体(包括收入论文集或被全文转载的),尽力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列出(目录中的K3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专题之代号)。一种著作有多种版本的,亦尽力标出。

四、检索方法:

1.中文论著目录(包括台港地区),均在类目之内按出版、发表时间检索。时间具体到日者排在前面,月、期者次之,只有年度者排在后面。出版、发表时间相同者,按篇(书)名笔画检索。

2.西文、俄文目录按著作者姓名字母的音序检索。同一著作者,按论著出版、发表的时序检索。

3.日文、韩文目录,均在类目之内按出版、发表时间检索。时间相同者,按著作者姓名笔画检索。

第一编　中文论著目录

一.论文、资料

张洪英　蒋秀丽

(一)综　述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概念　独秀
《向导周报》1924年9月81期

拳匪事变之分析　昭坤
《清华周刊》1929年10—11月32卷2、3期

义和团事件的政治背景同中国民族运动的关系　王亚权
《师大月刊》1932年11月1期

庚子拳乱　郭斌
《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6期

中国第一次反帝运动　马一行
《史地知识》1936年6月1卷2期

中国第一次反帝运动(为纪念义和团运动三十六周年而作)
马一行　《史地知识》1936年11月1期

作为民族斗争的义和团运动　吴泽
《劳动季报》1937年1月10期

戊戌与庚子　黎东方
《新认识》1942年12月6卷3、4期

拳乱与驻外使臣的活动　杨鸿烈

《文友》1943 年 11 月 2 期

义和团运动(1900—1901) 司绶延等

《历史教学》1952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 金家瑞等

《历史教学》1952 年 6 期

《义和团》序言 翦伯赞

《历史问题论丛》1953 年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戴逸

《人民中国》1955 年 13 期

六十年前的反帝斗争 华封

《新民晚报》1958 年 8 月 4 日

从陈恭禄先生对义和团革命运动的态度看他的反动立场 周本仁等

《史学战线》1958 年 2 期

批判王栻先生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动历史观点 孙淑等

《史学战线》1958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 翦伯赞

《历史教学》1958 年 5 期

《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1962 年

《翦伯赞历史论文集》1980 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初中中国历史"义和团运动"一章备课中的点滴体会 复旦中学初二历史备课组

《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 12 月

义和团运动前后反洋教斗争的特点 李时岳

《光明日报(史学版)》1959 年 7 月 9 日

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农民起义学习提纲 钱实甫

《历史函授教学》(华东师大)1959 年 6 期

《中国近代史》第十章学习提纲 中国近代史函授教学小组
《历史函授教学》1959 年 7 期
从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所想起的 张寄谦
《光明日报》1960 年 5 月 20 日
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 刘大年
《人民日报》1960 年 8 月 30 日
《新华半月刊》1960 年 9 月 18 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集》1961 年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
黎澍
《人民日报》1960 年 8 月 30 日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义和团运动
《光明日报》1960 年 9 月 29 日
义和团运动六十年 王介平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义和团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 赵宗成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论"铁拳" 郑鹤声
《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 年 6 月 2 期
批判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而作
陈月清
《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 李润苍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陈桂英
《北京师大学报》1960 年 3 期

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史思群

《历史研究》1960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1979 年

1897—1899 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赵永良等

《历史教训》1960 年 9 期

"义和团运动"一章教学的若干问题 金家瑞

《历史教学》1962 年 1 期

驳周谷城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 陈华炎

《江汉学报》1965 车 2 期

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 胡绳

《近代史研究》1979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侃

《历史教学》1979 年 2 期

《新华文摘》1979 年 4 期

《中国近代史散论》1982 年

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左步青 章鸣九

《历史研究》1979 年 12 期

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杨东梁

《光明日报》1979 年 12 月 11 日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 夏林根

《解放日报》1979 年 11 月 12 日

"义和团运动"评介中的不同意见 夏林根

《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 31 日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介问题 李侃

《人民日报》1980 年 4 月 10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座谈纪要）

《光明日报》1980 年 5 月 27 日

K3 1980 年 5 期

也谈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致丁名楠同志 王致中

《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19 日

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答王致中同志 丁名楠

《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19 日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几个问题 吴民贵

《解放日报》1980 年 12 月 10 日

义和团评价中的不同见解 戚其章

《人民日报》1980 年 12 月 15 日

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 荣孟源

《东岳论丛》1980 年 3 期

谈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 刘恩格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0 年 3、4 期

对当前义和团评价的几点看法 孙祚民

《东岳论丛》1980 年 4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几个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思考 程村

《社会科学》（甘肃）1980 年 4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 戚其章

《东岳论丛》1980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义和团运动——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

周衍发

《南京大学学报》1980 年 4 期

列宁与义和团反帝斗争 赵矢元

《东北师大学报》1980 年 4 期

K3 1981 年 1 期

义和团反帝运动 荣孟源

《历史教学》1980 年 11 期

《新华文摘》1981 年 2 期

《历史笔记》1982 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运动 午寅

《人民日报》1981 年 9 月 15 日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王燕梅

《青海日报》1981 年 10 日 3 日

如何进一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东岳论丛》1981 年 1 期

K3 1981 年 1 期

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 陈振江

《历史研究》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丁名楠

《文史哲》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K3 1981 年 2 期

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法的几点意见 李侃

《文史哲》1981 年 1 期

K3 1981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札记 戚其章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2 期

义和团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管见 付崇兰 孟祥才

《北方论丛》1981 年 2 期

K3 1981 年 4 期

对义和团运动的几点看法 黎光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2 期

怎样评价义和团的勇敢精神 杜德风

《江西师院学报》1981 年 2 期

评义和团问题讨论中的一种倾向 韩学儒

《西北大学学报》1981 年 3 期

建国前义和团研究史的考察 魏晓明

《历史教学》1981 年 7 期

K3 1981 年 9 期

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探索 冯士钵

《光明日报》1982 年 10 月 20 日

K3 1982 年 11 期

如何进一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1 期

义和团札记(续一) 戚其章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2 期

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 林克光

《清史研究集》1982 年第二辑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王魁喜

《新长征》1982 年 8 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管见 李侃

《历史教学》1982 年 12 期

K3 1983 年 1 期

对义和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李尚英

《学习与思考》1982 年 6 期

K3 1982 年 12 期

义和团问题辨析 陈振江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 年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论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廖一中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试论义和团的几个问题 林树惠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批判极左思潮、推动研究工作 戴逸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运动若干问题述评 张玉田
《电大语文》1983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吴民贵
《历史教学》1984 年 2 期
北国风雷;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吕涛
《自学》1984 年 2 期
略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 廖一中
《社会科学研究》1984 年 2 期
谈庚子事变中的爱国与卖国问题 廖宗麟
《光明日报》1985 年 11 月 27 日
K3 1985 年 12 期
也谈庚子事变中的爱国与卖国问题 江维范 韩希白
《光明日报》1986 年 3 月 5 日
K3 1986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与理论问题 陈振江
《光明日报》1986 年 7 月 16 日
K3 1986 年 8 期
从新编档案史料论义和团运动的几个问题 程歗 朱金甫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1 期
K3 1986 年 4 期

对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管见 苑书义

《河北学刊》1986 年 3 期

K3 1986 年 6 期

从义和团运动想到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李侃

《天津社会科学》1986 年 4 期

K3 86 年 9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 李文海

刘仰东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5 期

K3 1987 年 4 期

概论义和团运动 廖一中

《贵州社会科学》1986 年 10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 苑书义

《河北学刊》1986 年 3 期

《新华文摘》1986 年 7 期

历史合力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路遥

《史学情报》1987 年 2 期

K3 1987 年 9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 梁锦瑞

《洛阳大学学报》1987 年 3 期

"爱国"还是"卖国"?;评"庚子事变"中的程德全 王延华

《齐齐哈尔社联通讯》1987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反洋教斗争初探 贺弘景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义和团运动三题 苑书义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论甲午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的三种爱国自救运动

王守中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义和团运动再认识 李时岳

《广东社会科学》1989 年 1 期

庚子国难九十周年祭 陈振江

《光明日报》1990 年 8 月 15 日

《新华文摘》1990 年 10 期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 李文海、程歗

《人民日报》1990 年 11 月 16 日

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王守中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0 年

反洋教斗争中爱国主义的困惑

——论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宗教的宽容抗拒认同现象

徐梁伯

《学海》1990 年创刊号

义和团运动三议——纪念义和团运动九十周年 王晓华

《黄淮学刊》1990 年 3 期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种爱国观:写在义和团运动 90 周年之际

周源

《清史研究通讯》1990 年 4 期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陈铁军

《安庆师院学报》1990 年 9 卷 4 期

中外学者笔谈义和团运动与历史、文化研究(上)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历史需不断研究、加深认识 戴逸

"义和拳教"钩沉 路遥

义和团与晚清会党 (苏)科斯加耶娃

民众文化、政治戏剧与义和团运动 (美)周锡瑞

谈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　(美)柯文
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观　(日)佐藤公彦
近代华北社会的宗教活动及其活动者　(日)佐佐木卫
晚清基督教、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的兴起　(英)狄德满
义和团运动与基督教在华教会　(德)利文纽斯
关于在奥匈帝国范围内匈牙利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若干问题
(匈)尤山度
本组文章全文均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 7 月
K3　1991 年 3 期
中国近代农民与义和团运动　张守常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0 年 6 期
K3　1991 年 2 期
庚子与辛丑　陈旭麓
《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K3　1991 年 1 期
晚清政治与义和团运动:纪念义和团运动 90 周年　金家瑞
《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0 年 6 期
"救亡"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谢本书
《光明日报》1991 年 1 月 2 日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　孙占元
《北方论丛》1991 年 1 期
K3　1991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　孙祚民
《文史哲》1991 年 1 期
K3　1991 年 5 期
《新华文摘》1991 年 4 期
中外学者笔谈义和团运动与历史、文化研究(下)

《山东社会科学》1991 年 1 期

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 程歗

华北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陈振江

柴五郎对侵华战争的看法 (日)小林一美

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 (日)久保田文次

天主教对义和团形象的看法 (美)魏扬波

义和团运动后的基督教圣址的兴造 (美)詹姆士·L·何伟亚

清末天津县的乡镇结构与义和团组织 (日)中村达雄

论东南自保 (美)朱葆琯

本组文章全文均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 7 月

K3 1991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 徐梁伯

《近代史研究》1991 年 5 期

《新华文摘》1991 年 12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王守中

《山东师大学报》1991 年增刊

K3 1991 年 6 期

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农民战争 杜耀云

《山东师大学报》1991 年增刊

K3 1991 年 6 期

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再认识 商鸣臣

《济宁师专学报》1992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 郭大松

《人文杂志》1992 年 2 期

试析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锦程

《广西大学学报》1992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若干问题新探 季云飞

《求索》1992 年 6 期

K3 199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试论 郭墨兰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再谈中国近代农民问题 李侃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略谈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 苏双碧

《深圳特区报》1994 年 11 月 22 日

浅谈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演化 张磊

《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16 日

怎样看义和团运动 林华国

《北京日报》1996 年 12 月 5 日

在"灭洋"统帅下的反抗斗事 王胜运 苏衍崑

《济宁教育学院学报》1996 年 1 期

简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 张洪岳

《延安大学学报》1996 年 1 期

对 1900 年中国三次大事件的比较分析 王淑英

《许昌师专学报》1996 年 3 期

《史学月刊》1996 年 6 期

评 19 世纪下半叶的"扶清灭洋"和"求富求强"两条救国路线 王守中

《山东师大学报》1996 年 4 期

关于近代中国主战与主和问题的辨析 郑师渠

《光明日报》1997 年 8 月 19 日

爱国主义传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体现 崔树海

《石油大学学报》(社科)1997 年 1 期

浅析中国农民战争的终结——兼评义和团及反洋教斗争

刘敬忠、丁伯传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五四以来对义和团运动的不同评价及其文化导向 王毅

《开放时代》1998 年(7/8)

义和团之片面观 李聚轩

《科学时报》1999 年 7 月 6 日

义和团现象的再认识 王毅

《北京观察》1999 年第二期

义和团的悲剧 雷颐

《北京观察》1999 年 7 期

《炎黄春秋》1999 年 10 期

(二)性 质

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性质？这运动是怎样发生的？ 周南

《历史教学》1954 年 11 期

义和团的揭帖 荣孟源

《大公报》1952 年 5 月 8 日 69 期

《进步日报》1952 年 5 月 9 日 70 期

略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金少英

《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 2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

《文汇报》1960 年 10 月 7 日

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扶清灭洋"口号 李时岳

《光明日报(史学版)》1960 年 10 月 2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试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孙孝恩等

《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年

系一、科一学生合写

《扬州师院学报》1960 年 7 期

试论义和团运动性质和意义 许克华

《学术月刊》1960 年 10 期

义和团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组织

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1961 年

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张玉田

《辽宁大学学报》1979 年 1 期

义和团是否"反清""反封建" 李鸿生

《文汇报》1980 年 8 月 15 日

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王致中

《历史研究》1980 年 1 期

《新华文摘》1980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略论义和团反帝斗争正义性 商鸣臣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评义和团"反封建"说 史国瑞

《人文杂志》1980 年 2 期

义和团真是反封建吗? 吴文灿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3 期

试论义和团运动的排外主义和反封建性质 商松石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3 期

简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石芳龄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3 期

宗教和义和团运动 孙石月

《山西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1981 年 1 期

关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 冬青 大松

《山东师院学报》1980 年 5 期

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 刘其奎

《复旦学报》1980 年 5 期

略论义和团反帝与排外问题 王奕隆

《河北省史学会 1980 年年会论文集》1980 年

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和组织结构 (美)黄宗智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1 期

关于义和团的"奉旨造反"及其他 孙祚民

《历史研究》1981 年 1 期

K3 1981 年 3 期

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 张九洲

《史学月刊》1981 年 1 期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 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

《近代史研究》1981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谈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斗争的性质 卢善焕

《史学月刊》1981 年 2 期

义和团皇权主义试探 戚其章

《北方论丛》1981 年 3 期

K3 1981 年 5 期

简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李喜所

《中学历史教学》1981 年 4 期

也谈义和团反对先进科技的问题 廖一中

《天津师院学报》1982 年 2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廖一中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2 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刘钦铭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2 年 2 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庄建平 朱金甫

《清史研究集》1982 年第二辑

浅论义和团的分散性 冯士钵、于伯铭

《社会科学辑刊》1982 年 6 期

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说明了什么? 陈振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宗教迷信? 李吉奎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也淡义和团"奉旨造反"的问题 廖一中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张毅

《山东史学集刊》1983 年 1 期

义和团是否反封建 陈贵宗

《史学集刊》1983 年 2 期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 吴剑杰

《武汉大学学报》1983 年 4 期

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反封建性 洪世华

《贵州省史学学会编:贵州省史学学会首届年会论文集》1983 年

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 乔还田

《文汇报》1986 年 10 月 21 日

K3　1986 年 10 期

论庚子事变和义和团反维新之实质　杜伶

《江西大学学报》1988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反封建问题再探　王付昌　廖京山

《学术百家》1989 年 6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　陈业强

《社会科学探索》1990 年 5 期

K3　1990 年 12 期

义和团"灭洋"探析　徐海安

《学海》1991 年 3 期

K3　1991 年 11 期

义和团降神附体的实质与真象　姚周辉

《南开史学》1992 年 2 期

义和团反清反封建略论　边国恩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从冀州义和团运动看其反帝反封的双重性　刘振邦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运动和封建蒙昧主义　王全富　王金华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 2 期

浅论义和团运动的反封建性　荣卉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 16、(2)

(三)历史意义与教训

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和森

《向导周报》1924 年 9 月 81 期

列宁与义和团　大雷

《向导周报》1924 年 9 月 81 期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秋白

《向导周报》1925 年 9 月 128 期

义和团失败的根源是什么? 金家瑞

《历史教学》1953 年 8 期

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历史意义 丁名楠

《历史教学》1956 年 11 期

关于"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李时岳

《光明日报》1958 年 5 月 12 日

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 (朝)崔泰镇

《历史教学》1959 年 2 期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及其历史意义——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袁定中

《光明日报》1960 年 9 月 29 日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

——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历史系(一)班第二小组

《扬州师院学报》1960 年 8 期

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的一点感想 茅家琦

《江海学刊》1960 年 9 期

义和团的悲剧 刘安泰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3 期

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教训 马洪林

《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

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悲剧 杨策 任恒俊

《北方论丛》1981 年 2 期

论义和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梁世灿

《四平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 2 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纪念义和团反帝斗争八十周年　　戴学稷

《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历史学)1981 年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苏民族工作的发展　　周新国

《扬州师院学报》1982 年 1 期

义和团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吴雁南

《贵阳师院学报》1982 年 3 期

义和团历史功勋述评　　勒鄂

《学习与研究》1982 年 12 期

论义和团的反帝作用　　王致中

《社会科学》(甘肃)1983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发展动力的论争　　杜耀云

《山东史学集刊》1984 年 1 期

义和团的弱点与失败的原因　　王翔

《中学历史》1984 年 6 期

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　　樊树生

《辽宁大学学报》1986 年 5 期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胡宪立

《郑州大学学报》1987 年 4 期

K3　1987 年 10 期

略论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李喜所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以一个外国传教士的一段经历看山东义和团运动对西方殖民者的打击　　任毅军

《河南大学学报》1989 年 4 期

论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地位与作用　　公孙訇

《河北学刊》1990 年 5 期

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王承仁 乔茵

《武汉大学学报》1991 年 3 期

K3 1991 年 9 期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新政" 廖一中

《历史教学》1991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 年

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王兴业

《史学月刊》1991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 郭大松

《人文杂志》1992 年 2 期

试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张红军、毕务章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与亚洲民族运动 郭晓宁、马凤岗

《临沂师专学报》1994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 万希明

《青岛教育学院学报》(综合)1994 年 1—2 期

再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张书廷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近代反侵略斗争的精神财富

——论义和团的宣传鼓动 黄玉兰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美)朱葆瑁著、仲崇健等译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的量化分析 赵树好

《河南大学学报》1998 年 6 期

（四）组织与源流

拳术与拳匪　　陈铁生

《新青年》1919 年 2 月 6 卷 2 期

义和团的前史　　陈湛若

《文史哲》1954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的前身是祖师会　　胡珠生

《历史研究》1958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组织　　宋家珩等

《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　　李俊虎

《天津日报》1961 年 8 月 5 日

义和团源流试探　　李世瑜

《历史教学》1979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黄莲圣母事迹考　　闻性真

《南开大学学报》1979 年 2 期

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　　周海青

《破与立》1979 年 6 期

义和团源流刍议　　徐绪典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论义和团的源流及其他　　路遥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4 年

试论义和团的组织及其源流 侯斌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红灯照考略 王致中

《社会科学》(甘肃)1980 年 2 期

义和团捕杀白莲教辨疑 孙彩霞

《近代史研究》1980 年 4 期

K3 1981 年 2 期

义和团源流试探 陶柏康

《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

K3 1981 年 1 期

义和团源流质疑 冯士钵

《社会科学辑刊》1980 年 4 期

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 方诗铭

《社会科学辑刊》1980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论义和团的纪律 李文海

《近代史研究》1980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质疑——与史国瑞同志商榷 戚其章

《人文杂志》1980 年 5 期

义和团与八卦教——义和团源流试探 戚其章

《齐鲁学刊》1980 年 5 期

对义和团源流的不同看法 邓卫中

《光明日报》1981 年 11 月 17 日

K3 1981 年 11 期

乾、嘉朝义和拳浅探——义和团源流论证侧记 程献

《近代史研究》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4 年

大刀会及其反洋教斗争 周海青

《齐鲁学刊》1981 年 5 月

义和拳、民团、义和团 陈贵宗

《史学集刊》1982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选》1982 年

试论清代山东教门与拳会的特点 王永昌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

1982 年 1 期

金乡义和拳辨析 程献、陆景琪

《历史档案》1982 年 1 期

大刀会的起源和目的 (日)末光高义著 陶振钢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2 期

真假义和团辨析 陈振江、李喜所

《南开史学》1982 年 2 期

鲁西南大刀会 王如绘

《东岳论丛》1982 年 3 期

山东义和团是由八卦教"武场"演变而来 周海青

《东岳论丛》1982 年 4 期

山东义和拳的兴起、性质和特点 陆景琪

《文史哲》1982 年 4 期

山东基督教、白莲教和义和团三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

(美)包德威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源流考——义和拳、八卦教 (日)佐藤公彦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的起源 (美)舒曼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拳和白莲教的关系 金冲及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路遥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有真假之分 史之

《文汇报》1983 年 8 月 8 日

关于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几点看法 郭墨兰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关于义和团源流研究的几点体会 程献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真假义和团辨析 陈振江、李喜所

《南开史学》198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李文海

《近代史研究》1983 年 3 期

也说义和团镇压白莲教 顾秉迅

《牡丹江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有关义和团粮需来源的几个问题 冯士钵、于伯铭

《北方论丛》1983 年 4 期

论大刀会的性质 王守中

《齐鲁学刊》1984 年 6 期

义和团源流答问 李世瑜

《史学月刊》1985 年 2 期

K3 1985 年 4 期

大刀会探略 罗宝轩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3 期

义和团源流杂议 冯士钵

《史学月刊》1986 年 3 期

也谈义和团镇压白莲教 吴云廷

《河北学刊》1986 年 3 期

义和拳多元论 李恒

《唐山师专唐山教育学院学报》1987 年 3 期

清末徐州诸县的大刀会 李雅琴

《徐州师院学报》1987 年 3 期

义和拳源流考辨 张胜利

《成都体院学报》1987 年 4 期

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义和团组织及其斗争手段 刘宗武

《华中师大学报》1987 年 4 期

K3 1987 年 10 期

义和团的三层组织 陈贵宗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团练与义和团运动 王明伦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直鲁民团 周源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神拳与义和团 程歗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梅花拳与义和团运动 冯士钵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略述晚清时期中国的秘密社会 蔡少卿

《清史研究通讯》1988 年 1 期

晚清直鲁梅花拳会浅析 程歗

《清史研究通讯》1988 年 1 期

K3 1988 年 11 期

义和团

《通化县文史资料》(吉林)第4辑 1988年

义和拳

《通化县文史资料》(吉林)第4辑 1988年

梅花拳

《通化县文史资料》(吉林)第4辑 1988年

义和拳　李时雨

《娄烦文史资料》(山西)第3辑 1989年

论民间秘密结社与晚清教案的关系　孙江、黄东兰

《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3期

K3　1990年7期

"义和拳"更名"义和团"探析　欧阳跃峰

《历史教学》1990年9期

K3　1990年10期

试论义和团仪式的社会意义　(美)周锡瑞

《文史哲》1991年1期

"义和拳教"钩沉　路遥

《近代史研究》1991年2期

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

周育民

《近代史研究》1991年3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义和拳"起于山东""延及直隶"说质疑　林华国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年

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　王如绘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五圣传道书》·清水教·义和团 马西沙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论清末社团群崛起的原因 靳迎春

《河北师院学报》(社科)1994年2期

从梅花桩拳派看义和拳运动中的民俗因素 张士闪

《民俗研究》1994年4期

(五)、社会背景与发生原因

1.综论及社会经济背景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原因 史森钦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义和团起义的历史背景 郝镇华节译

《历史译丛》1963年6期

十九世纪末山东的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 孔令仁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1期

义和团的起因及灭洋 张力

《历史知识》1980年4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成因 (美)周锡瑞

《文史哲》1981年1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年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试探 廖一中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1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苏民族工业的发展 周新国

《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1期

论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 廖一中

《天津社会科学》1983 年 6 期

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 程洪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破产与义和团运动 张思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山东的铁路修筑与义和团运动 马庚存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直隶近代社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傅德元

《河北大学学报》1989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与特点 阮芳纪

《历史研究》1991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论义和团运动兴起于鲁西北之原因 卢庆洪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 3 期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林敦奎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K3 1991 年 10 期

19 世纪末外国在华银行的投资活动 汪叔虞

《近代史研究》1997 年 4 期

十九世纪末直隶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 姜文英、刘建军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2.洋教传布与教案(具体教案的收录范围为甲午战争以后,泛论不限)

四五十年前开始的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 陈庆华

《大公报》1951 年 2 月 9 日

1840—1900 年教案年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纪录 艾学

《进步日报》1951 年 4 月 17 日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对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 邵循正

《光明日报》1951 年 7 月 10 日

中国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与梵蒂冈 雷海宗

《大公报》1951 年 11 月 9 日

南昌教案 来新夏

《历史教学》1952 年 1 期

记南昌教案——帝国主义分子王安元戕杀南昌县知县江召棠案始末 付琴心

《光明日报》1953 年 5 月 30 日

1898 年的"永安教案"调查记 钟文典等

《近代史资料》1958 年 5 期

巨野教案 洛洋

《山东省志资料》1960 年 2 期

南昌教案见闻 王迈常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1960 年第 10 辑

帝国主义办理山西教案的讹诈罪行 乔志强

《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 1962 年

庚子前夕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的挑衅罪行 王神荫

《基督教史料选编第 3 辑》1962 年 12 月

明恩溥——一个由义和团运动起家的传教士 王神荫

《基督教史料选编第3辑》1962年12月

对《南昌教案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1962年第31辑

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华教会对土地房产的掠夺 魏钰

《经济研究》1965年8期

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王守中

《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4期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新教)对近代山东的侵略 廉立之、王守中

《齐鲁学刊》1980年2期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王守中

《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5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年

八十年前的南昌教案 姚肖廉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4辑

平罗县下营子教案始末 刘廷栋

《宁夏文史资料》1981年第10辑

《石嘴山文史资料》(宁夏)1983年第1辑

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

徐绪典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年

《文史哲》1983年2期

K3 1983年4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年

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的侵略主张 刘毅政

《内蒙古师院学报》1982年3期

献县天主堂掠夺土地 孙彩霞

《历史知识》1982年4期

日照教案及德军入侵内地的暴行 王守中

《山东师大学报》1983 年 1 期

梨园屯教案和义和团运动 张守常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传教士、教民与义和团运动;宗教伪装下的帝国主义

(美)周锡瑞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南昌教案与圣类恩医院 蒋文澜

《争鸣》1983 年 3 期

德国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董伯先、孟庆良

《东岳论丛》1983 年 4 期

巨野教案与德占胶澳 王守中

《东岳论丛》1983 年 5 期

K3 1983 年 10 期

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的侵略扩张 刘毅政

《内蒙古师院学报》1984 年 3 期

邵武庚子教案的始末

《邵武市文史资料》(福建)1984 年 3 辑

巨野教案与德占胶州湾 马庚存

《历史知识》1984 年 5 期

略论云南民族地区教案的特点 王丹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5 年 2 期

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

赵坤生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 年 3 期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

牟安世

《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 4 期

K3　1985 年 8 期

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运动　戚其章

《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 4 期

K3　1985 年 8 期

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　刘世龙

《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 4 期

南昌教案始末记　程为坤

《文物天地》1985 年 4 期

永安教案始末　萧德浩

《广西地方志通讯》1985 年 5 期

略论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　王守中

《天津社会科学》1985 年 5 期

K3　1985 年 10 期

泡影"十字架征服中国"　魏传述

《外国史知识》1985 年 10 期

美国传教士在广东的文化侵略　黄廷柱

《华南师大历史系论文集 1》1985 年

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卢维冲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1 期

肥城教案　陈吉甫

《泰安文史资料》(山东)1986 年 1 辑

肥城教案始末　陈吉甫

《肥城文史资料》(山东)1986 年第 1 辑

洋教在台湾的宣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　林其泉

《厦门大学学报》1986 年 1 期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黔西南　程昭星

《贵州社会科学》1986 年 2 期

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答牟安世同志　李时岳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5 期

庚子年衡州教案始末 罗济

《衡阳文史资料》(湖南)1986 年 5 期

庚子年衡阳天主教案纪略 郭则谦

《衡阳文史资料》(湖南)1986 年 5 期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反洋教斗争问题 张守常

《历史教学》1986 年 7 期

K3 1986 年 8 期

教会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几个问题 吕延涛

《贵州史学》1987 年 1 期

梨园屯教案述论 赵润生

《聊城师院学报》1987 年 1 期

梨园屯教案和义和团运动 张守常

《河北师院学报》1987 年 1、2 期

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 程歗

《历史档案》1987 年 3 期

K3 1987 年 10 期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胡宪立

《郑州大学学报》1987 年 4 期

简论三边教案 张义平

《玉林师专学报》1987 年 4 期

乐清的反洋教斗争 陈亦乐

《乐清文史资料》(浙江)1987 年第 5 辑

"宜昌教案"始末 龚浩

《宜昌市文史资料》(湖北)1987 年第 8 辑

近代江西教务教案年表 汪叔子等整理

《近代史资料》1987 年总 66 号

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再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徐绪典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冠县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运动 路遥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从拜上帝会到义和团 张守常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 年

反洋教运动综论 刘焜炳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 年

略论晚清部分教民的堕落 许剑英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 年 1 期

儒家思想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 孙江

《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 1 期

巨野教案 许彤

《菏泽师专学报》1988 年 2 期

关于近代史上的教会内地置产协定 吕坚

《史学集刊》1988 年 2 期

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 孙占元

《山东师大学报》1988 年 2 期

清季湖南教案论略 王继平

《湘潭大学学报》1988 年 2 期

19 世纪的湖北教案 萧致治等

《武汉大学学报》1988 年 3 期

日照教案及德军入侵内地的暴行 王守中

《日照文史》(山东)1988 年 3 辑

近代洋教在安徽的推传与安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 张湘炳

《学术界》1988 年 3 期

近代安徽洋教问题简叙 张湘炳

《阜阳师院学报》1988 年 4 期

汾阳教案前后 冯汝骅

《汾阳文史资料》(山西)第 4 辑 1988 年

晚清洋务派与教案 赵春晨

《历史研究》1988 年 4 期

论近代教案中的多层矛盾 程献

《历史教学》1988 年 7 期

民族意识与近代教案 程献

《广州研究》1988 年 10 期

K3 1989 年 3 期

安治泰与巨野教案 杨恒

《近代史研究》1989 年 1 期

论义和团运动与反洋教斗争的关系 刘恩格、邢丽雅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9 年 1 期

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思想剖析 赵书刚等

《求索》1989 年 2 期

论近代教会权威结构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冲突 孙江、黄东兰

《南京大学学报》1989 年 2 期

试论反洋教斗争中的官、绅、民 杜耀云

《山东师大学报》1989 年 2 期

K3 1989 年 4 期

评教案的"文化冲突论"及其他 徐梁伯

《江海学刊》1989 年 6 期

K3 1990 年 2 期

郯城神山教案史迹初探 赵镇政

《郯城县文史资料》(山东)1989 年第 6 辑

德州教案 刘晓焕

《德州文史》(山东)1989 年第 7 辑

反洋教斗争和爱国主义: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进展与走向 史岩

《社会科学报》1990 年 3 月 29 日

反洋教斗争中爱国主义的困惑:论中国人民对近代西方宗教的宽容抗拒认同现象 徐梁伯

《学海》1990 年创刊号

K3 1990 年 8 期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 丁名楠

《近代史研究》1990 年 1 期

传教士与贵州近代政治 程昭星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 1 期

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清末贵州教案 林建曾

《贵州社会科学》1990 年 2 期

再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 主要线索 牟安世

《近代史研究》1990 年 2 期

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的原因 岑生平

《求索》1990 年 2 期

庚子年衡州教案 陈文卿

《衡南文史》(湖南)1990 年第 2 辑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保教权的沿革 李师洲

《山东大学学报》1990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前西方传教士在德州地区的传教活动与 德州人民的反帝斗争 夏季亭

《德州师专学报》1990 年 3 期

反洋教运动发展论 戚其章

《近代史研究》1990 年 3 期

《新华文摘》1990 年 8 期

试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何桂春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 4 期
浅论反洋教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后果 于民雄
《贵州社会科学》1990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与基督教在华教会 (德)K·J·利文纽斯著 董林夫译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近代华北社会和宗教活动及其活动者 佐佐木卫著 任明译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晚清基督教帝国主义和义和团的兴起 (英)狄德满著 陶飞亚译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传教士、文化冲突与中国近代教案 许序雅
《教案与近代中国》1990 年
试论近代教案中的"爱国"与"反漫略" 熊宗仁
《教案与近代中国》1990 年
19 世纪山东新教与民教关系 陶飞亚
《文史哲》199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湖南衡州教案 刘泱泱
《求索》1991 年 1 期
19 世纪中国社会拒绝基督教的原因 顾卫民
《江海学刊》1991 年 2 期
从庙堂之争到义和拳运动:梨园屯教案管窥 王振华 李金鹏
《文物春秋》1991 年 2 期
K3 1991 年 11 期
试论近代教案中爱国与反侵略的一个矛盾现象 熊宗仁
《贵州师大学报》1991 年 2 期
近代教案与义和义拳运动的兴起 戚其章

《贵州社会科学》1991 年 4 期

K3　1991 年 7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晚清重庆地区的社会动乱与反洋观念的变化　(美)魏茱棣 王笛译

《四川大学学报》1991 年 4 期

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　刘泱泱

《求索》1992 年 3 期

K3　1992 年 7 期

论文化冲突与近代反洋教运动之关系　赵岩

《山东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

清末日僧在闽布教及其与台湾总督府的关系 ——以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　陈小仲

《台湾研究集刊》1992 年 4 期

清朝末期重庆的社会动荡——"反洋"的新含义　(美)魏茱棣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 年 4 期

南阳教案与近代首座教会圩寨的出现　柴俊青

《史学月刊》1992 年 5 期

固安教案　陈玉昆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的宗教体验与 20 世纪 20 年代山东基督教"耶稣家庭"的比较　(美)裴士丹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三度来华的概述　顾裕禄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华北农村的宗教和权力——义和团运动前直隶地区的天主教
(美)李仁杰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华北教会与义和团运动 路义忠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试论倪维思传教方法 王栋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论近代教案 廖一中、李运华
《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1期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年
K3 1993年3期

反洋教斗争中的农民爱国主义探微:兼论教案中农民的非爱国主义行为 徐梁伯
《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2期

近代反教会侵略的斗争分期及其特点 邱远猷
《文史知识》1993年2期

试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受到抵制的原因 丁平一
《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2期

南阳还堂案述评 赵树好
《黄淮学刊》1993年2期

辰州教案90年祭 刘泱泱
《吉首大学学报》1993年14卷3期

1898—1899年的"沂州教案" 刘晓焕、孙玮
《临沂师专学报》1993年15卷4期

论西方基督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和方法 欧多恒

《贵州社会科学》1993 年 4 期

辰州教案纪实 钟玉如

《怀化师专学报》1993 年 4 期

民族和生存危机是近代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杜文平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多维视角下的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 王继平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对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 涂鸣皋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略谈教案文化冲突的实质问题 岑生平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王继平

《湘潭大学学报》1994 年 1 期

对海门教案几个问题的探讨 李性忠

《浙江学刊》1994 年 2 期

谁是被告?! 近代中国"教案"试析 杨慎之

《求索》1994 年 2 期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李伟

《山东师大学报》1994 年 3 期

K3 1994 年 7 期

反洋教斗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关系评析 唐毅

《三峡学刊》1995 年 1 期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与中国秘密社会 邵雍

《历史教学》1995 年 2 期

试论十九世纪中美教案特点 赵润生、赵树好

《聊城师院学报》1995 年 2 期

国难与中国基督教 顾卫民

《史林》1995 年 2 期

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探析 侯杰

《河南大学学报》1995 年 2 期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

程歗、张鸣

《历史研究》1995 年 5 期

1861—1899 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 杨大春

《镇江师专学报》1996 年 1 期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胡维革、郑权

《东北师大学报》1996 年 1 期

K3 1996 年 4 期

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 赵润生、赵树好

《人文杂志》1996 年 2 期

十九世纪在华基督教的两种传教政策 王立新

《历史研究》1996 年 3 期

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关系略论 孙长来

《社会科学辑刊》1996 年 3 期

K3 1996 年 9 期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 王立新

《近代史研究》1996 年 3 期

从清政府对西洋教态度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朱云鹏、卢国强

《柳州师专学报》1996 年 4 期

近代基督教在浙江 沈雨梧

《近代史研究》1996 年 4 期

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 程歗、张鸣

《历史档案》1996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近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特征 侯杰

《学术研究》1996 年 5 期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 程歗、许蕾

《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 6 期

关于近代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林华国

《河北大学学报》1997 年 1 期

K3 1997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义和团时期直隶省的教会势力和民教冲突 解成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从反洋教斗争看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唐毅

《文史杂志》1997 年 5 期

时代与信仰的困惑——晚清华北基督教民政治意识浅析

许蕾、程歗

《历史教学》1997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古田教案起因新探 谢必震

《近代史研究》1998 年 1 期

"洋教征服"乡村社会秩序裂变·民教分化冲突之源起 罗萍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8 年 2 期

略论近代四川教案的政治文化背景 唐毅

《文史杂志》1998 年 2 期

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 张广智

《复旦学报》1998 年 3 期

K3　　1998 年 11 期

"宜昌教案"发生地点考　　祝其瑶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8 年 20(4)期

晚清曹州府的教案　　赵润生、赵树好

《山东文献》(台湾省)1998 年 23(4)

会党与近代教案探讨　　赵树贵

《江西社会科学》1998 年 5 期

论晚清习俗教案　　赵树好

《人文杂志》1998 年 5 期

3.瓜分危机

五十年前胶澳战争琐闻　　郭恩绶

《大公报》1952 年 12 月 25 日

德帝侵占胶州湾前侵略分子的阴谋活动　　林树惠

《文史哲》(总 7 期 1952 年)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铁路权利的阴谋活动　　胡滨

《历史研究》1956 年 5 期

遂良存牍(供研究一八九九年法帝国主义者强行租借我广州湾事件参考)　　李钟珏

《近代史资料》1956 年 6 期

德帝占踞胶州湾的阴谋　　郑鹤声

《山东大学学报》1959 年 4 期

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与山东人民的抗德斗争　　刘亦水

《历史教学》1960 年 9 期

高密孙文领导群众抗击德寇侵略的斗争　　高密政协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1978 年 12 月

德国侵略军炮击李家营惨杀克兰村人民纪实　　于承祥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1978 年 12 月

德国侵占下的胶州湾 方史
《山东师院学报》1979 年 4、5 期
试论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势力范围的形成(1897—1914)
胡汶本
《文史哲》1982 年 1 期
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始末 董伯先等
《外国史知识》1983 年 4 期
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沿海港湾的活动 姜鸣
《华东师大学报》1992 年 1 期
由盲目排外到文明抗争(1897—1911):中国对德占胶州湾的反应
王守中
《山东师大学报》1997 年 5 期

4.社会环境与文化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 王庭科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甲午战争与山东大刀会的兴起 王如绘
《东岳论丛》1984 年 4 期
近代风云与山东 戚其章
《文史知识》1987 年 10 期
十九世纪末直隶山东农民对外矛盾分析 董天佳
《山东社会科学》1989 年 6 期
直东武术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趋向 陈振江
《南开史学》199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 孙占元
《北方论丛》199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的社会环境 胡绳武、戴鞍钢
《东岳论丛》1991 年 1 期

K3　1991 年 5 期

从社会心理的变动看义和团运动的缘起　任军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 年 1 期

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　程歗

《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 3 期

K3　1991 年 7 期

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　陈振江

《历史教学》1991 年 6 期

K3　1991 年 9 期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跃峰

《近代史研究》1992 年 1 期

略论民俗信仰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张红军

《民俗研究》1992 年 1 期

K3　1993 年 3 期

论义和团倡始鲁西的社会环境　杜耀云

《历史教学》1992 年 11 期

K3　1992 年 12 期

浅析民间文化在廊坊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杨震望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廊坊军芦村的义和团乐队　萧兴华、曹国金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运动:试析近代华北农村社会文化心理　戚立煌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中国乡村地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儒教徒及现代化国家(1861—1911)

(美)汤若杰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运动与民族风俗 严昌洪

《史学月刊》1993 年 1 期

义和团"神术"论略 杨天宏

《近代史研究》1993 年 5 期

试论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赵燕玲

《韶关大学学报》1995 年 3 期

K3 1996 年 1 期

民族危机与思维转型:论甲午战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向 马克锋

《广州社会科学》1997 年 1 期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愫 杨天宏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 4 期

K3 1998 年 2 期

华北农村的巫觋风习与义和团运动 张鸣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清史研究》1998 年 4 期

K3 1999 年 3 期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张鸣

《读书》1999 年 9 期

(六)发展阶段

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 刘汝霖

《进步日报》1951 年 8 月 31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 吴松龄

《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1979 年

义和团的后期斗争及其特点

历史系四年级“义和团运动史”编写组

《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 3—4 期

山东义和团转入直隶说质疑 李宗一

《近代史研究》1979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4 年

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戚其章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3 期

《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 林华国

《近代史研究》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关于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问题的考察 付崇兰、冯佐哲

《华南师院学报》1981 年 2 期

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 鲜于浩、鲜华章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后的反教斗争浅析 刘鉴唐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八国联军入侵后的反洋教斗争 刘恩格等

《北方论丛》1988 年 1 期

20 世纪初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胡绳武等

《安徽史学》1988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后会党的反洋教斗争 邵雍

《历史教学》1989 年 6 期

K3　1989 年 10 期

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吴士英

《北方论丛》199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运动起讫时限之界定

——兼论并无"反清复明""扫清灭洋"阶段

欧阳跃峰

《安徽师大学报》1995 年 2 期

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略论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阶段

欧阳跃峰

《安徽师大学报》1996 年 2 期

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略论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阶段

欧阳跃峰

《安徽师大学报》1996 年 3 期

K3　1996 年 11 期

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的量化分析　赵树好

《河南大学学报》1998 年 38(6)

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主要标志　黎仁凯

《河北大学学报》1999 年 2 期

K3　1999 年 9 期

(七)各地义和团活动和反教会斗争(含余栋臣起义、景廷宾起义)

山　东

1898年濮州反抗教堂事件调查(有关义和团资料)　王先进
《近代史资料》1957年5期
参加山东、河北义和团运动调查的点滴体会　陈周棠
《中学历史教学》1957年10期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　陆景琪
《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3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年
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山东通史编写组
《山东师院学报》1960年1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年
山东义和团运动综述　刘亦冰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山东义和团资料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义和团在聊城的斗争　丝木、贻佐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原因　史森钦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义和拳在平原、德州的发展　许恒、森钦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临清义和团活动的回忆——于明轩先生访问记　白丝木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2期

郯城神山教案史迹初探 赵镇玫

《山东省志资料》1960 年 2 期

鲁北义和团调查概述(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而作)

华南师院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山东省志资料》1960 年 4 期

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与山东人民的抗德斗争 刘亦冰

《历史教学》1960 年 9 期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中的几个问题 陆景琪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郭栋臣的亲笔回忆——关于冠县义和团的二、三事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关于朱红灯反清问题的商讨 任荣康等

《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

义和团在山东活动情况二三事 张寄谦

《历史档案》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大刀会及其反洋教斗争 周海青

《齐鲁学刊》1981 年 5 期

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 商鸣臣

《义和团运动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的前奏和先驱 杨华

《义和团运动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陆景琪

《义和团运动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试论清代山东教门与拳会的特点 王永昌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

徐绪典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孙允荣率领的义和团 商松石

《惠民文史资料》(山东)第 2 辑 1982 年

山东义和团是由八卦教"武场"演变而来 周海青

《东岳论丛》1982 年 4 期

山东义和拳的兴起、性质与特点 陆景琪

《文史哲》1982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朱红灯是初期义和团主要领袖吗?

——兼析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侯彬、郭墨兰

《东岳论丛》1982 年 4 期

孙允荣率领的鲁北义和团的一些史实考辨 商松石

《山东史学集刊》1983 年 1 期

梨园屯教案和义和团运动 张守常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孙允荣率领的鲁北义和团斗争特点和意义 商松石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梨园屯教案浅探 王守中

《历史档案》1983 年 11 期

田镇、皂李的义和团暴动 高永祥

《高青文史资料》(山东)1984 年第 1 辑

试论孙允荣率领的鲁北义和团斗争特点 商松石

《山东史学集刊》1984 年 1 期

滨县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 关增岭

《滨县文史资料》(山东)1984 年第 1 辑

烧"洋楼" 于沅伯

《潍坊市潍城区文史资料》(山东)1984 年第 1 辑

1896—1897 年平度民众的反洋教斗争 刘晓焕

《平度文史资料》(山东)1985 年第 1 辑

日照人民反洋教运动 蔡悟一

《日照文史》(山东)1985 年第 1 辑

陵县义和团史略 夏季亭

《陵县文史资料》(山东)第 1 辑 1985 年

义和团在邹平起事始末纪略 郭连贻

《邹平文史资料》(山东)第 2 辑 1985 年

蒋官屯杀曹官始末记 王昔永

《聊城文史资料》(山东)1985 年第 3 辑

德州义和团史略 夏季亭

《德州文史》(山东)1985 年第 3 辑

山东义和团反帝斗争简述 陆景琪

《山东史志通讯》1985 年 4 期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 杜耀云

《东岳论丛》1986 年 1 期

义和团在阳信活动 魏健等

《信阳文史资料》(山东)第 1 辑 1986 年

义和团在滨蒲一带的战斗 商松石

《滨州文史资料》(山东)1986 年第 1 辑

义和团在利津的始末 周树生

《利津文史资料》(山东)第 1 辑 1986 年

冠县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运动 路遥

《历史研究》1986 年 5 期

义和团在临邑的活动 县志办

《临邑文史资料》(山东)1986 年

山东士绅与反教会斗争 陶飞亚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义和团在茌平 李盛奎

《茌平文史资料》(山东)第 1 辑 1988 年

义和团在沾化的活动概述 傅辛章等

《沾化文史资料》(山东)1988 年第 2 辑

我市发现义和团《团规》 文史办

《胶州文史资料》(山东)第 3 辑 1988 年

义和团玉皇庙战斗始末 陈远亮

《济阳文史资料》(山东)1988 年第 5 辑

孙允荣率领的鲁北义和团调查资料 商松石

《惠民文史资料》(山东)第 5 辑 1988 年

义和团运动在高密 刘晓焕

《文史资料选辑》(山东高密)1988 年第 7 辑

平度义和团运动史略 刘晓焕

《平度文史资料》(山东)1989 年第 2 辑

从一个外国传教士的一段经历看山东义和团运动对西方殖民者的打击 任毅军

《河南大学学报》1989 年 4 期

K3 1989 年 12 期

曹州地区大刀会的反帝斗争 许彤

《菏泽师专学报》1989 年 4 期

义和拳在高唐 邵金铭

《高唐文史资料》(山东)1990 年第 5 辑

义和团在阳信 魏书章

《阳信文史资料》(山东)第 5 辑 1990 年

益都义和团纪略 刘晓焕

《文史资料选辑》(山东青州)1990 年第 8 辑

清末山东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 马庚存

《山东师大学报》1993 年 2 期

鲁西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综述 卢庆洪、顾桂芳

《聊城师院学报》1995 年 2 期

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民教冲突形态研究 周育民

《历史档案》1997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 1997 年

略论中原地区大刀会的性质及其特点 王永昌、王强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 2 期

记一八九九年威海人民反抗英帝的斗争 戚其章

《文史资料选辑》(山东)第 9 辑

北 京

庚子拳变时之北京 吟梅山馆主

《新东方》(上海)1940 年 2 月—5 月 1 卷 1—4 期

义和团为什么用全力去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为什么始终也没有把使馆攻下？ 毛健予

《新史学通讯》1953 年 7 期

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杨济安、张寄谦

《光明日报》1960 年 5 月 12 日

义和团在京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 张祥光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 张寄谦

《北京大学学报》1960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论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兴起与衰落 魏开肇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义和团在北京的反帝活动 慧儒

《北京日报》1962 年 11 月 15 日

西什库被围纪略 刘品一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庚子回忆 马文容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 苏寿桐

《光明日报》1980 年 4 月 22 日

谁烧的大栅栏 王彬

《北京晚报》1980 年 10 月 9 日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回忆 张崇恩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1980 年 4 月

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期间围攻使馆事件的真象 廖一中

《文稿与资料》1980 年 5 期

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 李德征、丁凤麟

《文史哲》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集会卢沟桥散发揭帖 魏开肇

《北京日报》1982 年 4 月 15 日

义和团进占涿州威逼京师 魏开肇

《北京日报》1982 年 5 日 27 日

义和团用自制火箭散发传单 张必忠

《北京日报》1982 年 7 月 31 日

北京西郊百花山区莲花庵村及其附近义和团的活动情况 张守常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关于北京义和团的两个问题 李宏生等

《山东史学集刊》1984 年 1 期

评义和团火烧大栅栏事件 李文海

《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

K3 1986年5期

延庆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纪略 李士林

《延庆文史资料》(北京)第1辑 1988年

房山义和团运动纪略 戴宗斌

《房山文史选辑》(北京)第3辑 1990年

通州反教会抗联军始末 周良

《文史选刊》(北京通县)1990年8期

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林华国

《历史研究》1991年3期

K3 1991年9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起止时间 魏开肇

《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4期

天 津

义和团保卫天津的英勇斗争 金家瑞

《新史学通讯》1956年5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年

义和团在天津的揭帖 张耕

《北国春秋》1959年1期

天津发现义和团遗址多处,已查明的有吕祖堂等坛口六处

《光明日报》1960年7月2日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图片) 天津历史博物馆

《北国春秋》1960年3期

义和团天津的反帝斗争 南开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历史专业班

《历史教学》1960年6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义和团天津地区的首领张德成活动片断 董振修

《天津日报》1964 年 6 月 26 日

张德成的原籍在哪儿?

《天津日报》1964 年 7 月 22 日

天津义和团反帝斗争史迹调查记略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文物》1976 年 5 月 5 期

天津义和团史迹调查实录 常家骐

《天津社联通讯》1979 年 4 期

义和团在天津攻打过的紫竹林(资料) 张仲

《历史教学》1979 年 6 期

吕祖堂义和团坛口 孔椿

《天津日报》1980 年 7 月 5 日

吕祖堂——义和团总坛口 国魏

《天津日报》1980 年 11 月 2 日

庚子回忆片断(三篇) 张修华、张玉德、金大杨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1980 年 4 月

庚子沦陷后的天津 李然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1980 年 4 月

略论天津义和团运动 廖一中

《天津师院学报》1980 年 5 期

义和团天津保卫战 方奎

《湖北日报》1982 年 8 月 12 日

天津的义和团运动 史轩

《天津教育》1982 年 7—8 期

张德成大战紫竹林 刘景全、黄小同

《天津日报》1983 年 10 月 18 日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生于何年? 董振修

《天津日报》1984 年 3 日 18 日

义和团在天津城乡的反帝斗争 常家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5 年第 30 辑

义和团在天津的总坛口吕祖堂 李法贤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5 年第 30 辑

武清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梗概 冯品清

《武清县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 1 辑 1987 年

义和团大薄甸反帝斗争 恒庐

《宝坻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 2 辑 1989 年

静海"离字团"简述 武德巍

《静海文史资料》(天津)第 2 辑 1989 年

武清县"红灯照"反帝斗争情况点滴 沙国璞

《武清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 1989 年

河 北(含直隶、察哈尔)

察哈尔拳乱始末记(附属归绥道政之钦冤案) 陈守谦

《河北月刊》1936 年 4 卷 6 期

义和团首领文霸之是怎样一个人(问答) 贾逸君

《历史教学》1953 年 12 期

义和团在直隶省的斗争 林树惠

《南开大学学报》1956 年 2 期

《中国农民起义论集》1958 年

论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 祁龙威

《文史哲》1956 年第 10 期

冀中义和团运动和抗"洋捐" 李廷俭

《河北日报》1956 年 12 月 17、18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1901 年冀中农民抗洋捐运动调查 李廷俭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对"论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一文的几点商讨 杨登岳

《文史哲》1957 年 6 期

义和团大师兄是姚福财 张帆等

《文汇报》1959 年 7 月 15—19 日

义和团运动后河北、辽宁的一些"教案"资料 赵地

《北国春秋》1960 年 2 期

义和团团员访问记 张安民

《北京师大学报》1960 年 3 期

关于景廷宾的"扫清灭洋"起义 贾逸君

《历史教学》1960 年 6 期

关于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的几个问题 贾逸君

《光明日报》1960 年 12 月 9 日

义和团坐镇安次县 张士生

《河北日报》1961 年 12 月 3 日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地区 赵永生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闹义和团时的献县总堂 宋冠军口述 王洗耳笔录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戴德荣对义和团的战斗 张济众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有关义和团在保定地区反帝斗争的一些情况 邸富生

《历史教学》1964 年 11—12 期

义和团在保定地区反帝斗争 邸富生

《辽宁师院学报》1978 年 1 期

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英勇战斗 张智辉

《教学与研究》(丽水师专)1979 年 1 期

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中国近代史教研室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献县张庄天主教总堂的反动活动与冀东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张平一等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 1980 年

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 宋文 刘绍刚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兴起和发展 吴思鸥

《文稿与资料》(津)1980 年 7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清末宣府风云摭拾 石影

《河北师院学报》1981 年 1 期

义和团时期威县赵家庄耶稣会伊索雷神父的日记 龚杰文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1 期

从军机处档案看景廷宾起义 宋秀元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2 期

廊坊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张守常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2 期、198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在直隶 王纪河

《河北师大学报》1982 年 4 期

乡勇奋战八国联军 李梨

《河北日报》1982 年 3 月 28 日

河北威县义和团调查记 商鸣臣 于家福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直隶广宗景廷宾起义 方尔庄 李土石

《河北学刊》1983 年 2 期

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 马鼎盛

《广州日报》1984 年 1 月 5 日

张洪与滦州义和团 张喜丁

《滦县文史》(河北)第 1 辑 1984 年

宣化义和团简述 王鉴

《宣化文史资料》(河北张家口)第 1 辑 1984 年

《张家口文史资料》(河北)第 11 辑 1987 年

廊坊的义和团运动 岳一中

《廊坊市文史资料》(河北)第 1 辑 1984 年

廊坊大捷 孟宪臣

《廊坊文史资料》(河北)1984 年第 1 辑

定兴县大沟村的义和团 瞿福同

《定兴文史资料选》(河北)第 1 辑 1985 年

保定义和团运动概述 尤文远

《保定文史资料选辑》(河北)第 2 辑 1985 年

白石红灯明月高——涞源县义和团、红灯照始末初探 李清等

《文史资料专刊》(河北涞源)第 4 辑 1985 年

义和团运动在东城 张连君

《阳原文史资料》(河北)第 2 辑 1986 年

庚子之役的井陉保卫战 许力扬

《石家庄文史资料》(河北)1986 年 4 辑

赵三多与义和拳在直隶的兴起 李达三

《河北地方志》1987 年 4 期

涞水县义和团斗争大事记 县方志办

《涞水文史资料选辑》(河北)第 1 辑 1987 年

田洛献率众抗洋捐 葛致岩等

《安平文史资料》(河北)第 1 辑 1987 年

一件不见史籍的史实——略记 1900 年滏阳河岸大火 张鉴秋

《冀县文史》(河北)第 2 辑 1987 年

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 刘刚范

《河北师院学报》1988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 刘子甫等

《盐山文史资料》(河北)第 2 辑 1988 年

庚子烽火浭阳图 董宝莹

《丰润文史资料选辑》(河北)第 3 辑 1988 年

关于庚子大沽之战中的几个问题 姜文英

《河北大学学报》1988 年 4 期

义和团烧洋楼 张诚藩

《北戴河文史资料》(河北秦皇岛》第 1 辑 1989 年

义和团攻打文安城 李玉川等

《文安文史资料》(河北)第 1 辑 1989 年

庚子廊坊大捷 王树松

《廊坊文史资料》(河北)1989 年第 1 辑

英雄儿女——记沧州义和团 金义为

《沧州文史资料》(河北)第 2 集 1989 年

义和团落垡、廊坊之战史实考订 尚克强

《历史教学》1989 年 3 期

范家圪坮围困战始末——河间义和团与天主教摩擦缩影 闻涛

《河间县文史资料》(河北)第 4 辑 1989 年

义和团运动在遵化的兴起和失败 高纯秀

《遵化史话》(河北》第 6 辑 1989 年

义和团在廊坊阻止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几点史实质疑 徐树

《北京师院学报》1990 年 1 期

斗争中求胜和——南贾良村民痛打洋神甫 赵清玉

《灵寿县文史资料》(河北)第 2 辑 1990 年

廊坊战役与瓜分中国阴谋之缓解 牟安世

《历史教学》1991 年 1 期

冀中义和团运动与清廷的宣战决策 黎仁凯

《历史教学》1992 年 2 期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廊坊大捷纪实 岳一中

《文史通讯》1992 年 3—4 期

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研究 傅德元 姜文英

《河北学刊》1992 年 5 期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运动在阜城的兴起 常润华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义和团廊坊大捷永垂青史 金家瑞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义和团廊坊大捷的历史地位 张起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义和团廊坊大捷社会背景浅析 陈国旺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义和团又廊坊作战史实辨析 尚克强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由反帝爱国运动到反帝爱国战争的转折 马金旗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由廊坊大捷引发的思考 尹文清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有关廊坊大捷几个问题的考证 岳一中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关于廊坊大捷的几个问题 公孙訇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试论廊坊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色彩 仝正年 陈立民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略论义和团廊坊大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王聚英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与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潮 魏开肇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名实考 安龙琪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的内涵 徐树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的概念、称谓及其他 苏位智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和天津保卫战及其历史意义 陈德欣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是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标志 贾永生 刘淑敏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大捷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发展的结果 任家绪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廊坊义和团运动特点浅析 关秀媛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津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李玉川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霸州义和团运动综述 王及吾 崔伟基 姜寿民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黎仁凯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97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论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 李云豪、刘保华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试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高涨的原因 牟安世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保定的义和团运动 尤文远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试论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的特点 姜文英

《河北大学学报》1999 年 24、(2)期

K3 1999 年 9 期

山 西

义和团在山西的斗争 谢玉章

《历史教学》1959 年 12 期

山西地区的义和团运动 乔志强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义和团在汾阳、太谷和阳城之一:汾阳义和团斗争 田静轩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2 年 2 月第 2 辑

义和团在汾阳、太谷和阳城之二:太谷义和团简况 吴华亭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2 年 2 月第 2 辑

义和团在汾阳、太谷和阳城之三:东石臼村义和团起义始末 王延杰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2 年 2 月第 3 辑

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证 张茂先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2 年 2 月、10 月第 2、3 辑

临汾四先烈与义和团 侯少白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2 年 10 月第 3 辑

旧报重辑(北京"京报"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两侧报道) 王尊光抄录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2 年 2 月 4 辑

大同义和团的反帝运动 徐增祥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3 年 5 辑

《大同文史资料选辑》1982 年 5 辑

《阳城东石臼村义和团起义始末》的更正

《山西文史资料选辑》1963 年 7 辑

《阳城东石臼村义和团起义始末》的更正

《山西文史资料》1967 年 7 辑

义和团资料几则 乔志强

《山西大学学报》1978 年 2 期

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 乔志强

《山西大学学报》1981 年 2 期

壮烈的一幕 黎民

《忻州文史资料》(山西)第 1 辑 1985 年

平陆义和团之起落 王倬云

《平陆文史资料》(山西)第 3 期 1985 年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潞安 白嘉诚

《长治文史资料》(山西)第 3 辑 1985 年

义和团符水念咒的回忆 秦丙戌

《万荣文史资料》(山西)第 1 辑 1986 年

义和团运动 任瑞祥

《平定文史资料》(山西)第 1 辑 1986 年

义和团在堂明村烧杀天主教徒 媚荣

《五台文史资料》(山西)第 2 辑 1986 年

南开社村东杀洋鬼子的经过 张振文

《汾阳文史资料》(山西)第 2 辑 1986 年

义和团运动剪辑和在霍县的一些情况 郭英萍

《霍县文史资料》(山西)第 3 辑 1987 年

义和团在土门 张文盛

《石楼文史资料》(山西)第1辑 1988年

义和团在石曰、郎山的活动 栗守田

《阳城文史资料》(山西)第2辑 1988年

义和团在曲沃运动始末 段士朴

《曲沃文史》(山西)第4辑 1989年

义和团运动期间董福田等四先烈的反清活动 苏福文

《临汾文史资料》(山西)第4辑 1989年

榆次义和团运动始末 吴廷鸾

《榆次文史资料》(山西)第11辑 1989年

义和团在霍州陈村的一些活动情况 郑安虎

《霍州文史资料》(山西)第6辑 1990年

义和团运动在祁县 段镇

《祁县文史资料》(山西)第7辑 1990年

内蒙古

"光绪二十六年正,绥远到处起神兵"——洋教士的罪恶和义和团的反帝运动 戴学稷

《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1期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 戴学稷

《实践》1960年3期

一九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戴学稷

《历史研究》1960年6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0年

义和团运动在包头 朱硕甫

《包头时报》1962年7月14日

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陈育宁

《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5期

一九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义和团运动在"口外七厅"和伊盟等地的发展　戴学稷
《内蒙古近代史论》第二辑

东　北

东北义和团运动初探　陈贵宗
《史学集刊》1956年1期
义和团运动前后东北人民反瓜分斗争　李时岳
《史学月刊》1959年5期
义和团在辽宁的反帝斗争　辽大中国近代史教研究室
《辽宁时报》1961年5月10日
义和团运动在东北　黎光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年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见闻　佟洛生
《辽宁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1辑
义和团在黑龙江的反帝斗争情况　孙占文
《哈师院学报》1964年1期
《黑龙江省史探索》1983年
关于刘永和叛变投俄的问题　王魁喜
《吉林师大学报》1977年5－6期
辽宁义和团运动大事记　符生
《辽宁师院学报》1978年1期
三姓靖边抗俄遗址调查——依兰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吴文衔
卢锡鹏
《哈师院学报》1978年4期
义和团运动在黑龙江　孙占文
《学习》1978年10期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吴文衔

《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 年 1 期

略谈有关忠义军抗俄斗争的几个问题 黎光

《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 2 期

义和团在黑龙江 李士良

《黑龙江日报》1980 年 3 月 13 日、16 日

义和团辽宁的抗俄斗争 符生

《辽宁日报》1980 年 5 月 15 日

庚子纪实 郑成和等

《哈尔滨日报》1980 年 8 月 12 日

一九 00 年黑龙江军民抗俄纪实 谷风

《黑龙江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 1 辑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于志耿等

《学习与探索》1980 年 1 期

略谈忠义军抗俄史料的两个问题 敬知本

《学术研究丛刊》1980 年 2 期

一九 00 年东三省的抗俄战争及其失败的教训 薛衔天

《清史研究集》1980 年 3 辑

拦江锁与拦江锁柱石 李桂芹

《求是学刊》1980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在东北 武育文等

《社会科学辑刊》1980 年 4 期

可歌可泣的辽海保卫战——义和团运动中辽宁人民抗俄斗争的光辉一页 张璇如

《社会科学集刊》1980 年 4 期

义和团在吉林 张羽

《学会简报》1981 年 1 期

黑龙江的义和团运动 李士良

《黑龙江青年》1981 年 7 期

试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安静波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巴颜通抗俄要塞 李英魁

《学习与探索》1982 年 2 期

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反对沙俄蚕食和迫害的斗争 张本政等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 年 2 期

我对"忠义军"抗俄斗争中两个问题的看法 刘玉岐

《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 2 期

一九 00 年乜河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张永德等

《牡丹江文史资料》(黑龙江)1983 年 1 辑

义和团运动盘山人民的反帝斗争 文史办

《盘山文史资料》(辽宁)第 2 辑 1983 年

关于忠义军抗俄斗争时间的界限问题 敬知本

《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在辽宁 武育之等

《辽宁日报》1984 年 1 月 5 日

义和团火烧洋楼 孙万里

《黑山文史资料》(辽宁)第 1 辑 1984 年

铁岭的红灯照——记铁岭人民的反帝反洋教斗争

《铁岭文史资料汇编》(辽宁)1984 年第 1 辑

庚子年珲春军民抗俄斗争 郎立天

《延边文史资料》(吉林)1984 年 2 辑

《珲春文史资料》(吉林)1985 年 1 辑

1900 年东三省的抗俄战争及其失败的教训 薛衔天

《清史研究集》1984 年 3 辑

义和团攻打南三台子教堂 梁恩惠

《辽中文史资料》(辽宁)第 3 辑 1984 年

一九 00 年三姓保卫战 卢锡鹏

《黑龙江文史资料》1984 年 14 辑

义和团运动在海龙 李景惠、沈永嘉

《吉林史志》1985 年 2 期

田庄台义和团运动 郝勋

《营口文史资料》(辽宁)第 3 辑 1985 年

营口义和团的兴起 史忠

《营口文史资料》(辽宁)第 3 辑 1985 年

田庄台义和团活动始末 田兵

《大洼文史资料选编》(辽宁)第 6 辑 1985 年

一场轰轰烈烈的朝阳义和团运动 沈庆洪

《朝阳文史资料》(辽宁)1986 年第 1 辑

义和团运动在盘山一带之概况 鞠晶

《盘锦文史资料》(辽宁)第 1 辑 1986 年

林家店人民抗俄斗争

《榆树文史资料》(吉林)1986 年 1 辑

义和团运动在辽西 宋国强

《锦州师院学报》1986 年 2 期

红灯照与义和团 汪韶彬

《锦州文史资料》(辽宁铁岭)第 2 辑 1986 年

铁岭义和团运动 吴润令

《铁岭文史资料》(辽宁)第 2 辑 1986 年

辽宁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宗教斗争初探 顾明文

《辽宁大学学报》1986 年 3 期

蛟敦人民抗俄斗争 亓玉亮

《蛟河文史资料》(吉林)1987 年 3 辑

忠义军、六合拳在临江 于性菊

《浑江文史资料》(吉林)1987 年第 4 辑

营口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 王风仪

《营口文史资料》(辽宁)第5辑 1987年

忠义军抗俄救国史考 高其昌

《抚顺文史资料选辑》(辽宁)1987年10辑

论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北地区反洋教斗争 孙克复、杜丽君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年

长春义和团运动探析 高乐才

《长春师院学报》1988年1期

忠义军痛打沙俄侵略军 张春林等

《新宾文史资料》(辽宁)1988年1辑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北义军的抗俄斗争 敬知本

《历史教学》1988年2期

海城义和团运动亲闻录 李国安

《海城文史资料》(辽宁)1988年第2辑

义和团运动

《通化县文史资料》(吉林)第4辑 1988年

宁远州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张文俊

《兴城文史资料》(辽宁)1988年第4辑

从东北义和团到东北义勇军——从东北人民两次抵御外侮的义举透视东北近代社会以来的民族斗争 王希亮、韩来光

《黑河学刊》1989年1期

孙大圣举义旗 李荣芳

《磐石文史资料》(吉林)1989年3辑

刘单子奇袭"毛子营" 潘殿魁

《磐石文史资料》1989年3辑

沙俄与营口义和团运动 孙福海

《长春师院学报》1990年1期

长春义和团运动 田平

《长春史志》1990年4期

猫儿山上中华魂 田乃庆

《临江文史资料》(吉林)1990 年 4 辑

略述营口义和团运动 谢元 杨洪钧

《社会科学辑刊》1992 年 4 期

试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特点 郭桂兰

《北方论丛》1995 年 2 期

建华区的三座义和团神坛考 平庆林

《卜奎文史资料》(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第 1 辑

浙 江

王锡彤和反洋教起义 周中夏

《浙江日报》1963 年 4 月 7 日

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的反教会斗争 沈雨梧

《浙江学刊》1963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宁海王锡彤起义 徐和雍

《杭州大学学报》1979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浙南拳民运动 马允伦

《温州师专学报》1980 年 2 期

刘家福起义与衢州城的反教会斗争 徐和雍

《杭州大学学报》1981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平阳拳民运动 马允伦等

《平阳文史资料选辑》(浙江)1984 年第 1 辑

王锡桐反教起义始末 徐锡珪等

《宁海文史资料》(浙江)1985 年第 1 辑

《宁波师院学报》1985 年 3 期

诸暨白旗党的反帝反教会斗争[1900 年 6 月] 陈章兴

《绍兴师专学报》1985 年 1 期

论 20 世纪初浙江知识界与义和团 周小波

《江海学刊》1990 年 3 期

《教案与近代中国》1990 年

福　建

华山风景——一八九五年福建古田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陈元煦

《福建师大学报》1978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前夕厦门人民反对侵略者设立租界的斗争　洪玲

《中学历史教学》1958 年 3 期

清末建瓯人民反对教会的斗争　李宝石

《建瓯文史资料》(福建)1980 年第 1 辑

清末福州人民反帝斗争史话　郑贞文等

《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福建)1983 年第 2 辑

厦门事件与惠州起义关系质疑(1900 年)

(日)信夫清三郎著 熊达云摘译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5 年 6 期

1900 年福建"义和会"收复台湾的抗日斗争　王魁喜

《中日关系史论集 2》1985 年

略述近代福建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陈于勤

《理论学刊》(闽)1989 年 11 期

河　南

义和团运动前后南阳人民的反帝斗争——纪念义和团运动 60 周年(调查报告)　开封师院历史系南阳调查组

《史学月刊》1960 年 8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　开封师院历史系等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二十世纪初河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张连波、张九洲

《河南大学学报》1986 年 1 期

砸教堂小记 李涵阜

《社旗文史》(河南)第 1 辑 1986 年

南阳县安皋农民扒"洋堂" 席正等

《南阳县文史资料》(河南)第 1 辑 1987 年

桐柏人民反洋教斗争 刘祥卿

《桐柏文史资料》(河南)1988 年第 2 辑

清邑义和团 朱正朋

《濮阳文史资料》(河南)第 5 辑 1989 年

周口义和团的一次壮举——出击苑老庄天主教堂 苑明晨等

《周口文史资料》(河南)第 4 辑 1987 年

湖 南

近代衡州人民反洋教斗争述论 王继平

《衡阳师专学报》1985 年 1 期

周汉反洋教案述论 刘泱泱

《益阳师专学报》1985 年 1、2 期

近代土家族地区的反教会斗争 王承友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 2 期

湖南官绅与反洋教运动 王继平

《邵阳师专学报》1986 年 2 期

先祖周汉反洋教一事述略 朱声贤

《长沙史志通讯》1987 年 2 期

清代同光年间土家族地区反教会斗争述论 彭官章

《思想战线》1987 年 6 期

广 东

1898 – 1899 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

斗争

《理论与实践》1958 年 1 月 2 期

1898 – 1899 年广东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　　超英

《中学历史教学》1958 年 10 期

1897 – 1899 年乐东县多港黎族人民起义始末

广东省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

《广东历史资料》1959 年 1 期

1898 – 1899 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

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工作团

《广东历史资料》1959 年 1 期

1899 年东莞、宝安人民反对英国侵占九龙半岛的斗争　　沈付

《史学月刊》1959 年 12 期

四　川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　　徐庆坚

《近代史资料》1955 年 4 期

1886 年至 1898 年的四川大足教案——在义和团起义前两年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　　历史系调查组

《四川大学学报》1956 年 1 期

四川的义和团　　嘉弘

《历史研究》1956 年 8 期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史料续集　　伍士谦等

《近代史资料》1958 年 1 期

义和团在四川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　　隗瀛涛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　　隗瀛涛

《历史教学》1960 年 7 期

关于余栋臣反帝起义斗争的研究

《文汇报》1962 年 3 月 7 日

义和团运动在四川 黄淑君执笔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8 年 2 期,1979 年 1 期

"反清灭洋"的四川义和团 张力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79 年 20 辑

余栋臣反帝再起义 李有明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79 年 20 辑

廖观音——四川义和团人物介绍 李洁

《历史知识》1981 年 1 期

十九世纪末的四川大足爱国运动 黄天朋

《西南师院学报》1982 年 3 期

余栋臣起义军和哥老会 胡汉生

《西南师院学报》1982 年 3 期

反洋教运动和余栋臣起义讨论 吴金钟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5 期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涂鸣皋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5 期

评余栋臣 赵清、郑城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5 期

第一个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 隗瀛涛

《文史知识》1982 年 11 期

从档案史料看辛亥革命前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 宋秀元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四川义和团"质疑 曹蓉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近代史研究》1993 年 1 期

武装反清领袖余栋臣纪略 兰鸿章等
《隆昌文史资料选辑》(四川)第2辑 1983年
试论余栋臣起义的性质 曾绍敏
《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3期
论余栋臣起义在反洋教斗争史上的作用 彭易芬
《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4期
知识分子在余栋臣起义中的作用 李有朋、陈纪涛
《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4期
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 蔡少卿、屠雪华
《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3期
试论四川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意义和作用 刘德仁、王家楼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4期
余栋臣、蒋赞臣评价 田学诗
《荣昌文史资料选辑》(四川)第1辑 1985年
余栋臣在荣昌监狱纪实
《荣昌文史资料选辑》(四川)第1辑 1985年
余栋臣在永川的活动 王国璜
《永川文史资料选辑》(四川)第1辑 1985年
近代四川少数民族反教会侵略的斗争 郎维伟、周锡银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3期
浅析四川义和团运动与反教会侵略斗争的关系
李正清、余化一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历史研究专辑
四川新都"义和团"辨析 张永海
《历史档案》1987年3期
再论四川义和团运动——兼及义和团运动的范畴 张力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年
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专辑)

《大足文史》(四川)1988 年第 2 辑

义和团与吴直三 王建业

《温江文史资料选辑》(四川)第 2 期 1989

资阳义和团运动纪事 张炽棻

《资阳文史资料》(四川)第 4 辑 1989

渠县人民反洋教斗争 文世安

《渠县文史资料》(四川)1990 年第 3 辑

安岳义和团起义斗争简况 杨烈光

《内江文史资料》(四川)第 6 辑 1990 年

义和团炸毁舒家湾天主教堂的前后 刘乾隆

《金堂文史》(四川)1990 年

冠于川西的金堂义和团运动的几个问题的考辨 徐德勋

《金堂文史》(四川)1990 年

"四川义和团"质疑 曹蓉

《近代史研究》1993 年 1 期

其它地区

1900 年前后湖北地区的反洋反教斗争 章开沅

《理论战线》1960 年 5 期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1984 年

清末江苏地区的反"洋教"斗争 蒋顺兴

《江海学刊》1963 年 8 月 8 期

贵州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概述 张祥光

《贵州民族研究》1982 年 4 期

清代甘肃反洋教斗争述略 绿川

《甘肃日报》1984 年 1 月 16 日

试论 1899 年新疆回民起义 魏长洪

《新疆大学学报》1985 年 3 期

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　曾文琼
《西藏研究》1985 年 4 期
三边教案——1901 年至 1946 年陕西三边人民收回教会侵占领土的斗争　韩敏
《陕西师大学报》1986 年 1 期
洋教在台湾的传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　林其泉
《厦门大学学报》1986 年 1 期
近代湘鄂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王继平
《吉首大学学报》1986 年 1 期
伊犁义和团　张进清
《新疆日报》1986 年 10 月 18 日
陇人安维俊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刘大有
《社会科学(兰州)》1987 年 4 期
甘宁青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　赵艳林
《西北师院学报》1988 年 1 期
近代洋教在安徽的推传与安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张湘炳
《学术界》1988 年 3 期
近代云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徐继涛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 2 期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张应超
《西北大学学报》1990 年 20 卷 2 期
近代云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李可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90 年 3 期
摭谈义和团在安徽的活动及其未形成运动的原因　邹翔贵
《学术界》1991 年 3 期
论广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及其成效　谢铭
《河池师专学报》1996 年 4 期
19 世纪湖北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实践和启迪　田赐福

《江汉论坛》1996 年 8 期

(八)口号与政治思想

义和团的揭帖 荣孟源

《大公报》1952 年 5 月 8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历史笔记》1982 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义和团的"反清复明"和"扶清灭洋"的口号各是谁提出来的? 满清政 府用什么办法利用义和团?

《历史教学》1952 年 5 期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策略意义 毛健予

《新史学通讯》1953 年 2 期

有人分析义和团失败的原因是:义和团受满清统治阶级的利用,不应由 "反清复明"改为"扶清灭洋"义和团敌我不分,没有用阶级分 析,这些说法是否正确? 金家瑞

《历史教学》1953 年 8 期

正定匿名帖 史文录

《历史研究》1955 年 2 期

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 李绍忠

《光明日报》1956 年 2 月 16 日

一八八六— 一八九八年的四川大足教案始末——在义和团起义前两年 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 历史系调查组

《四川大学学报》1956 年 1 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扶清灭洋"口号 李时岳

《光明日报》1960 年 10 月 2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论义和团的政治口号 陆景琪

《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 1 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讨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北师大校刊

《光明日报》1961 年 5 月 6 日

从义和团和聂士城之间的关系看"扶清灭洋"的实质 高宗裕

《天津日报》1961 年 7 月 14 日

"扫清灭洋"口号是谁最早提出的? 李俊虎

《天津日报》1963 年 7 月 17 日

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 李俊虎

《历史教学》1963 年 2 期

关于义和团自立皇帝和"扶清" 张守常

《光明日报》1980 年 12 月 16 日

K3 1981 年 1 期

义和团的两个旗号 陈贵宗

《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 3 期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评议 杜耀云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3 期

义和团的起义及"灭洋" 张力

《历史知识》1980 年 4 期

论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 郑云山

《杭州大学学报》1980 年 4 期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 陈月清

《文史哲》1980 年 5 期

"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简论 张玉芬

《辽宁师院学报》1980 年 5 期

"顺清灭洋"、"剿清灭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张力

《社会科学研究》1980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 冯士钵

《历史教学》1980 年 7 期

从"扶清灭洋"口号看义和团对清王朝的认识 程歗

《历史教学》1980 年 7 期

义和团的旗帜 宋洪轮

《历史教学》1980 年 9 期

义和团思想述评 程歗

《文史哲》1981 年 1 期

义和团皇权主义试探 戚其章

《北方论丛》1981 年 5 期

义和团"扶清"口号的两重含义 李文海

《人民日报》1982 年 2 月 8 日

K3 1982 年 2 期

"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廖一中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5 期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涂鸣皋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5 期

第一个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 隗瀛涛

《文史知识》1982 年 11 期

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吴思鸥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运动的思想与宗教 (日)小林一美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评"大足教案"和"顺清灭洋"口号 (日)铁山博

《南开史学》1983 年 1 期

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 程歗

《历史研究》1983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吴剑杰
《武汉大学学报》1983 年 4 期
义和团的旗帜 陈振江
《文史知识》1984 年 9 期
"灭洋"口号的由来 戚其章
《光明日报》1985 年 5 月 1 日
"扶清灭洋"口号初论 邓春阳
《四川师院学报》1985 年 1 期
K3 1985 年 4 期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廖一中
《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 4 期
义和团思想论略 何若钧
《华南师大学报》1987 年 1 期
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源 史若民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兴华灭洋"口号试析 郭墨兰
《聊城师院学报》1988 年 4 期
"灭洋"口号的提出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郭墨兰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 1 期
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观 佐藤公彦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民众文化》1990 年 8 期
对"扶清灭洋"的再认识:义和团运动悲剧命运探析 范大章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 年 2 期
义和团"灭洋"探析 徐海安
《学海》1991 年 3 期
"扶清灭洋"解 高继红

《绥化师专学报》1993 年 1 期

对"扶清灭洋"口号之我见 章之骏

《上海金融学报》1994 年 3 期

"扶清灭洋"口号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李宁

《西昌师专学报》1997 年 2 期

近代中国人民仇教思想初探:以"兖州教案"为例试析 姚军

《青年史学》1997 年 51 期

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 张守常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华北农村的巫蛊风习与义和团运动 张鸣

《清史研究》1998 年 4 期

(九)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含地方政府)

义和团反帝运动被清政府利用的经过 何若钧

《新史学通讯》1955 年 2 期

清政府在山西镇压义和团的反动行为 志强

《山西师院学刊》1957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对外"宣战"的真相 金家瑞

《史学月刊》1957 年 12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士兵在天津的抗敌精神 赵捷民

《史学月刊》1958 年 2 期

义和团起义前夜清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苏)T·B·叶菲莫夫 郑之光译

《历史教学》1958 年 2 期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吴有清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戊戌政变后"帝党"在东南的活动——《张謇日记》笺余　祁龙威
《文汇报》1962年10月18日
对"帝党"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活动的剖析　祁龙威
《光明日报》1963年9月25日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抵抗派　廖一中
《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3期
K3　1980年3期
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廖一中
《历史研究》1980年3期
K3　1980年6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年
清朝顽固派与北京义和团　牛济
《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5期
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欧阳跃峰
《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6期
《团规》是清政府破坏义和团运动的罪证　林克光
《历史教学》1980年11期
义和团时期慈禧对外"宣战"的真相　金家瑞、袁家芳
《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1年1期
义和团、袁世凯及晚清政权结构　(美)麦金农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年1期
如何看待清政府支持利用义和团　冬青、大松
《史学月刊》1981年3期
庚子史诗中的义和团与清政府　刘学照
《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3期
庚子那拉氏对外宣战原因的探讨　张玉田
《辽宁大学学报》1982生4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年

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林敦奎、李文海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 年 4 期

K3 1982 年 10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对外"宣战" 金家瑞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试论十九世纪下半叶山东地方官对洋教入侵的态度 于家福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 年

论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军爱国官兵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周振雄

《广州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论那拉氏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阶段的政策 禾稼

《河北师大学报》1984 年 2 期

试论晚清统治集团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 吴民贵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 3 期

试论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发展变化的原因 吴思鸥

《天津社会科学》1984 年 4 期

K3 1984 年 8 期

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辨 林华国

《历史研究》1985 年 2 期

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廖一中

《天津社会科学》1985 年 6 期

K3 1986 年 2 期

后党主战帝党主和质疑 戚其章

《光明日报》1986 年 7 月 2 日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顽固派的嚣张和覆灭 高新战

《许昌师专学报》1986 年 2 期

K3 1986 年 5 期

关于刚毅从涿州回北京日期的讨论 丁名楠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2 期

《崇陵传信录》记刚毅回京日期有误 欧阳跃峰

《近代史研究》1986 年 2 期

关于义和团与封建统治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 李文海

《求索》1986 年 3 期

K3 1986 年 7 期

论清末庚子御前会议 陈颂桥、陈贵宗

《吉林大学学报》1986 年 4 期

K3 1986 年 8 期

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 戚其章

《东岳论丛》1986 年 6 期

K3 1987 年 1 期

一伙祸国殃民的顽固派:庚子事变肇祸诸臣 胜仪

《历史大观园》1986 年 6 月

义和团运动后的教案和清政府的政策 程为坤

《贵州文史丛刊》1987 年 2 期

论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演变 张玉田

《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 2 期

K3 1987 年 5 期

庚子那拉氏对外宣战刍议 冯培兰

《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87 牛 2 期

庚子宣战与"假照会"关系考辨 林华国

《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K3 1987 年 5 期

浅论庚子事变肇祸诸臣 刘圣宜

《华南师大学报》1987 年 3 期

K3 1987 年 10 期

清朝顽固派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欧阳跃峰

《安徽师大学报》1987 年 4 期

K3 1988 年 1 期

关于刚毅从涿州回京日期的更正 欧阳跃峰

《近代史研究》1987 年 5 期

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与义和团运动 陈振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地主阶级的内部分歧与义和团运动 廖一中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武卫军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马振举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评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与"仇教"官员 于伯铭、冯士钵

《社会科学辑刊》1988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后的官绅与教案 胡蝇武、程为坤

《史学集刊》1989 年 1 期

K3 1989 年 6 期

甲午庚子年间的清政府及其对外政策 高心湛

《许昌师专学报》1989 年 3 期

也评庚子宣战 安静波

《湘潭大学学报》1990 年 1 期

也评反对八国联军战争中的主和派与主战派 季云飞

《江海学刊》1990 年 2 期

K3 1990 年 5 期

清政府在义和团时期的人事变动 李德征

《近代史研究》1991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刘天路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 年 4 期

K3 1991 年 10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评庚子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争论 杜建国

《抚州师专学报》1991 年 4 期

东北满族官吏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政治态度 关捷

《社会科学辑刊》1992 年 1 期

冀中义和团运动与清廷的宣战决策 黎仁凯

《历史教学》1992 年 2 期

永清知县高绍陈镇压义和团的反动策略 王德奎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试谈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问题 孙长江、陈达伟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与东北三省满族官吏 关捷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论清朝地方官吏的主抚派 陈贵宗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清朝末期军事财政的变迁——以义和团战争前后为中心

(日)饭岛涉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庚子以后清廷变法失败原因探讨 李吉奎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时期统治集团各派心态分析 黎仁凯

《河北大学学报》199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庚子战前裕禄与袁世凯对反教会斗争的不同对策 林华国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黎仁凯、边翠丽

《河北大学学报》1998 年 2 期

K3 1998 年 11 期

晚清政府的守旧政策及其危害 王立业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 2 期

论清政府对外方略的改变 高路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边翠丽

《河北大学学报》1999 年 1 期

(十)其他派别的态度与活动(含自立军起义)

关于"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李时岳

《光明日报》1958 年 5 日 12 日

自立会唐才常等与会党的关系 嘉弘

《历史研究》1956 年 8 期

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态度和活动 何若钧

《历史教学》1957 年 9 期

自立会人物考 古哀州后死者原辑 赵必振增补

《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 2 期

自立会追忆记 吴良愧(琢宝)

《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 2 期

试论自立军事件 杨苏

《光明日报》1960 年 10 日 13 日

1900 年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原因 薛国中

《理论战线》1960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各阶级动向 金冲及等

《学术月刊》1960 年 11 期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1979 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试论自立军的性质 金冲及、胡绳武

《文汇报》1961 年 8 月 24 日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读史笔记 李侃

《人民日报》1962 年 12 月 27 日

唐才常遗作目录草编 文操

《学术月刊》1962 年 9 期

关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的几个问题 邓潭洲

《史学月刊》1964 年 11 期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汤志钧

《近代史研究》1979 年 1 期

论大通自立军起义——兼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问题 张珊

《安徽大学学报》1979 年 4 期

评孙中山对义和团的论述 丁凤麟

《文汇报》1980 年 11 月 3 日

资产阶级为什么没有联合义和团 钱艺艺、谢维卫

《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

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 刘其奎

《复旦学报》1980 年 5 期

孙中山与义和团 苏仲波

《南京师院学报》1981 年 2 期

孙中山与义和团运动 赵矢元

《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 3 期

试论自立军起义 刘泱泱

《求索》1981 年 3 期

关于孙中山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王勃

《兰州大学学报》1981 年 4 期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胡梦琪

《人文杂志》1981 年 5 期

论唐才常——兼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 郑云山

《华东师大学报》1981 年 6 期

义和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 苏位智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 年 1 期

自立军汉口起事始末 皮明麻

《武汉春秋》1982 年试刊 3 号

自立军湖北起事始末 皮明麻

《黄石师院学报》1982 年 4 期

关于自立军汉口失败的教训 汪叔子

《江西社会科学》1982 年 4 期

自立军败于龙汉厚、文廷式告密说辨讹 汪叔子

《近代史研究》1982 年 4 期

自立军汉口起事中的傅慈祥 傅光培

《武汉师院学报》1982 年 5 期

自立军事件中的唐才常 皮明麻

《武汉师院学报》1982 年 5 期

K3 1982 年 11 期

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骆宝善、桑兵

《近代史研究》1983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论文选》1984 年

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 蔡少卿

《光明日报》1984 年 1 月 4 日

兴中会与自立军 乐正

《孙中山研究论丛》(2)1984 年

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 蔡少卿

《近代史研究》1984 年 5 期

论唐才常的社会政治思想——兼谈自立军运动的性质 苏开华

《安徽史学》1984 年 5 期

正气会及《会序》三题 胡珠生

《历史研究》1984 年 6 期

兴中会与自立军起义 乐正

《华中师院学报》1985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和维新派 蔡世华

《历史教学》1987 年 1 期

K3 1987 年 2 期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试析 徐鹤年

《宁波师院学报》1987 年 1 期

K3 1987 年 6 期

自立军起义领袖唐才常 郑晓桦

《人物》1987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中的地方士绅 张九洲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唐才常与自立军 惠政

《纵横》1988 年 6 期

义和团时期中下层官绅的态势 王兴宁

《华南师大学报》1989 年 1 期

K3 1989 年 5 期

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大通自立军起义评述 张国茂等
《铜陵文史资料》(安徽)1989年第2辑

关于自立军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笃勤
《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2期
K3 1989年9期

论自立军起义失败原因及影响 陶季邑
《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0年1期

正气会二题:与胡珠生商榷 陶季邑
《历史研究》1990年6期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 赵春晨
《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1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义和团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 商鸣臣
《北方论丛》1991年3期

义和团时期南方会党斗争的若干问题 邵雍
《学术界》1992年2期

《开智录》与义和团 陈匡时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

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 桑兵
《历史研究》1993年1期
K3 1993年5期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康有为、梁启超) 容应萸
《历史研究》1994年3期

庚子勤王运动的几个问题 陈长年
《近代史研究》1994年4期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赵春

晨

《广东社会科学》1994 年 5 期

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 桑兵

《历史研究》1995 年 6 期

论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江中孝

《广东社会科学》1997 年 2 期

K3 1997 年 6 期

论庚子中国议会 桑兵

《近代史研究》1997 年 2 期

庚子孙李关系与中国政局 苑书义

《河北学刊》1997 年 2 期

K3 1997 年 5 期

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和论述 周兴樑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文史哲》1998 年 1 期

K3 1998 年 4 期

试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 申成玉

《山东师大学报》1997 年增刊

1998 年 2 期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 郭世佑

《历史研究》1998 年 5 期

K3 1998 年 12 期

(十一)列强对华政策及武装侵略

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 梁启超

《钦冰室文集》1905 年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

瓜分危言 梁启超

《钦冰室文集》1905 年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

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述之

《向导周报》1924 年 9 月 81 期

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果 杨绍震

《清华学报》1933 年 9 卷 1 期

所谓"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一九〇〇年美国对中国的领土阴谋 邵循正

《进步日报》1950 年 11 月 24 日

"门户开放"的侵略政策 王铁崖、周仁

《进步日报》1950 年 12 月 19 日

揭露美帝一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本质 宣百诗

《新中华》1950 年 13 期

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上、下) 雷海宗

《大公报》1951 年 3 月 2 日、9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 谢兴尧

《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13 日

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 丁则良

《大公报》1951 年 8 月 1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的抢劫行为 邵循正

《大公报》1951 年 8 月 1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天主教中的两个特别间谍——樊国梁和安治泰 邵循正

《大公报》1951 年 9 月 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洋教士的罪行　荣孟源
《学习》1951 年 1 期

美使康格与毓贤撤职　林树惠
《新史学通讯》1951 年 1 期

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帝侵华历史中的作用　余绳武
《历史教学》1951 年第 1 卷 5 期

天津都统衙门——帝国主义侵略的机构　林树惠
《历史教学》1952 年 6 期

论十九世纪末英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政策　A·耶鲁萨里姆斯基
《历史问题译丛》1953 年 4 期

美帝国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及其侵略性　胡滨
《光明日报》1955 年 3 月 1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论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　金冲及
《复旦学报》1955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形势图　杨文心
《历史教学》1955 年 5 期

美国夺取三沙湾的阴谋　高炳丰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美帝国主义"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美西战争与海洋政策　雷海宗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1895—1900 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黄廷柱
《历史教学》1957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斗争　宋异
《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 11 期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路线图

《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 12 期

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史森钦等

《文汇报》1960 年 10 月 14 日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 年

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矛盾与合作 童恩正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 2 期

1900—1901 年北京公使会议中英国帝国主义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 罪行活动 (苏)C·T·里夫西茨

《历史教学研究》1960 年 4 期

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丁名楠等

《新建设》1960 年 10 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行 张茂先

《山西文史资料》1962 年第 2、3 辑

宝复理屠杀义和团 刘清芬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帝国主义传教士对于义和团运动的通讯 赵永生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樊国梁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 赵永生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戴德荣对义和团的战斗 张济庆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对中国的侵略简述 王志光

《学术研究》1965 年 1 期

一个胃口特别大的斯文贼——丁韪良其人其事 原璞

《羊城晚报》1965 年 2 月 19 日

不忘过去，奋发图强——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史 隗瀛涛

《成都日报》1968 年 3 月 21 日

历史的铁案——沙俄侵占江东六十四屯的罪行 丽图

《南京大学学报》1977 年 2 期

帝俄出兵侵占东北与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义和团运动史》的一节 张旋如等

《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创刊号

老沙皇独占东北野心的大暴露(1900 年至 1903 年沙俄胁迫清政府订约 出卖东北主权的经过) 丁名楠

《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 4 期

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 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调查组

《学习与探索》1979 年 1 期

俄国的远东政策与维持 李济堂

《北方论丛》1979 年 2 期

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汪熙

《世界历史》1979 年 3 期

从赫德信函想到的一个呼吁 汪熙

《文汇报》1980 年 7 月 11 日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的侵华政策及其内幕 吴士英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3 期

海兰泡惨案死难人数究竟有多少(读史札记) 薛衔天

《历史研究》198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华军事行动的战略企图 吴士英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1980 年 1 期

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在联合侵华中的矛盾与斗争 李德征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英俄瓜分中国的协定(1899 年) (苏)波波夫 李嘉谷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1980 年

海兰泡惨案纪实 (俄)利奥·多伊奇 吕其苏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 1980 年

一九〇〇年中俄满洲冲突事件新探 郭玫瑰等 章伯铎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 年 3 辑

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罗荣渠

《历史研究》1980 年 3 期

沙俄是八国联军的侵华元凶 魏宏运 王黎

《南开学报》1980 年 4 期

俄英对关内外铁路及山海关的争夺 刘蜀永

《山东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

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 吴嘉静

《复旦学报》1980 年 5 期

论门户开放政策 向荣

《世界历史》1980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 胡滨

《山东师院学报》1980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满洲的桥头堡:一八九七——九〇二年英俄抗衡与京奉铁路

A·L·罗森鲍姆 刘观璧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 年 6 辑

庚子沦陷后的天津 李然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 8 辑

八国联军暴行简辑 世博

《历史教学》1980 年 11 期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略(上、下)　宁方
《新华日报》1981 年 9 月 22、30 日
九国瓜分天津的年代　张高峰
《天津日报》1981 年 10 月 25 日
克林德坊铭耻辱,德国战败被拆除　金文
《北京日报》1981 年 11 月 13 日
义和团运动和俄国的武装干涉　吴克明
《光明日报》1981 年 12 月 17 日
K3　1981 年 12 期
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的对华掠夺和抢劫　(澳)付因沏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1 期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　薛衔天
《近代史研究》1981 年 1 期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文资料　薛衔天等译
《近代史资料》1981 年 44 号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　姚秀芝等辑
《近代史资料》1981 年 44 号
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　(日)石光真清著　金宇钟译
《近代史资料》1981 年 44 号
义和团事件与日本的反应——派遣陆军部队的动机　(日)山口一之　丁贤俊　朴成昊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2 期
甲午战后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政策　丁名楠
《东岳论丛》1981 年 5 期
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方青
《山东师院学报》1981 年 5 期
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城,清廷卑躬屈膝办交接　赵淑香

《北京日报》1981 年 9 月 17 日

当年的耻辱柱 辛公显

《天津日报》1982 年 2 月 14 日

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几种不同看法 郝贵远

《历史教学问题》1982 年 1 期

K3 1982 年 2 期

《新华文摘》1982 年 4 期

沙俄在八国联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苏位智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1 期

关于沙俄争夺八国联军统帅权问题 薛衔天、李嘉谷

《中俄关系问题》1982 年 2 期

沙俄与天津都统衙门 李嘉谷

《近代史研究》1982 年 2 期

英国在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苏)奥斯特里科夫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 宋秀元

《历史档案》1982 年 2 期

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 (日)和田清著 魏光译

《学术研究丛刊》1982 年 3 期

庚子俄乱目击记 姜万昌

《黑龙江文史资料》1982 年 4 辑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屠杀 孟璠

《中学历史教学》1982 年 5 期

帝国主义与天津租界 王学海

《天津教育》1982 年 7—8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英俄瓜分中国的活动及其破产 杨遵道

《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科学论文集(历史部分)》1982 年

试论 1900 年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蒋一兵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 年

略论义和团时期英国对华政策 刘志义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 年

八国联军火烧端王府 王诚

《中国青年报》1983 年 8 月 7 日

《<女史箴>图》被八国联军劫走 许禄

《北京晚报》1983 年 11 月 6 日

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文物的罪行 庄建平

《史苑》1983 年 1 期

论义和团时期沙俄同英国在华争斗 吴士英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1900 年中俄海州冲突事件新探 郭玫瑰等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3 年 3 辑

有关《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史料的考证 李节传

《天津师大学报》1983 年 3 期

江东六十四屯屯名方位考 祁学俊

《黑河学刊》1983 年 3 期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对华政策 张玉芬

《辽宁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中国近代地方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 马振举

《历史知识》1983 年 4 期

八国联军血洗北国大地 耿来金

《外国史知识》1983 年 9 期

八国联军血洗京城,刘鄂北上救济难民 詹耀华

《北京日报》1984 年 12 日 3 日

俄国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农业移民 张宗海

《大庆师专学报》1984 年 1 期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企图控制中国东北的经济争夺活动

林世慧等

《学术研究丛刊》1984 年 2 期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谋求什么? 马宝华译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4 年 2 期

庚子年跑毛子 崔锡升

《延边文史资料》(吉林)1984 年 2 辑

沙俄的入侵东北与忠义军的抗俄斗争 池喜峰

《延边文史资料》(吉林)1984 年 2 辑

八国联军设立的天津都统衙门 廖菲

《历史教学》1984 年 6 期

海兰泡大屠杀见闻 尹兴文等

《黑龙江文史资料》1984 年 12 辑

庚子俄乱前前后后 徐永来

《黑龙江文史资料》1984 年 12 辑

试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杨令侠

《历史教学》1984 年 12 期

八国联军入侵我县窜犯"三关"纪实 王昌明

《盂县文史资料》(山西)1985 年 1 辑

沙俄侵略军入侵库伦旗始末 齐克奇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内蒙古)1985 年 1 辑

《库伦旗文史资料》(内蒙古)1987 年 1 辑

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 金安泰

《湘潭大学学报》1985 年 2 期

江东六十四屯的犁界之争及苏忠河垦地事件 刘邦厚

《社会科学战线》1985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再认识 崔丕

《东北师大学报》1985 年 6 期

K3 1985 年 12 期

试论八国联军侵华初期的俄国政策 李节传

《历史教学》1985 年 6 期

K3 1985 年 8 期

八国联军侵华纪略 赵振愚

《舰船知识》1985 年 9 期

庚子之秋八国联军侵略张家口始末 刘蔚

《张家口文史资料》(河北)1985 年 8 辑

天津都统衙门的军事殖民统治 董振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5 年第 30 辑

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若干历史考察 丁名楠

《档案与历史》1986 年 1 期

K3 1986 年 3 期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 辑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沙俄对满洲里地区的侵略 马祥峰

《满洲里文史资料》(内蒙古)1986 年 2 辑

法德联军在保定设立的权理司 吴云廷

《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86 年 3 辑

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及英俄关系 李节传

《史学月刊》1986 年 3 期

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19、20 世纪之交美国和俄国在中国的争夺 邹明德

《历史与档案》1986 年 4 期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 辑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题目改为"美 国门户开放政策起源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 王魁喜

《东北师大学报》1987 年 2 期

奥匈帝国与义和团运动 尤山度

《近代史研究》1987 年 2 期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张光灿
《学术论坛》1987 年 3 期
清末泉州叶题雁、吴鲁记八国联军暴行 陈盛明
《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福建)1987 年 20 辑
评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照会 吴机鹏
《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 2 期
K3 1988 年 6 期
帝俄在塘沽的暴行 闻超
《塘沽文史资料选辑》(天津)1988 年 2 辑
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阿列克谢耶夫在侵略我国东北问题上的表演 吴士英
《黑河学刊》1988 年 4 期
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 穆景元
《锦州师院学报》1988 年 4 期
K3 1988 年 12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马晶华译
《档案与历史》1988 年 4 期
俄国对义和团的初期政策 李节传
《河北师大学报》1988 年 4 期
天津都统衙门再研究 马振举
《清史研究通讯》1989 年 1 期
K3 1989 年 11 期
八国联军在天津北郊的暴行 滑富强
《北郊文史资料》(天津)1989 年 2 辑
法国侵略军在我县的暴行 王东海
《晋县文史资料》(河北)1989 年 3 辑
攻占北京 王继红译
《燕都》1989 年 4 期

八国联军进京见闻 齐如山

《文史资料选编》(北京)1989 年 37 辑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 乔文

《人民日报》1990 年 8 月 3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 年 8 月 20 日

不忘昨日之辱奋发开创未来:写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90 周年之际 李志荣

《中国青年报》1990 年 8 月 16 日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性质 孙秉敏

《山东工业大学学报》1990 年 5 卷 1 期

均势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徐国琦

《历史教学》1990 年 2 期

有关管理北京委员会的两个问题 陈勇勤

《北京档案史料》1990 年 3 期

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及建造营盘情况访采 文史办

《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河北)1990 年 4 辑

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缘起 牛大勇

《历史研究》1990 年 4 期

K3 1990 年 10 期

关于在奥匈帝国范围内匈牙利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若干问题 (匈)尤山度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德国与义和团运动 丁名楠

《近代史研究》1990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记八国联军在通州犯下的滔天罪行 陈乃文

《文史选刊》(北京通县)1990 年 8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宗方小太郎的活动 冯正宝

《日本历史》1990 年 505 期

厦门事件——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 胡晓丁

《世界历史》1991 年 4 期

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 王宏志

《历史教学》1991 年 9 月

八国联军没有始终如一的主谋 苏位智

《文史哲》199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试论八国联军对直晋边境的侵犯 苏位智

《河北大学学报》1992 年 1 期

K3 1991 年 5 期

义和团与美国对华政策 夏保成

《吉林大学学报》1992 年 3 期

八国联军侵害廊坊罪行录 黎世祖、任家绪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年

1898 年的"保全主义"与中国 (日)久保田善丈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福建和日本 (日)菅野正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日本的"脱亚入欧"与义和团运动 刘学照 周成平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关于日本对厦门的军事占领——论 1900 年 8 月厦门事件
(日)斋藤圣二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接收天津都统衙门的中外交涉 张利民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新探 王晓青
《历史教学》1993 年 2 期
K3 1993 年 6 期

论义和团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刘志义
《东岳论丛》1994 年 3 期
K3 1994 年 9 期

帝国主义对北京皇家园林的劫掠 徐德权、袁长平
《北京党史研究》1995 年 1 期
K3 1995 年 5 期

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新"十字军"东侵 张鸣、吴静研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 2 期

八国联军在北京抢掠损毁情形史料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方裕谨选编
《历史档案》1996 年 3 期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何以会出现战与非战的矛盾? 赵春晨
《广州师院学报》1996 年 4 期

八国联军统帅及各国司令官史实补正 苏位智
《河北大学学报》1997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论庚子大沽口之战 戚其章

《近代史研究》1997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若干特点 赵春晨

《历史教学》1997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传教士与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刘天路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赫德与《"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 叶凤美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二十世纪初美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 廉士兵

《北京档案史料》1998 年 1 期

中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 张小路

《社会科学战线》1998 年 2 期

K3 1998 年 8 期

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 (韩)金希教

《近代史研究》1998 年 4 期

(十二)东南互保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惜阴堂笔记之一) 惜阴

《人文》1931 年 2 卷 7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所谓"东南互保" 丁名楠

《进步日报史学周刊》1951 年 2 月 29 日 60 期

《大公报》1952 年 2 月 28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帝国主义导演下的"东南互保" 金家瑞

《历史教学》1951 年 2 卷 4 期

东南互保条约是什么时候由哪些军阀与哪些军阀签订的？它的内容怎样？ 金家瑞

《历史教学》1952 年 10 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互保"及"门户开放政策"的说明 钟玲维

《中学历史教学》1957 年 12 期

从"东南互保"看洋务派破坏人民反帝斗争的罪行 祁龙威

《历史教学》1963 年 12 期

义和团运动中英国与"东南互保" 王明中

《南京大学学报》1964 年 3—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福建互保协定》 宋显颖

《山东师院学报》1980 年 6 期

"东南互保"评述 廖一中

《历史教学》1980 年 7 期

"东南互保"再探讨 谢俊美

《档案与历史》1986 年 2 期

"东南互保"述论 刘天路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论盛宣怀所走的"V"字型路程(东南互保) 夏东元

《近代史研究》1988 年 4 期

张之洞东南互保新探 黎仁凯

《江汉论坛》1988 年 7 期

K3 1988 年 9 期

论"东南互保" 金家瑞

《福建论坛》1989 年 5 期

K3 1990 年 5 期

"东南互保"再析 安静波

《北方论丛》1990 年 6 期

K3 1991 年 1 期

"东南互保"与袁世凯 廖一中

《军事史》1994 年 3 月

读史札记三则:东南互保 唐振常

《上海大学学报》1996 年 6 期

论晚清"东南互保"中的两个问题 郭丽萍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 4 期

"东南互保"出现探因 李凤君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 1 期

"东南互保"原因浅析 易春秋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16)1 期

"东南互保"的社会成因 赵正桥

《历史教学问题》1999 年 5 期

(十三)中外舆论

厦门滋扰案件平议 附论厦门士民滋扰案(中外日报) (日)深山虎太郎

《亚东时报》1899 年 9 月 30 日(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中国事变之真相(译万朝报)

《中国旬报》第三期 1900 年 2 月 24 日(庚子年正月二十五日)

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 先忧子(本馆论说)

《清议报》1900 年 4 月 29 日第四十三册

开门政策

《中国旬报》第十一期 1900 年 5 月 13 日(庚子年四月十五日)

续论义和团事 伤心人(本馆论说)

《清议报》1900 年 6 月 7 日第四十七期

论中国人民无自立之性质(录汉报) 陈大佩

《知新报》1900 年 6 月 11 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第一百二十册

邦交·英议助华弹压

《中国旬报》第十六期 1900 年 7 月 11 日(庚子年六月十五日)

义和团事与英俄德之关系(译日本报) 时论译录

《清议报》1900 年 7 月 17 日第五十一册

论中国局面变迁(译日本报) 时论译录

《清议报》1900 年 7 月 17 日第五十一册

论义民与乱民之异 伤心人(本馆论说)

《清议报》1900 年 7 月 26 日第五十二册

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说

《清议报》1900 年 8 月 5 日第五十三册

荣禄谋结拳匪攻西人信据 本馆论说

《清议报》1900 年 8 月 15 日第五十四册

论说·中外关系说

《中国旬报》第二十期 1900 年 8 月 19 日(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

邦交·英对中国之政策

《中国旬报》第二十一期 1900 年 8 月 29 日(庚子年八月二十五日)

民教何以相安论(录学塾月报) 北京汇文书院 陈在新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8 月(庚子七月)[复刊]第六十八册

剿匪安华论(附南方督抚两电牍) (美)林乐知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8 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第一百三十九册(第十二年第七卷)

义和拳论 时务摘要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8 月(庚子七月)[复刊]第六十八册

论中国民气之可用 先忧子(本馆论说)

《清议报》1900 年 9 月 14 日第五十七册

论中国目下自全之策 (美)林乐知命意 任廷旭遣词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9 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册(第十二年第八卷)

拳匪乱华纂论 (美)林乐知译著 蔡尔康记述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9 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册(第十二年第八卷)

拳匪乱华续论 (美)林乐知译英报 蔡尔康 录华文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9 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册(第十二年第八卷)

拳匪祸速论 云津渔隐来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9 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册(第十二年第八卷)

邦交·法人论中、联军被创

《中国旬报》第二十五期 1900 年 10 月 8 日(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

议和难善后更难说

《汇报》第 219 号 1900 年 10 月 10 日

论议和 伤心人(本馆论述)

《清议报》1900 年 10 月 23 日第六十一册

评论结局(译日本报) 时论译录

《清议报》1900 年 10 月 23 日第六十一册

论说·强凌弱众暴寡亦有合于公理论 大西洋钓徒

《中国旬报》第二十七期 1900 年 10 月 27 日(庚子年九月初五日)

三译拳匪乱华檄论 (美)进士林乐知汇选 (清)进士蔡尔康汇述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0 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第一百四十一册(第十二年第九卷)

中国今祸起于不遵孔孟之道说 泰西友人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0 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第一百四十一册(第十二年第九卷)

惩前乱而悉后患说(并跋) 退隐居主人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0 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第一百四十一册(第十二年第九卷)

论列强对中国之政策及中国之前途 伤心人(本馆论说)

《清议报》1900 年 11 月 2 日第六十二册

论匪术与鬼戏相同 鉴胡逸民(论说)

《知新报》1900 年 11 月 6 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一百二十八册

昌教会案缘起 陈重远(论说)

《知新报》1900 年 11 月 6 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一百二十八册

中国轻重论

《中国旬报》第三十期 1900 年 11 月 20 日

论义和团事与俄国始终之意见(摘译外文时报) 时论译录

《清议报》1900 年 11 月 22 日第六十四册

论荣禄诡谋 松雪主人(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 年 12 月 2 日第六十五册

勤王乱匪辨 星客来稿(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 年 12 月 2 日第六十五册

主权篇

《中国旬报》第三十三期 1900 年 12 月 26 日

铁拳——1900 年 6 月 19 日"前进报"(VORWORTS)社论

廖道约等译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铁拳 廖道约 于深合译

《近代史资料》总第 26 号(1962 年 1 期)

"黄祸论"析 方式光

《人文杂志》1981 年 4 期

1900 年 9 月 18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保尔·辛格关于德帝国主义对华政 策的讲话 梁建华译

《教学与研究》1981 年 5 期

"我也是义和团" 马克·吐温

《新华日报》1982 年 1 月 30 日

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青柳猛

《义和团赞论》及其他 王晓秋

《北方论丛》1982 年 4 期

马克·吐温揭露传教士对义和团的镇压 顾长声

《学术月刊》1983 年 5 期

K3 1983 年 6 期

沙俄与黄祸论 黄鸿剑

《中学历史教学》1983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与国际公众舆论 李宏生

《山东师大学报》1992 年 7 期

K3 1992 年 5 期

（十四）辛丑条约（从谈判到条约的执行）

读和约全文感言（录新闻报）

《南洋七日报》第三册 1901 年 9 月 29 日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论赔款用金与各省将来之影响 汪荣秋

《鹭江报》第八十八册 1904 年 12 月 31 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辛丑条约之来源 炎炎

《东方杂志》1924 年 12 卷 17 期

庚子赔款的由来及其变迁

《新中华》1935 年 3 卷 8、9 期

辛丑条约第七款实行之经过 曹宗儒

《中和》1942 年 11 月 3 卷 12 期

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 本报资料室

《进步日报》1950 年 1 月 9 日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新华日报》1950 年 2 月

五十年的污点 本报资料室

《进步日报》1950 年 1 日 20 日

祝贺收回前美法荷北京兵营 君实

《进步日报》1950 年 1 月 26 日

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 郑天挺

《大公报》1951 年 9 月 7 日

《进步日报》1951 年 9 月 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探微集》1980 年

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 丁名楠

《大公报》1951 年 9 月 7 日

《进步日报》1951 年 9 月 7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庚子赔款与一九〇二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 荣孟源

《大公报》1951 年 10 月 12 日

《进步日报》1951 年 10 月 12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历史笔记》1982 年

庚子赔款——一幅帝国主义强盗争赃图 丁名楠

《进步日报》1951 年 11 月 25 日

《大公报》1952 年 8 月 14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辛丑条约的签字国公使表 本丛刊编者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4)1951 年 3 月

辛丑和约条文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4)1951 年 3 月

答丁名楠同志 金家瑞

《新建设》1951 年 4 月 6 期

请将有关辛丑条约内容中赔款的一些问题加以简介 金家瑞

《历史教学》1954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时，攻陷北京的是英、美、德、日、法、俄、奥、意八国，为什么以后签订辛丑条约时又加上了比、西、荷三国？它们根据什么理由也来中国分赃？ 吴文灿

《史学月刊》1957 年 1 期

1901 年冀中农民抗洋捐运动调查 李廷俭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帝国主义勒夺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派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了多少？ 禾元

《历史教学》1960年3期

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搁税剥削 刘克祥

《历史教学》1962年6期

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国主义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顾岳中

《文汇报》1964年6月4日

《辛丑条约》与沙俄帝国主义 李嘉谷

《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4期

辛丑条约的签订 王煜华

《北京日报》1981年9月7日

《辛丑条约》及其后果 王燕梅

《青海日报》1981年10月7日

关于《辛丑条约》的记述 王章

《中学历史》1982年4期

辛丑条约 吕良海

《学习与研究》1982年12期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退还"庚子赔款"？ 谢青

《中学历史》(江苏)1983年6期

略谈我国近代史上的赔款 潘君祥

《文史知识》1984年1期

庚款

《哈尔滨文史资料》(黑龙江)1985年6期

庚子赔款偿付情况简介 吴群

《历史教学》1986年11期

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 李守群

《历史档案》1987年3期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重庆出版社　1988年

退还庚子赔款与清末留美学生的派遣　黄新宪

《教育科学》1987年4期

"庚款兴学运动"论略　傅长禄

《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5期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决策过程　张乐天

《史林》1988年2期

从《荣禄存札》看《辛丑条约》的签订　杜春和

《历史档案》1988年4期

K3　1988年12期

清代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始末　田志和　苏义发

《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6期

"庚款留学"在中国的主要影响　徐鲁航

《天津大学报》1989年2期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清华学校　唐纪明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89年2期

庚子赔款的"退还"和使用　黄延复

《近代史资料》　第70号

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的选派　李守群

《历史档案》1989年3期

简述庚子教案中庚子赔款在善拉阿善旗蹚口情况　居正

《蹚口文史资料选辑》(内蒙古)1989年6辑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事件述评　季云飞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0年3期

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　张海鹏

《近代史研究》1990年6期

"庚款兴学"新探　张奇

《学术月刊》1991年1期

《辛丑条约》与晚清外使觐见 李岫

《北方论丛》1991 年 2 期

K3 1991 年 7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庚款兴学"与中国留美学生 梁碧莹

《贵州社会科学》1991 年 2 期

《辛丑条约》的签订 景和

《历史教学》1991 年 9 期

庚子赔款与晚清财政的崩溃 梁义群

《社会科学辑刊》1992 年 3 期

K3 1992 年 8 期

庚子赔款本息计算方法及应付数额 周志初

《历史档案》1992 年 4 期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数目的评析 李建国

《贵州师大学报》1993 年 1 期

花旗银行与"庚子赔款" 王先亭

《安徽师大学报》1995 年 3 期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史实 徐建平

《文汇报》1997 年 2 月 12 日

《新华文摘》1997 年 4 期

"庚款留美"学者在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徐鲁航

《汕头大学学报》1997 年 2 期

谈庚子赔款和清华学堂 李友唐

《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 3 期

庚子赔款的债务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 宓汝成

《近代史研究》1997 年 5 期

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 张静

《天津师大学报》1997 年 6 期

K3　1998 年 3 期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谈判　薛鹏志

《近代史研究》1998 年 1 期

说说"庚子赔款"　苏黎明

《泉州师专学报》1998 年 2 期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　徐建平

《华东师大学报》1998 年 2 期

1998 年 8 期

试论美国庚子赔款的"退还"　王海军

《山东师大学报》1998 年 5 期

《辛丑条约》丧权辱国:世纪回眸 1901 年

《生活时报》(北京)1999 年 1 月 5 日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来龙去脉　王卯庆 陈国泳

《中国档案报》1999 年 4 月 22 日

"庚子赔款"与南京办学　曹军

《南京史志》1999 年 3 期

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　宓汝成

《近代史研究》1999 年 6 期

(十五)书评、史料、文物

1、书评

书庚子国变记后　酬鸣

《庸言》1913 年 1 卷 4 期

读"义和团运动史"后的掇拾　葆蔚

《中国出版月刊》1932 年 11 月 1 卷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 健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3 年 53 期
华学澜"辛丑日记" 李鼎芳
《书人月刊》1937 年 1 卷 3 期
吴永与"庚子西狩丛谈" 郭则登
《天地》1944 年 3 月 6 期
《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九 秦飞
《大公报》1951 年 3 月 29 日
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的一部史料集 绍溪
《大公报》1951 年 3 月 29 日
介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九——义和团 蓝闻青
《光明日报》1951 年 7 月 21 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校后记 翦伯赞
《光明日报》1951 年 8 月 15 日
关于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书中的若干问题 胡庆华
《大公报》1951 年 8 月 24 日
翦伯赞编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 丁则良
《大公报》1951 年 8 月 24 日
翦伯赞编《义和团》一书中的一些问题 胡锡年
《大公报》1951 年 9 月 14 日
评翦编《义和团》——附金家瑞、林树惠答复 丁名楠
《新建设》1951 年 9 月 4 卷 6 期
答丁名楠同志 金家瑞、林树惠
《新建设》1951 年 9 月 4 卷 6 期
黄宁著的《义和团》 白容
《大公报》1952 年 3 月 31 日
华学澜的《庚子日记》 丁则良
《历史教学》1952 年 12 期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书的评价 鲁兵

《光明日报》1954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义和团》的一些意见 雁迅

《光明日报》1955 年 1 月 20 日

批判陈恭禄先生《中国近代史》中有关义和团性质的错误论点 刘瑜

《史学战线》1958 年 3 期

介绍《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一八九五至一九 OO 年》(福森科著，苏联科学出版社) 杨诗浩

《历史研究》1958 年 11 期

《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李时岳著)

《光明日报》1959 年 3 月 14 日

对《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所载之稿的订正(之三：《庚子－辛丑 随銮纪实》一文) 陆丹林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1963 年 12 月 48 辑

《义和团在四川战斗史料汇编》综叙 伍士谦

《四川大学学报》1979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西文参考书目 徐绪典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论著(英、日文)简介 (美)周锡瑞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 期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评价 余应彬等

《南开史学》1980 年 2 期

介绍几种新出版的义和团资料 史兵

《东岳论丛》1980 年 4 期

义和团文献探微 陈振江

《南开学报》1980 年 5 期

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篝笔偶存》述略 朱金甫、庄建

平

《文史哲》1980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辑》评介 仰淹

《文史哲》1980 年 6 期

三种新编义和团史料介绍 庄建平

《历史教学》1980 年 11 期

《义和团运动史》出版 邓卫中

《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1 日

评卡柳日娜亚著《义和团起义(1898－1901)》

(苏)B·A·克里夫采夫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 年 2 期

K3 1981 年 3 期

把历史放在历史范围内——评价《义和团运动史》 邓卫中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2 期

《山东义和团案卷》 庄建平

《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期

刍议《山东义和团案卷》史料价值 周庄

《历史教学》1981 年 12 期

关于《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读义和团运动史札记 祁龙威

《杨州师院学报》1982 年 1 期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一书出版 肇宗

《历史教学》1982 年 10 期

对《杨儒庚辛存稿》的三点质疑 王毅

《北方论丛》1983 年 1 期

《四川义和团运动》后记 张力

《四川史研究通讯》1983 年 1 期

《筹笔偶存》出版　　海陵

《历史档案》1983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日本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讲座第二卷简介

阎家仁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 年 8 期

评价《义和团运动史》　　邓卫中

《历史教学》1983 年 12 期

《清德宗实录》和《拳时上谕》与《义和团档案史料》——读史札记

林树惠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1 期

《历史档案》1984 年 1 期

K3　　1984 年 3 期

评《开智录》　　宁树藩等

《复旦学报》1984 年 3 期

读《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李喜所

《人民日报》1986 年 7 月 14 日

念奴娇·读《义和团运动》有感　　关兵

《阳原文史资料》(河北)第 2 辑 1986 年

陈振江、程啸同志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简介　　邢丽芬、李敏

《历史教学》1986 年 8 期

评《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孔祥吉

《人民日报》1987 年 9 月 18 日

略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朱金甫

《人民日报》1988 年 8 月 1 日

对《平原拳匪纪事》一文的按语　　朱志泉

《平原文史资料》(山东)1988 年第 3 辑

教案史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教案史》　　冯祖贻

《贵州社会科学》1988 年 10 期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辨误 欧阳跃峰

《历史档案》1990 年 1 期

略评《八国联军侵华史》 陈匡时

《东岳论丛》1991 年 1 期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编纂思想概述 朱金甫、程歗

《历史档案》1991 年 2 期

对帝国主义侵华本质的分析:评《八国联军侵华史》 茅家琦

《近代史研究》1991 年 4 期

开拓之佳构,创新之力作:评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任恒俊

《文史哲》1992 年 3 期

张士杰对义和团研究的贡献 王觉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雷颐

《读书》1993 年 5 期

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考据传统 ——读《义和团史事考》 程歗、许蕾

《清史研究》1995 年 2 期

义和团研究的铺路之作:评价《义和团史事考》 高刘、侯虎虎

《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7 年 1 期

2、史料

总理衙门奏定山东教案要犯罪名折

《萃报》1898 年 6 月 13 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四册

川匪被获 外国近事及外议(西报译编)

《清议报》1899 年 3 月 22 日　　第九册

匪扰胶州、胶州近状　　猛省录

《清议报》1899 年 9 月 25 日　　第二十八册

曹州教案条约　　猛省录

《清议报》1899 年 9 月 25 日　　第二十八册

川中教案　　猛省录

《清议报》1899 年 10 月 15 日　　第三十册

河南教案

《中国旬报》第一期 1900 年 1 月 25 日(乙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山东义和拳(或作义和团)匪论　　山东庞庄公理会来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 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第一百三十二册(第十一年第十二卷)

山东闹教　　教会纪事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1 月(已亥十一、十二月)[复刊]第六十一册

循吏秉公民教相安　　持平子(教会纪事)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1 月(已亥十一、十二月)[复刊]第六十一册

山东闹教　　教会纪事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2 月 1 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复刊]第六十二册

义和团闹案纪实(录国闻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2 月 14 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第一百十二册

匪胆包身(录华字报)　　广东福建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2 月 14 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第一百十二册

教案轇轕(译字林西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年2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第一百十二册

刀匪猖獗(译文汇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三册

议结四明公所案(附图)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三册

纪太平县匪(录国闻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三册

招诱会匪(录扈报) 贼党近事

《知新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三册

法教堂被击《译长崎新报》 教会纪事

《中西教会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复刊]第六十三册

匪徒啸聚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三册

匪徒猖獗(译字林西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三册

义民遍地(录华字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3月15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第一百十四册

蕲州疑案

《中国旬报》第六期 1900 年 3 月 25 日(庚子年二月二十五日)

大刀会

《中国旬报》第六期 1900 年 3 月 25 日(庚子年二月二十五日)

义和拳

《中国旬报》第六期 1900 年 3 月 25 日(庚子年二月二十五日)

五路缉匪　广东福建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3 月 31 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五册

或人论东省团匪(录中外日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3 月 31 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五册

洋人被殴详情(录中外日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3 月 31 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五册

山东团匪　时务摘要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4 月 1 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复刊]第六十四册

纵匪成患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4 月 20 日　第四十二册

义和团近事汇纪(录中外日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4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七册

记俄人在营口近事(录中外日报)　中外交涉要闻

《知新报》1900 年 4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七册

要约剿匪(录同文扈报)　中外交涉要闻

《知新报》1900 年 4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第一百十七册

颐和园驻兵　　贼党近事

《知新报》1900年4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第一百十七册

视听录·义和拳事汇志、三省兴乱

《中国旬报》第十一期1900年5月13日(庚子年四月十五日)

视听录·拳党丛谈、大刀会就抚、贵戚入会、灯教蠢动、私会何多、闹教述闻

《中国旬报》第十一期1900年5月23日(庚子年四月二十五日)

拳匪汇闻四则(译字林西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5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第一百十九册

视听录·美舰到沽、拳党汇报

《中国旬报》第十三期1900年6月1日(庚子年五月初五日)

义和团滋事汇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6月17日 第四十八册

官文·请查教堂

《中国旬报》第十四期1900年6月21日(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

视听录·拳党始末记上

《中国旬报》第十四期1900年6月21日(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

电音·拳事汇报

《中国旬报》第十四期1900年6月21日(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

义和团滋事续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6月27日　　第四十九册

拳匪作乱电函(附论)　　(美)林乐知译存直笔　蔡尔康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6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第一百三十七册(第十二年第五卷)

综纪拳匪破义和变故(庚子夏五旬有二日) (美)林荣章述略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6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第一百三十七册(第十二年第五卷)

视听录·录拳事始末记二

《中国旬报》第十五期 1900年7月1日(庚子年六月初五日)

义和团滋事三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7月7日 第五十册

纪乱·逋臣起事、京函照录、津地再战、递信人言、乱势利害、津事纪实、西兵遇仗情形、德使履历、拳事缘起、台湾乱萌、津古情形

《中国旬报》第十六期 1900年7月11日(庚子年六月十五日)

存疑·拳事轶闻

《中国旬报》第十六期 1900年7月11日(庚子年六月十五日)

会请剿匪述函(录华字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7月11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二册

拳匪汇闻(录中外日报)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年7月11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二册

义和团滋事四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7月17日 第五十一册

历溯荣禄阴谋(来稿) 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年7月17日 第五十一册

邦交·华使论教、各国兵舰表、日本兵舰表

《中国旬报》第十七期 1900年7月21日(庚子年六月二十五日)

纪乱·京友缕述、纪西人言避难事、津沽要闻、日舰军报、西报之言、

高丽思乱、西摩军报、津事又闻、津沽战事

《中国旬报》第十七期 1900 年 7 月 21 日(庚子年六月二十五日)

义和团滋事五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7 月 26 日 第五十二册

电请剿匪(录同文扈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7 月 26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三册

闹成重案(录博闻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7 月 26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三册

拳匪汇志(录上海报)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 年 7 月 26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三册

盗劫教士(录中外日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7 月 26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三册

纪乱·华俄启衅洋志、乱域纪程、回民附和、团党毁永定河堤、北省好音、沈阳失守

《中国旬报》第十八期 1900 年 7 月 20 日(庚子年七月初五日)

匪势甚炽　　时务摘要

《中西教会报》1900 年 7 月(庚子六月)[复刊]第六十七册

拳匪乱华电音　　(美)林乐知选译　蔡尔康记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7 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

第一百三十八册(第十二年第六卷)

京津拳匪乱事之二　　铸铁庵录存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7 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

第一百三十八册(第十二年第六卷)

义和团滋事六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8月5日 第五十三册

存疑·西人助我可疑

《中国旬报》第十九期 1900年8月9日(庚子年七月十五日)

纪乱·津沽战事函述、督办被拘洋述、探军委员缕述、拳党护照、津城纪事、西人论天津战事、辽阳交战、家书照录、津事详谈

《中国旬报》第十九期 1900年8月9日(庚子年七月十五日)

各省闹教汇录(录中外新报、苏报、译字林西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荣禄主谋结拳匪攻西人信据 论说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荣禄隐衷(录中外日报) 贼党新闻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津城陷后情形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浙省多乱(录中外日报) 名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拳匪汇纪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营口中俄开衅(录华字报、中外日报)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册

义和团滋事七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8月15日 第五十四册

纪乱·两教相仇、浙江乱耗、衢州匪平、盛京近事、议和触罪、清远闹教、死伤不顾、皖南警耗

《中国旬报》第二十期1900年8月19日(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

存疑·传闻西狩

《中国旬报》第二十期1900年8月19日(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

义和团滋事八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8月25日 第五十五册

统领武毅军直隶提督聶士成死事纪略(录中外日报) 论说

《知新报》1900年8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五册

称颂拳匪(录游戏报) 贼党新闻

《知新报》1900年8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五册

拳匪汇报(录同文扈报、中外日报、新闻报)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年8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五册

纪乱·大通警耗、机匠闹事、记营口失陷详情、记俄兵陷海城事、江山失守缘由、邵武匪警、从军录

《中国旬报》第二十一期1900年8月29日(庚子年八月初五日)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三(附各地防卫事宜) 铸铁盦录存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8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第一百三十九册(第十二年第七卷)

拳乱录要 时务摘要

《中西教会报》1900年8月(庚子七月)[复刊]第六十八册

义和团终局后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9月4日 第五十六册

北京战斗详报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9月4日 第五十六册

纪乱·从军录(续完)、联军入京情形、汉口近事、拳党尚炽、提督被拿、芜湖警报、京津近信、梧州消息、胶州消息、日报军情、英员军报、皖事情形

《中国旬报》第二十二期 1900年9月8日(庚子年八月十五日)

拳事汇志(录同文消闲报)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年9月8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第一百二十六册

联军入京详情(录廛报、华字报、中外日报、同文廛报) 朝事汇志

《知新报》1900年9月8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第一百二十六册

纪乱·监犯串盗劫狱详志、顺德教民被难详志、俄兵中据、衢州乱事记、厦门日本教堂起火详志(与第二十二期邦交栏内第二篇文同),日人在京日记(未完),记海城近事、拒退联军、汉事续志

《中国旬报》第二十三期 1900年9月18日(庚子年八月二十五日)

邦交·厦门日本教堂起火详志

《中国旬报》第二十二期 1900年9月8日

《中国旬报·乱纪乱》第二十三期 1900年9月18日

议和交涉汇记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9月24日 第五十八册

兵匪余焰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9月24日　　第五十八册

详述北京蹂躏情形(录中外日报、同文扈报、中外新报)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0年9月24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七册

拳匪汇志(中外日报、同文扈报、华字报)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0年9月24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七册

拳匪汇志(录中外日报、同文扈报、华字报)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0年9月24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七册

衢州乱事记(录香港中国日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9月24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七册

国是·示安民教

《中国旬报》第二十四期1900年9月28日(庚子年闰八月初五日)

纪乱·电报补录、新会闹教、俄中将示谕华人、德人述联军入京详情、击败会党群志、北塘西兵进攻炮台事、华兵可用、日人在京日记(续完)

《中国旬报》第二十四期1900年9月28日(庚子年闰八日初五日)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四(附各省防乱事略)　　奔向官守人录存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9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

第一百四十册(第十二年第八卷)

拳匪乱华要电(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五日)

(美)林荣章选译　蔡缕仙摘录　光绪政典 万国公报馆择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9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

第一百四十册(第十二年第八卷)

议惩匪首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4日 第五十九册

详述北京战后景况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4日 第五十九册

天津一月记

《中国旬报》第二十五期 1900年10月8日纪乱栏

第二十六期 1900年10月18日纪乱栏

第二十七期 1900年10月27日北省大事记栏

第二十八期 1900年11月6日北省大事记栏

存疑·照译丁教习聪良条陈

《中国旬报》第二十五期 1900年10月8日(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

纪乱·析津要事汇述、日人北京日记(续)、手书照录

《中国旬报》第二十五期 1900年10月8日(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

国是·袁昶请剿拳党第一疏

《中国旬报》第二十五期 1900年10月8日(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

山海关被攻述闻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14日 第六十册

天津一月记(未完) 析津寓公(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年10月14日 第六十册

记联军进据唐山事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14日 第六十册

华兵苦言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14日 第六十册

袁爽秋京卿清剿拳匪第一疏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14日 第六十册

纪乱·广东新安乱事记

《中国旬报》第二十六期 1900年10月18日(庚子年闰八月二十五日)

山海关近状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23日 第六十一册

天津一月记(续) 析津寓公(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年10月23日 第六十一册

俄兵屯驻满洲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23日 第六十一册

俄兵在牛庄之举动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23日 第六十一册

俄德北攻纪要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0月23日 第六十一册

北省大事记·大事拾零记、保阳电警、启秀被拘、李相告示、端邸之言、京员被祸汇志、留京人员名单、军事从谈、随户人员名单、召赴行在名单

《中国旬报》第二十七期 1900年10月27日(庚子年九月初五日)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五(附各省防乱及致乱记)

恸哭东流西上生录存稿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10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

第一百四十一册(第十二年第九卷)

拳匪乱华要电(八月十二日至三十日) (美)林荣章选译 蔡缕仙选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10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

第一百四十一册(第十二年第九卷)

湖广总督张湖北巡抚于摘叙自立会匪谋逆确据并解散胁从告示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有跋)(张之洞、于霖荫)

《(上海)万国公报》1900年10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

第一百四十一册(第十二年第九卷)

天津一月记(续) 析津寓公(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年11月2日 第六十二册

联军劫掠纪闻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1月2日 第六十二册

北省大事记·京中旧事汇述、警信汇记、疑团难破

《中国旬报》第二十八期 1900年11月6日(庚子年九月十五日)

北省大事记·东三省失守始末记

《中国旬报》第二十八期 1900年11月6日(庚子年九月十五日)

第三十期 1900年11月26日(庚子年十月初五日)

北省大事记·大事拾零记、吉林退让原委(本文误置在南省大事记中)

《中国旬报》第二十九期 1900年11月16日(庚子年九月二十五日)

义民叩阍(录华字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无意剿匪(录华字报) 名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会办教案(录华字报) 广东福建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纪晋抚事(录中国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南兵剿拳(录中外新报)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误勇为匪 广东福建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袁抚剿匪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匪徒星散(录华字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教案纷起(录中外新报、中国新报) 广东福建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潍县谣言汇志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八册

天津一月记(续第六十二册) 析津寓公(来稿杂文)
《清议报》1900年11月22日 第六十四册

拟定罪名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年11月22日 第六十四册

拳劫贡品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1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九册

梅军门剿匪详述(录华字日报)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11 月 22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第一百二十九册

董贼谋反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11 月 22 日 第六十四册

祸首惩罚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11 月 22 日 第六十四册

北省大事记·会议条款续闻、德兵破村详述、北民近况述闻、章程照录、统帅欲退、争管铁路、记王部郎死事、警信汇录
《中国旬报》第三十期 1900 年 11 月 26 日
(庚子年十月初五日)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六 海上铸铁生哀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1 月(光绪二十六年十月)
第一百四十二册(第十二年第十卷)

拳匪乱华后电音(闰八月初一日至二十七日) (美)林乐章译、蔡芝绂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1 月(光绪二十六年十月)
第一百四十二册(第十二年第十卷)

烧毁殆尽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12 月 2 日 第六十五册

北省大事记·手书照录、述联军占保定事、记铁岭失守事、直藩被监缘由、记梅东益剿拳事、各国清治罪魁、回京难望、警信汇记、条款 又闻
《中国旬报》第三十一期 1900 年 12 月 6 日(庚子年十月十五日

示拿拳匪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12 月 6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分兵驰剿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西匪详述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团首畏团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奉天拳匪祸详述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闹教余闻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闹教赔款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匪首正法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教案就结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擒获团魁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册

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 光绪党人来稿

《清议报》1900年12月12日 第六十六册

北省大事记·追记两宫临幸怀来事、津沽近事、道员被掳、京师要事、商议华款、联军驻华计数、珲春加税、条款已交、法人保库、法扩津界、俄占铁路、续参祸首、京员贸易、赔款拟减、详述使相议和情形、行军铁路、约期会议、北事汇记、行在纪闻、北京时政、工程将竣、记廷雍被祸事、误毙华官、详述直藩遇害事、银库被封、保护入京、催办和议、警信汇志

《中国旬报》第三十二期 1900 年 12 月 16 日(庚子年十月二十五日)

议和大臣与华统帅问答记(未完)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12 月 22 日 第六十七册

议和条件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12 月 22 日 第六十七册

议和消息汇闻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0 年 12 月 22 日 第六十七册

各国请治罪魁 中外涉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12 月 22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第一百三十一册

直属匪迹汇志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12 月 22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第一百三十一册

愚民毁电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0 年 12 月 22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北省大事记·山东缉捕纪要、补述西安迎銮记、陵寝震惊、京师惨祸、日修铁轨、津电两纪、义和大臣与华统帅问答(未完)

《中国旬报》第三十三期 1900 年 12 月 26 日(庚子年十一月初五日)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七(并志东三省攘祸及各省戡乱事略)

海天孤愤生汇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2 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
第一百四十三册(第十二年第十一卷)

拳匪乱华后电报(九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日)

(美)林荣章译意 蔡缕仙造语
《(上海)万国公报》1900 年 12 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
第一百四十三册(第十二年第十一卷)

议和大臣与华帅问答记(续完)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1 月 1 日 第六十八册

南省大事记·宁海教案缘由补志

《中国旬报》第三十四期 1901 年 1 月 5 日(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

北省大事记·议和大臣与华统帅问答记(续完),仍索规费、联军踪迹、联军纪事、采访忠烈述函、京畿要事、德人残暴、兵费计算、京函照录、警信汇志

《中国旬报》第三十四期 1901 年 1 月 5 日(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

分路剿匪 京师新闻
《知新报》1901 年 1 月 5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二册

黑龙江遇难记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1 年 1 月 5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二册

剿山东拳 各省新闻
《知新报》1901 年 1 月 5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百三十二册

北省大事记·围攻使馆始末记、补录和议十二款缘起译稿、安东失守确耗、京员待救计数、俄兵残暴确证、神京要事、使臣会议后闻、自惩罪魁、京事两志、警信汇志

《中国旬报》第三十五期 1901 年 1 月 15 日(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查办闹教 中外交涉新闻

《知新报》1901 年 1 月 20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第一百三十三册

北省大事记·联军纪事、和议十二款译文原稿照录、涿州被据、廷臣不协、和事两纪

《中国旬报》第三十六期 1901 年 1 月 24 日(庚子年十二月初五日)

清国官文·拿获假义和团奏 准良

《中国旬报》第三十六期 1901 年 1 月 24 日(庚子年十二月初五日)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八(附各省小乱记) 海天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1 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第一百四十四册(第十二年第十二卷)

拳匪乱华后电报(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

(美)林荣章选译 蔡缕仙裒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1 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第一百四十四册(第十二年第十二卷)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九(附各省戡乱记)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2 月(光绪二十七年正月)第一百四十五册(第十三年第一卷)

拳匪乱华后电报(庚子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美)林乐知选译 蔡尔康选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2 月(光绪二十七年正月)第一百四十五册(第十三年第一卷)

委查纵匪员名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3 月 1 日 第七十一册

衡州教案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3 月 11 日 第七十二册

匪难漏网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3 月 20 日 第七十三册

拳匪又起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3 月 30 日 第七十四册

衡门教案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3 月 30 日 第七十四册

华乱善后要电(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本年正月十九日)

(美)林荣章译意 蔡缕仙语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3 月(光绪二十七年二月)

第一百四十六册(第十三年第二卷)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十(附各省戡乱记) 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3 月(光绪二十七年二月)

第一百四十六册(第十三年第二卷)

牛庄近状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4 月 19 日 第七十六册

西藏教案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4 月 19 日 第七十六册

乱华善后要电(正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日) 上海蔡芝绂选译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4 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

第一百四十七册(第十三年第三卷)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十一(附各省戡乱纪) 古芦子城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4 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

第一百四十七册(第十三年第三卷)

教习拳法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5 月 9 日 第七十八册

川匪复动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5 月 28 日 第八十册

董贼消息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5 月 28 日 第八十册

湘匪又起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5 月 28 日 第八十册

大乱将平要电(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八日) 古芦子城缕馨仙史择译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5 月(光绪二十七年四月)第一百四十八册(第十三年第四卷)

和议初枕 叶文(时务摘要)

《中西教会报》1901 年 5 月 [复刊]第六十九册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十二(附各行中书省戡乱记) 黄歇浦滨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5 月(光绪二十七年四月)第一百四十八册(第十三年第四卷)

联军统帅策遣将士四出剿匪记 叶文(时务摘要)

《中西教会报》1901 年 5 月 [复刊]第六十九册

大沽之守备撤去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7 日 第八十一册

胶州增兵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7 日 第八十一册

保定残匪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7 日 第八十一册

山西杀害教士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26 日 第八十三册

教案赔款述略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26 日 第八十三册

匪惊叠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26 日　第八十四册

董贼近况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6 月 26 日 第八十四册

办理山西耶稣教案章程　　(美)李提摩太拟　林朝折述旨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6 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第一百四十九册(第十三年第五卷)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十三(附各省戡乱记)　　上海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6 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第一百四十九册(第十三年第五卷)

京津近况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7 月 16 日 第八十五册

预防董贼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7 月 16 日 第八十五册

匪惊再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7 月 16 日 第八十五册

嗾使匪类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7 月 16 日 第八十五册

端董消息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7 月 16 日 第八十五册

匪惊三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7 月 26 日 第八十六册

京津拳匪乱事纪要十四(附行在纪闻及各省召乱戡乱事)　　上海孤愤生雪涕集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7 月(光绪二十七年六月)

第一百五十册(第十三年第六卷)

决定议和条件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5 日 第八十七册

京津近鸿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5 日 第八十七册

匪惊四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5 日 第八十七册

平毁炮台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14 日 第八十八册

饬解元凶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14 日 第八十八册

匪惊余志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14 日 第八十八册

会议教案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24 日 第八十九册

教案议复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8 月 24 日 第八十九册

和议余闻 中国近事

《清议报》1901 年 9 月 13 日 第九十一册

复美英教士韩维廉、聂士华书 山东巡抚袁世凯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9 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第一百五十二册(第十三年第八卷)

索惩确犯重罪各华官清单(续查明确犯重罪应行严惩各员清单)

各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9 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第一百五十二册(第十三年第八卷)

清理山西教案章程 **兵部尚书衔山西巡抚岑春煊**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9 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第一百五十二册(第十三年第八卷)

志联军交还禁城事

《南洋七日报》第四册,1901 年 10 月 6 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

五洲教案纪略 （英）李提摩太著 蔡尔康节录

《（上海）万国公报》1901 年 10 月（光绪二十七年九月）第一百五十三册（第十三年第九卷）

摊还赔款年限表

《选报》第一期 1901 年 11 月 11 日（辛丑年十月初一日）

分年偿还赔款年利表

《送报》第八期 1902 年 2 月 28 日（壬寅正月二十日）

拳变余闻 罗惇曧

《庸言》1913 年 1 卷 3、4 期

光绪帝辛丑电报

《文献丛编》1930 年 8、9 期

戊庚辛纪述 惜阴

《人文》1931 年 一卷五期

庚辛史籍要录 瞿兑之

《国闻周报》1934 年 11 卷 3 期

庚辛史籍补 管雪斋

《国闻周报》1934 年 11 卷 8 期

庚子清帝避难略记 王文韶（清）

《北平世界日报》1935 年 12 月 24 日

庚子从军日记 孙星枢

《天津益世报史学》1935 年 15、16 期

庚辛史料 许同莘辑

《河北月刊》1935－1936 年 3 卷 1－8，10－12 期，4 卷 2、4、6、11 期

拳匪史料辑目 赵兴国

《人文》1936 年 7 卷 7、8 期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6 年 12 卷 1 期

辛丑回銮记 秋宗章

《越风》1936 年 5 期

光绪庚子辛丑电报

《文献丛编》1937 年 1－7 月 1－7 期

《文献从编》1937 年 1－7 月 34－36 期

庚子轶事 董作宾

《逸经》1937 年 22 期

辛丑回銮纪事

《河南政治月刊》1939 年 6 卷 2 期

所谓"景善日记" 程明洲

《燕京学报》1940 年 27 期

史料拾零——总署王大臣致西国大臣书 周琦

《进步日报》1951 年 6 月 1 日

义和团时期有关"东南互保"的英美方面资料 林树惠译

《历史教学》1951 年 2 卷 3 期

关于文霸之 贾逸军

《历史教学》1953 年 1 期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王崇武

《近代史资料》1954 年 2 期

义和团时期一个印度士兵日记 丁则良

《光明日报》1954 年 2 月 20 日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 年

正定匿名帖 史文录

《历史研究》1955 年 2 期

清末北京的五城公牍汇存 金毓黻

《光明日报》1956 年 6 月 21 日

悟彻源头 左绍佐

《近代史资料》1956 年 4 期

《瓦德西拳乱笔记》　赵捷民
《历史研究》1956 年 10 期
《高给谏日记》中的义和团史料　杨济安
《光明日报》1957 年 12 月 19 日
义和团杂记　王火选辑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1 期
1898 年濮州反抗教堂事件调查(有关义和团资料)　王先进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有关义和团资料　王先进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李秉衡誓师文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庚子随行简记　岳超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5 期
德国人在中国　朱士嘉译注
《历史教学》1957 年 8 期
一九〇二年贺金声起义资料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 近代史组整理
《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 3 期
唐才常的家书和课卷　唐才质搜集　邓潭州整理
《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 3 期
冯廷韬家书(提供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前后的皖北政局资料)
《安徽史学通讯》1958 年 5 期
义和团老人忆当年　王健材等
《光明日报》1960 年 9 月 17 日
义和团运动(资料)
《光明日报》1960 年 9 月 29 日
义和团运动后河北、辽宁的一些"教案"资料　赵地

《北国春秋》1960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图片) 天津历史博物馆

《北国春秋》1960 年 3 期

义和团团员访问记 张安民

《北京师大学报》1960 年 3 期

西什库教堂的两本旧帐 王守中

《北京日报》1963 年 7 月 16 日

辛丑见闻录 陈善颐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逃难记 王思贤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庚子见闻录 刘容镜口述 吴瑞英笔录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庚子回忆录 马文容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月

帝国主义传教士对于义和团运动的通讯 赵永生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静海县教会中的几个恶棍 王洗耳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樊国梁的一张布告 马光普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樊国梁等函牍 林锋源译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土匪头子姚三黑 张济众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记忆中的义和团 曹维舟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闹义和团时的献县总堂 宋冠军口述 王洗耳笔录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花狸豹抢亲 张济众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庚子—辛丑随銮纪实 孟超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1963 年 10 月 34 辑

关于庚子国耻纪念碑的变迁(《庚子—辛丑随銮纪实》订补) 沈茂林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1963 年 12 月 48 辑

董福祥史料 王伯祥

《宁夏文史资料》第 3 辑(1964 年)

董福祥轶事 雷应龙

《宁夏文史资料》第 3 辑(1964 年)

义和团资料几则 乔志强

《山西大学学报》1978 年 2 期

义和团文献探微 陈振江

《南开学报》1980 年 4 期

关于怡良擒杀英夷赏格的告示 黄凡

《群众论丛》1980 年 4 期

盛宣怀档案中关于"东南互保"的资料

《历史研究》1981 年 1 期

狂风暴发 (美)奚尔恩 王神荫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 年 2 期

廊坊地区发现义和团乐曲 杨树华 韩居乐

《河北日报》1983 年 3 月 23 日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存有关义和团问题的外交史料目录 任明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1 期

关于一张义和团照片的考证 闻性真

《史苑》1982 年第 2 辑

德国在内地(1898－1900) (美)施雷克 张廷钰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2 期教会资料选译(韩理神父传、大刀会)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3 期

李盛铎电稿

《近代史资料》1982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资料略述 庄建平

《历史教学》1982 年 11 期

汇报义和团运动的资料编辑工作和一点意见 荣孟源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 裴淑兰整理

《近代史资料》 第 47 号

山东传教士的逃脱 (美)韦丰年 王神荫译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有关《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史料的考证 李节传

《天津师大学报》1983 年 3 期

辽东义军檄文 佚名

《近代史资料》1983 年 4 期

《石涛山人见闻志》校补(义和团史料) 陈贵宗

《史学集刊》1983 年 4 期

荣禄集(义和团史料的补充) 荣禄

《近代史资料》1983 年 4 期

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 丁名楠

《近代史研究》1983 年 4 期

K3 1983 年 10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帝俄军队在塘沽的暴行

《天津文史资料》1983 年 24 辑

义和团运动史料片断 余谷似等

《文史资料选编》(北京)第 18 辑 1983 年

唐才常的一封家书 曹砚农

《文物天地》1984 年 1 期

历年日记汇钞(选录) 刘绍宽

《平阳文史资料选辑》1984 年 1 辑

景廷宾起义史料选辑 张侠 王非

《河北师院学报》1984 年 3 期

德铁柱老人访问记 臧汝新

《黑龙江文史资料》1984 年 12 辑

三边教案纪略(节录) 陕西省参事室

《陕西文史资料》1984 年第 16 辑

关于海兰泡大屠杀的几个史实问题 刘邦厚

《爱珲历史论文集》1984 年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5 年 1 期

日本外交文书有关义和团运动史料选译 仇宝山等

《南开史学》1985 年 2 期

马玉昆等镇压花子沟人民拒洋抗官斗争史料

《历史档案》1985 年 3 期

"义和团"在义州活动轶闻 徐英华

《义县文史资料》(辽宁)第 1 辑 1985 年

巨野教案调查记

政协山东省巨野县委员会 1985 年

慈禧西逃时漕粮京饷传输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档案》1986 年 3 期

寒金花史料初探 叶祖厚

《北京史苑》1986 年 3 期

庚子事件后那桐、盛宣怀给吕海寰的信

《历史教学》1986 年 4 期

斋堂川的义和团运动 包世轩

《文史资料选刊》(北京门头沟区)第 3 辑 1986 年

《文史资料选编》(北京)1988 年第 33 辑

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 孔祥吉

《历史档案》1988 年 1 期

K3 1988 年 3 期

庚子搏尔多交涉始末 王永曦

《讷河文史资料》(黑龙江)1988 年 1 辑

北京使馆区被围日志 (日)大山梓编 罗天译

《北京档案史料》1988 年 2 期

北京使馆区被围日志(续) (日)大山梓编 罗天译

《北京档案史料》1988 年 3 期

房山义和团拾零 赵润京

《房山文史选辑》(北京)第 1 辑 1988 年

与外国传士抗争的二、三事 徐灵石

《湖南文史资料》1988 年第 30 辑

酷吏毓贤逸事 杨传彬

《菏泽文史资料》(山东)第 2 辑(1990 年)

俄文文献:有关江东六十四屯的记述摘译 薛衔天

《黑河学刊》1990 年

李秉衡轶事 吴守芳等

《庄河文史资料》(辽宁)第 6 辑(1990 年)

义和团在各地的活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1900 年 第 1—176 页

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侵华活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1900 年 第 177—232 页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态度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1900 年 第 233—263 页

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过录本说明 张守常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海门教案始末 李性忠整理

《近代史资料》1993 年总 82 号

"克林德牌坊"铭文考 宁刚

《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 3 期

"庚子之乱"档案内容述要 叶秀云

《北京档案史料》1997 年 4 期

许景澄的两种遗集 张守常

《北京档案史料》1997 年 6 期

王锡桐起义简表:为《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试作订正和增补

王艾村

《浙江方志》1998 年 1 期

3、文物

永乐大典和义和团团旗 荣孟源

《大公报》1955 年 12 月 15 日

永乐大典和义和团团旗 南木

《新观察》1956 年 2 期

义和团团规一帧

《近代史资料》1957 年 1 期

上海市文物整理仓库发现义和团运动的旗帜 孙桂思

《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9 期

英雄的形象 杜永镇

《文物》1960 年 10 期

有关义和团反帝斗争文物二、三事 史树青

《文物》1960 年 10 期

子孙后世珍视祖先留下的精神财富:大家齐心协力恢复吕祖堂面貌 张宝山

《天津日报》1982 年 3 月 22 日

新都县发现两份义和团买田的契约

《四川日报》1983 年 11 月 5 日

义和团的旗帜 陈振江

《文史知识》1984 年 9 期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介绍两本来自德国的像册 黄传杰

《文物天地》1985 年 5 期

义和团团钱 马传德 马定祥

《中国钱币》1987 年 3 期

金堂发现四川义和团运动新资料:介绍三星桥吴公碑 詹绪河

《四川文物》1992 年 5 期

京津地区义和团文物纵横谈 曹欣欣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十六)学术动态

四川大学学报出版专辑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光明日报》1960 年 7 月 14 日

山东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六十周年

《光明日报》1960 年 9 月 10 日

山东举行关于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附照片)

《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7 日

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与资料整理 马汝珩

《光明日报》1960 年 9 月 17 日

纪念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六十周年——吴宣易作专题报告

《合肥师院学报》1960年5－6期

安徽省史学会在我院举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六十周年学术报告会

《合肥师院学报》1960年5－6期

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和资料整理简介 史师同

《新建设》1960年10－11期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义和团运动 宗华等

《学术月刊》1961年1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中评价问题(学术动态) 夏林根

《解放日报》1979年11月12日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种看法 陈振江

《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在济南举行

《光明日报》1980年11月22日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诸问题概述 冬青、大松

《大众日报》1980年11月29日

三十年来我国义和团研究述评 孟祥才、付崇兰

《齐鲁学刊》1980年4期

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

《文史哲》1980年6期

一次中外学术交流的盛会(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侧记)

顾长声

《文汇报》1981年2月23日

祝贺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 (加)文忠志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年1期

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几点建议 (加)谢培智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年1期

山东历史学会年会讨论义和团运动问题 沫兰

《东岳论丛》1981 年 1 期

外国学者在义和团史学术讨论会上 吕景华

《文史哲》198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讨论综述 冯士钵

《历史教学》1981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一年史学研究) 路遥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 年

义和团研究会召开座谈会 寸心

《人民日报》1982 年 2 月 9 日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探索 冯士钵

《光明日报》1982 年 10 月 20 日

《新华文摘》1983 年 2 期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在济南召开座谈会 寸心

《文史哲》1982 年 1 期

日本学者评"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 佟飞 李世瑜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 1 期

深入具体问题,扩大研究领域——义和团运动史座谈会综述

沫兰

《东岳论丛》1982 年 1 期

建国前国内研究义和团状况述评 罗超

《安徽师大学报》1982 年 1 期

K3 1982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研究述评 路遥

《近代史研究》1982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984 年

义和团运动研究在中国 孙祚民

《社会科学情报》1982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世博

《历史教学》1982 年 12 期

K3 198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史学研究) 李德征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 年

四川召开"反洋教运动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 吴金钟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若干问题述评 张玉田

《电大语文》1983 年 2 期

义和团研究会一九八二年年会讨论会综述 李德征

《文史哲》1983 年 2 期

山东大学义和团讨论会简介 刘天路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史学研究) 廖一中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3 年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问题讨论简介七:义和团运动

李喜所 凌东夫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3 年

八十年代以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情况简介 冯士钵、廖一中

《历史教学》1984 年 12 期

K3 1985 年 1 期

《新华文摘》1985 年 4 期

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纪要 史革新等

《人民日报》1983 年 5 月 27 日

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 史岩等

《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 4 期

关于中国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 覃光广、冯利

《河北学刊》1985 年 4 期

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延涛

《光明日报》1986 年 5 月 21 日

K3 1986 年 5 期

第三次义和团史学术讨论会简介 炳清

《人民日报》1986 年 6 月 2 日

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路遥

《史学集刊》1986 年 2 期

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综述 沫兰

《东岳论丛》1986 年 5 期

K3 1985 年 12 月

近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成果和论争 赵书刚

《大学文科园地》1986 年 5 期

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述 景和

《历史教学》1986 年 8 期

如何理解近代史反洋教斗争?:"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 会"侧记 吴树杨

《社会科学报(沪)》1987 年 10 月 15 日

近代案与中西文化冲突(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综述) 施立业

《文汇报》1987 年 10 月 16 日

K3 1987 年 11 期

《新华文摘》1987 年 12 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简况 陶飞亚

《史学情报》1987 年 1 期

关于近代教案性质的讨论(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述要) 史丁

《东岳论丛》1987 年 6 期

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述要 余年

《学术界》1987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教案评述 张应超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 年

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 吴金钟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 年

就新编档案史料谈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几点浅见

朱金甫 程獻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综述 施立业

《近代史研究》1988 年 1 期

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摄要 文凡

《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 1 期

"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纪要 史涅

《安徽史学》1988 年 2 期

"十九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研究中一些新的探索 冯士钵

《历史教学》1988 年 2 期

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述评 常润华

《北京社会科学》1988 年 3 期

首都召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90 周年座谈会,毋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人民日报》1990 年 8 月 13 日

十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述评 孙占元

《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 3 期

《新华文摘》1990 年 9 期

义和团学术讨论会在青岛举行

《文史哲》1990 年 6 期

K3 1991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邵雍

《安徽史学》1991 年 1 期

K3　1991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岫　李平生

《文史哲》1991 年 1 期

可喜的成果，重大的突破：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评述　史丁

《东岳论丛》1991 年 1 期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苏位智　刘天路

《近代史研究》1991 年 2 期

求实探讨，融洽交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冯士钵

《历史教学》1991 年 2 期

K3　1991 年 5 期

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研讨会概述　本刊编辑部

《河北大学学报》1991 年 3 期

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杨万民、柴书君等

《社会科学论坛》1991 年 5 期

K3　1991 年 11 期

近年来我省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一次检阅　孙峰

《山东社会科学情报》1991 年 10 期

义和团运动研究四十年　陈振江

《历史教学》1991 年 11 期

全国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　郭汉民、邹小站

《求索》1993 年 1 期

K3　1993 年 6 期

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　来新夏

《漳州师院学报》1995 年 9 期

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述要 黎仁凯 池子华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近代中国民众动员的社会观念"国际学术讨论综述 沈松平

《社会科学研究》1996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姜文英、吴宪

《河北大学学报》1997 年 1 期

(十七)人物研究

(列传在前;单个人物在后,按姓氏笔画排列)

庚子之忠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 徐彬彬

《越风》1936 年 4 月 11、12 期

庚子拳祸与浙江三忠 秋宗章

《越风》1935 年 10—11 月 2—4 期

庚子年间的丁韪良 王维俭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 辑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美国传教士万卓志 曹维舟

《近代史资料》1963 年 3 期

爱国学者王懿荣 赵格

《光明日报》1983 年 11 月 2 日

爱国学者王懿荣 王宜训

《山东师大学报》1984 年 2 期

爱国将领马玉昆 冯可

《安徽史学》1984 年 3 期

论光绪 叶林生

《社会科学》(甘肃)1981 年 3 期

略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光绪 孙孝恩

《北方论丛》1981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略论光绪 杨光楣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 3 期

光绪略论 陈旭麓

《近代史思辨录》1984 年

试评光绪皇帝 蒋懿菊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 1 期

关于朱红灯反清问题的探讨 任荣康等

《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 4 期

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斗争中几个题 陆景琪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 年

朱红灯是初期义和团主要首领吗? 侯彬、郭墨兰

《东岳论丛》1982 年 4 期

朱红灯事略 刘化冰

《泗水文史资料》(山东)第 1 辑(1986 年)

朱红灯生年考略 焦力军

《史学月刊》1986 年 5 期

K3 1986 年 12 期

护理直督廷雍被杀刍议 边翠丽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刘坤一与义和团运动 傅德元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安治泰其人 刘化冰

《文史资料》(山东济宁市中区)第6辑 1990年

许景澄、袁昶与义和团运动 张国斌

《雷州师专学报》(社科)1990年2期

论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李秉衡 马东玉、邸富生

《辽宁师大学报》1984年1期

论李秉衡 陈月清

《北方论丛》1985年1期

李秉衡与义和团的关系浅析 张庆军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年

爱国名将李秉衡 张天贵

《庄河文史资料》(辽宁)第5辑(1989年)

抗击八国联军的官员李秉衡 马东玉

《人物》1990年6期

爱国名将李秉衡 梁毓棠

《方志天地》1991年5期

中国近代重要人物:李秉衡 张天贵

《清史研究》1995年2期

"巨野教案"中的山东巡抚李秉衡 杨光

《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1期

李秉衡三御外侮尽忠节 张红军

《春秋》1998年3期

试论李鸿章的外交 范忘轩

《自贡师专学报》1989年2期

论中外战争中的李鸿章 夏冬

《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

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 翁飞

《安徽史学》1991 年 1 期

K3　1991 年 4 期

论 1900 年庚子事变中的李鸿章　陈勇勤

《安徽史学》1991 年 3 期

K3　1991 年 10 期

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　董丛林

《河北师院学报》1994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中的铁路问题与李鸿章　朱从兵

《安徽史学》1994 年 3 期

庚子年间的张之洞　冯天瑜

《湖北大学学报》1985 年 1 期

试析张之洞在东南互保中的对外态度　赵晓雷

《丽水师专学报》1985 年 3 期

张之洞与义和团运动　黎仁凯

《河北大学学报》1986 年 3 期

张之洞在《辛丑条约》开议前后的言行评析　钟康模

《历史教学》1987 年 4 期

张之洞与"东南互保"　孙孝恩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张之洞教案观初探　田锡富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K3　1994 年 1 期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　林树惠

《历史教学》1953 年 1 期

义和团天津地区的首领张德成活动片断　董振修

《天津日报》1964 年 6 月 24 日

张德成的原籍在哪儿?

《天津日报》1964 年 7 月 22 日

张德成大战紫竹林 刘景全、黄小同

《天津日报》1983 年 10 月 18 日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生于何年 董振修

《天津日报》1984 年 3 月 18 日

张德成和"天下第一团" 刘振勇等

《静海文史资料》(天津)第 2 辑(1989 年)

爱国抗俄的署黑龙江将军寿山 黎光

《北方论丛》1980 年 2 期

试谈庚子年间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抗俄主张——兼与黎光同志商榷 牛俊发

《求是学刊》1981 年 4 期

寿山与齐齐哈尔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陈志贵

《历史知识》1982 年 1 期

清末抗俄名将寿山 张超

《文物天地》1985 年 3 期

寿山评传 韩来兴

《黑河学刊》1993 年 4 期

K3 1994 年 3 期

寿山评传(续完) 韩来兴

《黑河学刊》1994 年 1 期

反帝爱国的英雄林黑儿 梁义群

《中州今古》1987 年 4 期

爱国将领罗荣光、聂士成 刘海岩

《天津教育》1982 年 7—8 期

罗荣光指驱大沽口 黄小同、刘景全

《天津日报》1983 年 10 月 4 日

抗击八国联军的天津总兵罗荣光 周文光等

《湘西文史资料》(湖南)第2辑(1984年)

殉难大沽口的罗荣光 周协文

《湖南日报》1985年3月26日

罗荣光与大沽口保卫战 陈延亮

《民族论坛》1988年3期

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 宋文宣、刘绍刚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1辑

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 戚其章

《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

K3 1983年1期

关于义和团创始人赵三多 叶荣

《社会科学报(沪)》1987年2月5日

1987年3期

赵三多与义和拳在直隶的兴起 李达三

《河北地方志》1987年4期

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 刘刚范

《河北师院学报》1988年1期

K3 1988年6期

赵三多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郝万瑞

《邢台文史资料》(河北)第4辑 1989年

关于赵舒翘之死 韩学儒

《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3期

荣禄 张焕宗

《历史教学》1986年5期

荣禄与义和团运动 李文海 林敦奎

《近代中国人物》1987年3期

论晚清重臣荣禄 张玉芬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3期

荣禄与庚子事变 高心湛
《许昌师专学报》1993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晋昌 高乐才
《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 年 2 期
杨儒与沙俄东三省交涉 孙克夫等
《北方论丛》1979 年 3 期
清末爱国外交官杨儒 黄征
《文汇报》1981 年 1 月 28 日
力抗强暴维护主权的杨儒 费成康
《华东师大学报》1981 年 2 期
杨儒与辛丑中俄谈判 王笛
《人物》1981 年 6 期
庚辛正气——不畏沙俄强暴的清使杨儒 李中
《新时期》1981 年 9 期
论杨儒与 1901 年中俄谈判 陈新华
《广州师院学报》1982 年 2 期
K3 1983 年 4 期
坚持民族利益,不畏强暴威胁——"交收东三省"谈判中的杨儒 马天增
《黄石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 4 期
中俄谈判中的杨儒与李鸿章 崔树菊
《历史教学》1982 年 8 期
对《杨儒庚辛存稿》的三点质疑 王毅
《北方论丛》1983 年 1 期
K3 1983 年 2 期
中国近代爱国外交家杨儒 王毅
《东北师大学报》1983 年 3 期
爱国外交家——杨儒 吴天明

《夜读》1983 年 4 期

论爱国使者杨儒 赵长碧、王鸿宾

《辽宁师大学报》1984 年 1 期

清末爱国外交家杨儒 陈国庆

《历史知识》1984 年 4 期

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晚清外交家杨儒在中俄谈判中 钟康模

《文史知识》1989 年 9 期

谈坚贞爱国外交家铁岭杨儒 何秀阁

《东北文献》(台湾省)1997 年 1—2 期

衡辰教案中的俞廉三 陈珠培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1993 年

论贺金声 刘泱泱

《邵阳师专学报》1982 年 3 期

贺金声起义述论 王继平

《湘潭大学学报》1985 年 3 期

排外意识与贺金声募勇反教 郭世佑

《湘潭大学学报》1995 年 6 期

论聂士成的功过——考察聂士成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兼与赵捷民同志商榷 李俊虎等

《天津日报》1961 年 6 月 24 日

试论聂士成的功过 赵捷民

《天津日报》1961 年 6 月 10 日

从义和团和聂士成之间的关系看"扶清灭洋"的实质 高宗裕

《无津日报》1961 年 7 月 14 日

聂士成与义和团 顾秉迅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 3 期

评聂士成 郑永福

《史学月刊》1981 年 4 期

谈庚子天津战役中的聂士成 顾秉迅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 4 期

略论聂士成 刘民山

《历史教学》1983 年 11 月

聂士成与八里台之战 刘景全 黄小同

《天津日报》1984 年 1 月 10 日

晚清民族英雄聂士成

《长丰文史资料》(安徽)第 1 辑 1986 年

聂士成传略 杨建英

《安徽文史资料》第 30 辑(1989 年)

聂士成镇压义和团与聂士成之死 王玉柱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论载漪 廖一中

《天津师大学报》1983 年 4 期

K3 1983 年 9 期

载漪与慈禧关系考——兼与廖一中先生商榷 郭卫东

《天津师大学报》1989 年 6 期

卖国贼袁世凯怎样镇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 张汉清

《大公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 1951 年 8 月 31 日

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 王神荫

《山东师院学报》1979 年 6 期

义和团运动中的袁世凯 侯宜杰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 年

论袁世凯对待义和团的态度 李德征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 年

论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政策 黄裕民

《阜阳师院学报》1987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袁世凯 侯杰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集)1987 年

试析袁世凯在晚清的特殊地位 顾卫民

《中州学刊》1989 年 3 期

袁世凯与义和团 张礼恒

《晋阳学刊》1989 年 4 期

袁世凯与《辛丑条约》的签定 廖一中

《贵州社会科学》1991 年 4 期

山东局势与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扶原委 廖一中

《东岳论丛》1994 年 3 期

山东巡抚袁世凯 高峰刚

《春秋》1998 年 1 期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 孔祥吉

《史学月刊》1991 年 2 期

倪赞清——廊坊大捷的杰出组织者 杨震望

《义和团廊坊大捷》(论文集)1992

义和团时代的徐桐 张醉丐

《新民报》1940 年 1 月 2 卷 1 期

唐才常是什么派? 朱国栋

《四川大学学报》1985 年 1 期

K3 1985 年 4 期

唐才常论 何晓明

《汉江论坛》1985 年 10 期

自立军起义领袖唐才常 郑晓桦

《人物》1987 年 6 期

从《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之碑》看庚子国难中的程德全与寿山

凌家民

《北方文物》1986 年 1 期

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　　刘家磊

《学术研究丛刊》1986年6期

董福祥抗击八国联军的几个问题 薛正昌

《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 6 期

董福祥与荣禄析论 薛正昌

《西北大学学报》1993 年 4 期

《董福祥传》序 李侃

《固原师专学报》1994 年 1 期

龙团大元帅——景廷宾 贾书敏

《邢台文史资料》(河北)第 4 辑(1989 年)

龙团大元帅——景廷宾(续) 贾书敏

《邢台文史资料》(河北)第 5 辑(1989 年)

龙团大元帅——景廷宾 贾书敏

《邢台文史资料》(河北)第 6 辑(1989 年)

扫清灭洋起义领袖景廷宾 刘保华

《广宗文史资料》(河北)第 1 辑 1990 年

景廷宾反洋教斗争考略 李金鹏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 1997 年 5 月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傅德元

《河北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 禾稼

《河北大学学报》1987 年 4 期

K3 1987 年 11 期

那拉氏在西安 胡一华

《教学与研究》1981 年 1 期

《历史知识》1982 年 3 期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兼与丁名楠先生商榷 吴民贵

《华东师大学报》1981 年 1 期

K3 1981 年 3 期

慈禧引狼入室镇压义和团 樊克

《北京日报》1982 年 5 月 25 日

慈禧西逃后的腐朽生活 叶秀云、叶志如

《历史档案》1982 年 1 期

封建没落阶级反动本质的大暴露—那拉氏在西安 邵宏谟

《人文杂志》1982 年 5 期

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 侯斌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 年 2 期

西太后逃离北京时间辨证 马福生

《东北师大学报》1985 年 2 期

K3 1985 年 4 期

庚子那拉氏离京避难记 段士朴

《山西师大学报》1987 年 1 期

简论慈禧与载漪的关系——兼议有关论著中的史实叙述 郭卫东

《清史研究通讯》1990 年 2 期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 李喜所 刘保刚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 年

慈禧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怎样决策 贾熟村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义和团运动中的赫德 阴三平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 年 4 期

毓贤之死

《山西文史资料》1962 年 2 期

论毓贤 亓长发

《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3 期

毓贤与山东义和团运动 李宏生

《山东师院学报》1980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 年

义和团大闹京畿首邑，替罪羊毓贤兰州挨斩 朱允光

《西北史地》1981 年 1 期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 陈在正

《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 2 期

K3 1982 年 4 期

毓贤与山西义和团 孙石月、宋守鹏

《山西师院学报》1982 年 4 期

毓贤与山东教案 郭墨兰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 年

试析毓贤对义和团的抚绥 张淑钊

《太原师专学报》1988 年 1 期

论义和团运动期间毓贤笫仇教官员 于伯铭

《社会科学辑刊》1988 年 2 期

K3 1988 年 5 期

毓贤与平原教案 王守中

《北方论丛》1992 年 6 期

K3 1992 年 12 期

赛金花根本不认识瓦德西 邢铁华

《戏剧界》1980 年 5 期

评赛金花 张智辉

《教学与研究》1981 年 1 期

赛金花怎么不认识瓦德西 张鹄

《戏剧界》1985 年 5 期

历史上的赛金花 刘晓伟

《社会科学参考》1982 年 3 期

(十八)文艺作品

痛伪谕嘉奖团匪有感而作 (诗文辞随录)罗辣

《清议报》1900年8月5日 第五十三册

京津大乱乘舆出狩起师勤王北望怀感 诗词杂录

《知新报》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第一百三十册

唱御驾到西安 竹实词凤生

《杭州白话报》第七、第八期,1901年8月18日、1901年8月28日

京津大乱乘舆出狩北望感怀十三首 更生(诗文辞随录)

《清议报》1901年10月12日 第九十四册

唱团匪认祖宗 竹实词凤生

《杭州白话报》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庚子诗鉴 龙顾山人

《中和》1941年1-7月2卷1-7期

长安词选诠释 赵生印

《中日文化》1943年12月-1944年3月3卷11、12期,4卷1期

庚子诗鉴补 龙顾山人

《中和》1944年5月12日5卷5、12期

庚子感事诗 石荣昶

《近代史资料》1956年4期

义和团的传统故事(八篇)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8年4期

义和团的传说故事(红缨大刀等)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8 年 4 期

仇视、轻蔑、自豪(读"义和团传说故事"札记) 汪曾礼

《民间文学》1958 年 4 期

关于义和团的传说故事 顾颉刚

《民间文学》1958 年 4 期

义和团的故事(老大造反等六篇) 张士杰

《民间故事》1958 年 7－8 期

义和团的故事(洪大海等)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8 年 10 期

义和团的故事(义和团战落堡等)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8 年 11 期

义和团故事的有关资料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8 年 12 期

义和团的故事(大师兄闹衙门,马六刀劈二毛子)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8 年 12 期

借庙(义和团的故事) 孙志勤

《天津日报》1959 年 6 月 4 日

人民群众的自我写照 朱寨

《民间文学》1959 年 1 期

几篇义和团故事中的妇女形象 张帆

《民间文学》1959 年 1 期

义和团故事笔谈 朱寨等

《民间文学》1959 年 1 期

义和团的故事(砍马二爷)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9 年 1 期

战士座谈义和团故事

《民间文学》1959 年 1 期

义和团的故事(大刀吓坏了张财主等二篇)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59 年 2 期

义和团故事笔谈——读了义和团故事之后 顾颉刚等

《民间文学》1959 年 2 期

为义和团故事所感 任桂林

《民间文学》1959 年 2 期

看了关于义和团传说故事以后 南木

《人民文学》1959 年 2 期

读义和团故事随感 敏

《民间文学》1959 年 2 期

深刻的表现农民革命性的"义和团的故事" 宗垒

《人民文学》1959 年 2 期

人民创作的珍宝 薛刚

《民间文学》1959 年 3 期

义和团的歌谣 刘崇丰

《民间文学》1959 年 3 期

伟大人民的伟大历史和创作——读《义和团的故事》笔记 吕振羽

《民间文学》1959 年 3 期

读"义和团的故事" 赵景深

《民间文学》1959 年 3 期

义和团的故事(大报仇,少爷和侯七) 张士杰

《新港》1959 年 4 期

义和团的故事(洪大海等) 张士杰等

《人民文学》1959 年 4 期

义和团故事笔谈 陈白尘等

《民间文学》1959 年 4 期

幻想与现实 刘守华

《民间文学》1959 年 4 期

风起云涌，虎啸龙吟的历史画卷——谈二十多篇“义和团的故事”的特色 刘剑青

《文艺报》1959 年 6 期

杨大师兄上南山——关于义和团的民间传说 张帆等

《文汇报》1959 年 6 月 14 日

张绍桓包打西什库——义和团的故事 张士杰

《北京文艺》1959 年 7 期

义和团打洋教堂 张士杰

《萌芽》1959 年 10 期

乐二爷摆阵——义和团的故事 张士杰

《萌芽》1959 年 23 期

庚子诗话 知更

《新民晚报》1960 年 2 月 16 日

反帝斗争的英雄诗篇——读《义和团故事》 张帆

《北京日报》1960 年 9 月 9 日

一幅光彩夺目的反帝斗争画卷——介绍义和团的故事选《托塔李天王》 周艾文

《天津日报》1960 年 10 月 6 日

《义和团故事选》出版

《光明日报》1960 年 11 月 2 日

打击帝国主义的不朽诗篇——读“义和团故事” 华东师大“星星之火”文学社

《羊城晚报》1960 年 11 月 4 日

论历史的真实性——读《义和团故事》，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吴晗

《光明日报》1960 年 12 月 3 日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精神武器——谈义和团运动的歌谣 李传龙

《光明日报》1960 年 12 月 4 日

进一步广泛深入地收集义和团的故事　长山
《民间文学》1960年2期
关于"朝阳人民反帝斗争的故事"
《民间文学》1960年3期
朝阳人民反帝斗争故事　许光时等
《民间文学》1960年7期
托塔李天王(义和团故事选)　河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
张士杰整理
《百花文艺》1960年8期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记录——读《义和团故事》　李俊虎
《民间文学》1960年11期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光辉记录——《义和团故事》读后随记　白丁
《民间文学》1960年11期
义和团的故事(曹老师大战海口,李鸿章出卖海口)　张士杰
《新港》1960年12期
陈傻子杀孙大王——义和团故事　张士杰
《天津日报》1961年10月5日
义和团大战纪老干　张士杰
《天津日报》1960年11月23日
义和团坐镇安次县　张士杰
《河北日报》1961年12月3日
英勇的斗争,优美的赞歌——读张士杰收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
张帆
《新港》1961年2期
张绍桓怒打鬼头王(义和团故事)　张士杰
《新港》1961年8期
反帝斗争故事(火烧天主堂)　苏方桂
《民间文学》1961年9期

爱国义侠大刀王五 陈华新
《中国青年报》1962 年 1 月 1 日
义和团故事的搜集与整理 蔚刚
《民间文学》1962 年 4 期
义和团故事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点 蔚刚
《河北文学》1962 年 12 期
漫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与创作 张士杰
《民间文学》1963 年 1－2 期
论义和团歌谣的战斗性 段宝林
《光明日报》1965 年 7 月 4 日
抄汉屯(义和团故事) 张士杰
《河北文艺》1978 年 5 期
对《义和团的故事》有关史实的几点质疑 邸富生
《辽宁师院学报》1979 年 3 期
义和团故事(二则) 张士杰收集整理
《民间文学》1979 年 7 期
义和团故事的继承与革新 张文
《民间文学》1979 年 8 期
义侠大刀王五传 史之余
《武林》1982 年 2 期
廊坊地区发现义和团乐曲 杨树华、韩居乐
《河北日报》1983 年 3 月 23 日
智办拳场,火烧教堂 宁津义和团逸闻 李惠池
《宁津文史资料》(山东)1983 年第 3 辑
廊坊军芦村义和团乐队及乐曲的调查 韩居乐等
《中国音乐》1984 年 3 期
李陆升大战五沿(民间传说)——宁津义和团逸闻 李新平
《宁津文史资料》(山东)1984 年第 4 期

义和团民谣(七首)　震望搜集
《民间文学》1984 年 12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对联集锦　陈楚翘
《屏山文史资料》(四川)第 8 辑 1986 年
农民歌谣两首　栗宇田
《阳城文史资料》(山西)第 2 辑 1988 年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照片十九幅)　张海鹏撰文
《解放军画报》1989 年 7 期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照片二十二幅》　张海鹏撰文
《解放军画报》1983 年 8 期

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文章

红灯女儿爱造反 "灭洋闹清"震中外　华师
《文汇报》1967 年 4 月 14 日
"红灯照"名扬天下,红卫兵威震全球　华东师大历史系红海潮
《文汇报》1967 年 4 月 14 日
继续和发扬"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　复旦大学历史系二红卫兵
《文汇报》1967 年 4 月 14 日
赞"红灯照"(社论)
《文汇报》1967 年 4 月 14 日
不准污蔑义和团革命群众运动　时群
《光明日报》1967 年 4 月 18 日
"红灯照"赞
《解放日报》1967 年 4 月 23 日
义和团是革命的　七十九岁红灯照四师姐赵菁
《光明日报》1967 年 4 月 24

不许诬蔑义和团 八十九岁义和团老团员张喜贵

《光明日报》1967 年 4 月 24 日

红灯照 武文英

《北京日报》1967 年 4 月 27 日

"红灯照"革命造反精神颂 孙达人

《光明日报》1967 年 4 月 27 日

"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农民战争组

《光明日报》1967 年 4 月 27 日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肖任武

《光明日报》1967 年 8 月 30 日

林彪恶毒咒骂义和团居心何在? 学员傅树本

《开封师院学报》1974 年 4 期

义和团反帝扫清朝,红灯照批儒破礼教 天津铁路第一中学理论 研究小组

《天津日报》1974 年 9 月 24 日

义和团反帝反封批孔孟 湖南省动力机厂工人理论小组

《长沙日报》1974 年 12 月 28 日

讨孔英雄义和团,反帝反修撼山川

《山西日报》1975 年 2 月 19 日

中国人民不可侮——读义和团民谣《还我江山还我权》 张元清

《济南日报》1975 年 3 月 20 日

不准污蔑义和团革命群众运动 时群

《光明日报》1975 年 4 月 18 日

义和团在东北的抗俄斗争 高援朝

《光朋日报》1975 年 5 月 13 日

林黑儿批儒破孔教 长沙纺织厂工人理论组

《长沙日报》1975 年 6 月 17 日

攻击农民起义就是为投降制造舆论——批判林彪一伙污蔑义和团的谬论 吴泾化工厂理论小组

《解放日报》1975 年 10 月 24 日

反帝反封破纲常——义和团的反孔斗争 历史系七二级

《中山大学学报》1975 年 1 期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孙代兴

《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 年 1 期

伟大的反帝革命斗争不容污蔑——河北省廊坊地区工农兵和义和团运动参加者怒斥苏修攻击义和团的谬论 北师大历史系二年级开门办学 小分队

《北师大学报》1975 年 2 期

红灯女儿颂 刘蓉、徐芬

《天津师院学报》1975 年 2 期

沙俄武装镇压黑龙江义和团的罪行——《修筑东清铁路图片册》(一八九七——一九三〇) 吴文衔

《文物》1975 年 3 期

是文明使者,还是侵略强盗?——从义和团反抗沙俄侵略的兵器和一张沙俄 的反革命"告示"谈起 戈天等

《文物》1975 年 3 期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壮丽战歌 何迈

《吉林师大学报》1975 年 4 期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电子仪器厂理论组历史研究所 晋岩

《天津师院学报》1975 年 5 期

无耻的叛徒——斥齐赫文斯基之流对义和团运动的诽谤 石岚

《历史研究》1975 年 5 期

谎言掩盖不了历史——驳斥苏修诬蔑义和团和美化老沙皇的谬论

钟锷

《理论学习》1975 年 5 期

义和团运动的光辉永存——三评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

孙克复、关捷

《辽宁大学学报》1975 年 6 期

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不可侮——斥苏修对义和团运动的恶毒攻击

毕泗生

《山东师院学报》1975 年 6 期

"江东六十四屯"和老沙皇的暴行录——痛斥苏修为老沙皇侵华辩护　董万崙

《延边大学学报》1976 年 1 期

"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和老沙皇的侵华暴行——驳苏修为老沙皇侵华 罪行的无耻辩护　董万崙

《文史哲》1976 年 1 期

义和团时期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　高援朝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6 年 2 期

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的反帝斗争　沈雨梧

《浙江师院学报》1976 年 2 期

山东茌平、平原一带义和团调查记　山东大学历史系 史斌

《文物》1976 年 3 期

义和团运动和反孔斗争　吴雁南

《吉林师大学报》1976 年 3 期

历史的见证，人民的战歌——读义和团歌谣　潮晨

《河北文艺》1976 年 3 期

独有英雄驱虎豹——驳齐赫文斯基对义和团革命精神的诽谤

魏宏运

《南开大学学报》1976 年 3 期

爱珲境内义和团和爱国军民抗俄战迹调查记　师傅文

《哈师院学报》1976 年 3 期

义和团反帝精神万代传——斥苏修林彪一伙污蔑攻击义和团的谬论 历史系七三级

《贵阳师院学报》1976 年 4 期

义和团和爱国军民在爱珲抗击老沙皇的壮丽诗篇 师傅文

《哈师院学报》1976 年 4 期

爱珲——抗俄斗争的历史名城 师傅文

《哈师院学报》1976 年 4 期

一面反帝斗争的光辉旗帜——"清邑义和团"团旗 河北省清丰县人民文化馆等

《文物》1976 年 5 期

天津义和团反帝斗争史迹调查记略 天津历史博物馆

《文物》1976 年 5 期

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伟大功绩永载革命史册 施滨

《无耻篡改历史，妄图称霸世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 年

沙俄独霸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七十三位老人访问记

龙政文 史言实

《无耻篡改历史，妄图称霸世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 年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驳齐赫文斯基之流对列宁《中国的战争》的恶意歪曲 汪恩枫

《无耻篡改历史，妄图称霸世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 年

揭穿齐赫文斯基之流歪曲义和团运动的险恶用心 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

《无耻篡改历史，妄图称霸世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 年

二 著作、图书

苏丽丹 关家铮

(一)综 述

庚子义和团情报纪略

蔡世瑢等撰 1900年稿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日记

杜某 1900年稿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庚子拜蜂录

奇生编 3卷1册 1900年稿本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选录)

本稿本分3卷,分别录上谕、奏稿、示谕及数篇义和拳事迹考记。

悟彻源头

左绍佐撰 1册 1900年稿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庸忧录

佚名1册 1900年稿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59年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庚子记事》 1978年中华书

局重印

陈氏家书

陈惟彦编 1 册 1900—1901 年稿本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节录)

选录有关义和团运动的 14 通信函,可供研究参考。

枕戈偶录

汪声玲撰 1 册 1900—1901 年抄本 吴丰培藏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

庚子国难纪事本末

2 卷 见日本横滨新民社印行之《清议报全编》第 6 集 1900—1901 年

庚子记事

仲芳氏撰 2 册 1900—1901 年稿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1959 年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庚子记事》

庚子纪闻

刘福姚 2 册 1901 年稿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拳事纪闻

日本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 1 卷 见《拳匪纪事》卷六(1901 年)

收入《义和团》第 1 册

拳乱纪闻

日本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 1 卷 见《拳匪纪事》卷二(1901 年)

收入《义和团》第 1 册

拳匪纪事

日本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 6 卷 1901 年铅印本

庚子义和拳案杂存

劳乃宣编　3卷　1902年著易堂仿聚珍版铅印本
1972年卢氏刊桐乡劳先生遗稿本　收入《义和团》第4册

庚子传信录

[日]小山秉信撰 东京 嵩云书社铅印本 1902年
阿英辑《近代国难史丛抄》及《近代外祸史》
是书内容与李希圣所撰《庚子传信录》大致相同，唯增"松平直三郎"序及作者自序。

庚子国变记

李希圣撰 1卷 1902年刻本　1923年裒冰堂刻本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拳匪纪略

侨析生撰　12卷 1901年香港书局石印本　1903年上洋书局石印本乱中日记残稿
袁昶撰　1篇　见《太常袁公行略》1905年石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拳祸记

李杕编2册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铅印本 1905年 1909年铅印本 1923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清朝事略

江楚编译书局编辑　6卷 金陵石印本 1906年

庚子寻亲记

陈浏(孝威)撰 见寂园志瓷香馆杂俎 1907年刻本
是书为作者在京津及南下途中的见闻。全篇约万余言，录有当时的告示、揭帖及日德冲突等事。

榆关纪事

邹渭三撰　4卷　凌登岳原本　芦中穷士删改　1907年石印本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阿英编《近代外祸史》中仅收联军上下

两篇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

花甲忆记

[美]丁韪良撰　1册　上海广学会铅印本　1910年

是书系作者在华60年的见闻记述。其中所述义和团事，从使馆被围说起，以次说到两宫西幸及回銮事。

庚子国变记

罗惇曧撰　1卷　天津《庸言》第一卷第一号

胡寄尘辑《清季野史》(1913年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卷一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梁启超撰　1册　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又见《饮冰室文集》(广智本)下册

是书亦名《李鸿章》，其中有“义和团之起”、“李鸿章之位置”、“联军和约”、“中俄满洲条约”及“李鸿章毙逝”等篇。

慈禧外纪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合著　陈冷汰等译　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1914年　北大图书馆藏

不远复斋见闻杂志

张廷骧撰　2册10卷　1915年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撰　80卷　上海　文明书局　1915年

清室外纪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合著　陈冷汰译　1册　上海　中华书局铅印本　1915年

清朝野史大观

小横香室主人编　12卷　上海　中华书局铅印本第三版　1917年

清稗类钞

徐珂辑　48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7年

清季野闻

陈恒庆撰　1918年上海小说丛报社铅印本　1932年再版改名为《谏书稀庵笔记》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节录)

清鉴辑览

文明书局编辑　28卷　上海　文明书局铅印本　1918年

悚斋日记

于荫霖撰　于翰笃编　8卷　见《悚斋遗书》1923年刊本　北大图书馆藏

国闻备乘

胡思敬撰　4卷　南昌铅印本　1924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景善日记

景善撰　原稿藏大英博物馆　曾刊载 Acta Orient Alia (1924) 亦有影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1册

磨盾余墨

马福祥撰　1册　1924年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选录)

是书记述庚子年廊坊之战与慈禧太后西逃之事。

翁文恭公日记

翁同撰　40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925年

梦蕉亭杂记

陈夔龙(庸庵居士)撰　2卷　1925年刊本　国家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198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本

作者庚子年夏秋之交任顺天府尹。是书记庚辛事十余则，其中除作者自述其亲身经历以外，对端王、董福祥、李秉衡及有关和约之事亦有记录。

遗民图

孟继元编　1篇　见《孟公晓墀百年经过史》

1926年北华印刷局铅印本　1935年续编　北平协和印书局重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选录）

是篇全文约二万字，记有庚子之经过、拳匪仇杀、显宦被戮、通县惨状等事。

湘绮楼日记

王闿运撰　32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927年 北大图书馆藏

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

半粟编　1册　上海　太平洋书店铅印本　1928年

庚辛纪事

柴萼撰　1卷　见梵天庐丛录卷三　中华书局石印本 1929年

收入《义和团》第1册

义和团运动史

陈捷撰　1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万有文库第一集）

1931年（新时代史地丛书）　1933年再版

复堂日记续录

谭献撰　1卷　见徐彦宽辑《念劬庐丛刻初编》1931年铅印本

古红梅阁笔记

江东阿斗　人文月刊卷一、三、四期　上海人文编辑所出版

1932年二、四、五月北大图书馆藏

第一期为义和团一般性记述。第三期记唐才常起义及失败之经记。第四期记西安行在事。

庚子外纪(原名北京最后的勾留)

[法]毕耶尔洛谛撰　允诺译　正中书局铅印本　1932年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传信录

李希圣撰　1932年人文月刊三卷五期　1936年李鉴铅印本

此录与作者所撰《庚子国变记》大体相同,唯内容仅及《庚子国变记》的1/3。

潜庐随笔

甘鹏云撰　13卷　1933年甘氏崇雅堂开雕　黄冈陶舫溪承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唐文治自订年谱

唐文治撰　1935年上海商务馆铅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四朝佚闻

金梁撰　2卷　铅印本　1936年

辛丑日记

华学澜撰　1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1936年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国变记

王独清辑录

1.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36年初版　1940年增修版

2.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46年初版　1947年3版

3.台北广文书局铅印本　1966年

4.上海　上海书店铅印本　1982年

本书收罗惇曧所著《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和《西巡回銮始末记》三种史料。

掌故零拾

王嵩儒辑　4卷 北平　彝宝斋印书局　1936年

满清兴亡史

汉史氏撰　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上海　新中国图书局　1936年第二种

中国近代史

李鼎声著　上海光明书局　1941年

内有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攻华篇

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

[美]施达格著　吴宣易节译　1册　重庆　正中书局　1941年初版　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再版

庚子纪事长札

赵声伯撰　《中和月刊》2卷1期　1941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

义和团

齐一著　1册　北平　新民印书馆铅印本　1944年

中国近百年史

宋云彬著　香港新知书店出版　1948年

内有戊戌政变到庚子拳乱篇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胡绳著　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1948年

内有义和团的受骗一章

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

华岗著　香港鸡鸣书店出版　1949年　1951年三联书店增订本

内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篇

中国近代史(上编)

范文澜著　北京新华书店铅印本　1949年

内有对抗瓜分运动的义和团运动篇章

义和团

黄宁著　1册　北京　开明书店铅印本　1950年

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史学会主编　翦伯赞等编　4册　1951年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5年新知识出版社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和团反帝运动(新少年儿童知识丛刊之一)

秦觉石著　1册　南京　民丰印书馆铅印本　1951年

义和团

柳志坚　1册　北京　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5年

义和团

包村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56年

义和团

朱愈　1册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6年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

《史学》双周刊社编　1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年

本书收辑建国初义和团运动50周年前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

义和团运动报告提纲(初稿)

翦伯赞　北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出版　1956年

义和团运动

金家瑞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初版　1959年第2版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李时岳　1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年初版　1985年第2版

义和团文献

见《近代史资料》总第12号　4种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义和团运动(中国历史小丛书)

金林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义和团档案史料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2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主编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庚子记事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北京　1959年科学出版社第1版又1978年中华书局新1版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年

义和团运动(工农通俗文库)

周萌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2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年

义和团运动

上海师范学院《义和团运动》编写组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1年

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代史丛书)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此书同时还在延边人民出版社出朝鲜文版；分别在北京、上海出盲文版。1973 年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蒙古文版。1974 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维吾尔文版。

中国近代史

[苏]齐赫文斯基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大学俄语系合译 2 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74 年

是书第四章为“1898—1901 年中国北部的义和团人民起义”。

义和团反帝斗争(《学点历史》丛书)

天津市电子仪器厂工人理论组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近现代史研究室合编　1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1979 年第 2 次修订 1984 年第 3 次修订　1994 年第 4 次修订

是书有义和团运动与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的章节。

义和团史话

金家瑞　1 册　北京出版社　1980 年

义和团运动史

廖一中　李德征　张璇如等编著　1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中国近代史新编

苑书义等编　3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1986 年

中册述及义和团运动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著　2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是书第十八、十九章分别为“义和团的勃起”和“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

义和团史料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2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编辑部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年

本书为1980年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的论文集。

近代中国八十年

陈旭麓主编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是书第20章为“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收辑从建国初起到1983年底止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1982年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上的文章。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王明伦选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年

中国近代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　3册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1986年

是书第二册第十一章为“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第十二章为“抗击沙俄入侵东北的战争”。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美]费正清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译　2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清实录山东史料选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　3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年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陈振江　程献编著　1册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

义和团运动

路遥编　1册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年

中国近代史纲

龚书铎　方攸翰主编　1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李文海　林敦奎　林克光编著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年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1册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是书为1986年在天津召开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路遥　程献著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年

中国近代史记(1840—1914)

徐泰来主编　3册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本书第一册五章三节为"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

徐绪典主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年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　2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年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年

义和团廊坊大捷

王广远主编　1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年

本书为1991年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的纪念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

陈旭麓著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是书第十一章为"庚子与辛丑"。

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著　1册　北京大学　1993年

义和团大辞典

廖一中主编　1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1995年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论文集)

黎仁凯等编　1册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是书为1996年在保定市河北大学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及暨直隶总督学术 讨论会"的论文集。

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

牟安世著　1册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年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

郭大松主编　北京　红旗　1997年

是书按总论、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大事记、文献史料六篇的通鉴体例,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义和团运动。

最后的呐喊——义和团运动

杨呈胜　1册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庚子日记

华学澜撰　2册　稿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59年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庚子记事》史料集中

石涛山人见闻志

作者姓左　由《拳变系日要录》中录出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铅印本

辛丑日记

徐鉴 1册 手稿残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上章困敦传信录(庚子传信录)

李超琼撰 1册 稿本 北师大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义和团运动散记

张黎辉辑 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1982年

五城公牍汇存

陈璧编 6函40册 稿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综论义和团

佚名 陈瑞芳整理 抄本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此本系摭拾当时传闻及报纸记载而成。记述义和团运动在京津等地的形况为多,对有关人物亦多有评论。

戊壬录

宋玉卿编 2卷 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第八种 又见成都昌福公司印行的《满清野史》第六种

匪目记

魏元旷撰 1卷 见《潜园二十四种》杂编第七册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全文不过八百言,分六段。第一段说义和团为八卦会之流派,第六段述教士之拔扈专横事。

拳变余闻

罗惇曧撰 天津《庸言》第一卷第三、四号 胡寄尘辑《清季野史》卷一 1982年上海书店《庚子国变记》

清史拾遗甲编

不才选辑 宣南编辑社铅印本

(二)背景与教案

支那教案论

[英] 密克撰　严复译　1册　上海　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本　1892年　国家图书馆藏

金川教案述略

江湘岚著　1卷　木刻本　1901年

系金川教案文件辑录。后附金川唱和诗1卷。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

佚名　1卷　山西长治县天主教堂抄本　1900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刘以桐撰　1册　1900年稿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2册

华司铎被掳记

[法]华芳济撰　刊于《汇报》1900年第174—190号

庚子教士受难记

不著撰者姓名　1卷　1900年

停琴余牍

罗迪楚撰　1册　武昌　1900年刻本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五洲教案纪略

[英]李提摩太著　5卷　上海　广学会铅印本　1901年

庚子教会受难记

[英]季理斐辑译　任廷旭笔述　2卷　上海　广学会铅印本　1901年

教案奏议汇编

程宗裕编 8卷 上海书局石印本 1901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山左教案书牍

祝鎏辑 1册 1902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教难记

李老楞辑 8卷 上海石印本 1902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教务纪略

周馥总纂 李刚己辑录 4卷 1904年刊本 又1905年两江学务处刊本 又见1886年上海书局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拳时北京教友致命

包士杰编 18卷15册 北京救世堂排印本 1—14卷于1904年出版 15—18卷于1927年出版 国家图书馆藏

东平教案记

柳堂撰 2卷 1905年笔谏堂刻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民教相安

高步瀛 陈宝泉同编 1册 天津北洋官报局石印本 1905年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教案函牍

祝芾撰 1卷 1905年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4册

山左教案二编

祝鎏辑 1册 光绪年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

柴栗粲辑 5卷 上海 中华圣教书会铅印本 1911年 1925年再版(略有增补) 1935年重印

湖北襄郧属教史纪略

成和德编　2卷　1922年出版

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

柴莲馥编　1册　汉口　中国基督圣教书会　1925年再版

义勇列传

河北献县天主堂编　3册　1935年出版

清季教案史料

故宫博物院辑　2册　北平铅印本　1937年

变异录

天嘏撰　1卷　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第16种

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

王文杰著　1册　福建　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　1947年9月出版

正文四编，另附《近世教案表》和《教案发生地点分布图》。

拳祸一瞥

三友编撰　公教小读物丛刊之三十三　澳门　慈幼印书馆印行　1948年

1898年的"永安教案"调查记

钟文典　萧辛合辑　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2号

樊国梁等函牍

林逢源编　收于《近代史资料》总第32号　1964年

山东教案史料(义和团资料丛编)

廉立之　王守中合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年

贵州三"教案"

周健钟编著　1册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0年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声著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献县天主堂资料

河北省博物馆编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四川省档案馆编　1册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

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

[英]E·H·爱德华兹著　李喜所等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1986年

中国教案史

张力　刘鉴唐合著　1册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合编　成都　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集合1980年以来有关中国近代教案史研究的论文38篇，其中以1985年 成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为主。

教案与近代中国

冯祖贻等主编　1册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年

本书为1989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晚清教案纪事

戚其章　王如绘编著　1册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0年

灾荒与饥馑1840—1919(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

李文海　周源著　1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

是书第五章第三节为"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旱为主的全国灾荒"。

拳案三种

劳乃宣撰　全1册　北京　中国书店影印本　1992年

中国近代教案新探

吴金钟等主编　1册　黄山书社　1993年

本书为1992年在湖南省怀化市召开的"第四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

陶飞亚　刘天路著　1册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是书第十章记述从教案、义和团到非基督教运动的内容。

清末教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已出3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96—1998年

是书为档案史料，其中第二册与义和团运动关系较大。

"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

张鸣　许蕾等　1册　北京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8年

(三)组织与源流

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劳乃宣编　1卷　1899年刊本　后有多种版本　收入《义和团》第4册

辟邪录

王锡祺撰　2卷　1900年　南清河王氏小方壶斋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续义和拳源流考

支碧湖撰　1篇　见《春坡梦传奇》　1906年活字本　收入《义和团》第4册

拳教析疑说

劳乃宣撰　1卷　光绪年间初刻本　重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近五十年见闻录

四家笔记　8册　上海　进步书局　1917年

1982年出版的《义和团史料》下册有选录

恽薇孙行状

恽宝惠撰　1918年恽氏自刻本　北大图书馆藏

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

陈贯宗著　1册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年

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路遥主编　1册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年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美]周锡瑞著　张俊义　王栋合译　1册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

(四)义和团运动在各地

山　东

平原拳匪纪事

蒋楷撰　1卷　1900年后刻本　1901年上海聚珍版题名《平原拳匪纪略》　收入《义和团》第1册

宰惠纪略

柳堂撰　5卷　1901年笔谏堂刻本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拳匪之祸首

若虚撰　1册　有光纸铅印本　出版日期不详(1918年撰稿)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易名为《胶州事件》

古春草堂笔记

曹倜撰　1册　1928年刻本　又1931年铅字重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选录)

行脚山东记

王照　1篇　见《小航文存》卷一　1930年木刻本　收入《义和团》第1册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

骆承烈编　1册　济南　山东人民　1959年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年

义和团在山东

陆景琪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年

筹笔偶存

朱金甫　庄建平等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北　京

王大点庚子日记

王大点撰　1册　稿本(1900—1901)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京师日记录要

宋廷模撰　1册　1900年　北京宋氏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京师拳祸记

安特雷撰　1册　首刊于《汇报》(1900)　后由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出版

是书记述北堂围困事甚详。

京都拳祸记

樊国梁撰　1篇　汇报235至237号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　1900年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大事记

杨典诰撰　1册　稿本(1900—1902)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59年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庚子记事》史料集　1978年中华书局再版

另有国家图书馆藏之抄本　1964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恒谦手札残稿

恒谦撰　原稿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荣孟源藏(1900—1901年)

恽毓鼎庚子日记

恽毓鼎撰　手稿本(1900年)北大图书馆藏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拳变纪略

继昌撰　选自《天津城垣考》(1900)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本文记载庚子五月至七月北京的情况。

高枏日记

高枏撰　1904年刊行过铅印4卷本　另一种为清翰堂刊木版8卷本　刊刻年月不详

1959年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庚子记事》　1978年中华书局重印

拳匪构祸纪实初编

佚名　1册　清光绪年间石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述德笔记

十丈愁城主人撰　1921年铅印本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汪穰卿笔记

汪康年　2册　1926年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缘督庐日记抄

叶昌炽撰　王季烈辑　16卷　上海　　蟫阴庐石印本

1933年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2册

军机处杂档中之尺牍五通

见文献丛编第18辑　故宫博物院出版　1934年

天　津

天津一月记

不著撰者姓名　1篇　见《拳匪纪事》卷六　1901年　收入《义和团》第2册

津乱实纪

阮国祯撰　1篇　见刘春堂撰《畿南济变纪略》1901年刘氏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2册

遇难日记

佚名　1卷　见《拳匪纪事》卷六　1901年　收入《义和团》第2册

天津拳祸遗闻

汤殿三撰　16则　见民兴报馆刊《国朝遗事记闻》　又见《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刘孟扬撰　2卷　1910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2册

拳匪闻见录

管鹤撰　1卷　见振绮堂丛书初集　1911年铅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1册

竹素园丛谈

顾恩瀚撰　1册　1927年云在山房校印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节录)

庚子轶事

董作宾　1篇　《逸经》(文史半月刊)22期　上海　人间书屋出版　1937年 北大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义和团保卫天津

金家瑞　1册　天津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

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天津人民反帝斗争史话)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　天津史话编写组　1册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73年

义和团在津的反帝斗争

廖一中编著　1册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天津近代史

来新夏主编　1册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年

是书第七章记述天津的义和团运动和天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内容。

河　北(直　隶)

庚子奉禁义和拳汇录

劳乃宣编　1卷　1900年刻本　1901年铅印本　1902年著易堂仿聚珍版铅印本　1927年卢氏刊桐乡劳先生遗稿本

收入《义和团》第4册

张家口庚子年拳匪日记

桂丰撰　原稿本(1900年)　国家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武垣定乱禀牍

马毓桂撰　1卷　北京　华北书局铅印本　1902年　见《守拙轩政书》　收入《义和团》第4册

涞水拳匪始末

作者不详　1卷　铅印本　1902年

本书为庚子剿办涞水拳匪始末禀信摘要，并附前任审断高洛村教案稿。

直东剿匪电存

林学域编　5卷　1907年石印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拳匪纪略

艾声撰　1卷　光绪年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朱君石臣庚子事迹纪略

任植撰　1册　1911年石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易名为《庚子事迹记略》

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

杨慕时编　1册　1915年铅印本　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

敏盦官书拾存

罗正钧撰　2册　湘潭　罗氏养正斋刊印　1920年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永忆录

韩国钧撰　2册　1941年上海　百宋铸字印刷局铅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书庚子国变记后

酬鸣　天津《庸言》第一卷第四号

景延宾扫清灭洋起义(中国历史小丛书)

贾逸君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义和团运动在河北

公孙訇著　1册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义和团廊坊大捷

王广远主编　1册　北京　中国文史　1992年

是书为1991年在廊坊市召开的"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山　西

晋祠志

刘大鹏撰　稿本(1900年)　山西省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省心堂杂著

何见扬撰　2卷　1902年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退思斋日记

刘大鹏撰　稿本(1902年)　山西省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十叶野闻

许指严撰　2卷　上海　国华书局铅印本　1917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徐悔斋集

徐继孺撰　18卷　1935年大梁刻字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乔志强　1册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

东　北

光绪庚子辛丑日记

嵩崑撰　1册　原稿本　国家图书馆藏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易名为《嵩崑庚子日记》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黑龙江省博物馆　81673部队政治处合编　1册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8年

忠义军抗俄斗争

吉林师范大学忠义军调查组　1册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9年

义和团运动在东北

黎光　张璇如编著　1册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

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合编　1册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

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合编　1册 沈阳　辽沈书社　1984年

四　川

岑大帅牌示

岑春煊撰　1册

是书辑录岑春煊于1902年至1903年间在四川总督任内颁布的告示24件。其中部分告示为研究四川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

三水关纪事和诗

高维寅等撰　4卷　1904年石印本　四川省图书馆藏

红灯教案卷

赵清　刘传英　郑城合辑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红灯教报刊资料选录

赵清　刘传英　郑城合辑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余栋臣仇教记

汪茂修撰　四川大足县档案馆藏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

徐庆坚辑　见《近代史资料》总第7号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续辑

伍士谦　李祖桓合编　见《近代史资料》总第18号

怡云馆文牍略存

罗湘撰　2册　清末排印本　四川省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啸海成都笔记

汪如海撰　1937年排印本　四川省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四川义和团运动

张力著　1册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

其　他

友琴山房文草内集

龙学泰撰　8卷　1905年石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本书为作者的亲历和见闻,可反映江西吉安府在义和团兴起后谋划保护教堂及 对抗义和团等事情。

河朔前尘

王锡彤撰　1 册　辛亥革命后出版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是书记载河南滑县一带义和团活动以及河北道岑春荣与豫北地方官吏筹议设立团防 局剿办义和团等材料。

审安斋遗稿

陈涛撰　6 册　1924 年校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是书反映陕西义和团发生之社会背景及其斗争事迹。

汪穰卿先生传记

汪诒年撰　7 卷　1938 年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 年出版的《义和团史料》下册有选录

是书记有江西、安徽省义和团事。

公牍存稿

不著撰者姓名　石印本

是书记有江西省义和团事。

佚名文稿

佚名　稿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 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本文稿除首篇录罪已诏外,其余均为杂记篇章,可以反映当时上海及江南地区的 反抗运动及部分社会真实情况。

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

庾裕良著　1 册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五)义和团时期的清政府

庚子西狩上谕

1册 1900年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有关民教及农工商务水利种植各谕旨

不著编者姓名 1卷 1900年后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拳乱上谕宫门抄汇订

不著编者姓名 4册 1900年木活字排印粘贴本、抄录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拳匪之乱上谕及奏折

林少远撰 1册 1900年清抄本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拳教析疑说

劳乃宣辑编 1卷 木刻本

收嘉庆上谕、那文毅公彦成奏疏、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书前兼录光绪关于义和团上谕。

光绪庚子拳匪倡乱被灾赈捐上谕及捐款赈济案

不著编者姓名 1册 1901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光绪政要

沈桐生编 34卷 上海 崇义堂石印本 1909年

东华续录

朱寿朋编 220卷 上海 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 1910年

德宗遗事

王照口述 王树枏笔记 1911年后铅印本

崇陵传信录

恽毓鼎撰 1卷 天津《庸言》第二卷第五号 1914年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是书记载庚子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间之御前会议非常详

备。

拳时上渝

包士杰辑　1卷　北京　救世堂铅印本　1919年　收入《义和团》第4册

光绪庚子辛丑电报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见文献丛编第八、九辑（1930年十月、十一月），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辑（1936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诸辑（1937年一月至七月）。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陈宝琛等修撰　597卷　日本缩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本 1939年

有关义和团上渝

林树惠　金家瑞辑　1卷　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

（六）两宫西巡

庚子西行记事

唐晏撰　1卷　有1900年印本　又有1919年南林刘氏求恕斋丛书本

另有1967年台湾广文书局本　收入《义和团》第3册

庚子两宫蒙尘纪实

王文韶撰　1900年收入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

迎銮王公百官绅民营兵各次序清单

1折　1901、1902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辛纪事

王彦威编　4册　1900—1901年稿本　北大图书馆藏

是书记两宫西巡事甚详,后由编者之子王亮据此编为《西巡大事记》12册。

西巡大事本末记

日本吉田良太郎　清八咏楼主人同撰　1901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回銮纪事

优钵罗斋主编　1册　杭州　白话报馆刻本　1901年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西巡回銮始末记

日本吉田良太郎　清八咏楼主人同撰　6卷　1902年石印本

1906年仿泰西法石印本

程演生辑《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34册

收入1982年上海书店印行的《庚子国变记》

回銮大事记

[日]长谷川雄大郎撰　6卷　上海　三乐书屋石印本　1902年

回銮日记及杂记

[日]长谷川雄大郎撰　1卷　上海三乐书屋石印本　1902年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3册

幸生录

五知老人撰　1册　1909年初刻　1914年续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是书记慈禧偕光绪出逃事迹,为作者亲闻目睹。

四种纪略

瞿鸿禨撰　1册　北大图书馆藏 是书为圣德、僾直、恩遇、

旧闻四种纪略之合称。其中"偹直纪略"记随扈西巡事甚详备;"恩遇纪略"记随扈诸臣所得赏赐。

庚子西幸纪程

文悌编　1册　清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端忠敏公奏稿

端方撰　16卷　1918年铅印本

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口述　刘治襄记　4卷　1928年北京广华印书局铅印本

1943年上海道德书局铅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3册　1985年岳麓书社版

随扈西巡记

傅谦豫撰　1册　1928年稿本　傅耕野家藏

西巡大事记

王彦威辑　王亮编　12卷　1933年铅印本

清帝外纪　清后外传

金梁辑　合1册　铅印本　1934年　北大图书馆藏

满清外史

天嘏撰　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上海新中国图书局　1939年)第二种

慈禧太后西狩记

刘治寰著　1册　重庆　北方出版社　1943年

庚子西逃(历史小故事丛书)

穆书法　1册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9年

(七)帝国主义侵略及中外关系

双青藤馆手录本

张蔼亭编　1册　1900—1902年稿本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是书抄录天津都统衙门布告35件，其中有13件为《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所不见。

京师北堂六旬记

佚名　汇报222至227号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　1900年

京师拳祸记

安特雷撰　1篇　1900年汇报240至242号、244号、245号、247号至250号　1901年258号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手札

奕谟等　1900年手稿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收录庚子年奕谟、瑞澂熙臣三人手札四通，均叙述八国联军入侵时，京畿附近遭受蹂躏的情况。

庚子使馆被围记

[英]朴笛南姆威尔著　陈冷汰　陈诒先同译　1900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另有1916年、1917年、1919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2册

拳匪起祸李鸿章外交文件

不著编者姓名　1册　1900年抄本　国家图书馆藏

醇亲王使德始末恭纪

佚名　1册　1900年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八国联军志

日本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　1册　《拳匪纪事》卷四　1901年

收入《义和团》第3册

太行阻战记

汪宝树撰　1册　1901年后刊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选录)

议和大臣与瓦统帅问答记

1篇 见佐原笃介等辑《拳匪纪事》卷二　1901年又见青田良太郎等辑《西巡回銮始末记》　收入《义和团》第3册

洋事记册(洋事记)

嵩崑等撰　8册　1901年有抄录粘贴本　国家图书馆藏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鹿完天撰　1卷　1901年刻本　收入《义和团》第2册

庚子海外纪事

吕海寰编　4卷　上海　办理商约行辕排印本　1901年

嵩公德政碑记

韩辅国撰　1卷　1901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避难始末纪

林颦　黛玉著　1卷　巾箱本　1901年

林为当时上海名妓,客天津。此为其在津、及避难南来时之日记。对天津及沿途混乱情形,多所叙述。

庚子殉难公文

不著撰人　1卷抄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中外战纪

[法]佛甫爱加来　施米依撰　刘翘翰　程瞻洛译　2卷

1902年著易堂铅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3册

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

西村博编　2册　天津　北清印字局　1903年

沈观察燕晋弭兵记

陈守谦编　2卷 1903年上海　英商顺成书局石印本

亦见阿英编《近代外祸史》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易名为《燕晋弭兵记》

俄国侵略黑龙江地方史

[日]　山专太郎撰　湖北学报馆译　1册 武汉　湖北学报馆　1903年

晋东防军纪略

王耀焕撰　1册　1904年刊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3册

永清庚辛纪略

高绍陈撰　1卷　1908年石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1951年 收入《义和团》第1册

是书记载联军蹂躏永清县人民之事甚详。作者时为永清县令。

庚辛提牢笔记

白曾焯撰　1册　1901年刻本　1908年京华印书局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是书记述庚辛年间所逮捕中国民众与官员之情形。作者时为提牢主事。

庚子交涉隅录

程德全撰　李逊辑　1909年铅印本　1910年铅印本

1934年中华书局重印本(国学文库第十编)　国家图书馆藏

东三省交涉辑要

刘瑞麟订　孙凤翔　赵崇荫辑　12卷　常州刘氏　1910年

海龙战守事迹

依凌阿辑　6卷　奉天　惠工公司铅印本　1910年

都门识小录

蒋芷侪撰　见胡寄尘辑《清季野史》　又见成都昌福公司出版的《满清野史》　第13种　1911年

是书记有联军残杀义和团、赵舒翘赐死及清军抢掠之事。

平等阁笔记

狄葆贤撰　4卷　民国间上海有正书局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选录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是书记有北京沦陷后之情形及城内妇女惨遭联军奸淫事。

庚子京师褒恤录

裕小彭辑　王守恂编　4卷　1920年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拳时北堂围困

包士杰编　1册　1920年北京救世堂铅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庚子京师褒恤录校记

罗振玉撰　1921年排印本　1卷补1卷　北大图书馆藏

骨董琐记

邓之诚编撰　1册　1926年铅印本　又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是书记有《庚子所失法物图书》一则,详细记载联军对北京宫庙法物馆阁图书浩劫的情况。

瓦德西拳乱笔记

[德]瓦德西撰　王光祈译　1册　1928年　上海　中华书局铅印本

收入《义和团》第3册

北京的末日

[法]P·Loti著　李金发译　《前锋》杂志连载　1931年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惜阴堂笔记)

惜阴撰　人文月刊第二卷第七期　1931年　收入《义和团》第3册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王芸生辑　7卷　天津　大公报馆铅印本　1932年

1979—1982年北京三联书店重印　8卷

庚子外纪

[法]P·Loti著　允若译　正中书局　1932年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故宫博物院编　88卷　北京铅印本　1932年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辑　王亮编　242卷　北京铅印本　1932年

八国联军

储祎编　1册　上海　大众书店　1935年　(中国近百年史少年丛书1)

庚辛史料

许同莘辑　《河北月刊》第3卷第1、2、4、5、6、7、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　1936年

本书所辑史料，皆庚辛年间东南诸省督抚及驻外各使臣间往来电报，大都与东南互保有关。

日清役后支那外交史

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　1册　1937年

帝俄侵略满洲史

[苏]罗曼诺夫著　民耿译　1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年

新燕语

雷震撰　2卷　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第15种

是书下卷记有联军抢掠毁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之事。

述庵秘录

王先生撰　见《清季稗史》卷二　观《满清野史》第14种

是书记有瓦德西举行考试事。

有关"东南互保"资料

金家瑞　林树惠辑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　1951年

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

人民出版社编　1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年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著　1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年

美国侵华史料

陶菊隐辑　1册　中华书局　1951年

美帝国主义近百年来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傅健翎编　1册　河北人民　1951年

美国侵华史

卿汝楫撰　2册　三联书店　1953、1956年版

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

荣孟源著　1册　三联　1954年

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

[英]菲利普约瑟夫著　胡滨译　1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4年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王崇武译　收入《近代史资料》总第2号　1954年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

胡滨著　1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年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美]马士编著　张汇文等译　3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1960 年

是书第三卷第七至十五章集中记叙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张蓉初译 1 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年

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

[苏]福森科著 杨诗浩译 1 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58 年

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

朱士嘉辑 2 册 中华书局 1959 年

全书共 10 部分,其中第 6 部分是"美国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

[英]伯尔考维茨著 江载华等译 1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美国人在东亚

[美]丹涅特著 姚曾广译 1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孙瑞芹译 3 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

俄国人在黑龙江

[英]拉文斯坦著 陈霞飞译 陈泽宪校 1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年

沙俄侵华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 1 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俄国在远东

[俄]科罗斯托维茨著 李金秋等译 1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中国历代战争史

台湾三军大学编　18册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6年

1983年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

是书第17册第28章为"八国联军攻北京之战",并附有3幅战争地图。

远东国际关系史

[苏]茹科夫主编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首届工农兵学员译　2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年

是书第一册第四章记述义和团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沙俄侵华简编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　1册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6年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2卷4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血与火的历史—沙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的暴行

黑龙江黑河地区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合编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

[美]马洛泽莫夫著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1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7年

是书第六—七章论述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及参与同中国的联合谈判和单独谈判。

沙俄侵华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　4卷5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1990年

其中第4卷撰述义和团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资料极为详

实。

文明传播者，还是刽子手？——沙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累累罪行

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理论组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合编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年

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董果良译　3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年

八国联军在天津(义和团资料丛编)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　许逸凡等译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年

日本外交史

[日]信夫清三郎　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杨儒庚辛存稿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1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

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

黄心川著　1册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年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胡滨译　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俄国在满洲(1892—1906)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著　陶文钊等译　1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帝国主义在满洲

[苏]阿瓦林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　1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

黑龙江历史研究所编　1册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维特致西皮亚金信件

李嘉谷译　见《近代史资料》总第 43 号　1981 年

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

[俄]谢·阿·多勃隆拉沃夫著　刘秀云等译　1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年

俄中战争——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

[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著　陈芳芝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刘星显　刘海岩合译　1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3 年

八国联军目击记

[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撰　许崇信等译　1 册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俄]谢·尤·维特著　张开译　2 册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3—1985 年

是书第十三章专论义和团时期沙俄政府的远东政策。

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 00 年满洲事件纪略

[俄]B·B·戈利岑著　[俄]奇恰戈夫　沃洛钦科编辑　李述笑　田宜耕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中国近代军事史

张玉田等编著　1 册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是书第十一章记述义和团和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军事斗争。

攻克瑷珲

[俄]基尔希纳著　郝建恒译　1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沙俄与东北

佟冬主编 1册 长春 吉林文史 1985年

俄国东正教侵华史略

吴克明编著 1册 兰州 甘肃人民 1985年

八国联军侵华

马东玉 邸富生编著 1册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天津租界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册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是书记述了天津九国租界在义和团时期的变化情况。

近代中外关系史

刘培华 2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是书第七章记述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

庚辛奉天书简集

谢承仁集释 1册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本书集释了华甫氏收集的信件，其中有些信件反映了义和团时期东北地区沙俄入侵、官场动态，以及当地人民抗俄斗争活动等内容。

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二卷

丁名楠 张振鹍等著 北京 人民 1986年

是书第二章记述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和《辛丑条约》的订立。

奥中友谊史

[奥]格·卡明斯基 埃·翁特里德著 包克伦等译

1册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年

是书第八章为"义和团运动"，记述了奥匈帝国海军参与八国联军对华侵略的情况，并反映了正直欧洲人的正义感。

中国近代外交史略

顾明义　1册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年

是书第五章第三节记述义和团时期的对外关系。

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王绍坊　3册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是书第一册第七章专门论述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对外关系。

近代中国租界史稿

袁继成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8年

德国侵略山东史

王守中　1册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年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

[日]依田熹家著　卞立强等译　1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

雷远高　主编　1册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年

书中有中国军民抗击八国联军和沙俄入侵东北的章节。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

[美]孔华润著　张静尔译　1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1997年

是书第二章记述美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映。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 — 189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合编　1册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年

八国联军侵华史

李德征　苏位智　刘天路 合著　1册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年

八国联军侵华罪行录

孙宗沆　王绍文编　1册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00年

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

鲍中行著　1册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

是书第五章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

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纪实

[法]贝野罗蒂著　李金发译　1册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年

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合编　1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话说八国联军侵北京

佟更等撰　1册　天津　新蕾出版社　1990年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42—1918)

阎广耀　方生选译　1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年

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

[苏]C·S·戈列里克著　高鸿志译　1册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年

庚子闻见录:奥匈使团驻华纪实

[奥]格·卡明斯基　埃尔译·温特丽德著

申文林译　1册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年

记述义和团运动期间奥匈帝国公使团的所见所闻,使用大量档案资料。

晚清外交史

杨公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

天津档案馆编　1册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1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本书以远东国际关系为背景，叙述从1871年到1945年的中日关系历史。

中国租界史

费成康　1册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

毋忘百年国耻

邵荣昌等　2册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瓜分狂潮

房德邻　1册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年

列强在中国的租界

上海、天津等政协文史委编　1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年

近代租界

孙燕京　1册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年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黄庆华译　1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庚子蒙难

李炳清　1册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年

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大事记：1838—1971

李瀛洲编　1册　海潮　1992年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

[美]韩德著　项立岭　林勇军译　张自谋校　1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

是书论述中美特殊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对义和团时期"门户开放"政策的形成、实施和发展作了深入、系统、全面的论述。

永不满足的扩张野心：沙俄侵华纪实（毋忘国耻历史丛书）

鲁瑜编著　1册　北京　中国华侨　1993年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

赵培吉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

中国近代外交史

赵佳楹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年

20世纪的中英关系

萨本仁　潘兴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天津通志(附志·租界)

天津地方志编　1册　天津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1996年

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

胡礼忠等　1册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是书第四章记述列强的瓜分与"保全"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王晓秋　1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

是书第二编第四章论述义和团运动在日本的反响。

近代国际关系史纲

杨闯　1册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

是书第七章记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与义和团运动。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丁山辑　见《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

(八)辛丑条约

回銮纪事

优钵罗斋主编　1册　杭州白话报馆刻本　1901年

是书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之一为《和约全稿》,收入《义和团》第4册

辛丑各国和约文件

1册　上海寓公校印铅印本　1902年

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

王振声编　1册　通州王氏铅印本　1902年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十九省筹还赔款表

韩国钧编　1册　1903年刻本

庚子赔款分年应还本息数目清册

4册　抄本　1904年造册　北大图书馆藏

辛丑各国和约

1册　清刻本

庚辛筹办善后各案专档目录　辛丑议约专档目录

清总理衙门编　5册　抄本　国家图书馆藏

光绪条约

裴维钧等编　16册　北平　外交部印刷所　1915年

中法实业银行复业既各公使要求庚子赔款用金付给全案

不著编者姓名　民国年间铅印本

庚子赔款问题

雷殷撰　1册　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铅印本(表列数字至1937年)　民国年间　国家图书馆藏

对法赔款之金纸法郎问题(经济类钞 第1辑)

银行周报编　41页　上海　编者刊　1923年　国家图书馆藏

关于以庚子赔款维持中法实业银行复业并协定

十六款用金佛郎偿还案国务院抄送各文件　330页　1923年　国家图书馆藏

金佛郎问题

雷殷编　116页　编者刊　1924年后出版　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藏

金佛郎案痛史

陈曾亮著　114 页　著者刊　1925 年　上海图书馆藏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

徐仲迪等撰　1 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1925 年

金案检举汇刊

翁敬堂编　67 页　1926 年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研究各国变更庚款办法意定书

财政讨论会编　200 页　编者刊　1927 年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九七纪念册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　35 页　编者刊　1928 年　国家图书馆藏

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签订辛丑条约 27 周年纪念)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　32 页　杭州　编者刊　1928 年　国家图书馆藏

辛丑条约国耻纪念特刊(签订辛丑条约二十八周年)

徐意庐等著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　48 页　1929 年　国家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

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

陈功甫编　1 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1 版　1933 年 2 版

解决中英庚款换文(欧美第 6 号)

中华民国国政府外交部编　22 页　南京　编者刊　1930 年　国家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年刊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事务所编　123 页　南京　编者刊　1931 年　国家图书馆藏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半年刊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事务所编　248 页　南京　编者刊　1932 年 6 月　国家图书馆藏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半年刊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事务所编　138 页　南京　编者刊　1932 年 12 月　国家图书馆藏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半年刊(第 5 期)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事务所编　115 页　南京　编者刊　1933 年 10 月　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以来中央财政与庚子赔款的关系(讲演稿)

杨汝梅　30 页　1933 年　(中国计政学会丛书)　国家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

解决中荷庚款换文(白皮书第 27 号)

中华民国国政府外交部编　23 页　南京　编者刊　1933 年　国家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

义庚款余额协定及其关系文件

(所见书残缺　出版项不详)　93 页　国家图书馆藏

中外条约汇编

于能模等编　1 册　上海　商务图书馆　1936 年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主编　1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

出卖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秘史

徐庆全著　1 册　北京　光明日报　1996 年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真

李文海、匡继先主编　2 册(上、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

李济琛　陈加林主编　1册　成都　四川人民　1997年

近代中外条约选析

牛创平、牛冀青编著　1册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年

（九）人物研究

（列传在前；单个人物在后，按姓氏笔划排列）

畿南济变纪略

刘春堂撰　1册　1901年刘氏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内记文武官员、绅士、教士等16传记。

光宣金载

魏元旷撰　1卷　清刻本　《潜园二十四种》单行本

内记慈禧、光绪、珍妃、庆王、荣禄、那桐、李鸿章、王文韶等事。

续碑传集

缪荃孙撰　86卷　金陵　江楚编译局刊校　1910年编成

内有徐用仪、刘坤一、宋庆等人碑传。

公呈浙抚褒建三忠词稿

王式通撰　1册　1911年　铅印本

稿文中记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人事迹。

春冰室野乘

李孟符、岳端撰　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　1911年

节录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

内记徐用仪、立山、联元、许景澄、王文韶等事。

清外史

古靁后人(菖斋)撰　1册　上海　五洲书局铅印本　1914年

内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奏稿。

清代轶闻

裘毓麟编　10卷　上海　中华书局　1915年　后有多版

内有徐用仪、袁昶、许景澄、立山、联元、珍妃等事。

一山文存

章梫撰　12卷　刘氏嘉业堂刊　1918年中国社科院　近代史所藏

内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王文韶等事。

清史稿

柯绍忞等纂修529卷　北京　初印本　1927年　后有多种版本

内有清政府多人列传

碑传集补

闵尔昌纂录　60卷　北平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行　1932年

内有王文韶、许景澄、董福祥、聂士成、王懿荣等人碑传。

华胥漫录

王小隐撰　人文月刊四卷六期　1933年　北大图书馆藏

内记袁世凯、端王、王文敏等事。

趋庭随笔

江庸撰　1册　1934年北京印书局铅印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节录)

内有荣禄与张怀芝事迹等。

奴才小史

老史撰　1卷　见《满清稗史》第4种

是书涉及裕禄、荣禄、增祺、鹿传霖、端方、李莲英等人。

贪官污吏传

老吏撰　见《满清稗史》第4种，又见《满清野史》第17种

内有与义和团有关人物如刚毅等。

所闻录

苏民撰　1卷　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第14种，又见成都昌福公司印行的《满清野史》第18种

内记刚毅、崇礼、毓贤及义和团未能攻入使馆之故等事。

晚清祸乱稗史

徐珂编　2卷　见阿英辑《近代外祸史》（上海潮锋出版社1947年）

内有聂士成、袁昶、罗荣光、联元、寿富、王懿荣、李秉衡、郑道湜等事。

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义和团资料丛编）

[英]特雷费—罗珀著　胡滨　吴乃华合译　1册　济南齐鲁书社　1986年

光绪秘记

德龄女士撰　1946年　上海三民图书公司铅印本

庆亲王外传

见胡寄尘辑《清季野史》，又见成都昌福公司辑《满清野史》第16种

刘忠诚公遗集

刘坤一撰　63卷　1909年刊本　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

吏部左侍郎许公墓志铭

俞樾撰　见俞樾《春在堂全书》（1902年重订补刊本）又见冈尔昌辑《碑传集补》　卷五（1931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许文肃公遗集

许景澄撰　21卷　北京　外交部图书处铅印本　1918年

清代名人轶事

葛虚存编　1册　上海　会文堂书局　1928年

内有许景澄专篇。

韧叟老人自订年谱

劳乃宣撰　1册　1922年铅印本

1982年将其有关义和团部分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撰　吴汝纶编　165卷　1905年金陵刊本　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书合肥轶闻

惜阴撰　人文月刊三卷七期　上海人文编辑所出版　1932年　北大图书馆藏

李鸿章全集(电稿　奏稿　函稿)

顾廷龙　叶亚廉主编　上海　人民出版社　从1985年陆续出版

庚子从军日记

迟程九口述　孙星枢撰　载于1935年11月12日及26日天津《益世报》副刊《史学》

1964年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是书记载宋庆在山海关和唐山一带保护洋人，而又在京津抗御八国联军等情况。

启公事略

颜札氏撰　1卷　1901年后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张文襄公自述

罗惇曧撰《庸言》第一卷第二号　北大图书馆藏

抱冰堂弟子记

1卷　见张文襄公全集

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撰　229卷　1928年新城王氏刊本

张之洞年谱(原题《张文襄公年谱》)

胡钧编　1册　1939年北京天华印书馆排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节录)

张季子九录

张謇撰　张怡祖编　1931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周悫慎公全集

周馥撰　36册　秋浦周氏石印本　1922年

1982年将其年谱有关义和团部分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说元室述闻

1卷　见《名家小说》中卷　192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内记珍妃轶事。

珍妃专号(故宫周刊三十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　1930年

珍妃之悲剧

白蕉撰　人文月刊六卷六、七期　1935年八、九月　北大图书馆藏

赵慎斋年谱

王步瀛编　1924年长安赵氏铅印本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节录)

慎斋文集

赵舒翘撰　王步瀛编　10卷　别集4卷　长安赵氏铅印本　1924年

荣禄存札

杜春和等编　1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年

俞廉三遗集

俞廉山撰　108卷36册　传抄本

容庵弟子记

沈祖宪　吴闿生合编　4卷　1913年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上册(选录)

内记袁世凯巡抚山东剿灭义和团事。

袁世凯奏议

廖一中　罗真容整理　3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

是书包括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奏议。

一代枭雄——袁世凯

廖一中著　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

是书第六章论述袁世凯在义和团时期的活动。

袁太常奏稿

袁昶撰　1册　1900年后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4册

复堂文续

谭献撰　5卷　1901年刻鸱斋刊本　北大图书馆藏

是书卷五有关于袁昶的材料

太常袁公行略

袁允橚等编　1905年石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袁京卿请剿拳匪奏疏遗墨

1册　清石刻本

记袁磎秋先生轶事

沈惟贤撰　人文月刊三卷九期　1932年　北大图书馆藏

袁忠节公事迹

佚名　人文月刊七卷九期　1936年

袁忠节公手札

袁昶撰　袁荣叟编　2册　长沙　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940年　北大图书馆藏

唐才常和自立军

皮明麻著　1册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愚斋存稿

盛宣怀撰　100卷　思补楼藏版　1916年后刊印

意诚公遗稿

贺金声撰　3卷　1910年贺氏家刻

是书为研究贺金声生平、思想及其领导起义的珍贵资料。

慈禧写照记

[美]卡尔女士撰　陈霆锐译　191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赛金花本事

刘半农　高鸿逵合撰　1册　1934年北京星云堂书店铅印本

1939年上海新生书屋更名为《赛金花纪念遗事》翻印

灵飞集

张次溪编　1册　天津书局铅印本　1939年

是书专记赛金花事，其中颇有涉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者。

赛金花纪念遗事

赵灵飞述　1册　上海　新生书店铅印本　1939年

(十)文艺作品

庚子事变文学集

阿英编　2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诗词、歌曲

两宫回銮善后事宜国民义务律例歌

佚名　1册　1901年后木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时事志略

洪寿山撰　1册　1901年抄本　国家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1册

庚子纪念图

乌木山僧等编　1卷　1901年

收图1幅、题诗40余首，另有叙、记、跋等。

长安宫词

胡延撰　1卷　1902年刻本　又见雷辑《清人说荟初集二十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1939年邓氏五石斋印《旧闻零拾》本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都门纪事诗

延清撰　6卷　卷首1卷补1卷　1902年京江刊本　1911年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国变弹词

李宝嘉(伯元)撰　40卷　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本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重印本

雁影斋诗存

李希圣撰　1卷　1905年刻本　北大图书馆藏

春坡梦传奇

支碧湖撰　4册　1906年活字版本　北大图书馆藏

驴背集

胡思敬(退庐居士)撰4卷　1908年印本

1913年南昌胡氏问影楼刻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2册

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

富察敦崇礼臣氏撰　1册　1908年刻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袁忠节公遗诗

袁昶撰　1册　1909年上海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秋词

王鹏运(半塘僧鹜)朱古微　刘伯崇合撰　2卷　光绪年间刻本　有正书局石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清宫词

吴士鉴撰　1卷　1912年铅印本　1936年铅印本

王王秋诗抄

王鹏运撰　1卷　上海进步书局铅印本《十大家诗抄》第1册　1915年　北大图书馆藏

后彩云曲

樊增祥撰　1篇　见裘毓麟编《清代轶闻》　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卷十

都门纪变百咏

复依氏　杞庐氏合撰　见雷瑨辑《清人说荟初集二十种》　1917年石印本

金銮琐记

高树撰　1925年石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1982年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选录)

清华集

汪诗侬编　2卷　见成都昌福公司印行之《满清野史》第19种,又见陆保璇编《满清稗史》第18种　另见1987—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之《清代野史》

庚子诗鉴

郭则沄(龙顾山人)撰　5卷　1940年蛰园刻本　1982年收

入《义和团史料》上册

庚子事变纪事诗

汪声玲撰　1册(折装)稿本(律诗三首,诗注有史料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

庚子都门秋感(10首)

臧史氏撰　1册　石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樊樊山诗抄

樊增祥撰　1卷　见《十大家诗抄》第2册　北大图书馆藏

义和团歌谣

刘崇丰编　上海　文艺出版社　1960年

小说、剧本、故事集

武陵奇传奇

陈季衡撰　1册　1901年抄本　国家图书馆藏

救劫传

艮庐居士著　12回　《杭州白话报》第2—31期　1901—1902年　另有杭州白话报馆3卷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内容在小说与散记之间,演庚子事变前后经过。

禽海石

符霖著　10回　群学社出版　1906年

本书是以庚子为背景之小说,但叙述事变处极少。

铸错记

伤心人著　8回　《新世界小说社报》连载　1907年

本书演衢州教案及杀西安令吴德潇事。

白话痛史

杭填修著　4卷　杭州　浙江白话新报馆　1910年

剑腥录(又名《京华碧血录》)

林纾(冷红生)撰　1913年北京平报社铅印本

1923 及 192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改名《京华碧血录》

端王

佚名　1 册　民国初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蜀鹃啼传奇

林纾撰　1 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7 年

恨海

吴趼人(我佛山人)撰　上海竞智图书馆铅印本　1931 年

赛金花

1 册　北平　戏曲出版社编印本　1936 年

赛金花纪念遗事

杜君谋编　1 册　上海　千秋出版社铅印本　1936 年

赛金花

熊佛西撰　1 册　1937 年北平实报社铅印本　1941 年重庆华中图书公司铅印本

赛金花

张次溪撰　1 册　天津书局铅印本　1939 年

义和团

齐壹撰　北平新民印书馆铅印本　1944 年

慈禧西幸记:一、山雨欲来风满楼;二、日暮乡关何处是

陈澄之撰　2 册　1948 年上海百新书店铅印本　1960 年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铅印本

邻女语

忧患余生著　1 册　上海　文化出版社　1957 年

续孽海花

燕古老人(张隐南)撰　翟兑之校订　2 册　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

义和团

高云阶等　《剧本》1960 年 7 期

义和团故事(44篇)

河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　1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

火烧望海楼(京剧)

来新夏　张文轩　《河北戏曲丛书》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60年

张绍桓包打西什库(义和团传说故事)

张士杰辑　1册　上海　文艺出版社　1960年

义和团的志气永不灭(故事80篇)

河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　1册　天津　百花出版社　1961年

义和拳

冯骥才　李定兴著　2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

义和团的故事

扬州师院中文系编　1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8年

庚子风云

鲍昌　2册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

朱红灯传奇

焦力军　于振声著　1册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年

血祭大沽口(8集电视剧)

许瑞生　天津电视台拍摄录制

巾帼遗恨

焦力军　于振声著　1册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3年

八国联军——告别世纪末的沉思

张超著　1册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5年

八国联军侵华纪实

孙其海著　1册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6年

流放紫禁城（庚子国变）

张建伟著　1册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97年

是书共九章40万字，为全面反映庚子国变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刻划出慈禧、荣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一系列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义和团演义

魏文华著　1册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铁血百年祭

孙其海著　1册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0年

是书以历史纪实文学的形势反映八国联军侵华史实，为1996年华文出版社《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一书的再版。

洋人进京　洋人回国　太后回国

1册　坊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赛金花故事

洪渊撰　1册　时代图书公司铅印本

图　集

京津救济善会图说

孙乐园辑　1册　1900年后石印本

北京事变写真帖

[日]永田龟编　1册　日本第五师团司令部影印本　1901年

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义和团战争全图

佚名　2册　影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庚子辛亥忠烈像赞

冯恕撰　2册　1934年珂罗版影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义和团通俗画史

方诗铭等　上海　四联出版社　1954年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图

地图出版社历史图编绘室编绘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58年

义和团图

地图出版社历史图编绘室编绘　1册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58年

(十一)其他

救济文牍

中国救济善会编　1907年苏省刷印局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津西琐记

柳溪子撰　2册　1902年铅印本　北大图书馆藏　收入《义和团》第2册

庚子赴行在日记

吴庆坻撰　1册　光绪年间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藏

救济日记

陆树藩撰　1册　1901年上海石印本　1907年　江苏省印刷局铅印本

亦见佐原笃介等编《拳匪纪事》第6卷　国家图书馆藏

有关义和团舆论

王其榘辑　2卷　收入《义和团》第4册

庚子之际月表

王延剑编　1册　京华印书局铅印本　1907年

拳变系日要录

陈陆编　1941年刊载于《中和月刊》第2卷第1、2期

自立会史料集

杜迈之等辑　1册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年

三　台湾、香港地区研究论著目录

杜继东

(一)论文

义和团的悲剧　徐亮之

《民主评论》第2卷第16期(1951年2月)。

清德宗实录本纪的正本　吴相湘

《大陆杂志》第2卷第12期(1951年6月),又见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故宫藏拳乱史料注释(摘要)　吴相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北,1951年12月,又见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永远难忘的一页血史——俄寇血洗江东六十四屯(一)　韩燝

《反攻》第66期(1952年8月)。

永远难忘的一页血史——俄寇血洗江东六十四屯(二)　韩燝

《反攻》第67期(1952年9月)。

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与黑龙江上的悲剧　曾庆裕

《新思潮》第32期(1953年12月)。

拳匪之乱冀省东南教区致命人数一览表　刘缊逊

《恒毅》第4卷第10期(1955年5月)。

辛丑条约第七款实行之经过　曹宗儒

《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7册，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

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上) 沈忱农

《反攻》第169期(1956年12月)。

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下) HTSS‖沈忱农

《反攻》第170期(1956年12月)。

晚清宫廷政治与义和团事件(上) 沈云龙

《民主评论》第8卷第21期(1957年11月)。

晚清宫廷政治与义和团事件(下) 沈云龙

《民主评论》第8卷第22期(1957年11月)。

晚清宫廷政治与义和团事件 沈云龙

《新铎声》第16期(1958年3月)。

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戴玄之

《大陆杂志》第19卷第12期(1959年12月)。

清季山东之教案与拳乱 李守孔

《幼狮学报》第3卷第2期(1961年4月)。

八国联军期间慈禧归政德宗之交涉(上) 李守孔

《大陆杂志》第23卷第7期(1961年10月)。

八国联军期间慈禧归政德宗之交涉(下) 李守孔

《大陆杂志》第23卷第8期(1961年10月)。

义和团变乱始末 李士华

《台大青年》第3期(1961年5月)。

义和团的本质 戴玄之

《大陆杂志》第24卷第1期(1962年1月)。

庚子衢州教案与吴德 沈云龙

《新时代》第2卷第7期(1962年7月)。

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考 戴玄之

《大陆杂志》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

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上) 王尔敏

《大陆杂志》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

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 王尔敏

《大陆杂志》第25卷第4期(1962年8月)。

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之一) 王尔敏

《大陆杂志》第25卷第5期(1962年9月)。

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下) 王尔敏

《大陆杂志》第25卷第6期(1962年9月)。

庚子拳乱与廷臣谬论 耘农

《中央日报》,1962年9月12日。

清季教案总考 宫川尚志

《亚洲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台北,1962年。

庚子拳乱的一页直接史料

《大陆杂志》第26卷第4期(1963年2月)。

义和团的变质(上) 戴玄之

《大陆杂志》第26卷第11期(1963年6月)。

义和团的变质(下) 戴玄之

《大陆杂志》第26卷第12期(1963年6月)。

辛丑议和中"叩头"与"坐轿"之事 吴蕤

《畅流》第28卷第2期(1963年9月)。

庚子轶事 董作宾

《平庐文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年版。

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之研究 林明德

《幼狮学志》第3卷第1期(1964年1月)。

许(景澄)袁(昶)三疏真伪辨 戴玄之

《大陆杂志》第28卷第3期(1964年2月)。

庚子议和中的惩凶问题(上) 吴蕤

《畅流》第31卷第7期(1965年5月)。

庚子议和中的惩凶问题(中) 吴蕤

《畅流》第31卷第8期(1965年6月)。

庚子议和中的惩凶问题(下) 吴薇

《畅流》第31卷第9期(1965年7月)。

义和团面面观 曾祥铎

《大学论坛》第20期(1967年6月)。

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一) 李恩涵

《大陆杂志》第35卷第3期(1967年8月)。

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二) 李恩涵

《大陆杂志》第35卷第4期(1967年8月)。

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三) 李恩涵

《大陆杂志》第35卷第5期(1967年9月)。

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四) 李恩涵

《大陆杂志》第35卷第6期(1967年9月)。

庚子教案始末 杨森富

《景风》第15期(1967年12月)。

庚子教案始末(续完) 杨森富

《景风》第16期(1968年3月)。

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 曾祥铎

《史绎》第5期(1968年5月)。

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光绪二十四年余栋臣事件 吕实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台北,1969年。

周汉反教案(1890—1898) 吕实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台北,1970年。

庚子年中俄东三省撤兵交涉经过 杨绍震

《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1971年5月。

重庆教案 吕实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下册,台北,1972年。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1860－1898） 吕实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台北，1973年。

辛丑回銮琐志（附志李丕之：辛丑回銮琐志补遗） 徐一士

《一士胜稿》，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

晚清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义理的辟斥（1860——1898） 吕实强

《师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2期。

德使克林德在庚子拳乱中被杀害的事实与传闻 王蜀黍

《史学会刊》第3期（1974年6月）。

美国与清代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 吴慧美

《史学会刊》第13期（1975年1月）。

八国联军侵华史话 罗云家

《艺文志》第113期（1975年2月）。

晚清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 吕实强

《师大历史学报》1975年第3期。

荣禄与武卫军 刘凤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台北。

慈禧后与赛金花 萧萧

《今日生活》第128期（1977年5月）。

从国际政治观点看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笠原正明著 张胜彦译

《史学会刊》第6期（1977年6月）。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的检讨 吕实强 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版。

清代教案史料的搜集与编纂 庄吉发

《幼狮月刊》第47卷第2期（1978年2月）。

清季山东地区的中外交涉 张玉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台北。

庚子拳乱时八国联军同床异梦——列强各有打算面和心不合相互矛盾多 钱袖烟

《春秋》第544期(1980年3月)。

清季民教冲突之分析 许文雯

《马公高中学报》第1期(1982年1月)。

清代义和拳源流考 庄吉发

《大陆杂志》第65卷第6期(1982年12月)。

王树槐著《庚子赔款》 何汉威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3卷(1982年)

八国联军俄军进攻依兰经过之探讨 汪仙陵

《满族文化》第7期(1984年9月)。

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役：瓦德西进驻皇宫的当时 簾外风

《春秋》第663期(1985年2月)

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几点初步观察：赫德中国问题论集译序 邝兆江

《大陆杂志》第70卷第2期(1985年2月)。

赫德著《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一) 邝兆江译

《大陆杂志》第70卷第2期(1985年2月)。

赫德著《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二) 邝兆江译

《大陆杂志》第70卷第3期(1985年3月)。

赫德著《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三) 邝兆江译

《大陆杂志》第70卷第4期(1985年4月)。

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传教活动及川人的反应(1860—1911) 吕实强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4)·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 李恩涵

《清华学报》第6卷第1、2期合刊,1967年6月,又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4)·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光绪二十一年成都等处教案 张秋雯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4)·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清季福建教案论述 林文慧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5期(1983年5月),又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4)·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清季江苏省的教案 王树槐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4)·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山东义和拳控案始末 唐瑞裕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5期(1986年5月)。

盛宣怀与东南互保 戴玄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光绪己亥建储与庚子兵衅 李守孔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 吴文星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德国与庚子拳乱 张水木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出兵华北 吴文星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民国时期的庚子赔款 王树槐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庚子地方赔款 王树槐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拳乱期间联军的抢掠行为 王树槐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反应(1899－1906) 张忠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4)·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美国在华之政策 万异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4)·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束 杨绍震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5)·清季对外交涉(二)俄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拳乱后中俄交收东三省问题(1900－1902) 黄俊彦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5)·清季对外交涉(二)俄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历史的结构主义解读——对义和团史学的反省 陈光中

《思与言》第24卷第6期(1987年3月)。

清代民间宗教的源流及其社会功能 庄吉发

《大陆杂志》第80卷第2期(1991年2月)。

清季孔孟之乡的民教冲突 赵树好

《山东文献》第21卷第4期(1996年3月)。

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 张鸣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季卷

山东天主教传教史略 李云泉译

《山东文献》第22卷第1期(1996年6月)。

门户开放政策形成的再探讨 郑翔贵

《二十一世纪》第35期(1996年6月)。

百年来的中俄关系——从"中俄密约"谈起 吴相湘

《历史》(月刊)第102期(1996年7月)。

义和团在胶东 宋玉娥 吕伟达

《山东文献》第22卷第3期(1996年12月)。

晚清曹州府的教案 赵润生、赵树好

《山东文献》第23卷第4期(1998年)。

中研院近史所藏中英庚款会档案简介 周 环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

从人类学观点看义和团 柯文(Paul A. Cohen)

《二十一世纪》第45期(1998年)。

庚子拳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看法 张忠栋

《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1期(年份不详)。

1953年至1992年来台湾各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共有博士论文50篇,硕士论文550篇,其中没有一篇以义和团运动为题的博士论文,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硕士论文也不多,列举如下:

拳乱前后袁世凯的处变 台湾大学 班一鲁(指导教授李守孔),1972年6月。

张之洞在拳乱期间之地位 东海大学 林松友(指导教授吕士朋),1978年4月。

清季直隶教务与拳乱 文化大学 曹中平(指导教授李守孔),1980年7月。

山东义和团之研究 政治大学 陈德汉(指导教授戴玄之),1986年6月。

香港只有一篇:

庚子拳乱期间东南督抚之态度 香港大学 郑葆冲(指导教授黄显康),1980年。

(二)著 作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非卖品),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印行,1967年和1993年再版。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16辑),台北,1966年。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

蔡建伟:**异教侵华史论**,台北,文心出版社,1973年。

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31辑),台北,1974年。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陈世昌:**中国与门户开放——清末民初外患史**,台湾海国书局,1977年。

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77 年版。

刘凤翰：**武卫军**，台北，1978 年版。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78 年版。

李守礼：**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79 年。

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邵玉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 1980 年版。

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 1981 年版。

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赵仁芳编著：**基督教侵华阴谋**，台北，传富实业公司 1990 年版。

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论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3 年版。

唐瑞裕：**清季天津教案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 年版。

(三)史　料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共 26 辑)，故宫博物院 1963－1965 年印行。

伍铨萃：北游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七年四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66 年影印。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影印。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台北，广文书局 1996 年版。

唐晏：**庚子西行记**，台北，广文书局 1967 年版。

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5 辑(4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影印。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陆睦：**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4 辑(335－33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影印。

《拳案三种》，台联国风出版社 1970 年版。

程宗裕：**教案奏议汇编**，台北，国风出版社 1970 年版。

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陈捷：**《义和团运动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5 辑(643－644)，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陈贻先、陈冷汰译：**庚子使馆被围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74 辑(732)，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74 辑(733)，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佐原笃介和沤隐：**拳匪纪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3 辑(822)，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3 辑(823)，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高绍陈：**永清庚辛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3 辑(824)，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3 辑(825)，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林学璈辑：**直东剿匪电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3 辑(826)，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咏楼主人编：**西巡回銮始末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3 辑(827)，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年份不详)。

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3 辑(127)，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5 年影印。

义和团档案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37 辑(361),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 年影印。

劳乃宣辑,蒋楷、刘春堂撰:**奉禁义和拳汇录 平原拳匪纪略 畿南济变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37 辑(362 – 364),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 年影印。

白曾焯著、左舜生辑:**庚辛提牢笔记 庚子拳乱资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37 辑(365 – 36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 年影印。

王守恂:**庚子京师褒恤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37 辑(367),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 年影印。

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义和团文献汇编**,台北,鼎文书局 1973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共 7 辑 21 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1974 – 1981 年印行)。

高枏:**庚子记事**,台湾学生书局 1976 年影印。

也愚:**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 18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第二编　外文论著目录

一　英　文

[德]R.G.狄德满

Allen, Roland, "Of Some of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eign Legations", *The Cornhill Magazine* n.s. 9 (December 1900), pp. 754 – 776.

Also in *Living Age* 228 (5 January 1901), pp. 26 – 41.

艾伦,R.:"关于外国使馆幸存的几点原因"

Allen, Roland, "Of Some of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the Siege of the Foreign Legations at Peking", *The Cornhill Magazine* n.s. 9 (November 1900), pp. 669 – 680.

同上:"关于北京使馆被围的几点原因"

Allen, Roland, "Of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Which May Be Drawn from the Siege of the Foreign Legations in Peking", *The Cornhill Magazine* n.s. 10 (February 1901), pp. 202 – 212.

同上:"从北京使馆被围得出的几点结论"

Allen, Roland,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London: Smith, Elder, 1901. x + 304 pp.

Roland Allen (1868 – 1947) was an Anglican missionary pries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Beijing during the siege and had been acting chaplain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同上: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艾伦(1868－1947),北京被围时任英国国教布道总会驻北京传教士,并任使馆随从教士。

Ament, William Scott , "A Bishop's Loot", *Independent* 53 (New York, 19 September 1901), pp. 2217－2218.

梅威良:"一位主教的劫掠"

Ament, William Scott , "Charges Against the Missionaries", *Independent* 53 (New York, 9 May 1901), pp. 1051－1052.

同上:"对传教士的非难"

Ament, William Scott ,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nce More", *Independent* 53 (12 September 1901), pp. 2147－2149.

同上:"中国问题的解决"

The American Troops in Peking. By an American soldier. Shanghai, 1901.

美军在北京

[Anderson, Emma] , '*Persecuted but not Forsaken*',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Journey of Three Swedish Missionaries from Ho－nan to the Coast*. Written by One of Themselves.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1]. 30 pp.

Concerns Misses Emma Anderson, Maria Pettersson and Sigrid Engström.

[安德森,E.]:未被遗弃的受迫害者

关于E.安德森,M.彼德逊和S.恩丝罗姆小姐

Angell, James Burrill , "The Crisis in China", *Atlantic Monthly* 86 (October 1900), pp. 433－437.

安吉立:"中国危机"

[Argento, Alphonso], '*In Perils by the Heathen*', *Being the Account of Mr. Argento's Flight from Ho - nan, told by himself*.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1]. 31 pp

[阿吉托, A.]: **"异教之祸",阿吉托逃离河南口述**

Ashmore, William, "The Troubles in China and Christian Missions", *Chinese Recorder* 34 (1903), pp. 78 - 82.

耶士谟: **"中国动乱与基督教会"**

Aspinall - Oglander, Cecil Faber, *Roger Keyes: Being the Biography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Keyes of Zeebrugge and Dover*, G.C.B., K.C.V.O., C.M.G., D.S.O.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1. xv + 478 pp.

Roger John Brownlow Keyes, Baron, 1872 - 1945.

艾斯宾诺奥格兰德, C.F.: **基斯勋爵传记**

Atkinson, James J., *Australian Contingents to the China Field Force*, 1900 - 1901.

Kensington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Military Historical Society, 1976. 69 pp.

艾特金森, J.J.: **中国战场上的澳大利亚分队**

Atwood, I. J., "Triumphal Reëntrance of Shansi", *Missionary Review* 24 (December 1901), pp. 832 - 834.

艾特伍德, I.J.: **"再入山西的胜利"**

Babcock, Maltbie D., *A Day of Testing. What Shall It Bring Out in Us?* Address delivered at Memorial Service for Martyred Missionaries in China, Fif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 New York, Oct. 28th 1900. (Leaflet No. 4.).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6 pp.

柏考克, M.D.: **一天的考验,我们懂得了什么?**

Barnes, A. A. S. [Arthur Alison Stuart],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2. xv + 225 pp. 2nd ed., rev. & enl.,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2. xvi + 282 pp.

A campaign account of the (British) First Chinese Regiment from Weihaiwei, Shandong

巴恩斯,A.A.S.:赴华第一军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1900.3-10)

Bastid-Bruguière, Marianne, "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35-602.

巴斯蒂德-布鲁吉尔,M.:"社会变化趋势"

Beach, Harlan P. (Rev.), "The Anti-Foreign Uprising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13 (September 1900).

毕海澜(评):"中国的反外起义"

Beals, Z. Charles [Zephaniah Charles], *China and the Boxer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oxer Outbreak, with Two Chapters on the Sufferings of Missionaries and a Closing One on the Outlook*. New York: M. E. Munson, [1901]. 158 pp.

比尔斯,Z.C.:中国与义和团:义和团简史

Beckmann, Johannes, "Martyrs in Heilungkiang", *Bethlehem* [English] 31 (Immensee 1926), pp. 303-306.

贝尔曼,J.:"黑龙江殉教者"

Bellairs, Carly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Rulers for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1 (1900), pp. 158-170.

贝尔莱尔斯,C.:"统治者对中国暴乱的责任"

Benjamin, A. N., "Peking on the Eve of Anarchy", *The Outlook* 65 (14 July 1900), pp. 638 - 640.

本杰明,A.N.:"混乱前夕的北京"

Bentley, W. P., *Illustrious Chinese Christians. Biographical Sketches*. Cincinnati, OH: The Standard Publishing Company, 1906. 284 pp.

Includes biographi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who suffered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本特利,W.P.:出色的中国教徒(简介)

Bigelow, Poultney, "Missions and Missionaries in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1 (July 1900), pp. 26 - 40.

比奇洛,P.:"在华差会与传教士"

Bigham, Clive, *A Year in China*, 1899 - 1900. London: Macmillan, 1901. xii + 234 pp.

Charles Clive Bigham (later Viscount Mersey) was a British traveller in China who accompanied the Seymour Expedition.

碧阁衔:在华一年记,1899 - 1900

碧阁衔(后来的莫西子爵)曾随行西摩在华行动

Bland, John Otway Percy, and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 Compiled from State Papers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1. xv + 525 pp. Reprinted Taibei, 1970.

New and revised cheaper edi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4]. xxvi + 322 pp.

Rev. ed., Beijing: H. Vetch, 1939. xxvi + 525 pp.

濮兰德与巴克斯:慈禧外纪

Bodin, Lynn E., *The Boxer Rebellion*. Colour Plates by Chris[topher] Warner. (Men – at – Arms Series, 95). London: Osprey, 1979. 40 pp.

博丹, L.E.: 义和团运动

Bonsal, Stephe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Monthly Review of Reviews* 22.2 (August 1900), pp. 166 – 175

邦索尔, S.: "中国革命"

Bornemann, Fritz, *As Wine Poured Out: Blessed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Missionary in China* 1879 – 1908. Trans. by John Vogelsang. Rom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1984. 485 pp.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ut without the copious footnotes and appendices.

博尼曼, F.: 神圣的福若瑟: 1879 – 1908 年的在华传教士

译自德文

Boulger, Demetrius C., "Peking – and After", *Fortnightly Review* 74 (August 1900), pp. 198 – 207.

布尔杰, D.C.: "北京事件及其余波"

"Boxers and What to Do with China",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78 (September 1900), pp. 305 – 317

"义和团以及拿中国怎么办"

Braisted, William 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 – 1909.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8.

See pp. 75 – 114 for a survey of the U.S. Navy's role during the Boxer episode.

布雷斯特德, W.R.: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897 – 1909)

美国海军在义和团事件中的行动见 P.75 – P.114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China and the Missionaries", *Independent* 53 (New York, 14 March 1901),

pp. 605 – 608.

班德:"中国与传教士"

Brandt, Nat , *Massacre in Shansi*.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xiv + 336 pp

勃兰特, N.:山西大屠杀

Broomhall, Marshall (ed.) , *Last Letters and Further Records of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1. 106 pp.

海思波(编):中国内地会殉难教士绝笔以及其它资料

Broomhall, Marshall (ed.) ,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ith a Record of the Perils and Sufferings of Some Who* Escaped.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1. 354 pp.

同上(编):中国内地会殉难教士录

Brown, Arthur Judson , *Report of a Visitation of the China Missions, May* 22 – *Sept*. 19, 1901. 3rd ed.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1902.

布朗, A. J.:1901 年 3 月 22 日 – 9 月 19 日中国教会实访录

Brown, Fred R. , *History of the Ninth U. S. Infantry*, 1799 – 1909. Chicago: R. R. Donnelley & Sons Co., 1909. xiii + 842 pp. The relief of the Beijing legations in covered on pp. 452 – 498.

布朗, F. R.:美国第九步兵团史, 1799 – 1909

Brown, Frederick (Rev.), '*Boxer*' *and Other China Memories*. London: A. H. Stockwell, 1936. 141 pp

宝复礼(评):"义和团"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记忆

Brown, Frederick (Rev.) , *China's Dayspring after Thirty Years*. With forewords by the late Sir Robert Hart and Rev. F. B. [Frederick Brotherton] Meyer. London: Murray and Evenden, [1914?]. 263 pp

同上:三十年后中国之觉醒

Brown, Frederick (Rev.), *The Chinese Christians under Fire*. Leicester: The Author, 51 St. Peter's Road, [1901?].

同上:炮火下的中国基督徒

Brown, Frederick (Rev.), *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 London: C. H. Kelly, 1902. 126 pp.

同上:八国联军津京行军随行记

Bruce, J. Percy, "Massacre of 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ies and Others in Shansi", *Chinese Recorder* 32 (March 1901), pp. 132 - 137.

卜道成:"英国浸礼教徒山西遇害记及其它"

Bryson, M. I. [Mary Isabella], *Cross and Crown: Stories of the Chinese Martyrs*.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04?]. 207 pp

布莱森, M.I.:十字架与王冠:在华殉难者传

Buck, David D., "The 199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Boxer Movement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Republican China* 16.2 (April 1991), pp. 113 - 120.

包德威.:"1990 年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Buck, David D. (ed.), *Recent Chinese Studies of the Boxer Move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7.

同上(编):中国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最新研究

C. B. A., "The Crisis in China and Its Causes", *Sunday Strand* (1900).

C.B.A.:"中国危机及起因"

Campbell, Isabella C. MacLeod, *Through the Gates into the City: Memorials of Stewart and Kate McKee,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s.a.].

坎贝尔, I.C.M.:穿门入城:悼念中国内地会殉教传教士斯图

尔特和麦基

Candlin, George T., "The Associated Fists. The Society which Caused the Riots, and Led to War in China", *Open Court* 14 (Chicago 1900), pp. 551 – 561.

甘淋:"义和拳:导致动荡与战争的组织"

Carlisle, Carris, *Party in Peking*. London: Ha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192 pp.

Historical fiction.

卡莱尔,C.:京师会

历史小说

Carter, William Harding, *The Life of Lieutenant General Chaffe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7]. vii + 296 pp.

Lieutenant General Adna Romanza Chaffee (1842 – 1914) was the commander of the American contingent of the Allied Relief Expedition.

卡特,W.H.:查飞中将传

查飞(1842 – 1914),为联军美国分队指挥官

Cary, A. C. L., and Stouppe McCance, *Regimental Records of the Royal Welch Fusiliers* (Late of the 23rd Foot). London: Forster Groom & Co., for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1923. 2 vols.

See pp. 257 – 270 for an account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in 1900.

卡里,A.C.L.和 S.麦坎斯:威尔士皇家火枪手记录

关于 1900 年华北战役的叙述见 P.257 – P.270

Casserly, Gordon, *The Land of the Boxers; or, China under the Allies*. London, New York and Bombay: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3. xiv + 307 pp.

Reviewed by Max von Brandt in *Petermanns Mitteilungen* 50. 7

(1904), p. 124. Gordon Casserly was a Captain in the Indian Army.

凯瑟雷,G.:八国联军控制下的中国

Chamberlin, Wilbur J., *Ordered to China. Letters of Wilbur J. Chamberlin Written from China while under Commission from the New York "Sun"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of 1900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lications which Followed*. New York: F. A. Stokes;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3. viii + 340 pp. London: Methuen & Co., 1904.

张伯伦,W.J.:受命赴华:1900年义和团暴乱期间的书信

Chapin, Franklin M., "How the Boxer Uprising Has Affected Mission Work in China", *Missionary Herald* (Boston, May 1904), pp. 190 - 192.

查平,F.M.:"义和团起义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

Ch'en, Jerom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xer Movement - A Morphological Stud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3.2 (1960), pp. 287 - 308.

陈志让:"义和团运动的本质与特点析论"

Ch'en, Jerome, "The Origin of the Boxers", in: Jero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 (eds.),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 - 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 (26 *January* 1896 - 2 *January* 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7 - 84.

同上:"义和团的缘起"

Chen, Kuang - Chung, "A 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Boxers' Movements: A Contribution to a Hermeneu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rbana -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5. 319 pp.

甄广冲(音):"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释读"

Chesneaux, Jean, "The Modern Relevance of Shui - hu Chuan: Its Influence on Rebel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 (March 1971), pp. 1 - 25.

谢诺,J.:"《水浒传》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起义运动的影响"

Chesneaux, Jean, *Peasant Revolts in China*: 1840 - 1949. Trans. from the French manuscript by C. A. Curwen. (Libra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Norton, 1973. 180 pp.

French edition published as 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in 1976. See also the Dutch translation, 1977.

同上:1840 - 1949 中国农民的反抗运动

Chesneaux, Jean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 - 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同上(编):1840 - 1950 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教门

Chesneaux, Jean,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65.

同上: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秘密教门

Chiang, Ying - ho, "Literary Reactions to the Keng - tzu Incident (1900)",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riental Languages, 1982. x + 342 leaves.

蒋英豪:"庚子事件在文化界引起的反应"

"China: A Survival of the Unfittest. Illustrated", *Frank Leslie's Popular Magazine* (October 1900).

"中国:生存的不适者(附插图)"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New York: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Publishing Co., [1900]. [66] pp.

Reprinted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Includes "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by G.B. Smyth.; "The struggle for reform in China", by C. Johnston; "Missions and missionaries in China", by P. Bigelow; "America's treatment of the Chinese", by C.F. Holder; "America's duty in China", by J. Barrett. See also *The Crisis i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s., 1900.

与世界对抗的中国

重印自《北美评论》。包括施美志的"中国反洋情绪探因";C.约翰斯顿的"为中国改革所做的斗争";P.比奇洛的"在中国的教会与传教士";C.F.赫尔德尔的"美国如何对待中国人";J.巴雷特的"美国在中国的职责"

China and Japan Trading Company, New York, *Claim of the China and Japan Trading Company*. United States. 6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907-1908. Senat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 15 pp.

中日贸易公司:中日贸易公司的要求

"China of To-Day", *Church Quarterly Review* 52 (April-July 1901), pp. 50-69.

Concerns the works of E. H. Parker and S. P. Smith.

"今日中国"

关于庄延龄和司米德的著作

China. Treaties. 1901., *Final Protocol between China and the Powers Represented at Peking*.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4. 29 pp

1901年中国条约:中国与列强在北京签署的最后条约

"The Chinese Reign of Terror", *Catholic Missions* 15 (July 1900) and subsequent issues in 1900 and 1901.

"中国的恐怖统治"

Chuan Sen, "Chinese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22 Nobember 1900), pp. 2776 - 2781.

全森(音):"中国人对使馆被围的叙述"

Clark, F. E., "Righteous Harmony Fisters of China",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9 August 1900), pp. 1910 - 1913.

克拉克,F.E.:"中国义和拳"

Clark, George R., "On Other Duty",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35.1 (March 1909), pp. 127 - 136.

克拉克,G.R.:"关于其他责任"

Clements, P. H. [Paul Henry], *The Boxer Rebellion: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view*.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ed.: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66 no. 3). New York, 1915. 245 pp. Reissued by AMS Press, 1967.

Subsequently presented as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1916.

克莱门兹,P.H.:义和团运动:政治外交性评论

Clementson, William Arthur Blakeney, *The Red Dragon. A Story of the Boxer Rebellion*. Illustrated by F. J. Seez. London: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1949. ix + 118 pp.

克莱门森,W.A.B.:红龙,义和团记事

Clowes, William Laird, *The Royal Navy: A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1897 - 1903. 7 vols. See Vol. 7, pp. 520 - 558, for coverage of the Boxer episode.

克洛斯,W.L.:英皇家海军史

有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叙述见第7册,P.520－P.558

Cohen, Paul 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43－590

柯文,P.A.:"基督教会及它们对1900年的影响"

Cohen, Paul A., "The Contested Past: The Boxers as History and My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February 1992), pp. 82－113.

同上:"一段有争议的历史: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xviii + 428 pp.

同上: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

Colby, Scott Dearborn, "The Boxer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Five Chinese Officials",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6.

科尔比,S.D.:"五个中国官员眼中的义和团之乱"

Colquhoun, Archibald R., *The Problem in China and British Policy*. London: P. S. King, 1900. 50 pp.

柯乐洪:中国问题与英国政策

Coltman, Robert, Jr. (M.D.), *Beleaguered in Peking; the Boxer's [sic] War against the Foreigner*.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 1901. iv + 248 pp.

满乐道(小):北京被围记

Compilation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Series, *The Yi Ho Tuan Movement of* 190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33 pp.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00 年义和团运动

Corbett, Hunter (Rev.),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4 (January 1901), pp. 8 - 16.

郭显德:"对中国基督徒的迫害"

Cornaby, William Arthur (Rev.), "Chinese Riots and Reparation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3 (August 1900), pp. 620 - 623.

高葆真(评):"中国的动荡与平复"

Cothonay, Bertrand, "A Missionary's View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Catholic World* 73 (July 1901), pp. 415 - 426.

科索尼,B.:"一个传教士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The Crisis in Chin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s., 1900. v + 271 pp.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that had appear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中国危机

《北美评论》一些文章的汇编

[The Crisis in China], *The Chautauquan* (Cleveland, OH, August 1900), pp. 443 - 447; (September 1900), pp. 545 - 548.

[中国危机]

Crowe, George, *The Commission of H. M. S. 《Terrible》* 1898 - 1902. London: George Newnes, 1903. xvi + 370 pp.

Appendices (pp. 357 - 370): List of all commissioned, warrant, and subordinate officers who have served in H. M. S. "Terrible during the commission; List of officers and men belonging to H. M. S. "Terrible" who landed with the naval brigade i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List of officers and men belonging to H. M. S. "Terrible" mentioned in despatches.

George Crowe was Master – at – Arms, Royal Navy.

克劳,G.:**英舰"恐怖号"的委任**

包括"恐怖号"委任期间被委任授权的下级官员名录;随海军登陆南非与中国的"恐怖号"船员与军官名录;在紧急派遣中提到的"恐怖号"船员与军官名录。

克劳为英国皇家海军宪兵

Crowe, George, *From Portsmouth to Peking via Ladysmith with a Naval Brigade*.

George Crowe was Master – at – Arms, Royal Navy.

同上:**随海军从朴次茅斯经莱迪史密斯到北京**

Crozier, William,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Peking Relief Expediti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1901), pp. 225 – 240.

William Crozier was a captain in the U.S. Army and Chief Ordnance Officer on the staff of General Chaffee, Commander of the American Contingent of the Allied Relief Expedition.

克鲁瓦齐耶,W.:**"对北京救援行动的一些见解"**

克鲁瓦齐耶为查飞中将手下的上尉兼军械长

Dabringhaus, Sabine, "An Army on Vacation? The German War in China, 1900 – 1901", i: Manfred Boemeke,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 rster (editors), *Anticipating Total War: 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1871 – 1914.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cal Institu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达布林赫斯,S.:**"德国在华战争,1900 – 1901"**

Daggett, Aaron Simon, *America in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An Account of the Brilliant Part Taken by United States Troops in that*

Memorable Campaign in the Summer of 1900, *for the Relief of the Beleaguered Legations in Peking*. Kansas City: Hudson - Kimberley Pub. Co., 1903. xii + 267.

Reprinted Nashville, TN: Battery Press, Inc.; Skokie: in association with Articles of War, Inc., 1997 (The Battery Press Wars of America Series, Vol. 1.).

Colonel Daggett was the commander of the newly arrived U.S. 14th Infantry Regiment.

达格特,A.S.:**中国救援行动中的美军**

Davidson, C. W., "Operations in North China",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6.4 (December 1900), pp. 637 - 646.

戴维森,C.W.:**"华北军事行动"**

Davies, Llewellyn James, "Chinese Boxers",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1 (July 1900), pp. 281 - 287.

戴维斯,L.J.:**"中国义和团"**

Davies, Llewellyn James, "The Church and Chinese Indemnitie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4 (September 1901), pp. 672 - 676.

同上:**"教会与庚子赔款"**

Davies, Llewllyn James, "The Taming of the Dragon", *Forum* 30 (November 1900), pp. 353 - 363.

同上:**"训龙"**

Denby, Charles, "The Defense of the Pei - tang", *Independent* 53 (New York, 23 May 1901), pp. 1178 - 1181.

田贝:**"守卫北塘"**

Denby, Charles,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the Missionaries", *Forum* 30 (October 1900), pp. 166 - 171.

同上:**"中国未来与传教士"**

Dennis, Jams S., "Missions in China. A Defense and an Appreciation", *American Monthly Review of Reviews* 22.3 (September 1900), pp. 302 - 308.

丹尼斯, J.S.:"中国教会:声辩与评价"

D'Herisson, "Sacking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t Pekin, 1901", *Current Literature* 32 (April 1902), pp. 411 - 415.

德里森:"1901 年对北京皇宫的劫掠"

Dicey, Edward, "Vengeance and Afterwards", *Nineteenth Century* 48 (August 1900), pp. 339 - 344.

戴西, E.:"复仇及复仇以后"

Dillon, E. J., "The Chinese Wolf and the European Lamb",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79 (January 1901), pp. 1 - 31.

狄龙, E.J.:"中国狼与欧洲羊"

Dix, Charles Cabry, *The World's Navies in the Boxer Rebellion, China 1900*. London: Digby, Long & Co., 1905. viii + 319 pp.

迪克斯, C.C.:抗击义和团中的各国海军

Doar, Bruce, "The Boxers and Chinese Drama: Questions of Interactions",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9 (March 1984), pp. 91 - 118.

都尔, B.:"义和团与中国戏剧的相互影响"

Doyle, A. P., "Crisis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s", *Catholic World* 71 (July 1900), pp. 548 - 554.

多伊尔, A.P.:"中国危机与教会"

Dreyer, F. C. H., *The Boxer Rising and Missionary Massacres in Central and South Shansi, North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a Missionary Band's Escape to the Coast*.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s.a.]. 80 *pp*.

德里耶, *F. C. H.*:晋中南义和团的兴起和对传教士的屠杀,

附传教士班德出逃海口记

Duiker, William J. , *Cultures in Collision: The Boxer Rebellion*. San Rafael, CA: Presidio Press, 1978. xvii + 226 pp.

杜伊克, W. J.: 碰撞的文化: 义和团运动

Dunnell, Mark B. , "The Settlement with China", *Forum* (February 1902), pp. 643 - 661.

Dunnell had formerly been Deputy Consul -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Shanghai.

邓内尔, M. B.: "与中国的和解"

邓内尔曾是美国驻上海副总领事

Duyvendak, J. J. L. [Jan Julius Lodewijk], *The Diary of His Excellency Ching - shan*. Lugduni Batavorum [Leiden]: E. J. Brill, 1924. viii + 85 + 48 pp. Reprinted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viii + 134 pp.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the supposed diary of Jingshan, fabricated by Edmund Backhouse.

戴闻达: 景善日记

Edkins, Joseph , *The Recent Changes at Peking, and Recollections of Peking*.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2. 15 pp.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艾约瑟: 北京的今日变化和关于北京的回忆

Edwards, E. H. [Ebenezer Henry], "Boxer Massacre in Taiyuenfu", *East of Asia* Special Number (June 1904), pp. 4 - 6.

爱德华兹, E. H.: "义和团在太原府的大屠杀"

Edwards, E. H. [Ebenezer Henry], *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The 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With introductory note by Alexander Maclaren. Edinburgh;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3. 325 pp

New ed., with additional chapter: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334 pp.

Reprint of the 1903 ed.: New York: Arno Press, 1970. 325 pp.

同上:山西的火与剑:外国人与中国教徒的殉教

[Edwards, Ebenezer Henry], *Further News of the Massacres in Shansi*.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1900] 13 pp.

[同上]:有关山西屠杀的另外一些资料

Edwards, Neville, *The Story of China, with Description of the Events Relating to the Present Struggle*. London: Hutchinson;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00. 128 pp.

爱德华兹,N.:中国事记和与当前斗争有关的一些事件的祥述

Elliott, Jane, "Who Seeks the Truth Should Be of No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Journalists Report the Boxer Rebellion, June 1900", *American Journalism* (1996).

甄爱寥:"英美记者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报道"

Elterich, W. O. [William Otto], "Causes of the Troubles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13 (August 1900).

伊维廉:"中国动乱的一些原因"

Elvin, Mark, "Mandarins and Millena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Boxer Uprising of 1899 – 1900",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Oxford* 10.3 (1979), pp. 115 – 138.

Reprinted in: Hugh D. R. Baker and Stephan Feuchtwang (eds.), *An Old State in New Settings: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in Memory of Maurice Friedman*. (JASO Occa-

sional Papers, No. 8.) Oxford: JASO, 1991.

埃尔文,M.:"满清官员与千年至福主义者:对义和团起义的反思"

Esherick, Joseph W.,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xix + 451 pp.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Ewing, G. H., "An Escape from the Boxers", *National Magazine* (*September* 1900).

尤因,G.H.:"逃离义和团"

Favier, Alphonse [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 "Answering to the Charges of Looting", *Catholic World* 74 (December 1901), pp. 387 - 390.

The author's name is erroneously given as Adolph Favier.

樊国梁:"答所谓'劫掠'的指责"

Fenn, Courtenay H., "American Marines in the Siege of Peking",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29 November 1900), pp. 2845 - 2849.

芳泰瑞:"北京被围期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enn, Courtenay H., "Food Supply during the Siege",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6 December 1900), pp. 2917 - 2920.

同上:"被围期间的食品供应"

Ferguson, Harley Bascom, *Report on the Engineer Equipment of the Allied Troops: Serving with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1900 - 1901*. (Professonal Papers of the Corps of Engineers, U.S. Army, No. 30).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1. 42 pp.

Ferguson was a lieutenant in the U.S. Corps of Engineers.

费尔居松,H.B.:八国联军赴华救援中的器械装备

费尔居松为美军工程兵上尉

Fiamingo, G. M., "Christian Missions and European Politics", *The*

Open Court 14 (1900), *pp*. 689 – 693.

费安明哥,G.M.:**"基督教会与欧洲政治"**

"The Fighting of the Month i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Review of Reviews for Australasia* (September 1900).

"在中国与南非战斗的岁月"

Field, Cyril , *Britain's Sea Soldiers: A History of the Royal Marines and Their Predecessors and of Their Services in Action, Ashore and Afloat, and Upon Sundry Other Occasions of Moment*. Liverpool: Lyceum Press, 1924. 2 vols.

See Vol. 2, pp. 250 – 291 for an account of Royal Marine action during the Boxer episode.

菲尔德,C.:**不列颠的海上战士**

英皇家海军陆战队在义和团事件中的行动见第 2 册 P.250 – P.291

Fleming, Peter , *The Siege at Peking*. London: Rupert Hart – Davis, 1959. 273 pp.

Also published in the Grey Arrow Books series, No. G38, London: Arrow Books, 1962. 274 pp.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Bonav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xiii + 273 pp.

弗莱明,P.:**北京的围困**

Fleury, Franois, "My Captivity with Chinese Rebels", *Catholic Missions* (1900), in several numbers.

Fleury was held captive by Yu Dongchen in Sichuan in 1898. His account first appeared in *Annales M. E. P.* 3 (1900).

华方济:**"被俘于中国造反者"**

华方济曾于 1898 年在四川被余栋臣俘虏

Foord, John , "The Root of the Chinese Trouble", *North American Review*

No. 527 (October 1900), pp. 401 - 410.

Foord was the Secretary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富尔德,J.:**"中国动乱的根源"**

富尔德是美国亚洲协会秘书长

Forsyth, Robert Coventry (comp. and ed.),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A Complete Roll of the Christian Heroes Martyred in China in* 1900, *with Narratives of Survivors*.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4. xii + 516 pp.

Reviewed by G. M. in *Chinese Recorder* 35 (August 1904), pp. 426 - 428.

法思远:**庚子殉难录**

Forsyth, Robert Coventry, *Narrative of Massacres in Shansi, July* 1900. With Introduction by E. H. Edward and Timothy Richard. Reprinted from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November 1900. 6 pp.

同上:**1900 年 7 月山西屠杀叙述**

Foster, John Watson, *The Chinese Indemnity*. Washington: Beresford, [1908?]. 6 pp.

科士达:**中国赔款**

Freemantle, E. A., *Prince Tuan's Treasure, and other Interesting Tales of the "Boxer Rebellion of* 1900". Vellore: E. A. Freemantle, 1911. 31 pp.

弗里曼特尔,E.A.:**端王的财宝及义和团的其他传说**

Freri, Joseph (ed.), *The Heart of Pekin: Bishop A. Favier's Diary of the Siege, May - August*, 1900. Boston: Marlier, 1901. 59 pp.

弗莱瑞,J.(编):**樊国梁主教北京被围日记(1900.5 - 8)**

Freri, Joseph, "Origin and Causes of the Chinese Crisis. 1900", *American Catholic Quarterly Review* 27 (April 1902), pp. 228 - 238.

同上:"1900年中国危机的根源与原因"

G. F. S., "The Outbreak and the Outlook",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April 1901).

G.F.S.,:"暴乱及其导向"

Galli, Mark, "Fury Unleashed: The Boxer Rebellion Revealed the Courage of Missionaries – and the Resentment They Sparked", *Christian History Magazine* 15.4 (Worcester PA, 1996).

加利,M.:"从义和团起义看传教士的勇气及其招致的愤恨"

Galpin, Frederic, "Some Remarks upon the Crisi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Manchester Geographical Society* 16 (July – September 1900), pp. 207 – 211.

盖尔宾,F.:"对中国危机的几点评价"

Gamewell, Mary Porter, *Mary Porter Gamewell and Her Story of the Siege in Peking*. Edited by Alexander Harrison Tuttle. New York: Eaton & Mains; Cincinnati: Jennings & Graham, 1907. vii + 303 pp. Repr.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rs, 1987.

盖姆韦尔,M.P.:M.P.盖姆韦尔及其对北京被围事记

Gatrell, Thomas J. N. (M.D.), "Expedition to Paotingfu", *Independent* 53 (New York, 17 January 1901), pp. 148 – 150.

盖切尔,T.J.N.:"在保定府的行动"

"Germa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inese Outbreak",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20 December 1900), pp. 3059 – 3060.

"德国在中国暴动中的责任"

Giles, Herbert A., "Mr. Parker and the Mailed Fist", *China Review* 25.6 (1901), pp. 288 – 290.

翟理思:"庄延龄先生与暴力"

Giles, Herbert A., "The Outbreak in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September 1900).

同上:"中国暴乱"

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Chinese Anti-Foreignism and the Boxer Uprising", by L[eslie] R[onald] Marchant. Nedland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1970. xxvii + 212 pp.

翟兰思: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Gilson, Charles James Louis, *The Lost Column: A Story of the Boxer Rebellion in China, etc.* London: Henry Frowde; Hodder & Stoughton, 1909. 379 pp.

吉尔森, *C. J. L.*,:迷失的队伍:中国义和团运动事记

Gilson, Charles James Louis, Through the Boxer Lines: A Tale of the Boxer Rebellion. (Arnold's Continuous Story Readers). London: E. Arnold & Co., [1938]. 126 pp.

同上:义和团起义的故事

Gipps, G. [George], *The Fighting in North China, up to the Fall of Tientsin Cit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01; London: S. Low, Marston, 1902. 65 pp.

Gipps was a midshipman in HMS *Orlando*.

吉普斯, G.:在华北直至天津陷落前的战斗

吉普斯为英舰"奥兰多"号上的实习生

Gleason, Joseph M. (Rev.), "As Things Are in China", *Donahoe's Magazine* 45 (January - June 1901), pp. 13 - 28.

格利森, J. M.(评):"中国事件实情"

Gleim, Albert F., *CRE Reference Data*. Arlington VA: Planchet Press, 1985. 41 pp.

This publication contains lists, sometimes incomplete,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cluding some non - U.S. nationals, receiving campaign medals and society badges relating to the Boxer Uprising.

格莱姆,A.E.:**中央侦察局参考资料**

军事人员名录(不全),包括一些在义和团事件中获得奖章的非美籍人员

Glover, Archibald E.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 A Personal Record of God's Delivering Power from the Hands of the Imperial Boxers of Shan - si*.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4. xx + 372 pp. Many subsequent reprints and editions.

Glover, Archibald E.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 A Personal Record of God's Delivering Power from the Hands of the Imperial Boxers of Shan - si.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4. xx + 372 pp.

Many subsequent reprints and editions. The most recent one was reissued as *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The Tragic True Story of Persecution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in China*.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00. 336 pp.

格洛弗,A.E.:**神迹千里:义和团时期的悲惨故事**

该书多次再版,最新版于2000年在苏格兰出版。

Goldman, Joel,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Other Tales*. New York: Donald I. Fine, 1988. xi + 265 pp.

New York: Avon Books, 1990.

格尔德曼,J.:**义和团运动和其他故事**

Goodrich, Mrs. Chauncey [Sarah Boardman], "Besieged in Pekin", *The Youth's Companion* 75.5 (31 January 1901), pp. 52 - 53.

富善夫人:**"被围在北京"**

Gracey, J. T.,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3 (August 1900), pp. 623 - 626.

格莱西,J.T.:**"中国的文化碰撞"**

Gracey, J. T., "Did the Boxer Movement Help or Hurt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4 (October 1901), pp. 762 – 764.
同上:"义和团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帮助还是危害?"

Graydon, William Murray, *The Perils of Peking*. London: John F. Shaw & Co., 1904. 294 pp.
格雷顿, W. M.:北京之祸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the British Share of the China Indemnity of* 1901.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31. 9 pp.
英国外交部:中英政府有关处理庚子赔款的文书往来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apers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the British Share of the China Indemnity of* 1901.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30. 15 pp.
英国外交部:有关英国处理庚子赔款的一些文件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ese Indemnity Advisory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other Documents Respecting the China Indemnity Presen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o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26. 197 pp.
Reprinted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Issued as No. 2 (1926) of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a. Also as No. 2766 of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英国外交部,中国赔款问题顾问委员会:英顾问委员会报告及外交大臣向议会提交的关于中国赔款的其他文件
英外交部有关中国的第二号(1926)文件。另见英议会第 2766 号文件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3 (1900). Correspondence Re-*

specting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Command Paper 257).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0.

英国议会:第3号中国文件(1900):有关中国起义运动的通信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4 (1900).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Minister in China*, *Respecting Events at Peking*. Command Paper 364.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0.

英国议会:第4号中国文件(1900):英国驻华公使关于北京事件的报告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1 (190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 (Command Paper 436).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1.

英国议会:第1号中国文件(1901):有关中国暴乱的通信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3 (1901).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Events at Peking*.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1.

英国议会:第3号中国文件(1901):有关北京事件的最新通信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4 (1901). *Plans of Defence of British Legation*.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1.

英国议会:第4号中国文件(1901):保护英使馆计划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5 (1901).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 (Command Paper 589).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1.

英国议会:第5号中国文件(1901):有关中国暴乱的最新通信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No. 6 (1901).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 (Command Paper 675).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1.

英国议会:第6号中国文件(1901):有关中国暴乱的最新通信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hina*, *Expedition*, 1900 – 1. *Correspon-*

dence Relating to Evacuation of Summer Palace at Peking by British Troops.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02.

英国议会:1900－1的在华行动,有关英军撤离颐和园的通信

Green, Charles H. S., "*In Deaths Oft.*" *A Brief Account of the Lord's Gracious Dealings with the Missionaries of Hwai－luh, N. China ... during the Troublous Times of* 1900.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901. viii + 72 pp.

2nd ed.; London and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1.

格林,C.H.S.:1900年华北获鹿(音)传教士历险记

[Green, Charles H. S., and Mrs. Green], *Thrilling Experiences of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Chihli Province during the Boxer Troubles of* 1900.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1. First published as *Thrilling Experiences of C. I. M. Missionaries in Chihli: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wanderings and marvellous escape of Mr. and Mrs. C. H. S. Green, their two children, Vera and John, aged respectively five and three years*, and *Miss J. G. Gregg*, written by Mr. and Mrs. Green.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 [s.a.]. 32 pp.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格林,C.H.S.夫妇]:中国内地会教士在义和团动乱期间在直隶的历险

Greenwood, Frederick, "The Chinese Revolt", *Nineteenth Century* 48 (August 1900), pp. 330－338.

格林伍德,F.:"中国的反抗"

Groot, Jan Jacob Maria de,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Verhandelingen Letterkund der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Afdeling Letterkunde, new series 4.1－2). Amsterdam: J.

Müller, 1903. 2 vols. (viii + 595 pp.)

Reprinted Taibei: Literature House, 1963.

哥罗特:宗教史的一页:中国的宗教教派和宗教迫害问题

Guinness, G. Whitfield, '*A Great Deliverance.*' *The Story of the Escape from She - k'i - tien, Ho - na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1]. 31 pp.

吉尼斯,G.W.:河南赊集店(音)大逃亡

Haar, B. J. ter,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and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Reality and Label", Ph.D. dissertation,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90. 409 pp

The dissertation was published under a different title in 1992.

哈尔,B.J.:"白莲教及其教义:真实与标签"

Haar, B. J. te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Sinica Leidensia, 26). Leiden: E. J. Brill, 1992. ix + 343 pp.

Reprinted as paperback 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Has a concluding section discussing the supposed link between sectarianism and the Boxers.

同上:白莲教教义在中国宗教史上的地位

Hamm, M. A., "The Anti - foreign Movement [in China]",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26 July 1900), pp. 1785 - 1788.

哈姆,M.A.:"[中国]反外运动"

Hamm, M. A., "Boxers and Oth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28 June 1900), pp. 1534 - 1537.

同上:"义和团与其他中国秘密教门"

Hart, Robert (Sir), "The Boxer Movement", *The Cosmopolitan* 30.5 (March 1901), pp. 507 - 512.

赫德爵士:"义和团运动"

Hart, Robert (Sir), "National Uprising and International Episode", The *Cosmopolitan* 30 (December 1900), pp. 121 - 139.

同上:"国内起义与国际事件"

Hart, Robert (Sir), *The Peking Legations: A National Uprising and International Episode*. Reprinted from "The Fortnightly Review".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00. 39 pp.

The article had also appeared in The Cosmopolitan 30.2 (December 1900), pp. 121 - 139.

同上:北京使馆:国内起义与国际事件

又见:《大千世界》

Hart, Robert (Sir),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01. 254 pp. 2nd ed., with an additional chapter, 1903.

Several chapters of this book first appeared in the Fortnightly Review, beginning in November 1900.

同上:"这些自秦国来":中国论集

Hays, Fanny Corbett (Mrs. George S.), "The Great Knife Sect of Shantung",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3 (February 1900), pp. 112 - 114.

海斯,F.C.:"山东大刀会"

Headland, Isaac Taylor, *Chinese Heroes: Being a Record of Persecutions Endured by Native Christians in the Boxer Uprising*. New York: Eaton & Mains; Cincinnati: Jennings & Pye, 1902. 248 pp.

何德兰:中国的英雄

Headland, Isaac Taylor, "Church Burning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23 (December 1900), pp. 931 - 936.

同上:"燃烧着的中国教堂"

Headland, Isaac Taylor, "The Crisis in China", *Munsey's Magazine* (October 1900).

同上:"中国危机"

Headland, Isaac Taylor, "The Heroes of the Peking Siege", *Munsey's Magazine* (February 1901).

同上:"北京之围中的英雄"

Henty, G. A. [George Alfred], *With the Allies to Pekin: A Tale of the Relief of the Legati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 ix + 353 pp.

A fictional account, first published in London: Blackie, [190 -?].

亨蒂,G.A.:随联军到北京:使馆解围故事

纪实文学,在伦敦首发

Hevia, James, "Leaving a Brand on China: 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18.3 (July 1992), pp. 304 - 331.

The article was reprinted in: Tani E.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3 - 140.

何伟亚.:"给中国打下印记: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鼓说"

Hewlett, William Meyrick,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June to August, 1900*. London: Pub. for the Editors of the "Harrovian" by F. W. Provost, 1900. 97 pp. Published as a supplement to the Harrovian of November, 1900.

许立德:1900 年 6 月至 8 月北京使馆被围记

Hirschfeld, Burt, *Fifty - five Days of Terror: The Story of the Boxer Rebellion*. Folkestone: Bailey Bros and Swinfen, 1971. 191 pp.

希尔施费尔德,B.:55 天的惊恐:义和团运动事记

Hoare, J. E., *Embassies in the East: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Their Embassie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from 1859 to the Present*.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9. xvi + 238 pp.

Chapter 3: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and the Boxer Settlement."

霍尔,J.E.:东方大使:英国和它从 1859 至今的驻中日朝的大使

第三章:使馆被围和义和团的平复

Hoe, Susanna, *Women at the Siege, Peking* 1900. The Women's History Press, 2000. 430 pp.

霍,S.:1900 年北京围困中的妇女

Holcombe, Chester,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Toronto: Copp Clark, 1900. xxii + 386 pp. London: Methuen, 1901.

Reprinted New York: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 etc.

Written by a friend of China.

Revised reprint: *China's past & future*, by Hon. Chester Holcombe... *Britain's sin & folly*, by B[enjamin] Broomhall.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4]. xii + 298 pp

Also reprinted as: Chester Holcombe,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stor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its millions, missionaries, and martyrs*. Kilmarnock, Scotland: J. Ritchie, [1904?]. xxii + 298 pp. "Revised reprint ... of ...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 "Britain's sin & folly by B. Broomhall": p. 233 – 298.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问题

写自一个中国的朋友

修订版:何天爵的"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海文启的"英国的恶与蠢笨"。修订版收于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问题"

Hooker, Mary [pseud. of Polly Condit Smith], *Behind the Scenes in Peking: Being Experiences during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New York: Brentano's; London: J. Murray, 1910. viii + 209 pp.; reprinted March 1911.

Reprinted Hong Kong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ii, viii, 209 pp., with a Bibliography on pp. xvi - xvii.

Reviewed in *United Empire* 2 (February 1911), p. 136;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April 1911), pp. 417 - 419.

胡克,M.:北京内幕:使馆被围期间的经历

Hornsby, W. L., "Michie and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Nation* 73 (3 October 1901), pp. 263 - 264.

霍恩斯比,W.L.:"密吉和中国传教士"

How to Read Chinese War News: A Vade - Mecum of Notes and Hints to Readers of Despatches and Intelligence from the Seat of War, with a Coloured War Map and a Glossary of Military Technical Terms, Local Titles, Places, Phrases, etc.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0. 142 pp.

Reviewed by Henri Cordier in T'oung Pao (December 1900), pp. 502 - 503.

如何释读中国战争新闻

Hsu, Immanuel C. Y., "Late Ch'ing Foreign Relations, 1866 - 1905",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 - 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 - 1911. Part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70 -

141.

With a substantial section on the Boxer mov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徐中约:"晚清外交关系,1866 - 1905"

Hu I, "Did the Boxer Uprising Recur in 1925?",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1.3 (January 1926), pp. 33 - 38.

胡义(音):"义和团运动在1925年卷土重来了吗?"

Hulbert, H. B., "Crusade of the Powers against China", *The Outlook* 66 (15 December 1900), pp. 926 - 928.

赫尔伯特,H.B.:"列强对中国的圣战"

Hunnex, W. J. [William Joshua], "The Martyrs' Memorial", *East of Asia* 2.3 (October 1903), pp. 274 - 278.

赫耐克斯,W.J.:"殉教者纪念"

Hunt, Michael H., "The Forgotten Occupation: Peking, 1900 - 190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79), pp. 501 - 529.

亨特,M.H.:"被遗忘的占领:1900 - 1901年的北京"

Hykes, John R., "The Missionary Martyrs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4 (February 1901), pp. 81 - 93.

海格斯:"在华殉教教士录"

Hykes, John 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Known to Have Been Massacred",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3 (December 1900), p. 950.

同上:"有记录的殉难新教教士"

Ingram, John Henry (M.D.), "Defens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Indenpendent* 52 (New York, 13 and 20 December 1900), pp. 2979 - 2984, 3035 - 3040.

盈亨利:"保卫北京使馆"

Ingram, John Henry (M.D.), "In Pek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Siege",

Crampton's Magazine (March 1901).

同上:"使馆被围时期的北京"

"The Japanese View of the Situation in China", by A Japanese Diplomat,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0), pp. 198 - 207.

"日本人对中国形势的观点"

Jellicoe, George Patrick John Rushworth, Earl, *The Boxer Rebellion*. By the Rt Hon the Earl Jellicoe. (5th Wellington Lecture, 1993). Southampton: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1993]. 30 pp.

Focuses on the Seymour Expedition in which the author's father, Captain John Jellicoe RN, took part.

泽立科:义和团运动

着重叙述西摩的军事行动。作者的父亲泽立科上尉,曾参加该行动

[Kang Youwei], "Kang Yu - wei's Open Letter to the Powers", *Fortnightly Review* 76 (July 1901), pp. 1 - 12.

[康有为]:"康有为致列强的公开信"

Kaspary, Joachim, *The Humanitarian View of the British - Boer War,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and of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eace*. London: The Humanitaria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01. 48 pp.

卡斯帕里,J.:从人道主义观点看布尔战争、中国问题和和平的恢复与维持

Kelly, John S., *A Forgotten Conference: The Negotiations at Peking, 1900 - 1901*.

(Travaux de droit, d'économie et de sociologie, No. 5). Geneva: Librairie E. Droz, 1962 [i.e. 1963]. 192 pp.

凯利,J.S.:被遗忘的会议:1900 - 1901 年北京和谈

Keown - Boyd, Henry, *The Firsts of Righteous Harmony: A History of*

the Boxer Uprising in China in the Year 1900. London: Leo Cooper, 1991. xi + 276 pp.

基翁－博伊德,H.:1900年义和团运动史

Ketler, Isaac C., *The Tragedy of Paotingfu: An Authentic Story of the Lives, Services, and Sacrifices of the Presbyterian, Congregational, and China Inland Missionaries Who Suffered Martyrdom at Paotingfu, China, June* 30 *and July* 1, 1900.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408 pp.

凯特勒,I.C.:保定府的悲剧

Keyes, Roger John Brownlow (Sir, Bart.), *Adventures Ashore and Afloat*. With a Foreword by Winston S. Churchill. London: G. G. Harrap & Co., 1939. 372 pp. Reprinted London and New York: White Lion Publishers, 1973.

The author's life to 1906.

基斯,R.J.B.:海陆历险记

King, Clifford J., *A Man of God: Joseph Freinademetz, Pioneer Divine Word Missionary*. Techny, IL: Divine Word Publications, 1959.

金,C.J.:圣言会先辈福若瑟

Krausse, Alexis Sidney, *China in Decay: The Story of a Disappearing Empire*. 3rd ed.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0. xiv + 418 pp.

克劳瑟,A.S.:腐朽的中国:一个正在消亡的帝国

Krausse, Alexis Sidney,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Crisis*. London: Cassell, 1900. vi + 237 pp.

同上:中国危机事记

Ku Hung－ming [Gu Hongming],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1. xvi + 197, errata 3 pp.

辜鸿铭:总督衙门文件:一个中国人对好政府和真文明的祈求

Langellier, J. Phillip, *Uncle Sam's Little Wars: The Spanish – American War,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and Boxer Rebellion, 1898 – 1902*. (The C. I. Series). London: Greenhill Books;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99. 72 pp.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oldier, his uniform, and his equipment."

朗热利耶,J.P.:1898 – 1902 期间的美西战争,菲律宾暴动和义和团运动

Leonard, Henry, "The Visit of the Allies to China in 1900", *Military Historic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Papers* 14 (1918), pp. 295 – 318.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Tianjin.

伦纳德,H.:"对 1900 年赴华联军的访问"

天津战役纪实

Lewis, Charles Lee, *Famous American Marines, an Account of the Corps: The Exploits of Officers and Men on Land, by Air and Sea, from the Decks of the Bonhomme Richard to the Summit of Mount Suribachi*. Boston: L. C. Page and Co., 1950.

See pp. 161 – 165, 174 – 186 and 205 – 209 for biographies of Littleton Waller Tazewell Waller, the commander of the U. S. Marine battalion; John Twiggs Meyers, the commander of the U. S. Marine Guard in Beijing; and 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 a company commander at the Battle of Tianjin.

刘易斯,C.L.:出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海军陆战队营队指挥官沃勒生平,美海军陆战队驻北京护卫队指挥官迈尔斯生平,天津战役连队指挥官巴特勒生平见 P.161 – P.165,P.174 – P.186,P.205 – P.209

Lewis, Robert Ellsworth, "The Gathering of the Storm in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1 (August 1900), pp. 208 – 213.

刘易斯,R.E.:"中国的风暴"

Lindbeck, John M. 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1898 – 1901", Ph. D. Disser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48.

林帕克,J.M.H.:"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对华政策,1898 – 1901"

Litzinger, Charles A. "Rural Religion and Vill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 The Catholic Challeng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1 – 52.

利曾格,C.A.:"华北乡村宗教与组织:19 世纪后期的天主教冲击"

Liu, Kwang – Ching, "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xer Uprising", *Modern China* 15.1 (January 1989), pp. 102 – 116.

Review article of 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刘广京:"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民:义和团起义背景"

评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Liu Tieh – yün [Liu E], *The Travels of Lao Ts' an*. Trans. by Harold Shadick. Taibei: Book World Co., 1952.

刘铁云[刘鹗]:老残游记

Lo Hui – min (ed.),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1895 – 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vols.

骆惠敏:莫理循信件(1895 – 1912)

Lombroso, C., "Diplomatic Ineptitude and the Chinese War", *Living*

Lynch, George , *The War of the Civilisations, Being the Record of a "Foreign Devil's" Experiences with the Allies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01.

林奇,G.: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随联军行记

Ma Yeh Shiang,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Boxer Movement: A Study of *tUNG – Nan HuPa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76. V + 333 pp.

马业湘(音):"东南互保研究"

MacCloskey, Monro , *Reilly's Battery: A Story of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R. Rosen Press, [1969]. 191 pp.

Concerns the 5th Artillery, Light Battery F, United States Army.

麦克洛斯基,M.:赖利的炮兵连

MacDonnell, John , "Looting in China", *Contemporary Review* 79 (*March* 1901), pp. 444 – 452.

麦克唐奈,J.:"在中国的劫掠"

Macoun, J[ohn] H[oratio],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1900. Belfast: Baird, [1913]. 16 pp.

麦康,J.H.:1900 北京使馆之围

Minnishev, (lieutenant) , "The Capture of the Taku Forts",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e* (June 1901).

米尼谢夫:"攻陷大沽港"

Martens, F. de , "Europe, China,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00).

马滕斯,F.:"欧洲、中国与和谈"

Martin, Christopher [pseud. of Edwin Palmer Hoyt] , *The Boxer Rebellion*.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belard – Schuman, 1986. 175 pp.

马丁,C.:义和团起义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Discussions – ''We Will Do Our Best''",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55.4 (April 1929), p. 323.

丁韪良:"讨论——我们将竭尽全力"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The Fall of Peking",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11 October 1900), pp. 2419 – 2421.

同上:"北京的陷落"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The Siege in Peking: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By an Eye Witness. London and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New York: F.H. Revell, 1900. 190 pp.

Reprinted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2.

同上:北京的围困:中国对抗全世界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The Siege in Peking: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33.1 (1901), pp. 19 – 30.

同上:"北京的围困:它的前因后果"

"The Martyrdom at T'ai – yuen – fu on the 9th of July, 1900", by an Eyewitness. *Chinese Recorder* 32 (April 1901), pp. 210 – 211.

"1900年7月9日太原府殉教"

"Massacres by Christians in China", *Nation* 72 (24 January 1901), p. 62.

"中国基督徒惨案"

Mateer, Ada Haven, *Siege Day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American Women and Children during the Peking Siege*. New York: F. H. Revell Company, 1903. 411 pp.

Reprinted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1976.

Reviewed by Chauncey Goodrich in *Chinese Recorder* 35 (August 1904), pp. 425 – 426.

马蒂尔,A.H.:**被围的日子:北京被围期间美国妇女儿童的经历**

McCalla, Bowman Henry, "Memoirs of a Naval Career". Santa Barbara CA, 1910. 4 vols.

More than 150 pages of vol. 4 of this fragile unpublished MS concern McCalla's command of a landing party during which he was wounded three times during the relief of the Beijing legations. The work can be inspected in the U.S. Navy Department Library.

麦卡勒,B.H.:**"海军生涯回忆录"**

第4册有150多页关于麦卡勒在解救北京使馆中的军事指挥的叙述,其间他曾负伤三次。该书可在美国海军部图书馆查阅

McClellan, Edwin N., "Battles of the [U.S.] Marines: The Battle of Tientsin", *Marines Magazine* 5.1 (January 1920), pp. 13 – 14, 26.

麦克莱伦,E.N.:**"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战役中的斗争"**

McClelland, James, *Names of Australians Who Died on Service with the Boxer Rebellion, China, 1900, the Boer War, South Africa, 1900 – 1901* ……(James McClelland's Recording of the Past for the Future, Reference Books). Silverdale, NSW: James McClelland Research, 1992. 1 vol. (various foliations).

麦克莱兰,J.:**在义和团运动、布尔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阵亡的澳大利亚人**

McIntosh, Gilbert, *The Chinese Crisis a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 Vindication*.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0. 90 pp.

麦金托什,G.:**中国危机与基督教士**

McIntosh, Gilbert, *Is there Anything in It?: Some After – Crisis Vindications*. London: Morgan & Scott (office of "The Christia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2?]. 79 pp.

Contents: Remedy – Letters from diplomatic & military officials – Appreciations from Chinese officials – Testimony of martyrs' last letters – Witness – bearing of native Christians – Further testimonies from diplomatists – Statement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 But – Inferences: 17 reasons for avoiding hasty judgments.

同上:**这样做有意义吗?:危机后的论证**

外交军事官员的一些挽救僵局的信函,中国官员的评价,殉难者绝笔证明,本国教徒的作证,外交家的其他一些证明,中国新教教士的言论。

McLeish, William, *Tientsin Besieged and after the Siege. From the 15th of June to the 16th of July*, 1900. A daily record by the correspondent of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North – China Herald, 1900. 36 pp. The 2nd ed. (1901) has 45 pp. Attributed to William McLeish.

麦克利什,W.:**天津被围前后,1900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6 日**

Mertens, P. X. [Pierre – Xavier], *The Yellow River Runs Red: A Story of Modern Chinese Martyr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ryl Pearson. St. Louis and London: B. Herder Book Co., 1939. xv + 181 pp.

梅尔滕斯,P.X.:**血染黄河:近代中国殉教者记**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1900 – 1911. Washington DC: Press of B. S. Adams, 1912. 137 pp.

The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was organized to perpetuate the memories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of 1900.

龙之兵事,1900－1911

纪念1900年赴华军事救援行动

Millard, Thomas F., "A Comparison of the Armies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29.1 (January 1901), pp. 77－87.

密勒:"在华军队比较"

Millard, Thomas F., "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29.2 (February 1901), pp. 187－194.

同上:"发生在中国的惩罚与复仇"

Millard, Thomas F., "The Settlement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29.3 (March 1901), pp. 370－377.

同上:"中国问题的解决"

Miller, Stuart Creighton, "Ends and Means: 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49－282.

米勒,S.C.:"目的与手段:19世纪传教士对在华使用武力正当性的声辩"

Miln, Louise Jordan, *It Happened in Peking*.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1926.

Historical fiction.

米尔恩,L.J.:北京事件

历史小说

Miner, Luella, "At the Graves of the Martyr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4 (September 1901), pp. 676－682.

麦美德:"在殉教者墓前"

Miner, Luella, "The Flight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entury Maga-*

zine 61 (March 1901), pp. 777 – 780.

同上:"西太后的出逃"

Miner, Luella, "Prisoner in Peking", *The Outlook* 66 (10 – 24 November 1900), pp. 641 – 649, 697 – 705, 734 – 741.

同上:"北京的囚徒"

The *Mission Crisis in China*. (Leaflet No. 1.).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2 pp.

中国差会的危机

The *Mission Crisis in China*. *The Missionary* "Under Fire". (Leaflet No. 2.).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2 pp.

中国差会的危机:"炮火"下的传教士

The Mission Crisis in China: *The Persecuted Chinese Christians*. (Leaflet No. 2.).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8 pp.

中国差会的危机:受迫害的中国教徒

"The Missionary in China", *Church Quarterly Review* 52 (April – July 1901), pp. 413 – 433.

Concerns the works by Roland Allen, Ransome, Broomhall, Holcombe.

"在华传教士"

Morrison, George 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Living Age* 227 (17 November – 15 December 1900), pp. 401 – 415, 471 – 485, 551 – 561, 642 – 648, 677 – 682.

莫理循:"北京使馆之围"

Mu Hsin, "On the Reactionary Thought of the Play, *Sai Chin Hua*: Dissecting and Analyzing a So – Called 'Famous Play' of the

Thirties", *Current Background* 786 (16 May 1966), pp. 15 – 36.

Translated from *Guangming ribao*, 12 March 1966.

穆欣:"论《赛金花》剧本的反动思想"

Muramatsu Yūji, "The 'Boxers' in 1898 – 1899: The Origin of the 'I – ho – chuan' Uprising, 1900", *Annals of the Hitotsubashi Academy* 3.2 (April 1953), pp. 236 – 261.

村松佑次:"1898 – 1899 年的义和拳: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源起"

Myakishev, "The Capture of the Taku Forts",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45 (1901), pp. 730 – 744.

Translated from *Morskoi Sbornik* No. 2 (February 1901). Lieut. Myakishev was Flag Gunnery Officer of the Pacific Squadron, Russian Imperial Navy.

米亚基谢夫:"攻陷大沽港"

米亚基谢夫中尉为俄帝国海军太平洋中队海军将官射击指挥所官员

Myers, John T.,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Defenses of the Siege of Peking",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8.3 (September 1902), pp. 541 – 551. First – hand account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U.S. Marine Guard at the Beijing legations during the siege.

麦尔斯,J.T.:"军事行动与北京防卫"

北京使馆被围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北京护卫队指挥官的第一手材料

Narbeth, Colin, *Admiral Seymour's Expedition and the Taku Forts, 1900*. Chippenham, Wiltshire: Picton Publishing, 1980. 88 pp.

纳柏斯,C.:西摩元帅的军事行动和大沽港,1900

Newman, Henry, *The Indian Contingent in China*. Calcutta: W. Newman, 1900. 90 pp.

Letters of journalist Henry Newman to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the *Times of India and* the *Englishman*.

纽曼,H.:在中国的印度分队

Nicholls, Bob, *Bluejackets and Boxers: Australia's Naval Expedition to the Boxer Uprising*.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164 pp.

尼科尔斯,B.:水手与拳民:澳大利亚海军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动

Nichols, F. H., "Chinese Dislike of Christianity", *Atlantic Monthly* 90 (December 1902), pp. 773 - 782.

尼科尔斯,F.H.:"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厌恶"

Norie, E. W. M. (Major),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 - 1901. Nashville, TN: The Battery Press; Skokie, IL: Articles of War Ltd., 1995. 510 pp.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Intelligence Division. 1903.

诺里,E.W.M.:1900 - 1901 在华军事行动的官方报道

Northrop, Henry Davenport, China; *the Orient, and the Yellow Man: Containing a Full Account of the Great Insurrection in China; Atrocities of the Boxers; Massacre of Foreigners and Native Christians; Heroic Attempts to Recue the Foreign Ministers and Ambassadors, etc.;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a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Including the War with Japan; Manners, Customs and Peculiarities of the People; Superstitions; Idol Worship; Industries; Natural Scenery, etc.* Kansas City, MO: S. D. Knapp, 1900. vi + 420 pp

Also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Chinese Horrors and Persecutions of the Christians: Containing a Full Account of the Great Insurrection in China, Atrocities of the "Boxers," Massacre of Foreigners and Native Christians, Heroic Attempts to Rescue the Foreign Ministers and Ambassadors, etc.,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a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Including the War with Japan, Manners, Customs and Peculiarities of the People, Superstitions, Idol Worship, Industries, Natural Scenery, etc., etc.* Philadelphia: World Bible House, [1900]. 420 pp.

Another edition: San Francisco: Whitaker and Ray Co., [1900]. vi + 17 - 368 pp.

诺斯罗普,H.D.:中国、东方和黄种人

O'Connor, Richard, *The Spirit Soldier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3. 379 pp. Another edition is entitled: *The Boxer Rebellion*. London: Hale, 1974. 374 pp.

奥康纳,R.:精神战士: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表述

O'Neill, F. W. S. (Rev.), "A Study of an Incident in the Boxer Rising", *Chinese Recorder* 33.4 (April 1902), pp. 181 - 185.

奥尼尔,F.W.S.(评):"对义和团起义中的一件事的研究"

O'Quinlivan, Michael,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the Boxer Rebellion*. (Marine Corps Historical Bibliographies, No. 4). Washington: Historical Branch, G - 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1961. 9 pp.

奥昆里万,M.:义和团事件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名录(附注)

Oliphant, Nigel,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 With a Preface by Andrew Lang.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1. ix + 227 pp.

奥利芬特,N.:1900 年夏北京使馆被围记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 – 1950. Edited by Joshua A. Fo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1978. Has a chapter on the Red Lanterns.

小野和子(音):百年革命中的中国妇女,1850 – 1950

Owen, F. C., "The Crime of the Powers", *Munsey's Magazine* 23 (September 1900), pp. 731 – 735.

欧文,F.C.:"列强的罪行"

Paine, Ralph Delahaye, *The Dragon and the Cros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12. 241 pp.

Historical fiction, first serialized in ten installments as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in *The Youth's Companion*, beginning 85.49 (7 December 1911), pp. 661 – 663, concluding 86.6 (8 February 1912), pp. 72 – 73.

佩恩,R.D.:龙与十字架

历史小说,最早在《青年伴侣》中以"十字架与龙"为题连载

Paine, Ralph Delahaye, *Roads of Adventur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xiii + 452 pp.

Popular editio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5. 402 pp.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of adventures as a filibuster in Cuba and aswar correspondent."

The popular edition of 1925 is described as a "Narrative of his life as Yale oarsman, filibuster, and war correspondent ... in three war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 large octavo in 1922..." This edition is shortened by the omission of certain chapters, and re – issued in smaller form.

同上:历险之旅

"关于在古巴和作为战争通讯员的自传"

1925 年的畅销版是关于作为耶鲁大学划手,在拉美的美国人及 3 次战争中的通讯员的自传。该版本对原版做了删减

Palmer, Frederick , "With the Peking Relief Column", *The Century Magazine* 61 (December 1900), pp. 302 - 307.

帕尔默,F.:"与赴北京救援部队在一起"

Parker, E. H. [Edward Harper] , "The Chinese Imbroglio and how to Get out of It",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July - October 1900), pp. 252 - 277.

庄延龄:"中国动乱及如何摆脱"

Parker, E. H. [Edward Harper] , "The Forces Arrayed against Us in North China",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August 1900).

同上:"在华北严阵以待的队伍"

Parker, E. H. [Edward Harper] , "Intimate Boxers", *Contemporary Review* 78 (September 1900), pp. 318 - 325.

同上:"义和团"

Parker, E. H. [Edward Harper] , "The Revolt of the 'Boxers' in China",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July - October 1900), pp. 57 - 62.

同上:"中国的义和团反抗"

Payen, Cecille E. , "Besieged in Peking", Century Magazine 61 (January 1901), pp. 453 - 468.

An American tourist who had arrived in Beijing with Mrs. Anna Woodward and lone Woodward in April 1900.

帕文,C.E.:"被围在北京"

Peill, Arthur D. , "Chinese Christian Martyr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6 (February 1903), pp. 109 - 112.

派尔,A.D.:"中国殉教基督徒"

Pethick, W. N., "The Struggle on the Peking Wall: An Episode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The Century Magazine* 61 (December 1900), pp. 308 – 313.

毕德格:"北京城墙上的斗争:使馆被围事件"

Pigott, C. A., *Steadfast unto Death or Martyred for China. Memorials of Thomas Wellesley and Jessie Pigott*.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3. 255 pp.

Concerns the killing of Thomas Wellesley Pigott (1847 – 1900) and Jessie Kemp Pigott (1851 – 1900) in Shanxi, 1900.

皮格特,C.A.:宁死不屈或为中国牺牲

关于1900年T.W.皮格特和J.K.皮格特在山西的被害

Porter, Henry D. [Henry Dwight], "Martyrs of Shantung", *The Outlook* 64 (31 March 1900), pp. 747 – 748.

博恒理:"山东的殉教者"

Porter, Henry D. [Henry Dwight],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11. 377 pp.

同上:梅威良传

Potter, Henry Codman, "Chinese Traits and Western Blunders",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 60 (1900), pp. 921 – 930.

See also the author's book, *The East of To – day and To – morrow*.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2. 190 pp.

波特,H.C.:"中国人的特点与西方人的大错"

Preston, Diana, *Besieged in Peking: The Story of the 1900 Boxer Rising*. London: Constable, 1999. xiv + 322 pp.

A general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the Beijing legations.

普雷斯顿,D.:被围在北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Preston, Diana,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Dramatic Story of 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that Shook the World in the Summer of 1900*. New York: Walker, 2000. [US version of previous entry?]

同上:义和团运动:1900 年夏中国发动的震惊世界的反外战争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t Crisis", *Missionary Herald* (Boston, September 1901), pp. 364 – 367.

"当前危机中的在华新教传教士"

Price, Eva Jane, *China Journal, 1889 – 1900: An American Missionary Family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Scribner's, 1989.

普莱斯,E.J.:中国报道,1889 – 1900:义和团运动中的美国教士家庭

Pryor, Helen (Brenton), *Lou Henry Hoover: Gallant First Lady*. New York: Dodd, Mead, [1969]. xiii + 271 pp.

A biography of the wife of Herbert Hoover; she nursed the wounded on the battlefront of China's Boxer Uprising.

普莱尔,H.:胡佛夫人:显赫的第一夫人

胡佛夫人传记,她曾护理义和团起义中的美军伤员

Purcell, Victor, *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xiv + 349 pp.

珀塞尔:义和团起义:背景的研究

Quested, R. K. I., "Local Sino – Russian Political Relations in Manchuria 1895 – 1900",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0. 2 (1972), pp. 119 – 144.

奎斯第德,R.K.I.:"满洲的中俄政治关系"

Quested, R. K. I., "*Matey*" *Imperialists? The Tsarist Russians in Manchuria* 1895 – 1917. Hong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2. iv + 430 pp.

同上:沙俄在满洲,1895 - 1917

Raden, Baron von , "Official Report of the Russian Landing Parties from the Battle - Ships《Navarin》and《Sissoi Veliki》in Peking from the 18th (31st) May to 2nd (15th) August 1900",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45 (1901), pp. 594 - 605. Translated from Morskoi Sbornik No. 3 (March 1901). Baron von Raden was a lieutenant in the Imperial Russian Navy, commanding the detachments.

拉登,B.:"关于俄舰在北京的官方报告"

拉登为俄帝国海军中尉,负责指挥分遣队

Radonić, Basilius [in religion: Basilio da Ragusa], "Father Basil's Diary of the Boxer Persecution", trans. by Julius Schott, *Franciscan Herald* 13 (Chicago 1925), pp. 203 - 206, 252 - 253, 300 - 301, 347 - 348, 396 - 397, 443 - 444, 492 - 493, 538 - 540; 14 (1926), pp. 60 - 61.

拉唐尼克,B.:"巴索尔神父关于义和拳迫害行为的日记"

Ransome, Jessie , *Story of the Siege Hospital in Peking: and Diary of Events from May to August* 190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New York: E. & J. B. Young, 1901. 125 pp.

兰塞姆,J.:北京围困医院的故事:1900 年 5 月至 8 月日记

Rasmussen, O. D. [Otto Durham] , *Tientsin: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Tianjin: The Tientsin Press, Ltd., 1925. 320 + xvi pp.

拉斯马森,O.D.:天津插图史要

Rees, W[illiam] Hopkyn , "Chinese Boxers and the Missionary", *Sunday Strand* (November 1900).

瑞思义:"中国义和团和传教士"

Reid, Gilbert , "The Ethics of Loot", *Forum* 31.5 (July 1901), pp. 581 – 586.

李佳白.:"从道德角度看劫掠"

Reid, Gilbert , "Ethics of the Last War", *Forum* 32 (December 1901), pp. 446 – 455.

同上:"从道德角度看最后一次战争"

Reid, Gilbert , "The Fall of Peking", *Forum* 30 (September 1900 – February 1901), pp. 578 – 582.

同上:"北京的陷落"

Reid, Gilbert , "The Powers and the Partition of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0 (May 1900), pp. 634 – 641.

同上:"列强与中国的瓜分"

Reinsch, Paul Samuel ,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Chinese Crisi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6.3 (December 1900), pp. 435 – 445.

芮恩施.:"中国危机的文化因素"

Reinsch, Paul Samuel , "Uprising Against Foreigners", *Forum* (September 1900).

同上:"反外起义"

Renaud, Rosario , "Blessed Ignace Mangin and His Companions, Martyrs", translated by Joseph Cahill, *Woodstock Letters* 92. 2 (1963), pp. 115 – 138.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French in *Lettres du Bas – Canada*.

雷诺,R.:"任德芬及其同伴"

Rentfrow, Frank H. , "In Many a Strife We've Fought for Life", *Leatherneck* 14.7 (July 1931), pp. 10 – 11, 47 – 49.

Account of U.S. Marine operations throughout the Boxer Uprising.

伦特弗洛,F.H.:"为生而搏"
义和团起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行动

"Report o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the Campaign, China Field Force, 1900 - 1901", *Army Medical Department Report* 43 (1901), pp. 381 - 410.

"关于战争医务史的报告"

Reynolds, Gerard A., *The Red Circle*. New York: P. J. Kennedy & Sons, 1915. 319 pp.

Historical Fiction

雷诺,G.:红圈
历史小说

Ricalton, James, *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 A Journey Through the Dragon Empire at the Time of the Boxer Uprising, etc*. New York: Underwood & Underwood, [1902]. 358 pp.

里卡尔顿,J.:中国透视

Ricalton, James, *James Ricalton's Photographs of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His Illustrated Travelogue of* 1900.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ristopher J. Lucas. Lewiston, NY: E. Mellen, 1990. x + 248 pp.

同上: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一些照片

Ricci, Giovanni, "Franciscan Martyrs of the Boxer Rising", translated by Jerome O'Callaghan, *Franciscans in China* 14 (Wuchang 1935/36), pp. 237 - 242, 267 - 270, 304 - 307, 334 - 337, 370 - 383; 15 (1936/37), pp. 13 - 20, 50 - 55, 82 - 86, 114 - 118, 146 - 149, 178 - 180, 212 - 214, 242 - 245.

里奇,G.:"义和团运动中殉难的方济各会教士"

Ricci, Giovanni, *Franciscan Martyrs of the Boxer Rising. The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Sufferings and Death of Some of the Victims of the*

Boxer Rising, *China*, 1900. Adapted into English by Jerome O'Callaghan. Dublin: Franciscan Missionary Union, 1932. 136 pp.

同上:义和团运动中殉教的方济各会教士受害致死纪实

Richards, George, "Blood's Thicker than Wate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Recollections of the Royal Welsh Fuliliers", *Century* 94.5 (September 1917), pp. 786 - 789.

Reminiscences of combined service in the Battle of Tianjin.

理查兹,G.:"血浓于水"

天津战役中的联合军事行动

"Rightful Indemnities", *The Chautauquan* 32 (Cleveland, OH, March 1901), pp. 571 - 574.

"应有的赔偿"

Roberts, James Hudson, *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 Boston: Pilgrim Press, 1903. 402 pp.

罗伯茨,J.H.:逃生记及蒙古内窥

Robinson, Charles Napier (Commander, RN) (ed.), *China of Today: The Yellow Peril. An Album of Pictures and Photographs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l Places, Incidents, and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Crisis in China*. London: George Newnes, 1901.

First published at the offices of the Navy and Army, London, [n. d.]. 92 pp, chiefly illus.

鲁宾逊,C.N.:今日中国:黄祸

Rogan, James Watkyn, *The Yang Brothers: An Unforgettable Story of the Boxer Uprising*. Techny, IL: [SVD] Mission Press, [1951]. 120 pp.

See also Joseph Spillmann (1842 - 1905), *The Yang Brothers and the Boxers*.

罗根,J.W.:杨氏兄弟:难以忘怀的义和团起义

另见J.斯皮尔曼所著的"杨氏兄弟与义和团"

Ross, John, "Boxers in Manchuria", *Missionary Review* 23 (November 1900), pp. 829 - 830.

Published as a separate offprint, Shanghai: *North - China Herald Office*, 1901. 18pp.

罗约翰:"义和团在满洲"

Ross, John, "Evolution of a Boxer", *Missionary Review* 25 (February 1902), pp. 126 - 128.

同上:"一个拳民的进化"

Ross, John, "Missions and War in China", *Sunday at Home* (November 1900).

同上:"差会与中国的战争"

Ross, John, "Persecution in Manchuria", *Missionary Review* 25 (November 1902), pp. 817 - 824.

同上:"满洲的迫害活动"

Ruoff, E. G. (ed.), *Death Throes of a Dynasty: Letters and Diaries of Charles and Bessie Ewing, Missionaries to China*.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x + 276 pp.

劳夫,E.G.(编):一个王朝的死痛:在华教士查尔斯与尤因的日记与信件

Russell, Samuel Markus, *The Story of the Siege in Peking*. London: Elliot Stock, 1901. 50 pp.

骆三畏:北京被围记

Sai - chin - hua, *That Chinese Woman. The life of Sai - chin - hua*.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enry McAleav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9. 207 pp.

赛金花:赛金花传

Saunders, Alexander R., *A God of Deliverances: The Story of the Mar-*

vellous Deliverances through the Sovereign Power of God of a Party of Missionaries, when Compelled by the Boxer Rising to Flee from Shan – si, North China.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901]. 87 pp and [7] pp of plates.

桑德斯,A.R.:**拯救之主:山西逃亡记**

Saunders, Alexander R., 'In *Weariness and Painfulness*'. *Being the Account by Rev. A. R. Saunders of the Flight from P'ing – iao to Hank – kow of Himself and Party*.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1]. 31 pp.

同上:**从保定到汉口的艰苦逃亡**

Savage – Landor, A. Henry [Arnold Henry], *China and the Alli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1. 2 vols.

Reprinted [Taipei: China Press, 1974?].

"Appendix: Composition of the British Force despatched to China": Vol. 2, pp. [414] – 423.

萨维奇 – 兰德,A.H.:**中国与八国联军**

"附录:赴华英军的构成"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David, "Russia's Ambivalent Response to the Boxers", *Cahiers du monde russe* (January – March 2000).

施麦尔潘尼克,D.:**"俄国对义和团的含糊反应"**

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5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xiv + 322 pp.

施雷克,J.E.:**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Scott Moncrieff, G. K., "Peking, August 1900", *Blackwood's Magazine* (November 1905), pp. 627 – 638.

斯科特,M.G.K.:**"1900 年 8 月的北京"**

Seymour, Edward Hobart , *My Naval Career and Travels*. London: Smith, Elder & Co.; New York: E.P. Dutton & Co., 1911. xvi + 428 pp.

西摩,E.H.:我的军旅生涯

[Shanghai Mercury] , *The Boxer Rising: A History of the Boxer Troubl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2nd ed.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Ltd., 1901. x + 174 pp.

Reprint of the ed. of October 1900;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7. xii, xvi + 118 pp.

中国义和团之乱

Sharf, Frederic Alan, and Peter Harrington , *The Boxer Rebellion, China*, 1900: *The Artists' Perspective*. London: Greenhill;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0. 64 pp.

"A centennial exhibition."

沙尔夫,F.A.和P.哈灵顿:艺术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

"一次百年纪念展览"

Sharf, Frederic Alan, and Peter Harrington , *China*, 1900. *The Eyewitnesses Speak: The Boxer Rebellion as Described by Participants in Letters, Diaries and Photographs*. London: Greenhill Books;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0. 240 pp.

同上:义和团运动见证:信件、日记和照片

Sheeks, R. B.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 Ho Ch'üan and Its Role in the Boxer Movement", *Papers on China* (1947).

希克斯,R.B.:"对义和拳的再思考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Sheffield, D. Z. [Devello Zelotos],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deal and the Actual", *Forum* 29 (March – August 1900), pp. 584 –

595.

谢卫楼:"中国文明:理想与现实"

Sheffield, D. Z. [Devello Zelotos], "Eight Months of Foreign Domination in China: What Have They Accomplished?", *The Congregationalist* (15 June 1901), pp. 956 - 957.

同上:"外人治下的中国:八个月的业绩"

Sheffield, D. Z. [Devello Zelotos],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World on China. Progress, Mistak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 60 (1900), pp. 784 - 791.

同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Shockley, Philip M., *The Krag - Jorgensen Rifle in the Service*. Aledo, IL: World - Wide Gun Report, 1960. 68 pp.

肖克利,P.M.:战争中的克拉格步枪

Shore, H. N. (Commander Hon., RN), "The Chinese Crisis - Was It Foreseen?",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January 1901).

肖尔,H.N.:"中国危机被预见到了吗?"

Sinelle, J. (Rev.),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ritics", *North American Review* (May 1901).

西奈尔,J.(评):"传教士及其批评者"

Smith, Arthur Henderson, "Anti - foreign Riots", *The Outlook* 67 (New York, 12 January 1901), pp. 113 - 118.

明思溥:"反外动乱"

Smith, Arthur Henderson, *China in Convulsion*. New York and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1. 2 vols. Reprinted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2;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同上:动乱中的中国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ers to Chinese Discontent", *The Outlook* 66 (New York, 15 December 1900), pp. 923 – 926.

同上:"从外国人方面看中国人的不满"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Hand of God in the Siege of Peking", *Chinese Recorder* 32 (*February* 1901), *pp*. 83 – 88.

同上:"北京之围中的上帝之手"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Political Causes of the Uprising*", *The Outlook* 67 (New York, 30 March 1901), pp. 721 – 728.

同上:"起义的政治原因"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Punishment of Peking", *The Outlook* 66 .(New York 1900), pp. 493 – 501.

同上:"北京之罚"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Remoter Sources of the Troubles in China", *The Outlook* 66 (New York, 8 December 1900), pp. 879 – 883.

同上:"中国动乱的最深根源"

Smith, Arthur Henderson, "Six Months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Peking", *The Outlook* 67 (New York, 13 April 1901), pp. 865 – 871.

同上:"占领北京后的六个月"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Sources of the Troubles in China", *The Outlook* 66 (New York, 29 December 1900), pp. 1036 – 1041.

同上:"中国动乱的根源"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king", *The Outlook* 68 (New York, 18 May 1901), pp. 157 – 162.

同上:"北京的改造"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wo Famous Modern Sieges", *East of Asia* 2.3 (October 1903), pp. 230 – 240.

同上:"近代两次重大的的围困"

Smith, Arthur Henderson, "The Uprising in North China", *The Congregationalist* (25 January 1900), pp. 120 - 121.

同上:"华北的起义"

Smith, Arthur Henderson, "A Year After the Siege in Peking", *The Outlook* 68 (New York, 24 August 1901), pp. 969 - 975.

同上:"北京围困后的一年"

Smith, Judson, "The Diplomatists Concerning Missionaries in China", *Missionary Herald* (Boston, October 1900), pp. 395 - 398.

史密斯,J.:"与在华传教士有关的外交家"

Smith, Judson,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ritic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May 1901), pp. 724 - 733.

同上:"传教士及其批评者"

Smith, Stanley P., *China from Within, or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Crisis*. London, 1901.

司米德:中国内幕 - 中国危机的真相

Smyth, George B., "Causes of Anti - 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1 (August 1900), pp. 182 - 197.

施美志:"中国排外情绪探因"

Sowerby, Arthur, "The Crisis in China",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No.* 415 (July 1900), pp. 11 - 15.

苏道味:"中国危机"

Speer, R. E. [Robert Elliott], *A Memorial of Horace Tracy Pitki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3. 310 pp.

斯皮尔,R.E.:悼念毕得经

Speer, R. E. [Robert Elliott], *Missions and Modern History: A Study of the Missionary Aspect of Some Great Mov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4. 2 vols.

Contains a chapter on the Boxer Uprising.

同上:差会与近代史:传教士与19世纪的某些重大运动

Speer, R. E. [Robert Elliott], *Missions and Politics in China: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 Record of Cause and Effect*. New York and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1900. 61 pp.

同上:差会与中国政治:中国局势的原因和影响

Spender, A. E., "China: A Plea for Justice", *Westminster Review* (November 1900).

斯彭德,A.E.:"中国:请求伸张正义"

Sprague, William P., "Flight from the Boxers by Way of Siberia",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24 (February 1901), pp. 99 – 103.

斯普拉格,W.P.:"取道西伯利亚逃离义和团"

Start, E. A., "China, the Storm Center of World's Politics", *The Chautauquan* 33 (Cleveland, OH, May 1901), pp. 142 – 153.

斯塔特,E.A.:"世界政治风暴中心之中国"

Stead, W. T. [William Thomas], "Revolt of the Yellow Man", *Review of Reviews* (London, July 1900).

斯特德,W.T.:"黄种人的反抗"

Steel, Richard Alexander, "Peking under the Allies",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9 (1903), pp. 147 – 153.

Richard Alexander Steel, Captain, 17th Bengal Lancers, was A. D.C. to General Sir A. Gaselee.

斯蒂尔,R.A.:"联军占领下的北京"

斯蒂尔,孟加拉第17骑兵队上尉,为盖斯利将军的副师长

Steel, Richard Alexander, *Through Peking's Sewer Gate: Relief of the Boxer Siege, 1900 – 1901*. Ed. by G. W. C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1985. xxxvi + 101 pp.

同上:穿过北京水门:义和团围困的解除

Steiger, George Nye,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xxii + 349 pp.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Steiger, George Nye, "China's Attempt to Absorb Christianity: The Decree of March 15, 1899", *T'oung Pao* 24 (1926), pp. 215 - 146.

同上:中国吸收基督教的尝试:1899 年 3 月的谕令

Stenz, Georg Maria,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 S. V. D., Missionary in China. Assassinated November* 1, 1897. *2nd ed*. Techny, IL: Mission Press S.V.D., 1921. 142 pp.

薛田资:圣言会在华传教士韩理教父传

Stenz, Georg Maria, *Twenty - five Years in China*, 1893 - 1918. Techny, IL: Mission Press, 1924. 133 pp.

同上:在华二十五年,1893 - 1918

Taio - ko (Tiän - ti - huwe) and Charles Stanford, "The Russo - Chinese Imbroglio", *Westminster Review* 156.2 (August 1901), pp. 149 - 167.

"俄中之间的复杂关系"

Tan, Chester C., *The Boxer Catastrophe*. (Columbia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5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ix + 276 pp.

Reprinted Taibei, Taiwan: Rainbow - Bridge, 1967.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7, 1983. 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c1967] (The Norton Library, N575).

See also Tan Chun - lin.

谭春霖:义和团大灾难

Taussig, J. K. (Captain), "Experience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53.4 (April 1927), pp. 403 – 420.

Based on the author's journal kept as a midshipman with the American battalion of sailors and Marines in the Seymour column.

陶西格,J.K.:"义和团起义期间的经历"

Taw Sein Ko, "The Chinese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July – October 1900), pp. 73 – 81.

"中国问题及其解决"

Taw Sein Ko, "Missionary Troubles in China",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rd ser., 10 (1900), pp. 278 – 281.

"传教士在中国的问题"

Thompson, Roger R., "Twilight of the God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hristians, Confucians, and the Modernizing State, 1861 – 1911",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3 – 72, 386 – 388.

汤普森,R.R.:"中国乡村的信仰之光:基督教,儒教,和现代化"

Thomson, H. C. [Harry Craufuird], *China and the Powers: A Narrative of the Outbreak of* 1900. H. C. Thomson by London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2. xii + 285. Reprinted Westport, CT: Hyperion Press, 1981.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by newspaper correspondent Harry Craufuird Thomson,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and the Monthly Review.

Reviewed in Edinburgh Review (July – October 1902), pp. 210 – 235.

汤普森,H.C.:中国与列强

Thomson, H. C. [Harry Craufuird], "With the Peking Relief Force", *National Review* (April 1901).

同上:"与赴北京救援部队在一起"

Titchett, W. H. (Dr.), "The Fighting of the Month in China and in the Transvaal", *Review of Reviews* [Australian edition] (August 1900).

蒂切特,W.H.:"在中国和德兰士瓦作战的岁月"

Tiedemann, R. G., "Baptism of Fire: China's Christians and the Boxer Uprising of 1900",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4.1 (January 2000), pp. 7 - 12.

狄德满,R.G.:"炮火的洗礼:中国教徒与义和团运动"

Tiedemann, R. G., "Boxers, Christians and the Culture of Violence in North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5.4 (July 1998), pp. 150 - 160.

Review article concerning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同上:"义和团,基督徒和华北的暴力文化"

评柯文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Tiedemann, R. G., "Christianity in a Violent Environment: The North China Plain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in: Jeroom Heyndrickx (ed.),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1). Louvai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 U. Leuven, 1994; pp. 138 - 144.

同上:"暴力背景下的的基督教:义和团起义前夕的华北平原"

Tiedemann, R. G., "Rural Unrest in North China 1868 - 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outh Shandong", Ph. D.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1. xi + 432 pp.

同上:"1868 - 1900 年华北乡村的骚动"

[Townsend, Alfred Markham (ed.)], *In Memoriam. Walter Ewen Townsend*.

[New York:] 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1901. 187 pp.

Walter Ewen Townsend (1879 - 1900) was in the Beijing siege as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consular service.

[汤森,A.M.(编)]:纪念 W.E.汤森

北京被围时 W.E.汤森在英驻北京领事机构任职

Twain, Mark [i.e.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April 1901), pp. 520 - 534.

马克.吐温:"写给我的传教士批评者们"

Twain, Mark [i.e.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February 1901), pp. 161 - 176.

同上:"写给黑暗中的人们"

Twain, Mark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 and, Concerning the Rev. Mr. Ament*. [S.l.]: privately printed, 1926. 44 pp.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 appear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for February, 1901 ... The title here used for the second article is that chosen by Mark Twain. The text appear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for April, 1901, und the title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同上:写给黑暗中的人们及关于梅威良先生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Chinese*

Indemnity.

China and Japan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New York.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 24 pp.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国赔款**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Chinese Indemnity*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 6 pp.

United States, 6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907 – 1908. House.

同上:**中国赔款**.....

美国第 60 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07 – 1908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Remission of Chinese Indemnity.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Sixty –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 J. Res*, 33, *to Amend the Joint Resolution of May* 25, 1908, *Providing for the Remission of a Portion of the Chinese Indemnity, Monday, June* 1, 1914.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4. 41 pp.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赔款的减免**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Remission of Chinese Indemnity ... Report*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4. 8 pp.

同上:**减免中国赔款**.....**的报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dited by Jules Davids. Series III: The Sino – 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1894 – 1905. Vol. 5: *Boxer Uprising*; *Vol*. 6: *Boxer Uprising: The Indemnity Settlement*.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1. xxvi + 363 pp. and xxi +

301 pp.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和公共事务文件:美国和中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s of State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Department of Wa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ar with Spain and Conditions Growing out of the Same, Including the Insurrection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between the Adjutant - General of the Army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ba, Porto Rico,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rom April* 15, 1898 *to July* 30, 1902, *etc.* Washington DC, 1902. 2 vols.

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关于美西战争及其形势的通信(1898.4.15 - 1902.7.30)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1901 - 1909 (Roosevelt), *Remission of a Portion of the Chinese Indemnity.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 transmitting copy of an executive order signed on the 28th day of December*, 1908, *in execution of the joint resolution of May* 25, 1908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9. 11 pp.

美国总统 1901 - 1909(罗斯福):关于免除部分中国赔款的总统签署令(1908 年 12 月 28 日)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ar with Spain and Conditions Growing out of the Same: Including the Insurrection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between the Adjutant - General of the Army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ba, Porto Rico,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rom April* 15, 1898, *to July* 30, 1902; *With an Appendix Giving the Organization of Army Corps an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ar with Spai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2 vols.

美国陆军部副官长行署:**关于美西战争及其形势的通信(1898.4.15 - 1902.7.30)**

Van Bergen, R.,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ts Causes",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 60 (September 1900), pp. 791 - 794.

范伯根,R.:**"中国革命及其原因"**

Van Westrum, A. S., [Boxer Outbreak], *Book Buyer* (New York, January 1902).

范韦斯特罗姆,A.S.:**[义和团起义]**

Vaughan, H. B., *St. George and the Chinese Dragon: An Account of the Relief of the Pekin Legations*. By an officer of the British contingent. London: C. Arthur Pearson, 1902. 206 pp.

Lieutenant - Colonel Vaughan of the 7th Rajputs.

沃恩,H.B.:**圣乔治与中国龙:北京使馆解围记**

即第7拉杰普特军的沃恩中校

Waldersee, Alfred Heinrich Karl Ludwig, Graf von, *A Field - Marshal's Memoirs: From the Diary, Correspondence, and Reminiscences of Alfred, Count von Waldersee*. Condensed and trans. from the German by Frederic Whyte. London: Hutchinson, 1924. 286 pp.

Reprint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8.

瓦德西:**瓦德西日记、通信及回忆**

Walker, John Brisben, "China and the Powers", *Cosmopolitan* 29.5 (September 1900), pp. 468 - 475.

Walker was a personal friend of Sir Robert Hart and, like the latter, took a sympathetic view of the Chinese position.

沃克,J.B.:**"中国与列强"**

沃克为赫德爵士的朋友,两者都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

Walsh, Tom, "Herbert Hoover and the Boxer Rebellion", *Our Heritage in Documents* (Spring 1987), pp. 34 - 40.

沃尔什,T.:"胡佛与义和团运动"

Walton, Joseph (M.P.), *China and the Present Crisis, with Notes on a Visit to Japan and Korea*. London: Sampson Low, 1900. xii + 319 pp.

沃尔顿,J.:中国和当前的危机及日本朝鲜游记

Wang Hsueh - wen, "A Comparison of the Boxers and the Red Guards", *Issuesand Studies: A Monthly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and Communist Problems* 4.1 (OctoOber 1967), pp. 1 - 14.

王学文(音):"义和团与红卫兵的比较"

Wasserstrom, Jeffrey,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Boxers and Luddites as Heroes and Villains", *Theory and Society* 16 (1987), pp. 675 - 707.

瓦瑟斯罗姆,J.:"'文明'及其不满:作为英雄与暴徒的义和团与卢德派"

Weale, B. L. Putnam [pseud. of Bertram Lennox Simpson],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Being the Notes of an Eye - witness, Which Set forth in Some Detail, from Day to Day, the Real Story of the Siege and Sack of a Distressed Capital in* 1900, *the Year of Great Tribulatio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6. xii + 310 pp.

辛博森: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

Wehrle Edmund S.,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 - 19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6. xii + 223 pp.

韦尔莱,E.S.:英国、中国和反洋教暴乱

Wei, Kimble Y. C., "The Boxer Rebellion: A Study in the Explanat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Ph. 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1984.

魏,K.Y.C.:"义和团起义:对群体暴力的解释的研究"

Weinert, Richard, "The Battle of Tientsin", *American History Illustrated* (November 1966), pp. 8 - 13, 52 - 55.

韦纳特,R.:"天津的战斗"

Weinert, Richard, "The Capture of Peking", *American History Illustrated* (January 1968), pp. 22 - 28.

同上:"北京的攻陷"

Wen Ching,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Edited by G. M. Reith. London: Richards, 1901. xvi + 355 pp.

温景(音):中国内部危机

Werstein, Irving, *The Boxer Rebellion: Anti - foreign Terror Seizes China*, 1900. (A World Focus book).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71. 65 pp.

沃斯滕,I.:义和团运动:1900年遍及中国的反外恐慌

"What to Do with China", by an Old Resident.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ember 1900), pp. 305 - 317.

"拿中国怎么办"

White, Trumbull, and James P. Boyd, *The Story of China and Her Neighbors; Their Manners, Customs, Life and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Including the Boxer Uprising, Massacre of Foreigners and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Powers*. Illustrations by Morimoto Teitoku and J. C. Fireman. Philadelphia?, [1900?]. 491 pp.

怀特,T.和J.P.博伊德:中国与其近邻

Whitewright, John Sutherland, "The Causes of the Crisis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23 (December 1900), pp. 943 - 949.

怀恩光:"中国危机探因"

Whiting, Joseph L. , "Besieged in Peking",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11 October 1900), pp. 2422 – 2423.

怀定:"被围在北京"

Wiest, Jean – Paul, "Catholic Images of the Boxers" *American Asian Review* 9.3(Fall 1991), pp.41 – 66..

魏扬波:义和团在天主教世界的形象

Wildman, E. , "Were We Cruel in China?", *Munsey's Magazine* 25 (May 1901), pp. 169 – 173.

怀尔德曼, E.:"我们在中国残忍吗?"

Will, Allen S. , *World Crisis in China*, 1900.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with the "Boxers", and Ensuing Foreign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also a Sketch of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Distracted Situati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Closing Year of the Century. Baltimore and New York: John Murphy Co.*, [1900]. 198 pp.

Allen S. Will of the Baltimore Sun.

威尔, A.S.:1900 年中国的世界危机

Wilson, James Harrison, *China: Travels and Investigations in the "Middle Kingdom". A Study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Possibilitie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the Boxer War, the Relief of the Legations, and the Re – establishment of Peace*. 3rd ed., rev. throughout, enlarged and reset.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xxxii + 429 pp.

威尔逊:中国

Wilson, James Harrison, *Under the Old Flag: Recollection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Spanish War, the Boxer Rebellion, etc*.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 & Co., 1912. 2 volsReprint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1.

同上:在旧旗下:关于南北战争、西班牙战争和义和团战争军事行动的回忆

Wise, Frederick May , *A Marine Tells It to You*. As told to Meigs O. Frost. New York: J. H. Sears and Co., 1929. xii + 366 pp.

See pp. 26 – 74 for a personal account by Wise who served as a lieutenant in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怀斯,F.M.:让海军陆战队告诉你

怀斯在中国救援行动中任中尉,其叙述见 P.26 – P.74

Wood, Mary Elizabeth (comp.), *The Boxer Indemnity and the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Hankou: Printed by the Central China Post Ltd., [1924?]. 38 pp.

韦棣华(编):庚子赔款和中国的图书馆运动

Woodward, Anna Graham (Mrs. Morgan S. Woodward), "Personal Side of the Siege of Peking", *Independent* 52 (New York, 22 November 1900), pp. 2782 – 2791.

Mrs. Anna Woodward and her 17 – year old daughter Ione had arrived as visitors in Beijing on 4 April 1900, along with their friend Cecille Payen.

伍德沃德 夫人:"从个人角度看北京之围"

Worley, J. H. , "Recent Troubles in China", *Missionary Review* 13 (August 1900).

沃利,J.H.:"中国最近的动乱"

Wright, Stanley Fowler ,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3rd ed.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5. iv + 674 pp.

Includes comments on the Boxer indemnity.

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关的税收

包括对庚子赔款的评论

Wright, Stanley Fowler,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the Maritime and Native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27. 276 pp.

Includes comments on the Boxer indemnity.

同上:辛亥革命以来海关与常关税收的征收与处理

包括对庚子赔款的评论

Wu Ting Fang, "A Plea for Fair Treatment",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 60 (1900), pp. 951 - 954.

伍廷芳:"呼吁公平的对待"

Wu Yung, *The Flight of an Empress*. Trans. by Ida Pruitt. Told by Wu Yung, whose other name is Yü - ch'uan; transcribed by Liu K'un;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xxiii + 222 pp.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7]. 294 pp

Reprint of the 1936 ed.: Westport, CT: Hyperion Press, [1973]. xxiii + 222 pp.

吴永:慈禧西行记

Wurtsbaugh, Daniel W., "The Seymour Relief Expedition",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8.2 (June 1902), pp. 207 - 219.

A participant's account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Seymour column, with emphasis on the capture and defence of the Xigu Arsenal.

沃茨博,D.W.:"西摩救援行动"

一个参与者关于西摩联军军事行动的叙述,详述西沽武库的攻陷与防卫

Young, L. K. [Leonard Kenneth],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 - 190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xi + 356 pp.

扬,L.K.: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Young, Marilyn Blatt,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3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viii + 302 pp.

"This book began as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 Harvard University."

扬,M.B.:字面上的帝国:美国的对华政策

Yamagata, I., "The Great Disturbance in China", *Orient* (January 1901).

山县(音),I.:"中国暴乱"

(李新强译)

二 德 文[①]

[德]R.G.狄德满

Adler, M. , "Der China – Jammer, die wahre Schuld und die rechte Sühne", *Die Kritik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15 (1900), pp. 495 – 500.

阿德勒,M.:"中国 – 苦难:真正的罪与赎罪"

Amelung, Iwo, "Gegen die ausländischen Barbaren. Die 'Boxer' und ihr Mythos", in: Hans – Martin Hinz and Christoph Lind (eds.), *Tsingtau. Ein Kapitel deutscher Kolonialgeschichte in China*. Berlin: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98; pp. 165 – 172.

阿梅隆,I.:"抵抗洋鬼子:义和团及其传奇"

"Die Anklage gegen Mgr Favier und die Lazaristen in Peking", *Katholische Missionen* 30 (*February* 1901), *pp*. 111 – 112.

"控诉樊国梁阁下和北京的天主教布道协会会员"

Baecker, *P*. , "Das chinesische Problem", *Akademische Blätter* 16 (Berlin 1901), pp. 81 – 84, 100 – 104.

拜克,P.:"中国问题"

Becker, Otmar , *Gengzi riji: das Tagebuch des Hua Xuelan aus dem Beijing des Boxeraufstands. Mit einer Einführung zum Tagebuch in der*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孙立新及奥地利外交部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C.卡明斯基博士提供了部分论著条目.

chinesischen Tradition. (MOAG - 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e. V., 109). Hamburg: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1987. ii + 289 pp.

Also submitted a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mburg, 1987.

贝克,O.:庚子日记:北京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华学澜日记

本文为作者在汉堡大学的博士论文

"Die Beteiligung der Marine an der Seymour'schen Entsatzexpedition und an den Kämpfen in und um Tientsin Juni - Juli 1900. Nach amtlichen Quellen", *Marine - Rundschau* (Berlin 1900), pp. 1155 - 1177, 1317 - 1340.

"海军参加西摩远征增援及 1900 年 6 月 - 7 月的天津内外战争。据官方材料"

Die Betheiligung der Deutschen Marine an den KQämpfen in China. Sommer 1900. *Nach amtlichen Quellen mit Skizzen und einem Plan von Tientsi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01.

德国海军参加 1900 年夏天的中国战争。据官方材料提要,附天津地图

Binder - Kriegelstein, Eugen, Baron [Eugen, Freiherr Binder von Kriegelstein], *Die Kämpfe des deutschen Expeditionskorps in China und ihre militärischen Lehren*. Berlin: E. S. Mittler und Sohn, 1902. x + 273 pp.

宾德 - 克里格施坦,E.:德国远征军在中国的战争及其军事指南

Bismarck, Hermann, "Die Belagerung von Peking. Auszüge aus dem Tagebuch des Herrn Hermann Bismarck, Beamten im kaiserl. Chinesischen Zolldienst",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1. 5 (Shanghai,

1900), pp. 93 - 143.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by Deut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Shanghai and Qingdao.

俾斯麦克,H.:"北京包围战,中国皇家关税局官员 H.俾斯麦克日记选"

Bloch, Johann vo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in China. Eine politisch - wirtschaftliche Studie*. Berlin: Dr. John Edelheim, 1900. 40 pp.

布洛赫,J.:论中国的当代局势:政治 - 经济研究

Bornemann, Fritz, *Der selige P. J. Freinademetz* 1852 - 1908. *Ein Steyler China - Missionar*. Ein Lebensbild nach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Bozen: Freinademetz - Haus, 1977.

First internally published by the SVD in 1976.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without footnotes and appendices, see Bornemann, As Wine Poured Out.

博尼曼,F.:福若瑟(1852 - 1908 年),伟大的在华传教士。

"Die Boxer", *Daheim* 37.7 (Leipzig 1900).

"义和团"

"Der Boxer - Aufstand in China", *Militär - Wochenblatt* (1900), Nos. 71, 73, 79, 83, 87, 92, 94, 102, 104,112; (1901) Nos. 1, 6, 11.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Die Boxer in Südost - Tscheli", *Katholische Missionen* 29 (Freiburg i. Br. 1900/01), pp. 28 - 34.

"自立 - 东南的义和团"

Boy - Ed (Oberleutnant), *Peking und Umgegend, nebst einer kurzen Geschichte der Belagerung der Gesandtschaften* (1900). Wolfenbüttel: Heckner, 1908. 160 pp. 2nd ed.: [Carl?]

Boy – Ed and Maximilian Krieger, *Peking und Umgegend. Nebst einer kurzen Geschichte der Belagerung der Gesandtschaften*, 1900. Wolfenbüttel: Heckner, 1910. 182 pp.

The second edition was reviewed by Max von Brandt in Petermanns Mitteilungen (1909), Literaturblatt, pp. 240 – 241.

波伊 – 艾德: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 公使馆区包围简史

Brand, Wilhelm F. "Der chinesische 'Boxer'", *Zeit* No. 298 (Vienna, 16 June 1900).

布兰德,W.F.:"中国义和团"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Die chinesische Frage", *Deutsche Rundschau* (September 1900), pp. 457 – 460.

班德:"中国问题"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Die chinesische Frage vom deutschen wirt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aus",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900), pp. 757 – 765.

同上:"从德国的经济立场上看中国问题"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Die chinesische Krisis. Mahnwort zum Frieden", *Die Woche* No. 44 (1900).

同上:"中国危机 – 维护和平的警告"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Die gelbe Gefah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4 (1901), pp. 28 – 33.

同上:"黄祸"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Ostasiatische Fragen. China. Japan. Korea. Altes und Neues*. Berlin:

Gebrüder Paetel, 1897. 359 pp.

Chapter 6, entitled "Ostasiatische Probleme", pp. 137 – 191, deals extensively with the missionary proble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eutsche Rundschau* 81 (1894).

同上:东亚问题,中国、日本、朝鲜,过去与现在

第六章,题为"东亚问题",专述教士问题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Ursprung der Boxerbewegung und Ereignisse bis zur Eroberung Pekings", *Die Nation* 18. Jahrgang, No. 6 (1900).

同上:"义和团运动,从发生到占领北京的后果"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Die Wirren in China und die Missionar – Frage", *Die Nation No.* 9 (1 December 1900), pp. 131ff; No. 10 (8 December 1900), pp. 147 – 149; No. 11 (15 December 1900), pp. 165 – 167.

同上:"中国的动荡与传教问题"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Zeitfragen. Die Krisis in Südafrika. China; Commercielles und Politisches. Kolonial – Fragen*. Berlin, 1900. vi + 394 pp.

同上:时代问题,南非与中国的危机,商业与政治,殖民地问题

Brandt, Max von [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Die Zukunft Ostasiens.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zum Verständnis der ostasiatischen Frage*. 3rd rev. and augmented ed. Stuttgart: Strecker und Schöä der, 1903. iv + 118 pp.

The 3rd edition covers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Boxer Uprising and its aftermath.

同上:东亚的前途,历史与东亚问题论解

第三版包括了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

Bremen, Walter von., [On board with German troops for China], Da-

heim (15 & 22 September 1900). [the second number also includes acount from Tientsin to Peking]

布来门,W.:家园

Buis, Jan, "Vor dem Sturme", *Kleiner Herz - Jesu - Bote* 24.3 (December 1896), pp. 20 - 23.

布伊斯.扬:"暴风雨的前夜"

Butz, Herbert, "Kniefall und Geschenke: Die Sühnemission des Prinzen Chun in Deutschland", *in*: Hans - Martin Hinz and Christoph Lind (eds.), *Tsingtau. Ein Kapitel deutscher Kolonialgeschichte in China*. Berlin: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98; pp. 173 - 180.

布兹,H.:"下跪与礼品:醇亲王的赔罪使命"

Charpentier, A., "Die Greuel in Peking und die Mächte", *Zeit* No. 302 (Vienna 1900).

卡贡蒂尔.A.:"北京惨闻及在京列强"

Chen Ch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bis* 1933.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Nr. 56).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73. 341 pp. Originally presented as the autho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陈奇(音):1933 年以前的中德关系

最初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

Chen Xiaochun, *Mission und Politik. Studie über die deutsch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üd - Shandong*. Hamburg: Verlag Dr. Kovaĉ, 1992. 317 pp.

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陈晓春:传教与政治:论山东南部的德国天主教布道团

博士论文

Chesneaux, Jean, *Weisser Lotus, Rote Bärte. Geheimgesellschaften in*

China zur Vor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Trans. and comp. by Walle Bengs and Uli Laukat. (Wagenbachs Taschenbücherei, 15). Berlin: Klaus Wagenbach, 1976. 191 pp.

German translation of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谢诺,J.:白莲教,红胡子:中国革命史前的秘密教门

译自法文

"Die chinesische Krise und die evangelische und römisch – katholische Mission", *Deutsch – evangelische Blätter* (1900), pp. 555 – 563.

"中国危机和新教及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Die Christenverfolgung in Shansi zur Zeit des Boxeraufstandes 1900", *Antonius von Padua* 34 (1927), pp. 131 – 134.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的基督徒大迫害"

Coerper, Heinrich Wilhelm, *China und die Missionare. Eine wahre Beantwortung der Fragen: Wie hat Europa sich an China verschuldet? und Was ist Europa China schuldig?* Nach einem Vortrag, gehalten in Hamburg. Hamburg – Uhlenhorst, 1900. 42 pp.

科泊.H.W.:中国和基督教的传教。

Coerper, Heinrich Wilhelm, *China's Märtyrer. Aus der Christenverfolgung in China im Jahre* 1900. Dinglingen: St. Johannis – Druckerei, 1902. iv + 276 pp.

同上:中国的殉道者 – 1900 年中国基督徒大迫害时期

Corbach, Christian Paul, *Von Kiel bis Peking. Der Boxeraufstand vor* 25 *Jahren. Nach Tagebuchaufzeichnungen*. [s. l.]: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26.

科尔巴赫,C.P.:从基尔到北京:25 年前的义和团运动

Dabringhaus, Sabine, "Der Boxeraufstand in China (1900/1901): Die Militarisierung eines kulturellen Konflikts", in: Eva – Maria Auch

and Stig Förster (eds.), *'Barbaren' und 'Weiße Teufel'. Kulturkonflikte und Imperialismus in Asien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Paderborn: Schäningh, 1997; pp. 126 – 143.

达令豪,S.:**"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Dabringhaus, Sabine, *Grundkurs neuzeitliches Asien. Kurseinheit 7. Der Boxer – Aufstand in China*. Hagen: Fernuniversität, Gesamthochschule, 1992. 71 pp.

同上:**近代亚洲基础教程。第七单元: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Dose, Henry, *Erlebnisse eines China – Kämpfers vom 4. M? rz 1899 bis Weihnacht 1900. Briefe und Tagebuchblätter*. With a preface by Wilhelm Müller. Hamburg: Karl Thomsen, 1901. 66 pp.

泽.H.:**1899 年 3 月 4 日至 1900 年圣诞节期间一位中国斗士的经历。**

Eberspächter, Cord, "Ein Ohmstedter in China. Aus einem Bericht über den Boxeraufstand 1900/1901", *Oldenburger Jahrbuch* 98 (1998).

埃伯斯派西特,C.:**"关于 1900 – 1901 年义和团运动的报道"**

Efler, Gert, *Der Feldzug in China 1900/01 (Boxeraufstand). Betrachtungen zur politischen Lage und zu den Aktivitäten des deutschen Expeditionskorps einschliesslich seiner Gliederungen in Ostasien; Hintergründe der Stiftung einer Denkmünze für kriegerische Ereignisse in China sowie deren zugehö rige Gefechtsspangen*. (Orden – Militaria – Magazin, 43, 10. Jahrgang). Steinau: Bund Deutscher Ordenssammler; Munich: Förderkreis Deutsches Ordensmuseum, 1991. 44 pp.

艾弗勒,G.:**1900 – 1901 年的中国远征(义和团运动)**

"Erhebung des Nationalismus in China", *Historisch – politische Blätter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26 (Munich 1900), pp. 292 – 305.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Die Expedition Viceadmirals Seymour gegen Peking", *Neue militärische Blätter* 57. Band (1957), pp. 464 – 475.

Based on English sources.

"西摩的向北京进军"

根据英语资料

Favier, Alphonse [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 "Die Belagerung des Petang", *Katholische Missionen* 29 (Freiburg i. Br. 1901), pp. 73 – 76, 98 – 103.

樊国梁:**"北堂之围"**

Feigl, Hermann, "Der Aufstand der Boxer", *österreichische Monatsschrift für den Orient* (Vienna 1900), pp. 73 – 76, 85 – 87.

费格,H.:**"义和团起义"**

Felber, Roland, and Horst Rostek, *Der "Hunnenkrieg" Kaiser Wilhelms II.: imperialistische Intervention in China* 1900/01. (Illustrierte historische Hefte, 45).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87. 43 pp.

费尔伯,R.和 H.罗丝泰克:**威廉二世皇帝的"匈奴战争":1900 – 1901 年**

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干涉

"Feldpostbriefe aus China", *Daheim* 37. Jahrgang, Nos. 14, 16 – 18, 24, 28, 37, 38 (Leipzig 1901).

"来自于中国的战地军邮"

Felsing, Otto, *Gert Janssens China – Fahrten*. 1901.

费尔辛,O.:**格特·扬逊的中国漫游**

Fiebig, "Deutschlands größte übersee – Expedition", *Wehr und Waffen No.* 25 (24 June 1930).

费比希:**"德国最大的海外远征"**

Fischer, Hermann, *P. Joseph Freinademetz. Steyler Missionar in China 1879 – 1908. Ein Lebensbild*. Steyl: Missionsdruckerei, 1936. 204 pp.

费舍尔,H.:福若瑟—伟大的在华传教士(1879 – 1908 年)。

Fischer, Per, "Chinas geopferter Freund Clemens von Ketteler", in: Kurt Schleucher (ed.), *Bis zu des Erdballs letztem Inselriff: Reisen und Missionen*. (Deutsche unter anderen Völkern, 6). Darmstadt: Turris – Verlag, 1975. pp. 170 – 223.

费舍尔,P.:"在中国捐躯的朋友克林德"

Fleming, Peter, *Die Belagerung zu Peking. Zur Geschichte des Boxeraufstandes*. Trans. from the English by Alfred Günther and Till Grupp. Nachwort von Petra Kolonko. (Die andere Bibliothek, 155). Frankfurt a. M.: Eichborn, 1997. 367 pp.

傅勒铭:占领北京:义和团运动史论

Forster – Streffler, S. von, "Boxeraufstand. Selbsterlebtes aus den Sommertagen von 1900", *Wiener Magazin* 4.9, pp. 8 – 15.

福斯特 – 施特莱费勒,S.:"义和团运动:1900 年夏季的亲身经历"

Franke, Wolfgang,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 – 1949. 2nd, augmented ed. Munich and Vienna: Oldenbourg, 1980. 294 pp.

傅吾康:中国革命一世纪

Franke, Wolfgang, "*Zur anti – imperialistischen Bewegung in China*", *Saeculum* 5 (1954), pp. 337 – 358.

同上:"论中国的反帝运动"

Gebsattel, L. von, "Aus dem Boxeraufstand vom Jahre 1900", *Gelbe Hefte 7.8 (1931), pp. 516 – 524.*

格布萨特,L.:"1900 年义和团运动记事"

Gebsattel, L. von, "Erinnerungen an die ostasiatische Expedition 1900/01", *Gelbe Hefte* 7.2 (1930), pp. 551 – 565.

同上:"1900 – 1901 年东亚远征回忆录"

Genähr, Immanuel Gottlieb, *Die Wirren in China in neuerer Beleuchtung*. Ein Salongespräch über die Mission. Gütersloh: C. Bertelsmann, 1901. 24 pp.

叶道胜:关于中国动乱的新视角:一次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讨论

Genschow, A., *Unter Chinesen und Tibetanern*. Rostock i. M.: C. J. E. Volckmann, 1905. vi + 384 pp.

Genschow was a lieutenant and interpreter in the East Asia Expeditionary Corps.

根绍,A.:置身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

作者为东亚远征军中尉及翻译官

Germany. *Die Groß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 – 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Im Auftrage des Auswärtigen Amtes hrsg. von by Johannes Lepsius, Albrecht Mendelsohn – Bartholdy, and Friedrich Thimme.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2 – 1927. 40 vols.

The material pertaining to China (in Vols. 9 and 14/1) was reprinted as *Die Sammlung der deutschen diplomatischen Akten, über die Vorgehen der europäischen Mächte in Ostasien, gewählt aus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 – 1914". Peking, 1940.

德国,1871－1914年各欧洲内阁政府的重大决策。外交部外交文件集

Germany. Kriegsmarine. Oberkommando. *Die kaiserliche Marine wähhrend der Wirren in China*, 1900－1901. Herausgegeben vom Admiralsstabe der Marine. Berlin: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1903. 271 pp.

德国,海军,最高司令,1900－1901年中国动乱时期的帝国海军

Germany. Reichstag. "*China Debatte*". 1900－1901. 10. Legislatur－Periode. II. Session. 1900－1901. 3. bis 6. u. 49 Sitzung.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der Norddeutschen Buch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1901].

Extracted from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

德国,帝国议会,关于中国的讨论,1900－1901年

Giehrl, Rudolf, *China－Fahrt. Erlebnisse und Eindrücke von der Expedition* 1900－01. Munich: J. Lindauer, 1903. vii + 198 pp.

吉尔.R.:中国之旅,1900－1901年远征的经历及印象

Goldmann, Paul, *Ein Sommer in China. Reisebilder*. 2nd rev. and augmented ed. Frankfurt a. M.: Rütten & Loening, 1900. 2 vols.

高德曼,P.:一个夏天在中国:旅行见闻

Grimm, Tilemann, "Anti－imperialistische Bauernaufstä? nde in China",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29 (1978), pp. 359－366.

格林,T.:"中国的农民反帝运动"

Grimm, Tilemann, "Die Boxerbewegung in China 1898－1901",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4 (1977), pp. 615－634.

同上:"1898－1901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Gründer, Horst, *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ihrer Beziehungen während der deutschen Kolonialzeit (1884 – 1914),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Afrikas und China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82.

The China mission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4.

格伦德,H.:基督教的传教运动与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德国殖民时期(1884 – 1914年)特别是在非洲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史

第四章对中国内地会有论述

Gündell, Erich von, *General Erich von Gündell. Aus seinen Tagebüchern. Deut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1900 – 1901. Bearbeitet und hrsg. von W. Obkircher.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 – Anstalt, 1939. vii + 358 pp.

冯.君德尔,E.:艾里希将军日记:德国的对中国远征军,1900 – 1901年

Günther, Hugo, *Die Schreckenstage von Peking. Eigene Erlebnisse und Beobachtungen nebst Illustrationen und Situationsplan*. Edited by Hermann Lunecke. Hamm i. W.: E. Griebach, 1902. 103 pp.

Günther was a corporal in the German naval detachment "Graf von Soden".

君特,H.:北京的恐怖岁月:附有图解和地图的亲身经历和观察

作者为德国海军分队下士

Harder, A., *Wider den gelben Drachen. Abenteuer und Fahrten zweier deutscher Jünglinge im Lande der Boxer*. Bielefeld and Leipzig: Velhagen & Klasing, 1900. viii + 531 pp.

哈特尔,A.:与黄魔博斗:两个德国青年在义和团境内的冒险游历

Hart, Robert (Sir), "Die Boxer (1900)", *Deutsche Revue* 26 (1901),

pp. 257 – 267.

赫德:"义和团(1900 年)"

Hartmann, A., "Die Hinrichtung der Mandarinen", *Der Lotse. Hamburger Wochen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 1.30 (1901).

哈特曼,A.:"一位中国朝臣的绞刑"

Hartwich, Richard,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Vol. 1: Missionarische Erschliessung Südshantungs* 1879 – 1903. (Studia Instituti Missiologici Societatis Verbi Divini, 36). S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1983.

哈特维希,R.:斯太尔传教士在中国,第一卷:山东南部的传教活动,1879 – 1903 年

Haslinde, Heinrich, *Tagebuch aus China* 1900/1901. Edited by Marlis Ottmann. Munich: published by the editor, 1990.

哈斯林德,H.: 1900 – 1901 年中国日记

Heinze, Wolfgang, *Die Belagerung der Pekinger Gesandtschaften. Eine völkerrechtliche Studi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01. 278 pp.

海则,W.:围攻北京使馆区:国际法个案研究

Henninghaus, Augustin, "Die Boxerbewegung im nördlichen China", *Alte und neue Welt* 35 (Einsiedeln 1900), pp. 209 – 213.

海宁豪,A.:"华北的义和团运动"

Henninghaus, Augustin, *P. Josef Freinademetz SVD. Sein Leben und Wirken. Zugleich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Mission Süd – Schantung*. Yanzhou: Verlag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1920.

同上:福若瑟:其生平和著作,兼论山东南部传教史

Herhold, H., "Bei der 2. Brigade des ostasiatischen Expeditions – Korps vorzugsweise vorgekommenen Krankheiten in China", *Deutsch militärärztliche Zeitschrift* (1901), pp. 641 – 655.

赫浩特,H.:"在东亚远征军团第二旅时的情景"

Herrings, Joseph , *Das erste Lorbeerreis des III*. Seebataillons. Shanghai, [s.a.].

赫令斯,J.:第三海军营的第一次胜利

Herrings, Joseph , *Taku – Die deutsche Reichsmarine in Kampf und Sieg*. Berlin: Hermann J. Meidinger, 1903. 160 pp.

同上:大沽——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战斗与胜利

Hesse – Wartegg, Ernst von , "China gegen Europa", *Der Türmer* (Stuttgart, April 1901), pp. 39 – 47.

赫瑟 – 瓦泰格,E.:"与欧洲对抗的中国"

Hetze, Stefanie , "Feindbild und Exotik. Prinz Chun zur Sühnemission in Berlin", in: Kuo Heng – yu (ed.), *Von der Kolonialpolitik zur Kooperatio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 – 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Munich: Minerva Verlag, 1986; pp. 141 – 161.

海策,S.:"敌意与异国情调:醇亲王到柏林的'求和使命'"

Hirth, Friedrich , "Die Strafuniversität des Herrn Eugen Wolf in Peking. – Die Reformpläne des Kaisers von China und sein Universitätsprojekt für Peking", *Hochschul – Nachrichten Heft* 125 (February 1901).

夏德:"中国皇帝的改革计划及其对北京地区高校的改革方案"

Horbach, Philipp , *Anzer contra Anzer*. Sonder – Abdruck aus dem "Reichsboten". Gütersloh: C. Bertelsmann, 1901. 29 pp.

霍巴赫,P.:安治泰

Horbach, Philipp , *Bischof von Anzers China – Mission in ihren Beziehungen zur Politik. Aktenmäßige Darlegungen nach den Aussagen des Bischofs und seinerMissionare*. Marburg: Moritz Spiess, 1901. 24 pp.

同上:安治泰主教的中国传教事业

Horbach, Philipp , *Offener Brief an Herrn Bischof von Anzer über die Stellung der Mission zur Politik, zugleich eine Denkschrift an die deutsche Regierung*. Gütersloh: C. Bertelsmann, 1900. 90 pp.

同上:**就传教与政治的关系致安治泰主教的一封公开信**

Ibler, Wolgang , "Die Christenverfolgung in der Provinz Schansi", *Deutscher Hausschatz in Wort und Bild* 27.26 (Regensburg 1901).

伊伯勒,W.:**"山西的基督徒大迫害"**

Ignotus , "Der chinesische 'Boxer'", *Die Wage. Wiener Wochenschrift* No. 26 (1900).

伊格诺图:**"中国的'义和团'"**

Jung, Emil , "Die chinesischen Boxer", *Deutsche Rundschau für Geographie und Statistik* 23 (Vienna 1900), pp. 157 – 162.

容格,E.:**"中国的义和团"**

Kaminski, Gerd, *Der Boxeraufstand*. Entlarvter Mythos. (Berichte des Ludwig – BoltzmannInstituts für China – und Südostasienforschung, 38) Vienna: Löcker Verlag, 2000. 248 pp.

卡明斯基,G.:**义和团起义**

Kaminski, Gerd, and Else Unterrieder , *Wäre ich Chinese, so wäre ich Boxer: Das Leben an der k. und k.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in Tagebüchern, Briefen und Dokumenten*. (Berichte des Ludwig – Boltzmann – Institut für China – und Südostasienforschung, 28). Vienna and Zurich: Europaverlag, 1989. 163 pp.

Includes reports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Austrian diplomat Arthur von Rosthorn and his wife Paula during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Chapter 3).

卡明斯基,G.和翁特里德,E.:**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加入义和团:在北京**

使馆的生活,日记、书信和文件

包括奥地利外交官 A.罗桑及其妻子保拉在使馆被围期间的报道及言论

"Der Kampf um Tientsin. Die Einnahme der Taku – Forts und von Taku nach Peking", *Neue militärische Blätter* 57 (Berlin 1900), pp. 315 – 333.

"天津战役:攻克大沽工事,从塔库到北京"

Die Kämpfe in China. In militärischer und politischer Beziehung dargestellt von Asiaticus. Berlin: Richard Schröder, 1900. 2 Vols.

Vol. II (pp. 76): *Die Ereignisse bis zur Erstürmung von Tientsin am* 14. Juli 1900.

在中国的斗争:阿齐亚所表述的军事和政治关系

Kamphausen, Adolf, "Die 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ie jetzigen Wirren in China", *Deutsche Revue* 26 (January 1901), pp. 80 – 91.

坎普豪,A.:"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与现今中国的动乱"

Kamsauer, Paul, *Aus dem Tagebuche eines Chinakriegers*. Wolfenbüttel: Heckner, [1904]. 104 pp.

坎造厄,P.:一位中国斗士的日记

Kent, Alexander, *Die Faust der Marine. Hauptmann Blackwood im Boxer – Aufstand*. Trans. from the English by Hans and Hanne Mockel. Frankfurt and Berlin: Ullstein, 1986. 221 pp. 3rd ed. 1993.

A novel set at the time of the Boxer Uprising.

肯特,A.:海军的铁拳:义和团起义中的司令官布拉克伍德

义和团起义时写成的一部小说

Kieser, Egbert, *Als China erwachte. Der Boxeraufstand. Esslingen: Bechtle*, 1984. 349 pp.

奇瑟,E.:中国的觉醒:义和团运动

Kollekt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China, *Die Yihetuan – Bewegung von* 1900. 1st ed. Beijing: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1978. 136 pp.

现代中国史文丛: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

Kranz, Paul, "Der Krieg in China und die Missio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1900), pp. 241 – 246.

克兰茨,P.:"中国的战争与传教活动"

Kuo Heng – yu, "Boxerbewegung", in: Wolfgang Franke (ed.), *China – Handbuch*. Düsseldorf, 1974.

郭恒钰(音):"义和团运动"

Kürschner, Joseph (ed.), *China. Schilderungen aus Leben und Geschichte, Krieg und Sieg. Ein Denkmal den Streitern und der Weltpolitik*. Berlin: Deutsche Kriegerbund – Buchhandlung, 1901. xl + 547, 444, 462 col., 7 pp

Leipzig: H. Zieger, [1902]. 3 parts in 1 vol.

Teil 1. Land und Leute – – Teil 2. Die Wirren 1900/1901 – – Teil 3. Erzählendes und Anderes von und aus China.

屈施讷,J.:中国:生活和历史、战争和胜利纪实,战士与世界政治纪念碑

Lee Kuo – chi [Li Guoqi], *Die chinesische Politik zum Einspruch von Shimonoseki und gegen die Erwerbung der Kiautschou – Bucht. Studien zu den chinesisch – deutschen Beziehungen von* 1895 *bis* 1898. Münster i. W.: C. J. Fahle, 1966.

李国祈(音):论 1895 – 1898 年的中德关系

"Leiden und Verluste der Mission in Nordchina", *Katholische Missionen* 29 (Freiburg i. Br. 1900), pp. 142 – 150. Also: "Leiden und Verluste, China", in *ibid.*, pp. 85 – 90, 107 – 111, 132 – 135, 176 – 178, 202 – 207, 226 – 227, 268 – 272; and "Liste der

bisher ermordeten Missionäre und Schwestern in China", in ibid., pp. 63, 224 – 226.

"华北传教士的遭遇和损失"

Leisner, "Aus dem Tagebuch eines Chinakämpfers", *Darstellungen aus der bayerischen Kriegs – und Heeresgeschichte* 11. Heft (Munich 1902). Hrsg. vom K. B. Kriegsarchiv.

莱斯纳:"一位中国斗士的日记"

Leitenbauer, Matthias, "Szenen aus den Boxerwirren", *Katholische Missionen* 60 (1932), pp. 95 – 97, 125 – 129, 157 – 160, 187 – 190.

莱屯鲍厄,M.:"义和团动乱中的场景"

Leroy – Beaulieu, Pierre, *Die chinesische Frage*. Translated by Albert Südekum. Leipzig: G. H. Wiegand, 1904. iii + 170 pp.

A translation of pt. 3 of the author's *La rénovation de l'Asie, Sibérie, Chine, Japon*.

莱罗伊 – 碧奥留,P.:中国问题

Lessel, Emil von, *Böhmen, Frankreich, China*: 1866 – 1901. *Erinnerungen eines preussischen Offiziers*. Introduced, explained and edited by Walther Hubatsch. (Studien zur Geschichte Preussens, 34). Cologne, Berlin: Grote, 1981. 323 pp.

Lessel, Emil von (1847 – 1927).

莱塞尔,E.:捷克、法国、中国:1866 – 1901 年,一位普鲁士军官的回忆

Leutner, Mechthild (ed.),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 – 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 bis 1914. Ein Quellensammlung*. Bearbeitet von Klaus Mühlhah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568 pp.

罗梅君(编):"殖民地的样板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

Leutner, Mechthild, "Yihetuan: Für Gerechtigkeit und Frieden. Boxer-

aufstand und Kolonialkrieg in China", in: *Fin des Siecles*. *Berlin*, 1986.

同上:"义和团:正义与和平。义和团运动和中国的殖民战争"

Liebknecht, Wilhelm, *Weltpolitik, Chinawirren, Transvaalkrieg : eine Rede ..., gehalten zu Dresden im "Trianon" am 28. Juli* 1900. Dresden: Kaden, 1900. 23 pp.

利伯克奈希特,W.:世界政治,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

L? bbecke, Robert, *Ein Westfale in China. Briefe und Fotografien* 1895 – 1900. *Der Nachlass Robert Löbbecke, Iserlohn*. Bearbeitet von Götz Bettge. Eingel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Bruns. (Westfälische Quellen und Archivverzeichnisse, 8). Münster: Landschaftsverband Westfalen – Lippe, 1982. 448 pp.

罗白克,R.:一位威斯特伐里亚人在中国:书信和照片,1895 – 1900 年

Loch, Werner, "Die imperialistische deutsche Chinapolitik 1898 – 1901 und die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 gegen den Volksaufstand der Ihotwan", Ph. D. Dissertation, Leipzig: Karl – Marx – Universität, 1960.

罗赫,W.:"1898 – 1901 年德国对华帝国主义政策及对义和团起义的军事干涉"

Löffler, Otto, *Die China – Expedition* 1900 – 1901.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hötigkeit des Armee – Oberkommandos und des deutschen Expeditionskorps*.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02. 48 ppOffprint from Beiheft zum Militär – Wochenblatt.

罗佛勒,O.:1900 – 1901 年的中国远征

Loti, Pierre [pseud. of Louis – Marie – Julien Viaud], *Die letzten Tage von Peking*. Dresden, 1924.

绿蒂:在北京的最后几天

Mabire, Jean, *Blutiger Sommer in Peking. Der Boxeraufstand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reta Steinböck and Alfred Baumgartner. Vienna and Berlin: P. Neff Verlag, 1978. 398 pp.

Also published at Bergisch – Gladbach: Lübbe, [1980]. (Bastei – Lübbe – Taschenbuch, Bd. 65030). 429 pp.

马比尔,J.:北京流血的夏天,目击者对义和团起义的报告

"Die Mächte in Peking und die Frage des Friedens", *Historisch – politische Blätter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26 (1900), pp. 367 – 377.

"在北京的列强与和平问题"

Maus, Carl, "Das grosse Leidensjahr 1900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 in China", *Geschichten und Bilder aus der Mission* No. 19 (Halle a. d.S. 1901), pp. 1 – 14.

毛斯,C.:"1900 年,一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悲惨的一年"

Maus, Carl, Die *Ursachen der chinesischen Wirren und die evangelische Mission*. Kassel: Ernst Röttger; Barmen: Missionshaus, 1900. 80 pp.

同上:中国动乱的原因和新教的传教活动

Max, Franz, *Unsere Chinafahrt. Feldzug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Offiziers*. [s.l.], [s.a.].

马克斯,F.:中国之行,一位德国军官的战地回忆

Michael, M., "Zur Entsendung einer deutschen Expeditionstruppe nach China während des Boxeraufstandes", in: Kuo Heng – yu (ed.), *Von der Kolonialpolitik zur Kooperatio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 – 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Berliner China – Studien, 13). Munich: Minerva Publikation, 1986. pp. 141 – 161.

米查尔,M.:"论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向中国派遣的远征军

团"

Monitor , *Der Weltkrieg um China*. Berlin: Hermann Walther, 1900. 47 pp.

莫尼托:争夺中国的世界大战

Müller, Alfred von , *Unsere Marine in China. Eingehende Darstellung der Thätigkeit unserer Marine und der See – Bataillone im ersten Abschnitt der "China Wirren"*. Berlin: Liebel, [1901]. vi + 290 pp. With "original reports" by participants and eyewitnesses: Kapitänleutnant Kühne, Oberleutnant Count von Soden, Lustig, von Wolf, Oberleutnant zur See Hilmers, Marine – Oberzahlmeister Koslik (*SMS Iltis*), Oberlazarettgast [Henry] Dose.

穆勒,A.:我们的海军在中国,详述海军及海上军旅在"中国动乱"前期 的行为

参与者与见证人的真实报道。

Müller, Alfred von , *Die Wirren in China und die Kämpfe der verbündeten Truppen*. *2nd ed*. Berlin: Liebel, 1902. 2 vols.

同上:中国动乱与联军的战役

Müller, Gustav , "Ein Rückblick auf den Pressefeldzug gegen die chinesische Mission", *Monatsschrift für Stadt und Land* (Leipzig 1901), pp. 502 – 509.

同上:"中国传教对抗报道一瞥"

Mumm, Alfons, Freiherr von Schwarzenstein ,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Meinen Mitarbeitern in Peking zur freundlichen Erinnerung*. Berlin: Graphische Gesellschaft, 1902. 268 pp.

穆默:日记与照片,深情忆念北京的同事

Nippold, Friedrich , *Bischof von Anzer, die Berliner amtliche Politik und die evangelische Mission*. Berlin: Schwetschke u. Sohn, 1905.

尼泊德,F.:安治泰主教,柏林的官方政策与新教传教

O'Connor, Richard, *Der Boxeraufstand: Gewalt und Tragödie*. Trans. from the American by Renate Zeschitz. (Heyne - Geschichte, 36). Munich: Heyne, 1980. 334 pp.

奥康纳,R.:义和团运动:强权与悲剧

[Obst, Adolf, and von Rocholl], *Deutschland in China*, 1900 - 1901. Bearbeitet von Teilnehmern an der Expedition. Düsseldorf: Bagel, 1902. 445 pp.

奥布斯特,A.和冯.罗科尔:德国在中国,1900 - 1901 年

Oestrich, O. von, "Der Feldzug der Alliierten im Jahre 1860 und die gegenwärtige Lage in China", *Velhagen und Klasing's Monatshefte* (Leipzig, September 1900), pp. 113 - 119.

奥斯特里希,O.:"1860 年联军远征及其当前在中国的状况"

Oppert, Ernst, [The crisis in China], *Zeit* (Vienna, 14 July 1900).

奥泊特,E.:中国的危机

Orloff, N. A., *Die Eroberung der Mandschurei durch die Transbaikal - Kosaken im Jahre* 1900.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R. Ullrich. Straßburg i. E.: Wolstein und Teilhaber, 1904. 203 pp.

See also the French translation under Orlov.

奥尔洛夫,N.A.:1900 年通过外贝加尔哥萨克占领蒙古

[Pichon, Stephen], "Der Bericht des französischen Gesandten in Peking, Mr. Pichon über die Belagerung der fremden Gesandtschaften vom 20. Juni bis zum 14. August 1900", *Mittei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s Seewesens* (Vienna 1901), pp. 438 - 444.

毕盛:"法国使官在北京的报告,毕盛先生关于 1900 年 6 月 20 日至 8 月 14 日包围使馆区的报告"

Plaschka, Richard Georg, *Matrosen, Offiziere, Rebellen. Krisenkonfrontationen zur See* 1900 - 1918: *Taku, Tsushima, Coronel / Falkland*, "*Potemkin*," *Wilhelmshaven, Cattaro*.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Ost – und Südosteuropa – Instituts, 12 – 13). Vienna, Cologne, Graz: Böhlau, 1984. 2 vols.

Vol. 1.: Faktoren und Expansion, has a section on Dagu in 1900.

普拉史卡,R.G.:水兵,军官,叛乱。1900 – 1918 年的海上对抗:大沽,对马,克罗内尔/法克兰,"波捷姆基",威廉港和卡塔罗

第一卷:国外事业与扩张,有关于 1900 年的大沽的论述

Post, N., "Die Unruhen in China und deren Einfluss auf den Handel dieses Reiches", *österreichische Monatsschrift für den Orient* (Vienna 1900), pp. 133 – 134.

泊斯特,N.:"中国的骚乱及其对商贸的影响"

Puhl, Stephan, *Georg M. Stenz SVD* (1869 – 1928). *Chinamissiona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Republik*. Edited by Roman Malek.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317 pp.

普尔,S.:薛田资(1869 – 1928 年):帝国和共和国的传教士

Rauch, Fedor von, *Mit Graf Waldersee in China: Tagebuchaufzeichnungen*. Berlin: F. Fontane, 1907. x + 451 pp.

劳赫,F.:与瓦德西伯爵在中国:日记

Reinhard, *Mit dem II. Seebataillon nach China*! 1900 – 1901. Auf Befehl des Kommandeurs des mobilen II. Seebataillons bearb. von Reinhard ... Mit Skizzen, sowie zahlreichen Abbildungen nach Photographien und Zeichnungen des Marinemalers Petersen – Flensburg. Ver? ffentlicht aus Anlass der Feier des 50 – jährigen Bestehens der Marine – Infanterie 1852 – 1902. Berlin: Liebel, 1902. v + 168 pp.

莱因哈德:第二海军旅向中国进军,1900 – 1901 年

Reuter, R., "Die Dinge in China", *Friedensblätter* (Esslingen 1901), pp. 13 – 17.

罗伊特,R.:"中国记事"

Richter, P. , "Die Märtyrer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 in China. 1900", *Die evangelischen Missionen* (1901), pp. 97 – 106.

里希特,P.:"在中国的新教殉教者,1900 年"

Richthofen, Wilhelm von, Freiherr , *Chrysanthemum und Drache. Vor und während der Kriegszeit in Ostasien. Skizzen aus Tagebüchern*. Berlin: Ferd. Dümmler, 1902. vii + 288 pp.

李希霍芬男爵:菊花与魔鬼:东亚危机的前夜和历程。日记摘要

Rivinius, Karl Josef , "Anfänge der Missionstätigkeit der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unter d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Umfeldes des P. Josef Freinademetz (1852 – 1908)", *China heute* 19.1 – 2 (2000), pp. 46 – 56.

里温纽斯,K.J.:"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福若瑟政治与社会活动考察"

Rivinius, Karl Josef , "Boxerbewegung und christliches Missionswesen in China", *Verbum SVD* 32 (1991), pp. 65 – 95.

同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实质"

Rivinius, Karl Josef, "Imperialistische Welt – und Missionspolitik: der Fall Kiautschou", in: Klaus J. Bade (ed.), *Imperialismus und Kolonialmission: Kaiserliches Deutschland und koloniales Imperium*. Wiesbaden: Steiner Verlag, 1982. pp. 269 – 288.

同上:"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和传教政策:胶洲事件"

Rivinius, Karl Josef, "Das kaiserliche Edikt vom 15. März und das katholische Missionswesen in China", in: Roman Malek (ed.), *"Fallbeispiel" China. ökumenische Beiträge zu Religion, Theologie und Kirche im chinesischen Kontext*. St. Augustin –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6. pp. 129 – 158.

同上:"3 月 15 日的皇帝敕令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

Rivinius, Karl Josef, *Mission und Politik. Eine unveröffentlichte Korrespondenz zwischen Mitgliedern der 'Steyler Missionsgesellschaft' und dem Zentrumspolitiker Carl Bachem*.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Missionspriesterseminars St. Augustin bei Bonn, Nr. 28). S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1977.

同上:传教与政治:一份没有发表的"伟大的传教会"成员与天主教中央政治 要员 C.达切姆的通信

Rivinius, Karl Josef, *Weltlicher Schutz und Mission. Das deutsche Protektorat über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von Süd - Shantung*. (Gabriel Adriányi, Ernst Dassmann, Eduard Hegel, and Bernhard Stasiewski, eds.: Bonner Beiträge zur Kirchengeschichte, 14). Cologne and Vienna: B? hlau Verlag, 1987. xliv + 599 pp.

同上:世俗势力的庇护与传教工作的进行,德国对天主教鲁南传教的保护

Rogalla von Bieberstein, "Das deutsche Expeditionskorps für China", *Neue militärische Blätter* 57 (1900), pp. 121 - 135.

罗格拉.冯.毕伯斯坦:"德意志的中国远征团"

Rogge, Christian (Marine - Oberpfarrer), *Deutsche Seesoldaten bei der Belagerung der Gesandtschaften in Peking im Sommer* 1900. Berlin: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1902. iv + 75 pp.

罗格,C.:1900 年夏天北京使馆包围战中的德国海军

Scheibert, J. [Justus], *Der Krieg in China* 1900 - 1901 *nebst einer Beschreibung der Sitten, Gebräuche und Geschichte des Landes*. *Berlin: A. Schröder*, 1900 - 1901. 2 vols.

Another edition: Berlin: C. A. Weller, 1909. v + 535 pp.

赛伯特,J.:1900 - 1901 年的中国战争,该国风土人情兼览

Schlatter,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Fremden - und Christenverfolgung*

vom Sommer 1900. (*Basler Missions – Studien*, *Heft* 7). *Basel*: *Missionsbuchhandlung*, 1901. 77 pp.

施拉特,W.:1900 年夏天中国对外国人和基督徒的大迫害

Schlatter,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Krisis", *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 (1902), pp. 364 – 376, 397 – 422, 459 – 468.

同上:"中国危机"

Schlick, "Die Verwundungen des deutschen Detachements beim Seymour' schen Expeditionskorps", *Marine – Rundschau* (Berlin 1901), pp. 182 – 195.

史里克:"西摩远征军团中的德国分遣队的损失"

Schlieper, Paul, *Meine Kriegs – Erlebnisse in China. Die Expedition Seymour*. 2nd ed. Minden i. Westf.: W. Köhler, 1902. 138 + x pp.

An English manuscript translation, entitled "The Seymour Expedition", is found in the Edward H. Seymour Collection, Phillips Library,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 U.S.A.

史里泊,P.:我在中国的战争经历:西摩远征

美国麻萨诸塞州菲利普图书馆的西摩文集中有英译手稿,题为"西摩远征"

Schott, Ernst, *Die Wirren in China und ihre Ursachen*. Leipzig – Reudnitz: A. Hoffmann, 1900. 38 pp.

邵特,E.:中国的动乱及其原因

"Die Schreckenstage in den Missionen Chinas", *Katholische Missionen* 29 (Freiburg i. Br. 1900), pp. 49 – 55.

"中国传教团的恐怖岁月"

Seifarth, F., *China. Schilderung von Land & Leuten, Kultur, Religion, (Missionswesen), Sitten und Geschichte, mit kurz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jüngsten Ereignisse und Deutschlands Handelsin-*

teressen. Berlin and Leipzig: F. Luckhardt, 1900. vii + ii + 182 pp.

赛法特,F.:中国:国家与人民,文化与宗教(传教情况),风俗与历史概览,兼议新近事件及德国的商贸利益

"Die seitens Russlands für die Bekämpfung des Aufstands in China getroffenen Massnahmen", *Jahrbücher für die deutsche Armee und Marine* 118 (Berlin 1901), pp. 301 – 310.

"俄国对中国起义运动的相关措施"

Sösemann, Bernd, "Die sog. Hunnenrede Wilhelms II. Textkritische und interpretatorische Bemerkungen zu Ansprache des Kaisers vom 27. Juli 1900 in Bremerhav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2 (1976), pp. 342 – 358.

索洋曼,B.:"威廉二世所谓的匈奴演讲:1900 年 7 月 27 日皇帝在不来梅港 的演讲文本考释"

Spillmann, Joseph, *Die Brüder Yang und die Boxer. Eine Erzählung aus den jüngsten Wirren in China*. (Aus fernen Landen, 19). Freiburg i. Br.: Herder, [1922]. 99 pp.

See James Watkyn Rogan for English version.

斯皮尔曼,J.:杨氏兄弟和义和团

见英文目录:J.W.罗根

Stenz, Georg Maria, *Erlebnisse eines Missionärs in China*. Trier: Paulinus – Druckerei, 1899. 104 pp.

薛田资: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

Stenz, Georg Maria, "Die Gesellschaft 'vom grossen Messer' (Boxer)", *Globus* 79.1 (1901), pp. 9 – 12.

同上:"大刀会(义和团)"

Stenz, Georg Maria, "Nachklänge zum blutigen Ereignis von Tschantjatschuang", *St. Michaels – Kalender* (1899), pp. col. 209 –

212.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is in Kleiner Herz – Jesu – Bote 26.6 (March 1898), pp. 44 – 46.

Concerns the murder of missionaries Nies and Henle at Mopan – Zhangjiazhuang, Juye xian, Shandong.

同上:"张庄血案的影响"

关于在山东巨磨盘张庄发生的对传教士的谋害。

Stoecker, Helmut,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Schriftenreihe des Instituts für Allgemeine Geschichte an der Humboldt – Universität Berlin. 2).

托马施基,P.:中国的战争与传教:在1900年11月26日柯尼斯贝格传教大 会上的报告

Tiedemann, Klaus – Peter, "Das *Yu – nan ri – ji* : eine anonyme Quelle zum Boxeraufstand in Tian – jin", Magister – Schrift, Hamburg: University of Hamburg, 1984. 104 fols.

狄德曼,克劳斯 – 彼得:"遇难日记:天津义和团运动的未署名的文件"

Tiedemann, R. G., "Der missionspolitische Kontext in Süd – Shantung am Vorabend des Boxeraufstands in China", in: Stephan Puhl , *Georg M. Stenz SVD* (1869 – 1928). *Chinamissiona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Republik*.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 275 – 312.

狄德满:"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山东南部的传教政策"

Tossenberg, von , "Enthüllungen über die Thätigkeit und das Vermögen der Missionen in China", *Deutsche Stimmen* 2. Jahrgang (1901), pp. 698 – 703.

托森贝格:"试看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及其财富"

"Ueber die Teilnahme S.M.S. 'Iltis' und dem deutschen Landungskorps an den Kämpfen um die Taku – Forts", *Marine – Rundschau* (1900), pp. 1071 – 1081.

"论参加大沽争夺战中的德国军队"

Völling, Arsenius , Die *Christenverfolgung in Nord – Schansi (China) im Jahre* 1900. (Aus allen Zonen, 6). Trier: Druck und Verlag der Paulinus – Druckerei, 1911. 128 pp.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northern Shanxi in 1900.

佛伶,A.:1900年山西北部(中国)的基督徒大迫害

1900年对山西北部基督徒的迫害

Völling, Arsenius , "Geschichtliche Notizen über den Distrikt Sche Ba

Tuin (Shantung)", *Communicationes* 5 (1926), pp. 28 – 29, 35 – 40, 52 – 55; 6 (1927), pp. 7 – 12.

Description of the Shibacun exclave of Shandong, located in southeaster Zhili; the village of Liyuantun is located in this exclave.

同上:"十八村地区(山东)史录"

关于山东的十八村飞地(座落于直隶东南)。梨园屯位于此飞地。

Volpert, Anton, "Aus den Tagen der Verfolgung", *Stadt Gottes* 24 (1901), pp. 36 – 38, 62 – 65, 110 – 13, 158 – 159, 206 – 207.

佛泊特,A.:"大迫害的日日夜夜"

Volpert, Anton, "Eine chinesische Schmähschrift gegen das Christentum", *Steyler Herz – Jesu – Bote* 29 (1901/02), pp. 150 – 152, 168 – 170, 179 – 181.

同上:"一封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毁谤书"

Volpert, Anton, "Ein Rückblick auf die Boxergeschichte", *Stadt Gottes* 26.1 (1902/03), pp. 14 – 15; 26.5 (1902/03), pp. 226 – 227.

同上:"义和团小史一瞥"

"Der Vormarsch auf Peking und die Einnahme Oder Hauptstadt", *Neue militärische Blätter* 57. Band (1901), pp. 563 – 575.

"向北京进军及首都的占领"

Vosberg – Rekow (Dr.), "Der ostasiatische Markt vor und nach dem Kriege", *Asien No.* 7 (1904), pp. 97 – 100; No. 10, pp. 145 – 148; No. 11, pp. 164 – 167.

佛斯贝格 – 雷寇(博士):"战争前后的东亚市场"

Voskamp, C. J. [Carl Johannes], *Aus der verbotenen Stadt*. Berlin: 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901. 80 pp.

佛斯坎坡,C.J.:紫禁城记事

Waldersee, Alfred Heinrich Karl Ludwig, Graf von , *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 – Feldmars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 Auf Veranlassung des Generalleutnants Georg Grafen von Waldersee bearb. und hrsg. von Heinrich Otto Meisner. Stuttgart und Berlin: Deutsche Verlags – Anstalt, 1922. 3 vols.

Reprinted Osnabrück: Biblio Verlag, 1967. (Deutsche Geschichtsquellen des 19. Jahrhunderts, Vol. 9 – 10, Vol. 13).

Vol. 3 contains Waldersee's experiences as comma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ce in China. A condensed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1924.

瓦德西:**纪念陆军元帅 A.瓦德西伯爵**

第三卷有关于瓦德西作为在华联军统帅经历的叙述

Warneck, Gustav , "Anzer contra Anzer", *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 28 (1901), pp. 196 – 202.

瓦奈克,G.:**"安治泰"**

Warneck, Gustav , "Die Ausläufer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sdebatte", *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 (1901), pp. 8 – 24.

同上:**"中国传教争执的枝蔓"**

Warneck, Gustav , *Die chinesische Mission im Gerichte der deutschen Zeitungspresse*. 2nd ed. Berlin: M. Warneck, 1900. 38 pp. 8th ed. Berlin : M. Warneck, 1900. 45 pp.

First published in 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 (1900), No. 36, pp. 353 – 375.

同上:**德国报界对在华传教活动的指控**

Warneck, Gustav , *Die 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ie überseeische Politik. Vortrag auf der Missionskonferenz der Provinz Sachsen am* 12. 2. 1901. Berlin: M. Warneck, 1901. 37 pp.

同上:**基督教传教与海外政策:在 1901 年 2 月 12 日萨克森省**

传教大会上的报告

Warneck, Gustav , "Die neuen Katholiken – Verfolgungen in China, speziell in Südschantung, der Diözese des Bischofs Anzer", *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 27 (1900), pp. 97 – 106.

同上:"中国对天主教徒的新迫害,特别是在山东南部安治泰主教区内"

Wartenberg, C. von , "Strafexpedition in China und ihre ethischen Gefahren für unser Volk", *Der Lotse. Hamburger Wochen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 1.35 (1901).

瓦腾贝格,C.:"对中国的讨罚远征及其对我们人民的道德损害"

"Was haben unsere Truppen bis jetzt geleistet?", *Daheim* 37. 29 (Leipzig 1901).

"我们的军队现在又取得了什么战绩?

Wegener, Georg , *Zur Kriegszeit durch China* 1900 – 1901. 2nd ed. Berlin: Allgemeiner Verein für Deutsche Literatur. viii + 405 pp. Reviewed by Felix Lampe in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Berlin, 1902), pp. 566 – 569.

威格讷,G.:战时游历中国,1900 – 1901 年

Wereschtschagin, Alexander W. , *Vom Kriegsschauplatze in der Mandschurei gesammelte Erzählungen von Mitkämpfern bei der Eroberung der Mandschurei* 1900/1901.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R. Ullrich. Berlin: Karl Siegismund, [s.a.]. 229 pp.

威勒史查金,A. W.:蒙古战场,蒙古包围战的亲历者叙述,1900 – 1901 年

Werner, Reinhold von , *Deutschlands Ehr im Weltmeer.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Marine und Skizzen aus dem Leben an Bord*. Berlin: U. Meyer, 1902. vii + 298 pp.

威尔讷,R.:德国在世界海洋上的声誉:德国海军的发展,甲板生活小记

Werner, Reinhold von , *Der Entscheidungskampf der europäischen Völker gegen China*. Chemnitz: R. Martin, 1900. 120 pp.

同上:欧洲人与中国的决定性战役

Wewel, Anton , "Drei martervolle Tage", St. *Michaels – Kalender* 21 (1900), pp. col. 193 – 202.

威沃尔,A.:"受尽折磨的3天"

Wilhelm, Maria (trans.), "Sai Chin – hua erzählt ihr Leben",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 Hamburg* 81 (1957), pp. 38 – 59; Vol. 82 (1957), pp. 43 – 65.

维海姆,M.:"赛金花自述"

Wilhelmy, Emil , *China. Land und Leute.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s Reiches der Mitte*. With contributions by Bruno Stenzel and Walter Kirsch. Berlin: Verlagsdruckerei Merkur, 1903. x + 704 pp. Reprinted Berlin: W. Herlet, 1904 (and 1905?).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book contains chapters on Qingdao and the conflict in North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xer Uprising.

维海米,E.:中国,土地和人民:中原帝国史图解

本书最后部分讲述青岛问题及与义和团有关的华北冲突

Winterhalder, Theodor, Ritter von , *Kämpfe in China. Eine Darstellung der Wirren und der Betheiligung von österreich – Ungarns Seemacht an ihrer Niederwerfung in den Jahren* 1900 – 1901. Vienna and Budapest: A. Hartleben, 1902. 6 + 584 pp.

The author was an officer on the Austro – Hungarian cruiser Zenta and accompanied the Austrian marine detachment to Beijing on 3 June 1900.

温特哈德,T.R.:在中国的斗争:试述1900 – 1901年中国的动

乱及奥－匈海军的参战

作者为奥匈帝国巡洋舰"曾塔"号官员，1900年6月3日随奥海军分队来北京

Wójcik, Carl, *Ursachen und Verlauf der Wirren (Kurzer überblick)*. Vortrag, gehalten am 3. und 10. Januar 1902 im militärisch－wissenschaftlichen Verein in Wien. Vienna: L. W. Seidel & Sohn, 1902. 41 + 6 pp.

Offprint from *Organ der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n Vereine*.

约西克，C.：**动乱的原因及过程(简述)**。

Würz, Fr., "Was lehrt uns der vorjährige Pressefeldzug gegen die chinesische Mission?", *Evangelisches Missionsmagazin* (1901), pp. 133－142.

乌尔茨，F.："**早年对中国传教的攻击性报道给我们什么教训?**"

Zabel, Rudolf, *Deutschland in China*. Leipzig: Georg Wiegand, 1902. xvi + 433 pp.

查伯尔，R.：**德国在中国**

(刘新莉、李道刚译)

三 法 文①

[德]R.G.狄德满

"L'activité du maréchal comte Waldersee en Chine", *Internationale Revue über diegesamten Armeen und Flotten* Supplement No. 26 (1901), pp. 711 - 718.

"瓦德西元帅在中国的活动"

Agnius, P., *Un Missionnaire Mandchou. Le Père Agnius* (1874 *à* 1900). Roubaix: Imprimerie G. Delannoy - Flipo, 1924. 163 pp.

Concerns Edouard - Eugène - Joseph Agnius MEP, killed at Ya - tse - chang, Manchuria, on 11 July 1900.

阿格纽丝,P.:满洲传教士.阿格纽丝神父(1872 - 1900)

关于 E.E.J.阿格纽丝 1900 年 7 月 11 日在满洲琊泽场(音)的被害

Allier, Raoul, *Les troubles de Chine et les missions chrétiennes*. Paris: Librairie Fischbacher, 1901. 281 pp.

阿利埃,R.:中国动乱和基督教使命

Anthouard, baron d', *La Chine contre l'étranger. Les Boxeurs*. Paris:

①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海岩提供了部分法文条目。

Plon, 1902. xi + 361 pp.

Albert – Franc ois – Ildefonse, baron d'Anthouard de Wasservas, was first secretary of the French Legation and chargé d'affaires at Beijing in February and March 1900. He lived through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On pp. 294 – 343: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ékin".

Reviewed by Joseph Desmarquest in *Etudes* (20 July 1902), pp. 275 – 277.

安图阿男爵:**中国反洋人—义和团**

安图阿任法国军团书记和法国驻北京事务总管,曾亲身经历过北京之围。

Appia, Georges, *Souvenirs des martyrs de Chine*. Paris: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vangéliques, 1901. 125 pp.

Appia, born in Frankfurt a. M. in 1827, was "pasteur de l'église de la confession d'Augsbourg à Paris".

Contents: Avant – propos – Legende des saints – Sont – il de vrais martyrs? – Declaration d'un ambassadeur – Journal d'un employe des douanes – Causes du mouvement chinois – Nos responsabilites – Missions protestantes en Chine – Debuts de la persecution – Preparation – Martyrs du Petchili – Lettre du Dr Morrison – Martyrs de Paotingfou – Martyrs du Chansi – Massacre de Tai – yuan – fou – Dernieres informations sur le massacre – Massacre de Hsin – Chou – Dix martyrs suedois – Noms & citations – Lettre de Mme Atwater – Martyr aveugle de Mandchourie – Accusation contre les missionnaires & contre les chretiens indigenes – Valeur des convertis – Peuple, missionnaires & autorites chinoises – Delivrance de la famille Guinness – Delivrance de la famille Green – Conclusion

阿比雅,G.:**中国教难者回忆录**

"Après la lutte. – Misère et ruines", *Chine et Ceylan* 2 (March 1901), pp. 315 – 320.

Consists of letters from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Victor Lomüller, Auguste Finck and Henri Maquet, southeast Zhili.

"斗争之后:苦难和废墟"

东南直隶耶稣会教士 V.洛穆勒,A.芬克,H.马凯的一些信件

"Aux tombes des martyrs",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4 (December 1902), pp. 245 – 259.

Concerns the tombs of Christians killed by Boxers in southeast Zhili.

"在殉教者墓前"

有关在直隶东南被义和团杀害的一些教徒的坟墓

Banzemont, A., "Les Missionnaires et les Boxers", *Revue des Revues No.* 22 (Paris, 15 November 1900), pp. 385 – 399.

旁士蒙,A.:**"传教士和义和团"**

Barascud, Alphonse – Clément, *Campagne de Chine*, 1900 – 1901. *Service vétérinaire du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cais et dans les armées alliées*. Illustré de nombreuses gravures. Vannes: Lafolye frères, 1903. 269 pp.

Barascud was "chef du service vétérinaire du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e Chine".

巴拉斯居,A.:**中国之战,1900 – 1901。法国远征军团和联军中的兽医服务**

Bataille, Jules, "Siège de Fan – kia – kata par les Boxeurs (juin – septembre 1900)", *Études* 38e année, tome 87 (20 May 1901), pp. 433 – 456. Also published in Chine et *Ceylan* 2 (September

1901), pp. 381 – 411, incl. illustrations.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the Christian village of Fanjiageda in southeastern Zhili by Boxers in the summer of 1900.

巴塔耶,J.:"义和团围攻范家疙瘩(音)"(1900.6 – 1900.9)

关于1900年夏义和团围攻直隶东南教徒村落范家疙瘩(音)的叙述

Baudoux, Clotaire, "Un mandarin au temps des Boxeurs",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no.* 70 (December 1925), pp. 248 – 255.

Concerns Magistrate Wang Huilan of Renqiu xian, Zhili.

博杜,C.:"义和团时期的一位官吏"

关于直隶任丘县令王会兰(音)

Bazin, René, *L'Enseigne de vaisseau Paul Henry, défenseur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Tours: Marne et fils, 1902. 286 pp. Other editions were published. Concerns Paul – Charles – Joseph – Martin Henry (1878 – 1900), killed during thesiege of the Beitang cathedral in Beijing.

巴赞,R.:海军尉官P.亨利,北京教会的捍卫者

亨利于北京北堂的围攻中被害

Becker, Emile, "Une nouvelle insurrection au Tche – li S. – E. en mai 1902", *études* (5 January 1903), pp. 111 – 119.

贝凯,E.:"1902年5月直隶东南新的暴动"

Bertrand, Pierre, *Les atrocités de la guerre de Chine*. Publication du《Comité d'Action Socialiste contre la Campagne de Chine》. Paris: Soc. nouvelle de librairie et d'édition, 1901. 43 pp.

贝尔朗,P.:中国战争之残酷

Bienheureux André – Joseph de Guébwiller, martyr des Boxers (1866 – 1900). Paris, 1946. 24 pp.

Concers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Andreas Bauer who was killed

at Taiyuan, Shanxi, on 9 July 1900.

幸运的安德烈－约瑟夫.德.盖布维年埃:义和团殉教者(1866－1900)

关于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害的方济各教士A.鲍尔

Bland, John Otway Percy, and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Tseu－Hi Impératrice douairière (la Chine de 1835 à 1909) d'après les Papiers d'état, les Mémoires secrets, les Correspondances*.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by E. Buisson. Paris: Hachette, 1912. vii + 349 pp.

濮兰德与巴克斯:慈禧皇太后

Bloch, Jean de [Johann von Bloch], "L'état présent de la question chinoise", *Revue scientifique* 37.2 (1900), pp. 618－628.

布洛克,J.:"中国问题之现状"

Boell, Paul [Paul Victor Boell], *Le protectorat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 et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n Extrême Orient*. Paris: Institut Scientifique de la Libre－Pensée, 1899. vii + 71 pp.

布埃尔,P.:中国基督教会保护制度和法国在远东的政策

Botty, Albert, "Les martyrs de Tsing－yeul et de Ta－sou－tai. Episodes de la persécution des Boxeurs", *Missions Catholiques* 51 (1919), pp. 309－311, 322－323, 332－334. See also the author's article under the same title in: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5 (Beijing 1918), pp. 510－512; 6 (1919), pp. 15－22.

布蒂,A.:"清苑和太叔台(音)的殉教者,义和团迫害事件"

Bourgerie, Raymond, and Pierre Lesouef, *La guerre des Boxers* (1900－1901). Tseu－Hi évite le pire. (Collection Campagnes & Stratégies. Les Grandes Batailles, 24). Paris: Economica, 1998. 220 pp.

布尔热利,R.和P.利瑟夫:义和团之战(1900－1901),慈禧避

难

"Les Boxeurs dans le Midi de la Chine en 1907",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80 (Lyon 1908), pp. 177 – 186.

Boxer – like activities in South China in 1907.

"1907 年中国南部的义和团"

1907 年华南地区类似于义和团的运动

"Les Boxeurs dans le Tché – li sud – est", *études* 37e année, tome 85 (20 November 1900), pp. 544 – 566.

Letters from Henri Maquet SJ (dated Zhaojiazhuang, 8 September 1900) and Joseph Hoeffel SJ (dated Shanghai, 17 August 1900), commenting on Box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ern Zhili.

"直隶东南部义和团"

H.马凯(1900 年 9 月 8 日赵家庄)和 J.霍菲尔(1900 年 8 月 17 日上海)信件:对直隶东南部义和团运动的评论

"Les Boxeurs dans le Tché – li sud – est. Dernières nouvelles du Tché – li", *études* 37e année, tome 84 (1900), pp. 836 – 840.

Further letters from Jesuit misionaries on Box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ern Zhil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

"直隶东南部义和团.直隶的最后消息"

耶稣会教士的其他信件:对 1900 年夏直隶东南部义和团运动的评论

"Les Boxeurs dans le Tché – li sud – est. Lettres des missionnaires", *études* 37e année, tome 84 (1900), pp. 690 – 698.

Box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ern Zhili, as reported in letters from Ignace Mangin SJ (dated Zhujiahe, 10 June 1900); Jules Gouverneur SJ (dated Ling – chang – sen near Xianxian, 10 June 1900); Alfred Sénéschal SJ, Zhangjiazhuang near Xianxian, 13

June 1900); Paul du Cray SJ (dated Tianjin, 2 July 1900).

"直隶东南部义和团.传教士的信"

直隶东南部义和团的活动:任德芬(1900年6月10日朱家河)、J.戈韦纳尔(1900年6月10献县附近岭长森(音))、A.塞纳斯夏尔(1900年6月13日献县附近张家庄(音))、P.克雷(1900年7月2日天津)的信件。

Buret, Maurice, "La santé des troupes alliés en Chine", *Revue Indo-chinoise* (1 September 1902), pp. 803-807.

比雷,M.:**"联军的健康"**

"La campagne de Chine 1900-1901", par U. C., *Revue francaise* (1901), pp. 645-650.

"中国之战 1900-1901"

Castellane, comte, [Boxer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 August 1900).

卡斯戴拉纳子爵:**[义和团与中国秘密教门]**

Charpentier, L., [The Chinese drama], *Nouvelle Revue* (October 1900).

夏庞蒂埃,L.:**[中国戏剧]**

Charpentier, L., [Initiation into the secret society of the Boxers], *Revue Blanche* (15 August 1900).

同上:**[义和拳加入秘密会社]**

Chavigny, G. de, *La guerre en Chine*. 1901.

肖雅尼,G.:**1901年中国之战**

Cheminon, Jules-Marcel, and G. Fauvel-Gallais, *Les événements militaires en Chine.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u 2e Bureau de l'état-Major de l'Armée*. Paris: R. Chapelot & Cie., 1902. 196 pp.

谢米侬,J.M.和G.福韦尔-加雷:**中国军事事件**

Chesneaux, Jean, *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1840-1949.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6. 189 pp.

谢诺,J.:1840 - 1949 年的中国农民运动

Chesneaux, Jean,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19e et 20e siècles)*. Paris: René Julliard, 1965.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1971.

同上:中国秘密教门(19 世纪和 20 世纪)

"Chine. Les Massacres", *Annales M. E. P.* 3 (Paris 1900), pp. 210 - 225.

"中国大屠杀"

Collin, Victor, *Un reportage belge en Extrême - Orient (guerre internationale de* 1900 - 1901). Antwerp: imprimerie de C. de Cauwer, 1901. 379 + viii pp.

科兰,V.:远东比利时报道(1900 - 1901 的国际战争)

Cordier, Henri, "Martyrologe de Peking", *T'oung Pao 2nd ser.*, 1.5 (December 1900), pp. 494 - 497.

高第:"北京殉教者名录"

Cordier, Henri, "La Révolution en Chine. Les Origines", *T'oung Pao* 2nd ser., Vol. 1 (1900), pp. 407 - 450.

First published in Le Temps, suppl., 12 July 1900.

同上:"中国革命的起源"

Coup, capitaine, *Notes sur la compagnie montée du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e Chine*, par le capitaine Coup de l'infanterie coloniale. Paris: H. Charles - Lavauzelle, 1903. 16 pp.

"Extrait de la Revue des Troupes coloniales."

库普上尉:远征军团笔记

Courant, Maurice, "En Chine - Les effets de la crise, intentions de réformes",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 (November 1901), pp. 708 - 717.

古恒.:在中国一危机的效果,改革之意图"

Courant, Maurice, "Les événements de Chine (1900) d'après les récits de quelques témoins", *Annales de Sciences politiques* (15 May 1903), pp. 369 - 382.

同上:"中国事件(1900)见证人的叙述"

Courant, Maurice, "La situations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 (July 1900), pp. 523 - 539.

同上:"中国北方的形势"

"La Croix rouge en Chine", *Revue de Paris* (1 January 1902), pp. 143 - 154.

"中国红十字会"

Curey, M. C. [Marie - Charles], *Russie et Chine en* 1900. *Extrait de la Revue d'artillerie*. Paris and Nancy: Berger - Levrault, 1901. 39 pp.

居莱,M.C.:1900 年俄国在中国

Damenez, Louis, *Histoire de trois enfant pendant la guerre de Chine*. F. Didot, 1903.

达默内,L.:中国战争时期三个儿童的故事

Darcy, Eugène,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3rd ed. Paris: A. Challamel, 1903. viii + 242 pp.

An extract was published as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 - king", *Revue des Deux Mondes* (15 June 1901), pp. 799 - 839.

The work is also included in a collection consisting of:

Pierre Loti,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récédé de La ville en flammes* par Stephen Pichon et de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par Eugène Darcy. Suivi de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ékin*. Paris: Julliard, 1991. 322 pp.

达尔西,E.:保卫法国公使馆

Debroas, L., *Le Drame de Pékin en* 1900. Paris and Lille: Desclée, DeBrouwer et Cie, [1903]. 289 pp.

德布罗阿,L.:1900 年北京的戏剧

"La défense des chrétiens dans le Nord de la Mission [de Tcheu - li sud - est]", *Chine et Ceylan* 2 (December 1900), pp. 142 - 153.

"保护直隶东南部教会的基督徒"

Delines, Michel, [Siege of Peking],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revue Suisse* (Lausanne, January 1902).

德利纳,M.:[北京之围]

Delorme, H., "A Pékin", *Le Correspondant* 201 (10 October 1900), pp. 59 - 70.

德罗姆,H.:"在北京"

Denis, Pierre, "La Chine et l'Europe", *Nouvelle Revue Internationale* (15 August 1900), pp. 103 - 114.

德尼,P.:"中国和欧洲"

[Desmarquest, Joseph (ed.)], "Nos Matryrs de Chine (Juin - Juillet 1900)", *Chine et Ceylan No.* 7bis (June 1901), pp. 3 - 23 [Notices sur les Pères Andlauer et Isoré]; No. 8bis (December 1901), pp. 25 - 112 [Les PP. Denn et Mangin].

[德马盖,J.(编)]:"我们在中国的殉难者(1900 年 6 月 - 7 月)"

"Devoirs funèbres et réparations",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4 (June 1902), pp. 17 - 33.

Aftermath of Box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Zhili: burial of Christians and the question of indemnities.

"葬礼和谢罪"

直隶东南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后:教徒下葬与赔偿问题

Donnet, Gaston, *En Chine* 1900 – 1901.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 1902. 380 pp.

多内,G.:1900 – 1901 在中国

Doualas, Alexis, *Le Siège de Tien – tsin*, 15 *jain* – 15 *juillet* 1900. Paris: Berger – Levrault, 1903. 400 pp.

杜阿拉,A.:围攻天津,1900.6.15 – 7.15

Du Bois, A., "L'échec du projet d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belge contre les Boxeurs", *Les cahiers Lesvoriques* 37 (1968), pp. 71 – 78.

迪布阿,A.:"比利时远征义和团军团计划的失败"

Duchesne, A., "Les aspects diplomatiques du projet d'expédition belge en Chine en 1900",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32 (1954), pp. 77 – 96.

迪歇纳,A.:"1900 年在中国的比利时远征计划的外交概况"

Duchesne, A., "La dissolution de la légion belge en Chine (1900)", *Carnet de la Fourragère* 3 (1950), pp. 193 – 216.

同上:"驻华比利时军团瓦解(1900)"

Duchesne, A., "Quand les Belges devaient partir pour la Chine. Un projet d'expédition contre les Boxeurs (1900)", *Carnet de la Fourragère* 1 (1948), pp. 24 – 48, 62 – 82.

同上:"何时比利时军人去中国:反义和团远征计划"

Du Cray, Paul, and Eugène Bosch, "A Tien – tsin pendant et après le siège", *Chine et Ceylan* 2 (December 1900), pp. 115 – 124.

迪克莱,P.和 E.包士:"围攻中与围攻后的天津"

Ducrocq, Louis, *Représailles en temps de paix – Blocus pacifique suivi d'un étude sur les affaires de Chine* (1900 – 1901). Paris: A. Pedone, 1901. 237 pp.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soutenue le 20 mars 1901,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

杜克罗克,L.:和平时期的报复

Dunstheimer, G. G. H., "Le mouvement des Boxeurs", *Revue Historique* (April – June 1964).

邓斯泰梅,C.G.H.:"义和团运动"

Dunstheimer, G. G. H., "Religion et magie dans le mouvement de Boxeurs d'après les textes chinois", *T'oung Pao* 47.3 – 5 (1959), pp. 323 – 367.

同上:"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和妖术"

Dyé, Henry, "La situation de la Chine 1900 – 1901, le soulèvement Boxer et l'expansion français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23 (1901), pp. 530 – 552.

The author was a "Lieutenant de vaisseau".

戴耶,H.:"中国形势(1900 – 1901)义和团起义和法国的扩张"

作者为海军中尉

Ebray, A., [The Chinese indemnity], *Questions Diplomatiques et Coloniales* (1 June 1901).

爱勃莱,A.:中国赔偿,外交和殖民问题

"Les 'échappés'", *Chine et Ceylan* 2 (December 1900), pp. 161 – 184.

Concerns the escape from the Jesuit mission of Southeast Zhili of Eugène Bosch, E. Japiot, Hoeffel and Joannes Yang SJ.

"逃亡者"

关于E.博施,E.雅皮奥,E.J.霍菲尔,J.杨逃离直隶东南耶稣会一事

Ed. Agnius, Missionnaire, massacré en Mandchourie, 1874 – 1900. Notes et Souvenirs avec Portrait. Lille: Imprimerie de la Croix du Nord, [1900]. vi + 120 pp.

Concerns Edouard – Eugène – Joseph Agnius MEP, killed at Ya

– tse – chang, Manchuria, on 11 July 1900.

阿格纽丝传教士:**在满洲里被杀害**

关于 E.E.J.阿格纽丝 1900 年 7 月 11 日在满洲琊泽场(音)的被害

[Eletz, captain]. Conférence du Capitaine Eletz, Chef d'escadron de la Garde impériale russe faite à la Société Royale de Géographie d'Anvers le 9 octobre 1903., "La Mongolie orientale et les Missions belges pendant la révolte de ce pays en 190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Géographie d'Anvers* 27 (Antwerp 1903), pp. 335 – 355.

[埃尔茨上尉]:**"1900 年这个国家造反时期的东蒙古和比利时传教团"**

"L'emprunt et les indemnités chinoises",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December 1901), pp. 384 – 395.

"中国赔款和赔偿"

Estournelles de Constant, baron d', [The Chinese problem],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10 November 1900).

埃斯图内勒.德.贡斯当男爵:[**中国问题**]

Estrange, Gabriel d', *Les Boxeurs chinois, ou les mystères de la Chine sanglante*. Grand roman historique et de moeurs. Brussels: J. Hoste, 1900.

埃斯当日,G.:**中国义和团,或血腥中国的秘密**

"L'Europe en Chine", *Revue de Paris* (1 September 1900), pp. 1 – 17.

"欧洲在中国"

"Expulsion de Tai – ming – fou. Tribulations et vie errante de six missionnaires", *Chine et Ceylan* 2 (March 1901), pp. 239 – 274.

"逐走大名府,六名传教士的磨难和流浪生活"

"Faux témoins contre les missionnaires", *études* 38e *année*, *tome* 89 (20 December 1901), pp. 721 - 738.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Joseph Desmarquest and Jérôme Tobar refute French press reports that were hostile to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See also Joseph Desmarquest, "Faux témoins contre les missionnaires",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4 (June 1902), pp. 57 - 63.

"反传教士的假见证"

耶稣会教士 J. 德马盖,管宜穆否认法国报界反教士的报道。另见德马盖的"反传教士的假见证"

Favier, Alphonse [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 "Les derniers événements de Chine. Conférence de Mgr Favie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Marseille* 25 (1901), pp. 41 - 46.

樊国梁:**"中国最近的事件"**

Favier, Alphonse [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et religieuse en Chine et ses causes", *Missions Catholiques* 31 (1899), pp. 97 - 101. Italian version in Le Missioni Cattoliche 28 (Milan 1899), pp. 121 - 125.

同上:**"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及其原因"**

Fleury, François, "La persécution au Su - Tchuen et ma captivité", *Annales M. E. P.* 3 (Paris 1900), pp. 2 - 51.

Fleury was held captive by Yu Dongchen during the anti - Christian persecution in eastern Sichuan in 1898.

华方济:**"苏镇的迫害和我的被俘"**

华方济曾于 1898 年在四川被余栋臣俘虏

France. Red Cross.,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aux blessés militaire des armées de terre et de mer en Chine* (1900 - 1901). Croix Rouge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1902.

法郎士.莱德.克罗丝:**中国陆军和海军伤员救援公司(1900－1901)**

Frey, H. [Henri], Français et Alliés au Pé－tchi－li. *Campagne de Chine de* 1900. Paris: Hachette, 1904. xii + 507 (Error in paging: pp. 507 numbered 407) pp.

"Général H. Frey ancien Commandant en chef des forces françaises, au Pé－tchi－li de juillet à septembre 1900."

弗莱,H.:**法国人和盟军在北直隶**

Frey, Henri, "Au Pé－tchi－li: Français et Alliés (1900－1901)", *Revue des Deux Mondes* (1 July 1903), pp. 83－117.

Military campaigns of French and Allied troops in Zhili province. 同上:**"法国人和盟军在北直隶"**

Governeur, Jules, "Correspondance des Missions. Troubles en Chine", *études* 35*e année*, *tome* 77 (1898), pp. 93－98.

Box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ern Zhili in 1898.

戈韦纳尔,J.:**"传教会通讯:中国动乱"**

1898 年直隶东南的义和团运动

Grigoriantz, Alexandre, Le Siège de Pékin, 1900. *L'attaque des occidentaux par les Boxers*. (Collection "Petite et grande histoire"). Lausanne: Favre, 1989. 264 pp.

格里戈利扬茨,A.:**1900 年北京之围:义和团攻打西方人**

Guillot, Marie－Joseph－Frédéric, *Pékin pendant l'occupation étrangère en* 1900－1901. Paris: Henri Charles－Lavauzelle, [1904]. 94 pp.

Lieutenant－Colonel Guillot was "Commandant du Génie de la 1re Brigade du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e Chine Ancien Chef du Génie à Pékin".

吉约,M.J.F.:**1900－1901 外国人占领时期的北京**

Harfeld, Ferdinand Joseph , *Opinions chinoises sur les barbares d' occident*. Paris: Plon – Nourrit; Brussels: Albert Dewit, 1909. viii + 308 pp.

哈费尔特,F.J.:**中国关于西方野蛮人的舆论**

Henry, Léon , *Le Siège du Pé – t' ang dans Pékin en* 1900. Le Commandant Paul Henry et ses trente marins. Niort, 1910. vi + 414 pp. Reprinted in Beijing: Impr. des Lazaristes du Pé – t' ang, 1921. vi + 366 pp.

Concerns Paul – Charles – Joseph – Martin Henry (1878 – 1900), killed during the siege of the Beitang cathedral in Beijing.

亨利,L.:**1900 年北京城里围攻北堂**

P.C.J.M.亨利,于北京北堂围攻中被害

[Hilt, François, and Albert Vinchon], "La persécution. – Les chrétiens martyrs", *Chine et Ceylan* 2 (September 1901), pp. 412 – 424.

Accounts of Jesuit missionaries Hilt and Vinchon concerning Boxer attacks on Christians in Suining district, southeast Zhili.

[希尔特,F.和 A.樊松]:**"迫害—基督蒙难者"**

耶稣会教士关于义和团在直隶东南绥宁(音)地区攻击基督徒的叙述

Humbert, Jules , "Un officier de troupes en Chine – Le lieutenant Contal 1876 – 1900", Bulletin.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de Bordeaux* (15 June 1903), pp. 221 – 232.

亨伯,J.:**"一个军官在北京—中尉贡塔尔 1876 – 1900"**

Isoré , Remi , "La Chrétienté de Tchao – kia – 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 Journal du P. Isoré", *Chine et Ceylan* 1.2 (April 1899), pp. 105 – 113.

伊索雷,R.:**"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的基督教会"**

Jacquin, Joseph , *La prise de Pékin : pièce comique d' ombres avec livret* ,

musique, décor et personnages à découper. Texte de J. Jacquin ; illustrations de R. de la Nezière ; musique de G. Meynard. Paris: Hachette et Cie., 1903. 34, 12 pp.

雅坎,J.:攻占北京:具有句蹦、音乐、布景、剪影人物的皮影戏剧

Jarlin, Stanislas - François, "Lettre pour le procès informatif des victimes des Boxeurs",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1 (Beijing 1914), pp. 219 - 221.

林懋德:"关于义和团受害者情形报道的信"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ékin. Du 29 mai au 16 août 1900", *Missions Catholiques* 33 (Lyon 1901), pp. 579 - 580, 591 - 593, 603 - 605, 620 - 621.

This journal was reproduced in several other publications.

"北京一位平民的日记,从 1900 年 5 月 29 日至 8 月 16 日"

"Journal d'un officier du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e Chine", *Tour du Monde* (1902), pp. 61 - 84; (1903), pp. 265 - 300.

"一位远征军官的日记"

"Journal du siège de Tien - tsin", *Revue de Paris* (15 January 1902), pp. 221 - 256.

"围攻天津的日记"

Jullian, élie Alphonse, *Souvenirs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1900 - 1902. Avec deux croquis. (Collection Les Clochers de France, [no. 26]). Paris: J. Peyronnet, 1928. 106 pp.

朱丽安,E.A.:远征中国的回忆

Jung, Paul, "Migration d'un village. - Quatre mois au Tcheu - li Ouest", *Chine et Ceylan* 2 (March 1901), pp. 321 - 331.

Concerns the Christians from the village of Fengjiazhuang, Ji zhou, southeast Zhili.

荣格,P.:"一个村子的迁移—在直隶西四个月"
有关直隶东南冀州范家屹塔的教徒

Kerval, L. de [i.e. Célestin - Marie Sant OFM], *Deux martyrs français de l'Ordre des Frères Mineurs. Le R. P. Théodoric Balat et le Fr. André Bauer, massacré en Chine le 9 juillet* 1900. *Aperçus biographiques*. Rome, Vanves and Paris: Vic et Amat, 1903. 453 pp. A second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Canada in 1906. A 3rd, augmented edition was published as:
Célestin - Marie Sant, Deux martyrs français de l'Ordre des Frères Mineurs. Le R. P. Théodoric Balat et le Fr. André Bauer, massacré en Chine le 9 juillet 1900. Aperçus biographiques. Rome, Vanves and Paris: Vic et Amat, 1914. 367 pp.
The 3rd edition contains a revised account of the execution of missionaries in Taiyuan, Shanxi, on 9 July 1900, based on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克尔瓦,L.:布雷兵兄弟们成了两个法国殉难者
第三版基于新的资料,对1900年7月太原对教徒的迫害有了新的说法

Lamy, étienne, "La Chine, l'Europe et le Saint - Siège", *Le Correspondant* (25 July 1900), pp. 193 - 215.
拉米,E.:"中国,欧洲和罗马教廷"

Launay, Adrien, "Episodes de la persécution en Mandchourie", *Missions Catholiques* 34 (Lyon 1902), pp. 91 - 94, 100 - 105.
洛奈,A.:"满洲里迫害之事"

Laur, Francis (ed.), *Le Siège de Pékin. Récits authentiques des assiégés S. Pichon, d'Anthouard, C. Darcy, Matignon, Bartholin, Mathieu, Piot, etc.; avec photographies de Piry prises pendant le Siège*. Paris: Société des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1904 – 1905. 442 pp.

Had appeared in *Chine nouvelle*. *Reviewed in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April 1904).

劳尔,F.(编):北京之围:被围者叙述

Le Veux, J., "L'héroïne du Pé – Tang", *Revue Générale* 82 (1905), pp. 452 – 468.

Concerns Hélène de Jaurias, a Sister of Charity.

勒弗,J.:"北堂女英雄"

有关姐妹 H.茹里爱丝

Lederer, André, *La mission du commandant A. Wittamer en Chine*, 1898 – 1901. (Mémoire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 – 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ouv. sér., t. 48, fasc. 3 = Verhandelingen. Koninklijke Academie voor Overzee Wetenschappen, Klasse voor Morele en Politieke Wetenschappen; nieuwe reeks, book 48, afl. 3).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 – mer, 1984. 72 pp.

勒德雷,A.:维塔马司令在中国的使命 1898 – 1901

Legrand – Girarde, E. [émile (1857 – 1924)], *Le Génie en Chine* 1900 – 1901. Paris and Nancy: Berger – Levrault, 1903. 278 pp.

勒格朗 – 吉拉尔,E.:守护神在中国 1900 – 1901

Lepintre, Jean, *Le glorieux défenseur du Pé – t'ang, Paul Henry* (1876 – 1900). (éditions de l'Apostolat de la Prière). Toulouse, 1939. 16 pp.

Concerns Paul – Charles – Joseph – Martin Henry (1878 – 1900), killed during the siege of the Beitang cathedral in Beijing.

勒潘特尔,J.:北堂光荣的保卫者

P.C.J.M.亨利,于北京北堂的围攻中被害

Leroy – Beaulieu, Pierre, "La situation en Chine et les perspectives de

la question chinoises", *La Semain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21 July 1900), pp. 689 - 697.

勒鲁瓦 - 博利厄,P.:"中国局势和中国问题的前景"

Leroy, Henri - Joseph, "Les causes de l'insurrection en Chine", *études* 37e année, tome 84 (1900), pp. 145 - 159.

勒鲁瓦,H.J.:"中国起义的原因"

[Letort, Aristide - Gustave - Marie], *La Mandchourie Méridionale et les Boxeurs*. Paris: Téqui, 1902. 82 pp.

First published in Annales M. E. P. 5 (Paris 1902), pp. 7 - 82.

[勒托尔,A.G.M.]:南满洲里和义和团

Lonis [Louis?], P., [The situation in China], *Revue Socialiste* (August 1900).

罗尼,P.:中国形势

Loti, Pierre [pseud. of Louis - Marie - Julien Viaud],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aris: Calmann - Lévy*, 1902. *iv* + 464 *pp. Several subsequent editions; the latest as C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journal (extraits du 19 octobre au 3 novembre* 1900). [Paris:] Editions Findakly, 1996. 158 pp. Note also the English and German translations.

It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following work:

Pierre Loti,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récédé de *La ville en flammes par Stephen Pichon et de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par Eugène Darcy. Suivi de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ékin. Paris: Julliard, 1991. 322 pp.

Letters written from Beijing to the Figaro newspaper during the period of foreign occupation following the siege of 1900.

Reviewed in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April

1902), pp. 191 - 192.

绿蒂:北京最近几天,日记(节选自1900年10月19日至11月3日)

外国军队占领北京时,在北京写的一些信件

M. S., *La Chine et les Alliés* (1900 - 1901), 20 reproductions en simili - gravure. Paris: R. Chapelot et Cie., 1903. 33 pp.

M.S.:中国和联军(1900 - 1901)

Mabire, Jean, *L'été rouge de Pékin*. [Paris]: Fayard, 1978. v + 455 pp.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 See also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马比尔,J.:北京红色夏天

北京使馆之围的民间叙述,另见德文版

"Mandchourie. Nouveaux Massacres. - Ruines", *Annales M. E. P.* 3 (Paris 1900), pp. 265 - 270.

"满洲里,新的屠杀 - - - - 废墟"

Mangin, Ignace, "Les Boxeurs dans le Tché - li sud - est (Juillet 1899 - 1900)", *études* 37e année, tome 84 (1900), pp. 366 - 394, followed by "Nouvelles complémentaires", pp. 395 - 398.

Box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ern Zhili, July 1899 to 1900, as reported by Ignace Mangin SJ who was killed by the Boxers at Zhujiahe, Jing zhou, on 20 July 1900. The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in *Chine et Ceylan* 2 (August 1900), pp. 11 - 53.

任德芬:"直隶东南部义和团(1899.7 - 1900)

1899 - 1900直隶东南的义和团运动。作者1900年7月20日在冀州(音)朱家河(音)被义和团杀害

Marcel, A., "La Croix Rouge Française pendant l'Expédition de Chine", *Revue de Géographie* 50 (1902), pp. 357 - 360.

马塞尔,A.:**"远征中国期间的法国红十字会"**

Matignon, Jean - Jacques , *La Chine hermétique. Superstitions, crime et misère (souvenirs de biologie sociale)*. Nouvelle édition, ornée de quarante - deux planches hors text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6. xx + 397 pp.

The "Préface" is dated 1898 and signed Marcel Monnier. Previously issued under the title *Superstitions, crime et misère en Chine (souvenirs de biologie sociale)* in 1899, 1900 and 1902.

Matignon was French legation doctor during the siege in 1900. One chapter of the later editions is devoted to the Boxers and mass hysteria.

马丁荣:**封闭的中国:迷信.罪行和悲剧**

作者在1900年被围时为法国使馆医生,后来的版本中对义和团和暴乱有一章专述

Matignon, Jean - Jacques ,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Pékin, du 13 juin au 15 août 1900)*. Conférence de la Croix - Rouge de Bordeaux, le 3 mai 1901. Paris and Bordeaux, 1902. 47 pp.

Offprint from *Revue Philomatique de Bordeaux et du Sud - Ouest*, 4e année, nos. 8 and 9 (1901).

Matignon was the French legation doctor during the siege in 1900.

同上:**捍卫法国军团**

Matignon, Jean - Jacques , "L'Hystérie chez les Boxeurs", *La Revue d'Asie* (1 December 1901), pp. 86 - 92.

Extracted from the author's book, *Superstition, crime et misère*.

同上:**"歇斯底里和中国义和团"**

选自作者的著作《迷信.罪行和悲剧》

Matignon, Jean - Jacques , "Hystérie et 'Boxeurs' en Chine", *Revue scientifique* (9 March 1901), pp. 302 - 304.

See the comments by H. Mansuy in *L'Anthropologie* 12 (1901), pp. 217 – 218.

同上:"义和团中的歇斯底里"

Matignon, Jean – Jacques, L'Orient lointain; *Chine, Corée, Mongolie. Impressions et souvenirs de séjour et de tourisme*. Lyon and Paris: A. Storck & Cie, 1903. xxiii + 304 pp.

Contains a chapter entitled, "Ense et Cruce! – Boxeurs et Missionnaires en Mongolie", pp. 243 – 261.

同上:远东;中国,朝鲜,蒙古,旅居时的印象和回忆

Mazeau, Henri, *L'héroïne du Pé – tang, Hélène de Jaurias, Sœur de Charité*. Paris: Victor Retaux, [s.a.]. 370 pp.

马佐,H.:北堂女英雄

Mertens, Pierre – Xavier, "De l'apostasie au martyr par le chapelet", *Revue Missionnaire des Jesuites Belges* 37e année, Vol. 11 (May 1937), pp. 232 – 233.

梅尔滕斯,P.:"念珠对蒙难者的背叛"

Mertens, Pierre – Xavier, *Du sang chrétien sur le fleuve Jaune*. Actes de martyrs dans la Chine contemporaine. Paris: Editions Spes, [1936]. 192 pp.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Yellow River Runs Red*. Note also the Italian and Spanish translations.

同上:"血染黄河 – – – 中国基督徒殉教者事迹"

Mertens, Pierre – Xavier, "La légende dorée en Chine. Fan – kia – kata, le village qui communie tous les jours", *études 55e année, tome* 154 (1918), pp. 58 – 80.

Concerns the siege of the Christian village of Fanjiageda en southeastern Zhili.

同上:"范家疙瘩,每天都领圣体的村子"

关于对直隶东南部教徒村落范家疙瘩的围攻

Mertens, Pierre – Xavier, "La légende dorée en Chine. Pour le 25e anniversairede《la Boxe》. Siège et martyre d'une petite chrétienté", *études 62e année, tome* 183 (5 June 1925), pp. 546 – 565.

Concerns the siege and detruction of Zhujiahe, a Christian village 6 km west of Jingzhou, southeastern Zhili.

同上:"纪念义和团运动25周年"

关于对直隶东南部冀州(音)教徒村落朱家河(音)的围攻与洗劫

Mertens, Pierre – Xavier, "La légende dorée en Chine. Une page du martyrologe chinois", *études* 67e année, tome 202 (1930), pp. 57 – 70.

同上:"在华殉教者名录的一页"

Mertens, Xavier [Pierre – Xavier], *Une petite martyre chinoise. Anne Wang de Ma – Kia – Tchoang.* (Collection "Parvuli", IX). Paris: P. Lethielleux, éditeur, 1935. viii + 54 pp.

Reprinted as *Anna Wang. Une petite martyre chinoise* (1886 – 1900). Paris: P. Lethielleux, 1946.

同上:殉教女子黄安娜

Moireau, Auguste, [The Boxers], *Revue Bleue* (16 June 1900).

穆瓦罗,A.:[义和团]

Moireau, Auguste, [The Chinese imbroglio], *Revue Bleue* (4 August 1900).

同上:[中国的混乱局面]

Monnier, Marcel, *Le drame chinois (juillet – août* 1900). Paris: Félix Alcan, 1900. 173 pp.

These article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Le Temps*. Reviewed by A. – A. Fauvel in *Etudes* 20 December 1900, pp. 840 – 841.

莫尼埃,M.:中国悲剧(1900.7－8)

Mury, Francis , "L'insurrection de Pékin et la sécurité des étrangers en Chine", *Le Correspondant* 200 (25 September 1900), pp. 1046－1057.

莫雷,F.:"北京起义和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

Négotiations de Pékin. 1900－1902. Beij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02]. 570 pp.

北京和谈

Nogues, A. , "A propos des affaires de Chine", *Revue française* 25 (1900), pp. 505－518.

诺格,A.:"关于中国事件"

"Origine de la crise des Boxeurs", *Revue française* 25 (1900), pp. 464－471.

"义和团危机的起因"

Orléans, Henri d' , "L'insurrection des Boxeurs et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n Chine", *Questions Diplomatiques et Coloniales* (15 July 1900), pp. 65－85.

奥莱昂,H.:"义和团起义和法国在中国的政策"

Orlov , Nikolai Aleksandrovich , *Les Cosaques de Transbaïkalie en Mandchourie. Aperçu de la campagne du détachement de Khaĭlar commandé par le général N. A. Orlov pendant les troubles de Chine en* 1900. Avec une carte et plusieurs croquis. Trans. from the Russian by A. Hippolitovich. Paris: Charles－Lavauzelle, 1905. 182 pp.

See also the German translation under Orloff.

奥尔洛夫,N.A.:在满洲里的汤斯巴依加利的哥萨克

Le P. Ignace Mangin ,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 missionnaire au Tche－li sud－est (Chine), tué par les Boxeurs en haine de la foi.

Abbeville: Paillart, 1902. 56 pp.

Mangin was killed at Zhujiahe, Jing zhou, southeast Zhili, on 20 July 1900.

任德芬神父

任德芬1900年7月20日被害于直隶东南部冀州(音)朱家河(音)

Pages libres No. 11 (16 March 1901). Numéro contre la guerre de Chine, pp. 211 - 254.

"Paraissant chaque Samedi. - Ce numéro est exceptionnellement mis dans le commerce. - Contient: Les Expéditions coloniales, par émile Duclaux. - Une page de Montesquieu: Pourquoi la Chine ne sera jamais chrétienne. - La Question chinoise et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par Paul Boell. - Les Intentions des Missionnaires protestants. - Documents. - 'Bienheureux les Pacifiques!', par R. Périé."

自由篇章

Pandellé, Eugène - Marie, "Quelques souvenirs de la tourmente des Boxeurs dans le Chantong Oriental", *Echo de la Mission du Chantong Oriental* 12 (Chefoo [Yantai] 1915), pp. 11 - 14, 47 - 50, 68 - 70, 88 - 92, 112 - 115, 135 - 139; 13 (1916), pp. 19 - 24, 39 - 44, 58 - 64, 79 - 84, 104 - 107, 122 - 125, 139 - 143, 155 - 159, 171 - 175, 186 - 190, 202 - 205, 216 - 220; 14 (1917), pp. 8 - 11, 43 - 45, 62 - 64, 75 - 78, 108 - 110, 127 - 128.

On 'Boxer' activities in the French Franciscan mission of eastern Shandong.

潘代莱,E.M.:"山东东部义和团风潮的几段回忆"

关于义和团在山东东部法国方各济教会的活动

Parès, Eugène, *Les Boxeurs. Aventures d'un jeune marin français en Chine. Limoges: Ardant & Cie., 1901. Paris: Librairie nationale d'éducation et de recréation*, [1903?]. *302 pp.*

Historical fiction.

帕雷斯,E.:义和团:法国水兵中国历险记

历史小说

[Pélacot, Charles Balthazard d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u Petchili. Rapport du Colonel de Pélacot commandant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sur les journées des 11, 12, 13 & 14 juillet 1900. Combats autour de T'ien – tsin et Prise de la Cité chinoise", *Revue Indo – Chinoise* No. 111 (3 December 1900), pp. 1145 – 1156.

[佩拉科,C.B.]:"关于北直隶远征军团的报告"

Pélacot, Charles Balthazard de, *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900 *jusqu'à l'arrivée du général Voyron*. Paris: Henri Charles – Lavauzelle, [1903]. 285 pp. Also 1905.

同上:1900 年沃伊隆将军到来之前的在华军事行动

Pelliot, Paul, *Carnet de Pékin*. 1899 – 1901.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Gérald Duverdier and Louis Hambi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6. iii + 74 pp.

伯希和:北京记事 1899 – 1901

Pichon, Stephen, *Dans la bataille*. Essai biographique par Georges Normandy. Paris: A. Méricant, 1908. 314 pp.

Contains "Le siège des légations (1900)". Note also the following work:

Pierre Loti,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récédé de *La ville en flammes* par Stephen Pichon et de *La défens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par Eugène Darcy. Suivi de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ékin*. Paris: Julliard, 1991. 322 pp.

毕盛:在战役中

Pichon, Stephen, "Le siège des légations de Pékin", *Revue française* 25 (Paris 1900), pp. 689 – 707.

同上:"围攻北京使馆"

[Pichon, Stephen, and Alphonse Favier], "Le siège du Pei – tang", *Revue française* (1901), pp. 77 – 87.

Contains "Journal de M. Pichon". – "Journal de Mgr Favier".

[皮雄,S.和 A.法维埃]:"围攻北堂"

Piton, C., [China and the missionaries],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revue suisse* (Lausanne, June 1901).

皮东,C.:中国与传教士

Planchet, Jean – Marie (comp.), *Documents sur les martyrs de Pékin pendant la persécution des Boxeurs*. Beij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20. 404 pp. Later ed.: Beijing: Impr. des Lazaristes, 1922 – 1923. 2 vols.

包士杰(编):义和团迫害时期有关北京蒙难者的资料

Pontvianne, Jean, "Les Boxeurs au Su – tchuen Occidental", *Annales M. E. P.* 6 (1903), pp. 65 – 80.

'Boxer' activities in western Sichuan.

蓬特维雅纳,J.:"义和团在西洋人集中的苏村"

川西义和团运动

Pouvourville, Albert de, [The Boxer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Humanité Nouvelle* (October 1900).

普武维尔,A.:义和团与中国秘密教门

Pouvourville, Albert de, "A propos des Boxers", *Nouvelle Revue* (1 July 1900), pp. 115 – 127.

同上:"论义和团"

Le R. P. *Bayart,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massacré en Mandchourie*, 1877 – 1900. *Notice publiée par sa famillie, avec portrait. Lille: Imprimerie de la Croix du Nord*, 1900. 111 pp.

Concerns Jules – Joseph Bayart MEP, killed by Boxers at Ya – ts – chang, southern Manchuria, on 11 July 1900. The brochure was also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Notice biographique sur Maître Jules Bayart,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en Mandchourie méridionale*...

L.R.P.巴亚特:传教士在满洲里的被害

关于J.J.巴亚特1900年7月11日在满州琊泽场(音)的被害

Rebillot, général baron, "Huit mois de guerre en Extrême – Orient", *Le Carnet* (December 1904), pp. 272 – 278.

勒比尤:"在远东八个月的战争"

Reclus, élisée, "La Chine et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L'Humanité Nouvelle* (September 1900), pp. 257 – 270.

Also published as a separate offprint by Editions de l'*Humanité Nouvelle*, 1900, 16 pp.

勒克吕,E.:"中国和欧洲外交"

Réganey, Félix, "On égorge en Chine" (Avec illustrations), *L'Humanité Nouvelle* (September 1900), pp. 289 – 297.

雷加悔,F.:"中国大屠杀"

Renaud, Rosario, "Le bienheureux Ignace Mangin S.I. et ses compagnons, martyrs", *Lettres du Bas – Canada* 9.3 (1955), pp. 133 – 157.

雷诺,R.:"最幸运的任德芬和他的伙伴,蒙难者"

Renaud, Rosario, *Suchow. Diocèse de Chine. Vol. I*: (1882 – 1931). Montreal: Editions Bellarmin, 1955.

同上:苏州:中国教区

"La rentrée de la Cour à Pékin", *Revue de Paris* (1 April 1902), pp. 667 - 688.

"朝廷返回北京"

"Le retour du Général Voyron",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October 1901), pp. 272 - 274.

"沃伊隆将军回国"

Ricci, Giovanni, and Théobald Aumasson, *Avec les Boxeurs chinois*. Brive (Corrèze): Ed. "Echo des Grottes, 1949. 93 pp.

里奇,G.和 T.奥马松:**同中国义和团在一起**

Ruffi de Pontevès, Jean de, *Souvenirs de la colonne Seymour: les marins en Chine*. Paris: Plon - Nourrit, 1903. xii + 330 pp.

6th ed.: *Les marins en Chine: souvenirs de la colonne Seymour*; illustré de dessins d'Henri Rousseau, de photographies, et de croquis. Paris: Plon - Nourrit, 1904. xii + 330 pp.

鲁菲.德.蓬特韦,J.:**西摩特遣队的回忆:海军在中国**

Saillens, Marcel - Michel - Pierre (lieutenant), *Campagne de Chine (mai à septembre 1900)*. Journal d'un officier. Paris: Charles - Lavauzelle, 1905. 141 pp.

萨扬,M.M.P.(中尉):**中国之战(1900 年 5 月至 9 月)**

Salinis, Albert de, "L'héroïne du Pé - tang", *Etudes 42e année, tome 103* (1905), pp. 305 - 329.

Concerns Hélène de Jaurias, a Sister of Charity.

萨里尼,A.:**"北堂女英雄"**

关于姐妹 H.茹里爱丝

[Siege of Peking; Diary of a Russian Doctor],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Lausanne, February 1902).

[俄国大夫"北京被围"日记]

Séneschal, Alfred, and Emile Becker, "Blocus et résistance de la

Résidence de Tchang – kia – tchoang près Hien – hien", *Chine et Ceylan* 2 (*December 1900*), *pp. 125 – 141*.

塞纳斯夏尔,A.和E.贝克尔:"献县附近张家庄驻地的围攻和抵抗"

Silvestri, Cipriano, "La Chine de 1900", *Revue d' Histoire des Missions* 14 (1937), pp. 478 – 493.

With bibliography.

西尔维斯特里,C.:"1900年的中国"

Simon, Joseph, *Sous les sabres des Boxeurs*. Lille: Morel et Corduani, 1955.

西蒙,J.:在义和团大刀下

Soulié de Morant, Georges, *Ts' eu – Hsi, impératrice des Boxers*. Paris: Nielsson, 1911. 204 pp.

Reprinted Paris: Ed. You – Feng, 1997.

苏利埃.德.莫朗,G.:慈禧,义和团的太后

"Tai – ming – fou et les districts du Sud [de la mission de Tcheu – li sud – est]", *Chine et Ceylan* 2 (December 1900), pp. 154 – 160.

"大名府和南部各县(直隶东南教会)

Tardieu, A., [Chinese Indemnity], *Nouvelle Revue* (Paris, January 1902).

塔迪厄,A.:中国赔款

Tariel, V. (lieutenant), *La Campagne de Chine* (1900 – 1901) *et le Matériel de* 75.

Paris and Nancy: Berger – Levrault, 1902. 109 pp. Extracted from the *Revue d' Artillerie*.

塔里埃尔,V.:中国之战

Taurat, Jacques du, "Souvenirs du Sièg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kin", *Revue Indo – chinoise* 200 (18 August 1902), pp. 762 –

767.

托拉,J.:"法国驻北京使馆被围攻的回忆"

Taw Sein Ko, "Les Missionnaires en Chine. L'Opinion d'un Chinois", *Belgique Coloniale* 2.12 (1900), pp. 565 – 567.

陶盛科:"传教士在中国,一个中国人的看法"

[Tchang, Jean], "Lettre du Prêtre Jean Tchang à Mgr Otto, au sujet de la persécution sanglante de 1900 au Heoupa (Ecrite en 1901)", *Missions de Scheut* 45 (1937), pp. 361 – 365; 46 (1938), pp. 7 – 9.

The Flemish version is in *Missiën von Scheut* 45 (Scheut 1937), pp. 361 – 365; 46 (1938), pp. 6 – 9.

[张,J.]:"张神父就 1900 年河北血腥迫害之事写给 M.奥托的一封信"

Tobar, Jérôme, "Correspondance de Chine. Décrets impériaux contre les Boxeurs et en faveur des étrangers", *études* 38*e année*, *tome* 87 (5 June 1901), pp. 675 – 693.

Concerns the imperial edicts against the Boxers and in favour of foreigners.

管宜穆:"中国通讯,扼止义和团和利于洋人的皇家法令"

Tobar, Jérôme, "Correspondance de Chine. Un coin de la politique chinoise du 15 août au 15 novembre 1900", *études* 38*e année*, *tome* 86 (5 February 1901), pp. 388 – 405.

同上:"中国通讯,1900 年 8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中国政治一角"

Vasco, Gabriel, "L'Expédition de 1860 et les difficultés de la campagne actuelle", *Revue française de l'étranger et des Colonies* (August 1900), pp. 449 – 464.

See also the brief note,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e 1900", on

pp. 474 – 476.

瓦斯科,G.:"1860 年的远征和目前战争的困难"

另见简件"1900 年的远征军"

Une victime des Grands Couteaux. Vie et martyre du R. P. Théodoric Balat, Franciscain français. Au profit de la Mission du Chan – Tong [Shandong] Oriental (Chine). Bordeaux, 1923. 80 pp.

大刀会的一位受害者

Van Havere, Eugène, "Les ruines, les martyrs, les survivants, le corps de Mgr Hamer",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902), pp. 101 – 112.

Bishop Ferdinand Hamer CICM (1840 – 1900) was killed in Inner Mongolia on 24 July 1900.

范哈弗尔,E.:"废墟、殉教者与幸存者"

1900 年 7 月 24 日被害于内蒙古的费迪南主教

Van Kerckhoven, Joseph, "Un sauvetage émouvant",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901), pp. 31 – 32.

Extract from a letter dated Si – ing – dze (Mongolie Centrale), 25 August 1900.

范凯科文,J.:"感人的营救"

Verwilghen, Henri, "A travers le désert du Gobi. Relation du voyage des quinze missionnaires expulsés du Vicariat des Ortos [Mongolie sud – ouest]",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901), pp. 73 – 76, 96 – 108, 121 – 131, 145 – 151.

韦维让,H.:"穿越戈壁沙漠:15 名传教士旅行记"

Vidal, lieutenant – colonel, "Souvenirs de la guerre de Chine",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January 1902), pp. 3 – 13; (February 1902), pp. 57 – 69.

维达尔中校:"中国战争的回忆"

Villate, L. , *Du ravitaillement du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çais pendant la campagne de Chine de* 1900 – 1901. Paris: Charles – Lavauzelle, 1902.

维拉特,L.:1900 – 1901 中国战争时期法国战争的给养

Voyron, [émile – Jean – François – Régis] (général) , *Rapport sur l' Expédition de Chine* 1900 – 1901. (Extrait de la Revue des Troupes coloniales). Paris: Henri Charles – Lavauzelle, [s. a.]. 514 pp.

First published in *Revue des Troupes coloniales nos*. 11 – 18.

华伦(将军):关于 1900 – 1901 远征中国的报道

Wetterwald, Albert , "Une armée chrétienne improvisée. Défense de Wei – tsuen. (*Extraits du journal du* P. A. *Wetterwald*)", *études* 38e année, tome 86 (5 March 1901), pp. 663 – 693.

Also published in *Chine et Ceylan* 2 (March 1901), pp. 275 – 314. Accou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 Christian militia at Weicun, Wei xian, southeastern Zhili.

韦特沃,A.:"临时建立起的一支基督军队:保卫魏村"

关于直隶东南威县魏村教徒武装的叙述

Zenzinoff, B. de , "La politique russe en Chine", *Le Correspondant* 200 (25 August 1900), pp. 662 – 669.

津济诺夫,B.:"俄国对华政策"

(龚杰文译)

四　意大利文

[德]R.G.狄德满

Barzini, Luigi , *Avventure in Oriente*. A cura di Luigi Barzini, Jr.. Milan: A. Mondadori, [1959]. 570 pp.

巴芝尼,L.:东方历险记

Beltrami, Silvio , *La Voce del Sangue. P.* Giuseppe Maria Gambaro. (Bibliotechina Missionaria Anno XIX – Giugno 1941 XIX – Serie Biografica, No. 38). Milano: Istituto delle Missioni Estere, [1941]. 82 pp.

Concerns Giuseppe Maria [Bernardo] Gambaro OFM who was killed at Huangshawan, Hunan, on 7 July 1900.

白特勒米,S.:血的呼唤

Brevi Cenni della Persecuzione del Sansi (*Sciansi*). Ferrara: Tipografia Commerciale, 1902.

"Documenti inediti e editti di persecuzione contro le missioni francescane e cattoliche in

Cina (1900 – 1903)", La Voce di S. Antonio 12 (August 1907), pp. 10 – 14.

山西百年迫害

Fasil, Tommaso [in religion: Cherubino da Sappada] , *Una pagina dal-*

la Cina. Cause ed effetti della rivoluzione del 1900. Udine: Tipografia del 'Crociato', 1903. xxi + 395 pp.

法斯勒,T.:中国一页:1900年革命的起因和影响

Favier, Alphonse [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 "Dopo l'assedio del Petang", *Le Missioni Cattoliche* 31 (1902), pp. 182 – 185.

法维,A.:"北堂被围之后"

Favier, Alphonse [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 "Due mesi di assedio di Pechino", *Le Missioni Cattoliche* 30 (Milan 1901), pp. 7 – 9, 20 – 22, 30 – 32, 40 – 44, 56 – 58.

同上:"北京两月之围"

Julitta, Michele Maria, and Geremia Pedroni, *Distruzione del Vicariato Apostolico di Hun – nan meridionale ... e alla morte di Mons. Antonino Fantosati. Lettere del P. Michele Maria O. F. M. e del P. Geremia Pedroni O. F. M. al Cardinal Prefetto della S. C. di Propaganda*. Rome: Tipografia Poliglotta della S. C. de Propaganda Fide, 1900. 8 pp.

Destruction of the South Hunan mission and death of Antonino Fantosati in 1900.

朱丽达,M.M.等:河南南部神父之死

Manini, Odoardo, "L'assedio di Kleimbragge. Ossia avventure di 15 Europei assediati nell'alta Mongolia nel 1900. Giornale di viaggio", *La Realtà* (1902).

玛尼尼,O.:"1900年北蒙古欧洲人之围"

Manini, Odoardo, *Episodi della rivoluzione cinese* 1900. Per un missionario dell'Istituto Parmense S. Francesco Saverio per le Missioni Estere. Parma: Tipografia Rossi – Ubaldi, 1901. 254 pp.

同上:1900年中国革命事件

"Martiri della Cina del 1900", *Le Missioni Francescane* 22 (1946), pp.

145 – 176.

Special issu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eatification.

"1900 年中国的殉难者"

"I martiri della Manciuria", *Le Missioni Cattoliche* 30 (Milan 1901), pp. 350 – 354.

Concerns the experiences of missionaries Henri – André Roubin and Elie – Fran? ois Delpal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in southern Manchuria. Note also "Un manifesto dei Boxer", in *ibid*., pp. 541 – 542.

"满洲的殉难者"

Mertens, Pietro Saverio [Pierre – Xavier], *Sangue cristiano lungo il Fiume Giallo. Atti dei martiri nella Cina contemporanea*. Rome: Scuola Tipografica Missionaria Domenicana, 1940. 150 + iii p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麦屯斯, P.: 黄河边的基督徒惨案

[Nanetti, Barnaba], *Barbarie e trionfi. Ossia le vittime illustri del San – Si in Cina nella persecuzione del* 1900. Parma: Tipografia Egidio Ferrari, 1908. 552 pp.

The 2nd edition, with new documents and many illustrations, collected by Giovanni Ricci OFM, was published "per cura dell'Associazione Nazionale per Soccorrere i missionari cattolici italiani". Florence: Tipografia Barbèra Alfani e Venturi Proprietari, 1909 [al. 1910]. viii + 853 pp.

With brief accounts of all the Catholic priests and sisters killed at Taiyuan, Shanxi, on 9 July 1900.

[拿乃蒂, B.]: 野蛮与胜利: 1900 年中国山西迫害中的殉难者

Pozzi, G., *In morte del missionario P. Giuseppe da Galliate*. Milano: Litografia Cantone, 1900.

Concerns Giuseppe Maria [Bernardo] Gambaro OFM who was killed at Huangshawan, Hunan, on 7 July 1900.

波芝,G.:葛里得神父之死

Ricci, Giovanni, *Gigli e rose. Ossia le sette protomartiri dell' Istituto delle Francescane Missionarie di Maria, massacrate in Cina il 9 luglio* 1900. Appunti storici. Levanto: Tipografia dell' Immacolata, 1919. 110 pp.

Concerns the seven pro-martyr sis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killed at Taiyuan, Shanxi, on 9 July 1900.

里奇,G.:百合花与玫瑰:玛丽亚神学院的第一个殉难者

Ricci, Giovanni, *Un Martire Francescano. Biografia del P. Giuseppe M. a Gambaro di Galliate, morto per la fede in Cina nel* 1900. Rome: Libreria S. Antonio, 1912. 90 pp.

Concerns Giuseppe Maria [Bernardo] Gambaro OFM who was killed at Huangshawan, Hunan, on 7 July 1900.

同上:一位方济各会修士殉难者

Ricci, Giovanni, *Pagine di eroismo cristiano. I Terziari Cinesi martiri nello Shan-si Settentrionale (Persecuzione dei Boxers - 1900).* Edito a cura della Pia Opera dei Fratini di S. Antonio (Vicenza) Lonigo. by Lonigo: Tipografia Moderna, 1925. xii + 193 pp.

Lists some of the Chinese Franciscan Tertiaries killed in northern Shanxi in 1900.

同上:基督徒英雄的一页:1900 年山西的殉难者

Ricci, Giovanni, and Ercolano Porta, *Storia della missione Francescana e del Vicariato Apostolico del Hunan meridionale dalle sue origini ai giorni nostri*. Pubblicata per cura del P. Enrico Muratorio O. F. M., procuratore per la stessa missione by Bologna: Stabilimenti Poligrafici Riuniti, 1925. 222 pp.

This history of the Vicariate Apostolic of South Hunan has two chapters on the anti – Christian activities in 1900.

里奇,G.等:河南南部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的故事

"'Sanguinis Martyrum'; ossia i martiri di Pechino del 1900", *Le Missioni Estere Vincenziane* 9 (1931), pp. 179 – 182, 197 – 199, 243 – 245, 281 – 285; 10 (1932), pp. 8 – 11, 32 – 35, 51 – 55, 78 – 80, 98 – 102, 132 – 135, 151 – 153, 177 – 181, 201 – 204, 230 – 233, 281 – 283; 11 (1933), pp. 16 – 17, 134 – 136, 209 – 212, 259 – 260; 12 (1934), pp. 8 – 9, 33 – 36, 57 – 58, 83 – 85, 180 – 182, 209 – 212, 226 – 228, 255 – 256; 13 (1935), pp. 163 – 166, 233 – 235; 14 (1936), pp. 33 – 36, 91 – 93, 114 – 116, 151 – 152, 187 – 189.

"血中英雄:1900 年北京的殉教者"

Savarese, Vincenza (Sister), "La persecuzione dei Boxer a Pechino nel 1900", *Le Missioni Estere Vincenziane* 18 (Chieri 1940), pp. 138 – 142, 156 – 159, 175 – 179; 19 (1941), pp. 28 – 31, 44 – 45, 76 – 79.

萨娃莱塞,V.:"1900 年义和团在北京的迫害"

Silvestri, Cipriano, "I martiri cinesi nella rivoluzione del 1900", *La Voce di San Antonio* 14 (1936), pp. 35 – 36, 61 – 64, 95 – 96, 129 – 131, 193 – 196, 287 – 288, 317 – 318, 323 – 324; 15 (1937), pp. 35 – 36, 61 – 63, 253 – 256.

斯维斯特里,C.:"1900 年革命中的中国殉教者"

Silvestri, Cipriano, *Palme e Aureole. Compendio del martirio e della vita di ventinove martiri cinesi del* 1900. Rome: Tipografia Superstampe, 1944. 111 pp.

Compendium of 29 martyrs in China in 1900.

同上:棕榈与光环:1900 年 29 位中国殉教者

Silvestri, Cipriano , *La testimonianza del sangue. Biografie dei beati martiri cinesi uccisi il* 4, 7 *e* 9 *luglio* 1900. Rome: Scuola Tipografica 'Don Luigi Guanella', 1943. xx + 559 pp.

Concerns the victims of persecution in Shanxi and Hunan in July 1900.

同上:血证:1900 年 7 月 4、7、9 日遇难的中国殉教者传记

Silvestri, Cipriano , *Vita e martirio del servo di Dio Mons. Antonino Fantosati , Frate Minore , massacrato in Cina nel* 1900. *Appunti biografici*. Quaracchi near Florence: Tipografia del Collegio di S. Bonaventura, 1914. 243 pp.

同上:上帝信徒的生活与殉教

Silvestri, Cipriano , *Le vittime dei Pugni Uniti*. Rome: Scuola Tipografica 'Don Luigi Guanella', 1941. 271 pp.

Concerns Boxer victims.

同上:义和团的受难者

Tesi, Luca , *La rivolta dei Boxer. Esoterismo e guerra , magia e arti marziali nella Cina imperiale*. (Politica e storia – Arnaud editore, 15). Florence: Arnaud, 1995. 207 pp.

苔斯,L.:义和团起义

Testore, Celestino , *Sangue e Palme sul fiume Giallo. I beati martiri cinesi nella persecuzione della Boxe , Celi Sud – Est* – 1900. Rome: Curia Generaliz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1955]. viii + 263 pp.

An account of the 56 marty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southeast Zhili.

苔斯托莱,C.:黄河岸边的鲜血与棕榈

[Yuxian] , "Lettera del Persecutore Iu – sien, Vicerè del San – si, all' Imperatore della Cina dopo la strage de' Vescovi Grassi ecc. – Coan – siu 26 (10 Luglio 1900)", *L' Oriente Serafico* 19 (*S. Maria degli Angeli* 1907), pp. 565 – 566.

Letter of Yuxian, governor of Shanxi.

「毓贤」:"山西巡抚毓贤的信件"

(姜作利译)

五 其他西文

[德]R.G.狄德满

Anasagasti, Pedro, *Héroes del apostolado católico. Apostar? Jamas! La revolución de los Boxers en la China del siglo XX*. Bilbao: Editorial "El Siglo de las Misiones", 1951. 335 pp.

阿拿萨莫斯蒂,P.:**天主教殉教者传**

Een blik in Zuid – Chan – Si tijdens de jongste Vervolging. Verslag van eenige Missionarissen aan Mgr J. Hofman, Vic. Ap. Met Toelichtingen. Cuyk a. d. Maas: Jos. J. van Linderf, [1901]. 183 pp.

最近迫害中的晋南一瞥

Botty, Albert, "Heldentijden. Een verhal uit den tijd der christenvervolging in China", *Annalen van Sparrendaal* 15 (Sparrendaal 1915), pp. 195 – 198, 217 – 226.

波蒂,A.:**"中国的基督徒殉教者传"**

Chesneaux, Jean, *Boerenopstanden in China*, 1840 – 1949. Trans. by N. H. Fuchs – van Maaren. Leiden: Sijthoff, 1977. 112 pp.

Dutch translation of Le Mouvement paysan en Chine.

谢诺,J.:**1840 – 1949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中国的农民运动一书的荷兰译本

Chesneaux, Jean, *Movimientos campesinos en China*, 1840 – 1949.

Madrid: Siglo Veintiuno, 1978. 156 pp.

Spanish translation of the French edition, 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谢诺, J.: 1840 – 1949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中国的农民运动一书的西班牙译本

De Schaepdryver, E., *De Boksers* 1899 – 1900. (Xaveriana: No. 40; April 1927: 4e Reeks., No. 4). [Leuven], [1927]. 32 pp.

谢皮得维, E.: 1899 – 1900 年的义和团

"Duo documenta ex tempore boxerorum", *Communicationes* 13 (1934), pp. 74 – 76.

Concerns a letter from the Rev. T'eng to Bishop DeMarchi OFM at Qingdao; and a letter from Rev. Simon Gao to DeMarchi, of the same date.

"义和团时期的两个文件"

Glover, Archibald E.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Genom dödsskuggans dal eller tusen mil af under in Kina: Ett personligt vittnesbörd om Guds fr, cölsande makt ur de kätjserliga Shansi – boxarnes händer*. Trans. from the English by J. Adolf Helldén. Gothenburg: N. P. Pehrsson, 1912. 271 pp.

哥劳维, A.E.: 山西义和团手中逃生记

Green, Charles H. S., *Rystende oplevelser under Boxer – oprøret i Kina 1900, berettet af missionær Green og hustru*.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into Norwegian by N. N. R? nning. Minneapolis: Ungdommens Ven, [s.a.]. 75 pp.

格林, C.H.S.: 1900 年义和团时期历险记

Gubbels, Natalis Henricus, "De causa martyrii in persecutione Boxerum anni 1900", *Nova et Vetera* 17 (Yichang 1932), pp. 469 – 488. *See also Apostolicum* 7 (Ji'nan 1936), pp. 67 – 68.

古伯尔斯,N.H.:"1900年义和团迫害中殉教的原因"

Gubbels, Natalis Henricus, "Iterum de causa Martyrii a. 1900", *Nova et Vetera* 23 (1937), pp. 11 – 33. Also in *Apostolicum* 9 (Ji'nan 1938), pp. 228 – 231.

同上:1900年义和团迫害中殉教的原因再论

Himle, Th. [Thorstein], *Guds veie med et gjenstridigt folk: en historisk beretning*. Udgivet af Kinamissionsbestyrelsen. Red Wing, MN: [s.n.], 1902. 388 pp.

欣勒,T.:在对立人群中的上帝之路

Iruarrízaga, José Maria, *Barbarie i Triunfos modernos, o sea La Persecución de los Boxers en el Shansi, China, en el año del Señor 1900*. Bilbao: Imp. Del Ave María, 1920. 244 pp. Part II: Bilbao: Impr. C. Dochao de Urigüen, 1924. 350 pp.

Based on the works by Giovanni Ricci, Barnaba Nanetti da Cologna and Ricci's Acta Martyrium.

伊路里扎葛,J.M.:野蛮与胜利,1900年山西义和团的迫害

Mertens, Pedro – Javier [Pierre – Xavier], *Sangre cristiana en el Río Amarillo. Actas de los mártires de la China contemporánea*. Bilbao: Editorial El Siglo de las Misiones, 1941. 168 p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梅尔滕斯,P.:血染黄河——中国基督徒殉教者事迹

Radonić, Basilius [in religion: Basilio da Ragusio], "Relatio de persecutione Hu – Nan Meridionalis in Sinis. U – cian – fu [Wuchang]: XVo Kal. Decembris 1900 [17 November]", *Acta O. F. M.* 20 (1901), pp. 44 – 47, 80 – 83, 89 – 91, 111 – 114, 145 – 148, 162 – 163.

拉多尼可,B.:"中国河南南部的迫害"

Ricci, Giovanni, *Acta Martyrium Sinensium Anno 1900 in Prov. San –*

Si occisorum historice collecta a P. Joanne Ricci O. F. M. ex ore testium singulis in locis ubi martyres occubuere. Relatio Ex – Officio E Parte Ordinis Fratrum Minorum. Ad Claras Aquas (Quaracchi) propre Florentiam: Ex Pypgraphia Collegii S. Bonaventurae, 1911. 753 pp.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 Christian martyrs in Shanxi province killed at the time of the Boxer uprising. 1764 names are listed. Reprinted as: "Acta Martyrium Sinensium anno 1900 in Provincia San – si occisorum historice collecta ex ore Testium singulis in locis ubi Martyres occubuere. Relatio ex – officio ex parte Ordinis Fratrum Minorum", in: *Acta Ordinis Fratrum Minorum* 30 (Quaracchi 1911), pp. 96 – 100, 181 – 185, 211 – 215, 278 – 289, 299 – 307, 327 – 335, 355 – 367, 389 – 398; 31 (1912), pp. 22 – 29, 45 – 55, 86 – 93, 106 – 114, 138 – 143, 158 – 165, 185 – 189, 256 – 257, 300 – 304, 325 – 330, 337 – 343; 32 (1913), pp. 13 – 17, 31 – 41, 87 – 91, 125 – 126, 157 – 160, 191 – 196, 222 – 227, 251 – 258, 292 – 295, 319 – 325, 350 – 352.

里奇,G.:1900 年山西省殉教者事迹

Ricci, Giovanni, *Vicariatus Taiyuanfu; seu brevis historia antiquae Franciscanae missionis Shansi et Shensi a sua origine ad dies nostros* (1700 – 1928). Beijing: Ex Typographia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1929. ix + 192 pp.

同上:山陕圣方济各会简史,1700—1928

Rinell, Johan Alfred, and John H. Swordson, *Boxare – upproret och förföljelserna mot de kristna i Kina* 1900 – 1901. Stockholm: Baptistmissionens Förlagsexpedition, [1902]. 307 pp.

里内尔,J.:义和团起义与基督教的迫害

Schlegel, Gustaaf, *De Oorsprong van den Vreemdenhaat der Chineezen*. 13 pp.

Offprint from *Tijdschrift van het Koninklijke Nederlandsch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 (September 1901). Read at Amsterdam on 13 April 1901.

施勒吉尔,G.:**中国反外主义的起源**

Sinarum seu Vicariatus Apostolici Shien – Hsien. Beatificationes seu declarationis martyrii servorum Dei Leonis Ignatii Mangin et Pauli Denn, sacerdotum Societatis Jesu; Petri Tchou, viri laici; Annae Wang, virginis secularis, et sociorum; sacerdotum atque Christifidelium in odium fidei, uti fertur, interfectorum summarium super dubio. "An constet de martyrio et causa martyrii in casu et ad effectum, de quo agitur.". Rome: Typis Pont. Universitatis Gregorianae, 1937. 5 vols.

Investig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eatification of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killed by the Box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Southeast Zhili in 1900, including the Jesuits Ignace Mangin and Paul Denn.

The results of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s were published under the same or similar title in 1939, 1947 and 1954. For details, see *Bibiotheca Missionum Vol.* XIII, p. 173.

献县代牧区义和团时期殉教传教士与中国教徒

Zetterholm, Tore Ulf Axel, *De främmande djävlarna*. Stockholm: Norstedt, 1977. 303 pp.

Historical fiction.

泽特霍尔姆,T.:洋鬼子

(姜作利译)

六 俄 文

[俄]A.A.博克沙宁 [中]苏位智

Акатова Т.Н. и другие,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итая : XIX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X в.*, М., 1990.

阿卡托娃 T.H.等著:19－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社会结构,莫斯科,1990 年。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 дела 115－117, 763－764.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中国部分),案卷第 115－117 页及 763－764 页。

Архив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СССР, фонд 32, дело 53.

苏联海军档案,总第 32 号,案卷第 53 页。

Ассоциация кулаков. Обще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вызвало восстание и привело к войне с европейцами—"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т. 2, 1900－1901, выпуск 1, с. 17－27.

拳会——发动起义并向欧洲人开战的社团,《东方学院院报》,第二卷(1900－1901)第一辑 17—27 页。

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 *Папа и восстание боксёров*—"Атеист", 1930, № 53, с. 122－128.

巴拉诺夫斯基 M.И.:**教皇与义和团起义**,载《无神论者》

1930 年第 53 期，122 – 128 页。

Боксё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26, т. 1 (14), с. 1 – 49.

义和团起义，见《红色档案》1926 年第 1 卷第 14 册，第 1 – 49 页。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П., Резонов П.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освободите -льная 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ов, М., 1959.

邦达连科 В. П.，列泽诺夫 П. И.：**19 – 20 世纪初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斗争**，莫斯科，1959 年。

Бродская М. Ф., *Народ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общества Ихэцюань* (1898 – 1901), Л. 1947 (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

布罗茨卡娅 М. Ф.：**义和拳领导的中国民众运动**（1898 – 1901），列宁格勒，1947 年（副博士学位论文）。

Бродская М. Ф., *Народ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общества Ихэцюнь* (1898 – 1901), Б. м., б. г., (тезисы каид. дисс.).

布罗茨卡 М. Ф.：**义和拳领导的中国民众运动**（1898 – 1901），莫斯科图书馆·市图书馆，（副博士论文提纲）。

Века наравной борьбы, М., 1967.

非势均力敌之争的世纪之交，莫斯科，1967 年。

Взятие Пекина доблестными русскими войсками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под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генерал – лейтенанта Линевича, М., 1901.

利涅维奇中将指挥俄军勇士与盟军攻占北京，莫斯科，1901 年。

Витте С. Ю., *в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рлин, 1923 – 1924.

维特 С. Ю.：**回忆录**，柏林，1923 – 1924 年。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8.
义和团起义(文献资料),莫斯科,1968年。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т. Ⅶ, М., 1960.
《世界历史》第7卷,莫斯科,1960年。

Галкин И.С., *Китай* 1870－1918, М., 1950.
加尔金 И.С.:中国 1870－1918,莫斯科,1950年。

Горелик С.Б.,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1898－1903*гг. и доктрина "открытых дверей"*, М., 1960。
戈列利克 С.Б.:1898－1903年美国在满洲的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莫斯科,1960年。

Грими Э.Д.,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М., 1927.
格里姆 Э.Д.:关于远东国际关系史的条约及文件汇编,莫斯科,1927年。

Гриневич П. А., *Боксё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1934, № 13, с. 242－275.
格里涅维奇 П.А.:义和团起义,载《中国问题》1934年第3期,第242－275页。

Гром русских побед в Китае (Разгром "Большого кулака"), М., 1900.
俄国在中国胜利的雷声("神拳"的毁灭),莫斯科,1900年。

Дацышен В.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Маньчжурии* 1900*г.* Ч. Ⅰ,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сухопутном фронте*.
达齐申 В.Г.:1900年满洲的俄中战争,第1册,陆路战线的战斗行为。

Дейч Л., *Кровавые дни*, СПб, 1906.
杰伊奇 Л.:流血的日子,圣彼得,1906年。

Делюсин Л. П. и др.,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в*

Китае (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М., 1988.

杰柳辛 Л.П.等编：**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莫斯科，1988 年。

Доиадзе В.,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народ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ь* – "*Труды Тбили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 – 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3, т.51, с.111 – 154.

多那泽 В.：**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起义**，载《国立第比利斯大学丛刊》1953 年第 51 册，第 111 – 154 页。

Евреинов Б.П., *Осад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миссий в Пекине. Май – август* 1900*г*..СПб., 1906.

叶夫列伊诺父 Б.П.：**对驻北京各国公使馆的围攻——1900 年 5 月至 8 月**，圣彼得堡，1906 年。

Елец Ю.Л., *Жёлтое нашествие*, СПб, 1903.

叶列茨 Ю.Л.：**黄祸的侵害**，圣彼得堡，1903 年。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 С.: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конце* XIX века, М., 1951.

耶路撒冷斯基 А.С.：**19 世纪末德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及手段**，莫斯科，1951 年。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их монополий В Китае на рубеже* XIX *и* XX *веков*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0, №.9, с.66 – 89.

耶路撒冷斯基 А.С.：**19 – 20 世纪之交时德国垄断集团对中国的渗透**，载《历史问题》1960 年第 9 期，第 66 – 89 页。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Герм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в Китае в* 1900*г*.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1, № 4, с.68 – 105.

耶路撒冷斯基 А.С.：**德帝国主义与 1900 年国际武装干涉中国的外交策划**，载《亚非人民》1961 年第 9 期，第 68 – 105 页。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 С., *Поход сеймура и его провал*.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литика. Дипломатия. XVI – – XX века", М. 1964, с. 398 – 402.

耶路撒冷斯基 A.C.:**西摩尔的进军及其失败**,载《16 –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政治及外交》,莫斯科,1964 年,第 398 – 402 页。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экспас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XVII – XIX веках*, М., 1974.

耶路撒冷斯基 A.C.:**17 至 19 世纪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莫斯科,1974 年。

Ефимов Г.В., *Герм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и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мстичес -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900 – 1901*гг. в Китае* – "Труды юбилейной научной сессии ЛГУ, сек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Л., 1948, с. 264 – 275.

叶菲莫夫 Г.В.:**德国帝国主义与 1900 – 1901 年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载《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会议周年纪念论文集·历史分册》,列宁格勒,1948 年,第 264 – 275 页。

Ефимов Г.В., *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М., 1951.

叶菲莫夫 Г.В.:**中国近现代史文集**,莫斯科,1951 年。

Ефимов Г.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ц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конце XIX в.* (1894 – 1899), Л., 1956.

叶菲莫夫 Г.В.:**19 世纪末(1894 – 1899 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列宁格勒,1956 年。

Ефимов Г. 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1894 – 1899, М., 1958.

叶菲莫夫 Г.В.:**中国的对外政策(1894 – 1899)**,莫斯科,1958

年。

Ефимов Г. В., *Ихэтуань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6, М., 1965, с.707 – 710.

叶菲莫夫 Г.В.:**义和团起义**,载《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 6 卷,莫斯科,1965 年 第 707 – 710 页。

Зарина Л.Л., Лившиц С.Г., *Брит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Китае* (1896 – 1901гг.), М., 1970.

扎林娜 Л.Л., 利夫希茨 С.Г.:**英帝国主义在中国**(1896 – 1901),莫斯科,1970 年。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В.Меликсетова, М., 1998.

中国历史,梅利克谢托夫 А.В.主编,莫斯科,1998 年。

Истор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 XIX и XX веках, М., 1928.

19 – 20 **世纪中国革命运动史**,莫斯科,1928 年。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шихдней,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Л.В.Симоновской и М.Ф.Юрьева, М., 1974, с.228 – 231.

从古代到今天的中国史,西蒙诺夫斯卡娅 Л.В.,尤里耶夫 М.Ф.主编,莫斯科,1974 年,第 228 – 231 页。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М., 1971.

近代亚非各国史,莫斯科,1971 年。

Калюжная Н. М., *Новая книга о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реценз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9, № 2, с.188 – 195.

卡柳日娜娅 Н.М.:**一部关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新书**(评论),载《历史问题》1959 年第 2 期第 188 – 195 页。

Калюжная Н.М.,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движении ихэтуаней*, Пекин, 1959 /аннотация /,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1, № 2, с.204 – 206.

卡柳日娜娅 Н.М.: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1959 年(简介),载《亚非人民》1961 年第 2 期,第 204 – 206 页。

Калюжная Н. М., *Зар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ихэтуаней до выхода ихэтуаней за пределы провинции шаньдун*, 1898 – 1900, М., 1964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кандидат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

卡柳日娜娅 Н.М.:超越山东省界以前义和团运动的萌芽与发展(1898 – 1900),莫斯科,1964 年(副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Кадюжная Н. М., *О содержании прокламаций написанных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восстания Ихэтуаней*,—"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 № 71, 1964, с. 133 – 142.

卡柳日娜娅 Н.М.:关于义和团起义参加者撰写的揭帖内容,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 71 期,1964 年,第 133—142 页。

Калюжная Н. М.,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1898 – 1900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8.

卡柳日娜娅 Н.М.:1989 – 1900 年的义和团起义(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68 年。

Калюжная Н.М., *О характере тайного союза "Ихэтунь"*, – – "Тай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М., 1970, с. 85 – 107.

卡柳日娜娅 Н.М.:关于秘密会社义和团的性质,见《旧中国的秘密会社》,莫斯科,1970 年,第 85—107 页。

Калюжная Н. М.,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1898 – 1901),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 1973.

卡柳日娜娅 Н.М.:义和团起义(1898—1901)(历史文献),莫斯科,1973 年。

Калюжная Н. М.,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1898 – 1901), М., 1978.

卡柳日娜娅 Н.М.：**义和团起义**(1898—1901)，莫斯科，1978年。

Канторович А.Я., *Америка в борьбе за Китай*, М., 1935.

坎托罗维奇 А.Я.：**美国参与瓜分中国的争斗**，莫斯科，1935年。

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екин, 1922.

科罗斯托韦茨(廓索维慈，廓罗思)И.Я.：**俄国在远东**，北京，1922年。

Корсаков В.В., *Пекинские события – Лич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участника об осаде в Пекине*, СПб., 1900.

科尔萨科夫 В.В.：**北京事变——亲历北京之围回忆录**，圣彼得堡，1900年。

Корсаков В.В., *Пекин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Пб., 1901.

科尔萨科夫 В.В.：**北京事件**，圣彼得堡，1901年。

Костяева А.С. и др.,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1898 – 1901),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 1973.

科斯佳耶娃 А.С.等编：**1898—1901年的义和团起义(史学研究)**，莫斯科，1973年。

Краткая записка 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в год ген – цзы / 1900 / бедствий. Сочинение "Ленивого отшельника пустынного острова", СПб., 1901.

庚子年间(1900)灾难实录，荒岛赋闲隐士作，圣彼得堡，1901年。

Крюков М.В, Малявин В.В., Софронов М.В., Чебоксаров Н.Н.,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М., 1993.

克留科夫 М.В.、马利亚温 В.В.、索夫罗诺夫 М.В.、切博克萨罗夫 Н.Н.：**19—20世纪初中国民族史**，莫斯科，1993年。

Кюнер Н. В.,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屈纳 Н.В.:**中国现代政治史概要**,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 年。

Ленин В. И., *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1900, –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4, с.378 – 383.

列宁 В.И.:**中国的战争**,1900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78—383 页。

Ленин В. И., 1908, *Горючий материал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7, с.174 – 183.

列宁 В.И.:**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1908 年,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74—183 页。

Ленин В.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1912, –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21, с.400 – 406.

列宁 В.И.:**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1912 年,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400—406 页。

Ленин В.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уч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1913,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23, с.1 – 4.

列宁 В.И.:**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 年,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4 页。

Либкнехт В.,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Китае и Трансваальская война*, СПб, 1907.

里布可涅赫特 В.:**世界政治(中国的骚乱和德兰士瓦战争)**,圣彼得堡,1907 年。

Лившиц С.Г., *Из истории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и Южном Китае в 1900 году*, –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60, № 4, с.93 – 105.

利夫希茨 С.Г.:**1900 年华中华南反帝运动史料**,载《东方学问题》1960 年第 4 期,第 93—105 页。

Лившиц С. Г., П. Флеминг, *Осада Пекина*, *Лодон*, 1959 / *рецензия* /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Африки", 1961, № 3, С. 209 – 212.

利夫希茨 С. Г.、П. 弗莱明:**围困北京**,伦敦,1959 年(评论),载《亚非人民》1961 年第 3 期第 209—212 页。

Лившиц С.Г.,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аннотация* /,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0, № 5, с. 210 – 212.

利夫希茨 С.Г.:**义和团起义(文件和资料)(简介)**,载《亚非人民》1970 年第 5 期第 210—212 页。

Лянцичао, *Лихунчжан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40 *лет*, СПб., 1905.

梁启超:**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圣彼得堡,1905 年。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Китае в 1900 – 1901*гг*., СПб., 1908.

1900—1901 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圣彼得堡,1908 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40 – 1949, М., 1956.

远东国际关系(1840—1949),莫斯科,1956 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М., 1973.

远东国际关系,莫斯科,1973 年。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К.,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жизнь*, *Китайские дела*, – –"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 1900, № 7, С. 91 – 108.

米哈依洛夫斯基 Н.К.:**文献与现实,中国事态**,载《俄国财富》1900 年第 7 期,第 91—108 页。

Непомнин О. Е., *Синтез традиционалистской редакции и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виже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вКитае* (в связи с

монографией Н. М. Калюжной,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 (1898 – 1901))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6, 1982, с. 145 – 153.

涅波姆宁 O.E.:**沿袭传统的反应方式与反帝精神的结合,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评卡柳日娜娅,义和团起义(1898—1901)**,载《亚非人民》1982 年第 6 期,第 145—153 页。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 М., 1972.

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 年。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 зависимых стран , М., 1940.

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近代史,莫斯科,1940 年。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 , *т*. 2, М., 1952.

东方各国近代史,第 2 卷,莫斯科,1952 年。

Овсяный П.,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 1910.

奥夫夏内 П.:**发生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圣彼得堡,1910 年。

Остриков П. 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в Китае в 1900 – 1914 годах*, М., 1973, 1978.

奥斯特里科夫 П. И.:**英国对华的帝国主义政策(1900—1904)**,莫斯科,1973、1978 年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Л., 1928.

帝国主义时代专制制度对外政策史文集,列宁格勒,1928 年。

Паволодин П. Л., *Кита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о –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орьба*, М., 1901.

帕沃洛金 П. Л.:**中国及中国与欧洲当前的争斗**,莫斯科,1901 年。

Позднеев Д. М., 56 *дней пекинского сидения в связи с ближайшими к нему событиями пекинской жизни*, СПб., 1901.

波兹涅耶夫 Д. М.：由于最近北京事件而困留北京的 56 天，圣彼得堡，1901 年。

Позднеев Д. М., *Боксёр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ак этап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в Китае*, – –"Звезда", 1926, № 4, с. 156 – 172.

波兹涅耶夫 Д. М.：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解放斗争的一个阶段，载《星》月刊 1926 年第 4 期，第 156 —172 页。

Покотилов Д. Д., *Дневник осад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 Пекине с 22 мая по 1 августа*. Ялта, 1900.

波科季洛夫（璞科第）Д. Д.：欧洲人在北京被困日记（5 月 22 日至 8 月 1 日），雅尔塔，1900 年。

Покотилов Д. Д., *Дневник с 2 по 31 августа 1900г.*, СПб., 1900.

波科季洛夫（璞科第）Д. Д.：日记（1900 年 8 月 2—31 日），圣彼得堡，1900 年。

Попов П. С., *Два месяца осады в Пекине. Дневник 18 мая – 31 июля стар. ст. 1900г.*, – –"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 1901, № 2, с. 517 – 536; № 3, с. 6 – 37.

波波夫 П. С.（柏百福，茂陵）：北京围城两月记（俄历 1900 年 5 月 18 日—7 月 31 日日记），载《欧洲通报》1901 年第 2 期第 517—536 页，第 3 期第 6—37 页。

Романов Б. А., *Росс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2 – 1906), Л., 1928.

罗曼诺夫 Б. А.：俄国在满洲（1892—1906），列宁格勒，1928 年。

Романов Г.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 Ин – т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АН СССР, 1980.

罗曼诺娃 Г. Н.：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中两国远东经济关系史，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0 年。

РомановГ. 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М., 1987.
罗曼诺娃 Г.Н.:**俄中两国远东的经济关系(19—20 世纪初叶)**,莫斯科,1987 年。

Рудаков А. В., *Общество И – Хэ – туань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последних события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1.
鲁达科夫 A.B.:**义和团及其在远东时局中的作用**,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 年。

Сафаров Г.И., *Классы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Л., 1928.
萨法罗夫 Г.И.:**阶级与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莫斯科 列宁格勒,1928 年。

Сафаров Г.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Л., 1933.
萨法罗夫 Г.И.:**中国历史概要**,列宁格勒,1933 年。

Симоновская Л. В., Эренбург Г. Б., Юрьев М. Ф.,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М., 1956, с.179–187.
西蒙诺夫斯卡娅 Л.В.、爱伦堡 Г.Б.、尤里耶夫 М.Ф.:**中国史纲**,莫斯科,1956 年第 179—187 页。

Столповская А., *С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цев с иностранцами и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М., 1903.
斯托尔波夫斯卡娅 A.:**中国人与洋人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后果**,莫斯科,1903 年。

Сутробов Е., *Народ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Китае*, – – "Коммунист"(Куйбышев), 1939, № 1, с.69–72.
苏格罗博夫 E.:**中国的民众起义**,载《共产党人》(古比雪夫)1939 年第 1 期,第 69—72 页。

Тяпкина Н. И., *Деревня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Кита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М..

佳普金娜 Н.И.:**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下的农村和农民(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莫斯科。

Ухтомский Э., *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ем*, СПб., 1901.

乌赫多姆斯基 Э.:**中国书简选辑**,圣彼得堡,1901 年。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Борьба за раздел Китая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Открытых дверей"*, 1895 – 1900, М. – Л., 1956.

富尔先科 A.A.(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 年。

Харьский К. А., *Китай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Хабаровск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哈雷斯基 K.A.:**中国从远古到现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 年。

Ходоров А.Е., *Страничка и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 –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3, № 3, с. 258 – 266.

霍多罗夫 A.E.:**中国革命史的一页**,载《新东方》1923 年第 3 期,第 258—266 页。

Ходоров А. Е., Павлович М. П., *Китай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 1925.

霍多罗夫 A.E.、帕夫洛维奇 M.П.:**中国为捍卫独立而斗争**,莫斯科,1925 年。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 фонд 560, опись 28. дела 78, 155 – 157. 159 – 160, 163, 183, 203, 764, 790, 794, 800, 819, 864 – 865, 874; опись 29, дела 78, 107.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圣彼得堡),总第 560 号,目录第 28 册,案卷 78、155—157、159—160、163、183、203、764、790、794、

800、819、864—865、874；目录第 29 册，案卷 78、107。

Южаков С. Н.. *Китайские дела*, – –"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 1900, №.6, с.115 – 129.

尤扎科夫 С.Н.：**中国事态**，载《俄国财富》1900 年第 6 期，第 115—129 页。

Янчевецкий Д., *У стен недвижного Китая*, СПб, 1903.

扬契维茨基 Д.：**在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圣彼得堡，1903 年。

（张永全 译）

七 日 文

[日]佐藤公彦

(一)资料、战史、日记

国民新聞社編「支那便覧」、東京、国民新聞社、1900

国民新闻社编《**中国手册**》，东京，国民新闻社，1900

杉本 殖『清国擾乱日記』、神戸、三盟館、1900

杉本 殖《**清国骚乱日记**》，神户，三盟馆，1900

服部宇之吉『北京籠城日記』、1900

服部宇之吉《**在北京被困日记**》，1900

田平義三郎『東洋風雲録』、東京、上田屋書店、1900

田平义三郎《**东洋风云录**》，东京，上田屋书店，1900

『風俗画報』編集部編『支那戦争図会』、東京、東陽堂、1900

《风俗画报》编集部编《**中国战争画册**》，东京，东阳堂，1900

『東洋戦争実記、一九編、北清戦史』、東京、博文館、1901

《**东亚战争实记，十九篇，北清战史(义和团战史)**》，东京，博文馆，1901

坪井善四郎『北清観戦記』、東京、文武堂、1901

坪井善四郎《北清观战记(义和团战争观战记)》,东京,文武堂,1901

愛育舎編『北清連合戦史』、東京、愛育舎、1901

爱育舍编《八国联军战史》,东京,爱育舍,1901

柴　五郎述『北京籠城』、東京、軍事教育会、1902

柴　五郎述《被围困于北京》,东京,军事教育会,1902

参謀本部編『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変戦史』全八冊、東京、川流堂、1904

参谋本部编《一九〇〇年清国事变战史》共八册,东京,川流堂,1904

参謀本部編『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変戦史　付録』、東京、1904

参谋本部编《一九〇〇年清国事变战史　附录》,东京,1904

海軍大臣官房『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変 海軍戦史抄』、東京

海军大臣官房《一九〇〇年清国事变 海军战史抄》,东京

『清国事変海軍戦史資料』(東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所蔵)

《清国事变海军战史资料》(东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收藏)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第三十三巻　別冊　北清事変』、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6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件　第三十三卷　另册　北清事变》,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

北平日本大使館陸軍武官室編『北清事変北京籠城日記』、在北平日本大使館、1935

驻北平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编《义和团事变中在北京被围困日记》,驻北平日本大使馆,1935

小川量平「北京籠城日記」、『暮らしの手帖』83(東京、暮らしの手帖社)、1966

小川量平《在北京被困日记》,《生活杂记》83(东京,生活杂记社),1966

藤村俊太郎『北清事変一ある老兵の手記』、東京、人物往来社、1967
藤村俊太郎《义和团事变中某老兵手记》，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
山口　昇編『欧米人支那における文化事業』、上海、日本堂書店、1921
山口　昇编《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上海，日本堂书店，1921
菅原佐賀衛『北清事変史要』、東京、偕行社、1925
菅原佐贺卫《义和团事变史要》，东京，偕行社，1925
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各国の団匪賠償金処分問題』、東京、外務省、1926
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各国对庚子赔款的处置问题》，东京，外务省，1926

(二)研究书

園田一亀『満州における拳匪の叛乱一露国の満州占領経過』、奉天、奉天図書館叢書第一七冊(原載『満蒙』15-4、5、6、7)、1934
园田一龟《满州之拳匪叛乱一俄国占领满州的经过》，奉天，奉天图书馆丛书第十七册(原载《满蒙》15-4、5、6、7)，1934
勾川十子男『北京籠城とその前後』、北京、北京新聞社、1936
勾川十子男《被围困于北京及其前后》，北京，北京新闻社，1936
ジョージ・リンチ(George Lynch)『除滅洋鬼子一義和団変乱記』、清見陸郎訳、東京、産業経済社、1942(原書名、The War of Civilisations)

乔治·卡奇《消灭洋鬼子—义和团变乱记》，清见陆郎译，东京，产业经济社，1942

（原书名：文明战争—The War of Civilisations）

ウィール(B. L. Putnam Weal)『北京籠城』、清見陸郎訳、東京、生活社、1934(原書名、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B. L. 蒲南·威尔《在北京被围困》，清见陆郎译，东京，生活社，1943

（原书名：轻率的北京来函）

立野信之『北京の嵐—義和団変乱記』、東京、博文館、1944

立野信之《北京风暴—义和团变乱记》，东京，博文馆，1944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49)。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研究》，(东京，春秋社，1949)

佐野　学『清朝社会史　第三部　農民暴動』、東京、文求堂、1947

佐野　学《清朝社会史　第三部　农民暴动》，东京，文求堂，1947

里井彦七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とその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里井彦七郎《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及其思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

牧田英二·加藤千代編訳『義和団民話集』、東京、平凡社、1973

牧田英二，加藤千代编译《义和团民话集》，东京，平凡社，1973

村松祐次『義和団の研究』、東京、巌南堂書店、1976

村松祐次《义和团研究》，东京，巌南堂书店，1976

黒羽清隆『明治の軍隊——義和団鎮圧戦争』、東京、そしえて出版、1982

黑羽清隆《明治军队——镇压义和团战争》，东京，社会(Society)出版，1982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東京、汲古書院、1987
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7
矢沢利彦『北京四天主堂物語』、東京、平河出版、1987
矢泽利彦《北京四天主教堂传奇》东京，平河出版，1987
ピエール・ロチ(Pierre Loti)『北京最後の日』、船岡末利訳、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1989
(原書名、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
皮埃尔·罗奇《北京的末日》船冈末利译，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9
(原书名：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
路遥・佐々木衛編『中国の家・村・神々——近代華北農村社会論』、東京、東方書店、1990
路遥、佐々木卫编《中国的家庭・村落・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
佐々木衛編『近代中国の社会と民衆文化—日中共同研究・華北農村社会調査資料集』、東京、東方書店、1992
佐々木卫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众文化—日中共同研究・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集》，东京，东方书店，1992
三石善吉『中国、一九〇〇年——義和団運動の光芒』、中公新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
三石善吉《中国，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光芒》，中公新书(东京，中央公论社)，1996
佐藤公彦『義和団の起源とその運動——中国民衆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誕生』、東京、研文出版、1999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东京，研文出版，1999

(三)评论、论文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の真相(拳匪の乱)」、『外交時報』 3-30、1900

有贺长雄〈清国事件真相(拳匪之乱)〉,《外交时报》3-30,1900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における日本の態度」、『外交時報』 3-30、1900

有贺长雄〈日本在清国事件中的态度〉,《外交时报》3-30、1900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と列強」、『外交時報』 3-31、1900

有贺长雄〈清国事件与列强〉,《外交时报》3-31、1900

宮本平九郎 「南部山東省司教アンツェル氏の義和団論」、『外交時報』 3-31、1900

宫本平九郎〈山东南部主教安治泰(Anzer J. B.)的义和团论〉,《外交时报》3-31、1900

中村進午 「前駐清独逸公使ブラント氏の北清事変に関する意見」、『外交時報』 3-31、1900

中村进午〈前德国驻清公使巴兰德,有关义和团事变问题提出的意见〉,《外交时报》3-31、1900

中村進午 「清国事変に関する独国外相ビューロー伯の回章」、『外交時報』 3-32、1900

中村进午〈德国外相比罗伯爵有关义和团事变的信函〉,《外交时报》3-32、1900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と国際公法」、『外交時報』 3-32、1900

有贺长雄〈义和团事件与国际公法〉,《外交时报》3-32、1900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に関する日英外交顛末」、『外交時報』 3-32、1900

有贺长雄〈有关义和团事件的日英外交始末〉,《外交时报》3-

32、1900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に関する日英外交批評」、『外交時報』 3-33、1900

有贺长雄〈有关义和团事件的日英外交批评〉,《外交时报》3-33、1900

有賀長雄 「清国善後策における露独英意見の衝突」、『外交時報』 3-33、1900

有贺长雄〈对清善后对策中俄、德、英之间的意见分歧〉,《外交时报》3-33、1900

有賀長雄 「清国事件に関する列国外交」、『外交時報』 3-34、1900

有贺长雄〈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列国外交〉,《外交时报》3-34、1900

有賀長雄 「北京各国使臣会議」、『外交時報』 3-34、1900

有贺长雄〈驻北京各国使臣会议〉,《外交时报》3-34、1900

無著名 「清国変乱始末概要」、『国家学会雑誌』 14-162、1900

无署名〈清国变乱始末概要〉,《国家学会杂志》14-162、1900

有賀長雄 「北京列国使臣会議の功過」、『外交時報』 4-42、1901

有贺长雄〈驻北京列国使臣会议之功过〉,《外交时报》4-42、1901

青柳 猛 「義和団賛論」、『女学雑誌』 513、1901

青柳 猛〈义和团赞论〉,《女学杂志》513、1901

無著名 「北京事変終結議定書」、『国家学会雑誌』 15-175、1901

无署名〈义和团事变终结议定书〉,《国家学会杂志》15-175、1901

山田芳彦 「北清事変の国際法上の性質を論ず」、『法学新報』 118、1901

山田芳彦〈论义和团事变的国际法性质〉,《法学新报》118、1901

高橋作衛 「満州における露兵撤去」、『国際法雑誌』 2-1、1903

高桥作卫〈俄国从满州的撤军〉,《国际法杂志》2-1、1903

無著名 「外国の庚子賠款返還問題」、『北京満鉄月報』 1-3,5、1924

无著名〈外国的庚子赔款返还问题〉,《北京满铁月报》1-35、1924

無著名 「英国庚子賠尝金問題」、『北京満鉄月報』 2-2、1925

无著名〈英国的庚子赔偿金问题〉,《北京满铁月报》2-2、1925

立 作太郎 「明治二十七年の戦役とドイツ外交」、『国際法外交雑誌』 26-1、1926

立作太郎〈甲午战役与德国外交〉,《国际法外交杂志》26-1、1926

佐藤保太郎 「北清事変と日英同盟について」、『歴史教育』 1-3、1927

佐藤保太郎〈义和团事变与日英同盟〉,《历史教育》1-3、1927

永富守之助 「独逸の膠州湾、露国の旅順大連及英国の威海衛獲得事情(一)」、『国際法外交雑誌』 26-6、1927

永富守之助〈德国之对胶州湾、俄国之对旅大及英国之对威海卫的获得情况(一)〉,《国际法外交杂志》26-6、1927

矢野仁一 「義和拳乱の真相に就いて」、『史学雑誌』 38-9、1928(のち、「義和拳乱の本質」として『清朝末史』 1944に収む。)

矢野仁一〈关于义和拳乱之真相〉,《史学杂志》38-9、1928(后

改题为〈义和拳乱之本质〉收于《清朝末年史》1944 中)

鹿島守之助 「日本の対満韓政策一日英接近一」、『国際法外交雑誌』 33-1、1934

鹿岛守之助〈日本对满、韩政策一日英接近一〉,《国际法外交杂志》33-1、1934

矢野仁一 「義和拳乱と露西亜の満州占領について」、『東亜経済研究』 18-1、1934

矢野仁一〈义和拳乱与俄国占领满州〉,《东亚经济研究》18-1、1934

佐藤安之助 「拳匪事変の回顧」、『支那』 25-10、1934

佐藤安之助〈拳匪事变之回顾〉,《支那》25-10、1934

田村幸作 「団匪賠償金の由来と其後の変遷に就いて」、『支那』 26-2、1935

田村幸作〈关于团匪赔款之由来及其后之变动〉,《支那》26-2、1935

岩間徳也 「明治三十三年露国の金州占領始末及び大正十一年支那の旅大回収運動」、『満蒙』 18-5、1937

岩间德也〈一九〇〇年俄国占领金州之始末及一九二二年中国收回旅大运动〉,《满蒙》18-5、1937

古城胤秀 「北支事変と九箇国条約」、『満蒙』 18-9、1937

古城胤秀〈卢沟桥事变与九国条约〉,《满蒙》18-9、1937

田保橋潔 「義和拳乱と日露」、史学会編『東西交渉史論』(東京、富山房)所収、1939

田保桥洁〈义和拳乱与日俄〉,收于史学会编《东西交涉史论》(东京、富山房)1939

和田 清 「所謂江東六十四屯の問題に就いて」、史学会編『東西交渉史論』(東京、富山房)所収、1939

和田 清〈关于所谓江东六十四屯问题〉,收于史学会编《东西

交涉史论》(东京、富山房)1939

丹羽新一郎 「満州における拳匪の叛乱」、『収書月報』 67、1941

丹羽新一郎〈满州拳匪之叛乱〉,《收书月报》67、1941

小此木壮介 「岡田兵曹の『北京籠城日記』」、『満蒙』 22-4、1941

小此木壮介〈冈田中士的《在北京被困日记》〉,《满蒙》22-4,1941

清見陸郎 「『北京籠城』について」、『中国文学』 89(東京、生活社)、1942

清见陆郎〈关于《在北京被困》〉,《中国文学》89(东京生活社),1942

田村幸作 「所謂英独揚子江協定の再検討—義和団事変と列強外交」、『東亜学』 4輯、1942

田村幸作〈所谓英・德长江协定之再探讨—义和团事变与列强外交〉,《东亚学》4辑、1942

植田捷雄 「支那における基督教宣教師の法律的地位」、『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第一冊、1943

植田捷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册,1943

矢野仁一 「義和拳乱の真相について」、同著『清朝末史』 第四章、(大阪、大和書房、1944)

矢野仁一〈义和拳乱之真相〉,矢野仁一著《清朝末史》第四章,(大阪,大和书房,1944)

市古宙三 「義和拳の性格」、『近代中国研究』(学術研究会現代中国研究委員会編、東京、好学社、1948)〔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に再録〕

市古宙三〈义和拳的性质〉,《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究会现代

中国研究会编，东京，好学社，1948）〔转载于市古宙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市古宙三　「義和拳雑考」、『東亜論叢』六号、1948、〔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に再録〕

市古宙三〈义和拳杂考〉，《东亚论丛》六号，1948，〔转载于市古宙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山本澄子　「義和拳の性格について」、『史観』33、1950

山本澄子〈义和拳之性质〉，《史观》33，1950

波多野善大　「中国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民族文化」、『日本史研究』14、1951

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文化〉，《日本史研究》14，1951

江口樸郎　「義和団事件の意義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150、1951・3

江口朴郎〈义和团事件的意义〉，《历史学研究》150，1951・3

村松祐次　「義和拳乱——一九〇〇年——の政治的背景」、『一橋論叢』26-5、1951

村松祐次〈义和拳乱——一九〇〇年——的政治背景〉，《一桥论丛》26-5，1951

稲生典太郎　「義和団事変と連合軍総指揮官選任問題」、『国史学』55、1951

稻生典太郎〈义和团事件与联军总司令的选任问题〉，《国史学》55，1951

市古宙三　「江口樸郎氏『義和団事件』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153、1951・9

市古宙三〈关于江口朴郎的《义和团事件》〉，《历史学研究》153，1951・9

市古宙三　「一九五一年の歴史学界——清末民国」、『史学雑

誌. 61-5、1952・5

市古宙三〈一九五一年的史学界——清末民国〉,《史学杂志》61-5、1952・5

曽村保信 「義和団事件と清国政府」、『国際法外交雑誌』51-2、1952

曽村保信〈义和团事件与清国政府〉,《国际法外交杂志》51-2、1952

村松祐次 「義和団乱の社会経済的背景」、『一橋論叢』 51-2、1952

村松祐次〈义和团乱的社会经济背景〉,《一桥论丛》51-2,1952

稲生典太郎 「義和団事変と日本の出兵外交——第五師団出動に至るまでの経緯——」、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開国百年明治文化史論集』、乾元社、1952

稻生典太郎〈义和团事变与日本出兵外交——第五师团出动前的经纬——〉,开国百年记念文化事业会《开国百年明治文化史论集》,乾元社,1952

森田 明 「拳匪剿・撫両論考」、『岩手史学研究』 13号、1953

森田 明〈拳匪剿・抚两论考〉,《岩手史学研究》13号,1953

内田道夫 「庚子事変をめぐる文学」、『文化』 23-3、1953

内田道夫〈围绕庚子事变的文学〉,《文化》23-3,1953

鷲尾 隆 「義和団事件—植民地中国の悩み」、『世界史講座(東京、三一書房)、1954

鹫尾 隆〈义和团事件—殖民地中国之烦恼〉,《世界史讲座》(东京、三一书房),1954

里井彦七郎ほか 「十九世紀仇教運動の一側面上、中」、『東洋史研究』 13-1、2、4、1954

里井彦七郎等〈十九世纪仇教运动之一侧面,上、中〉,《东洋史

研究》13-1、2、4、1954

村松祐次 「義和拳・清廷・列強—平原事件から涞水事件に至る—」、『経済学研究(一橋大学)』、1954

村松祐次〈义和拳・清朝廷・列强—自平原事件至涞水事件—〉,《经济学研究(一桥大学)》,1954

村松祐次 「涞水事件と列国の出兵」、『一橋大学創立八十周年記念論集』下、(勁草書房、1955)

村松祐次〈涞水事件与列国出兵〉,《一桥大学创立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劲草书房、1955)

英 修道 「義和団事件に関する一考察」、『法学研究』(慶応大学)29-11、1956

英 修道〈有关义和团事件之一考察〉,《法学研究》(庆应大学)29-11、1956

河村一夫 「義和団事変における栄禄の事跡」(上)、(中)、(下)、『歴史研究』 4-1、2、3、1956

河村一夫〈义和团事变中荣禄之事迹〉(上)、(中)、(下),《历史研究》4-1、2、3、1956

河村一夫 「北清事変と日本」、『国際政治——日本外交史研究・明治時代』(東京、有斐閣、1957 秋季)

河村一夫〈义和团事变与日本〉,《国际政治——日本外交史研究・明治时代》(东京、有斐阁、1957 秋)

内藤潮邦 「内蒙古における拳匪の擾乱と蒙地の開放—基督教会の土地支配」、『立正史学』 20、1957

内藤潮邦〈内蒙古拳匪骚乱与蒙古地区之开放—基督教会的土地控制〉,《立正史学》20、1957

小林通雄 「義和団事変」、『世界史大系』 14(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58

小林通雄〈义和团事变〉,《世界史大系》14(东京、诚文堂新光

社),1958

故谷美子 「廈門事件一の考察」、『歴史教育』 6-3、1958

故谷美子〈厦门事件之一考察〉,《历史教育》6-3、1958

前島省三 「漢城政変—北清事変にいたる日本「帝国」外交の一側面」、『立命館法学』 29,30、1959

前岛省三〈汉城政变——义和团事变前日本"帝国"外交的一个侧面〉,《立命馆法学》29,30、1959

村松祐次 「義和団事変」、『アジア歴史事典』 2(東京、平凡社)、1959

村松祐次〈义和团事变〉,《亚州历史事典》2(东京、平凡社),1959

永井算巳 「東南保護約款について——日中関係史料よりみたる——」、『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紀要』 第9号、1959

永井算巳〈关于东南保护约款——从日中关系史料看——〉,《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纪要》第9号,1959

永井算巳 「互相保護約章と廈門事件」、『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紀要』 第10号、1960

永井算巳〈互相保护约章与厦门事件〉,《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纪要》第10号,1960

森山定雄 「義和団研究序説—初期義和団の発展過程とその性格」、『史海』(東京学芸大学)7、1960

森山定雄〈义和团研究序说—初期义和团的发展过程及其性质〉,《史海》(东京学艺大学)7,1960

江口朴郎 「一九〇〇年前後の世界」、『年報政治学 1961——現代世界の開幕』、日本政治学会編、(東京、岩波書店)、1961

江口朴郎〈一九〇〇年前后的世界〉,《政治学年报 1961——现代世界之启幕》,日本政治学会编,(东京,岩波书店),1961

野村浩一 「義和団事件前後の政治・思想状況」、『年報政治

学 1961 ·· 現代世界の開幕』、日本政治学会編、(東京、岩波書店)、1961

野村浩一〈义和团事件前后的政治・思想状况〉,《政治学年报 1961——现代世界之启幕》,日本政治学会编,(东京、岩波书店),1961

里井彦七郎・小野信爾 「十九世紀中国仇教の運動——植民地主義への抵抗」、『世界の歴史』第 11 巻、(東京、筑摩書店)、1961

里井彦七郎・小野信尔〈十九世纪中国的仇教运动——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世界之历史》第 11 卷,(东京,筑摩书店),1961

野原四郎 「極東をめぐる国際関係」、『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近代 I、(東京、岩波書店)、1960

野原四郎〈围绕远东问题的国际关系〉,《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近代 I,(东京、岩波书店),1960

阿部光蔵 「義和団事変と清廷—事変勃発時における清廷消極派の事跡を中心として」、『英 修道博士記念論文集 外交史及び国際政治の諸問題』、(東京、慶応通信)、1962

阿部光藏〈义和团事变与清廷—以事变爆发当时清廷消极派的事迹为中心〉,《英 修道博士纪念论文集 外交史及国际政治问题》,(东京、庆应通迅),1962

石田興平 「帝国主義列強の中国争奪戦とロシアの対満進出」、『彦根論叢』(滋賀大学)97、1963

石田兴平〈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国争夺战与俄国人侵满州〉,《彦根论丛》(滋贺大学)97,1963

佐藤三郎 「明治三三年の廈門事件に関する考察——近代日中交渉史の一齣として——」、『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第 5 巻 2 号、1963

佐藤三郎〈有关一九〇〇年厦门事件的考察——近代日中交涉史的一个片段——〉,《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5卷2号,1963

竹内　実　「《人民》の自己認識とその組織—義和団民話の世界」、『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29、1963

竹内　实〈"人民"的自我认识及其组织—义和团的传奇世界〉,《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9,1963

堀川哲男　「義和団運動研究序説」、『東洋史研究』 23-3、1964

堀川哲男〈义和团运动研究序说〉,《东洋史研究》23-3、1964

中塚　明　「義和団鎮圧戦争と日本帝国主義」、『日本史研究』 75、1964

中塚　明〈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史研究》75、1964

大山　梓　「北清事変と廈門出兵」、『歴史教育』 第13巻12号、1965

大山　梓〈义和团事变与厦门出兵〉,《历史教育》第13卷12号、1965

堀川哲男　「義和団運動と中国の知識人」、『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人文科学—』 15、1966

堀川哲男〈义和团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5、1966

菅野　正　「義和団事変日本輿論」、『ヒストリア』(大阪歴史学会)44・45号、1966

菅野　正〈义和团事变与日本舆论〉,《历史学(History)》(大阪历史学会)44・45号、1966

堀川哲男　「辛亥革命前における義和団論」、『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人文科学—』 16、1967

堀川哲男〈辛亥革命前的义和团论〉,《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6、1967

菅野　正　「北京議定書の締結過程—小村公使の賠償交渉を中心に」、『ヒストリア』 49号、1967

菅野　正〈北京议定书的缔结过程—以小村公使的赔偿交涉为中心〉,《历史学(History)》49号、1967

鈴木　良　「帝国主義への道—義和団事件と日本」、井上清等編『近代日本の争点』(東京、毎日新聞社)、1967

铃木　良〈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义和团事件与日本〉,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论争重点》(东京、每日新闻社)、1967

山口一之　「義和団事変日本反応——陸軍部隊派遣動機——」、『国際政治——日本外交史諸問題Ⅲ』 第37号、(東京、有斐閣)、1968

山口一之〈义和团事变与日本的反应——派遣陆军部队的动机——〉,《国际政治——日本外交史的某些问题Ⅲ》第37号,(东京,有斐阁),1968

野原四郎　「義和団運動の評価に関して」、『専修史学』 第1号、1968

野原四郎〈有关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专修史学》第1号、1968

小野川秀美　「義和団期における勤王と革命」、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所収、1969

小野川秀美〈义和团时期的勤王与革命〉,收于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东京、三嶺书房)、1969

野原四郎　「義和団運動——日本人の評価に関して」、『講座現代中国』 二 中国革命、(東京、大修館書店)1969

野原四郎〈义和团运动——日本人的评价〉,《现代中国讲座》二 中国革命,(东京,大修馆书店)1969

里井彦七郎　「義和団運動―貧乏人の天下になるんだ―」、『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第22巻(近代9)、東京、岩波書店、1969
里井彦七郎〈义和团运动―必将成为穷人的天下―〉,《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第22卷(近代9),东京,岩波书店,1969
堀川哲男　「義和団の形成」、『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人文科学―』 18、1969
堀川哲男〈义和团的形成〉,《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8,1969
久保田文次　「『義和団有功于中国説』の筆者をめぐって」、『史艸』 第11号、1970
久保田文次〈围绕"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笔者〉,《史草》第11号,1970
加藤千代　「革命伝説故事―ある民話の断面図」、『人文学報』(東京都立大学)91、1970
加藤千代〈革命传说故事―某民间传说的断面图〉,《人文学报》(东京都立大学)91,1970
堀川哲男　「義和団運動の性格――民衆の言動よりみた」、『岐阜史学』 57、1970
堀川哲男〈义和团运动的性格――从民众的言行看〉,《岐阜史学》57,1970
菅野　正　「義和団事変後の対中国政策―北京議定書の若干の問題について―」、『ヒストリア』 55号、1970
菅野　正〈义和团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有关北京议定书的若干问题―〉,《历史学(History)》55号,1970
倉橋正直　「義和団運動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 360、1970
仓桥正直〈关于义和团运动〉,《历史学研究》360、1970
小林一美　「義和団民衆の世界―近代史部会里井報告によせて」、『歴史学研究』 364、1970

小林一美〈义和团民众的世界—寄语于近代史部会上里井的报告〉,《历史学研究》364,1970

中村義・倉橋正直 「帝国主義世界の成立と東アジア」、『講座日本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

中村义・仓桥正直〈帝国主义世界的形成与东亚〉,《日本史讲座》,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

河村一夫 「義和団事変の際の近衛篤麿公の対清韓政策—佐々友房の動きを中心として」、『朝鮮学報』、57、1970

河村一夫〈义和团事变之际近卫笃麻吕公爵的对清对韩政策——以佐佐友房的活动为中心〉,《朝鲜学报》,57,1970

山口一之 「義和団事変と日本の反応(二)——火中の栗を拾う」、『国際政治——国際政治の理論と方法』 第 39 号-2、(東京、有斐閣)、1970

山口一之〈义和团事变与日本的反应(二)——火中取栗〉,《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方法》第 39 号-2,(东京,有斐阁),1970

菅野 正 「辛丑条約の成立——庚子賠款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 31-3、1972

菅野 正〈辛丑条约的缔结——以庚子赔款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1-3,1972

野原四郎 「義和団運動の評価をめぐって」、『専修史学』 第 4 号、1972

野原四郎〈围绕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专修史学》第 4 号,1972

小林一美 「書評:里井彦七郎著『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とその思想』」、『歴史学研究』 394、1973

小林一美〈书评:里井彦七郎著《近代中国的民众运动及其思想》〉,《历史学研究》394,1973

小沢礼子　「高密県阻路運動—義和団前史」、『史海』（東京学芸大学）20、1973
小泽礼子〈高密县阻路运动—义和团前史〉，《史海》（东京学芸大学）20，1973
小林一美　「中国前近代史像のための方法論的覚書」、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議編『中国民衆叛乱の世界』、（東京、汲古書院）所収、1974
小林一美〈为真实重现中国前近代史的形像，从方法论角度所作的笔记〉，收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编《中国民众叛乱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4
小林一美　「白蓮教反乱から義和団運動へ」、『歴史学の再建に向けて』（濃尾社・私家版）、1975
小林一美〈从白莲教叛乱到义和团运动〉，《为历史学的重建》（浓尾社・自家版），1975
石田米子　「義和団運動へのアプローチ」、『アジア経済』（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5-8、1975
石田米子〈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方法〉，《亚洲经济》（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5-8，1975
和田博徳　「義和団の源流—乾隆年間の義和拳と白蓮教」、『史学』（慶応大学）47-3、1976
和田博德〈义和团的源流—乾隆年间的义和拳与白莲教〉，《史学》（庆应大学）47-3，1976
久保田文次　「義和団評価と革命運動」、『史艸』（日本女子大学）17、1976
久保田文次〈对义和团的评价与革命运动〉，《史草》（日本女子大学）17，1976
山根幸夫　「佐原篤介と拳匪紀事」、山根幸夫『論集　近代中国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所収、1976

山根幸夫〈佐原笃介与拳匪纪事〉，收于山根幸夫《论文集　近代中国与日本》(东京、山川出版)，1976

佐々木揚　「日清戦争後の対露政策」、『東洋学報』 59-1・2、1977

佐佐木扬〈甲午战后的对俄政策〉，《东洋学报》59-1・2，1977

佐々木正哉　「義和団の起源」上・中、『近代中国』 1，2(東京、巌南堂書店刊)，1977

佐々木正哉〈义和团的起源〉上、中、《近代中国》1，2(东京，巌南堂书店刊)，1977

佐々木正哉　「義和団の起源」下、『近代中国』 3(東京、巌南堂書店刊)、1978

佐々木正哉〈义和团的起源〉下，《近代中国》3(东京，巌南堂书店刊)，1978

堀川哲男　「義和団運動の発展過程」、野沢豊・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国近現代史 2 義和団運動』、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

堀川哲男〈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野泽丰・田中正俊编《中国近现代史讲座 2 义和团运动》，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小林一美　「義和団の民衆思想」、野沢豊・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国近現代史 2 義和団運動』、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

小林一美〈义和团的民众思想〉，野泽丰・田中正俊编《中国近现代史讲座 2 义和团运动》，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佐藤公彦　「乾隆三十九王倫清水教叛乱小論——義和団論序説」、『一橋論叢』 81-3、1979

佐藤公彦〈乾隆三十九王伦清水教叛乱小论——义和团论序说〉，《一桥论丛》81-3，1979

佐々木揚　「一八九五年の対清・露仏借款をめぐる国際政治」、『史学雑誌』 88-7、1979

佐佐木扬〈围绕一八九五年对清・俄法借款问题的国际政

治),《史学杂志》88-7,1979

佐藤公彦 「義和団評価論争をめぐって」、『中国研究月報』398、1981

佐藤公彦〈围绕对义和团评价问题的论争〉,《中国研究月报》398,1981

佐藤公彦 「義和団(拳)源流——八卦教と義和拳」、『史学雑誌』 91-1、1982

佐藤公彦〈义和团(拳)源流——八卦教与义和拳〉,《史学杂志》91-1,1982

J.W.エシェリック 「宣教師・中国人教民と義和団—キリスト教の衣をまとった帝国主義」、『史潮』 新 11 号、1982

周锡瑞〈传教士、中国教民与义和团——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史潮》新 11 号,1982

佐藤公彦 「初期義和団運動の諸相——教会活動と大刀会」、『史潮』 新 11 号、1982

佐藤公彦〈初期义和团运动的各种表现——教会活动与大刀会〉,《史潮》新 11 号,1982

黒羽清隆 「日本人の団匪観」、『史潮』 新 11 号、1982

黑羽清隆〈日本人的团匪观〉,《史潮》新 11 号,1982

三石善吉 「義和団『以民制夷』の系譜」、『中国近現代史の諸問題—田中正美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図書刊行会、1984、所収(のち、三石善吉『中国の千年王国』、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収。)

三石善吉〈义和团与"以民制夷"的系谱〉,收于《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田中正美先生退休记念论文集》,东京,图书刊行会,1984(后收于三石善吉《中国千年王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

佐々木衛 「華北村落社会と朱紅灯義和団運動」、『社会分析

』（山口大学紀要）15、1985
佐佐木卫〈华北村落社会与朱红灯义和团运动〉，《社会分析》（山口大学纪要）15，1985
佐々木衛　「山東義和団運動の社会的性格」、『民族学研究』9、1985
佐佐木卫〈山东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性质〉，《民族学研究》9，1985
佐々木衛　「近代華北村落社会の結社的性格について」、『季刊人類学』18-1、1987
佐佐木卫〈近代华北村落社会的结社性质〉，《季刊人类学》18-1，1987
中村哲夫　「中国農村社会の市場社会と民衆生活——義和団の神々」、『歴史学研究』573、1988
中村哲夫〈中国农村社会的市场社会与民众生活——义和团的诸神〉，《历史学研究》573，1988
佐藤公彦　「義和団民衆の権力観」、『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 6 民衆文化』、東京、岩波書店、1990
佐藤公彦〈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观〉，《对系列世界史的提问 6 民众文化》东京，岩波书店，1990
佐藤公彦　「カトリック布教と郷村社会」、路遥・佐々木衛編『中国の家・村・神々—近代華北農村社会論』、東京、東方書店、所収、1990
佐藤公彦〈天主教传教与乡村社会〉，收于路遥・佐佐木卫编《中国的家庭・村落・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
路　遥　「近代華北農村秘密拳会の調査と分析—『梅花拳』組織を典型とした事件について」、路遥・佐々木衛編『中国の家・村・神々—近代華北農村社会論』、東京、東方書店、

所収、1990

路　遥〈近代华北农村秘密拳会的调查与分析—以"梅花拳"组织作为典型事件〉,路遥・佐々木卫编《中国的家庭・村落・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

久保田文次　「帝国主義と義和団運動」、路遥・佐々木衛編『中国の家・村・神々—近代華北農村社会論』、東京、東方書店、所収、1990

久保田文次〈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收于路遥・佐佐木卫编《中国的家庭・村落・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

阮　芳紀　「近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芽生え—義和団運動の発生とその特徴」,路遥・佐々木衛編『中国の家・村・神々—近代華北農村社会論』,東京,東方書店,1990

阮　芳纪〈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及其特征〉,收于路遥・佐佐木卫编《中国的家庭・村落・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

佐藤公彦　「華北農村社会と義和拳運動——梨園屯村の反教会闘争」、『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45号、1993

佐藤公彦〈华北农村社会与义和拳运动——梨园屯村的反教会斗争〉,《亚・非语言文化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45号,1993

J.W.エシェリック　「義和団の文化的前提—教派・武術・民衆文化」、溝口・浜下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5]近代化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

周锡瑞〈义和团的文化前提—教派、武术、民众文化〉,沟口・滨下等编《来自亚洲的思考[5]近代化形像》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佐藤公彦　「義和団の起源について——J. W. エシェリック説への批判」、『史学雑誌』 104-1、1995
佐藤公彦〈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对周锡瑞说的批判〉,《史学杂志》104-1、1995

(四)反基督教运动

甘粕石介　「支那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は排斥運動」、『宗教研究』 9-11、1932
甘粕石介〈中国的排斥基督教运动〉,《宗教研究》9-11,1932
野村正光　「天津教案に就いて」、『史林』 20-1、1935
野村正光〈关于天津教案〉,《史林》20-1,1935
矢沢利彦　「長江流域教案の一考察」、『近代中国研究』 1、1958
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的一个考察〉,《近代中国研究》1、1958
宮川尚志　「清末教案総考」、『岡山大学文学部学術紀要』 14、1960
宫川尚志〈清末教案总考〉,《冈山大学文学部学术纪要》14、1960
矢沢利彦　「長江流域教案の研究」、『近代中国研究』 4、1960
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研究〉,《近代中国研究》4,1960
矢沢利彦　「光緒永安教案史料」、『埼玉大学紀要』 12、1963
矢泽利彦〈光绪永安教案史料〉,《埼玉大学纪要》12,1963
佐々木正哉　「同治年間教案及び重慶教案資料(上)(下)」、『東洋学報』 46-3・4、1963・1964
佐佐木正哉〈同治年间教案及重庆教案资料(上)(下)〉,《东洋学报》46-3・4,1963・1964

佐々木正哉 「一八九三年福建惠安県教案資料」、『東洋学報』 48-1、1965
佐佐木正哉〈一八九三年福建惠安县教案资料〉,《东洋学报》48-1,1965
小野信爾 「清末の仇教運動」、『中国文化叢書 6 宗教』(東京、大修館書店)、1967
小野信尔〈清末的仇教运动〉,《中国文化丛书 6 宗教》(东京,大修馆书店),1967
佐々木正哉 「清末の排外運動 資料編」、(東京、巌南堂書店)、1968
佐佐木正哉〈清末排外运动 资料篇〉,(东京,巌南堂书店),1968
小野信爾 「清末の仇教運動と義和団」、『歴史と人物』 1972-1、1972
小野信尔〈清末仇教运动与义和团〉,《历史与人物》1972-1,1972
矢沢利彦 「乾隆丙寅福安教案考」、『論集 近代中国研究』(東京、山川出版)所収、1981
矢泽利彦〈乾隆丙寅(1770 年)福安教案考〉,收于《论文集 近代中国研究》(东京、山川出版),1981
佐々木正哉 『清末の排外運動研究』 第一冊、『近代中国』 12(東京、巌南堂書店)、1982
佐佐木正哉〈清末排外运动研究〉第一册,《近代中国》12(东京、巌南堂书店),1982
佐々木正哉 「酉陽教案補遺(上)」、『近代中国』 13(東京、巌南堂書店)、1983
佐佐木正哉〈酉阳教案补遗(上)〉,《近代中国》13(东京,巌南堂书店),1983

鉄山　博　「清末四川における半植民地化と仇教運動」、『歴史学研究』592、1984

铁山　博〈清末四川的半殖民地化与仇教运动〉,《历史学研究》592,1984

佐藤公彦　「一八九一年、熱河の金丹道蜂起」、『東洋史研究』43-2、1984

佐藤公彦〈一八九一年、热河的金丹道聚众蜂起〉,《东洋史研究》43-2,1984

佐々木正哉　「1871年広東・福建・湖広地方の仇教謡言掲帖」、『近代中国』18(東京、巌南堂書店)、1986

佐佐木正哉〈1871年广东、福建、湖广地区的仇教谣言揭帖〉,《近代中国》18(东京、巌南堂书店),1986

佐々木正哉　「日清戦争前後四川・湖南の排外風潮」、『近代中国』19(東京、巌南堂書店)、1987

佐佐木正哉〈甲午战争前后四川、湖南等地的排外风潮〉,《近代中国》19(东京、巌南堂书店),1987

佐々木正哉　「四川教案(1892—98)関係文書」、『近代中国』20(東京、巌南堂書店)、1988

佐佐木正哉〈与四川教案(1892—98)有关的文件〉,《近代中国》20(东京、巌南堂书店),1988

鉄山　博　「清末四川仇教運動の展開と守旧派官紳指導(上)(下)」、『鹿児島経済大学論集』31-4、32-1、1991

铁山　博〈清末四川仇教运动之开展与守旧派官绅的领导(上)(下)〉,《鹿儿岛经济大学论文集》31-4、32-1,1991

李　若文　「教案にみる清末司法改革の社会背景」、『東洋学報』74-3・4、1993

李　若文〈从教案看清末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东洋学报》74-3、4,1993

李　若文　「清末中国、欧米宣教師による『干預訴訟』問題の一側面—プロテスタントの対応策を中心に」、『東洋学報』76-1・2、1994

李　若文〈在清末中国，欧美传教士"干预司法诉讼"问题的一个侧面——以基督教徒的对应策略为中心〉，《东洋学报》76-1、2，1994

渡辺祐子　「清末揚州教案」、『史学雑誌』103-11、1994

渡边祐子〈清末扬州教案〉，《史学杂志》103-11，1994

吉沢誠一郎　「火会天津教案（一八七〇年）」、『歴史学研究』698、1997

吉泽诚一郎〈火会与天津教案（1870年）〉，《历史学研究》698，1997

（任明译）

八 韩 文

[韩]金希教

(一)论 文

崔文衡,「 러시아의 만주침략과 열강의 대응. 」,『 열강의 동아시아정책』, 서울 : 일조각 1979.

崔文衡:**俄国的满洲侵略及列强之对应**

《列强的东亚政策》,汉城,日朝阁,1979 年

朴月羅,「義和團運動時期의 東南互保에 대한 一考察」,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동양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1981.

朴月罗:**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东南互保的考察**

汉城大学研究生院东洋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981 年

崔文衡,「러시아의 태평양진출기도와 英日의 대응」,『歷史學報』91집,1981.

崔文衡:**俄国的进犯太平洋企图及英日的对应**

《历史学报》1981 年 91 辑

車瓊愛,「義和團運動의 性格에 대한 考察 - 清朝의 對策과 관련하여- 」,『梨大史苑』20,1983

车琼爱:**对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考察——清朝的对策及有关事宜**

《梨大史苑》1983 年 20 期

許　元,「1898 年　四川省년四川省의大足縣仇教運動」에 대하여, 서울대학교대학원 동양사학과,석사학위논문,1984.

许　元,关于 1898 年四川省大足县的仇教运动

汉城大学研究生院东洋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1984 年

金鐘健,「1899 년山東省巨野縣의仇教運動」,慶北大學校대학원사학과석사학위논문,1985.

金钟健:1899 年山东省巨野县的仇教运动

庆北大学校研究生院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985 年

金鐘健,「1899 年 山東省 平原縣의仇教運動」,『慶北史學』,9,1986

金钟健:1899 年山东省平原县的仇教运动《庆北史学》1986 年 9 期

辛容石,「清末 東南互保에 대한 一考察」,성균관대학교대학원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1986.

辛容石:关于清末东南互保的考察

成津馆大学研究生院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986 年

許　元,「청말의 기독교와 제국주의」,『釜山史學』12,1987.

许　元:清末的基督教和帝国主义

《釜山史学》1987 年 12 期

車瓊愛,「義和團의形成過程에 대하여」,『梨大史苑』22·23 합집,1988

车琼爱:关于义和团的形成过程

《梨大史苑》1988 年 22－23 合辑

崔熙在,「周漢教案과 張之洞의 대응」,『歷史教育』43 輯,1988.

崔熙在:周汉教案和张之洞的对应

《历史教育》1988 年 43 期

辛容石,「現代中國의 義和團運動認識-최근의 研究動向을 중심으로-」,『慶熙東洋學研究』1,1989

辛容石:**现代中国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以最近的研究动向为中心**

《庆熙东洋学研究》1989 年 1 期

辛容石,「義和團運動發生背景에 관한 - 考」,『湖西文化研究』8,1989

辛容石:**关于义和团运动发生背景的考察**

《湖西文化研究》1989 年 8 期

車瓊愛,「日本의 義和團運動鎮壓戰争 參加에 대한一考察」,『梨花史學研究』19,1990

车琼爱:**对日本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战争的考察**

《梨花史学研究》1990 年 19 期

金龜春,「짜르 러시아의 東北亞侵略政策」,『梨花史學研究』第 19 輯,1990.

金龟春:**沙俄的东北亚侵略政策**

《梨花史学研究》1990 年 19 期

金鐘健,「冠縣 義和團의 仇教運動」,『大邱史學』39,1990

金钟健:**冠县义和团的仇教运动**

《大邱史学》1990 年 39 期

曹永善:「義和團運動期 東南互保와 列强의 態度」,숙명여자대학교 대학원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1990.

曹永善:**论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互保和列强的态度**

肃明女子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1990 年

許　元,「청말의 선교사제국주의와 중국인의 대응」,「역사비평」13,1991.

许　元:**清末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及中国人的对应**

《历史批评》1991 年 13 期

車瓊愛,「辛丑條約案 을 둘러싼 列强間의 角逐」,『梨花史學研究』20·21 합집,1993

车琼爱:**围绕辛丑条约案列强间展开的角逐**

《梨花史学研究》1993 年 20 – 21 合期

金鐘健,「1896 年 山東省 曹·單縣 大刀會의 反教會活動」,『大邱史學』,46,1993

金钟健:**1896 年山东省曹、单县大刀会的反教会活动**

《大邱史学》1993 年 46 期

金希教,「義和團運動對第 2 次海約翰照會(The Second Hay's Note)的影響」,『歷史學報』138,1993

金希教:**义和团运动对第 2 次海约翰照会(The Second Hay's Note)的影响**

《历史学报》1993 年 138 期

車瓊愛,「러시아의 義和團運動 鎮壓戰爭 참가에 대한一考察」,『五松李公範教授停年退任紀念東洋史論叢』,1993

车琼爱:**对俄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战争的考察**

《五松李公范教授退休退任纪念东洋史论丛》1993 年

金鐘健,「19 세기山東省에서의基督教 宣教와 그 문제점」,『昌原史學』2,1994.

金钟健:**19 世纪山东省内的基督教宣教及其争论焦点**

《昌原史学》1994 年 2 期

辛容石,「19 세기 말 山東 反基督教運動의 發生 背景에 관한一考 – Anzer 의 布教活動 을 중심으로 」,『忠北史學』7,1994

辛容石:**关于 19 世纪末山东反基督教运动发生背景的考察——以安泽(Anzer)的布教活动为中心** 《忠北史学》1994 年 7 期

李銀子,「義和團運動時期保守排外派的動向」,『中國學論叢』第八輯,1994.12.

李银子：**义和团运动时期保守排外派的动向**
《中国学论丛》第 8 辑，1994 年 12 月
車瓊愛，「獨逸의 義和團運動 鎮壓戰爭 참가에 대한 一考察」，『東洋史學研究』50，1995
车琼爱：**对德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战争的考察**
《东洋史学研究》1995 年 50 期
愈長根，「清末民初 廣東社會의 金蘭會」，『東洋史學研究』52，1995
愈长根：**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的金兰会**
《东洋史学研究》1995 年 52 期
辛容石，「清光緒末年 大刀會의 出現과 仇教活動」，『阜村申延澈教授停年退任紀念史學論叢』，1995
辛容石：**清光绪末年大刀会的出现及其仇教活动**
《阜村申延澈教授退休退任纪念史学论丛》1995 年
金希教，「義和團運動和丁韙良（W. A. P. Martin）的保全領土和主權策略）」，『동아 시아의人間像（東亞的人間像』，1995
金希教：**义和团运动和丁韪良（W. A. P. Martin）的保全领土和主权策略** 《东亚关系的人间像》 1995 年
車瓊愛，「義和團運動 鎮壓過程에서의 列强間과 的角逐과 그 推移」，『東洋學研究』2，1996
车琼爱：**在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列强间的角逐及其变化**
《东洋学研究》1996 年 2 期
愈長根，「近代 中國에 있어서傳統思想과 反侵略運動」，『東北亞』3，1996
愈长根：**近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反侵略运动**
《东北亚》1996 年 3 期
車瓊愛，「義和團運動時期 李鴻章의 政治·外交的 活動－李鴻章에 대한 評價와 관련하여－」，『明清史研究』5，1996

车琼爱:**义和团运动时期李鸿章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对李鸿章的评价及其有关事宜** 《明清史研究》1996 年 5 期

金鐘健,「1897 년 獨逸의 膠州灣 占領과 그 影響」,『慶北史學』19,1996

金钟健:**1897 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及其影响**
《庆北史学》1996 年 19 期

車瓊愛,「義和團運動時期 英國의 對中國政策」,『慶熙史學』20,1996

车琼爱:**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庆熙史学》1996 年 20 期

李銀子,「清末基督教與地區社會的對應:以冠縣教案爲中心」,『中國現代史研究』第 3 期,1997.6.

李银子:**清末基督教与地区社会的对应:以冠县教案为中心**
《中国现代史研究》第 3 辑,1997 年 6 月

金希教,「抵制美貨運動期中國民衆的'近代性'」
『歷史研究』(中國)1997－8

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中国民众的"近代性"**
《历史研究》(中国) 1997 年 8 期

趙明哲,「의화단사건과 일본」,『月刊日本語』,1997.8

赵明哲:**义和团事件和日本**
《日本语月刊》1997 年 8 月

金希教,「抵制美貨運動和美國的對中國政策」,『東洋史學研究』57,1997

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和美国的对华政策**
《东洋史学研究》1997 年 57 期

金鐘健,「1897 년 山東 巨野教案 에 관한 考察」,『東洋史學研究』57,1997

金钟健:**关于 1897 年山东巨野教案的考察报告**

《东洋史学研究》1997 年 57 期

金鐘健,「1897 年년 山東 日照教案에 關한 考察」,『中國史研究』3,1998

金钟健:关于 1897 年山东日照教案的考察报告

《中国史研究》1998 年 3 期

金希教,「義和團運動與美國對華政策」,『近代史研究』(中國) 4,1998

金希教: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

《近代史研究》(中国) 1998 年 4 期

金希教,「1905 年以前韓中反基督教運動比較研究」,『韓國研究論叢』(中國) 4,1998

金希教:1905 年以前韩中反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

《韩国研究论丛》(中国) 1998 年 4 期

李銀子,「關于中國近代民間宗教與拳會的研究:爭論焦點與動向」,『中國現代史研究』第 5 輯,1998.6.

李银子:关于中国近代民间宗教与拳会的研究:争论焦点与动向

《中国现代史研究》第 5 辑,1998 年 6 月

李銀子,「1861—1863 年魯西八卦教起義與地區社會」,『東洋史學研究』第 63 輯,1998.7.

李银子:1861—1863 年鲁西八卦教起义与地区社会

《东洋史学研究》第 63 辑,1998 年 7 期

金鐘健,「清末 山東 兗州教案에 關한 考察」,『慶北史學 - 金燁博士停年紀念史學論叢』21,1998

金钟健:关于清末山东兖州教案的考察报告

《庆北史学——金烨博士退休纪念史学论丛》1998 年 21 期

金希教,「清末民衆社會的基本構造」,『東洋史學研究』64,1998

金希教:清末民众社会的基本构造

《东洋史学研究》1998 年 64 期

李銀子,「十九世紀后半期魯西民間宗教拳會的動向」,『歷史學報』第 161 輯,1999.3.

李银子:**19 世纪后半期鲁西民间宗教与拳会的动向**

《历史学报》第 161 辑,1999 年 3 月

(二)著作

金培喆,「'教案'과 義和團」,서울大學校東洋史學研究室编,『講座中國史 Ⅵ』(서울:知識産業社,1989)

金培喆:**"教案"与义和团,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

《中国史讲座 Ⅵ》(汉城,知识产业社,1989 年)

金相洙,『英國의 孤立政策清算外交—英日同盟의 成立過程을 중심으로-』,漢陽大學校 大學院 史學科 博士學位論文,1991.

金相洙:**英国的孤立政策清算外交——以英日同盟的成立过程为中心**

汉阳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1991 年

李時岳 著,李銀子 譯,『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漢城:高麗苑出版社,1992.2.

李时岳著,李银子译:**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汉城,高丽苑出版社,1992 年 2 月

許　元,『清末 서양교회의 内地不動産租買權和教案』,1994 년도 연세 대학교 대학원 사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

许　元:**清末西洋教会的内地不动产租买权和教案**

1994 年度延世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

車瓊愛,**의화단 운동과 제국주의 열강**

车琼爱:**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列强**

裕英图书出版社,1995 年

金鐘鍵,『19 世紀末 山東地域 反教會活動과 初期義和團運動』,

1995 年 년도 경북대 대학원 사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
金钟健:19 世纪末山东地域反教会活动和初期义和团运动
1995 年度庆北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
愈長根著,『近代中國의 秘密結社』,高麗苑,1996
愈长根著:近代中国的秘密结社
汉城,高丽苑出版社,1996 年

(李劲军译)

后 记

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义和团研究一百年》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本书力图对百年来义和团研究的发展进行比较全面的回顾与反思,同时为新世纪的义和团研究者提供学术便利。本书是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为"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准备的学术成果之一。在本书编撰过程中,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的陈振江、程歗、黎仁凯等同志始终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顾问李文海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山东大学教授路遥、李德征先生也一直关心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曾业英、黄春生先生也给予过必要的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数位海内外学者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学术贡献,还有一些学者和朋友们热情地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狄德满博士,在得知我们在搜集西文研究目录的困难后,他在完成西方义和团研究的述评和英文论著目录的同时,又主动地提供了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其他西文的论著目录。为使读者能够得到尽量全面准确的信息,他多方搜求,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正,直到本书付梓之时方告结束。山东大学历史系留德学者孙立新先生、奥地利科研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卡明斯基博士以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赴法国

访问学者刘海岩先生也为西文研究论著目录做了有价值的补充。另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郭凤歧先生为中文书目索引增补了部分条目，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亚洲老师和彭晓宇同学进行了俄文目录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郑敏同志帮助核对了某些资料。齐鲁书社的金之平女士、刘志义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鼎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真诚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乖舛难免，敬请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资助，谨志于此。

苏位智　刘天路

2000年9月于山东大学

访问学者刘海岩先生也为西文研究论著目录做了有价值的补充。另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郭凤歧先生为中文书目索引增补了部分条目，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亚洲老师和彭晓宇同学进行了俄文目录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郑敏同志帮助核对了某些资料。齐鲁书社的金之平女士、刘志义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鼎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真诚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乖舛难免，敬请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资助，谨志于此。

苏位智　刘天路

2000年9月于山东大学

访问学者刘海岩先生也为西文研究论著目录做了有价值的补充。另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郭凤歧先生为中文书目索引增补了部分条目，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亚洲老师和彭晓宇同学进行了俄文目录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郑敏同志帮助核对了某些资料。齐鲁书社的金之平女士、刘志义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鼎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真诚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乖舛难免，敬请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资助，谨志于此。

苏位智　刘天路

2000年9月于山东大学

访问学者刘海岩先生也为西文研究论著目录做了有价值的补充。另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郭凤歧先生为中文书目索引增补了部分条目，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亚洲老师和彭晓宇同学进行了俄文目录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郑敏同志帮助核对了某些资料。齐鲁书社的金之平女士、刘志义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鼎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真诚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乖舛难免，敬请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资助，谨志于此。

苏位智　刘天路

2000年9月于山东大学

访问学者刘海岩先生也为西文研究论著目录做了有价值的补充。另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郭凤歧先生为中文书目索引增补了部分条目，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亚洲老师和彭晓宇同学进行了俄文目录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郑敏同志帮助核对了某些资料。齐鲁书社的金之平女士、刘志义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鼎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真诚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乖舛难免，敬请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资助，谨志于此。

苏位智　刘天路

2000年9月于山东大学